

(上)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拿破仑时代 (上)

 **eBOOK**
网络资源 非卖品

联邦德国总理

阿登纳

Konrad Adenauer

Konrad Adenauer



王蕾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引 子

196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已经隐退了联邦总理的身影又像往常一样，出现在美丽的科摩湖畔。这时候，太阳正从远处的群山中收敛最后一丝光辉，天空带着最后一幕深沉的碧蓝，科摩湖上轻烟正起，仿佛笼着一层薄薄的雾纱。远处教堂的尖顶隐约可见，教常的钟声则回响在整个山谷、湖面……

意大利南部的卡德纳比亚是有名的渡假胜地，这里秀丽迷人的湖光山色吸引了无数的名人游客。1957年春天，当阿登纳第一次来到卡德纳比亚休养时，就立即爱上了这里的风光，也爱上了科摩湖。从那以后，一年两次的休假他总是来到卡德纳比亚。他在罗萨别墅住过，也在阿尔米尼奥别墅住过，可他最爱的还是科林纳别墅。从1959年秋天开始，他一到卡德纳比亚就住在科林纳别墅。这儿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散步小径，并且离公路很远，可以避开汽车喇叭声的干扰，也可以避开好奇的旅游者的围观。

卡德纳比亚的历史环境给阿登纳的印象很深，尤其是科摩湖，在他的脑海里时时都闪现着维吉尔吟颂科摩湖的诗句。大普林尼和小普林尼也都描述过此地的生活和美丽的景象。小普林尼还有列奥那多·达·芬奇都曾在卡德纳比亚对岸的贝拉季奥住过。贝拉季奥是一座幽静的小城，有着十九世纪的遗风，它那古香古色的旅店闪现着昔时的光辉，引人遐思。

此时，阿登纳静立于湖边，远眺着湖的另一边，默默沉思着……

早在1963年底阿登纳下台之后不久，他便与斯图加特德意志出版社和法国阿歇特出版社签订了合同，由它们来出版他的回忆录。当时谈妥，回忆录德文版版权归德意志出版社所有，其他语种的版权都归阿歇特出版社所有。可是春假将近，回忆录还没有着落，几乎一字未成。他不久便将转回波恩，在那里写作的机会便将更少。尽管他已经不是联邦总理了，可他仍然是基民盟的主席，有许多党的工作还等着他去做，而他最担心的还是继任的文哈德政府外交政策的新动向。

阿登纳已经坐在湖边的一块石头上了，手中摆弄着一根草梗。他突然间跟随他的秘书安娜丽丝·波萍迦小姐：

“您知道伦巴人和腊万纳的拜占庭总督之间在科摩湖畔进行过决战吗？”

不等回答，他又接着道：

“您可知道，1176年巴巴罗萨在雷那诺战役失败以后，曾经设法从这里沿湖岸逃跑，以摆脱身后的追兵。人家差一点没把他给逮住！”

“您知道为什么希姆布赖人未能征服整个意大利呢？”

波萍迦小姐沉默着，她等待着联邦总理的回答。她习惯当联邦总理思维跳跃时保持沉默，她知道他并不期待她的回答。阿登纳抬眼望着湖面上越来越浓的雾气，站起身来，道：“小姐，我们走吧！”接着他讲起了希姆布赖人的故事。

“我曾经读过一本名为《疾病创造历史》的书，书中讲希姆布赖人曾经在波河三角洲安营扎寨，后来那个地方流行伤寒症，把他们活生生给毁了。”

“您知道吗？这本书的确耐人寻味，这确实说明，像疾病暴起之类的纯偶然性事件，往往对事态的发展进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搞政治之所以非常棘手，也就在于政治的发展难以逆料。”

讲到此处，阿登纳忽然停下了脚步，回身望着暮色苍茫中的科摩湖，一

字一顿道：

“因此，要能够并且永远能够无所畏惧，就得沿着一条看准了的正确道路前进。必须勇敢、坚毅、耐心，这才是政治上正确的根本。”

草梗依然在他的手中转动，阿登纳沉默了。他的脑海中翻腾着政治这个词，几十年的风雨苍桑一幕幕如映画般闪现在他的眼前。从科摩湖吹来的风柔和而又湿润，一切如同发生在昨日，童年的往事越来越清晰……

夜幕已经降临了。繁星满天，仿佛是嵌在黑色天鹅绒上的宝石在闪亮。宇宙如此浩瀚，阿登纳沉浸在对柱事的追忆之中……

前 言

1963年春日，年届八旬的联邦德国总理康纳德·阿登纳仍像平日一样，十点钟准时迈进波恩的绍姆堡宫，然后直接进入总统府二楼的联邦总理办公室，开始工作。他精神矍铄、身体健康，每天完成的工作量和比他年轻20岁的人一样多。他那挺直的腰板也使任何人都难以相信他已是耄耋之年。阿登纳决不服老，若是有人偶尔问起年纪是不是会影响他的视力，联邦总理会取下眼镜让他看，并告诉这人，他戴眼镜不是为了帮助阅读，而仅仅是用来保护他的眼睛免受紫外线的伤害。阿登纳的眼睛曾在早年的一次车祸中受过损伤，不能受强紫外线的刺激。由于年纪的关系，阿登纳每天在13点至14点的午餐后都要稍事休息，但若有人问起午睡得如何，他会生气他说：“我没睡，正忙着呢！”

这也许并不仅仅是虚荣心在作祟。阿登纳和丘吉尔、戴高乐一样，很难想象自己被别人取代，并相信自己对国家和民族负有使命。也的确如此。对德国人民来说，在战败后充满迷惘的时刻，阿登纳总理是信念和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他带领他们走出废墟，重建家园，重新树立起德意志民族的新形象。阿登纳坚信，他对西德的生存必不可少。1949年9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西方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基础上成立，阿登纳在联邦议院的选举中仅以一票之多当选为联邦总理。他说这一票是自己所投，坚信是命运要让他担负起使德意志民族复兴的重担。

有一天，有人不小心说出他终将会离职的问题，阿登纳楞了一下，然后敷衍搪塞道：“是的，我有可能在车祸中丧生。”年迈的他从来不想离开他的战斗岗位。1966年1月5日，阿登纳的90岁寿辰，联邦政府为此煞费苦心：上午在联邦议院大厦举行祝寿盛典，下午在绍姆宫召开了内阁特别会议，邀请曾经在他手下担任过联邦各部部长的全体人士参加，晚上由联邦总统举行国宴。晚上，各界来宾云集霍夫花园，盛况一时。阿登纳挺直腰板、毫无倦意地接受了人们对他的敬贺。一位曾经在他80岁生日采访过他的记者告诉他：“我期望在您百岁时再来采访您。”阿登纳神采奕奕的答道：“当然，我会告诉我的秘书把这件事记下来。”

自始至终对政治斗争保持着旺盛充沛的精力和顽强斗志，是阿登纳在战后众多杰出的政治家中最有特色的一点。他登上权力顶峰时已73岁，这是大多数人早已退休的年龄。在西德成立前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次重要会议上，阿登纳昂首阔步而入，坐了下来，宣布自己在与会者中间年龄最长，因而理所当然应该担任会议主席，其他人在惊愕之余竟没有想到要抗议，于是他自动行使主席责权。

对德国的忧虑和责任感使阿登纳终生都保持了对政治生活高度的热情。二战后担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也是在70多岁才当上首相的，吉田一直认为竞选活动是一种使人烦恼，甚至是有失身份的苦事，堪称政坛斗士的尼克松也认为竞选是一种折磨，但阿登纳却屡屡表示：“我喜欢竞选活动。我乐意能为自己的信念而战斗”。他热爱同批评者辩论并反击他们，他也热爱政治辩论的空气与胜利者的荣誉。联邦德国的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从1949年立国开始，阿登纳经历了四次大选，每一次他都充满了斗志。他在总理位子上干了14年，直到1963年才不得不下台。

阿登纳是名副其实的政坛斗士，实际上他不仅对政治热爱，而且相当精

于此道。尽管年纪大，他的精力却让所有的人吃惊。他曾经讲，最好的政治家是“能把别人坐垮”的人。他懂得政治斗争的策略，他与联邦议院打了14年的交道，几乎每次总能实现他的愿望。政治是他的提神剂。他总是耐心地坐在那里，等着困倦不堪的反对者一个又一个的接受他的观点。

1958年9月14日，阿登纳到戴高乐家乡科隆贝会晤了这位号称法兰西民族骄傲的独立斗士。自此，两位伟人彼此钦佩，结成终生友谊。戴高乐有帝王般的傲慢，不屑于同政敌们在政治的角斗场上交手。阿登纳则不然，他喜欢短兵相接的个人政治搏斗。或许是时势造英雄，作为一个被占领国的领导人，阿登纳的实权受到了盟国的严格限制，同时，他在国内的政策也受到强大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挑战，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库特·舒马赫几乎在一切问题上反对阿登纳的立场。形势决定了阿登纳在同盟国和政府内部的对峙时，都必须大大依靠他的常识和他顽强的、钢铁般的耐心。他必须时时准备为自己的观点辩驳，时时准备反击对手。他不得不全力以赴作政治角逐。

像众多伟人一样，阿登纳把政治作为一种艺术，在政治风云变幻中，他总能在适当的时候避开不利处境，变被动为主动。他总是进退有度。“度”的把握来自于他对敌方和己方情势的周密审视，也来自于他多年从政的丰富阅历。他的政治生涯长达57年。早在二战以前，他就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德高望重的“科隆之王”，自1917年起，直至1933年希特勒把他赶下台，他一直担任科隆市长。在宦海沉浮中阿登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漫长的政治生涯也使阿登纳谙熟以势压人的策略。在他任职期间，许多人在背后议论他独断专行、冷酷无情，他丝毫不在意，甚至否认这一点。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大多数政策都是他独自作决定的，他顶多参考一下别人的意见。阿登纳的政治艺术中还有一个绝招：即善于在紧张气氛中注入幽默机智的调剂。1959年赫鲁晓夫又一次挑起柏林事端。值此东西关系骤然紧张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患肺癌不幸去世。杜勒斯是阿登纳挚友，阿登纳前去美国参加杜勒斯葬礼。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白宫为前来参加葬礼的外国贵宾举行了招待会。会上，阿登纳看见当时作为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正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站在一起，便走了过去。葛罗米柯是刚从日内瓦飞来的，当时日内瓦会议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的讨论已陷入僵局。尼克松为使空气轻松些，说很多人都认为自己与葛罗米柯外长外貌相似。阿登纳听罢，凝神看了看他们两人，然后莞尔一笑，道：“的确如此。不过，这倒使我有了一个打破日内瓦僵局的主意：尼克松你搭上飞机飞回日内瓦，让葛罗米柯留在这里当副总统。这样一来，我敢肯定日内瓦会议会迅速取得进展。”谈笑声中，微笑爬上了阿登纳那原本崩紧的面孔。

这就是阿登纳，战后联邦德国的奠基人。他身高六英尺二英寸，身材魁梧，精力充沛。人们很难从他那锐角形的狮身人面像似的面孔中看到他的内心世界。只能感受到他目标明确、意志坚强，还有他超人的耐心——一旦目标选定决不半途而废。他看起来目空一切，独断专行，自以为一贯正确，无懈可击；他从不暴露自己的任何弱点，从不给人以可乘之机，也从不需要别人给自己鞭策和劝告；他懂得与人交往的艺术和掌权的技巧，从不轻信他人，但却知人善任；他喜欢简单明了，好作即兴演说，讨厌重复，却从不厌倦反复谈论政治原则。像他的朋友丘吉尔和戴高乐一样，他热衷权力，并以一种几乎不容争辩的地位充分地运用权力；也像丘吉尔和戴高乐一样，他从未想

过自己会离开权力顶峰。他的对手们称他为“狡猾的狐狸”，他们每每试图反对他，可事实总是证明了这是徒劳无益。他把政治视为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在90岁高龄之际，他仍出访了以色列和西班牙。在那儿，面对欢呼的人群，他毫不知倦地作了激动人心的即席演说，以他的严密的逻辑和娴熟的演说技巧征服了到场的每一个人。

这就是阿登纳，不能想象德国没有阿登纳，就像英国没有丘吉尔、法国没有戴高乐一样。戴高乐曾说：“非伟人成不了大业”。阿登纳无疑是戴高乐所指的伟人。他在废墟中创立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被誉为“第四帝国”，比之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它拥有无限的“生存空间”任其发展，并用数百万计的大众汽车、机床、机车、重型工业设备、机器、发动机和其它出口商品，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商业桥头堡，这远比希特勒用几百万军队对欧洲、俄国和非洲进行的失败战争征服所建立的桥头堡更加稳固和持久。今天，由于联邦德国优越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高科技技术，它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饮水思源，人们把联邦德国取得的成就归功于阿登纳，并把他称作是“联邦德国之父”。

尼克松在他所著的《领导人》里曾写到：“提出一种主张是一回事。在合适的时机提出这种主张是另一回事。而能够成为把这种主张付诸行动的人，又是另一回事。恰恰是这三者构成了阿登纳的伟大之处。”

同欧洲战后的另外两位巨人——丘吉尔和戴高乐——相比，阿登纳有时被形容得索然无味，暗淡无华。作为二战的英雄，丘吉尔和戴高乐的品格被人们夸大：丘吉尔机智风趣，并有贵族风度；戴高乐的孤僻高傲和虚饰夸张，也符合他作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缔造者和领导人的身份。但是作为战败国的领导人，阿登纳若像他们那样表现，对战败的德国来说却危险而不合时宜。相比之下，阿登纳的表现更现实、更精明。他有律师般善作分析的头脑，又有等待成功的耐性。丘吉尔爱挖苦人，喜欢争论，常常精心设计一个讽刺令对手的抨击落空；而阿登纳总是用精心研究的办法来驾驭事物，以猜透和揭穿批评者计谋的办法驳倒对方。他的做法体现了德国人处世哲学的一切特点：刻板、严谨、勤奋、一丝不苟和不屈不挠。阿登纳认为，西德只有全力以赴、奋斗不已，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获得主权、安全和繁荣。他实践了他的一切信条。毫无疑问，他和他们尽管各人特点不同，却同样伟大。戴高乐在一生中把阿登纳作为政治上的对手和合作伙伴来尊重，而一向用词刻薄的丘吉尔则在1953年对下院说，阿登纳是“自俾斯麦以来最英明的德国政治家”。

1963年的一个秋日，阿登纳结束了在联邦议院作为联邦总理的最后一次演讲后，毫无表情地走下了主席台。联邦议院的一位议员——阿登纳每年的政治对头——想对即将离任的阿登纳表现得大度一些，于是站了起来，恭敬地对阿登纳说：

“总理先生，您在1954年筹划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的主张，现在证明是正确的。”

阿登纳冷冰冰地盯着此人，然后作了一个尖刻的答复：

“你我的区别，就在于我善于掌握时机。”

阿登纳用寥寥数语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成功之道……

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

第一章 流年似水

莱茵少年

1876年的圣诞钟声敲响了，那天晚上

科隆下了大雪，清晨时，茫茫大地为积雪所掩盖，莱茵河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大雪还在飞扬。

可是，在巴尔杜英街的一所房子里却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圣诞树上挂满了幸运星、幸运球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礼物。孩子们正围坐在母亲身边，天真地问：

“妈妈，圣诞老人什么时候给我们带来小弟弟呀！”

“快了，快了，等到天空又变得蓝蓝的，那时候，圣诞老人就会把小弟弟给送来的。”

几天之后，一个新的生命在这所屋子里呱呱坠地。是个男孩，他的到来给全家增添了一分欢喜。圣诞的钟声刚刚敲过不久，在科隆高等法院作首席书记官的一家之主感到新生儿的到来似乎得自天赐，于是为新生儿起了一个和自己相同的名字——康纳德·阿登纳。

这是一个标准的德意志帝国中等文官的家，并不算富裕。老康纳德并非出身贵族豪门，他的一切都是靠他一生奋斗所得。尽管他的职位不错，可是家里的开销也很大。在小康纳德出生之后，他又生了一个女儿，这样家里一共有四个小孩，三子一女。那时候还没有节育这一说，阿登纳家又是虔诚信奉天主教的，老康纳德深信孩子是上帝赐予的。

老康纳德的青年时代很艰苦，他很早就成了一个孤儿。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有一次上树摘果子，结果掉下来摔死了。父亲死后，再也没有人关心他的求学问题，也没有人愿意为他提供学费，因此他年纪轻轻就得自食其力。适龄后他主动去当兵服役。他在军队呆了十二年，参加过1866年的普奥战争，著名的克尼希格雷茨战役时他也在场。那时他作战勇敢，还负了伤。此次战役后，为了表彰他的英勇善战，他由下级军官晋升成为军官。这种形式的表彰在普鲁士军队里极其罕见。他是一名合格的军人。

但老康纳德却不愿再做军官了，因为他已经同一位漂亮的姑娘订了婚。军官申请婚假需要交付一笔保证金，他没有这笔钱。好不容易盼到了十二年服役期满，他回到家乡和等待他多年的未婚妻结了婚，然后踏上了中级文官的仕途。

他的妻子是一位勤劳节俭、精明能干的女人，老康纳德虽为了她而放弃了在普鲁士军中的似锦前程，但却终身不悔。夫妻俩感情非常好，终生不渝。她总说是天主赐予她这生活中美好的一切。在丈夫努力工作时，她操持家务，教育孩子，还利用闲暇空余时间为人缝补围裙来增加家庭收入。夫妻俩一起尽力使家庭安定、快乐。在母亲的教导下，小阿登纳和哥哥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他们知道很多东西都来之不易。到老年了阿登纳还能记起他儿时帮助母亲烫衣服、钉扣子、做家务的情形。

俾斯麦帝国时代的科隆还远没有它今日的繁华，那时科隆的街头只有马

指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争夺德意志领导权于1866年6月开始进行的普奥战争，结果是普鲁士胜，俾斯麦得以在小德意志范围内实现统一。

车和马拖的公共车辆，一切都安详而舒适。1880年科隆大教堂的落成使安静的科隆城整整热闹了好一阵子。落成典礼那天，小阿登纳和他父亲一起去看游行。当时他们站在火车总站附近一个好友家的阳台上。游行的人群过去之后，威廉一世皇帝乘着华丽的四轮轻马车，就紧挨在他们面前驶过，尾随其后的是一大堆穿着制服的德意志帝国的达官显贵，个个衣着华丽。小阿登纳一直目送这支浩大的队伍绝尘而去，兴奋不已。

入夜，科隆大教堂灯火辉煌，和天上的星星相互辉映，记忆中的这一天是小阿登纳最美好的节日。那时，他刚满4岁。

物价在飞涨，政府的津贴却一直没有增加。随着孩子的增多、长大，必要的支出越来越多，阿登纳一家的生活也日渐拮据。孩子们都学会了抑制某种愿望。小阿登纳到了七八岁时，非常向往能够得到一把细工锯，这样他就可以做一些想做的东西。但他却忍着没有向父母开口。圣诞节到了，他期待、盼望、甚至做梦，但礼物桌上却没有送给他的细工锯。他沮丧极

了。后来，母亲终于知道了儿子的希望，她一点一点省出钱来，悄悄去买了一把，放在衣橱的枕套下。小阿登纳欣喜地发现了它，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收起来。直到中学毕业，这把细工锯一直伴随着他。

尽管家里生活不富裕，但小阿登纳的童年无疑是幸福的。在科隆的家里，他们有一块小园地，小阿登纳可以自己栽种植物。后来培植花草成了他终生的爱好。那时候他不断地进行试验，想培育出新品种。例如，他想把犊牛儿与蝴蝶梅杂交，但没有成功。父亲劝慰他说：“孩子，可不能跟上帝作对啊！”于是他放弃了这种努力。在他十一二岁时，老康纳德把家迁到了沙芬街的一所公寓里，小阿登纳失去了园子，深感悲伤，但他很快就想办法弄到一些盆子和木箱，在阳台上继续栽培他的花草。

那时阿登纳的父母经常带着孩子们去乡下度假。在波恩近郊莱森尼希的一个幽静的小村子里，有父亲年轻时的一位好友，后者是教会职员，但开了一家旅店。阿登纳一家就住在那旅店里。阿登纳热爱这儿的一切。每次到莱森尼希，他总去看教堂仓库顶上的那一对猫头鹰。它们在仓库顶上筑了窝巢，总从一个圆形的窗口里飞进飞出，他常常看到它们在黎明时分飞出去觅食，他喜欢这大鸟振翅高飞的样子。

有幸保存的阿登纳少年时的一张照片是在乡间拍的。照片上的五个孩子都藏在一个草垛的后面，只露出头部。其他四名少年皆顽皮地露齿而笑，阿登纳却一本正经，表情严肃，但是他的左手却伸在草垛上面，向着镜头挥动，使人很容易将他分辨出来。这张照片显现出日后阿登纳的典型性格：故意表现出矜持和超然，而又自得其乐。

不过，儿时的阿登纳还是异常天真的。有个星期天，母亲为他穿上了一件天蓝色的新上装，带上白袖头，脚上还穿了一双翻口长统靴，然后带着他一块去做弥撒。他自己感到神气极了。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对年轻夫妇。女的对她丈夫说：“看，巴杜尔英街最漂亮的小伙子过来了。”阿登纳很自豪地把这话告诉了母亲，大家知道了都乐坏了。以后家里人常常拿这话打趣他——“喂，巴杜尔英街最英俊的小伙子，怎么样了？”

这是难得的一次，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阿登纳其实相当害羞。遇到有人跟他讲话，他总是遮着脸，当他意识到这个弱点之后，经过好几年的强烈克制，才终于能够很自如地讲话。

小时候他经常生病，在父母的鼓励下，他努力锻炼自我克制的能力。整

整有一年的时间，他的腿出了毛病，不得不在髓部到腿部这一段打上钢夹。尽管那时他不能像别的小孩一样到处奔跑，但他终于战胜了病痛痊愈了。从此以后，他几乎很难再生病了，但他终身都记着母亲那时教他的那首诗，是海因里希·海涅的《赴克弗拉尔朝圣）：

母亲站在窗旁，
儿子睡在床上
“你不想起来，威廉，
去看看列队游行？”

“啊，妈妈，我病成这样，
不能看，也无法听。
想起死去的格蕾茜，
我心痛如焚。”“起来，我们去克弗拉尔，
带上圣经和玫瑰花环；
圣母将完全治好，
你那惧病的心。”

克弗拉尔圣母，
今天穿上盛装。
来了许多病人，
她可要忙个不停。

病人到她跟前，
齐把祭品献上：
那是蜡造的四肢，
蜡手蜡脚一大堆。

谁献上一只蜡手，
就治好他手上的创伤；
谁献上一只蜡脚，
他的脚就完好如常。

直到年老时，阿登纳仍能完整背诵这首诗。

老康纳德教育孩子们从小要勤俭节约、热爱真理。他尽力让他们感到忍耐和责任感的重要性，他以他对天主教义的理解，教给了孩子们基本的生活规律和待人接物的方式，然后让他们自由发展。他从不向孩子们隐瞒真象，他让孩子们知道家庭的状况，并让他们参予家庭决策。有一年，家里窘迫到了再也买不起圣诞树的地步。于是老康纳德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让孩子们选择，究竟是一连几个星期天的午餐都不吃肉，省下钱来买圣诞树和蜡烛呢？还是反过来。孩子们都选择了后者。

小阿登纳的启蒙教育是在他父亲帮助下完成的。他跟父亲学习了一年级的课程，这样他一进入小学就连跳了两级。父亲也发给他学习证明书，这些证明书他一直都保存得很好。父亲为人很严厉，经常告诫孩子们要忠于职守。有一次，一个哥哥因听到火警而撂下功课不做跑去看时，遭到了父亲的严厉

谴责。父亲说：“哪怕有人在向你开炮，你也得继续工作！”这件事在小阿登纳的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当时他们几兄弟都非常尊重和理解父亲。父亲用过的象牙柄手杖，是全家引以为荣的骄傲。

小学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按照父亲的意愿，阿登纳进了科隆的教会中学。当时的中学是9年制，要学的东西很多，数学、理化、历史、地理、拉丁文、德文、法文、劳动等等。每周有36节课。阿登纳是个勤奋的孩子，在学校里常得老师的表扬。在中学里他对文学、艺术、历史、自然科学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几乎对所有的一切着迷。家里简单的机械都被他拆修过，他常常钻到教堂和博物馆几小时几小时地凝神看里面的藏画，他会向他认为是每一个能够告诉他一些知识的人追问关于宇宙终极的问题，并且他每天不厌其烦地伺弄他的花草和小鸟。这些爱好他一生都保有。当他当上联邦总理之后，他几乎每到一个国家，总是提出要参观当地的博物馆，长年的兴趣与修养的积累使他有着很高的评鉴水平。他最喜爱的一幅画是斯特凡·洛赫纳的《蔷薇丛中的圣母》，画中的圣母玛利亚贞洁而娴静地怀抱圣子，姿态优美动人。他始终感到画中的圣母透

出一种伟大的爱和伟大的孤独感。他每次形容起这幅画时，总是富有诗情画意。

阿登纳的家乡位于德意志西南部的莱茵兰，这里一直是德意志思想、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科隆是莱茵的中心，靠近法

国，大革命的自由民主思想曾经一度在这儿兴盛，和德意志其它地区相比，莱茵在思想上相当开放，接近于西方，有自

由主义的传统。大革命失败后，西欧一些自由主义者逃到莱茵，带来了启蒙思想，因而莱茵人从不认同于普鲁士传统，直到普鲁士宰相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用“铁和血”统一德意志，将莱茵纳入版图之后，莱茵人仍为他们的自由传统而骄傲。

少年阿登纳像海绵吸水一般地拼命吸取莱茵的思想文化。他最早得到的一本书是莱茵民间传说集，那是他用帮助母亲挑

花和在围裙上钉纽扣赚的钱一分尼一分尼攒起来买的。他还用这些钱订了一份美术月刊，上面刊登着各种绘画和雕塑学

派的精美复制品。他把这些看作他十分珍贵的财产。他渐渐地热爱读书了，他念了索菲·韦里斯赫夫尔的许多著作，她几乎每年出一本厚厚的书，描写在那炎热而遥远的南美洲所发生的

故事。他读完了儒勒·凡尔纳和卡尔·迈的全部作品，经常神游在凡尔纳的探险世界。从中学六、七年级开始，他花大

量时间来研究艺术史。从十六岁开始，他每年的圣诞礼物都是一本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他喜欢圣诞节第一天从教堂回家后坐在圣

斯特凡·洛赫纳（Stefan Lochner 1410—1451）晚期哥特式科隆画派的主要画家，代表作之一是《蔷薇丛中的圣母》（MadonnainRosenhag）。

指1789—1804年法国大革命。

分尼（Pfennig），德国辅币，一马克为一百分尼。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法国小说家。

卡尔·迈（Karl May，1842—1912）德国文学家。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国小说家。

庭树下快乐地读他的新书。此外，他还读康西安

斯、弗里德里希·威廉·韦贝尔等的书，以及歌德、席勒的作品，路德维希·乌兰德、埃马努埃尔·盖贝尔等的诗歌。他喜欢那些富于哲理的诗句：

我目睹那森林换上秋装，
灰蒙蒙的天空毫无声响；
我昏沉沉地感到即将死亡，
却不知道原因来自何方……

一个清脆的声音，
蓦然在头上高鸣；
那是一只过境的候鸟，
踏上了南飞的征程……

每当读到这样的诗，阿登纳感到思绪万端，充满了对人生探索的渴望。

阿登纳的求知欲在书海驰骋中日强一日。但他此时仍然只是科隆沙芬街上的一个少年，少年人的心性使他也不乏顽皮。他像所有那个年龄的孩子一样不喜欢学校。在念中学2年级的时候，他所在的中学正值25周年校庆，阿登纳便和他的朋友们作了一首有趣的打油诗：

啊，你这古老的痛苦之箱，
二十五载于兹，
你成年累月，
把青年人折磨摧残。

他喜欢和朋友们一道高唱：
到了星期天三点半，
我们且去跳舞寻欢！
你看他风度何翩翩，
一颗颗耀眼的钮扣，
衬托出上衣分外鲜艳。
她的柳腰多纤细，
配上一对长长的金发辫。

他常和同学们一道玩捉弄老师的游戏。由于他们的顽皮，一位老师常常恼怒到极点，于是他们画了一张老师怒发冲冠、气歪了嘴的漫画，贴到了教室的墙上；对另一个老师他们采取了另一种方法。课间休息时，他们把碎纸片沾上唾液，贴到天花板上，到上课时纸片干了，从天花板上纷纷落落飘落下来，课堂大乱，老师气歪了鼻子。

中学毕业考很快就到了。考试之前，他和几个同学事先得知三个德文作文考题以及规定考的拉丁文课文。在阿登纳的领导下，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在同学中间分配好题目，并拟定好了文章结构。为了使拉丁文考试的准

康西安斯（Hendrik Conscience，1812—1883），佛兰德所作家，作品有《佛兰德斯的狮子》。

弗里德里希·威廉·韦贝尔（Friedrich Wilhelm Weber，1813—1896）德国作家，作品有《十三株菩提树》。

约翰·路德维希·乌兰德（Johann Ludwig Uhland，1787—1862）德国诗人。

埃马努埃尔·盖贝尔（Emanuel Geibel，1815—1884），德国诗人。

备做得更充分，他们甚至按照一向的评分标准预先确定好了应错几个。但一向诚实的阿登纳并不感到轻松，他度过了好多个不眠之夜，有时他梦见补考，从睡梦中惊醒。这件事他终身牢记，从此对弄虚作假深恶痛绝。

大量的阅读使他在拉丁文、历史、德文等几门专业课上相当突出，这些知识成为他今后在政坛上发挥的深厚基础。他在以后的政治讲演之中常常突如其来地引用拉丁文成语，而这些成语大多是在他中学时学来的。中学8年级时，他的德文老师对他十分赏识，给他的作文下了如下评语：“文章简洁，构思严密清楚，阿登纳，构思是你的特长！”这一评语让他感到相当自豪。实际上，简洁和严密也正是他后来发表政治演说的特点。

到了高年级时，阿登纳就开始对政治感兴趣了，因为俾斯麦当政带来了德国内外政策的巨大变动，引起社会各界的争论。这时，阿登纳开始用自己的眼光观察这个变动的社会，经常加入大人们政治的讨论。

当时，德意志帝国还处在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巩固帝国基础的阶段。为了不让强邻法国在西方再起，“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外交以削弱法国为核心，集中力量巩固和发展德国在中欧的强权地位。俾斯麦布下了一盘外交棋局，即联合奥地利，拉拢俄国，挑起英俄争端，同时离间英法，以全力孤立和打击法国。俾斯麦深知，1871年虽然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取胜，但法兰克福和约决不可能完全摧垮法国。事实如此，70年代法国已迅速恢复，1873年法国提前向德国交付了50亿金法郎的赔款。9月，最后一个德国士兵撤离法国的领土，从而结束了法国6省区的被占领状态。法国从1873年5月开始，政权又回到了保守的君主主义者手中，麦克马洪元帅接替了梯也尔，当上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并做出卧薪尝胆的姿态。俾斯麦明白，这意味着法国有可能同神圣同盟时期的路易十八一样，受到沙皇和其他专制君主、以及敌视新教德国的耶稣教团的支持。这样，他想在外交上孤立法国的举措就很可能难以奏效。同时，法国人也摩拳擦掌，战争的屈辱，使法国人中的民族主义复仇情绪高涨。法国战后很快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重建军队，不久议会又通过改组军队的议案，把每个团队步兵营数从3个扩增至4个。法德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法德关系也势同水火。

俾斯麦搞了一套回旋战术，领导着新兴的德国周旋于欧洲列强之间。俾斯麦外交棋盘的核心是“三皇同盟”，他全力维护“三皇同盟”，同时又适当照顾英国利益，借英国力量来维持大陆均势，防止任何一方过于强大。在1875—1878年的东方危机中，俾斯麦鼓动俄国挑起战争，同时又在柏林会议上扮演“仲裁人”角色，压制俄国的过分要求。俄皇亚历山大二世是因得到了俾斯麦通过外交官拉多维茨传达的“德国力图有裨于俄国政策并倾向在重大问题上附合俄国的意见”这一讯息，又获得俾斯麦准予德国银行借予俄

三皇同盟：这是俾斯麦所策划的拉拢俄、奥匈，孤立法国的外交核心。1872年9月，德皇威廉一世、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和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三皇及其外长会晤于柏林，达成成立三皇同盟谅解。1873年5月，德俄先定立军事协定，4月，俄皇与奥匈帝国订立正式条约，10月德皇也在条约上签字。该条约规定，三皇在发生争执时，有义务进行协商；遇到来自第三方面的攻击威胁时，有义务采取共同方针。

1875—1878年：“东方危机”，1875年夏天，巴尔于半岛的黑塞哥维纳和波斯尼亚爆发反土耳其素丹的民族起义，俄奥共同进行干涉，英国宣布反对干涉土耳其，支持奥斯曼土耳其政府持强硬态度。1877年4月24日爆发了俄土战争，1878年6—7月，英俄奥法意德和土耳其、巴尔干各国代表召开柏林会议以解决问题。

国 1 亿卢布以应军需的承诺，才敢于在 1877 年 4 月对土耳其正式宣战的。俄军取得节节胜利之后，俾斯麦却转而支持英奥立场，胁迫俄国作出让步，签订《柏林协定》。“东方危机”中俄国并没有能通过这次所谓的“援助斯拉夫兄弟”战争进入巴尔干地区，仅仅从土耳其取得亚洲的阿尔达罕、喀尔斯和巴统地区；反倒是英奥达到预期目的，英国得到了塞浦路斯岛，奥匈帝国则取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占领和治理权。

柏林会后，俄国因俾斯麦落井下石，翻覆云雨，对俾斯麦政策发动激烈指责，德俄关系骤然紧张。俾斯麦又转而采取了新一轮的步骤，以巩固他的反法中心阵地。他暂不理睬亚历山大二世不断施加的压力，反与和俄国矛盾已深的奥地利结盟，说服安特拉西签订了针对俄国及其盟友的“德奥军事同盟条约”。回到柏林，俾斯麦又向各方隐瞒条约的真实内容，在回答俄使的询问时，他把维也纳之行说成是警告奥地利不要对俄抱任何敌对情绪。与此同时，俾斯麦又做出了要和英国谈判的姿态，指使驻英大使明斯特会晤英首相比康斯费尔德，就关于在德俄冲突时“英国将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进行磋商。德奥同盟以及柏林——伦敦往来频繁的消息迅速传到克里姆林宫，亚历山大二世神经格外紧张，不得不指派主张德俄亲善的沙布罗夫从内定的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改任驻柏林大使，并要求他：“通过与德缔结协议，为俄国取得必要的支持。”这样，俾斯麦以迂回外交的方式纵横捭阖，迫使俄国又乖乖回到了三皇同盟的轨道。

待沙布罗夫见得俾斯麦，以沙皇的名义向德国的宰相声明，俄国今后的政策仅仅是防御性的，除了执行柏林条约外没有其他任何目的之后，俾斯麦眼见成功在即，立即通知明斯特，结束了同英国的谈判。1881 年 6 月，三皇协定续约，德奥俄三国又恢复同盟关系，在东方危机和柏林会议上一度失衡的大陆政策，又重新回归原先俾斯麦的既定轨道。1884 年 3 月，三国在柏林举行会议，决定三皇协定又续定三年。通过俾斯麦，欧洲各国都见识了德国人的外交手腕。

新闻报业在那个时代已经相当发达了，舆论、报纸不断地向人们传达各种各样的信息。政府的各项政策通过报纸的评论而为人们所熟知。阿登纳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对外交政策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思考，他认为俾斯麦的外交政策“聪明而有远见”。实际上，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洲，谁不佩服俾斯麦的外交呢！

父亲是政府职员，因而常常把一些政治问题带回家里同几个儿子讨论。在外交上，一家人几乎一致对德国的纵横捭阖予以肯定，但俾斯麦的内政问题却常是家里争论的焦点。老康纳德十分尊敬俾斯麦，几乎对宰相所有政策表示理解和维护，但年轻的儿子们则不然，阿登纳虽然年少，却常常振振有词，尤其在对俾斯麦《反社会主义非常法》问题上，父子之间经常意见相左，争论不休。从 1881 年开始，社会民主党在议会的选举中不断获胜，1881 年取得 12 个议席，1884 年又得 24 席，工人领袖辛格尔以及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等的声望一天比一天高。阿登纳和他的哥哥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壮大恰与俾斯麦对工人运动的无情镇压有关，同时，他们也向父亲指出这项法令有违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阿登纳清楚记得在圣诞节时流传着许多

反社会主义非常法（sozialistengesetz），是 1878 年俾斯麦制定颁布的一项反工人运动的法令，1890 年废除。

照片，照片上印着来比锡社会主义者在他们自己家里圣诞树下被捕的场面，阿登纳认为这是残忍而野蛮的行为。这种看法左右了他的思想，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渐加深。至死他都对《非常法》深表遗憾，认为是俾斯麦一生中两大错误之一。

阿登纳认为俾斯麦的另一错误是在 70 年代为打击天主教徒和中央党而发起的文化斗争。少年阿登纳曾听人讲在艾弗尔山区的有些天主教教士不得不穿上蓝色的劳动服，化装成农民，走村窜寨，为找个仓库做弥撒，以防宪兵发现。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内政气氛。俾斯麦意欲打击天主教旧势力，缓解国内宗教矛盾，可这一举措反而加剧了国内宗教矛盾，影响了以后党派政治的发展。尽管少年阿登纳当时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一种感性认识的基础之上，但这种认识左右了他日后的政治倾向，午餐桌上的争论可以算作他政治意识的萌芽。

在中学毕业之前不久，老康纳德就告诉阿登纳，家里没有足够的钱供他上大学。阿登纳尽管内心失望，却异常平静地接受了父亲的安排，中学一毕业就到银行做了一名练习生。两个星期之后，老康纳德看出儿子异常痛苦，便与妻子重新盘算了一下经济状况，决定进一步紧缩家用，供他去念大学。老康纳德对儿子说：“孩子，我们试试看吧”，就把他从银行里接了回来。于是阿登纳上了大学，第一学期他就学于布莱斯高的弗赖堡，主修法律。

后来，他又转入了慕尼黑，在那儿念了一年书。那儿他主要听法律和国民经济学两门课程，最后他在波恩大学学习了一年半，还在波恩通过了律师资格的考试。法律的学习培养了他思维的条理性和逻辑性，他日后在政坛上简单明洁干练的政治风格，与他这几年法律的学习不无关系。阿登纳知道，他是由于家庭作出牺牲才得以接受大学教育的，因此他学习异常勤奋，努力争取学校的助学金。为了延长学习时间，赶走睡意，他常在深夜将脚浸在冷水桶里。

漫长的学习时期终于过去了，阿登纳的考试成绩虽然不是最出色的，但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在大学学习期间，他的理想是在乡村当一名公证人。他的一个哥哥汉斯这时已经在波恩附近的一个乡村做了教士。在波恩时，阿登纳常常去乡村看哥哥，他十分热爱乡村美丽清新的大自然环境。居住在一个美丽的地区，工作不要太多，这就是他的理想。

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艾弗尔山区（Eifel）在莱茵兰——法尔次州西北部。

布莱斯高在德国南巴登，弗赖堡为其首邑。

公证人（Notar）：指证明契据，收取宣誓书等的官员。

初露头角

歌德曾经说过：“啊，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两个灵魂。”

歌德一语道出了德国人的精神个性。在年轻的康纳德·阿登纳内心深处，同样有着两个灵魂：一个渴望与大自然亲吻，另一个却时时在等待世俗使命对他的召唤。

世纪之交的德国社会正酝酿着一场巨大变动。1888年，德皇威廉一世去世。皇储腓特烈三世早在继位之前就已身患重病。在继位99天之后，腓特烈三世也撒手而归。这样，皇位就落到了他29岁的儿子威廉·凯泽手中。新皇被称为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有着很高的天赋、敏捷的理解力、出色的记忆力，他的想象力也十分丰富，能异乎寻常迅速地接受一切现代的和新生的事物。他为此相当自傲。

这位年轻的皇帝以善作鼓感性演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名位与权势有着近乎狂热的执著。所以当他大权在握时，必然导致他与长期执掌帝国大权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之间的冲突。等到白发苍苍的老宰相公开表示他认为年轻的新君主在政治上缺乏经验、欠成熟时，缺乏自信心而又敏感得有些病态的威廉二世马上一反常态，将对这位老政治家的钦佩之心转变为因受触怒而产生的敌意。帝相冲突在威廉继位后不久，便在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公开表现出来。最后威廉忍受不了俾斯麦对他的“教导”，干脆罢黜了老宰相，自己来管理国家。

几乎是在转瞬之间，俾斯麦的时代就逝去了。新皇威廉二世打破了老宰相的陈规，竭尽全力转动国家机器。此时，德国工业飞速发展。工业总产量迅速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1871年，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镜厅宣告成立之时，德国居民的绝大多数还在农村及中、小城市里生活与工作。而此时，德国人口与版图几乎是魔术般地起了变化：在鲁尔河沿岸、在德国中部的产煤区、在萨克森、在西里西亚和南德地区，如同被巫师从地里召唤出来一般，大片大片的工业中心拔地而起。1900年，这些地区聚集了全德人口的54%、工业、农业，对外贸易和交通运输几乎是以飞一般的速度在发展着。时代之风影响了德意志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的旧习惯、旧风俗随时光流去，城市和乡村几乎每天都在变换新的容颜。时代在变，交通工具的变化反映出时代的节奏变换：马拉车不知不觉为有轨电车代替，接着，戴姆勒和本茨汽车开始征服公路，当小汽车把人们对乡村田园的沉思默想碾得粉碎之际，天空又成了人们开发的新领域。城乡在变化，社会生活也在变化，年轻的德皇站到了时代的潮头摇旗呐喊，呼唤着新的精神文化和政治价值标准。

正是这一切的变动，激起了年轻的阿登纳投身时代洪流的勃勃雄心。

大学毕业后，阿登纳已经长成一个挺拔的青年，不复是科隆街头那个孱弱的少年人。他精力充沛、敢想敢干。在父亲的帮助下，阿登纳进了科隆中央党领导人考森所开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中央党是保守的天主教政党，也即是后来阿登纳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前身，而考森是中央党科隆市议会的议会党团主席。阿登纳在考森的事务所里做了两年的代理律师，后来他成为科隆法院的陪审员。不过，阿登纳的父亲只是科隆市的一个中级官员，虽然受人尊重，但是社会地位并不高。即使做上了陪审员，小阿登纳也很难自由

进出于上流社会。

1906年的一天，命运之神敲开了阿登纳的门。29岁的阿登纳偶然获悉中央党有一个市长助理的职位空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而考森有对这个职位人选的任命权。他立即去找考森，说：“考森先生，我替您工作已两年了，您了解我，能够对我的能力作出鉴定。为什么不让我去呢？我能干得比其他人更出色。”考森为这个年轻人身上所透出的胆量和自信所打动，当即定板把市长助理的空缺给了阿登纳。阿登纳言之不谬，他干得的确不错。一开始时，市长让他主管税务局的工作，由于他工作出色，没过几年，他就被委任主管财政，并且成为市长第一助理。1907年，市长职位空缺，科隆市议会委任他代理市长之职。阿登纳的出色表现，引起各届关注，众家好评。这时，他在科隆政界的基础已经确立起来了。他也在做市长助理期间学到了许多具体实际的东西，上了很好的一课。

也正是在这期间，阿登纳爱上了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艾玛。他很快同她结了婚，并在勒恩多夫建立起了一个幸福的小家。艾玛聪明而娴静，她为他生了三个小孩，但是，由于太多的操劳，艾玛的身体垮掉了，并且一天比一天糟。阿登纳挚爱他的妻子。在艾玛患病期间，不论工作多忙，阿登纳在每天午间和晚间都定时赶回他们的家，陪伴在艾玛床前。他为她朗读、陪她聊天，直到她入睡。但死神终究是忌妒他们相爱，阿登纳和艾玛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1916年，长期患病的艾玛终于在科隆去世。艾玛的死对阿登纳打击沉重。他们最小的孩子丽亚当时只有三岁。

在妻子生病期间，阿登纳的身体也不好，医生诊断出他患有糖尿病。当时的医学还没有找到治疗这种病的有效药品，得糖尿病的人大多很快致死。但阿登纳几乎一直是在用钢铁般的意志同这种疾病作斗争。作为市长第一助理，他常常要参加科隆市的许多官方宴席，但作为糖尿病患者，他却必须遵医嘱严格遵守饮食规定。他在宴会上陪同客人吃喝，但每一次宴会之后，他却到洗手间去喝一杯温水，再用手指刺激咽喉，吐出所吃的东西。这一切他从没有向患病的妻子提起过。他怕她的担心会加重她的病情。但她终于离他而去。

在艾玛患病期间，欧洲国际形势风云突变。

俾斯麦下台以后，威廉二世离开了俾斯麦小心翼翼营建的维持大陆均势的欧洲安全轨道，全面卷入了世界性的政治纷争之中。俾斯麦在外交上可以算是一个天才，他能像杂技演员同时耍弄5个玻璃球一样，游刃有余地穿梭纵横于欧洲各大国之间，可他的继任者们却没有这种才能，他们玩两个玻璃球还显得手忙脚乱。继任者们只能放弃了俾斯麦复杂的结盟体系，但是他们却不能以另一个旗鼓相当的结盟体系来取而代之。威廉二世手下的外交智囊们的设想一一破灭：他们首先在对俄国问题上判断失误。这些人设想俄国不会同法国结盟，便转向同英国商议结盟之事。俄英在近东和中东分歧已深，德英接近使俄国认为德国选择了英国，感受到严重威胁。俄国转而与法国走向接近。1892年法俄订立了军事条约，1894年两国又将其变为一个正式条约，这立刻使得俾斯麦长期推行的孤立法国的政策宣告瓦解。更有甚者，法俄一旦成为敌国，德国还将不得不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接着，德英结盟谈判又陷入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德英关系一方面由于威廉二世谋求殖

勒恩多夫，在科隆行政区内，属波恩近郊。

民地并大力加强海军建设而大受影响，另一方面英国虽然打算放弃光荣孤立，寻求一个盟友，但却反对关系过于密切。德国政府坚持要缔结由英国会批准的正式盟约，英国却做不到，谈判持续三年而告终。威廉二世的智囊们错误地判断德国拥有选择盟友的自由，在坐失一个个良机之后，直到战争爆发前一刻才明白能够自由选择盟友的是英国而非德国。两次摩洛哥危机中，德法与德英关系交恶，而英法则趋近，使德国在欧洲大陆上陷入昔日俾斯麦时期法国似的孤立。两次巴尔干危机将德国与奥匈帝国绑在一起。后者老大积弱，正陷于内交外困巴尔干上空战云密布，战火一触即发。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谋杀事件点燃了早已蓄势的火药桶，一场欧洲大战展开了。

几年来，威廉二世的内外政策经常受到激烈批评，此时一切都蓦然让位于战争中心。战争一下子转移了全民的视线，使得高昂的民族情绪席卷全国。在威廉的鼓动下，人们相信战争和防御是德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准备“同全德国人民一起，不分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团结一心，进行俄国野蛮统治所强加于德国的这场战争，为德国的独立、荣誉和伟大流尽最后一滴血”。在战争爆发的那些日子，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全民奋起，同仇敌忾。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矛盾都被战争短时间内掩盖起来。全国都在为战争作准备。

但是，战争的进行并不如当初所设想。威廉二世向出征的战士保证“在叶落之前就会凯旋”，总参谋长小毛奇向奥地利保证“动员第39日在西线决出胜负，动员第40日派兵去西线支援奥地利”的诺言都没有能兑现。德军一开始就遭到比利时军的顽强抵抗。在纵深挺进法国之时，德军又遇法国殊死迎击。1914年9月初，德法双方在巴黎近郊的马恩河决战，势均力敌，形成胶着之势。这样德军想迅速结束西线战事的闪电战战略破产，西线转入阵地战。这时，小毛奇又策划在东线发动一场有力的攻势以缓和西线的局势。东线指挥官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发动攻势，于8月26—30日、9月7日—15日连续在坦能堡和马祖尔湖击败俄军。但是，由于战线拉得太长，军队供给不接，东线也不得不转入阵地战。德国军队在两线作战，阵地战变成消耗战。战争旷日持久继续了下去，当初的设想全部落空。

战争进入相持状态给德国国内带来很大的压力。大批劳动力和马匹被征用，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困难，加之气候条件不利，粮食产量急剧下降，肉类生产也大量减少，协约国粮食禁运使德国能够从国外获得的物资也越来越少，食品奇缺已成为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各个城市政府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严格控制食品的征发和管理，同时保证战略物资的征购并将其迅速运至前线。当时作为科隆市市长助理的阿登纳就负责这方面的工作。1915年，阿登纳写了一本书——《重新调整我们的粮食经济》，书中对如何保证粮食供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这本书得到了市议会头头们的赏识。

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期间，也正是艾玛患病之时。由于阿登纳担任公职和他的身体状况，他没有上前线。妻子死后，阿登纳仍然每天到市政府上班，有一天，他下班回家乘车时出了一次车祸。那天驾驶员睡着了，致使汽车在全速行驶中同一辆电车相撞。驾驶员受了重伤，鲜血淋漓地躺在座位上，在人们跑来关心驾驶员之际，阿登纳从车的残骸里爬了出来。他也受了严重的擦伤，颧骨破裂，上嘴唇裂开，脸部严重划伤，牙齿碰落几颗，有的掉进了喉咙里。他血流满面地独自步行了一刻钟才走到附近的医院里。医生们吓了一跳，立刻为他动了手术。因为血流太多，手术时不能上麻药，阿登纳坚持

忍着，一声不吭。手术后，阿登纳的脑袋被绷带裹得严严实实，母亲以为他的脑部受伤。但这次车祸最大的伤害在于他的眼睛，他的视力受到严重威胁，医生担心他有可能失明。上帝保佑，几星期后他的视力渐渐恢复，受到轻度破坏的视力留给了他的后半生，他的眼睛不能受强烈的紫外光刺激，而每当他突然向下看的时候，就会发生重影，平添了许多麻烦。

这次车祸使阿登纳不得不停止工作达半年之久。他调笑着安慰他那方寸大乱的母亲：“事情还算顺利地过去了，您的儿子耳朵没聋就该很高兴了！跟聋子比起来，人们还是照顾瞎子的。因为人们毕竟看不出他的耳朵聋与不聋。”

车祸在他右边太阳穴部位和上嘴唇靠人中的地方留下了清晰的伤痕。这使他原本严肃的脸看上去更加古板。后来有许多作家形容他的面部表情像中国清朝的官僚，因为在那时西方人眼里，东方人是高深莫测的。这个说法非常贴切。后来美国人麦克洛伊 见了 他，说他有一张美国印第安人坚强而冷漠的面孔，看上去就像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基罗宁莫酋长。就这一点来说，车祸反而铸就了阿登纳那张坚毅、冷漠、喜怒不形于言表、令对手讳言莫测的面孔。

车祸后，阿登纳住到了圣布拉西恩的黑森林疗养院。这时科隆市长的职位告缺了，有鉴于他做第一助理时给人留下了精明强干的深刻印象，在市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的中央党议会党团决定选他为继任者。但是，阿登纳车祸受伤和他长久的缺席，使他们对他的身体能否胜任工作感到忧虑。于是，市议会便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圣布拉西恩，以便判断车祸是否震坏了他的脑子，他的“智力”是否“健全”，确定他是否能够胜任市长职务。阿登纳猜到了来访者的意图。他开门见山就道：“先生们，我的头部只是外表出了点问题，它还能和以前一样灵活运转。”来访者大笑，旋即向他说明来意。阿登纳很快就行动起来，结束休养，赶回了科隆。

1917年，41岁的阿登纳被选为科隆市长。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接近尾声，处于前线与德国国内各方交通枢纽的科隆也如其他各地一样，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阿登纳一上台就要忙于替居民和从前线归来的士兵找到足够的食品和住处。

11月7日，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宣布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苏维埃赶走了老沙皇，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俄国的退出使德国在东线的压力减轻，但是，1918年美国投入了协约国一方参战。150万美国生力军陆续运至欧洲战场，一下子改变了西线的相持胶着状态，协约国联军挟声势先后在马恩河、亚眠战役中取胜。10月初，协约国联军突破兴登堡防线，从北起伊普尔，南迄凡尔登的漫长战线全线向东推进。德国的盟友土、奥、保军队开始崩溃。兵败如山倒，引发了国内固有危机，9月，保加利亚士兵起义，政府宣布投降；10月，土耳其宣布投降，奥匈帝国内南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纷纷宣布起义，奥匈帝国土崩瓦解。11月3日，奥国投降。

同盟国土崩瓦解。德国国内也形势大乱。接受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纲领”的呼声越来越高。奥国投降引发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斯巴达克团领导的11月3日基尔港水兵起义，起义像毒瘤一般，迅速引起整个海军

麦克洛伊：二次战后美国驻德首任高级专员。

的哗变。基尔、汉堡等城市爆发革命，政权迅速为工人、水兵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所控制。革命形势由北向南，向德国全境蔓延，不可抑制。在斯巴达克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推动下，对战争愤怒的矛头都对准了威廉二世，一致要求德皇下台。11月10日，威廉皇帝出逃荷兰。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在柏林，宣告成立了共和国。

在基尔水兵事件发生后不久，科隆市长阿登纳得到报告：基尔的水兵正向科隆和科不伦次方向开来，准备继续他们的革命事业。水兵坐火车而来，车次、开车时间、行经路线以及到达科隆的时间全都报告得很清楚。

科隆当时是要塞，驻防着军队。阿登纳不希望水兵们来到影响科隆市的正常运转，这样不仅会引起一个城市的混乱，而且会加剧整个德国的混乱状况。在得到消息后，阿登纳立即赶至科隆要塞司令处商讨对策。前方吃紧和后方动荡已令要塞司令方寸大乱，只好求策于阿登纳：“市长先生，事已至此，您有何见教？”

阿登纳正色回告：“这很清楚，您应派人半途拦截列车，命令一个连的士兵去把水兵撵下车，然后一一逮捕。”——“这个主意不错”，要塞司令说着就给铁路管理局挂电话，向后者说明要求，但遭到了拒绝。

要塞司令两手一摊，作出无可奈何的表情：“不行了，市长先生，铁路局长说了，列车得按行车时刻表到达科隆总站，我无能为力了。”

阿登纳坚持道：“我们现在是在打仗，您是科隆要塞司令官，对这里的公理和秩序负有责任！事不宜迟，您应当尽快派人半路拦截列车！”

要塞司令固执而胆小，他拒绝作进一步的努力。阿登纳为他的愚蠢感到恼火，话不投机，便起身拿起帽子，说：“阁下，我在您这里再也无可指望。告辞！”

市长阿登纳亲自赶到火车站，目睹了带着革命的红胸章标志的水兵们长驱直入准点到达科隆总站的情形。他站在了火车站的出站口。要塞司令总算听了点阿登纳的话，命人在站台出口处设置了岗哨。可这对于潮水般涌入的水兵毫无用处。水兵们听从值勤军官的命令摘下了红布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即将在科隆进行的革命行动。等通过站台，行到大街上，水兵们又纷纷戴上了红布条，开始在科隆的主要大街上游行。

天黑之后，水兵们开始行动，首先打开科隆军事监狱大门，放出了关押的5000多名囚犯、逃兵，接着又冲击要塞司令部，兵不血刃地解除了要塞司令的武装。

在这个不平静的夜晚，阿登纳始终在市政府大楼里守候着。科隆当时是前线与后方的枢纽，去往前线与开向后方的列车均以科隆为中转。列车一进站，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与从后方准备上前线的士兵都涌入科隆城，国内政局的变化使大量的士兵滞留在科隆城内等待观望。士兵们手中都有武器，阿登纳最为担心的是革命之风蔓延至科隆，引起科隆社会动乱，发生暴乱事件。因此，阿登纳别出心裁地贴出一则布告：

“凡是交出武器的士兵都可以吃上一顿热饭热菜。”

布告贴出后，他在市政府前安置了战地炊事车，炊事车通宵达旦冒着热气，吸引来了无数饥饿的士兵。这位深悉人之大欲的市长所发布的告示很快传开。第二天一早，市政府的一间厅堂里堆满了士兵们交出的武器。阿登纳一颗悬着的心稍稍放下。

接下来，第三天，“工人士兵代表会议”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

员佐尔曼被选为代表会议主席。接近晌午时分。佐尔曼来到市政府通知阿登纳，工人士兵代表会议将接管科隆市全部政权。阿登纳毫无违抗之意，他担心的只是这个城市的失控，他在一旁等待着新政府发布的命令。

佐尔曼是科隆市的议员，阿登纳早已熟知。他认为和这些人保持接触是有好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施加影响。反抗是无谓的，而这些人本身也富于人情味，彬彬有礼。他和他们友好相处，甚至尽力帮助他们稳定事态。

佐尔曼接管了政权，旋即打了一通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科隆人民报》的值班负责人。平日里颇为和气的佐尔曼对接话人劈头就是一句：“工人士兵代表会议业已接管全部政权，报纸不得发表任何批评新政权的文章。——完了！”放下电话。

阿登纳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个情景，他问佐尔曼，接话人对他这项消息和指示有何反应？“他问我”，佐尔曼老实地回答，“您还有别的命令吗？”

佐尔曼打了好一阵电话，等他打完电话，阿登纳向他提出了一项建议：“佐尔曼先生，干革命您少不了用打字机。您没有打字机，我倒有几台。我建议您和您的班子都到市政府来，我来帮助您安排房子、打字机和必要的人手。”

佐尔曼认为这主意不错，让阿登纳负责去办理。阿登纳又进一步建议道：“工人士兵代表会议肯定不希望科隆市发生混乱。我对这方面的工作很熟悉，也有些经验，您把安全委员会交给我来主持，让我来负责城市的治安如何？”

佐尔曼感到这个主意也不坏。于是，阿登纳成了“工人士兵代表会议”的安全委员，他得到一个相应的袖章和一份盖有工人士兵代表会议大印的公文证明书，凭此证明，任何人都得协助康拉德·阿登纳博士先生执行他的使命——维持治安。

人们指望1918年的革命会带来一些奇迹般的变化，但是，经过了11月的动荡之后，这一切又都像空中楼阁般幻灭了。1919年2月，以社会民主党挑头，在象征德国古典主义和人道主义遗产的南部小城——魏玛召开了一届国民议会。国民议会通过了新的国家宪法，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和中央党组成了以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为总理的内阁，从而稳定了由于德国战败和德皇退位以来动荡的政治局面。

生活渐渐恢复正常了，科隆市的议会、政府又恢复了。工人士兵代表会议自动解散，消声匿迹。阿登纳在经历了这次政治上颇有意思的小插曲之后，继续当他的科隆市长。

这时，他已在科隆市小有威望。

科隆之王

由于阿登纳在 1917 年水兵闹科隆事件中表现出来的镇定,也由于他为维护科隆社会稳定所作出的种种努力,阿登纳的声誉鹊起。

接下来的日子阿登纳成了科隆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一大堆各种名目的头衔在等着他:他先被选为莱茵省代表会议议员;从 1918 年开始,他又担任了莱茵省省委员会主席,同时还兼任科隆市代表会议第二主席;接着 1920 年,阿登纳开始担任普鲁士议长,后一职务是全国性的。他在科隆的政绩使他饮誉国内政坛。

在阿登纳成为科隆市长的最初几年里,整个德国社会仍旧处于一遍动荡与混乱之中。战争失败了,帝国崩溃了,人们民族自信心也被战争带走了。战后的世界在德国人眼里完全变了样,凡尔赛条约给每一个德国人心里蒙上了屈辱的阴影。为了让科隆振作起来,阿登纳尽了全力。为繁荣科隆经济,阿登纳主持在莱茵河畔新建了一个大吨位的船舶码头,扩大科隆港的吞吐量,加强科隆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接着,他否决了使城乡分离的议案,坚持乡镇合并,以利于经济管理与发展。考虑到和平建设人才的需要,阿登纳在科隆重新办起一所大学,培养工程建设人才。同时,他还制定了吸引外资的计划,鼓励外资企业在科隆建厂。当美国福特公司在科隆设立德国分公司之时,阿登纳亲自去主持了剪彩仪式。

1923 年的鲁尔危机使得德国战后的通货膨胀升至顶峰。德国马克的国际外汇比价从 1919 年的 1 美元兑 8.9 马克狂跌至 1923 年 11 月 15 日的 1:4.2 万亿。经济终于全面崩溃。

之后,在道威斯计划帮助下,斯特雷泽曼依靠抵押地产、商业、工业银行以及黄金储备,发行了以 32 亿马克为限的新币制,并得以暂缓战争赔款的偿付,这才使得德国经济在经过几年的动荡之后逐步恢复正常。

阿登纳领导科隆市在走过这段艰辛的日子之后,开始了两手计划。一方面他着力于改善人们生活,尽可能多地发展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他全力展开了市政建设。他的目标是要把科隆建设成为德国和西欧之间新的连接点。他要改变科隆的面貌,恢复科隆的古老文化和壮丽建筑,改变科隆人的精神状态,他要在一切方面树立起人们对德意志,对科隆历史和文化的信心。“发生政治灾难的时候,特别适合于干一番新的创造性事业”,阿登纳作如是说。

第一件事是需争得对科隆周围碉堡的拆除权。在他看来,这些碉堡令人想起战争的阴云,而科隆应该发展成为一个和平美丽的城市,人们不能总在战争的阴影下生活。阿登纳经过与市代表会议代表们的艰苦舌战,终于获胜。碉堡一一拆除后,他在城市周围建起了供人们休憩的绿化地带。他认为绿化对人们健康至关重要,而人应该尽量与大自然结合,作大自然的朋友,这样人的心灵才能得以净化,才会自然主出和谐感。他认为他的责任是尽量为他的人民创造这样的生活环境。

在那时候,为了取得同事们对他计划的支持,阿登纳开始学会使用一些谈话的技巧,并讲究一些策略。科隆的同仁们对他的评价是既聪明又狡诈。1926 年,阿登纳计划要建立一座跨莱茵河的大吊桥,因为预算的关系,市议会中多数人主张建立一座拱桥,其中共产党议员反对最为激烈。他让讨论暂停。然后,他把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们单独请来,告诉他们赋予列宁格勒以

罕有而特殊美丽的正是那座城市的吊桥。实际上，阿登纳从未去过列宁格勒，也对那座城市及其桥梁一无所知，但他深谙人性，明白德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的俄罗斯满怀激情。他如愿了、尽管不知道共产党人是为他谈话的内容打动，还是为他的良苦用心所感动，但他们同意了他的建议。这样，科隆市增添了一座美丽的吊桥，而阿登纳也获得了精明实干政治家的名声。

另一件大事是修建展览馆区，举办“普雷莎”。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型国际新闻报刊展览会，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参加了，来了当时许多著名的政治家。阿登纳作了周密的策划。展览馆区建筑的宏伟以及展览会的成功使得科隆和阿登纳的影响陡然扩大。全世界的主要新闻机构都报道了这一盛事，阿登纳出尽风头。

接下来，他又搞了一个纪念莱茵地区归属德国一千周年庆祝大会，搞了古代德意志艺术和重要历史事实的展示会，他想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确立德国人对莱茵河地区的信念。在凡尔赛和约中德国被迫接受了协约国关于莱茵地区的安排：莱茵河西岸划归法国，东岸 50 公里以内不许设防。阿登纳意欲加强莱茵河西岸是属于德国的这一认识。

在阿登纳当政的时期，科隆进入它的黄金时代。它既成长为德国西部经济文化的中心，莱茵河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又以其宏伟的建筑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成为欧洲当时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即使以后不当联邦总理，阿登纳以他做科隆市长的政绩，也足以自傲于世。他积累了政治声誉，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很多年后谈到这一时期时，阿登纳一直为他的作为感到满意，他说：“一个大城市的市长可以做许多事情，直接去做说服人的工作。好就好在这里。那时的情况迫使我独立行动和单独作出决定。这对我今后极有好处。我懂得了不能完全由一个人承担责任，有时政敌也可能会有相当明智的见解。我学会了这一点。”

通过在莱茵省委员会、省代表会议以及普鲁士议会的活动，阿登纳的政治范围扩大了，他学会了从相对整体的角度来把握政治和经济问题。他与国内外许多名人会晤，同中央政府的要人们建立直接联系，并跟大多数担任领导的欧洲政治家私交甚厚。人们赏识他治理科隆的才华，也折服于他敏锐的政治眼光。1926 年，中央党的领导人认为阿登纳也许有能力使魏

玛政府变得强有力些，于是两番邀请他到柏林组阁。

阿登纳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从不轻易下结论、决不做没有把握的事。他的心为之所动，但却不形于色。他倒不是不愿承担政治风险，而是要权衡利弊得失。多年的政治经验形成阿登纳的一贯作风：遇事总把周密的分析和明察秋毫的政治本能结合起来。他先跑到柏林去探了探政治气候，感觉到成功的机会不大：接着又同各党派都分别进行了接触，更确信他在国会中将可能得不到多数的支持。于是，他拒绝了组阁，又回到了科隆准备继续做他的科隆王。

因为有这么一个插曲，很多人设想如果这位才能出众的政治领导人在那时当上了政府总理，历史该发生何等深刻之变化：也许希特勒在取得政权、并给德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灾难之前，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假设毕竟是假设，阿登纳一直确信他当时决定的正确性，他十分肯定他说：“我没有机会，看来我不会取得多少成就。”

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状况吧！这样或许可以明白阿登纳当时拒绝组阁的原因。

自 1918 年诞生起，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便是多灾多难。它的宪法虽然赋予了各政党以充分的民主，可长期处于帝国政治制度下，又经历了战后政治、经济、社会动荡的各党派却不能有效地适应这种自由的新制度。在帝国时期，它们没有尝试过协调政策；战后，它们又不能学会相互容忍和相互妥协，因而，充分的民主反使它们不能力就探索共同的政治目标走到一起。在这种情形下，政治上我们便看到魏玛政府大多数情况下的一般构成，即清一色的少数派组成政府，政府在国会中不得不依靠大多数的容忍来取得支持。这种结构是不稳定的，执政党的议会联盟稍有分歧便会破裂。魏玛共和国一任总理平均只能干 7 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阿登纳拒绝组阁，自有其充分的道理。

在拒绝组阁的三年半之后，阿登纳在选举中以绝对的优势战胜对手，第二次当选了每届任期十二年的科隆市市长。科隆市组织了盛大的典礼庆祝他的连选连任。阿登纳泰然受之。当时他 53 岁，他打算待这一届于满之后到 65 岁便退休回家伺弄他的花园，他十分热爱园艺。但始料未及，到 1929 年，一个新的动荡时期又开始了。

1929 年 10 月 24 日，这一天被西方国家称为“黑色的星期一”。美国纽约华尔街突然出现了股市大滑坡，一下子造成全美的金融恐慌。美国金融恐慌立刻波及靠美国道威斯计划帮助建立起来的德国金融体系，德国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经济萧条很快蔓延至西方所有国家：美国、德国、奥地利、英国，以及依赖农产品出口和外贸的中欧、南美、大洋洲国家，最后是法国，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大恐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以求自保。德国由于对英美经济的依赖和它本身不能以关税壁垒自保的情形，处境十分不利。从 1931 年 5 月到 7 月，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了 42%，1932 年的工业生产比 1929 年危机前几乎下降了一半，破产的银行和工商企业达一万多家，失业工人高达 700 万，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

经济的岌岌可危加剧了社会的动荡，魏玛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更迭，可是，无论是社会民主党的缪勒、天主教中央党的布鲁林，还是冯·巴本和施莱彻尔将军组阁的政府，都无法克服尖锐的财政困难。魏玛共和国诞生之初就背着重重的历史负担：虽然它对于帝国的灭亡毫无责任，却因继承了威廉帝国的遗产而不得不承受履行帝国覆灭所留下来的凡尔赛条约的义务，后者的许多强制性条款令德国人感到内心不服。于是，在这个经济、社会的困难时期，民族问题又被提出来了。惯于煽动的希特勒很容易就把签定令德国人受屈辱的凡尔赛和约的责任加在了魏玛共和国的身上。

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阿登纳开始时不相信纳粹真的能够上得了台。作为普鲁士议会的议长，他经常上柏林去，一般是一月一次。动荡时期他看到纳粹分子经常“大打出手”，他也看到当时身居要职、肩负国家重任的政治家们不去制止这些暴行。他很震惊地和柏林许多有影响的人谈过纳粹问题，希望敲起警钟，但毫无作用。危机已迫在眼前，他感到“大家就像一只一动不动地呆在毒蛇跟前的兔子一样，等着成为毒蛇的口中之食，毫无抵抗和麻木不仁地看着悲剧演下去。”他建议魏玛政府采取一些强有力措施，比如有效训练一支警察部队以维护社会治安，制止纳粹分子的野蛮行径，但没人响应。他眼见魏玛政府的领导者拥有国家权力手段而不去使用，任由共和国被纳粹侵蚀，民主被纳粹践踏。当他以旁观者眼睁睁看到魏玛共和国最终覆亡在希特勒手中时，阿登纳深深地被刺痛了，他亲身感受到政治家的无能与庸碌、民主的软弱在历史的危机关头的危险作用。他一生都谨记着这个教训。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组阁。当时阿登纳还担任着普鲁士议会议长，普鲁士代表会议所拥有的某些权限令纳粹感到碍眼，纳粹在此时已是为所欲为，准备通过法律手段解散普鲁士代表会议。作出这种决议的权力，掌握在由普鲁士总理、普鲁士代表会议主席和普鲁士议会议长组成的三人小组手中。2月初，普鲁士代表会议主席克尔邀请大家开会，想在纳粹提出国家总改革的时候作出一项关于解散普鲁士代表会议的决议。普鲁士总理布劳思没有出席，代替他的是当时已被任命为“普鲁士帝国专员”的冯·巴本。作为普鲁士议会议长，阿登纳在会上义正严辞地指出：这个小组无权作出解散普鲁士代表会议的决定。因为第一、冯·巴本不是普鲁士总理，无论是国家宪法还是普鲁士宪法都没有规定有什么“普鲁士帝国专员”；第二、他本人作为普鲁士议长决不签署同意这样的决议。说完，阿登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议。

他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事态发展。克尔和冯·巴本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解散代表的会议的决定。他那桀骜不驯的独立个性使他成为纳粹的眼中之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3年3月，希特勒在大选前的竞选旅行中来到科隆，他满以为阿登纳会到机场去欢迎他的到来，阿登纳却拒绝这么做，并以最大限度的怠慢来表示了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领袖的摒弃和蔑视。两天后，希特勒在科隆发表演说，纳粹分子在城里挂满了宣传标志。阿登纳一大早就命令市政工人取下了挂在莱茵河桥上的纳粹旗帜，为防止纳粹分子捣乱，他又派出了一队警察去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他的做法显然触怒了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不想要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同自己作对。大选之后，纳粹掌握了绝对权力，阿登纳很快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大受排挤。他被加上凭空捏造的反对科隆人民的罪名，成为“叛徒”和“人民公敌”，当众受辱，并最终于1933年春天，被纳粹赶出了科隆城。

在被罢黜之后，阿登纳曾经上过柏林找当时的普鲁士内务部长戈林申诉自己的情况。可以想象戈林对他的态度，他早已上了纳粹要消灭者的黑名单。此前纳粹曾经暗示说如果他愿意主动引退，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退休金。他却拗执地呆到别人把他撵走。被罢黜的阿登纳命运悲惨，这时他带着七个儿女，一贫如洗，没有退休金，银行存款也被冻结，连家庭生活也失去了保障。

突如其来的变化给阿登纳内心的打击极为沉重，他需要有一个时期来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作出思考。于是他把家人留在勒恩多夫，独自跑到离莱茵河十五公里的玛丽亚拉赫山的一家本尼狄克教派的修道院中隐居起来。修道院的住持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在这儿可以暂时避开纳粹的注意，不被其搔扰，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

“科隆之王”在修道院里留居了将近一年，这是他在纳粹时代过得最有意义的日子。修道院里有着丰富的藏书，他贪婪地读了一本又一本，他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思考分析。林中漫步和阅读书籍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据阿登纳自己说，日后他关于欧洲和平的构想，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

不过纳粹并没有将他遗忘。1934年，他在施莱歇事件中受到牵连，6月30日的“长刀之夜”，阿登纳遭到纳粹逮捕。他侥幸逃过了那次大屠杀，因为纳粹查不出他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这一次他学乖了，不再公然顶撞纳粹。在被释放之后，他回到了在勒恩多夫的家中，平日里深居简出，照顾家人，以种花度日。有一件事使他连这种生活也难以继了。他去了一次勒恩多夫的射击协会，那儿的会员们大胆地吹奏了一支进行曲向他致敬，这支进行曲

恰是希特勒所喜爱的《巴登魏勒进行曲》，希特勒每逢盛大庆典出场时必然演奏。大约是会员们只会奏这么一支曲子，但纳粹当局却感到愤怒，像阿登纳这么一位希特勒的藐视者居然敢于接受这种礼遇，这无疑是对元首的大不敬，是一种挑衅。于是地方当局作出决定，再次勒令他离开勒恩多夫。

那是 1935 年 11 月的一个仟悔日，那一天阴沉而凄凉，从早到晚大雨如注，莱茵河涨了大水，那灰暗得没有一丝光亮的天空恰如阿登纳的心境：科隆市长的职位被撤了，他的家庭失去了保障，他的人民正在被遭受愚弄，前途茫茫，看不到一丝希望。这时候他读了一本书：约瑟夫·康拉德的《台风》。书中描写一位勇敢的船长同咆哮肆虐的台风进行艰苦搏斗的故事——一切都已经毫无指望了，但是船长并没有对风暴屈服，他沉着冷静，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做到了一切力所能及。最后，船长战胜了台风，重新看到了风平浪静的大海。这本书使他得到了安慰，获得了勇气，他变得坚定多了，学会了泰然自若地承受即将到来的一切风浪。

因为他曾是显赫一时的科隆之王，纳粹总是没有将他遗忘。1939 年波德战争爆发之时，阿登纳的名字又一次上了一张列有莱茵省人士的黑名单，并排名第一位。这次是一位不知姓名的好心人救了他，将他的名字从黑名单上划掉了，使他得以逃脱厄运，而他的一个好朋友却因同列这张名单上而惨遭纳粹杀害。1944 年他再次死里逃生。那年他被邀请参与卡尔·戈德勒策划的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当时他估计了形势，认为计划失败的可能性太大，因而拒绝了邀请。在暗杀行动果然失败之后，纳粹同样也逮捕了他，并把他投入科隆附近布劳魏勒的盖世太保监狱里。他假装生病而逃避了被转送到布坦瓦尔德集中营的命运，然后在一位空军朋友的帮助下又从医院里潜逃了。后来，盖世太保发现他藏在距科隆四十英里处的一个森林磨坊里，又重新逮捕了他。这时盟军已经离此不远了。有一天，他和囚犯们一起被带到一堵墙前，并被盖世太保告知——当美国人越过布劳魏勒附近的埃尔福特河时，他们就将在这里被处决。他的儿子马科斯此时是德国陆军军官，他到柏林去为他的父亲说了情。这时纳粹自顾不暇，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于是在 1944 年 11 月将他释放。阿登纳总算逃脱了死亡的厄运。

回到勒恩多夫家中，阿登纳开始焦虑地等待着盟军打来的消息。等待的心情是沉重的，隆隆的炮火声最初是遥远而稀疏的，到后来便越来越近，并越发密集。他每天收听好几次国外的广播，尤其是英国的 BBC 和瑞士的贝罗明斯特电台。

1945 年春天，美军向美因茨集中，而英军也开始向威塞尔集中。由于德国军队没有来得及炸毁雷马根桥，美军改变了进军计划，将防守薄弱的雷马根桥作为渡莱茵河的第一条通道。这样勒恩多夫便正好陷入战火，阿登纳一家不得不将屋后山中的酒窖作为临时的避难所。他们在酒窖里躲了八天，听到了手榴弹在花园里爆炸的声音。第八天，炮火停了，美军开进了勒恩多夫。阿登纳走出酒窖重见天日。当两个美国士兵进入阿登纳的家时，他们看到这位昔日的“科隆之王”正在花园里摆弄他的花草。

战争终于结束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梦魇也结束了。1933—1945 年，整整十二年，阿登纳过着与权力和政治无关的生活，并且时时担心着纳粹的追捕。这些年里，他有过昔行僧似的在修道院里的苦修生活，也曾如隐世者一般孤芳自赏，寄情花草田园，但更多的时间里他在思索。他的信念没有改变，船长与台风的故事深印在他的脑海中。他看到德意志民族屈服于好胜的民族主

义和专制暴君招致的灾难，也看到使德国重建、摆脱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出路。他在脑海里勾画出了一张新秩序的宏图，他的新秩序不仅规划了被战争彻底打垮的德国，也涵括了因战争而伤痕累累的欧洲，他感到他有责任、有义务、有信心再为完成这新秩序的建设而作出努力。他是船长，他将带领着他的船员们继续和台风拼搏，带领他们重建为战争所破坏的家园。

阿登纳等待着新生命的开始。

第二章 基民盟与联邦德国的建立

“只有当一位领袖的能力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战时，我们才能充分地衡量其伟大的程度”。

——理查德·尼克松
《领导者》

占领

第一号公告

致德国人民：

一、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特作如下宣布：

由我指挥的盟军已开进德国。我们是作为征服者而不是作为压迫者来到德国的。在由我指挥的部队占领下的德国地区，我们将消灭纳粹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我们将推翻纳粹统治，解散纳粹党，废除纳粹党一切残酷的、压迫人民的和歧视性的法律和机构……

——1945年3月盟军发布对德占领“第一号公告”

1945年3月，美军占领了阿登纳的家乡科隆。紧接着，美军跨过莱茵河，攻克了德国工业中心鲁尔区。4月，苏联红军从东到南控制了维也纳，并沿多瑙河向林茨挺进。美军则从鲁尔南下。兵分两路，一支沿卡塞尔、莱比锡至德累斯顿，对付南德之敌，并于4月19日进军捷克境内；另一支部队则从莱比锡出发直抵易北河西岸。4月25日，苏联红军以强大的优势兵力包围了柏林。同一天，美军先头部队在易北河西岸的托尔高与苏军会师，把德军防线自东西切断。希特勒困守柏林，调集20万德军负隅顽抗，但干将戈林、希姆莱等人先后背离，大势已去。4月30日，苏军将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同日，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

5月9日，德国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后，德国最高统帅部发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项公报，把这个时刻描述为“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与其它公报中气势汹汹的措词相比。这最后一份公报的语气阴郁而凄凉。

希特勒曾经威胁说，假如他的军队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他将和德国人民同入深渊。第三帝国元首的话不折不扣地实现了。自17世纪30年战争中野蛮的宗教冲突摧毁了封建德国并使其1/3的人民丧生以来，德国遭受到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城镇破坏以及人们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结构的瓦解，从未如此之严重。

第三帝国的光辉、梦想和希望转瞬间烟消云散、荡然无存，现实使每一个德国人清醒：三百万士兵死亡，两百多万人受伤致残，五十多万人死于空难，在被驱逐出自己在东方的家园的一千六百万难民中有四百多万人死亡和失踪，犹太人、吉卜赛人、“无生活能力者”、斯拉夫人和政治反对派被无情消灭。昔日繁华热闹的城市如今已变成满目疮痍的废墟，只有在碎砖乱瓦

之中才依稀可辨得几条弯弯曲曲的小径。战争留下了数百万饥肠辘辘、颠沛流离的人们，过去的经历剥夺了他们对现在和将来梦想的权力，当纳粹以德国人的名义对犹太人以及东欧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被充分揭露出来之后，德国人在深感羞愧的同时，必须要等待着战胜者的裁决，等待命运加在他们未来的一切……

在希特勒军事政权最强盛的时期，从西面的比斯开湾，到俄国腹地的伏尔加河畔；从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北角，到利比亚和埃及的炽热沙漠，卐字旗在被征服的国土上高高飘扬。随着希特勒在两线的失败，“千年帝国”犹如一只被戳破了的气球，一下子垮了下来。战事结束，该是赢得胜利的盟国按照自己意图和规格重画欧洲地图的时候了。德国被剥夺了第三帝国时期所有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占领的地盘，本土面积也被减少到了只及战前的2/3左右。

对德国分区占领的原则是在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时就已经确立起了的。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盟国都在考虑胜利后如何防止这个不安分的国家重新再起、发动战争，各国都力图想做到1919年在凡尔赛条约中没有做到的事情：以某种最有效的方式剥夺德国的侵略手段，并从根本上打消其扩张妄想。对战争贡献最大，对德国事务拥有决定权的几个大国经过了一系列的争吵和讨价还价之后，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终于确定了由四大国分区占领德国。1945年8月，盟国发布《波茨坦公告》，公布了关于处理战败德国的最后原则。

第三帝国的残山剩水被美英法苏四大国划分成了四个占领区：

俄国人接管了约有一千七百万人的东部地区，这里是德意志帝国的传统粮仓。美国人占领了西南部，包括工业区黑森、巴登—符腾堡，以及原来是农业区和高山地带的巴伐利亚。英国人进入了德国西北部和鲁尔地区。数十年来，鲁尔一直是欧洲工业的心脏。这里集中了几百家钢铁厂、煤矿以及重型机械制造厂。在美英的极力支持下，法国人也占据了一块，这是德国西南角以及莱茵兰—法尔茨地区，该地区的摩泽尔河流域盛产葡萄，是欧洲最好的酿酒中心。西方三个占领区的人口约四千五百万。

尽管波茨坦会议后，成立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它在法律上是德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可是每个占领国还是在各自的占领区内自行其事。每个占领区就像一个小小的国家：各自的边境都由部队守卫，边境上对往来于各占领区的德国人和他们的物品进行严格的审查与管制。同时，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国家元首”，即派驻占领区领导盟军占领部队的军事长官。他的命令高于任何德国法律，任何德国人皆不得违抗。占领区军事长官的行动仅对他在华盛顿、莫斯科、伦敦或是巴黎的上级负责。

盟国管制委员会之所以形同虚设，主要是由于四大国在任何重大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决议。美英法苏、特别是美苏对德国都有各自的基本目标和计划，这些目标与国家利益相连接，势必相互冲突。这样德国问题很快成为美苏对战后欧洲争夺的焦点。美苏冷战愈演愈烈，德国最终被分为东西两块。

不过，客观地看，希特勒的覆亡却是阿登纳重返政坛的新机运。正是在希特勒德国的废墟上，阿登纳重新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1945年3月，美国人一占领科隆，便开始寻找这位昔日的科隆之王。

当阿登纳和他的家人一起，从勒恩多夫的地窖中爬出来，忙于清理曾遭炮火袭击过的家园时，一名原是德国犹太移民的美国军官来到了勒恩多夫，

在花园中见到了精神矍铄的阿登纳老头。这位军官请阿登纳呆在家里，等待驻美科隆美军司令官的召唤，至于原因，则未做解释。

又过了几天，美军驻科隆地方司令官 R.L. 海尔斯陆军中校派了一辆敞篷吉普车，把阿登纳和他的妻子接到科隆，准备任命他为科隆的代理市长。

当时战争还在激烈进行，阿登纳担心美国人的任命传出去后，纳粹盖世太保不会放过他正在前线作战的三个儿子。美国人打消了他的顾虑，毁于战火的科隆城的凄凉惨状也激起了阿登纳的责任感，他爽快地表示愿同美军合作。

古老的教堂城市科隆遭战火洗劫，面目全非。在乘美军吉普车到科隆的路上，阿登纳极目所见处处是倒塌了的房屋建筑。一切都毁于战火：有千年历史的教堂群只剩下了残垣断壁，莱茵河上的一座座美丽桥梁断裂崩塌，阿登纳当年建筑的米尔海姆大吊桥消失了，尼勒尔港、展览馆区也不复存在。只有塔尖高达 515 英尺的科隆大教堂仍然矗立在平坦的莱茵大地上，却也千疮万孔。

破坏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致当时许多人都认为科隆不可能被修复。但阿登纳不愿意看到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文化的城市在地球上消失。从中世纪前罗马人建立的一个前哨基地，发展成为第一个基督教主教管区，成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科隆已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雨沧桑。阿登纳出任代理市长作出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就是拒绝了一些人要放弃科隆，在北边几英里处沿莱茵河畔另建新城的建议，决心在原地全力重建这个曾经是古老而美丽的城市。

美国人请阿登纳参加盟军城市管理局的工作。海尔斯中校答应阿登纳，将对他的工作提供全面支持与帮助。这样，阿登纳立即投入恢复城市秩序的工作之中。

第一步是要解决居民的吃和住的问题。

当德军与盟军在科隆附近遭遇接火的时候，科隆的绝大部分居民都逃亡了。战争结束后，逃到各地避难的人们又大批返回故乡，粮食供应成了大问题，科隆 80% 以上的房屋被毁，许多人流离失所。占领军城市管理局公开劝告人们不要回乡，理由很简单：人太多了无法安置。但是，每天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利用各种交通工具或步行，如潮水般地涌回科隆。

实际上，早在战争后期，德国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严重困难，粮食、物资均已告罄，科隆也不例外。为了保证这数万居民的粮食供应，阿登纳一面请求美军司令官从仓库中拨出食品，供应居民；一面又组织动员全城力量寻找食物作为补充。他派人在城中搜集余粮，将其集中；又扣下了科隆的所有车辆，让人把它们开到乡下，向农民购买储存的土豆、粮食、谷物以及牲畜等。在战前习惯于每天吃三千卡路里热量食物的德国人，现在只能得到官方配给的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的定量，而且，这个定量还在不断减少，难民的人口在不断增加。食品短缺威胁着每一个德国人。人们排着长队，等待领取面包和其他定量供应的食品。

数万居民的安置问题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无家可归的人蜷缩在昔日城市的各个角落，与一堆堆覆盖着厚厚尘土的碎砖乱石作伴，阿登纳派人设法把一些受损坏程度稍小的房屋清理出来，又搭起大量窝棚，暂时解决了居住问题。

在安顿好了居民之后，阿登纳尽力设法使城市恢复运转。他和美军城市管理局商议，请求首先恢复城市的商业与交通。美国人对阿登纳很慷慨，他

们给了他一张购买钢铁的许可证。凭着这张证明，阿登纳在莱茵的一家工厂买到了大批钢材。他把这批钢材用于修复莱茵河上那些被毁的桥梁，以便恢复交通。

1945年7月，美国军管政府迅速对美占区内所有的工业设施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在美占区大约一万二千个工厂中，只有10%的工厂还在进行有限的生产，其他工厂均已被炸得无法开工。整个生产处于停滞状态。阿登纳曾经试图组织人员清理废墟中的工厂，安排就业，但他很快发现这只是徒劳。整个德国的生产和供应系统已经全部瘫痪，没有原料，燃料与能源奇缺。更何况谁也不愿这么做，因为如果机器还可以开动，就要被拆卸下来充当战争赔偿。

战争的破坏是全国性的。在停止轰炸和炮击之后，德国居民密集的中心城市全都变成了一堆堆瓦砾场。高楼大厦的断壁残垣和碎砖乱石使过去繁华成为令人伤感的回忆。鲁尔区尤其如此。在这个五十英里长、中间二十英里宽的椭圆形地区，座落着许多人口密集的城镇，每个城镇均设有煤矿和钢铁厂，曾号称欧洲的机器车间。战火之后的鲁尔上空，在人们记忆里第一次变得蔚蓝而洁净。过去钢铁厂、煤矿、发电厂和有关工业设施鳞次栉比、烟囱林立、烟雾弥漫的景象已经绝迹。空袭后只余下寥寥无几的烟囱孤然兀立，几只鸦鹊飞过，更增满目凄然。

在四个占领国中，美国人对德国最为大度与宽容。阿登纳对此感受颇深。美国人对阿登纳在做代理市长期间的所作所为，表现了恰如其分的容忍。

在一次涉及科隆艺术品保护的事件中，阿登纳感到了这一点。作为古老文化名城的科隆，拥有丰富的艺术珍藏，其中包括最有收藏价值的中世纪时期“科隆学派”的绘画，堪称德国的国宝。为了使这些画不遭受破坏，战争时期阿登纳曾派人将它们藏到了南德的霍亨佐伦城堡中一间具有防弹设施的地下室里。战后，阿登纳感到担心，因为美国人已发出通令，“要交出德国所占有的全部艺术品”，以审查德国人手里是否还有抢来的东西，他派人把绘画从霍亨佐伦城堡取出，装在一辆灵柩车里运回了科隆，最后把它们藏在了赫尔曼—普夫劳姆艾大街一幢房子的地下室里。这幢房子的主人当时是一个天主教神父，他在房里设了一个小型的礼拜堂。阿登纳估计美国人会尊重教会财产，希望那些画也因此保全。事情虽做得隐秘，但美国人最终还是知道了。阿登纳坦白地向美国占领当局作出解释，美国人则表现出容忍与理解。军事长官给了阿登纳一道命令：

“迫切要求阿登纳市长先生把科隆博物院所有的绘画交出来。军事长官保证，如果证实这些艺术品是德国的财产，一定归还。”

美国人倒是言而有信，在证实了绘画确属科隆市藏品之后，随即如数归还。这件事使阿登纳认定，美国人的态度是友好的。

不仅如此，美国人还对阿登纳的工作提供有效帮助。阿登纳后来才知道，美国人之所以信任他，是由于他有幸在美国人开出来的全德白色名单中名列榜首。这儿有一封陆军中校帕特森写给其上司吉尔里上校的信，可说明一切。信中写道：

“亲爱的吉尔里上校：

我在这封信里，把科隆市长康纳德·阿登纳博士介绍给你，阿登纳博士将向你提供有关你所希望从他那儿了解

的 1945 年 5 月 10 日节日的任何消息和意见。

阿登纳博士是 1919 年到 1933 年的科隆市长。1933 年他被纳粹撤职并受到严重的迫害。阿登纳博士的声誉远远超出科隆地区；他是全德白色名单中的第一号人物。

在阿登纳博士最近被任命恢复旧职以前，他是我的科隆市和科隆行政区的民事特别顾问。我对阿登纳博士的正直、他个人和工作中具有的无私的民主思想表示极大的尊敬。

忠实的

陆军中校帕特森

1945 年 5 月 8 日

但是，好景不长。战争结束后不久，各国、军队都开始回撤到各自的占领区。英美军队从 7 月 1 日起，撤离苏占区，苏军进驻莱比锡、魏玛、埃尔富特等城市；同时，苏联也让出了半个柏林市，让美英法三国军队进驻西柏林。美军于 6 月 25 日撤离了科隆，把科隆行政区的占领权移交给了英国当局。

英国人并不能像美国人那样欣赏阿登纳。如果英国国内仍然是保守党的丘吉尔执政，他也许会与同样保守固执的阿登纳关系亲近些。但在 7 月的英国大选中，厌恶战争的英国选民抛弃了丘吉尔和他的保守党，选择了打着改革与建设旗号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艾德里工党，改由工党执政。工党政府看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抱有明显好感，起用了一大批德国社民党人士。他们似乎不想让像阿登纳这样一位保守派著名人士担任科隆市长这样的要职，同时，阿登纳与美国当局过往甚密也使英国人心存芥蒂，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合作自然不尽人意。英国方面常常指责阿登纳办事不力、提出过分要求等，而阿登纳总是据理不让，这种态度令英国人更恼火。

1945 年 9 月底，阿登纳与英占领当局之间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当时冬天将至。在解决人们衣、食、住等重要问题之外，又增添了一个新问题——给居民供暖。随着天气的转凉，问题日益迫切。城市居民每人每天的配给定量已经下降到六百到七百卡，饥饿再加之寒冷，很可能使许多人过不了这个寒冷的冬天。

英国军事占领当局为了解决供暖问题，要求阿登纳把科隆市郊那条长 20 公里，宽 1 公里的绿化带和环城马路上的树木砍倒，供给居民作燃料。阿登纳强烈反对这种做法。这条绿化带是 1917—1933 年阿登纳做科隆市长期间的政绩之一，阿登纳认为它对居民的健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向英国人解释砍伐绿化带将使科隆市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也许几十年都难以恢复。他还说在缺乏煤碳燃料的情况下，借砍伐树木来解决困难，只可能是杯水车薪、于事无济。建议英国人着力恢复鲁尔的交通和发电厂运行，开放英军当局征用的存煤，从鲁尔运煤来供给居民燃料之需。

英国人当然不可能采纳阿登纳的要求。因为整个欧洲都面临着寒冬的威胁，英国人必须从鲁尔煤矿有限的开采量中分出一大部分供应欧洲的其它国家，使英国人更为恼怒的是阿登纳还在报刊上公开提出自己的要求。

1945 年 10 月 5 日，阿登纳在勒恩多夫的家中接见了《新闻记者报》和美联社两位记者。他告诉他们：盟国若不打算供应德国居民用煤，将会造成极坏的后果——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余下的人也将衰弱不堪，疾病丛生，瘟

疫流行。他还谈到了他对法国人想使德国分裂，成立一个莱茵——鲁尔国的看法。英国人把阿登纳的行动看作是对占领者权威的一种挑衅，他们指责他干扰了占领政策的推行，并把这件事说成是阿登纳不服从占领管制命令的一大罪状。

也许这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戈林格尔给英国谍报机关的一份报告起到了火上浇油作用。在这份报告中，戈林格尔把阿登纳和过去基督教中央党的关系大加渲染，认为他在战后支持天主教教会人士，压制工会活动；认为他在学校教育问题上支持教会，重新在教学中推行宗教教育课。这无疑是与不主张把宗教课列入教学计划的社会主义工人和部分进步市民的对立。无疑是有思想使人们忘却国家社会主义统治十二年期间的遭遇和经历，有损于各阶层联合合作的新精神。在报告的最后，戈林格尔谈到了阿登纳曾转呈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一份备忘录，在其中，阿登纳要求当局考虑放宽有关清除纳粹分子的严格规定。

有了这份报告，英国人对阿登纳“不服占领政策”事件迅速作出处理。在他接见记者谈话后的第二天，10月6日，英国占领当局的北莱茵军事长官巴勒克拉夫旅长便把阿登纳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阿登纳走进巴勒克拉夫办公室时，一群英国军官端坐不动，对阿登纳的致意不予理睬。见没有人端椅子给他坐，阿登纳便自己拿过一张椅子，准备就座。这时巴勒克拉夫以毫不客气的口吻对阿登纳说：“您站着！”阿登纳不得不站在那里，听候英国人对他的裁决。

巴勒克拉夫毫无表情地宣读道：

“尊敬的阿登纳博士、首席市长先生：

我对于科隆市的修理、街道的清扫以及准备过冬的一般工作所取得的进展情况感到不满意。……您未能使我满意地履行这些职责。……我认为，您对科隆居民没有尽到您的责任。因此，从今天起，您被解除科隆市长的职务。您必须尽快离开科隆，至迟不得超过10月14日。……您不得再直接或者间接地从事任何性质的政治活动。

如果您不遵守本信件中任何一项指示，您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北莱茵省军政府军事长官

旅长巴勒克拉夫

1945年10月6日

宣读之后，巴勒克拉夫要求阿登纳在文件上签字，以证明已收到。签完字后，英国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阿登纳板着面孔，冷冷地吐出两个字：“没有”。说罢告辞，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英国人的解职放逐令使阿登纳对英国占领当局从此抱有很深的成见，这种成见影响到他后来做了联邦总理与彼得斯贝格山盟国管制委员会中英国人打交道。英国人解职令中的要害是两点：一是将阿登纳逐出科隆，二是以军法限令他不得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这已经是阿登纳政治生涯中第二次被逐出科隆并禁止政治活动了。第一次他被纳粹驱逐，并剥夺了政治权利，而这一次则是解放者英国占领军当局。

被逐出科隆让阿登纳在生活上感到十分烦恼。那时他的第二个妻子古丝由于过去被关在盖世太保监狱里患了重病，正在科隆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阿登纳费了很大周折，才取得英国人的同意，每周两次回科隆探望妻子。英国人对探望的时间和路线均作了精确规定。古丝的病一直未能好转。1948年她不幸去世，未能分享阿登纳出任联邦总理的荣誉。阿登纳对没有照料好古丝一直深感遗憾，以后终生未再续弦。

当然，已经历经过纳粹时期磨砺的阿登纳不会就此甘于赋闲。他一边在勒恩多夫养花，一边随时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变化与发展。“赋闲”使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关注新闻媒介，阅读各种报纸评论，收听各方广播新闻，然后仔细思考与评析。当时瑞士驻德国代表、总领事冯·魏斯是阿登纳的好友，促膝密谈的常客，他经常来向阿登纳通报盟国的最新消息，一起讨论局势的发展。不管怎么说，英国人的驱逐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似乎并没有给阿登纳造成多大的影响，或许科隆之所失恰是德国之所得。阿登纳此时得以将视线从科隆一城扩大到全德范围，关注整个国家命运的沉浮，筹划着在基督教伦理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党，由它来领导德国。

有一天，勒恩多夫来了一位英国客人。此人战前是牛津大学的教授、阿登纳的旧交。当时他正在英国占领当局宾德将军的司令部工作，军衔是上校。他想从阿登纳那儿了解些德国的政治状况，并想听取后者的意见。阿登纳幽默自嘲地告诉他，他不能和他在家里谈政治，但却可以同他一起驱车前往五公里以外的法占区讨论政治问题。这位朋友开始时感到莫名其妙，他不知道阿登纳已遭当局驱逐，但很快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因为勒恩多夫属科隆行政区，在英国占区管辖范围内。他回去后把此事报告了宾德。过了两天，这位朋友的转陈起了作用。阿登纳接到一纸通知，告知他政治活动的禁令只限于在科隆行政区内。看来英国人也许只是不想让他做科隆市长。12月份，阿登纳甚至接到英国方面的邀请，让他出席在巴特格德斯贝格举行的一次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重要大会。英国人给自己也留了些面子。

阿登纳政治活动的禁令被解除了。但在他被禁止活动的两个月里，形势发展得很快，各地的政治活动已经兴起，阿登纳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运动的洪流之中。等待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起一个能代表他政治理想的以基督教民主为宗旨的政党。

基督教民主联盟

.....我们并不想绝望。我们要进行工作。我们前面是一条艰辛而坎坷不平的道路。我们只看到这条道路口上堆起的一片废墟，我们看不到它通向何处。我们要走这条路，我们要以我们尚存的全部力量来走这条路。我们要用无比坚强的耐心，对于我们人民和城市的无限热爱来走这条路.....

——阿登纳在科隆市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在被纳粹驱逐的漫长日子里，在翁克尔的修道院，在布劳魏勒的盖世太保监狱，在勒恩多夫的自己家中，阿登纳苦心思索德国的前途和出路。他曾清楚地看到德国屈服于无神论独裁统治而招致的灾难，因而强烈期望在战争结束之后，能以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为基础，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希望能重新教育和引导德国人，“使他们从把国家搞成偶像、供奉在祭坛上，把个人的尊严和作用当成这个偶像牺牲品的错误观念中走出，确立起人、人的尊严和自由高于一切，也高于国家权力的原则”；也希望能重新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包括了社会各阶层的、以基督教原则为该心的政党，为德国人确立出一个新的政治目标，开始一种新的政治生活。

1945年春天，在纳粹帝国走向崩溃之际，一些在1933年被取缔的政党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随着战争的结束，盟国也在着手建立战后德国政治生活的原则。在8月初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公布了战败德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其中第2条第9款规定，允许在整个德国重新建立民主政党，准予并鼓励各政党召集会议和进行公开讨论。苏占区在6月10日，美占区在8月13日、英占区在9月15日、法占区在12月，分别发布公告，允许了占领区内的政党活动。

在此之前，前中央党人士建立的基督教组织的活动已经在全德许多地区恢复，在柏林、科隆—杜塞尔多夫、汉堡地区以及法兰克福等地建立了颇有影响的基督教党小组。科隆地区的基督教党小组的领导人、前中央党人士莱奥·施威林几次前来邀请德高望重的老市长阿登纳参加，但是由于当时政局未明，阿登纳婉言谢绝。这是阿登纳战前和战后政治活动的一大特点，即在形势尚未明朗、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绝不轻举妄动。阿登纳在等待盟国解除政党活动的禁令，同时也想弄清盟国允许的政党活动范围究竟有多大。

8月初，波茨坦公告公开发表，阿登纳感觉到时机已到。8月31日，杜塞尔多夫地区两名基督教党小组的领导人卡尔·阿诺尔德和瓦尔特·亨泽尔对阿登纳再作邀请，阿登纳毫不迟疑地答应出山，因为盟国政党活动的禁令已被解除，可以一展身手。他开始筹建基督教政党。

随着禁令的解除，其它政党的活动也复苏。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最先行动起来。作为他们传统支柱的工会，几乎是在希特勒帝国刚一崩溃就马上被准许恢复活动，而当时其它政党则无此优遇。社民党公认的领导人库特·舒马赫精明强干，在战前坚定反对纳粹，1933年7月，被纳粹党逮捕入狱，受尽折磨。他在纳粹集中营里落下满身残疾，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脚。这些经历使他为盟国所敬重，为他在战后政治舞

台的活动奠定了基础。舒马赫同时又是一位极为坚强、百折不回的人，出狱后以顽强的毅力投入了社会民主党的重建工作，任何人都为他的斗志折服而肃然起敬。

共产党也同样很快恢复了组织，该党的领导人在纳粹时期也曾遭到严重迫害。靠苏联的帮助共产党很快在全德展开活动，美英占领当局最初为了维持盟国合作，也支持了共产党的活动。共产党的影响很快遍及全德。

此外，在德国西南部以及黑森等地区，一些自由思想者及老民族自由党人也在聚集起来，准备筹建一个新的自由民主党。在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政治派别在活动，使得在战后初期德国出现了一派活跃的政治气氛，各党各派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纲领主张。

在这个过程中，各地的基督教活动小组也以蓬勃之势向全德发展。这些小组在四个占领区内分别组织了起来，彼此间形成了某种联系。随着形势的发展，各地基督教活动小组要求统一组织，由于许多前中央党人是小组的领导核心，若要形成一个团结紧密的政党，前中央党内的各种分歧，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带入党组织中。于是，各地基督教小组陷入不停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即在于：是继续保留中央党的宗旨、纲领和组织原则，还是放弃中央党的主张，重新以共同遵循的基督教伦理道德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全新的基督教政党。

中央党是在 19 世纪建立起来的，建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抵抗普鲁士国家对教会的压制。普鲁士是奉行新教的国家，而中央党则是信奉天主教的教会少数派。党人大多处于社会上层，尽管它力图奉行社会平衡政策，企图把企业主、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融合成一个整体，但教义的分歧使中央党把新教徒拒之门外。在进入 20 世纪、尤其是一次大战以后，中央党内部为了是否接纳新教徒的问题几经激烈争论，党陷于政治上的分裂。

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组建一个新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要使这个党变得真正强有力并发挥自己的影响作用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阿登纳坚决主张同中央党在政治上决裂，建立起全新政党，他认为这样既可以与旧中央党内部的分歧一刀两断，扩大基督教的党的社会基础，也便于树立一个全新的形象，在新形势、新基础、新观念上，提出新的政治主张。这种认识为基督教政治组织内一大批志同道合者所响应。

阿登纳希望新基督教党的大门向所有基督徒敞开。在阿登纳看来，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原则应当是这个新党的核心宗旨。早在 1922 年他担任慕尼黑天主教会大会主席时就主张“我们应尽我们的力量争取与新教徒阵营中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携手前进，力求彼此帮助和相互支持。”在魏玛共和国时代，他亲眼目睹了软弱无能的政党不能抵挡国家社会主义对民主侵害和践踏；在希特勒纳粹的时代，他又深切地体会到无神论的独裁统治将国家和人民引向灾难。痛苦的体验和深刻的思考，使他得出结论：一个没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党将是软弱的，而一个不以伦理原则为基础的政党则是危险的。因此，只有一个扎根于基督教教义，又具有坚定的伦理原则、并得到德国各阶层人民支持的新政党，才能担当起引导和教育德国人民的重任。他的观点得到了党内大多数人士的认可。

1945 年 12 月 31 日，就在英国占领当局解除对他禁令的同一天，阿登纳接到邀请，去参加在巴特格德斯堡召开的基督教民主党小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柏林地区基督教党小组领导人安德雷亚斯·赫尔门斯的发起下召开的，云集了全德各地基督教党小组的成员，但赫尔门斯本人却因苏占区当局的禁止未能到会。会上人们决定称自己的组织为“联盟”，强调所有选择了基督教民主政治基础的人们，都应联合起来，努力争取建立起全德范围内的政党。这样，“基督教民主联盟”便诞生了。在南德的巴伐利亚，人们组织起名曰“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同样性质的基督教政党。

由于德国处于分区占领的状态以及赫尔门斯未能到会，使阿登纳感到：建立跨占领区的全国性基民盟组织的条件尚不具备。因此他主张在英军占领区发展和扩大基民盟，以此为基础，再建立和加强英占区基民盟与其它占区基民盟之间的联系。

政治上的资本需要一步步积累，想在政治上崭露头角，还必须懂得利用和争取各种各样的机会。当时在英占区基民盟内部，阿登纳既不是最早的创始人，又在基民盟党小组发展的关键时期，被英国人停了两个月的政治活动，这对他争取英占区基民盟领导权来说是不利的。不过，在他决定要干某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善于扭转局势，化不利为有利。

1946年1月22、23两日，英占区基民盟在威斯特伐伦的赫尔福德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以选举英占区基民盟执行委员会。会议刚开始，代表们就为选举会议的主席而争论不休。阿登纳在开会的前一刻才姗姗到场，他径直走到主席台上，向代表们宣布自己在与会者中年龄最长，理应是会议主席，会议的开幕式也应当由像他这样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

不知道出于对德高望重的阿登纳的尊重，还是在惊诧之余来不及反应，没有人对阿登纳的毛遂自荐提出异议。阿登纳的精明能干是人们早已熟知，他直接务实的工作作风与他敏锐的政治思想，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就这样，阿登纳成了会议的主席。主持了赫尔福德会议之后，阿登纳确立作为英占区基民盟领导人的地位。但是，阿登纳并不认为是因为他的自荐才使人们听从其发号施令的，按照阿登纳自己的说法，他是“应到会者的一致要求担任了会议的主席”的。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显然有出入。不过可以肯定，即使没有这次机会，凭借他的才能，阿登纳也能成为众望所归者。

赫尔福德会议决定了英占区基民盟的第一任务，是要“引导德国人民摆脱他们目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局面”，这样就必须强化基民盟的组织机构，增加基民盟的活动能力与影响。会后，与会的26名代表回到了他们各自的地区，在莱茵兰、威斯特伐伦、汉诺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汉堡、不来梅、奥尔登堡、布伦瑞克以及利珀等地开展活动。由于新政党是建立在广泛的基督教原则的基础上，抛弃了旧中央党的派别之争及其狭隘政治观念，它立即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的拥护。历经了纳粹无神论国家至上统治以及战争痛苦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似乎感到在基民盟的主张中找到了一种信仰和政治上的依靠。正像阿登纳所预想的那样，战后人们开始在寻求一种人性的回归和精神的回归，基督教和基民盟思想使他们于战败的颓丧、屈辱与绝望之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并得到安慰。

一个月之内，基民盟的发展情况就取得出人预料的进展，各种身份、来自各个阶层的人们纷纷入党，并且热心致力于建设基民盟的工作。党员们提出了尽快制定党纲，在政治、精神上统一德国，在经济上重建国家的要求。

随着党的扩大发展，一些分歧也随之产生。由于受到社会民主党有关经济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小组在各自单独发布的

建党宣言中，主张将资源和大企业社会主义化，认为国家应将矿业和其它国民经济中的垄断部门收归国有。但更多的人主张将政治上的个人自由原则引入经济自主之中。为了解决这些分歧，1946年2月26日到3月1日，阿登纳等倡议英占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威斯特伐伦的内海姆-休斯顿举行该党第二次委员会会议。

会议在个人同国家关系、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文化领域等方面，就一般性原则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与会者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并确定了基本原则。在对待个人同国家关系上，与会者认定“国家生活必须具有并充分体现基督教伦理和文化原则，以及真正的民主。国家权力不得侵犯人的尊严和不可转让的权利”；在文化教育方面，会议确定要“回到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根本原则中去，高度尊重人的尊严和每一个人的价值”；国家和教会之间要保持真诚合作，相互尊重等。引起各地代表广泛争论的是经济与社会生活原则方面，争论的核心在于是否应该在德国实行广泛的社会主义化。

阿登纳旗帜鲜明地反对经济的社会主义化。在讨论中，他力陈个人自由的原则也必须适用于经济领域。他说：政治权力应该分散，经济权力也同样。国家社会主义让每一个德国人都看清了过多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的危害。因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必须对权力集中的问题引起高度重视。不应该实行广泛的社会主义化，这样会导致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这对个人自由原则也将是一种危害。

照阿登纳的看法，应该建立起一种公正的社会秩序，使每个人能够为他自己和家庭挣到一份财产。他力陈国有化并不利于鼓励个人作出杰出成就，因为一个工人或职员在一家国营企业里并不比在一家私人企业里享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必然会使人们过分依赖国家，造成责任心薄弱，容易屈服于国家权力等弊病，从根本上妨害民主政治。

这些观点演绎自他在科隆十七年从政的经验，也来自他对魏玛及纳粹时代政治的深刻反省，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看不到这些，因而，很难将内部各种观点统一起来。争论持续到深夜，阿登纳与科隆的前基督教工会成员的约翰内斯·阿尔贝斯为此同不同意见的代表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以求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双方同意推迟对这一问题作出原则性的决定，并将其理由写入了1946年3月1日公布的党纲之中：

“由于德国经济上还不自由，因此，急于对部分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化的问题，从目前来说是不切合实际的，日后解决这一问题时，将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特别是从全民福利方面着眼来作出决定。”

阿登纳还从自己的从政经验出发，向与会代表们阐述了一所房屋、一座花园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家庭稳定对国家的重要性，以及健康的住宅环境对家庭生活、从而也是对人民生活的重要性。这样，在内海姆-休斯顿经济纲领的第10点中，通过下述规定，体现了阿登纳的主张：

“适当的占有财产是民主国家得以巩固的一种主要因素。鼓励以诚实的手段挣得适当的财产。”以及“在重建被毁坏的城市和乡镇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到不使居民因

居住条件过于拥挤而受害，如果有必要，应征用土地来建造房屋等。”

在内海姆-休斯顿会议上，阿登纳的循循善诱，顽强的工作热情和坚韧的意志使基民盟折服。3月1日，代表们一致选举他担任英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第一主席。

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发展，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也迅速统一起来了。作为一个新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在许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苏军占领当局竭力限制基民盟的活动，而在英占区内，英国人也更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社会民主党的奉行原则，与英国工党政府的“民主社会主义”同出一辙。在英美占领区内，占领军当局对德国共产党和中央党都比对基民盟来得客气，对该党怀有明显的不信任感。

1946年5月11日，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召开了战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宣布他们的目标是要以对“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不妥协的意志”，“把德国所有的民主力量聚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舒马赫说：没有民主、没有认识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没有人道主义、不尊重人的人格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很显然，社民党的核心是要在政治上倡行民主自由，在经济上追求“计划指导和共同塑造的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生产的“规模、方向和分配上”，更多地顾及“大众的利益”。舒马赫杰出的个人能力与占领当局的支持，使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民众中建立了广泛的影响。

作为英占区的基民盟主席，阿登纳不仅要忙于协调本党内部不同派别的政治主张，还需要抗衡在英国人支持下日益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势力。尽管英国人不喜欢阿登纳和他的基民盟，却不能不注意到它在本占区内日益扩大的影响，以顺利推行占领政策。很明显，英国人必须依靠德国人，也必须让德国人适应民主政治，自己管理自己。他们不能不面对基民盟崛起的现实，也不能再忽视它的领导人阿登纳。

1946年2月，英国军政府宣布，它将在它的占领区内成立一个由德国人组成的“协商委员会”（即通称的咨询委员会），由政党、工会、行政、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代表组成。这只是一个没有决定权力的咨询机构，在32名成员之中，政党代表有8名。基督教民主联盟指派了阿登纳和来自伍佩尔塔尔的奥托·施密特作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社会民主党方面则派出了库特·舒马赫。这样，战后德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重要人物的相遇不可避免。

在第一次富有戏剧性的碰面会上，英国人对待两党的态度泾渭分明。1946年的3月6日，英占区咨询委员会在旧汉堡陆军总司令部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咨询委员会成员们率先到会。之后，英军司令官和占领区军事长官、空军元帅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在震耳的鼓声与喇叭声中出席会议。鼓乐之后，北莱茵省省委员会主席、省长勒尔一一介绍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第一个被介绍的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库特·舒马赫。勒尔着重介绍了舒马赫在纳粹时期为抨击纳粹而作出的巨大努力与付出的巨大代价，向人们展示他光荣的过去。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与舒马赫博士彼此长时间的亲切问候，格外引人注目。到了介绍阿登纳时，英国人则明显冷淡多了，时间也很短。阿登纳自己精确地计算了一下，只有1分零45秒。

以反德出名的道格拉斯也许是有意想奚落一下有帝国工作背景的背景的阿登纳，他漫不经心走到阿登纳眼前，趾高气扬地问：“市长先生，你的政治背

景如何？”

阿登纳怒从心起，板着面孔，毫无表情地一字一顿地答道：“哦，我只是在1917年当上了科隆市长；后来，1933年纳粹认为我政治上不可靠，罢了我的官；1945年3月，美国人复了我的职；同年10月，英国人说我不称职，又把我撵走。因此我靠这些现在进了占领区参议会！”

所有的人都听到了阿登纳的回答，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十分惊愕。这个插曲给每一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没过多久，伦敦的《每日电讯报》报道了这次活动，当然，阿登纳的回答经媒体大加渲染了一番之后，令人印象深刻。

当天晚上，在下萨克森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人物，当时的汉诺威省省长欣里希·威廉·科普夫的搓合下，阿登纳和舒马赫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两人讨论了国内粮食情况，也讨论了关于工业设备的拆除问题。在这些方面，舒马赫的态度让阿登纳感到两党似乎有着合作的基础。但是舒马赫却在讨论的最后一刻提出了阿登纳根本不可能让步的一个问题：让阿登纳接受社民党的领导，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全德的领导地位。虽然社民党的力量强大、基民盟发展的未来前景尚不明朗，但阿登纳却毫不相让。他正色地告诉舒马赫：“尽管基督教民主联盟是一个新近才成立的新党，但它决不会放弃自己的原则和独立性。就目前来看，虽然社民党可以算是全德最大的党，但是，今后的发展却未必。究竟哪一个党的力量强大，将由最终的选举来作出结论。”

就这样，谈判最终告吹，不欢而散。

基民盟与社民党的争夺与冲突从此开始，社民党的强大和舒马赫以势压人，并不意味着处于劣势的基民盟会永远处于下风。阿登纳虽然年事已高，却总是信心十足、精神百倍地奔走于各处，发表演说，向德国人民力陈基民盟的政治主张。盟国渐渐重视阿登纳，对基民盟的发展速度也另眼相观。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不能不对占领政策重新估计。这样，对阿登纳和舒马赫、对基民盟和社民党来说，情况渐渐发生逆转，主张以基督教原则和西方民主观念为建国基础的阿登纳和基民盟，在西方人眼里变得亲切起来。

分道扬镳

“……不久前还被盟国胜利的光辉照亮的舞台蒙上了一层阴影。谁也不知道，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即将搞些什么花样，或者说，它们的扩张计划和意图的界限——如果说有界限的话——究竟在哪里……”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来了……”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和平砥柱》演说

战败国的命运首先取决于战胜国对它的安排，但是，随着战胜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使得本来错综复杂的德国问题更加错综复杂，这样，德国人的命运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了战后大国在欧洲的争夺中。

战后德国舞台的第一幕，是由四大战胜国美、英、法、苏演出的，演出的主旋律是改造德国。改造的目标是“四D”，即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这四个词在英语中均以“D”字母开头，并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得到各战胜国的一致确认。但是，各大国的分区占领却使得实际的占领政策比起初的预想有很大的不同，“四D”落实到各占领区，其意义和做法又有很大的区别。

在四个占领国中，美国人对待败敌德国的态度和政策是极为独特的。在大战的尾声中美国宣称将在欧洲战事结束后两年内退回美洲大陆。因此，美国人喜欢推行的是自己的思想观念，认为思想的影响才是深远的。它主张惩罚和改造并举，最终使德国人转而接受征服者和它新主人的政治思想。

英、法、俄国人对美国人想通过全面改造来恢复战败德国的做法颇有异议。1945年4月美占区主持军管事务的卢修斯·杜比格农·克莱将军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们不是到这里来投机谋利的。”但要让其它三国这样做显然是不可能。美国在大西洋彼岸，美国人可以一走了之，欧洲各国却不能这样做，它们费了好大劲才打败德国人，他们不能再次任由德国在欧洲肆意横行。因此，英、法、俄三国对待战败德国的态度要比美国人实际得多，注重落实有限度的目标，在德国长期待下去。而不是像美国人那样空谈人的改造和理想。

正如《曼彻斯特卫报》老资格的记者特伦斯·沓里蒂所说的那样，英国人不容易发怒，但更不容易宽恕别人。他们同德国人有一大笔帐要算。德国人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每次都耗尽了英国人的人力和财富，这些财富都是大英帝国几十年、几百年苦心经营的结果。况且自俾斯麦时代以来，德国一直是英国在欧洲和国际市场上最强劲的工业竞争对手，这次德国被彻底打败、无条件投降，正是英国在多年来一直求之不得的大好机会。英国必须借此机会向德国讨还它过去的损失，把德国降为欧洲政治舞台上第三或是第四等的国家，伤尽德国的元气，使它无法同自己进行贸易竞争。由于英国人直接控制了鲁尔的工业，因而它完全能够实现这些目标。

法德之间要清算的东西就更多了，德国人更给法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1870—1945年这短短的75年间，法国三次遭德国人侵，两次战败投降。这一次，一向耀武扬威的德国终于被打翻在地，法国人要做的就只有一件：踏上一只脚，使它永远不能翻身。只有这样才能平法国人为法兰西报

仇的雪耻之心。法国人的信念是，谁也无法改变德国人，因此只能彻底压服德国人：德国必须保持分裂状态，还必须剥夺其一切权力，使它对巴黎俯首帖耳。法国人的对德政策可以说是最为强硬，他们迫不急待地要从军事占领中大捞油水。他们以赔偿为名，占毗邻地利之便，动用了一切交通工具，拿走一切可以拿的东西。更有甚者，法国人策划着在政治上分割德国，它要求分离莱茵兰，鲁尔地区实行国际共管，并使萨尔在经济上与法国合并，在政治上与法国保持特殊关系。

至于俄国人，则把德国看作是西方进攻苏联的桥头堡。首先他们要保持对所占地区的严格控制。在向德国讨还战争赔偿方面，俄国人的做法与法国人类似，他们在自己的占领区内，从抽水马桶到整座工厂，凡能拆卸的东西统统都运回苏联。也许本来他们也希望像法国人那样分割肢解德国，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在全德成立一个他们可以对其发挥影响力的中央政府似乎更为有利。俄国人改变了主意，这成为后来俄国对德政策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也许单从处理战败国的角度四大国各自的做法并不算是是什么，但是，德国的地位在欧洲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样一来，各个国家对于其它国家对德国的处理办法及其对德造成的影响就不能不警觉。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他国的做法影响到本国的在德利益。四大战胜国为此吵吵嚷嚷，连开数次外长会议都不能协调分歧，反而越谈越谈不拢。1947年2月，盟国缔结了对旧法西斯轴心国意大利以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的和约，可对德和约却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

不久，德国人的命运就随东西方冷战的开始，完全改变了。

冷战的原因错综复杂。许多年来国际问题专家为研究这个问题大费脑筋。有人认为它首先起因于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患脑溢血暴亡，副总统杜鲁门接任人主白宫。由于杜鲁门在罗斯福在世时从未涉足过外交国际关系领域，他对罗斯福在雅尔塔对苏联妥协的做法不甚知之，也不甚理解，上任之后，采取了与罗斯福总统截然不同的外交路线，这样，东西方的妥协合作也随之宣告结束。无论怎么说，杜鲁门上台之后，组织起了一个班子专门研究对苏联的外交政策。这个班子给他的意见是美国应该在欧洲“遏制”住苏联。这时，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给杜鲁门发来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报，引起杜鲁门高度重视。在电报中，凯南分析了苏俄政策的特点，他警告美国人，苏联有天生的不安全感，美苏利益根本对立。苏联过去是游牧民族，处在大平原，生存有威胁，而苏联传统的民族主义也是以向外扩张为表现。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人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外扩张的目的。现今苏联人在东欧的做法正是在继续老沙皇未竟之业。苏联人的这种做法，是对美国作出的挑衅，也是对美国利益的侵害。因此，美苏不可能和平共处，美苏矛盾不可调和，美国的强大就是苏联的削弱。凯南还很明确地向杜鲁门指出：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却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而美国必须拥有足够的武力并准备使用它，那么不用真正动武，也可以遏制住苏联，迫使它退却。杜鲁门对此很感兴趣，这些后来就成了杜鲁门政府对苏联遏制政策最基本的

几次外长会议是：伦敦外长会议（1945年9月11日—10月2日）；巴黎外长会议（1946年4月25日—7月12日）；莫斯科外长会议（1947年3月10日—4月24日）；伦敦外长会议（1947年11月25日—12月25日）；巴黎外长会议（1949年5月23日—6月20日）。设立“外长会议”的决定。是苏联、美国、英国在波茨坦会议上作的决定。

理论根据。

东西方分道扬镳的第一声号角是丘吉尔吹响的。1946年的3月5日，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来到了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敦斯特学院。在演说中丘吉尔向激动的听众大声疾呼，美国应成为自由世界的“和平砥柱”，他说：

“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对美国民主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拥有最大的力量，也就是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对你我两国来说，现在都有一个机会在这里，一个明确的、光彩夺目的机会。如果拒绝、忽视、或糟蹋这个机会，我们将受到后世的长期责备……”

“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没有人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他们扩张和传教倾向的止境在哪里，如果还有止境的话……”

“我们理解，俄国需要它西部边境的安全，以免再次遭受德国的侵略。我们欢迎它占有它在世界大国中有权占有的地位。……但是，我有责任把有关当前欧洲形势的某些事实摆在你们面前。”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了。在这道铁幕的后面，座落着东欧、中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城市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的控制。只有雅典——放射着它那不朽的光辉——能在英、美、法三国观察员的观察下，在自由选举中决定自己的前途。”

“现在，如果苏联政府试图单独行动，在他们的地区建立一个亲共的德国，就将给英美两国占领区制造严重的困难，授予了战败的德国人以在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拍卖抬价的权力。不论我们从中得到什么结论，这肯定不是我们进行武装斗争所要建立的解放的欧洲，也不是一个具有永久和平必要条件的欧洲。”

“……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完全协调地工作着。……第五纵队到外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如果我们不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正视这些事实，那就太不明智了……”

在演说的最后，丘吉尔号召美国 and 所有说英语的国家联合起来，建立英美特殊关系，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政策。他赢得了美国人暴风雨般的掌声。丘吉尔的演说刺激着杜鲁门的神经，坚定了杜鲁门遏制苏联的决心。以

此为契机，英美开始磋商为坚守西欧阵地，美英两国应在德国问题中采取共同的立场，与苏联在东欧的扩张形成对抗态势。

传统德国内部的经济联系是这样的：东部地区和南部的巴伐利亚等是农业区，而西部，尤其是鲁尔、莱茵兰地区是德国的工业中心。东西之间产品交流情况是东部向西部提供农产品，而西部向东部提供工业产品。战后东部成了苏联占领区，最初斯大林曾答应由东部地区向西部提供农产品，以缓解西部缺少粮食的困难。1946年5月，美国占领区军事长官克莱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上公开宣布美占区将不再向苏联提供一切赔偿，此举激怒了斯大林，斯大林决定拒绝向西部提供东部的农产品。这次公开冲突成了东西方在德国问题上分裂的重要一步，也坚定了英美要抛开大国一致原则，单独采取行动的决心。

然而，波茨坦会议的精神却是双方都不能够公开违背的。波茨坦协定规定了德国在完成了占领改造之后，应该缔结对德和约，结束占领，实现统一。于是美英和苏联便在怎样实现统一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

美英提出：根据波茨坦会议的精神，德国应该首先实现各占区的“经济统一”。因为英占区拥有全德人口的30%，硬煤蕴藏量和钢产量的75%，但粮食紧缺；苏占区生产粮食，但钢铁工业需要英占区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美占区有20%的人口，工业多数是轻工业，也缺少粮食；法占区一般可生产17%的硬煤和12%的钢铁，只拥有全德人口和战前德国资源的10%。所以，如果不实现各占领区的“经济统一”，各占领区的经济情况都将产生严重问题。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1946年7月的巴黎外长会议上强调“经济统一”，提议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德国管理机构，把四个占领区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来进行管理，以便于在各个占领区之间“交流食品、交通乃至思想”。

针对美英“经济统一”的立场，苏联抛出了“政治统一”的方针。苏联提出必须首先建立全德中央政府，在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再来解决经济和其它方面的问题。由是在历次的外长会议上，双方为此吵吵嚷嚷，争论不休。

很显然，德国问题的实质是：既然德国已被分成了几个占领区，就必然会形成几个不同的政治、经济实体，每一个实体都服务于本国的对外政策目标。美苏战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冲突已然明显，美国显然不会再从欧洲撤出。自杜鲁门上台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美国已将遏制苏联提升到战略高度。为确保德国西部，美国将战后为限制德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摩根索计划”转变成为把战败德国迅速扶植起来的政策。美国对德的新目标也得到英国的支持，这样，美苏所代表的东西方在德国和欧洲分道扬镳显然不可避免。美国希望把德国（西占区）变成与苏联对抗的主阵地。

1946年7月，美国向英法提出合并占领区的建议，得到英国的响应。之后，美国政府指示克莱着手就美英双占区经济合并问题进行筹备。

7月18日，英国占领区军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这是在德国西部建起的一个大州，目的是将工业重心鲁尔区同周围农业区及中小型工业分布地区合并在一起。

9月6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讲话，指出不应该把德国变成一座“贫民救济院”，应该促进德国的“经济统一”，使德国人“承担起处理自己事务的首要责任。”

1947年1月1日，贝尔纳斯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于1946年12月2日签

署的“德国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并协定”正式生效，决定成立由德国人选举产生的经济委员会。美英双占区成立。

同年5月，双占区又在法兰克福成立了经济委员会，不仅负责双占区的经济事务，而且享有某些立法权，实际上具有一定的政府职能。很显然，无论是“经济统一”，还是占领区合并，都已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

美英双占区成立以后，开始协调与法占区的经济政策。1947年7月的巴黎会议成为法国同英美走到一起，东西方分野的重要里程碑。会议的中心是讨论美国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即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准备改变过去对欧洲零零星星援助的方针，面对欧洲国家提供长期援助，支持欧洲为实现经济自足而进行地区性合作，从“治标”变为“治本”。出席这次欧洲经济会议的有西欧、北欧以及南欧的16个国家。会议也向东欧国家提出了邀请，但在莫斯科干预下，东欧国家没有参加。

法国不可能忽视巴黎会议报告中所提出的美国将在4年内向欧洲提供224亿美元的援助款额。因为战后法国国内经济困难以及它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军事开支，已使第四共和国财源枯竭，陷入危机。因而，虽然法国在德国问题上余悸未消，但却成为马歇尔计划最积极的支持者，美英以此为条件，迫使法国人在分割肢解德国问题上作出让步：法国政府保证不再将分割鲁尔区和莱茵兰，以及盟国永久占领莱茵河左岸作为对德政策中不可改变的一个原则。这样，法国的对德政策开始向美英立场靠拢，西方从双占区合并向三占区合并的条件日益成熟起来。

与此同时，在巴黎会议上，苏联因在拟定欧洲统一经济计划问题上与英法发生重大分歧，外长莫洛托夫中途宣布退出会议。苏联转而在7月到8月同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友好互助条约，进一步加强苏东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由此形成了与美国“马歇尔计划”相抗的“莫洛托夫计划”。是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宣告成立，苏联又正式提出了两大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概念。两大阵营的形成昭示了德国和欧洲的正式分裂。1947年11月25日至12月15日，四大国在伦敦召开了

“最后一次碰碰运气”的四国外长会议。立场和原则的分歧已使它们之间合作的基础完全丧失。在此之前，苏联已在柏林举行了一次“德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建立一个“统一德国中央政府”的要求。莫洛托夫提议听取“德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意见。西方三国外长以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并不代表全体德国人民的意志为由予以拒绝。伦敦会议的气氛明显地紧张起来，双方各不相让，相互指责。12月15日，会议宣布无限期延期，这意味着苏联同西方国家都准备各行其事了。

德国的分裂已成为不可避免。

1948年2月23日至6月1日，分两阶段举行了美、英、法、比、荷、卢六国代表参加的伦敦会议。这是对西德成立的一个关键的会议，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充分协调了立场。会议发了一系列内容细琐繁杂的公报文件，统称为“伦敦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在西方占领区召开德国的制宪会议，起草宪法，为成立政府作好准备。

第二，鲁尔的煤和钢由美、英、法、比、荷、卢和西德等七国共管；另

外签定关于鲁尔地区管理的法规。

第三，在对西德的全面军事占领结束后，西方盟国继续占领鲁尔和莱茵河。

“伦敦协议”把苏联排除在外。以上三点之中，第一点是最主要的，因为实现了这一点，德国就完完全全一分为二了。协议公开后不久，德国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立即在科尼希斯泰因温泉召开了一次讨论会议。阿登纳主持了这次会议。6月10号，基民盟发了一张声明，严厉地拒绝了“伦敦协议”的部分内容。

自然，不可能指望美英法三大国在这时会重视德国人的主张，德国人不喜欢鲁尔和萨尔从他们的国家分离出去，也不希望国家就此分裂。基民盟的声明表达了此种愿望。但协议本身是三大国彼此妥协的产物，盟国不理睬德国人的抗议。在伦敦会议上，法国作出了让步，放弃了分离莱茵兰的主张，美英也就支持法国要国际共管鲁尔的要求，更何况鲁尔问题本身牵涉到自身的利益以及德国军火工业潜力的问题，鲁尔的国际共管和把萨尔在经济上并入法国成了美英对法的妥协。

“伦敦协议”通过后不久，6月18日，美、英、法占领当局宣布三日后再西占区实行单独“币制改革”。这次行动成为触发苏联在德国问题上采取强有力行动的契机。自1948年3月美英双占区合并以来，苏联代表已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并在酝酿采取一次更强有力的行动。6月22日，紧跟着西方占领区“币制改革”苏联也宣布在苏占区和大柏林市实行币制改革。6月24日起，苏联宣布对柏林实行全面封锁，对西方进入柏林的通道实行水陆交通管制，只保留了三条“空中走廊”。苏联对柏林的封锁达一年之久，东西对峙，关系骤然紧张。7月，苏联人关闭了最后一个还在活动的四国机构——柏林军事管制总部。东西双方都在加紧筹划在各自占领区建立有效政府。11月30日，柏林苏占区成立大柏林临时民主政府；12月5日，柏林西占区举行议会选举，组成市政府，柏林正式一分为二。

大柏林的分裂成了整个德国分裂的先声。东西方都加紧筹划在各自占领区内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两个德国政府的成立已是指日可待。

通向波恩之路

“东欧——俄国的范围——和西欧截然分开，这是一个事实”

——阿登纳 1945 年 10 月写给前
杜伊斯堡市市长魏兹的信

“目前我们必须接受铁幕分割了德国这一事实。行动起来吧，德国的大部分处于铁幕的光明一侧，下决心把它建设好吧！另一部分国土总有一天会回到你们手中。”

——英国军事长官布赖恩·罗伯逊将军于 1948 年
4 月 17 日在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会议上的讲话。

与盟国在德国问题上的争吵相比，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当时新闻界更为关注的是牢牢掌握着德国命运的盟国当局的决定和行动，而不是相互争吵的德国政客与政党，有时评看来这种争夺也许只是从盟国军事长官桌上掉下来的一些小权力，不能起根本的作用。但是，阿登纳却很清楚，这是一场真正的搏斗，搏击的目的在于决定究竟是哪一方能够获取权力机构，以领导前途渺茫的德国人。

早在 1945 年的 10 月阿登纳就看到了东西方必将走向分裂的前景，10 月 31 日他给前杜伊斯堡市市长魏兹写了一封信，认为：俄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东欧行事，实行不同于西欧的政治经济原则，愈来愈不同其它大国合作，“东欧——俄国的范围——和西欧截然分开，这是一个事实”，因此，必须使西欧在英、法的领导下联合起来，联合的西欧必须包括未被俄国占领的德国部分，共同抵抗来自东方的无神论唯物主义以及极权主义。这是战后较早时期阿登纳有关东西方关系的论述。

1946 年 3 月，阿登纳在报纸上读到丘吉尔在富尔顿的“铁幕”演说，精神为之一振，他称：“温斯顿·丘吉尔是第一个能正确估计俄国人意图的人。”丘吉尔在演说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在场，阿登纳敏锐感到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态度将来一个 180 度的大转向，而这种转向将会有助于处于被占领、崩溃状态的德国在西方自由民主基础上的重建，并且，西方盟国也将从此重视德国西占区在遏制苏联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这对基督教民主联盟在西战区地位的巩固也会有利。

事情果不出阿登纳所料。1947 年 3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希腊、土耳其问题援助的议案——杜鲁主义出台，宣布“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制武装的少数集团或外来压力所试图的征服活动”；“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为实施对欧洲的援助，杜鲁门给前总统胡佛配备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委托他对欧洲经济问题进行专门调查。1947 年春天，胡佛公布了他的调查结果。

胡佛的报告对德国是有利的，他真实地反映了德国的困境和它对欧洲的影响。报告指出：德国由于割地给波兰以及萨尔区的经济脱离德国，使它与 1936 年相比，丧失了粮食生产的 25%，煤碳生产的 30%和消费品生产的 20%，而德国人口却在增长：1936 年德国的人口总数为 6800 万，1949 年的德国人口（包括苏占区）将会上升到约 7100 万。与欧洲其它国家相比，目

前欧洲的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及英国的粮食状况几乎已达到战争爆发前水平，而德国人的粮食供应水平却明显低于欧洲其它国家。

胡佛说，美国的战略迫需复兴欧洲，并要将此作为维护和平的首要手段，而复兴欧洲只有一条途径：生产。但是，欧洲的整个经济是通过原料和成品的交换而同德国经济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因而，“没有德国作为一个成员的经济力量的恢复，就不可能有整个欧洲经济力量的恢复。”胡佛警告美国人，说人们可以继续把德国拴在铁链上，但必须估计到，这样，欧洲也就将是衣衫褴褛！

胡佛的报告促使美国政府下决心将德国的复兴纳入“马歇尔计划”，并将其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阿登纳欣喜异常，对胡佛的人道主义大加褒扬，从各个方面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对德国取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意义。

从这时候起，人们感到基民盟与社民党的分歧不仅是在两党的党纲原则上，更在两党对变化形势的看法及对形势机遇的把握上。阿登纳和舒马赫这两位战后德国杰出的政界人物，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脱颖而出。他们各自代表了一条原则路线，为捍卫各自的原则，他们注定了要在政治上进行殊死较量。这是他们政治生涯中相当重要、且命运攸关的一个时期，它将决定谁能指引今后德国的发展方向。

最初阿登纳与舒马赫是站在一起的，他们都批评盟国的占领政策和做法，但是，胡佛的报告一出，阿登纳敏锐地嗅出盟国对德占领政策即将发生改变。这位老练而精明的莱茵人立即得出结论：第一，在西方政策发生改变之际，再坚持德国的东西两部分合为一体显然已是不太可能的事了。苏联一方决不会放弃它在东部的权益，西方也要坚持在西部的利益，因此，德国目前的分裂是必须正视的事实。第二，西部地区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实现德国政治和经济复兴的，要复兴，就必须利用西方。由于在战略上需要，西方必须对德实施支持和帮助政策，因此，阿登纳一方面呼吁占领国停止分割肢解德国的政策，取消对德工业设备的拆迁和经济恢复的限制政策，另一方面又强调基民盟将和西方盟国一起，为把德国西部建设成为反苏重要阵地而作出努力。他多次发表声明，欢迎并支持西方对德占领政策的转变。

舒马赫的表现正好相反。这位容不得反对意见的社民党理论家仍然固执地公开蔑视西方国家的占领政策，咒骂盟国占领当局是“傻子”、“恶棍”。在形势已然变化的情况下，舒马赫仍然坚持要在德国人中培养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走一条独立于东西方之间的自主的“中间道路”。他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德国，不愿把德国战后的命运与西方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讲，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理想。舒马赫的观点和做法令社民党在英国工党政府面前感到为难：英国当然希望能在德国建立起一个亲英的社会党政府，但舒马赫僵硬的立场却引起美法等的大大不快，英国工党一向宣传要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反共堡垒”，这种说法现在连工党说来也感到为难，更难指望美法支持。英国不能不考虑它对社民党过分公开的支持是否会引起西方盟友的不愉快和反对。

在盟国对德问题分歧演至白热化的同时，阿登纳的基民盟与舒马赫的社民党的权力之争也全面展开。竞争最初是在人口最多的英占区进行的。阿登纳和舒马赫都看到英占区拥有的优势地位，这里有巨大的北海港口和人口稠密、素有欧洲工场之称的鲁尔工业区，这决定了它将左右德国今后政治和经济发展。

起初，由于英国人的偏袒，基民盟在英占区居于劣势。成立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时，英国当局分配的州议会席位是：

德国社会民主党	71 席
基督教民主联盟	66 席
德国共产党	34 席
中央党	18 席
自由民主党	9 席
无党派人士	2 席
共 200 席	

对英国人的这种忽视基民盟影响的分配方式，阿登纳多次向英国占领当局提出抗议。阿登纳要求基民盟拥有的席位必须和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在一起的席位相等。英占领当局拒绝了他的建议。为了表示抗议并进一步扩大基民盟的影响力，阿登纳断然放弃在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政府当部长，甚至当州政府总理的机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州内各县议会的竞选工作。英占领当局曾声明，作为使战后德国民主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各州政府和各州议会组成人选上必须符合人民自由表答的意愿。这样一来，各县议会的竞选便举足轻重。

实践证明，阿登纳的这一做法颇具远见，基民盟取得了在各县议会选举的辉煌胜利，并在整个占区内扩大了影响。英国当局不得不放弃原来分配给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议会的各派议席，重新做出如下调整：

基督教民主联盟	92 席
德国社会民主党	66 席
德国共产党	19 席
中央党	12 席
自由民主党	9 席
无党派人士	2 席

这是基民盟在英占区的议席数第一次超过社民党。

1946年10月13日，在各县议会选举结果对基民盟明显有利的情况下，阿登纳乘胜前进，以英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身份致函社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是两个最强大的政党，因此也对德国人民负有最大部分责任，两党应该为德国人民的前途为重进行合作。阿登纳向社民党提出了两个具体建议性的问题：第一，是否打算与基民盟按照力量对比进行相应合作；第二，是否准备对所属的下级组织作出这样的指示。

阿登纳狠狠地戳中了舒马赫的痛处。因为在此之前社民党一直是英占区和全德最强大政党，并在英国人的占领当局中占据了大部分要职。阿登纳此举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算准了恼羞成怒的舒马赫必定会拒绝他的提议，这样他就可以明正言顺地反击社民党不顾民族大义。八九天之后，见没有回函，阿登纳又电请复函。又过了四五天，舒马赫果然被激怒，复函表示拒绝，提出社民党与基民盟合作的前提必须是基民盟承认社民党的社会主义纲领。复函的内容早在阿登纳的预料之中，阿登纳立即将这次信函往来的内容向新闻媒介公开并大加渲染。他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基民盟为使基民盟与社民党联合一致作出了巨大努力而遭社民党拒绝；二是社民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纲领将会给德国的未来带来危害。阿登纳把舒马赫塑造成俯首听命于苏联、会使德国社会主义化的奴从形象。

舒马赫恼羞成怒，亦决心全力以赴。1947年1月，双占区成立，两党政见之别伴随权力之争，拉开鏖战帷幕。

自1946年以来，经济论战一直是基民盟与社民党论战的焦点。基民盟主张自由经济，而社民党力陈实行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化的必要。1946年起，英国工党政府在国内大搞了一次国有化运动，因此，英国占领当局支持舒马赫的主张，计划在德国最重要的鲁尔工业区进行大规模国有化，以防止关键性的工业部门再度落入如希特勒这样的野心家及其支持者之手。

阿登纳和他在经济委员会中的同伴们早已领会舒马赫的意图，他们相信实行计划经济将为德国带来危险。阿登纳先发制人，他利用基民盟在议会中占有稳定多数的优势，控制了经济委员会，否决了舒马赫的建议。舒马赫在遭抵制以后，拒不参加经济委员会。这样，作为经济委员会少数派反对党的社民党更大受打击。基民盟进一步着手完善自己的经济纲领。阿登纳起用了一些著名的商人、银行家、工业家以及经济学家，邀请他们在双占区委员会工作，准备将英国占领当局迄今实行的经济政策实行彻底改造，目标是尽可能缩小政府在私人经济部门的权力和影响，以建设一种“社会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是由当时一名叫做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经济学教授提出来的。理论初出时，并没有能马上为德国政界和公众所接受。阿登纳不是经济学专家，可他对经济却有一种直觉，艾哈德的一句著名告诫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要约束金钱和人民，他们就可以使国家强盛起来。”这正是阿登纳所赞同的主张。他信任并重用艾哈德，让他放手搞经济改革，这在后来被证明是他一生中最明智的决策之一。艾哈德当上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的主任。

舒马赫在对待“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态度上，再次严重脱离实际。按照当时货币价格的估算，“马歇尔计划”中美国人将向停滞的西德经济提供近四十亿美元的现金和物资。没有哪一个德国人不知道美国的这项救济计划，报刊和其它宣传媒介对这件事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这对于生活在贫困之中，经历了1946—1947年严冬困难的德国人来说，是一线希望。装有马歇尔计划援助物品的盒子、箱子、火车车皮和火车上贴满了马歇尔计划的图案和标记，被运到德国各地。德国民众没有理由对美国人送来的“礼品”吹毛求疵，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肚皮生计”。与阿登纳公开作出的欢迎姿态形成强烈对比，倔犟的舒马赫将马歇尔计划视为“美帝国主义”渗透的洪水猛兽大作抨击。这或许是他本能地感到美国人是社民党实现东西德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宿愿的最大障碍，但是，他却因此开罪于美国人，也引起了法国人的戒心。最糟糕的是，德国公众对他的做法也深感不可理解，为什么要拒绝美国人的好意呢？刊登在1949年3月1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一封短信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寄出的，上面写道：

“亲爱的先生：

如果一个人必须要有一个主人，那么他最好选择一个富主人、而不是选穷主人。

诚挚的
德国一读者

从这封信所反映的情绪来看，舒马赫在这时候强调民族自尊，显然是违

背了民意。失去了盟国的支持，又表现出不关心民众的生计，这种失误对政治家来说后果是严重的。舒马赫很快就看到了这一点。

1948年7月，西方三国占领区总司令和西德各州（共十一州）政府的总理在法兰克福会谈，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会议决定，伦敦协议所规定的制宪会议（即议会委员会）将由各州议院根据每七十五万名居民选出一名代表的方式组成，制宪会议的目的是为即将成立的西占区政府起草一部宪法。

由于基民盟影响的扩大，基民盟在整个西占区范围内制宪议会的选举中取得与社民党相当的成绩。1948年9月1日，制宪会议开幕式如期在波恩的教育学院举行，来自美、英、法三个占领区的65名代表参加了。其中，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它在巴伐利亚州的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代表占27名，社民党代表27名，自由民主党代表5名，德意志党2名，中央党2名，共产党2名。阿登纳当选为议会委员会主席。

阿登纳曾经做过十几年的普鲁士议会议长，这期间所积累的政治经验使他对议会委员会的工作驾轻就熟。工作的困难在于一方面要经常向同盟国占领管制委员会通报会议的情况，并听取盟国方面的意见精神，另一方面，还要协调议会委员会内部的意见，尤其和社民党之间的分歧。

议会委员会在阿登纳的主持下开了9个月的会。在这一时期里，社民党的舒马赫大部分时间卧病在床，由社民党的卡洛·施密德教授负责实际起草基本法的中心委员会工作。与舒马赫的瘦弱、阴郁、待人尖刻而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施密德教授长得壮实、待人和蔼、友好并富有幽默感，这很大程度冲淡了基民盟与社民党在很多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和火药味。自由民主党的豪斯教授也是议会委员会中的一员。他后来成为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在基民盟与左派的社会党、共产党人之间发生争议时，豪斯教授那土瓦本人特有的幽默和和善的性格使他在其中起了平衡和调解作用。阿登纳自己则发挥了善于协调的特长，往来于各个小组之间。不论是正式的讨论，或是私下的商谈，他的精明和简洁干练的工作方式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喜欢私下商谈这样的形式。当他看到会上激烈争论，双方意见不相容时，就宣布暂时休会，再在其后不厌其烦地作调解说明。人们乐于接受他这种求和和解的态度，到下次开会时，争论往往已经解决。

阿登纳有时也会运用一些直观的语言来制造幽默效果，达到降低敌意的目的。有一次，共产党代表伦纳的发言令儒雅的豪斯教授也感到恼火，忍不住用土瓦本土话向伦纳高喊“闭上你的驴嘴。”整个会场为之大哗。这时，会议主席阿登纳摇起了铃，让会场安静下来后，问豪斯是不是蓄意侮辱伦纳，豪斯摇头回答，他是和伦纳在寻开心，于是引起哄堂大笑。阿登纳又一本正经转过脸问伦纳是否受到了侮辱，伦纳只好说没有。于是，会场气氛变得十分活跃。

议会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制定一部宪法。通过多次的磋商、协调，代表们达成共识：为防止独裁，将来的联邦总统不能像魏玛共和国总统那样拥有全部权力；为杜绝政府被轻易推翻的危险，应加强联邦总理的地位；倘使议会不同意联邦总理所奉行的政策，不能通过不信任提案来撤销某些部长的职务，使联邦总理在执行他的职责时发生困难，但议会有权对联邦总理本人提出不信任案，前提条件是：新联邦总理人选已被提名，并已在议会中获得必要的多数票，能够进行组阁。

另一点共同确认的原则是：新宪法将不被称其为宪法，尽管它具有宪法

的性质，但是，为了不放弃将德国东西两部分统一在一起的目标，只能将其作为建设国家的“基本法”，待德国统一之后，再正式称为宪法。

会议结束后，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取得盟国对基本法的认可。美英法三盟国对西德占领法规的谈判直到1949年4月的华盛顿外长会议才取得积极进展。由于盟国在占领法规问题上的争争吵吵，1949年3月，三名占领区军事长官否决了基本法草案，理由是：草案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过多，特别在征税和支出方面损害了各州政府的权力。

于是，议会委员会内部展开讨论，是否应向占领国当局作出某种妥协，以使基本法尽快获得批准。当时许多人怀疑；如果基本法以占领国军事长官所希望的文字形式被通过，那它可能就不会是一部理想的法典了。阿登纳认为，即使基本法有缺陷，比起它未获通过来，总可以给国家带来一些有利的地方。而基本法如果未获占领国军事长官通过，那全部工作就得从头再开始，1948年6月六国伦敦会议的成果将荡然无存。法国人就会再对西德的成立从中作梗。谁也不能预言，以后会发生怎样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不是对德国有利。因此，首要的任务不是与占领国军事长官们在条文上争吵，而是应使基本法获通过，以最快的速度缔造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登纳的看法得到不少代表的赞同。

占领当局否决基本法草案立即引起了社会民主党的抗议。与历次对抗基民盟一样，社民党又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反对对基本法作任何修改。舒马赫从病榻上爬起来，在1949年4月19日社会民主党于汉诺威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慷慨陈词，猛烈抨击盟国关于修改基本法的要求，大声疾呼社民党为了整个德国和德国人民的意志，决不会像基民盟似的奴颜屈从。他对听众讲道：“你们要做爱国者，就必须爱整个德国，而不仅是爱十一个德意志州。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全部分歧。”美英法占领区内一片激昂的抗议声，在这种情况下。占领军当局收回了否决基本法草案的意见。

5月8日，正好在战争结束四周年这一天，基本法得以通过。此后一切工作变得十分顺畅。到5月底，各州议会批准了该法，正式形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联邦议院的第一次全国大选定于1949年8月14日举行。联邦议院成立后，将立即投票选举联邦共和国的首任总理和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

由于敢于公然顶撞占领军，舒马赫受到了新闻界和公众的赞扬。《法兰克福舆论报》声称：这是德国人的反对意见第一次得到尊重，而“舒马赫这次历史性的‘否定意见’必将决定西德的命运。”

由于这件事，民意测验表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在直线上升，虽然离首届联邦政府的选举还有好几个月，但舒马赫前景看好。舒马赫深信，选民会支持社民党的政治经济纲领。他向选民许诺实行计划经济和重工业国有化将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好处，他说“烟囱大王”们的专断决定再也不能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收入。他又进一步阐述有关“中间道路”的观点，主张德国人应当摆脱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政治压力与影响，在世界舞台上闯出自己的路子。掌声与欢呼冲昏了舒马赫与社民党的头脑，似乎忘记了站在一边的狡黠的对手阿登纳。

阿登纳却始终是清醒的。虽然民意测验一直表明阿登纳落后于舒马赫，

“烟囱大王”：鲁尔人给煤、钢大托拉斯和联合企业者板起的绰号。

新闻界与政治观察家们也看好后者，但是几十年政治斗争经验使阿登纳深知，只有最后的胜利者才是真正的大赢家。舒马赫很快就为轻视阿登纳的大意付出了巨大代价。

7月22日，大选前不到一个月，基民盟在海德尔堡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合，全体外国记者应邀出席。阿登纳在会上抛出一颗政治炸弹。他向所有在场的人指出舒马赫在汉诺威发表的所谓“历史性的否定意见”只是一场骗局，舒马赫装腔作势拒绝盟国关于修订基本法的要求只不过是政治把戏！因为一名英国军官事先已向舒马赫交底，如果德国人强烈反对修改基本法，盟国将会收回其反对意见。阿登纳指责舒马赫制造似乎只有他敢于顶撞盟国当局的假象，其实是因为他知道“和纸老虎进行搏斗是毫无风险的”。阿登纳还告诉听众：社民党没有及时将这件事通报给议会委员会，也是舒马赫为提高政治声誉而玩弄的政客把戏！

此言一出，群情哗然。舒马赫大力恼怒，竭力否认这种无端指责。可是，当阿登纳说出了曾事先向舒马赫透露详细情报的英国军官的名字后，舒马赫哑口无言。

英国当局也企图想要掩盖这件令人尴尬的事，但这只能欲盖弥彰，因为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英国工党政府对社民党的棉袒立场。最后，英占区军政治官员克里斯托弗·斯蒂尔爵士向新闻界承认，社会民主党的确曾经得到过英国政府的特殊帮助和鼓励。斯蒂尔没有详谈向社民党提供帮助的性质，但他说出提供这种秘密帮助的目的在于“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反共堡垒”。阿登纳立即加以反击：是奉行与西方同出一源的基督教伦理道德原则的基民盟更能成为反共堡垒呢？还是奉行“中间道路”，不愿与西方结盟的社民党更能抵制苏联共产主义的侵害。这次，该英国人哑口无言了。

实际上，英国工党政府感兴趣的只是在西德成立一个社会党政府，这个政府将与英国工党政府合作，并能抵消美国在波恩日益增长的影响和力量。英国人与社民党之间这种暧昧的关系使得德国公众感到又一次受到盟国的愚弄，社民党的支持率开始下降。

炸弹抛出后，阿登纳把竞选的基点放在他认为德国人民真正关心的“肚皮”问题上：为其提供更多的食品、足够的住房、就业保障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他为基民盟布置了竞选战略。他向党员们强调说，一个政党如果能使德国人相信，它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紧迫要求，它就能赢得他们的选票。舒马赫提出的重工业国有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冷战中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以及摒弃马歇尔计划等等主张对于尚处于温饱状态的德国人来说太遥远而抽象，因此，基民盟竞选主题应是“肚皮政治”，让人们感到基民盟对他们生活的关心。

阿登纳没有忘记那个主张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艾哈德教授。艾哈德当上双占区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后，主持币制改革和整个经济的复兴工作。币制改革从1948年6月开始，到1949年春天已初见成效，艾哈德自由市场经济计划的实行使西占区经济起死回生。商品又重新摆上货架，西部的德国人在战后第一次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工作、去花钱，也第一次感到了今后生活的美好前景。为了赢得竞选胜利，阿登纳请出了艾哈德，将这个德国人的宠儿拉入基民盟，并让他参加竞选活动。艾哈德成了阿登纳的一笔政治资本，成了他“肚皮政治”口号的可靠支柱。

1949年8月14日是西德大选日，东西双方都对这次选举给予高度重视，

大选的结果将产生一个新的德意志国家和它的政府。西部有 78.5% 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选举的结果大出社民党人意外：基督教民主联盟得票率为 31%；社会民主党得票率 29.2%；自由民主党得票 11.9%；剩余选票为许多小党派和临时党派瓜分。

这样的结果在社民党的意料之外，却在基民盟主席阿登纳的意料之中，这是他几年来逆境中奋战的结果。事实证明了一点，这就是阿登纳的竞选战略完全正确，德国人投谁的票是由其自行抉择。孤独的思想家舒马赫显然忽视了普通老百姓的想法，但他认识到错误时，为时已晚，联邦总理之职也因此而失之交臂。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得票 736 万张，社会民主党得票 693 万张。从这以后的近 20 年时间里，社民党在选举中始终处于落后地位。

紧接着，联邦议院根据竞选结果进行了议席分配。有 10 个政党和派别参加了总共 402 个议席的分配。结果如下：

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

	联盟 139 席 + 柏林代表 2 名
社会民主党	131 席 + 柏林代表 5 名
自由民主党	52 席 + 柏林代表 1 名
德意志党	17 席
巴伐利亚党	17 席
德国共产党	15 席
经济建设协会	12 席
中央党	10 席
民族右翼	5 席
石勒苏益格州联盟	1 席
无党派人士	3 席
<hr/>	
共计	402 席 + 柏林代表 8 名

基民盟虽然取得了联邦议院大选的胜利，但没有获得议会的绝对多数。为了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摆在阿登纳与基民盟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应该同社会民主党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呢？还是应该同自由民主党再加上另一个小党组成一个所谓的小联合？另一个问题是党内意见不一致。在三个占领区中，基民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党组织，也没有统一的党的机关。在这种情况下，基民盟与基社盟的许多成员都认为同社民党搞大联合是上策。各占领国，尤其是英国人，也欢迎这种做法。舒马赫与社民党抓住这一点开出条件，发表声明：掌握经济都是社民党参加大联合的必要和先决条件。

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阿登纳举棋不定。他当然不愿接受，但这个问题必须全党讨论后才能定夺。

阿登纳感到应该先就此问题在小范围内磋商，待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向公众发表。不必等待新选的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开会来磋商，因为大范围讨论会使意见纷呈，给公众产生基民盟内部分裂的印象。

于是，阿登纳以英占区基民盟主席和基民盟最强大的党组织的身份，邀请全国基民盟及巴伐利亚基社盟的领导成员，于 8 月 21 日到他在勒恩多夫的寓所讨论这个问题。

柏林代表无投票权。

8月21日星期天，在勒恩多夫，阿登纳会见基督教联盟党的重要人士。与会的有原来议会委员会的代表，因为他们参与了基本法的制定工作，能正确判断与选举有关的事；还有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和经济管理处成员，他们坚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外还有三个占领区的各州基民盟与基社盟代表，以便能全面反映各占领区的意见。这次聚会不论是对基民盟，还是对阿登纳，都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聚会讨论中，以阿登纳为首的一派反对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以莱茵兰—法尔茨的总理阿尔迈特尔为首的一派主张联合。阿登纳作为主人率先发言，说明反对与社民党联合的理由。认为：社民党与基民盟两党的竞选大部分分歧围绕经济问题展开，焦点在于是应在未来德国搞计划经济，还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两党联合执政，答应让社民党占据经济部，那就无异放弃了基民盟基本纲领中的一项承诺，这样会使投票赞成基民盟与基社盟的选民感到上当受骗，会使党受到致命的打击。另外，选举的结果非常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德国人民根本不欢迎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票数加在一起，共有800万选民投票赞成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而如果把自由民主党等其它非社会主义政党与基民盟—基社盟的选票加在一起，投票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民则共有1300万。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之所以受到选民们的如此厚爱正说明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拥护。既然人民拥护，而且表达得如此明确，就没有什么理由要反其道而行之。

阿尔迈特尔认为：“我们必须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像用一根缆绳一样和政府缚在一起，否则，我们会遇上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它会以民族的论据攻击同各占领国进行和解的任何努力。即使我们从盟国方面争得了某些重大让步，社民党仍然会攻击我们做得太少，如果让社民党来做将会好得多。而就德国人民目前所处的生活条件来看，可以预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有许多人心怀不满。这样一来，社民党将会运用这种方法，获得巨大的成功，而我们所处的困难地位将难以对社民党的非难进行自卫。也许到了第一届立法期满，社民党将轻而易举取得第二届联邦议院选举的胜利。”

一场情绪激昂的辩论展开了。许多人赞同阿登纳的观点，另有许多人认为阿尔迈特尔言之有理。辩论中，阿登纳反复强调从原则上，由于党不能放弃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这就决定了与社民党合作的不可能。既然基民盟与社民党不可能在经济方面进行合作，为了能获得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的政府，基民盟可以考虑同社民党以外的一个或几个政党联合执政。有鉴于在法兰克福委员会中共事的经验，基民盟可以考虑与自由民主党及德意志党联合执政。从健全议会民主制的角度看，联合也不可取。如果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那样

议会就将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这样将不利于议会民主制的运行。必须使德国人民习惯于由一个最强大的党担任领导，而另一个大党处于反对地位，但这却是一种责任重大、同国家整体利益一致的反对地位，如果执政党无所成就，那么选民们在下一届选举中就会因其不称职而使它下台；如果反对党很好地发挥了作用；它就可望通过下一届选举上台执政。德国需要像这样的议会民主制。

阿登纳力求使与会者确信，只要基民盟与基社盟采取坚定的态度坚持己方立场，逐步实现在选举中提出的各项纲领，就肯定会取得成果，而且这种成果“必将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有的抨击成为胸襟狭隘的挑剔”。阿登纳最

后慷慨激昂地说，“我认为在执政四年期满时，我们将会比以前更为强大，并且比今天更加无惧于反对党。选民们既已决定拥护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宗旨，我们就对这一决定负有责任！”

经过四个小时的激烈争论，多数与会者接受了阿登纳的主张。

至当天下午，阿登纳掌握了会议的主动，提出与自由民主党和德意志党组阁，这样新政府将拥有基民盟—基社盟的 139 席、自由民主党的 52 席以及德意志党的 17 席，一共是 208 席，就有了一个恰当政府多数。与会绝大多数的人对此表示同意。

会后基民盟发表了一份新闻公报。公报指出：

“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政治家们本星期日午后在勒恩多夫阿登纳博士的寓所举行会议。会议认为，选举不仅有力地证明了承认基督民主主义社会观的基本路线，而且有力证明了确凿不移地拥护市场经济，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因此，有义务继续坚持这一整个政策，并在组织联邦政府时，得出明确的结论。”

联合组阁问题议定后，接着讨论联邦总理和总统人选的问题，这时，一名与会者提议由阿登纳担任联邦总理，理由是他德高望重。但是有更多的人显然担心阿登纳的年龄和健康。阿登纳挺直腰板，当仁不让地表示：“如果与会者意见一致，我就接受。我与我的医生马蒂尼教授谈过，我问他，以我自己的年龄是否可以至少当上一年的联邦总理。马蒂尼教授没有表示担心，他说，就是当上两年也无妨。”

阿登纳话已至此，再没有人对联邦总理的人选提出异议，阿登纳提议由自由民主党的豪斯教授担任联邦总统，因为政府中自由民主党将是第二大党。

有人问道，“豪斯教授已经知道这种想法了吗？”

阿登纳回答：“不，可惜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同豪斯教授商谈。但豪斯教授热心社会问题，在自由民主党和德国人民中深受众望，我相信他是联邦总统最适合的人选。”

又有人提出反对豪斯的理由，说豪斯并非同教会友好的人，他当上总统可能会对教会不利。阿登纳回答说：“他有一位笃信基督教的夫人，有这点就够了。”

联邦总理与总统的人选就这样决定下来，阿登纳的观点主张为大多数人接受。在勒恩多夫会议上，他确立起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两天之后，即 8 月 23 日，星期二，阿登纳在波恩联邦议院大厦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阐述并解释了勒恩多夫公报原则。同一天，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议会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在一项决定中声明，支持勒恩多夫公报原则，并声明信任阿登纳本人。有了最强大的北莱茵—威斯特伐伦的基民盟党组织的支持，阿登纳感到完全有把握实现党内团结。

1949 年 9 月 12 日，联邦代表大会召开。在第二轮选举中，自由民主党主席奥尔多特·豪斯当选为联邦总统；三天之后，9 月 15 日，进行了联邦总理的选举。在首轮选举中，阿登纳仅以一票的多数当选第一任联邦总理。

事后有人问阿登纳，莫非是他自己投了自己一票。阿登纳回答说：“一

点不假，不这样做我倒认为是虚伪的。”

9月20日，阿登纳组织起了自己的班子，任命了各部部长：

联邦马歇尔计划事务部长：弗兰茨·布吕歇尔

联邦内政部长，古斯塔夫·W·海涅曼博士

联邦司法部长：托马斯·戴勒博士

联邦财政部长，弗里茨·舍费尔国家顾问

联邦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教授博士

联邦农业和粮食部长：威廉·尼克拉斯国家顾问

联邦劳工部长：安东·史托希

联邦交通部长：汉斯·克里斯托夫·席包姆博士

联邦邮电部长：汉斯·舒伯特

联邦房屋建造部长：埃贝哈德·维尔德穆斯

联邦难民事务部长：汉斯·卢卡契克

联邦全德问题部长：雅各布·凯泽

联邦参议院事务部长：海因里希·黑尔韦格

1949年9月20日，联邦政府组成，阿登纳在绍姆堡宫发表了就职演说。

他宣布：

联邦政府首先要利用“起码是相对的国家自由”，来克服燃眉之急的物资匮乏，并“在取得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的同意下”，为德国人赢得外交上的行动自由权。”

我过去和现在都相信，看来对我们是如此绝望的时代，终将导致重建大有作为的国家和超国家组织。这些组织必须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在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统一整个德国并使之参加欧洲组织。

“我毫不怀疑，根据我们的血统和思想意识，我们是属于西欧世界的。我们要同所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尤其是要同比荷卢经济联盟国家，法、意、英等西欧各国保持良好关系。几百年来支配着欧洲政治和多次引起战争、破坏和流血的德法对立必须永远予以消除。……”

“联邦政府决心竭尽全力地从事各方面工作，以便沿着这一条款所规定的巩固欧洲和边界和平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本着基督教西方文化的思想并尊重人类的权利和尊严，从事我们的全部工作。我希望，依靠上帝的帮助，德国人民将能实现统一，对欧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随着阿登纳踏入绍姆堡宫，战后德国历史新的一页开始了。

第三章 彼得斯贝格之路

“一个英明的政府开宗明义便要做两项不同的理性工作。首先，它必须根据现有力量，选择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方法，使之有取得成功的最大可能。”

“一个国家如果将目标定得太低，放弃了在它实力范围内可以实现的外交政策，就会放弃它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

“一个国家可能设法扮演大国的角色，但又没有这样做的基本条件，于是就会招致灾难”。

— [美] 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

占领法规

“我坚信使我们国家和我国人民重获自由的唯一可取途径是同三国高级专员步调一致。”

——《阿登纳回忆录》（一）

1949年4月8日，美、英、法在华盛顿签订了一系列关于德国问题的重要协定。华盛顿协定的目的既为使西德在和盟国占领不相抵触的条件下享有一切自治权利，也为使西方三国保留自己在西德的最高权利。

波恩《基本法》通过之后，6月20日，“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在巴黎成立。它的成员包括：美国的约翰·麦克洛伊、法国的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和英国的罗伯逊将军。盟国制定出《占领法规》，规定“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拥有在西德的最高权力，它可以改变联邦政府方面作出的任何司法或者行政决定。用盟国的话来讲，比起占领军总司令来，高级专员们的权力已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由他们处理的事务包括：裁军与非军事化；对鲁尔地区的监督，如退赔与赔款、非卡特化、地方分权化、消除商业歧视、外国在德利益与外国对德债权等；外交；移民；盟军对德的保护和占领费用；对联邦宪法和州宪法的尊敬；对对外贸易与外汇、金融的监督；以及消费资金的利用，以便把外国的援助减缩到最小限度等等。具体而言，管制和监督是“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在德拥有的权利。联邦德国和其它国家签定的协定，必须先经过高级专员委员会的审查，只有高级专员委员会同意之后，方可生效。联邦政府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和决定，必须由高级专员委员会通过，才能视为有效。

《占领法规》在联邦政府成立的次日，即9月21日，开始生效。

德国的战败国地位使它不得不接受这一命运安排，无从选择。尽管《占领法规》本身的权威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是与执行《占领法规》的人之间却是可以通融的，这是联邦总理阿登纳对待《占领法规》的态度。

1949年4月，《占领法规》制定后，西方三国外长曾给当时作为议会委员会主席的阿登纳一份通知书，通知书中写到：

“三国外长强调指出，三盟国政府的最高目标是，鼓励和促使德国人民在一个民主的联邦国家领导下，并在政治合作的范围内，从符合双方的利益

出发，争取牢固的统一”。

接到通知后，阿登纳感到本着这种精神制定的《占领法规》对联邦德国的发展来说是有利，至少它比起原有的情况是前进了一大步，联邦政府应该努力遵守占领法规的条款，尽量与高级专员们协调配合。他设想在一年或至迟不超过一年半的时间内，在高级专员们审查《占领法规》执行情况时，可以此争取进一步扩大德国当局的立法、行政及司法方面的权限。这是一种希望。

所以，阿登纳一上任即对他们的同僚们讲：“我坚信使我们国家和我国人民重获自由的唯一可取途径是同三国高级专员步调一致。”

从另一方面阿登纳亦感到，《占领法规》之下的德国在政治上还是拥有相当的自由权的。因为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在很多情况下不能不重视联邦政府的意见，高级专员委员会命令需通过联邦政府执行。

联邦政府一成立，三国高级专员即派人通知阿登纳，打算举行隆重的仪式颁发《占领法规》，并借此请阿登纳介绍其内阁阁员。阿登纳派人请求高级专员设身处地为联邦政府考虑，取消这个打算，因为对于一个战败国家来说，占领法规始终是令人心理上不愉快的东西，接受它对于被占领的国家来讲，没有任何可值得为之举行隆重典礼的理由。高级专员们考虑了阿登纳的请求，决定只由高级专员委员会主席发表一次讲话宣布《占领法规》生效，具体仪式是高级专员们站在一块地毯上，而阿登纳则需立在地毯的前面，在听候高级专员委员会主席宣读完《占领法规》后，再走上地毯，声明拥护。

9月21日这天，按照议定好的程序，阿登纳偕同一些联邦部长到达了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所在地——彼得斯贝格。一下汽车，阿登纳一行立刻被人领入了一间大厅，三国高级专员正站立在红色的地毯上等候接见他们。当中一位正是法国专员弗朗索瓦—庞赛，他是当天的主席，左右分站着美国专员麦克洛伊和英国专员罗伯逊将军。

阿登纳率领众联邦部长在地毯前立定，弗朗索瓦—庞赛跨前一步欢迎。阿登纳趁势趋向前去，正好一步踏上了地毯。高级专员们对阿登纳的小动作似乎毫无察觉，弗朗索瓦—庞赛宣读了《占领法规》。这种不知是否是有意忽略使阿登纳心里有了一种感觉，即对于盟国的命令并非事事都须要唯唯诺诺，在某些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仅是必要，而且也许是可行的。这种感觉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信念，在与彼得斯贝格山的高级专员们打交道过程中，阿登纳锻炼得运用自如。

随后，阿登纳向三国高级专员一一介绍了随行阁员，并声明坚决拥护《占领法规》，他又借机发表讲话，阐述自己的立场主张。他说：联邦德国的健全发展有赖于西方国家的帮助，“只有保证每个个人在经济上得到最低限度的衣食住行条件，一个国家才能健全地得到发展。在没有使数百万被炸得一贫如

洗的人和难民获得足够数量的住房和相应的就业机会之前，德国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内部秩序。”为此德国急需盟国的帮助。

看到三位专员默默颌首，阿登纳继续说道：当然，一个和平稳定的德国，也是我们联邦政府追求的基本目标，不仅如此，联邦政府的社会纲领还应同时有助于保证欧洲的和平发展。联邦政府要竭尽全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一问题。

他说，目前欧洲各国之间的紧密合作已经开始，这将把欧洲引向一个和

平的新秩序，这将可以建立起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欧洲，联邦德国乐于并准备与欧洲国家一起共同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

饮过香槟酒，阿登纳等起身告别。当阿登纳及其随员部务主任布兰肯霍思在衣帽间穿大衣时，高级专员委员会的一名官员走到他们身边，把一本用包皮纸包好的书交给了布兰肯霍思。

登上汽车坐定后，阿登纳叫布兰肯霍思打开了那个纸包。

一本用羊皮纸包装，印刷精美、装订考究的《占领法规》跃然入目。上面没有任何签字，却足以决定德国人的命运。阿登纳感觉到了它的沉重。

冲破紧箍圈的尝试

“照我看来，联邦政府的首要目标只能是取消拆除设备计划，不管要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

《阿登纳的回忆录》（一）

1949年春天后，艾哈德的币制改革使得物价稳定下来，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联邦德国成立伊始，大多数德国人对新政府还抱观望与怀疑态度。这是丧失信心的战败国心理，也是对刚刚历经的严重经济困难的余悸。他们最关心的只是具体物质状况的改善。尽管币制改革和马歇尔计划减轻了一些困难，但是，大部分城市还是一片废墟，工业处于瘫痪。战后最初几年，占领盟国对德国人又怕又恨，都执行了拆除德国工业设备的计划，虽然冷战开始使设备拆迁有所缓减，但德国工业已元气大伤。如果严格按照规定将这些企业拆卸一光，德国就不仅根本无法在经济上恢复元气，也无法在政治上恢复元气。因此，阿登纳认为联邦政府首要的目标就是使盟国取消拆除计划，负什么样的代价都在所不惜。

取消设备拆除计划，重建德国的政治经济牵涉到邻国对德的安全恐惧心理。

对德国的恐惧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德国潜在实力的惧怕。后来的法国总理弗朗索瓦·密特朗在谈到德国与欧洲的关系时曾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欧洲的形成和解体都是围绕着德国进行的。”把这句话解释开来，就是说德国自19世纪下半叶崛起之日始，总是对欧洲固有秩序发动冲击，它的每一次崛起都是以破坏欧洲均势为代价，使欧洲经历一次又一次新秩序形成的大冲击：俾斯麦战争打破了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形成的欧洲大陆均势；威廉·凯泽挑起的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大陆德、奥匈、俄、土四大帝国土崩瓦解；希特勒战争更使欧洲地图面貌大为改变，彻底瓦解了欧洲秩序，并动摇了欧洲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地位。所以，无论统一还是分裂，德意志总是以它的存在威胁着欧洲国际关系体系，欧洲国家无不担心德国的潜在力量及它重新崛起时将将对欧洲国际关系构成的威胁，各国一致认为，保证欧洲和平一劳永逸的做法就是将德国打倒，分割肢解，并把它降为农业国。战后法国对德的做法反映了欧洲大陆上国家普遍的戒心，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小邻国，更竭尽全力支持法国压制德国。

再是德国处于一个令人敏感的战略和地理位置。

德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正好是东西方的交接处，它秉承了东西双方的文化、传统，对东西双方都有着重要影响。它是一个中间地带、大杂烩，这里既有东方式的普鲁式军事专制传统，又有与西方一体的基督教文化，东方的专制权力与西方的平等自由都能在德国找到滋生的土壤。所以德意志既是东方式的，又是西方式的，东西双方都将它作为自己范围内的一个重要地区。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醒过世人。他认为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最集中的地区就是欧亚大陆，欧亚大陆相当于一个“世界岛”，而德国正好处于这个“世界岛”的中心位置，因此谁控制了德国，就可以控制“世界岛”，而控制了“世界岛”就等于控制了全世界。希特勒曾经利用了德国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发动了欧洲战争，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大陆，仅就这一点看，德国战略地位就不该再为任何人所忽略。

正因为如此，四大占领国都将设备拆除计划视为限制德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阿登纳欲使盟国放弃这一点，就必须考虑盟国限制德国的根本出发点——安全问题。德国所有的战争对手无不强烈地要求安全保证。有必要寻求一条道路，它既能考虑欧洲国家的安全要求，又能使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得以重建。

阿登纳认为这看似矛盾的两方面在很多地方可以相通，加以利用。

首先，他认为，从国际关系现状来看，联邦政府虽处不利的战败国地位，却有很多有利因素：东西德国的建立本身就说明美苏冷战对抗已经不可调和，美国与西方联盟的切身利益是需要有一个强大团结的西欧来抵御苏联，其中德国的力量不可或缺。而“一个戴上了镣铐的国家不会是完全有用的好伙伴”，这是联邦德国可以用以向西方讨价还价的重要本钱。

其次，美国是西方联盟的中流砥柱，“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总是首先以本国的实际利益或设想利益为主导”。美国要在欧洲推行美国政策，美国政府的许多讲话都明确表示“德国重新强大起来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美国的支持会有利于联邦德国实施对外战略。

这两点虽然不多，却已足够，它说明战败和受限制的德国并非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在外交上它仍然可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关键是怎么利用好这一点。在阿登纳看来，美国虽然有心恢复德国经济，但却要顾忌德国邻国的安全要求，联邦德国重建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应首先设法满足邻国的安全要求，消除其对德畏惧之心，以低姿态取得盟国信任，一步步扫清盟国为防止德国重起而设置的种种障碍，冲破限制德国的重重“紧箍圈”，平等地参加到欧洲和国际社会中。

1949年11月30日，联邦议院就盟国在德进行的工业设备拆除计划召开了一次会议。阿登纳在议院辩论中努力使议员们明白了他的上述思想。他向联邦议员们指出，西方盟国对德国实行工业限制和设备拆除根本是一个心理的问题，他说：“西方盟国常常会这样认为，只要我们反复谈到设备拆除问题，似乎我们德国人就是想要借此进行宣传，这样就反而激起对方的情绪，为了维护威信和体面而不能对德国的要求作出让步。所以，我们应尽可能向盟国作出解释，强调德国人要求放宽设备拆除既非强词夺理，也非热衷于进行宣传；促使我们这样做是由于经济原因。而且还要告诉他们如果要想把德国人民纳入欧洲的生活，并且也纳入欧洲的经济生活，那么至少只有使大部分德国人民相信西方三国确有这种愿望，才能做到这一点。”

阿登纳深入合理的分析说服了议员们。最后，联邦议院所有党派一致通过，将要求盟国减少拆除项目——最好是完全停止拆除——作为联邦政府的首要工作。

可是，要使盟国放弃拆除计划谈何容易，联邦德国政府必须拿出有效的计划，这一点至关重要。阿登纳作为英占区咨询委员会成员、议会委员会主席时都曾反复向盟国占领当局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毫无结果。联邦政府成立后，每次阿登纳前往彼得斯贝格山与高级专员讨论此问题，都遭到完全拒绝。如何冲破“紧箍圈”确实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正在这时，盟国几次三番敦促联邦政府，要求立即作出表态支持鲁尔国际署的工作。

“鲁尔国际署”是西方盟国在准备建立联邦德国时为限制德国工业能力而建立的一个国际性机构。鲁尔地区集中了联邦德国大部分工业，法国、比

利时等强烈要求对这一地区实行国际共管，以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再起。1948年12月，早于《占领法规》制定前，美、英、法三大国与荷、比、卢等三个较小的国家一起公布了“鲁尔法规”。根据这项法规，盟国于1949年4月28日设置了“鲁尔国际专署”，并规定即将成立的联邦德国也必须派代表参加。

鲁尔法规是盟国对法国同意建立西德国家的一种补偿，它将鲁尔从德国分离，划归国际共管。西德一旦参加“鲁尔国际

署”就等于承认“鲁尔法规”，阿登纳深知这将使联邦政府处境为难，风声一起，在野的社会民主党便全力攻击政府的“卖国”行径。

另一方面，如果参加“鲁尔国际署”，同意“鲁尔法规”，却能够在外交上产生一些有利的结果，比如联邦政府的合作态度会降低法、比等邻国的敌意，也可借此密切同盟国的关系，并且联邦政府还可以以此为前提，使盟国放宽设备拆除计划。但是，社民党的宣传已经造成声势，民意测验表明在占有全国人口1/3的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大多数人反对加入鲁尔国际署，明春这个州还要举行州议会选举，若失去民心，后果不堪设想。阿登纳举棋不定，他想从有利的一方来考虑，但对是否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却毫无把握。最后，他决定召开一次内阁会议，先统一内阁的意见。

事不宜迟，10月25日，联邦政府成立后仅一个月，阿登纳召集所有内阁成员开会。

阿登纳开门见山讲了他同彼得斯贝格山的高级专员们就设备拆除问题举行了几次劳而无功的会谈，他观察着在座每个人的表情，继续道：“部长先生们，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要使德国的影响能左右高级专员的政策，在最近的时间内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派代表参加到盟国的机构里，我们就会有机会对盟国政策施加影响。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将加入鲁尔国际署作为同盟国密切关系的一种手段，这将会有利于今后的工作。”

全场默然了半晌之后，部长们开始交头接耳。这时，经济部长艾哈德站了起来。阿登纳做了个手式，示意全场安静。艾哈德清了清嗓子，不紧不慢地说：“我认为参加鲁尔国际署是完全可取的。”

此言一出，群情哗然，众所周知艾哈德在币制改革成功后甚得民心。艾哈德阐述道：“我是搞经济的，所以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联邦总理言之有理，使盟国缩减对德设备拆迁，是目前当务之急。我们应看到鲁尔专署是不受英国高级专员公署约束的，英国高级专员公署几乎控制着我国煤钢工业的命脉，如果我们参加鲁尔专署，英国对我国经济的控制就会减弱一分，在鲁尔专署里我们也可拥有发言权。”

艾哈德的一席话使阿登纳的说服工作顺利多了。很快他就取得内阁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会议一结束，他立即派人拟就了一份有关加入鲁尔专署的申请书，准备递交高级专员们。

尽管如此，阿登纳还是不敢冒险轻易向公众宣布联邦政府准备参加鲁尔国际专署，甚至在英法两国对美国提出的减轻德国经济负担的要求得到同意之前，阿登纳也没有将这一点向盟国透露。10月的最后几天，盟国的外交活动十分频繁，美、英、法三国外交大臣与高级官员们就商讨德国问题在伦敦频频碰面。

10月31日，阿登纳正在审阅联邦议院议会党团委员会拟就的有关设备拆除问题致三国高级专员的申请书，忽然接到英国高级专员布莱恩·罗伯逊

将军的电话通知：有紧急事宜请他于当晚赴彼得斯贝格一议。阿登纳知道罗伯逊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刚好碰过面，估计这次谈话十有八九与设备拆除有关，于是决定暂不送呈申请书，先听听罗伯逊的意见。

阿登纳与罗伯逊这次会谈是秘密的，气氛也是谅解和探讨性的。双方都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开诚布公畅所欲言。罗伯逊告诉阿登纳，英国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削减拆除项目，德国若想要“冲破紧箍圈”，就必须注意不能把设备拆除单纯作为经济问题或赔偿问题来处理，而是应将其置于西方盟国安全需要之下。“我提醒你联邦共和国必须顺应这种安全需要，放弃它目前拒绝参加军事安全委员会工作的做法，尽早向鲁尔专署派出一名成员，这对德国是有好处的。”

阿登纳感到罗伯逊的话里有话，与过去一谈设备拆除即断然拒绝大有区别，肯定是盟国将在拆除设备问题上作出松动的表示。他告诉罗伯逊，联邦政府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在他没有和联邦议院有影响的党派就此事讨论之前，他不可能发表任何声明，但是他可以向三国高级专员发出一份能够适应罗伯逊愿望的一般性内容的公函，他必须等有确信通过的把握之后才将此事送交联邦议院讨论。

罗伯逊明白阿登纳的处境，社会民主党人不久前发表了反对加入鲁尔专署的声明。他说：“总理阁下这样做，将会使我们的合作愉快。我相信联邦政府若能采取这样的立场，将使西方三国于11月9日至10日召开的巴黎外长会议上，对德问题的讨论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天11月1日，阿登纳向作为本月高级专员委员会执行主席的罗伯逊发了一份公函。内容涉及昨晚他和罗伯逊谈话的一切方面。公函中阿登纳用了如下措词：

“有关拆除设备问题在谈判中已强调指出过，拆除设备问题虽属赔偿问题，但首先乃是安全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已经反复提出了对于德国军事潜在力的质问。

德国联邦政府于此声明，它把面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安全需要看成是现实问题，并愿尽一切可能考虑这一需要。

因此，联邦政府原则上准备与所有旨在控制德国军事潜力的机构进行合作，一同工作。联邦政府知道，钢的生产能力也属安全问题范围。

联邦政府建议，立即召开一次有德国代表参加的委员会，审议安全问题和与此有关的各国之间的经济问题。它请求在该委员会提出报告以前暂停拆除设备，无论如何也得相应地放慢拆除设备的进度。

联邦政府期望该委员会能大大促进欧洲合作。”

阿登纳希望在联邦政府作出以上姿态之后，盟国能够在设备拆除问题上对德作出让步。阿登纳已看得很清楚，在西方三盟国中，美国愿意帮助德国建设，也愿意满足德国在拆除设备问题上的愿望，因为这与马歇尔计划的精神是一致的；根据罗伯逊传达的消息来看，英国也准备在这种条件下作出让步。现在最大的难处就在于促使法国改变它的对德政策。

使法国改变政策又有易有难。从易的方面讲，法国政府肯定如美英一样认识到德国重建的必要性，同时美国方面也会敦促法国政府与联盟阵线保持一致。但是，政府必须代表国家公众舆论和选民的意愿，法国政治复杂，国民议会党派林立，任何一派都难以控制议会多数，政府更叠频繁，大多数法国人对德国的恐惧心理未消，政府在对德问题上便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冒触怒公众而致内阁倒台之险。要使法国政府顺利作出政策改变的决定，必须设法从根本上消除法国公众对德国的恐惧之心。

阿登纳决定加强新闻攻势。1949年11月1日，阿登纳接见了法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两天之后，11月3日的《时代》周刊以《破冰解冻、法德谅解》为题刊载了这次谈话的全部内容。阿登纳侃侃而谈，他说：

“许许多多历史上的荆棘挡住了两国人民的视野，阻碍着双方往来的道路。但是处在欧洲今天的阶段，‘世仇夙怨’已经完全不合时宜，因此我决心要以德法关系作为我政策的一个基点。身为联邦总理，必须既是正直的德国人，也是正直的欧洲人。因为我希望做到一身二任，所以我不能不致力于德法的谅解。……和法国的友谊需要付出较大的努力，因为迄今为止这方面遇到了较为严重的阻力。和法国的友谊将成为我们政策的一个基点，因为它是我们政策中的薄弱环节……”

“我相信，可以这样说，在德国，今天对于同法国谅解的思想较之1945年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这种思想也许在刚刚崩溃以后比今天更为深入人心。最近的四年半中发生了许多足以再次造成障碍，再度引起误会的现象，但是总的趋势在德国始终没有改变。……如果法德两国互不谅解，欧洲统一是不可能的。因此，我相信，联邦政府建设性的对法政策在德国人民中可望获得良好的反应。”

阿登纳的坦率在法国引起良好反响，各大报纸竞相转载。这次讲话为今后的法德关系做了很好的铺垫。

与反对党协商也是必要的步骤。11月5日，阿登纳绕开舒马赫，选择了同社民党另一重要人物外交委员会主席、议员卡洛·施密德教授会晤。阿登纳坦诚告诉施密德他同罗伯逊将军会谈的情况，也让后者知道了联邦政府送交罗伯逊的公函，希望社民党能从民族大义出发，不要阻拦联邦政府的行动。施密德理解阿登纳的处境，表示尽管社会民主党反对向鲁尔专署派出一名成员，但是他可以设法说服社民党内成员，使社民党以它处于反对党地位的身份来满足阿登纳的愿望。

阿登纳本想在11月5日把这几天来所发生的事情先一步通报联邦议院各议会党团主席，但11月5日正逢周末，议会党团的主席们已离开了波恩。阿登纳意识到一场与议会党团的唇枪舌战在所难免。

11月7日星期一，阿登纳获悉社会民主党的舒马赫、奥伦豪尔、施密德和巴德刚刚同美国高级专员麦克洛伊举行了一次会谈。社民党人向麦克洛伊提出了一个新方案，要把奥古斯特——蒂森炼钢厂改变为股份公司，让那些

分得该厂作为赔偿份额的国家按照各自所得的资产份额作为股东入伙，组成国际财团。阿登纳还同时获悉社民党已就重建联合钢铁厂一事拟定了一项计划，估计投资额为3亿德国马克，其中外国财团出资两亿五千万马克，另五千万马克由联合钢铁厂的一些主要企业所在的城市筹集。这份计划报告一转就到阿登纳手中，他立即将联邦经济部长艾哈德和联邦财政部长舍费尔招来商议。

正商议中，部务主任布兰肯霍恩前来通报，说法国高级专员弗朗索瓦—庞赛在启程去参加巴黎外长会议前派人请他去谈了一次话。法国方面表示，阿登纳在11月1日写给罗伯逊将军的公函太一般化了，提请考虑是否有可能立即作出较为具体的说明，最好能在当晚（即11月7日）19时之前送呈法国高级专员，以便法国政府能在巴黎会议前作出相当决策。

这是法国人要改变对德政策的信号。看来阿登纳11月1日对法国《时代》周刊记者发表的谈话起了作用。阿登纳立刻根据法国政府的要求拟就了一份备忘录，请布兰肯霍恩迅速转交法国高级专员公署。备忘录全文如下：

“德法问题主要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联邦政府本着这一思想在1949年11月1日致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执行主席的公函中声明，它把面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产生的安全需要看作是现实问题，并愿尽一切可能考虑这一需要。为了既在法国人民中也在德国人民中创造彻底和持久地解决德法问题所必需的条件，联邦共和国愿意在上述1949年11月1日公函中建议组成的委员会内议论下列问题：

1. 德国同意鲁尔法规；
2. 和现有安全委员会密切合作；
3. 外国资本投资德国工厂；
4. 德国尽可能早日参加法、意和比荷卢经济联盟国家之间进一步紧密的经济联系；
5. 结束战争状态。

为了在德国人民中也创造必要的心理上的条件，在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将明显地放慢已经着手的卸除进度，并停止着手新的拆除工作……”

很显然，麦克洛伊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谈判时提出的有关外国资本投资德国各工厂的方案给了阿登纳以启发，阿登纳将此写入了第三点议论问题中。

为使美国公众，特别是杜鲁门总统了解联邦政府对“法国人的安全要求”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11月7日阿登纳又借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采访他的机会大谈了一通。他知道《巴尔的摩太阳报》是杜鲁门的必读报刊之一。他抓住了社民党提过的话头侃侃而谈，说：“法国人把德国的钢生产看成是军事潜力。我国政府以为，法国提出要求德国采取安全措施，可以通过由法国人向德国工业投资，特别是向钢厂投资来实现，投资比例可以高达百分之四十。如果法国投资的款额由美国提供，美国资本假法国之道进入德国，法国通过这一方式参加德国经济企业，我们非但不持任何异议，而且还

会异常欢迎，因为这样做只会有助于使两个民族进一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将能消除法国对安全的很大一部分忧虑。我们尊重法国的不安全感，我们也不想给已经建立的安全委员会活动制造障碍。今后联邦政府将以改善法德关系作为政策的核心。”

接着，阿登纳又把话头引向设备拆除问题。他指出德国的观点与美国一样，是希望促使欧洲统一，而目前盟国在德国进行的拆除设备计划，是促进欧洲统一的一大障碍。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出于心理上的原因，联邦德国都认为拆除工作必须停止。目前联邦政府已作出加入鲁尔专署和协调军事安全委员会工作的准备，盟国方面也应该考虑到德国人作出的努力，尽快作出停止拆除的决定。

阿登纳没有提出联邦德国参加鲁尔国防署的时间，只表示一旦条件“适宜”就参加进去。他有意让人领悟到，拆除停止之日就是他所认为的最适宜的时刻。

阿登纳反复保证德国人决心在邻国安全要求问题上自愿克制的表态，在各国得到良好的反应，法国新闻界更是大加渲染。《解放了的巴黎人报》发表社论，问“法国政府是否意识到目前时刻的严重性”，“是否意识到德国试图这样寻求谅解乃是给法国提供的机会”？左倾社会主义的《游击战士报》甚至主张法国政府理当同意停止拆除设备和允许修改占领法规。法国新闻舆论几乎以一致的口径认为阿登纳的表态有助于拆除设备问题的解决。这种有利的舆论转向使阿登纳对法国政策转变与法德和解充满了信心。

巴黎外长会议召开在即，尽管三国外长将如何讨论阿登纳提出的要求尚未明朗，但是，毫无疑问国际形势的变化将使盟国对德国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美英两国的动向基本已确定，法国参加谈判的罗伯特·舒曼是个德国通，他对法德和解历来持赞成态度，看来问题也不会太大。一周多来为了建立盟国对德的信任，阿登纳采取了一系列步骤，这样做的结果本身也包含着风险，最坏的可能是既没能促成法国方面态度的转变，又失去了德国民众的信任支持，让社会民主党钻了空子。这是一次机会，也是一次赌博。在政治生活中，有解决困难问题的形势并不是经常出现的，阿登纳决心一搏。

在这时候阿登纳所需要做的事就是耐心等待。他急切盼望着巴黎外长会议出结果。

彼得斯贝格议定书

“德国找到了一条回到欧洲各国人民大家庭的道路，而不致加剧东西方的紧张局势。”

—1949年11月25日伦敦《泰晤士报》

1949年11月9、10两日，巴黎外长会议如期召开。尽管三国对德政策的分歧仍在，但阿登纳努力的成效已卓然。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商促下，法国外长舒曼终于表示法国愿意从整个欧洲的角度来对待德国经济能力的问题，尤其在钢铁生产方面，法国不再单纯将拆除作为赔偿手段。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含糊，也过于圆滑，但这毕竟表明法国人已经感受到阿登纳与德国联邦政府发出的求和信号。

三国外长还在巴黎会议上拟定了一个关于德国问题的纲要，这份纲要经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传达给了阿登纳。纲要表明，三外长在限制拆除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三国确定了一个限制拆除的范围。放宽了对联邦德国造船业的限制，允许它从现在起可以按规定数量制造远洋船只，使德国可以发挥过去造船业的优势，在航速和吨位上能同其他国家远洋船竞争。此外，三国还准许联邦德国通过总理领导下的领事处来开始筹组德国外交部的工作，允许其在外国建立领事馆和经济代表机构，这对德国对外贸易的恢复也有重要意义。阿登纳大为兴奋。

为期两天的外长会议结束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1月11日直飞法兰克福，住进巴特霍姆堡的美国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的寓所里，准备访问波恩，与阿登纳会谈。

13日，艾奇逊乘坐麦克洛伊的柴油火车沿莱茵河来到波恩，在他按外交礼仪向联邦共和国的新总统奥尔多特·豪斯致敬后，在绍姆堡宫与阿登纳总理举行下会谈。

这是艾奇逊与阿登纳的第一次会面，两人谈得很是投机，彼此留下良好的印象。

前一天在麦克洛伊的寓所里，美国的高级专员便对他的这

位做联邦总理的亲戚作了高度赞扬，第二天会见印证了麦克洛伊的话。尽管艾奇逊和他的随员们感到阿登纳不苟言笑，但他们却同时认为这位看似迟钝的老人亲切而精明。艾奇逊说，阿登纳“观察问题的想象力和智慧给我以深刻的印象”。阿登纳的言语不多，却是一针见血，再加上他大家长的威严，令所有人为之心折。这是阿登纳与艾奇逊亲密友谊的开始，也是他与美国政府愉快合作的开始。

阿登纳明白身为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是杜鲁门总统决策班子里的重要人物，联邦德国对他“仰仗”甚多，所以对谈话作了充分准备。他竭力向艾奇逊阐述当前德国人的心理状态，详细讲述德国的难民、失业以及经济垂危等诸多问题，希望他理解联邦政府提出的修改拆除项目单的要求。

美国人对德国人的处境很同情，但这却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无关，艾奇逊告诉阿登纳，美国的战略利益在欧洲，所以美国政府关心西欧问题，联邦德国问题只有和整个欧洲问题联系在一起，美国才能施以援手。艾奇逊表示，美国的公众舆论虽然愿意向欧洲，特别是向德国提供经济和政治援助，但是

阿登纳的第二位妻子古丝是约翰·麦克洛伊妻子的表妹。

联邦政府必须防止德国政党抨击各占领国，防止由此而产生的德国政府机关和高级专员们之间的合作出现紧张局面。

阿登纳说，联邦德国完全理解美国人的政策做法，他的政府的目标就是使德国融入欧洲，并要尽力协调与占领国政策之间的分歧。联邦政府全力拥护美国人支持欧洲复兴和欧洲联合的做法。为了使德国在美国领导下的欧洲中再生，联邦政府愿意致力于与法国政府的和解，以增强欧洲联合的力量。两个人很快就在使德国融入西欧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语言。

阿登纳为艾奇逊一行准备了盛大的午宴。出席宴会的有艾奇逊、高级专员们、联邦政府全体内阁成员和联邦议院议长。这是自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位外国外长的首次来访，来访者又是主要占领国美国的国务卿，联邦政府更予高度重视。作为主人的阿登纳在席间熟练而亲切地与客人交谈，他对各种酒的熟悉程度和品味能力令在场的所有人感到惊讶。酒过三巡，政治问题成为讨论热点。人们都知道在鲁尔问题上舒马赫和社会民主党反对阿登纳的做法，英国的柯克帕特里克爵士问阿登纳是怎样看待社民党和舒马赫的观点的，阿登纳露出狡黠之笑，说：“哦，是这样的，上帝犯了一个大错误，他限制了人的智力却没有限制人的愚蠢。”

艾奇逊很快感受到阿登纳所谓的舒马赫的“愚蠢”：双方初次见面艾奇逊便对这位残疾了的二战反纳粹英雄失去了好感。他既不赞同舒马赫的政治观点，也不喜欢他的尖刻。两人相互问候致意未毕，舒马赫就开始猛烈攻击阿登纳同占领当局的合作，大力宣扬德国应该采取是在东西方之间保持中立的政策，撤走德国土地上一切外国军队，从而取得苏联同意，重新统一德国。

艾奇逊很恼火，出于对反纳粹英雄的尊敬，他委婉告诉舒马赫：俄国人5月在巴黎外长会议上的态度很难使人相信这样的政策会取得积极成果。舒马赫眉头一扬，转而把攻击矛头指向美国，指责美国企图分裂德国。

艾奇逊火了，正告舒马赫：“舒马赫先生，如果您和贵党想以中伤占领当局的办法来讨好德国选民的话，那就错了，那将只会招致打击；如果你以为占领当局会容忍有人在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以从中渔利的话，那更是错上加错。我奉劝您不要这样想。”

会谈自是不欢而散，舒马赫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直率暴躁的性格与阿登纳的现实沉着形成了鲜明对照，直到很久以后艾奇逊仍然认为，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初显得越来越不得人心，完全是由于该党领导人舒马赫的误导和偏见所至。

艾奇逊是闻所欲闻而来，见所欲见而去，他对美国政府今后的对德决策起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巴黎会议只是确定了对德政策改变的基本精神，而具体问题则需德国与盟国双方谈判协商解决。

11月15、17和22日，阿登纳和彼得斯贝格的高级官员们就巴黎纲要和阿登纳11月1日致罗伯逊的公函进行了三次讨论。讨论会上，英国专员罗伯逊提出，盟国在以下几个方面无论如何必须保持不变，希望德国方面予以合作。这些方面是：军事生产工业、非卡特化措施、在赔偿和拆除方面已采取的各项措施。

美国专员麦克洛伊告诉阿登纳：盟国给德国作出的让步要求德国方面准备进行合作，德国政府今后的态度将影响盟国在巴黎纲要范围内让步的快慢，以及盟国对修改占领法规的态度。

阿登纳明白，盟国进行讨论的目的虽然不是要增加德国的经济潜力，但却意味着目前的状况不会永远固定不变，德国工业力量的恢复与提高，将取决于盟国对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的考虑，如此一来，联邦政府对盟国的态度十分重要。换言之，战后最初几年盟国所制订的这些规定、条约和法规——包括鲁尔法规、占领法规，都是过渡性的处理方法，关键在于其本身是否包含继续发展的前景以及什么样的前景。如果联邦政府明白了这一点，争取将这些限制性的法规、条款作为德国重新获得平等地位道路上的某种手段，再根据形势发展，慢慢化解消除其中不利因素，那么联邦德国可望由此得到盟国的支持与帮助，实现稳固和发展国家的基本目标。

想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有关加入欧洲委员会的问题，便使阿登纳政府伤透了脑筋。

欧洲委员会组织的建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 1947 年以前，人们还不考虑建立一个西欧民族联盟的问题，因为害怕这样做会引起苏联的不安，损害世界集体安全。但是随着美苏之间关系恶化，美国日益倾向于支持欧洲联合运动。为求发展，1948 年 5 月 7 日到 10 日，来自欧洲不同国家倡导欧洲联合的代表们在海牙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表达了要建立欧洲联盟的愿望。几经周折，1949 年 1 月 22 日，各国外交部长们决定根据海牙大会的精神建立一个“欧洲委员会”。欧洲委员会表示将对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 17 个参加国开放，美国大力支持。1949 年 5 月 5 日，各国签署了欧洲委员会的正式章程。第一批参加国有 10 个，常设机构“部长委员会”和“欧洲咨询议会”设在施特拉斯堡。8 月 9 日，欧洲委员会向西德和萨尔同时发出了参加邀请。

加入欧洲委员会引出了萨尔地区归属的原则性问题，联邦政府希望萨尔加入后在欧洲咨询议会中的议席包括在德国代表团的 18 个席位里，显示萨尔主权属于德国，而法国正谋求使萨尔脱离德国，因而支持萨尔自治政府，坚持萨尔应作为一个地区与德国平等加入。

这对于法德双方来说都是个头疼的问题，无论哪方在这个问题上让步都有可能给各自政府造成很大冲击。阿登纳不想贸然行事，他专程拜望了法国专员弗朗索瓦—庞赛，想探一探法国动向。

法国高级专员弗朗索瓦—庞赛告诉阿登纳，法国外长将于 11 月 22 日向法国国民议会宣布法国政府今后的对德政策，接着议会进行辩论，就政府对德政策作出表决。考虑到在彼得斯贝格谈判之后的联邦议会辩论中，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对政府政策诸问攻击，阿登纳向弗朗索瓦—庞赛建议，为了使得其它的议项能够顺利通过，可否暂时不提欧洲委员会问题，而等到法国议会辩论之后再行讨论。

法国专员未置可否，但当阿登纳将此事提到彼得斯贝格会议上讨论时，却得到罗伯逊的赞成，他认为等各国议会辩论结束后，联邦德国再提出加入斯特拉斯堡委员会的做法比较妥当。麦克洛伊也表示，当时三国外长在巴黎会议讨论过这一问题，各国都认为德国加入欧洲委员会是将德国完全纳入欧洲的关键，三国外长的声明中表示欢迎德国参加欧洲委员会，并没有涉及萨尔地区加入欧洲委员会的问题，所以说阿登纳要求并不算过分。

弗朗索瓦—庞赛明白英美不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完全支持法国的立场，

只好表示：如果阿登纳总理不愿现在谈欧洲委员会的问题，他并不持任何异议。但到 11 月 22 日法国议会讨论这一问题时，萨尔问题将占重要地位，讨论的结果也许会对联邦德国不利。法国政府为了确保在议会辩论中处于有利地位，曾要求他在这次彼得斯贝格讨论中，必须明确联邦政府对于德国参加鲁尔专署和对军事安全委员会的态度。

这一点阿登纳已与联邦各部达成共识，他当即表示，联邦政府完全赞成同安全委员会的合作，但在鲁尔法规中有些条款有必要事先澄清。比如其中第 31 条规定，如果德国联邦政府加入了鲁尔专署，它就必须服从多数的决议。阿登纳担心这是一个针对德国的陷阱。罗伯逊解释道，鲁尔专署成立的目的是要执行德国经济非卡特尔化的占领政策，如果联邦政府在这方面予以合作，鲁尔专署的其它国家不会为刁难德国设置障碍的。阿登纳要求盟国以声明的形式对此作出说明，高级专员们同意了。

在确定一切清楚之后，阿登纳也作出声明：联邦政府准备顺应盟国的愿望，并已经在准备一项非卡特尔化的专门法令。同时，联邦德国也同意派员参加鲁尔国际署的工作。

阿登纳拐了一个弯，他绕开了法德关于萨尔如何加入欧洲委员会的分歧，也满足了弗朗索瓦—庞赛和罗伯逊的要求，答应以联邦政府的名义发表一份有关鲁尔法规、安全委员会和非卡特尔化的声明，支持盟国的安排。

解决了欧洲委员会问题，阿登纳又把进攻重点放到设备拆除问题上，他重申了 11 月 1 日写给执行主席罗伯逊的公函内容，请求高级专员们回答关于拆除工作的两个问题：1. 放慢拆除进度将涉及哪些工厂；2. 如何解释“放慢进度”。

罗伯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表示这个问题要从现实来考虑，从目前的情况看，已经开始拆除的企业，无法恢复原状，造船业和机器工业的拆除已接近尾声，列入赔偿项目单的设备已分配就绪，不久即将起运，因而拆除进度放慢所涉及的工厂主要在合成工业和橡胶工业。具体来说，从拆除设备的项目单上删去 6 个工厂，即：格尔森贝格石油厂、许尔斯化工厂、汉博恩奥古斯特—蒂森炼钢厂、哈廷根鲁尔钢厂、夏洛特钢厂以及柏林博尔西格厂。放慢拆除进度是指多数工厂在谈判期间不作大动，使其不足以影响谈判的最后结果。“不过，考虑到法国议会的情绪”，罗伯逊增加了一句，“不应把这些措施当成是最后的决定。”

这已经是盟国迄今为止在设备拆除停减问题上作出的最大让步了，阿登纳甚感欣慰。为了即将举行的联邦议会辩论，阿登纳必须在事先把所有问题澄清。他必须考虑到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在盟国方面争取更多的宽限，再是争取得到德国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谅解。必须保证对两方面都有所支持，才能实现他的设想目标。盟国方面对拆除的放宽显然会有利于联邦政府的政策辩论。

果不其然，11 月 15 日下午的联邦议院辩论中社会民主党抓住鲁尔问题又大作文章，攻击重点是鲁尔法规的第 31 条。阿登纳把这个问题带到了 11 月 17 日在彼得斯贝格与三国高级专员的又一次会谈之中。阿登纳在取得鲁尔法规第 31 条关于盟国保留“处置办法”一句的满意解释之后，进一步问道：从这一点出发，可否认为鲁尔法规有可能在将来作出某些更改，联邦政府可否以此对德国参加鲁尔法规作出某些解释说明？

罗伯逊回答道：“鲁尔法规是否有可能在将来作出某些更改，这个问题

完全要由那时候的各国政府来作出回答。我必须十分坦率地告诉您，我不知道我国政府对此问题将抱什么态度。不过，要在今天和 11 月 22 日这段时间内使各国政府就此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恐怕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您希望向您的议会声明，您认为鲁尔法规的某些地方有修改的必要，并且您将提出修改这些地方的恳求，那么您得自己拿定主意是否愿意这样做。我们对此不会提出什么意见来。”对此，弗朗索瓦—庞赛也表示赞同。

阿登纳笑了，他相信一旦加入鲁尔专署，与各国在鲁尔专署中合作共事，自然而然就会发现法规的某些条款纯属多余。就这一点他已有了在议会最后辩论中取胜的绝对把握。

11 月 22 日，在法国国民议会举行对德政策辩论的同一天，阿登纳同彼得斯贝格的高级专员们进行了第三轮的磋商。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将过去会谈的结果以条文公报形式确定下来。会议开了 11 个多小时，双方就公报和议定书的措辞进行了反复商谈。对阿登纳来说，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他发挥了年轻时做律师事务所助理练就的与人交道的才能，尽可能设法要求盟国排除掉可能受到社会民主党人最激烈攻击的部分。最艰难的是草拟有关联邦共和国参加鲁尔专署一节的措辞。这一点之所以特别棘手，不仅是因为鲁尔问题本身的敏感性，而且还因为 1948 年 12 月鲁尔法规公布之时，他作为英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时曾对它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反对态度。阿登纳希望在彼得斯贝格议定书公报中对此问题特别作出说明，以保持立场的一致性，但三国高级专员反对这种做法，强调不允许联邦政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参加鲁尔专署。经过反复谈判，盟国方面同意阿登纳在联邦议院说明中讲出他希望讲的话。

最令阿登纳感到满意的是经过几次的商谈，高级专员们同意确定从拆除设备项目单上删去的工厂由原来的 6 个增加到 12 个，这等于使联邦政府 80% 的要求得到了实现。当然，德国提出的所有愿望和申请并没有完全实现，比如阿登纳提议建立一个有德国参加的西欧国家钢铁生产的统一机构，以审查这些国家钢的生产和需要，以及让外国资本参加德国的工业投资筹建议，盟国便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未予讨论。但毫无疑问，在彼得斯贝格山形成了联邦德国与盟国就德国发展问题进行讨论与合作的良好开端。

历次磋商的结果以条文公报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彼得斯贝格议定书反复强调了会谈双方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并指出双方在彼得斯贝格商谈的首要目标是使联邦共和国作为热爱和平的成员加入欧洲大家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通过联邦共和国参加一切有关国际组织，并通过同其它各国发展贸易和建立领事关系，有力促进德国同西欧各国在各方面合作。“三国高级专员和联邦总理都认为，在这条道路上的进步，必须以有利于重新恢复西欧的真正安全感为基础，这是他们努力的首要目标。对此，观点和意图广泛的一致坚定了他们的这一信念。”

彼得斯贝格议定书共列 10 点。这 10 点内容涉及同意德国参加所有国际组织、同意联邦政府同外国建立领事和贸易关系等等，它的签定对刚刚成立两个月的联邦德国来说意义重大。它不仅为德国的恢复与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而且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阿登纳情不自禁地称这“是政治上具有的一个伟大成果。战败以来，第一次正式承认了我们的平等地位，使我们第一次又重新踏入国际范围中了。”

但是，也应看到彼得斯贝格议定书的另一面：西德踏入国际社会与残留

的歧视性待遇是并存的。造成这种矛盾特征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对德政策的两重性：一方面冷战全球战略要求扶持西德、另一方面盟国又担心德国重新崛起会危及和平。阿登纳需要联邦议院通过议定书，他必须设法使作为国民代表的议员们对形势和他签定这个矛盾性的议定书有充分理解。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愿意轻易接受如此受歧视的命运，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它的议员们可不把彼得斯贝格议定书看作是打开联邦德国外交僵局的杰作，一场激烈的议会大辩论是避免不了的。

阿登纳只有在 24、25 日的联邦议院的辩论中获胜，才能取得联邦德国踏入国际社会的这第一张宝牌。

“盟国的总理”

“你们说，到底谁是战败国？”

——阿登纳在联邦议院发言记录

彼得斯贝格议定书的发表日期原定是11月22日，考虑到德、法两国议会辩论，阿登纳将日期推迟到了11月24日，即推迟到美、英、法三国发表政府声明之后。11月24日这一天，彼得斯贝格议定书的全文在华盛顿、伦敦、巴黎、波恩同时发表。

果不出阿登纳所料，议定书一发表，社会民主党立即强烈表示反对，扬言决不让阿登纳出卖德国人民的阴谋得逞。当天下午联邦议会进行了激烈辩论。

这是一次精彩的德国式的政治辩论。执政党与反对派分两边坐定。右边是执政党，左边是社民党，在联邦议长克勒博士的摇铃声中，辩论开始了。

社民党先发制人，辩论一开始即把论题引至焦点——彼得斯贝格议定书，谴责阿登纳“没有通过联邦议院就作出通过彼得斯贝格议定书的决定”。

极富煽动性的阿恩特博士作为社民党代表首先发难，他一针见血指出：签订彼得斯贝格议定书是作为联邦总理的阿登纳企图排斥议会，“采用极权主义的突然袭击以赢得宪法斗争”的冒险行径；阿登纳无权“把议会一脚踢开”，在议定书上签字，也无权让联邦共和国承担加入鲁尔国际专署，无权让联邦共和国承担加入欧洲委员会的义务。

此言一出，群情激动，社会民主党议员们一片附和之声，阿登纳不慌不忙，婉言陈述道：“请允许我对自己的做法作出说明。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的联邦议院还是一个很年轻的议会，它的许多成员对于议会的责权并不十分清楚，他们往往去干预与他们无关的行政方面的事务，而我们以为，联邦政府应该严加注意，务使行政和立法保持分立。这一点特别应适用于所有涉及同高级专员委员会或各盟国关系的事务。占有议会多数的执政的联合党派有理由郑重声明：彼得斯贝格议定书不属联邦议院的管辖权限，并且也无需提请联邦议院作出决定。我提请各位议员们注意一点——彼得斯贝格议定书不用由法国国民议会，也不用由英国下院或美国国会加以批准。”

阿恩特略加迟疑，继续发动攻击，提出他第二个方面的理由，转而陈述西方盟国的对德政策：

“我们所更为担心的是，这份议定书中所反映的西方盟国在彼得斯贝格执行的政策。西方盟国不是在执行一种欧洲政策，而是在追求一种利益政策，这种政策的趋势是，宁愿支持阿登纳极权主义政权，而不肯让一个民主政权取而代之……今天在这里所要辩论和投票表决的，无非是检验一下，看看基本法是不是只是一张废纸，看看多数人是否还能像过去在这所堂堂的议会厅中屡见不鲜的那样一意孤行，或者是这一回基本法能够受到尊重。”

社民党议员欢呼：说得对呀！

阿恩特受到鼓舞，用力挥动手臂，情绪激昂地大声说：

“我们曾经以为走上了通向议会民主的道路，现在却发现我们是处在没有宪法的专制道路上。——女士们、先生们，我担心你们就会没有什么兴致再笑了。”

社民党的议席中发出了骚动声和喝彩声：“说得对极了！”

阿恩特双眼发出灼人的光芒，把脸转向脸色阴沉的阿登纳，指责说：“诸位可以相信，我们要把这样黑暗的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诸位肯定会相信，我们没有忘记，联邦总理先生，在这里就职时是向基本法宣过誓的。苍天在上，联邦总理先生，我们自会有办法叫您回忆起您的誓词来的！”

“说得对！”“联邦总理阿登纳先生回答问题！”阿恩特的发言得到了社民党和共产党议员的热烈支持。之后，社民党议员舍费尔及共产党议员代表先后发言，支持阿恩特观点。

就在社民党和共产党议员指责阿登纳政策的同时，阿登纳收到了一系列电报，这些电报打自刚从拆除设备项目单上删去的那些工厂职工，纷纷表示拥护阿登纳所采取的做法。信心十足的阿登纳起而为自己辩解：

“现在我的确禁不住要把我刚刚收到的一份电报告诉诸位女士和先生。诸位将从这份电报中看到，感谢上帝，幸好在德国还有和反对党代表想法不同的强大而有影响的组织。我刚刚收到的下述电报来自杜塞尔多夫，而且是德国工会联合会对于德国与盟国议定书的表态。诸位请听！”阿登纳随手举起一份电报，挥舞了两下，念道：“从刚才发表的德国——盟国议定书中可以看出，盟国对于满足德国的要求方面作出了真正的努力。”

执政党派议员齐声大叫：“听吧！”“听吧！”

德国社民党议员叫道：“这说明什么呢？”“太空洞！”舒马赫博士不屑一顾地责问：“还有吗？请继续阅读！”

阿登纳停顿了一会儿，等会场安静下来后，又大声读道：

“一系列的问题可惜依然存在。因此，一切有关部门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使那些继续受拆除设备威胁的劳动人民消除他们为生存而担心的忧虑。”

坐在右侧议席的执政党议员喊道：“说得一点都不错！”

舒马赫反问：“还有呢？”

阿登纳道：“别着急！现在，主要的东西来了。”提高了嗓门：

“尽管德国——盟国协定不是在所有方面都令人满意，但是工会认为联邦政府参加鲁尔国际专署是对的。”

右侧和中间议席上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舒马赫高喊：“这实在谈不上对在哪里！”会场出现骚动。

阿登纳清清喉咙，一句一顿地大声说：“我要把这一句再给诸位朗读一遍。诸位请听，尽管德国——盟国议定书不是在所有方面都令人满意，但是工会认为联邦政府参加鲁尔国际专署是对的。这首先是因为，看来对于鲁尔法规第31条的忧虑已经成为多余的了。随着联邦政府的参加，工会希望欧洲的重工业也将纳入鲁尔专署的活动范围。”

在社民党议员的诧异声中，阿登纳神色得意地停止了发言。会场上，右侧和中间议席的议员们用力鼓起掌来。

社会民主党乱了阵脚，舒马赫问：“电报是谁签发的？”

左边反对党立即叫喊：“是‘阿登纳’签发的嘛！”

舒马赫大声道：“这肯定不是电报的原话！你们明天会看到答复的！”

坐在右侧议席的议员维尔梅林博士喝问：“看啊，德国社会民主党难道要对工会专政吗？”

会场骚动起来。

议长克勒博士摇铃，待会场平静下来，他说：“这份电报是合众社发自杜塞尔多夫的报道。”

坐在左侧议席的反对党议员又是一片哄笑声，纷纷叫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是委托的！”“是阿登纳委托的！”“这哪里是什么电报！”“这是一条新闻社的报道！”

会场再度骚动。叫喊声响成一片。

议长克勒博士摇铃。

议员舒马赫指着阿登纳责问：“您明明讲过，您收到的是工会的电报呀！”

阿登纳辩驳：“我把电报一字一句地念过了。”

反对党议员叫喊。骚动。

克勒议长摇铃，大声说：“诸位请安静！”“诸位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待会场静下来，议长说：“我可以确证这一点：根据我的回忆，联邦总理先生说的是：他收到了一份电报。至于是谁发来的，他没有说。我请诸位先生让联邦总理先生继续讲话。”

阿登纳补充说：“女士们和先生们！我再一次讲清楚，这份电报是合众社普遍散发的。”

舒马赫立即发问：“还有呢？已经散发过不知多少伪造的东西了！”

阿登纳回敬道：“我请舒马赫先生不要问我，还是去问问伯克勒尔博士先生吧！（注：伯克勒尔博士系德国工会联合会领导人）

倔犟的舒马赫穷追不舍：“不，合众社的这份报道客观上和主观上都是不正确的！”

执政党议员故意发出哄笑声，以示抗议。支持阿登纳的议员们大举反击。维尔梅林叫道：“您从哪里知道的呢？您监视工会了吗？”不等舒马赫回答，右侧议席响起议员施特劳斯的冷冰冰的叫声：“这一下真正思想露底了！”

骚动一片。议长摇铃不止。

这次辩论从晚上 21 点 30 分开始，一直持续到午夜过后。有人提议过若干小时后再进一步辩论彼得斯贝格议定书。但多数议员反对，讨论又继续进行。

德国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的新闻报道一直被认为是个疑团。为了证实报道的真实性，阿登纳让人立刻向工会联合会主席伯克勒尔博士办公室询问此事。一名叫克莱茵的办公室女秘书证实阿登纳在辩论中宣读的文句，是与德国工会联合会作为公报用电话发给新闻界的内容相同的。

11 月 25 日凌晨 3 点，已持续了五个多小时的辩论高潮再起。

阿登纳再次发言，抛出了德国工会联合理事会提供的证明：

“女士们、先生们，作为一个反对党，它的职责并不是事事都要拿相反的观点去看待。”

执政党议员喝彩：“说得对！”

阿登纳强调说：“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叫喊：“我们也认为是错误的！”

阿登纳接着说：“再说，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大厅里的所有的人，在任何一个部门从事政治或公共事业的人，几年以来为了停止拆除设备都曾花过心血。”

执政党议员齐声大喊：“一点不假！”

阿登纳一字一板地大声宣布：“这一点我可以替我自己断言，替我的党断言，替联邦政府声明。”

议员凯泽及时插话道：“而且替全国人民声明！”

阿登纳乘会场安静之机，连珠炮般地说将起来：“大家共同付出了最大的精力，利用了一切可能的条件，以求实现停止拆除设备。”

“但是，现在请允许我回溯一下上次会议我在这个大厅里讲过的话，当我们与联邦议院议会党团共同准备提出一项新的重大申请时，10月31日，却听到了英国最有影响的人士对我们说：‘算了，这样没有什么用，所有这些申请都会被拒绝的。’”

“随后，人家对我说：‘您只有从安全需要的角度来考虑整个问题，才能得到一些东西；为了顺应西方盟国的这种安全需要，您必须声明准备与军事安全委员会合作，准备向鲁尔专署派一名代表代替一名观察员。’”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懂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发言人设想的景象究竟为什么总蒙着一层烟雾。无论如何，设立鲁尔专署的事，根本就不是由我们——联邦政府——或由你们来同意的呀！”

执政党议员大声喝彩：“说得完全对！”

阿登纳提高嗓门，大声说道：“先生们知道得很清楚，鲁尔专署已经设立了，鲁尔法规也先于占领法规已经存在。秘书处已经设立了，而且机构人员远远超过一百以上。所有这些，你们可都是完全知道的呀！你们像大厅里的每一位先生一样完全知道，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派出一名代表去投德国的三票呢？还是我们应该干脆让整个拆除设备的工作进行到底！”

执政党派议员喊叫：“讲得好！”

社民党议员叫喊，“不对”！

骚动。叫喊声响成一片。

阿登纳将脸转向左侧，继续说道：“问题就在这里！女士们、先生们，我肯定——根据奥伦豪尔同事先生上次的讲话，我不得不遗憾地肯定这一点——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准备宁可让整个拆除设备的工作进行到底！”

执政党派议员齐声大叫：“讲得好！”“听吧！”“听吧！”纷纷热烈鼓掌，为阿登纳鼓励。

议席左侧响起社民党议员叫喊声：“真是闻所未闻！”

右侧执政党议员对喊：“你们的英国朋友不灵了！”

左侧回击：“没有政治头脑！”

阿登纳继续提高声音，说道：“对于这个问题，反对党必须表态——”

执政党议员热烈鼓掌，左侧一片嘘声。

阿登纳强调说：“——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不是任何别的问题——反对党是准备向鲁尔专署派遣一名代表呢？还是不肯派遣？如果他们声明不派——那么，根据罗伯逊将军向我发表的声明，拆除设备的工作就要进行到底，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

舒马赫猛然叫道：“说得完全不对！！”

执政党议员喊：“听着！”“听着！”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议员继续激动地叫喊。议长克勒博士摇铃，要求全场安静。

舒马赫唰地站起来，用手指着阿登纳吼叫道：“你扯谎！……你是彻头彻尾的盟国的总理！”

中间和右侧议席上发出暴风雨般的抗议声。执政党派的议员们大声起哄，桌子被叩得乒乓作响。社民党议员和基民盟——基社盟的议员们都从座位上立起，吵成一团。议长摇铃不止，铃声淹没在吵嚷声、叩桌声中。

议长克勒博士大叫：“议员舒马赫博士先生！”

两边起哄不停，大厅里的吵嚷声、口哨声响成一片。坐在右侧和中间议席上的议员怒吼：“没有听说过！”“滚出去！滚出去！”……

议长克勒博士不停地摇铃：“议员舒马赫博士先生！您把联邦总理先生称为‘盟国的联邦总理’，我要您遵守纪律！”

这时，社民党的议员们都站起来攻击阿登纳与盟国达成的协议。双方激动的叫喊声持续不断，夹杂着人身攻击的恶毒咒骂声浪震动着会议大厅。这时，阿登纳再也按捺不住了，冲着反对派愤怒地吼道：

“你们说，到底谁是战败国？！”

阿登纳这一刺痛人心的喊声使人们想起了冷酷的现实，吵嚷声忽然中止，大厅里一片沉默。一脸怒色的阿登纳遂离开了讲台。

议员厄勒斯博士道：“议长先生，我提议立即召开元老委员会，并要求表决。”

议员施特劳斯道：“他们现在非赔礼道歉不可，否则我们退出议会！”

骚动又起，议长不得不摇铃制止：

“女士们、先生们，我请诸位静一静。让我们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

议员们停止吵嚷，议长说：

“鉴于议员舒马赫博士先生使用这一称呼所造成的严重局面，有人向我提议会议暂停，并立即召开元老委员会。”议会大厅里气氛紧张，议长说：“我确认多数同意会议暂停。现在我宣布会议暂停，并立即召开元老委员会。”

执政党派议员热烈鼓掌欢迎。联邦议院的记录员作了如下记录：11月25日，星期五，3时21分，会议暂停。

6时刚过，议长克勒博士宣布复会。克勒博士宣布了元老委员会的裁决：

“关于议员舒马赫博士先生使用‘盟国的总理’字眼插话叫喊，元老委员会讨论之后认为这是对联邦总理先生施加的严重侮辱——这也是对联邦议院和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侮辱。因为联邦总理是国家的形象。舒马赫博士先生应正式公开收回对联邦总理施加的严重侮辱。大多数议员认为：舒马赫博士先生此次对联邦总理先生此次插话的叫喊，事实上违反了第91款议事规程，即粗暴地破坏了纪律。我感到遗憾的是，劝说舒马赫博士先生收回插话叫喊的努力没有起到作用。”

说到这里，克勒议长目光扫过会议大厅，宣布：

“现在，我当着联邦总理先生的面——和当着议会的面，使用我执行第91款议事规程的权力和义务——由于粗暴破坏纪律行为，剥夺议员舒马赫博士先生参加联邦议院讨论的权利，时间为20个会议日。”

起初，社会民主党对议长克勒裁决的反应是宣布该党全体议员在这20个活动日期间拒绝参加联邦议院的任何活动。但舒马赫说服党员放弃了这种

盲目行动。这次议会辩论结束后几天，舒马赫以书面方式向阿登纳作了赔礼道歉。

有鉴于此，11月25日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大型记者招待会。罗伯逊执行主席发表了一个声明，强调：德国不能把1949年11月24日公布的彼得斯贝格议定书当成是德国可以借势进一步再提出要求的起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议定书将永久固定盟国与德国的关系。议定书的有效期限至1950年秋季为止，然后，盟国将酌情修改占领法规。针对记者有关盟国进一步作出让步的可能性的提问，罗伯逊回答：“这一点在目前不会考虑。因为谈判业已结束。但是，盟国的宗旨是，为了提高新政府的声望和权威，必须使德国重新加入世界大家庭，必须消除占领国和德国人民之间的摩擦。”

阿登纳得到了盟国强有力的支持。反对党对彼得斯贝格议定书是“盟国高级专员们制造出来的工具”、是“西方对俄国在东德占领区建立独裁政权行为的报复”之类的指控再也站不住脚。失去了舒马赫，社民党在议会辩论中失掉了轴心。反对党终于偃旗息鼓，执政党在议会辩论中大获全胜。

彼得斯贝格议定书的签订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1949年11月25日伦敦《泰晤士报》对此的评论报道极为中肯，也极为精辟。该报评论道：

“虽然阿登纳博士作出了许多明智和有远见的让步，但是，如果以为德国做了一桩蚀本买卖，那就完全错误。尽管德国还没有得到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显然获得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盟国不得不与之谈判，并且再也无法对它发号施令了……而比这更重要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德国找到了一条回到欧洲各国人民大家庭的道路而不致加剧东西方的紧张局势。一纸仅仅由英、法、美三国发表的关于它们无意重新武装德国的声明，是不会使苏联和波兰相信这种诚恳和坦白的意向的。一项由联邦政府发表的这种声明，却能具有大得多的分量和说服力。”

彼得斯贝格议定书签定后的事实是，阿登纳在12月份以及随后的1950年内举行的彼得斯贝格谈判中，一步一步又争取到了更多的让步。按照阿登纳自己的说法——“紧箍圈被冲破了”。

第四章 欧洲联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留下的混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如果我们欧洲人不想在起了根本变化的世界里走下陡路的话，我们就必须从起了变化的形势中作出必要的结论：欧洲的联合是绝对迫切需要的。”

“德国的道路必须通向欧洲！”

——《阿登纳回忆录》（三）

欧 洲

——站在十字路口

“我们大家必须同过去的恐惧决裂，面向未来。我们简直不能让过去那些由于非正义引起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在未来岁月中继续附在我们的身上，难道这是人类无法学会的唯一的歷史教训吗？让我们信赖正义、同情和自由吧！……”

——1946年9月19日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在苏黎世大学的演说

早在战争时期，与权力隔绝的阿登纳就已开始思考战争之后德国的发展问题了。

一次战后，从维护欧洲未来和平，防止战争再次爆发的角度，阿登纳就曾与法国的白里安等人一起倡导过欧洲联合运动。白里安倡议欧洲各国建立联邦式的、对各国主权尊重的欧洲联合会，阿登纳则从“平行发展的步调一致的经济利益，是——而且永远是——各国人民之间最良好政治关系的最健全和最持久的基础”出发，认为将法、英、德的工业有机地一体化，可以保障持久的和平。可惜这些建议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强烈反响，法国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立即看出联邦式的联系与维护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询问联合者们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英国人的反应也是不肯定的，著名的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婉转讲出英国不愿加入的立场，他说“即使没有大英帝国和俄国，欧洲的群众一旦团结起来，一旦组成联邦或部分组成联邦，一旦觉悟到他们都属于一个共同的欧洲大陆，也会成为一个无可比拟的组织。至于英国，我们和欧洲站在一起，但不属于欧洲；我们和欧洲连在一起，但不包括在内。”

两次大战期间关于欧洲联合的倡议完全失败了。但纳粹期间在野的阿登纳不无痛心地看着德意志民族屈服于好战的民族主义和专制暴君所招致的灾难，省察往事，开始越来越强烈地寄望于在欧洲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他设想在这种新的秩序中，自由和基督原则将居于首位，而民族权势与特性将退居其次。尽管这在当时只是一位觉醒者的臆想，可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欧洲国家所处的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感受到了这一点。阿登纳心目中理想的欧洲政治秩序成了战后欧洲各国政治家们关心的一

个重要课题。

这其中根本原因是：战后的欧洲也像德国一样，再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资本了。1945年5月对德战争的胜利虽然使得被希特勒德国侵略的欧洲各国恢复了独立，但欧洲难以重温昔日世界舞台中心的美梦。从战争恶梦中醒来的欧洲国家不由自主地被拖入一个新的力量体系：虽然这儿还是世界舞台的重心，却不由它们所主宰；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要作用，无非是在强加于他们的环境中去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独立，去适应战争打出来的两个超级大国——美苏在控制欧洲问题上的协议和冲突所形成的两极局势。新的权力天平上只剩下了美苏两国，大多数欧洲国家变得无足轻重。徘徊于战争废墟中的欧洲国家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欧洲联合与合作的必要性便成为它们的共识。舆论界的民族主义倾向较之过去大为削弱。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欧洲联合的思想成为其重建并维持相互间和平的唯一保证。稍后，随着斯大林欧洲政策日益显示出咄咄逼人的压力，更加强了西欧国家联合与合作的决心。防御共产主义、抵制苏联压力成了联合与合作的又一目标。美国也把这一点作为它向欧洲国家提供援助的重要条件。所以西欧联合的趋势便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进一步增强。对欧洲国家来说，美苏冷战把德国一分为二，同时也把欧洲一分为二。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决心主动采取必要行动并开始进行合作。

阿登纳再次站到了欧洲联合运动的前列。战争一结束，他就呼吁欧洲各国抛弃前嫌，真诚合作，共同建立欧洲新秩序——欧洲联邦。

但是作为战败国的政治家，阿登纳的呼声是微不足道的。战后支持欧洲统一强有力的宣传运动是作为英国保守党反对派领袖的丘吉尔发起的。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在苏黎世发表了一次反响极大的讲演，以其崇高的威望鼓舞了欧洲人的信心。他说：“如果所有欧洲国家能联合起来，它们的三、四亿居民就会通过一个共同遗产带来的成果而获得任何界限、任何边境都无法限制的繁荣昌盛、灿烂光辉和幸福生活。”丘吉尔倡议建立起一个类似欧洲合众国的组织，并且第一个公开呼吁法德和解。丘吉尔以这样明显的方式对舆论界施加了影响，从此，为传播欧洲统一的理想并为这种理想努力的运动应运而生。1948年5月7日至10日，各欧洲运动组织在海牙举行了一次盛大聚会。在温斯顿·丘吉尔名誉主席的主持下，大会聚集了近800名政治家、工业企业家、工会领袖、大学教授、作家等西欧国家的显赫人物。作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康纳德·阿登纳率领德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盛会。

在追求欧洲联邦政治理想的同时，阿登纳注重欧洲联合的现实主义思考。

阿登纳认为欧洲联合是德意志国家重返国际社会的出发点和恢复国家主权的前奏，强调“只有欧洲各国人民重新建立起一个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每一国人民对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对西欧各国的思想、意识和发展作出他们不可替代的特有的贡献，才有可能出现一个联合的欧洲”。正因为如此，只能先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外交活动，渴望以平等地位参加国际组织和活动的联邦德国，才有可能从欧洲联合中找到解决困扰德国和欧洲多年的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这种办法虽进展缓慢，却能够逐步收到实效。这样，将既能消除对联邦德国发展的限制，也可使得对国防安全感到担心的邻国放弃肢解德国

1945年7月，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失利，工党领袖艾德礼成为英国首相。

的企图。再一点，德意志民族主义因为希特勒纳粹的暴虐而变得声名狼藉。在欧洲联合中，对其他国家来说，联合只需要抛开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对联邦德国来讲，则要消除令世人敏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幽灵，强调参与欧洲联合，为联合作贡献，摆脱德国发展的不利困境。同时，由于欧洲联合已经成为美国加强与苏联冷战对抗全球战略的重要部分，美国敦促西欧联合，重视联邦德国在联合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使联邦德国通过联合而求发展的意图成为现实。

以欧洲联合为核心，阿登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战略。

首先是要争取美国的支持。阿登纳深切地体会到战后欧洲衰落现状。他向阁僚们指出，在东西方冷战对抗的国际形势之中，西方只有美国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方堪与苏联对抗，因而联邦共和国欲实现以西欧联合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只有努力争取美国的支持。联合的西欧和德国必须站在美国一边，在行动上与美国西方保持一致。换言之，联邦德国应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

阿登纳的构想在当时联邦德国关于未来发展走向的讨论中独树一帜。尽管各派的政治家们都本能地意识到：完全以主权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欧洲均势体系已经成为过去，欧洲将长期服从于新崛起的美苏的意志。但就如何摆脱西德的内外困境，各派却看法不一。

曾参与建立柏林统一工会和苏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雅各布·凯泽提出了一种著名的“桥梁理论”，他认为未来的德国应该在东西方之间起一种“桥梁作用”，不能倒向东西方的任何一方，为此要先使德国统一在1937年的疆界之中。凯泽代表了基民盟中左翼人士的观点，由于它保证了未来德国的强国地位，和不结盟的独立自由，凯泽方案很能适应战败德国一部分人的口味。

另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构想是社会民主党的库特·舒马赫提出来的，他认为德国应奉行独立政策，绕开美苏两大集团，走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德国的社会民主事业应加入一个由英国领导的西欧—中欧联盟，德国应该在联盟中实现重新统一和平等参与国际事务。这种观点迎合了许多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观点。

自由民主党的卡尔·乔治·普夫德莱雷尔提出使德国“脱离军事接触”的理论。他主张通过中欧地区脱离军事接触来使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对抗缓和，在缓和中实现德国统一。

各派政治家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阿登纳则认为上述主张均不现实。因为历史的教训使世人最忌讳德国在东西方之间实行纵横捭阖的民族主义政策：美苏冷战对峙，凯泽意欲使德国保持独立不结盟姿态而斡旋于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舒马赫对英国的指望也靠不住。英国虽然凭借战时发展起来的英美特殊关系及英联邦等固有资本保持了相对的实力，但英国要巩固英联邦又要驰骋世界，无力为欧洲事业花费代价；美国也绝对不允许德国如普夫德莱雷尔设想的脱离军事接触，因为这无疑是将整个德国拱手让与苏联。

阿登纳的一边倒源自他对冷战国际关系的清醒认识。他认为，二战后两个德国的建立本身就是美苏两大集团在欧洲争夺的产物。冷战世界中，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会放弃对各自势力范围的控制，德国将会在很长一个时期保持分裂状态。联邦德国既脱胎于西方三国占领区，国家的政治、经济 and 传统均与西方关系紧密，又受西方盟国的管制，它的安全要靠西方保证，主

权恢复要得到西方首肯，经济重建也有赖于西方的帮助与合作。与走中间道路或实际处于苏联的控制下相等，西德实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相对于欧洲而言，美国处于欧洲大陆之外，美国支持欧洲联合并不意味着联邦政府可以以对美关系来代替西德与欧洲国家关系改善。欧洲联合需要欧洲国家的共同努力。“德国的道路通向欧洲”，只有欧洲国家彼此之间真诚合作，才能把欧洲联合向前推进。这其中与法国的和解是一个关键。阿登纳强调法德和解是西德政治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由于法德之间的历史夙怨与现实矛盾，阿登纳深信，只有实现了与法国的和解，使法国放弃了压制德国的做法，才能使西德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道路畅通无阻；才能实现西欧范围内政治经济的协调统一，并在联合与统一中实现西德政治经济的复兴繁荣。1949年11月3日，上台伊始的阿登纳总理即利用接见《时代》周刊记者的机会作出了表态，他指出：法德关系对法国、对德国、也许对欧洲来说，如果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法德关系的解决，对持久和平有决定性的意义……“和法国的友谊将成为我们政策的一个基点，因为它是我们政策中的薄弱环节。……如果两国互不谅解，欧洲统一将是是不可能的。”阿登纳把法德和解提到了和一边例同样的高度。

阿登纳自幼是在忠于德国和喜好法国文化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接受教养，长大成人的。他出生的莱茵省在中世纪处于法兰西和德意志的中间地带。许多莱茵人生来就具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他们具有德国国籍而同时又具有法国人的文化心态，阿登纳也是如此。他所谋求的法德和解，是要在东西方对抗的世界中，把两个民族的古老友谊，用来作为实现联合的战略性楔子。和解不仅要消除法德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宿仇和现实中的紧张对立，而且要形成一种积极、有建设性和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关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法德轴心，支撑起他所梦想的欧洲大厦。

阿登纳还有一个希望，即是借助于在美苏冷战国际形势下，利用美法双方在战略上的各自需要，从中协调德美、德法关系，使其服务于联邦德国通过欧洲联合中实现复兴的政治目标。阿登纳认为，面对强敌苏联向西方扩张的态势，美、法的安全目标和利益一致。法国需要美国的安全保护，也仰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支援。同时美国也是以欧洲联合强大作为它对抗苏联和摆脱在欧洲沉重的政治经济负担的唯一途径，因而，联邦德国有了能利用美国，迫使法国在安全问题上作出一定让步的可能。

比起凯泽尔、舒马赫与普夫德莱雷尔来，阿登纳对局势的审视更清醒。形势的发展也越来越朝向阿登纳预想的方向发展：冷战的尖锐化发展使法国对德政策逐步发生变化。对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需要不再允许法国在美苏两大国之间保持平衡，法国被迫向西方阵营靠拢。乔治·皮杜尔虽然还抱着分割德国的希望，却不能不顺从欧洲和大西洋的政策。1947年皮杜尔已提到“组织自由欧洲”的必要性，1948年3月在国民议会上，他又声明说：“尽快并完善地把所剩的欧洲组织起来的时刻已经来临。”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可以保证更完善的防卫，也可以给德国带上个紧箍。于是，“欧洲”成为法国在战后未能付诸实施的德国政策的代替品。美国人并没有满足法国分

指苏联控制之外的欧洲国家。

裂德国领土的愿望：分割莱茵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前放弃了，法国也没有能使鲁尔国际化；法国人得到的只是萨尔地区在经济上与法国合并（1947年6月）、鲁尔国际专署和军事安全局的成立（1948年6月）。美国人支持西德的复兴！这使法国政治家们感到有建立一个坚固的欧洲范围的必要，减少德国复兴对法国的危险。

美国政府已经为欧洲的组建做了大量的工作。它通过马歇尔计划促进了欧洲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合作，也通过布鲁塞尔公约、欧洲委员会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外交与军事合作。然而，美国政府不可能提出一项欧洲计划，这不是它份内的事，它只能鼓励而不是强迫欧洲人采取行动。这项倡议应该由欧洲某个国家政府提出。1949年9月15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表示：“关于德国问题的解决，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法国来充当带头人。”即希望让法国来提出一种能把联邦德国纳入欧洲和西方阵营的解决办法。

阿登纳明白美国的立场。1949年底到1950年初，阿登纳作为联邦总理提出了许多关于组织西欧基础工业的建议，他希望以此表现联邦政府支持美国促进法德和解的努力。阿登纳在要求盟国放弃拆除当时欧洲大陆最大的钢铁企业——位于汉堡的蒂森工厂时，曾建议盟国将蒂森工厂变成国际财产，用于战争赔偿。他向法国人呼吁：“这个组织甚至可以成为在煤钢领域进行广泛国际合作的萌芽，我认为它将很有助于法国和联邦德国的谅解。”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放弃了对蒂森工厂的拆除，而罗贝尔·舒曼却没有做出反应。1950年春，阿登纳接二连三地抛出各项建议：3月初，联邦政府为抗议法国——萨尔协定发表了一份白皮书，建议成立萨尔国际专署和一个包括联邦德国南部及法国洛林在内的关税同盟。3月9日，阿登纳总理在接受一位美国记者采访时再次提到了这份白皮书建议成立一个拥有统一的议会和共同国籍并向其它国家开放的法国、联邦德国联盟，前提是萨尔归还联邦德国。3月22日，阿登纳总理在接受另一位记者采访时又提出在此之前先成立一个法德经济联盟的建议。

阿登纳的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被法国政府当作波恩政府为摆脱从属地位所采取的一种手段。法国舆论对这些主动接近的意向无动于衷。只有当时处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反对派的戴高乐将军对此似乎有所醒悟。他在3月16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如果不是强制自己冷静地对待各种事物的话，人们几乎就会被联邦德国的重要性和由于非洲而增加了的法国的重要性可能展现的前景所迷惑。总之，人们将在现代经济、社会、战略、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查理曼的事业”。

很明显，当时英国与欧洲大陆上的其它国家政府都难以提出一项联合的倡议。英国将外交重心放在了加强英联邦和维系英美特殊关系上，对欧洲，英国不准备超越简单的合作。意大利也做不到，因为它的重工业已被大大缩减，国际地位也未得到恢复。比、荷、卢三国主要是通过保罗—亨利·斯巴克的声音，在欧洲联合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斯巴克当时不在台上，比、荷、卢三国也不具有发出一项革命性倡议的能力。归根结底，应当由法国来采取行动。

阿登纳期待着法国人作出反应，美国人也在等待，整个欧洲都希望法国

指中世纪时在卡塔洛平原上，高卢人，日尔曼人和罗马人在查理曼大帝指挥下共同奋战，打败了阿提拉。

政府拿出有效的行动。这便是 1950 年春天欧洲的形势。

舒曼的建议

“ 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创建共同未来的基础 ,而当将来为今天这个时代及其疑难的问题谱写历史时 ,人们将会承认 ,我们曾经在莱茵河畔 ,在我们德国和法国的莱茵河畔 ,哪怕具有一切民族界限而仍然构成一个整体的莱茵河畔 ,试图作过一项重要的事业。我相信 ,这一事业必将取得成功 ! ”

——1950年1月14日法国外长
罗贝尔·舒曼第一次访问波恩时的讲话

签定了彼得斯贝格议定书后 ,联邦政府虽然在取消设备拆除方面取得进展 ,但是 ,议定书讨论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关于德国加入欧洲委员会的问题却使联邦政府陷入困境。其中最关键的还是萨尔问题。

1949年 ,法国政府和萨尔自治政府决定就一系列协定举行谈判 ,以确定萨尔的政治自治章程和萨尔与法国的经济联合。在法国政府看来 ,这些协定虽然不可能事先符合未来的和平条约的各项决定 ,但至少能够巩固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形势。1950年1月13至15日 ,法国外交部长罗贝尔·舒曼第一次访问联邦共和国首都波恩。阿登纳与舒曼之间的会谈原本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 ,可当一谈到萨尔问题时 ,双方都措词尖锐 ,互不相让了 ,以至于会谈后阿登纳与舒曼二人各自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未能发表联合公报。法国政府随后于1月21日通过高级特派员吉贝尔·格朗瓦尔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出法国与萨尔谈判的主要内容。联邦总理阿登纳强烈反对法国在萨尔问题上的这些做法 ,但他未能得到美英的支持。美英虽然强调萨尔章程是临时性的 ,但仍然支持法国的政策。法国政府于1950年3月3日签订了“ 萨尔协定 ”。

对于阿登纳来说 ,“ 萨尔协定 ”十分棘手 ,它规定萨尔大约一百万德国人要从德国分离出去 ,萨尔的煤矿也要被夺走。占有这些煤矿对于联邦德国的经济恢复必不可少。“ 萨尔协定 ”签订后 ,德国新闻界十分混乱。混乱情况从各大报纸的新闻标题中可略见一斑 :《法兰克福评论报》的标题是 :“ 法国租借萨尔矿藏 ” ;《法兰克福新闻报》 :“ 法国放弃财产要求 ” ;《法兰克福汇报》则简略概括为 :“ 关于萨尔的协定 :反对欧洲 ”。

阿登纳更担心的是萨尔协定会对德国人产生一种危险的心理影响。盟国在1949年11月9、10两日召开的巴黎外长会议上已经明确声明 :萨尔的地位只有通过德和约才能获得最终解决。联邦政府已经以此作为支持盟国政策的条件 ,法国与萨尔之间的这种做法却将会使西方盟国声明的信用在德国人心中受到严重的损害。阿登纳担心萨尔问题很可能会成为德国民族主义集团的一种危险的导火线和煽动工具 ,这必然会妨碍阿登纳上台以来就努力致力的法德和解 ,并且必然会妨碍他想通过法德和解、将德国纳入欧洲联合以求取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划。

萨尔协定更加剧了联邦议院中围绕是否加入欧洲委员会问题的争论。社会民主党已经多次声明 ,如果萨尔必须和德国同时被接纳加入欧洲委员会的话 ,社会民主党将断然投票反对加入欧洲委员会。萨尔的割离使一些原来不赞成社会民主党立场的政党转而支持社民党的意见。为此 ,阿登纳不得不反

复再上彼得斯贝格，希望盟国方面能做出些让步或者可以通融的姿态。磋商的进展是极微小的：法国方面坚持原有立场；英美也不愿支持联邦德国对萨尔问题的意见。阿登纳不愿冒险反对德国加入欧洲委员会，它毕竟是欧洲国家第一次联合与合作的尝试，不参加意味着联邦政府将失去一次进入欧洲的良好机会。欧洲委员会的部长委员会最后作出裁决，决定分别邀请德国和萨尔参加欧洲委员会，并在欧洲咨询议会内分别给予 18 个席位和 3 个席位。萨尔代表团的席位，与阿登纳希望的正相反，并不占用德国代表团的席位，这样等于联邦政府在事实上承认萨尔自治。阿登纳和三国高级专员谈判的结果只是得到了以下保证：萨尔协定仍然必须经过对德和约的最后批准，才能正式生效。

阿登纳希望坚持欧洲合作的发展方向，法国人对萨尔的种种做法却阻碍了他为德国复兴设计好的欧洲轨道。联邦德国内部以社会民主党为核心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反对联邦政府的欧洲政策。正在阿登纳苦寻解决萨尔问题良方之际，1950 年 5 月 9 日，一封来自法国外长舒曼的信为整个问题带来了转机。

5 月 9 日这一天，联邦内阁准备就参加欧洲委员会的问题进行讨论。阿登纳邀请了参加联合政府的各议会党团主席冯·勃伦塔诺博士、舍费尔博士和米伦费尔特博士参加会议。内阁会议在 9 点 30 分开始。因为 5 月 11 日西方三国外长即将在伦敦召开外长会议，并就德国问题进行磋商。阿登纳认为联邦政府必须赶在这次会议之前公布一项关于参加欧洲合作的决定。为使这个决定以适当方式向国内外公众宣布，他决定当晚 8 时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包括阿登纳在内，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天将会给欧洲的事态发展带来重大的转机。

上午内阁进行讨论时，阿登纳得到消息，法国外长舒曼的一名代表带来了两封急信。阿登纳的部务主任布兰肯霍恩接待了这位来访者。舒曼的代表请布兰肯霍恩立即呈交此信，并转告联邦总理：眼下巴黎正在召开内阁会议，并在讨论信件的内容；如果舒曼外长能立即知道联邦总理对这两封信所持的态度的话，他将十分感激。

这两封信一封是罗贝尔·舒曼的私人亲笔信。第二封是一个包括在备忘录里的、后来通称为“舒曼计划”草案的正式附件。

舒曼建议的核心，是将法德两国的整个煤、铁、钢的生产置于一个共同的高级别的超国家机构的联合管理之下，而这个组织也对其它欧洲国家敞开大门。舒曼在信中写道：煤、铁、钢生产的合并，必然会通向欧洲国家联盟的初步阶段，能立即为扩大经济建设创造共同的基础，并为这些国家的发展带来动力。这个计划一旦实现，由于煤、铁、钢基础工业生产的合并，以及建立起一个共同的机构——它作出的所有决定对法、德及所有参加国都具有约束力，就将为创建一个对于维护和平必不可少的欧洲联邦奠定初步的也是现实牢固的基础。

舒曼在信中强调其建议不仅仅是经济性的，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法国，人们担忧的是，德国一旦恢复了元气，就会进攻法国；舒曼反过来也设想了德国人的安全要求。他说，重振军备总是首先在煤、铁、钢的生产过程中显其端倪，如果建立起一个超国家的机构，那么两国中任何一国都能够觉察到对方重振军备的进展，从而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

舒曼建议的精神与阿登纳长久以来所主张的关于欧洲基础工业联营的设

想相符，阿登纳立即通知正在巴黎开会的罗贝尔·舒曼，他由衷地赞同他的建议。

5月9日的下午，期待一次例行记者招待会的记者们听到罗贝尔·舒曼低沉而平淡地向他们宣读出一份真正爆炸性的消息。记者们惊呆了，迟迟未作表态的法国政府迈出了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舒曼指出：“问题不在于说废话，而在于采取一项大胆的行动，一项建设性的行动。法国已采取行动，其后果会是重大的。我们希望将会这样。法国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和平，为了使和平真正来临，首先要有一个欧洲存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已经5年，法国完成了建设欧洲的第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并使联邦德国加入进来。欧洲的形势将因此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将使其它迄今不可能采取的共同行动成为可能。一个牢固统一、坚不可摧的欧洲将由此诞生。在这个欧洲，由于生产联合，市场扩大，物价下降，生活水平将会提高；鲁尔、萨尔和法国盆地将同心协力作出努力。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之下，所有欧洲人——无论是东欧人还是西欧人，所有希望依靠旧大陆获得自身发展和繁荣的地区，尤其是非洲，将共同分享他们和平的劳动成果。”

随后，舒曼宣布了法国政府的正式声明。

舒曼的计划为阿登纳处理萨尔协定问题和联邦德国参加欧洲委员会的问题，打开了方便之门。阿登纳抓住时机，当晚便召开记者招待会。他请全体阁员出席记者招待会，借以突出强调所要发表公告的重大意义。招待会上，阿登纳向记者们宣布了法国内阁关于舒曼计划的决定和德国内阁加入欧洲委员会的决定，这两项决定同时作出，事前根本来不及经过任何磋商。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阿登纳花了很大精力以图争取盟国政府支持德国加入欧洲委员会，同时也希望通过一种和解的姿态，力争在联邦议院中获得尽可能的多数，赞同联邦政府接受邀请，参加欧洲委员会。舒曼所宣布的法国的态度的转变缩小了联邦议院关于加入欧洲委员会的意见分歧。阿登纳以他惯用的简练手法，将德国参加欧洲委员会直接与人们所关心的欧洲发展的问题联系起来，他指出：欧洲委员会虽然还不是完美无缺，然而它却是盼望中的良好发展的开端；西方国家一致认为，没有德国的参加，欧洲委员会就不可能顺利发展。不能抱有胸襟狭窄的观点来看待参加欧洲委员会的问题。

他特别强调说：“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在联合起来的欧洲建立一个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虽然远不如这两大强国（美苏）那样强大，但是，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如此有力，如果潜在的分歧发展成为严重的紧张局势，在面临这种威胁时，为了维护和平，它可以在天平上投入自己的砝码。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执行欧洲政策时必须注视和追求的目标；这是一个卓越的和平目标，循此前进，就能使世界人民获得持久和平。”

阿登纳还表示：“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没有德国参加，欧洲委员会就无法继续发展。我们德国人必须们心自问，如果由于我们不参加欧洲委员会而使欧洲联邦的前途一开始就幻灭的话，我们能够对自己的良心，对我国人民以及欧洲负责吗？”

他说：“我们过去由于战争而负罪深重；现在，我们德国人不是更有责任，要用我们全部精神的、道德的以及经济的力量，为这一个欧洲的诞生，为使这个欧洲成为和平的因素而奋斗吗？”

他同时强调：“最近几个月里，世界政治形势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以

致相比之下，萨尔协定以及萨尔地区在欧洲委员会中占有席位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就不应成为进入欧洲委员会的障碍了。我们务必着眼于宏大的目标。”对联邦德国恢复元气的前景，阿登纳作了如下的描述，即：

“对于今后的发展，我所盼望的是，一旦我们成为欧洲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就能够很快地在施行占领制度的整个地区大大地舒一口气。我确信，如果我们成为欧洲委员会的成员的话，占领法规的修改——占领法规即将修改——将会掌握得更为宽大。”

阿登纳谈到了法国内阁会议于当天即5月9日上午作出的决定，他指出：这个决定是法国及其外交部长舒曼针对德国和欧洲问题所采取的一项宽宏大量的步骤，它对德法关系和整个欧洲的发展具有可以想象的巨大意义。阿登纳强调，法国的建议首先是基于平等的，因为舒曼建议中说如果法德两国意见不能统一，将由一位经两国选出的仲裁人进行裁决，这在德法关系上是极为重要的进展。再，萨尔的生产也纳入了这个计划，因而德法之间彼此疏远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将不复存在。其三，煤、铁、钢基础工业的联营为今后消除德法之间的一切事端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前提。

舒曼的建议和阿登纳的积极响应为5月11至13日召开的伦敦三国外长会议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气氛。5月16日，阿登纳在与高级专员们在彼得斯贝格的会谈中，了解到伦敦会议的详尽细节。舒曼外长提出的建议，拿美国专员约翰·麦克洛伊的话来说，犹如一枚小型原子弹爆炸。麦克洛伊也告诉阿登纳，基于阿登纳对舒曼建议迅速作出声明，同意计划及基本原则的反应，大家对之无不表示赞赏和欢迎。

伦敦会议的公报——涉及德国问题的部分，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令阿登纳感到满意。与以往西方盟国对联邦德国问题处理相比照，伦敦公报的形式、内容和措辞都有了长足进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阿登纳的期待自有其道理。他一直盼望德国能够重新纳入欧洲自由国家的大家庭中去，并从此从它还受着的一切控制中解放出来，在符合占领法规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重新获得它的国家主权。伦敦公报表达了盟国方面对把德国纳入西方阵营的决心和诚意：

“西方大国希望看到这一进展具有尽快的速度。这一进展将取决于联邦共和国和人民方面的充分信任和真诚合作的程度。这一进展的速度首先取决于：盟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它们的自身安全由于德国对和平的愿望和愿意友好地靠拢盟国而得到保证。”

麦克洛伊告诉阿登纳，盟国对联邦政府的合作感到满意，因此，打算给予德国以愈来愈多的独立，而且尽可能少地介入联邦政府的事务。他交给了阿登纳一些有关德国问题的文件，其中不乏盟国改变对德占领政策的关键举措。最为确切且最为重要的措施，是盟国已经在着手成立一个研究小组。该小组的任务是拟定占领法规的修正案，并处理一系列在缔结和约之前可能妨碍德国发展的各种问题。同时，盟国也表示要在经济上与联邦德国进行更多的合作。比荷卢经济联盟国家同意要在柏林购买比过去更多的产品，而美国也通过全权代表哈里曼发表声明，准备通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在柏林进行更多的采购。

这一切为联邦德国加入欧洲委员会扫清了障碍，在确信联邦德国加入欧洲委员会的提议能在联邦议会中获得绝大多数的赞同之后，阿登纳于 1950 年 6 月 13 日将议案提交联邦议院辩论。

6 月 15 日，联邦议院对联邦共和国参加欧洲委员会提案进行表决。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和德意志党的议员投赞成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议员投反对票。提案以 220 票对 150 票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

六国的“小欧洲”

“凡事开头难，进行过程中有风险，成功也没有把握，但所有这些，都比不上带头实行一种新秩序。”

——尼克洛·马基维里王子 公元 1513 年

到目前为止，舒曼计划只是构画出一个非常一般的基本轮廓，而要把计划确实下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在联邦德国内部，尽管舆论界普遍对计划感到非常满意，但亦有相当多的人持反对或保留态度。反对党社会民主党认为，管理鲁尔和防止其重新成为军火库的最好办法，就是对这一地区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可是，舒曼计划既不促成国有化，也不导致非国有化，企业制度由各参加国自由作出决定。建立共同市场无疑只是加强资本主义经济和鼓励卡特尔的一种方式。同时，社民党人也反对舒曼计划中倡议实行的所谓高级机构的技术官僚统治。从根本上讲，社民党人反对联邦德国同西方建立过于紧密的联系，认为这会加剧分裂，损害德国的重新统一。

工业界对舒曼计划反应积极。他们认为对煤钢实行共同管理，将是对联邦德国生产取消限制的一种手段。但是，工业家们担心法国工业的竞争，因为联邦德国的钢铁工业自战后以来在生产上一直受到限制和敌视，没有像法国那样得到国家的重点扶持，也得不到像法国那样多的马歇尔计划贷款。

令阿登纳感到欣慰的是德国工会方面反应积极。尽管工会领导人同社会民主党人有着各种联系，然而工会希望参与未来共同体的各个机构，从而使劳动者在市场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意大利，舒曼计划受到热烈欢迎。政府总理，天主教民主党领袖阿尔契德·加斯贝利反应十分积极。对于意大利来说，舒曼计划可以带来政治实惠，使意大利有可能重新获得和它以前战胜国一样的待遇。但加斯贝利却对经济问题感到担忧，因为意大利的重工业不够发达，需要保护。

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对计划的反应比较慎重。这三国正在试行一种经济联盟，其中经济联合的原则虽被采纳，但关税同盟的实施却困难重重，荷兰与比利时、卢森堡的差异使得人们对是否能够最终实现真正的同盟产生了怀疑。有鉴于此，三国在赞同舒曼计划的政治原则的同时，提出了许多保留意见。在比利时，由于钢铁企业已经实现了设备现代化，所以钢铁业对舒曼计划态度积极，然而比利时煤炭公司破旧不堪，私营煤炭企业主却忧心忡忡，把比利时煤炭公司纳入一个共同市场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另外，比利时各个工会则支持法国的建议，但资方却惧怕法国式的统制经济，更喜欢直接的工业协定。钢铁出口大国卢森堡亦是如此。荷兰的煤炭和钢铁工业虽然不占重要地位，却正在迅速发展。正因为煤钢工业尚未发展到足以对付国际竞争的地步，所以荷兰对共同市场也表示担心。

总的来讲，这些国家准备采纳法国的建议，舆论对于煤钢的联营是持支持态度的。

英国的态度完全不同，英国人不愿因联营而使英国经济受到任何损害，更不愿损害英国主权和英美特殊利益关系。舒曼计划的制定者让·莫内最初是设想在协调英法计划的基础上组成一个英法核心，使其逐步扩展成为一个在经济上统一的欧洲。让·莫内在 1949 年便就此与英国计划处处长埃德温·普

洛登爵士进行过秘密会谈，但英国人不感兴趣，只是想发展贸易，提出不出让国家主权的一些初步意义的联合。这与莫内想借加强联合而振兴法国、振兴欧洲的宏伟计划相去甚远。于是让·莫内在欧洲计划中撇开了英国。英国人的表现是极有意思的，在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经合组织中，英国人已经显示出英国不愿为欧洲付出任何主权代价，使这两个欧洲组织，在进一步联合问题上陷入僵局，但舒曼计划一出，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却又怨恨法国在不征求伦敦意见的情况下单独采取主动行动。因为莫内与舒曼主要担心英国人的讨价还价有可能使计划本身受到影响。故而将计划针对联邦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如果愿意可以接受，但不能使计划本身受到影响。舒曼的建议在英国也引起了一些积极反应。温斯顿·丘吉尔把它看作是“平息高卢人和条顿人之间千百年来争端的手段。”工党政府发表声明，认为这项倡议对于把联邦德国重新纳入欧洲大家庭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工党政府和反对派保守党都不约而同将自身排除在外。道理很简单，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煤钢贸易所占比重并不大，舒曼建议涉及的工业部门对英国的经济利益有限，相较之下，反倒有许多不利因素：英国工党正在国内试行改革，已经完成煤炭企业的国有化，钢铁企业的国有化也在进行，加入联营会损害国有化进程。并且工党和保守党都不愿让国家加入一个超国家机构受到限制，他们认为英国还是处于欧洲之外而和欧洲保持紧密联系的地位对国家发展更为有利。英国最终拒绝了让·莫内的建议。

英国人的态度也影响了比荷卢三国，后者提出许多质疑，为舒曼计划的实施造成了压力。只有阿登纳坚定不移地支持它，并全力为其辩护。

舒曼计划虽然在旗子上写的是“欧洲联邦”，但在当时却有一块醒目的政治招牌——“套住”德国。这一点舒曼并没有向阿登纳讳言隐瞒。但狡黠的莱茵人阿登纳看到的却是它实用的一面，他的目的是要想将其接过来“为我所用”，“在天平上投入自己的砖码”。他对建议的支持完全是另有所图。这一点很快就可以看到。

1950年5月23日，舒曼计划的幕后策划者和经济方面的组织者让·莫内偕同高级专员代理贝拉尔到波恩，希望与阿登纳进一步磋商，以确保法、德两国在总的方面能够意见一致，同时也准备抵制可以料到的各种情况。

莫内此行担心德国人会提出以各国的煤钢产量来决定每个国家在煤钢共同体所属机构中的地位。依据德国的实力，它很快会成为欧洲煤钢最大国。这对德国人有利，但却会造成对其他各国的歧视。阿登纳主动打消了莫内的顾虑。他说：“您知道，为了我国的前途，我是多么重视权力平等的问题。对把我国拖回到灾难时代的勾当，我曾经提出过多少责难。我荣幸地向您表示，我完全赞成您的建议。因为离开了全面的平等，也就谈不上什么煤钢共同体了。我的代表团可能提出的以经济为基础的一切建议，我都将予以撤销。”

阿登纳的意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起到简单明确的保证作用。在欧洲联合这个问题上，阿登纳与莫内同样高瞻远瞩，认为全面的平等是欧洲和平的首要条件。平等的原则阻止了以后煤钢共同体各机构内部杠杆游戏勾心斗角的一切企图，为它的成功带来了很大希望。

阿登纳与让·莫内还就关于煤钢联营计划讨论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即首先由各国高级机构的代表进行讨论，尽可能迅速地就舒曼计划的实行范围和缔结国家条约的框架取得基本谅解，只有在各国议会声明赞同的情况下，

才让技术顾问们参与活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各国因技术困难和意见分歧过大去进行不厌其详的讨论，以致产生使整个计划陷入空谈的危险。

为加快煤钢联营的步伐，阿登纳与法国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磋商。舒曼决定于1950年6月20日在巴黎举行起草建立煤钢联营条约方案的会议。根据阿登纳与莫内的商谈，巴黎会议所有的参加国一律不派技术专家出席。阿登纳采纳勒普克教授的建议，任命了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学家哈尔斯坦为联邦共和国代表。在此之前，哈尔斯坦教授从未从事过政治活动，但他的表现却是相当出色，在这以后哈尔斯坦成为阿登纳的国务秘书和他政策主要参与者之一。

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政府先后表示接受法国提出的超国家原则。英国借口涉及主权原则问题予以拒绝。1950年6月2日，英国拒绝参加在巴黎召开的会议。6月12日，工党政府公布了一本题为《欧洲统一》的小册子，再次声明英国坚决拒绝放弃任何一部分国家主权。英国的态度影响了北欧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的国家，这样，关于建立煤钢共同体的讨论未能扩及整个欧洲范围，而是局限在由几个西欧国家组成的“小欧洲”范围内。它们分别是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6月25日在远东地区爆发的朝鲜战争成为六国谈判新的推动力。朝鲜战争大大加强了舒曼计划的意义。就像阿登纳所料想的那样，舒曼计划能导致建立独立发挥作用的欧洲，成为美苏间的第三种力量。它一方面可以增强西欧抵御苏联的实力，同时也可以使欧洲在美苏起平衡作用，有助于国际缓和。为了对抗苏联的战略目标，美国大力鼓励六国举行谈判，认为这是加强大西洋联盟来防御苏联可能对欧洲发生进攻的一项有效办法。善于捕捉机会的阿登纳立刻感到，联邦德国凭借它的工业能力和人力资源变成了西方一张重要的王牌。他要善用它。

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迅速表示想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阿登纳觉得美国即将在更多方面放松对联邦德国的限制。道理很简单，西方要利用联邦德国的人力物力以加强防御力量就不能不给予联邦德国以平等的国际地位。这样，联邦德国虽然要通过舒曼计划来实施其欧洲战略，但却并不十分需要依靠舒曼计划来恢复它的地位，联邦德国的谈判砝码增加了。

英国的拒绝给联邦德国带来了一些麻烦，并为法国社会民主党拒绝加入煤钢联营提供了一种借口，阿登纳决定尽快促使联邦议院就德国参加欧洲一体化进行议会辩论，力促通过一项议院决议。1950年7月26日，联邦德国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指出：联邦政府和联邦议院自从成立以来，就认为它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反复主张建立一个欧洲共同体，并努力促其实现。同时，主张缔结一项欧洲公约，确立欧洲共同体机构的超国家性质并拥有各种必需权力。有了这个公约，阿登纳就可以放手进行有关欧洲一体化的各项谈判工作。

1950年5月11日和12日召开的美英法三国伦敦外长会议，决定要尽早解除对德管制并修改占领法规。舒曼计划加快了这一进程，因为联邦德国政府已作出各种努力要使联邦德国尽快纳入西方，纳入欧洲一体化轨道。国际形势的变化使杜鲁门感到不能再作拖延。这一年9月19日，美英法三国外长召开纽约会议，决定修改占领法规，扩大联邦共和国权力。纽约外长会议同意波恩重新成立外交部——由阿登纳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重新和所有国家恢复外交关系。所有这一切在三国外长11月22日与阿登纳举行巴黎会

谈时确立下来。从这时起，联邦德国开始拥有外交部，阿登纳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新的国际形势显示出联邦德国在东西方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也增加了阿登纳在舒曼计划谈判的砝码。

六国的谈判是在一种友好和协商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德法间的萨尔之争仍然是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

萨尔问题涉及三方：联邦德国、法国和萨尔自治政府。就萨尔政府来讲，它希望借缔结一项多边性条约的机会把萨尔作为缔约国纳入欧洲国家的范围。萨尔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必须让萨尔作为第七个国家，从而以平等伙伴的资格参加舒曼计划。阿登纳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如果允许萨尔政府在舒曼计划上签字，那么结果就是舒曼计划告吹，联邦政府将拒绝签约。法国政府处境两难：既不能倒向萨尔一方，开罪联邦德国，冒舒曼计划失败的危险，又不能因联邦德国而无视萨尔要求，置法国在萨尔的利益于不顾，况且议会会强烈反对这种做法。

鲁尔法规的问题也颇费周折。鲁尔专署设在原英占区，大不列颠是鲁尔专署的成员却不是舒曼计划组织的成员，这便把鲁尔的钢铁工业纳入欧洲煤钢联营组织的法律程序更为复杂化。阿登纳一再向英国人提出要求，必须取消鲁尔专署和鲁尔法规，联邦德国的煤钢生产才能完整纳入舒曼计划。使阿登纳感到放心的是在1950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声明对舒曼计划是积极欢迎的。英国同意在计划签署之后同签字各国在舒曼计划的基础上缔结一项协定。贝文托英国新一任高级专员柯克帕特里克转告阿登纳，英国深信舒曼计划一经签署，鲁尔专署就已失去存在的理由。这正是阿登纳所希望的。这样随欧洲联合的进行，鲁尔问题将自动解决。

1951年4月11日，阿登纳以联邦德国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巴黎参加舒曼计划的最后一轮讨论和签字仪式。阿登纳希望萨尔和鲁尔问题都有一个圆满的解决。这是阿登纳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长的第一次正式出访。阿登纳有意向新闻界透露，他选定法国首都作为第一次正式访问他，是想借此证明他把德法关系看成是解决欧洲任何问题的关键。

在法德和解，共建煤钢联营的问题上，阿登纳与舒曼是相互谅解，共同期待。

舒曼也一心希望煤钢联营条约能顺利实现，所以在对待萨尔问题上一直采取克制立场。2月份，舒曼抵制了法国议会逼他就萨尔问题同联邦政府讨论的要求，他不愿法德双方就萨尔问题进行毫无成效的争辩。舒曼说，在处理萨尔问题上，最要紧的是保持镇定。阿登纳理解舒曼的态度与做法，因而一开始就主张双方互相谅解，并有意保持低姿态。4月一到巴黎，他即向舒曼表明了态度。他说：在萨尔地区，法国有经济利益，我们有经济利益和民族利益。在这些利益之间，应本着一种诚恳的和愿意作出忍让的欧洲合作精神找出一个平衡的办法来，它不但要对大家都公平合理，而且特别要符合萨尔人民的愿望。无论如何，不能使萨尔问题破坏建立德法之间良好关系的努力，从而妨碍欧洲建设。不能让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产生的变故和困难，成为背离对德、法、欧洲与世界和平都有决定性影响的欧洲一体化方针以及构成欧洲一体化基础的德法亲善的理由。

由于舒曼和阿登纳都同时考虑到对方的立场并互作了一些让步，萨尔问题取得令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暂时解决：4月18日，法国还是以萨尔的名义在条约上签了字；但由于德国的反对，萨尔并没有作为第七个参加国。阿登纳

的请求也得到准予,将他和舒曼 4 月 18 日的互换信件作为附件与欧洲煤钢联营条约放在一起。并在条文中列入这一点。

以下阿登纳与舒曼的互换信件清楚表明了双方在萨尔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 巴黎

外交部长罗贝尔·舒曼主席阁下

主席先生：

在欧洲煤钢联营谈判过程中，联邦政府代表一再表明，萨尔的地位只有通过和约或一项类似和约的条约才能作出最后解决。

他们还在谈判中声明，联邦政府签署条约并不表示承认萨尔现有的地位。

我重复这一声明并请予以确认：法国政府同意联邦政府的观点，即萨尔的地位只有通过和约或一项类似和约的条约才能获得最后解决，法国政府并不认为联邦政府在欧洲煤钢联营条约上签字是联邦政府承认萨尔的现有地位。

主席先生，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阿登纳（签字）

1951 年 4 月 18 日于巴黎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兼外长

康纳德·阿登纳博士先生

联邦总理先生：

在答复您 1951 年 4 月 18 日的来信时，法国政府注意到联邦政府并不把它在欧洲煤钢联营条约上的签字看作是对萨尔现有地位的承认。

法国政府本着自己的立场声明，它根据萨尔现有地位代表萨尔行事，但它并不认为联邦政府在条约上签字就等于联邦政府承认了萨尔的目前地位。它并不认为欧洲煤钢联营条约是预先处理了萨尔的最后地位。萨尔的最后地位将通过一项和约或一项作为代替和约而缔结的条约予以解决。

联邦总理先生，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舒曼（签字）

1951 年 4 月 18 日于巴黎

这正是阿登纳所需要。阿登纳一直害怕法国政府把萨尔协定当作是确定不移的东西，只要法国人没有就萨尔问题把话讲绝，萨尔就有重回联邦德国的希望。

在阿登纳的坚持下，鲁尔问题也得到了一份符合德国人希望的书面证明。同一天，舒曼以煤钢联营主席的身份给阿登纳写了一封信：

“ 联邦总理先生：

在舒曼计划谈判结束的时刻，我感到有必要告诉您，法国政府对进行谈判及达成圆满结果的特别友好的气氛表示十分重视。

今天所签署的协定，创建了一个超国家性质的欧洲共同体。

在参加国地位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并在满足所有参加国的利益下，协定将六国煤钢生产潜力合并起来置于共同体的管理之下。这就使参加国之间的关系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并在通向欧洲一体化道路上形成一个决定性阶段。法国政府认为，在煤和钢的领域里，加在德国身上的特殊义务（即鲁尔法规），已不再符合这个条约所有签字国都受到同样约束的共同规则。法国政府因而主张，在参加国政府的同意下采取下列措施：

1．目前鲁尔专署所履行的职能必需取消，由煤钢联营高级机构按照有关过渡时期的协定规定，承担履行职能的权力。鲁尔专署和设立这一机构的1949年4月28日伦敦协定，必须在与缔约国商定的情况下最迟在煤的共同市场建成时废止。

2．至于钢的生产和钢的生产能力，德国只受对所有缔约国都适用的规则的约束。因此在条约生效时，对德国钢的生产与产钢能力的限制应予取消。

3．高级专员委员会应代表其自身及其所属机构（包括监督组织）宣布放弃其在煤钢方面为高级机构职权所取得的那些职能，即授权后者按照过渡时期协定规定行使这一职能。

本信件中规定的所有措施至迟将于共同市场建成时付诸实施。

此外，法国政府打算在签订条约后采取必要步骤，使伦敦协定签字国以及其他占领国同意上述措施。

罗贝尔·舒曼（签字）

1951年4月18日于巴黎

法国人终于同意取消“鲁尔国际专署”，这也分别得到美国政府同英国政府的认可。鲁尔法规在1951年12月21日失效，阿登纳为签署彼得斯贝格议定书而在鲁尔问题上所作的让步自动取消。阿登纳的法德谅解政策得到了回报。

巴黎会议上，六国外长最后一轮谈判的最后争执发生在煤钢联营高级机构总部的地址选择问题上。几乎每一个参加的外长都希望把总部设在自己的国家。最后，卢森堡外交大臣伯克建议作为权宜之计将总部暂设卢森堡。由于劳累的谈判已把外长们搞得精疲力竭，也没有人担心小小的卢森堡会因为在他国内设立了这个重要欧洲组织而会在煤钢联营中提高政治地位，大家最终同意了他的建议。4月18日这一天，六个参加国签署了煤钢联营条约。阿登纳实现了他欧洲战略的第一步：联邦德国加入西欧阵营，并且以完全平等

地位成为欧洲的国际组织中的一员。

随着各国先后履行批准手续，1952年1月1日，条约正式生效。欧洲联合的梦想在六国组成“小欧洲”范围内得以实现。

“ 十字勋章 ”

“ 事实上我是一个好心人 ,是一个希望同法国和解的德国人。 ”

——康纳德·阿登纳语

1951年4月11日,阿登纳所乘的专机在巴黎的达奥利机场着陆,前来欢迎的只有让·莫内和西德驻巴黎的总领事豪森施泰因教授。没有一名法国政府部长在飞机旁迎候。

这是战后德国政府首脑对巴黎的首次访问,法国政府却有些尴尬。反对德国的呼声来自左和右的两方面。自从苏联拒绝了马歇尔计划之后,法国共产党人便谴责任何形式的西欧联合运动。同时,西方保守主义者也不相信德国向民主转变的诚意,继续将其当作危险的象征,两股力量汇集在一起,使法国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中立主义的思潮。仇恨的心理仍然存在于大多数法国人心中。

这便是法国政府不愿给阿登纳以隆重外交礼仪的原因。小小的欢迎车队高速飞驰,直奔巴黎。但无论如何,这总比应付危险的示威游行轻松得多。为了防备反阿登纳的示威游行,法国政府动用了维持秩序的专门机构。

阿登纳并不注重表面的形式,相反,他对巴黎给予的任何友好和同情的暗示都心神领会。他明确知道要想使国家尽快复兴,必须一步一步地走。签署舒曼计划对他来说,是一条复兴道路的起点,他希望通过这条捷径走向全面独立和争得国家的强盛。他理解法国政府的为难之处,实际上他的政府也顶住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来自左右两方面的保守主义者、旧军人以及抱有不现实中立主义幻想的强大思潮,都给阿登纳带来过许多麻烦。但他平静地接受了。他像一个斗士为捍卫自己的信仰作了不屈不挠的抗争,终于,带着希望来到了巴黎。为了法德两国的和解,他准备全力以赴。

法国各大报纸竞相报道阿登纳访问巴黎的消息。报上的文章,除了少数例外,语调均友善而客观,热情赞扬阿登纳为法德谅解所作出的努力。法国著名新闻评论家莫里斯·舒曼在人民共和党的机关报《黎明报》上写道:“阿登纳博士不顾一伙人好几星期以来的肆意谩骂,终于来到巴黎,这是需要有勇气的。但是过份的挑拨也指出了补救的办法。如果以全然不信任的态度来回答泛日尔曼主义的复活,那只会走上重复过去的道路。阿登纳不是布吕宁,1951年也不是1931年。”保守的《费加罗报》带着怀疑的口吻写道:“谁说阿登纳是法国的朋友,那是措词不当的花言巧语。”共产党人的报纸则干脆攻击阿登纳是“盟国的傀儡总理”,提醒人们提防这个“美国军火工业家的稻草人”。

阿登纳是在舒曼计划谈判开始的前一天飞抵巴黎的。第一天的日程安排是由弗朗索瓦—庞赛陪同,参观巴黎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几年来在彼得斯贝格山的交道,已使弗朗索瓦—庞赛与阿登纳结下深厚友谊。弗朗索瓦—庞赛挽着阿登纳的臂膀,穿过布洛涅森林,越过林荫大道,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尽情漫步。阿登纳对法国文化的热爱与了解成了记者们新闻报道的重点。

漫步过巴黎有名的大道,弗朗索瓦—庞赛引导阿登纳来到拿破仑时期建立起来的赫赫有名的凯旋门。它是法兰西历史与文化辉煌的象征。阿登纳一行在凯旋门的逗留引来了许多法国人的围观。好些人一眼认出了联邦德国总

理阿登纳。在人们目光注视中，阿登纳挺直了腰板。法国人对阿登纳很好奇但却很友好，阿登纳自认为是他的努力取得成绩。最后，阿登纳一行是在法国保安人员的簇拥下乘上电梯，登上了艾菲尔铁塔。在铁塔上，他第一次俯瞰了巴黎的壮丽景色。他向在身旁的弗朗索瓦—庞赛说：多么美丽的城市啊！看到它，使我感到我们的责任是保卫和平，使它永远如此。

第二天，4月12日，法国总统欧里奥尔在爱丽舍宫设宴招待阿登纳总理。宴会的气氛十分友好，阿登纳感到，对于这次很重要的巴黎访问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序曲。

下午四点，参加舒曼计划的六国外长会议在法国外交部的博韦大厅举行。一个民主的德国的代表重新参加国际外长会议的讨论，这是十九年来第一次。会议厅中挂满了珍贵的壁毯，1946年，美、苏、英、法四盟国代表贝尔纳斯·莫洛托夫、贝文、皮杜尔曾在这里举行过会谈。这次，参加会议的是比利时外交大臣范·齐兰、卢森堡外交大臣伯克、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意大利外长斯福尔扎伯爵、荷兰外交大臣斯蒂克以及阿登纳。阿登纳坐在罗贝尔·舒曼和比利时外交大臣范·齐兰之间，舒曼是会议的主席。关于舒曼计划尚有一些问题等待作出决定，例如：煤钢联营的总部地址，高级机构的成员名额、组成人选和职权，部长理事会和联营议会的权限，表决方法、讨论时用语以及高级机构主席的权限等等。会议充满了热烈友好的气氛。

第一次会议开了两个半小时。当晚，阿登纳与舒曼单独作了一次长达四小时的会谈。两人十分坦率地讨论了萨尔问题以及法德之间有意见分歧的其它方面的问题，并讨论了进一步加强欧洲力量的可能性。两人还就计划中的欧洲防务集团以及有关欧洲农业、能源和交通的联合计划交换了意见。

由于让·莫内在长达9个月的预备性会谈中孜孜不倦所作的协调努力，各国代表团对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在巴黎讨论中所有决议都能获得一致通过，没有国家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投票否决，人们都本着协商谅解的态度求得一致的决定。这次会议使阿登纳，也使所有的人感到这次会议一改1918年以来有德国人出席的多次国际会议中那种相互不信任的态度。阿登纳认为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理解和协商。在最后签署的共同决议中，各国一致同意，各国要经常进行协商和个人接触，尽力在其它领域中推广舒曼计划所依据的欧洲联合的政治理想。对于德国人来说，取得在舒曼计划参加国之间就重要政治事件经常性磋商的同意，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成就。

4月18日下午，六国煤钢联营条约的签署仪式在法国外交部的“钟厅”举行。让·莫内的小组成员为煤钢联营条约的签署煞费苦心。当条约文件放在各成员国签字人面前时，大家都惊叹不已，文件用的是荷兰纸张、德国墨水、法国印刷术、由比利时和卢森堡装订并用了意大利制作的文件飘带。签字国按法文字母顺序的先后签字。联邦德国在法语中称为“Alle-magne”。因此，阿登纳代表联邦德国首先签字。

当天，阿登纳及其随行回到下榻的克里翁饭店。有人给阿登纳送来一封信，上面写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阿登纳阁下亲收”。阿登纳拆开了这封信。里面装有一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十字勋章”，并附有一封由巴黎的一名叫做西蒙娜·帕特鲁伊的女大学生写来的长信。西蒙娜写道：

“总理先生！

我作为一名法国妇女从巴黎写信给您，感到十分荣

幸。我同我们古老城市的其他许多居民一样，对阁下访问我们的古老首都感到无限愉快，虽然您在这里逗留的时间是如此短促。

我把您的访问看成是真正踏上和平与幸福之路的第一步象征，这不仅是为了您的祖国德国，也是为了法国和所有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意识到这种共同遗产的价值，有责任和义务来捍卫这个共同的遗产。

我的父亲由于参加 1914—1918 年的战争而死去。那场战争，他从头到尾都参加了。十分尊敬的总理先生，请接受我附在信里的这枚属于我父亲的一个法国士兵的“十字勋章”，作为您对 1951 年 4 月对巴黎的有意义访问的小小纪念。聊表两国人民希望实现真正的和解之情，他们彼此在以往已使对方忍受了那么多的苦难。”

阿登纳被这封来信深深地感动了。这件作为一名普通法国人赠送的礼物，对他来说首先意味着两个国家的人民彼此渴望和平的象征，也代表了两国青年彼此希望了解对方的一种征兆。在他担任联邦总理的整个岁月中，阿登纳一直非常珍视这枚“十字勋章”。1963 年他下野时，特意佩戴着它一起离开了绍姆堡宫。

第五章 重新武装与主权恢复

没有德国，欧洲的防御不过是大西洋岸边的一场后卫战。

——《杜鲁门回忆录》

同等的义务以同等的权力为前提。

——《阿登纳回忆录》（一）

穿军装的德国人

我们今天面对一个共同的现实，即需要确保我们在冷战中能够胜过对手，并且能够切实进行战争准备。

—1950年8月让·莫年写给勒内·普利文的信

历史的发展经常出乎人们的预料。法国人提出舒曼计划，曾以为借此足以一劳永逸地拔除战争的雷管，欧洲大陆的军事冲突将永远成为过去，和平时代降临全球。然而1950年6月25日在朝鲜爆发的战争不仅加快了舒曼计划的脚步，同时又把5年来人们都不可想象的另一件大事提上日程——重新武装联邦德国。

重新武装德国确实是最敏感的问题。痛苦的经验仍历历在目，法国人曾经商定在会谈中永不涉及这个问题。阿登纳对此也十分清醒，他在第三帝国法西斯军事暴虐下饱受过曲辱，所以曾慨叹道：“我的国家，血流得够多了，再也不愿被重新武装了。”苏联人在东德建立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警察部队时，阿登纳亦曾义正严辞地予以谴责。

但是，由于东西方冷战的加剧，这个问题不再成为禁区，自1949年11月开始，国外报界便已就有关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新闻记者无孔不入。12月初，美国《克利夫兰实话报》记者询问阿登纳对此问题的看法，阿登纳回答说，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同意德国人作为雇佣兵加入外国的军队。即使盟国要求德国对欧洲的安全作出贡献，但作为他本人还是拒绝建立一支德国国防军。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德国部队参加欧洲联邦军队的问题。

第二天，许多记者打电话来询问有关这次谈话的内容，有报道说阿登纳认为有必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德国军团。阿登纳对此发表了一项声明，重申他尊重那些在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侵略下受过苦难的国家所提出的安全要求。但他又补充道，如果坚持要德国参加西欧防务，那只有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并且只有在欧洲军的体制内，由欧洲人指挥的形式下才能考虑这个问题。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武装德国的问题又突然重提，而且变成了当时的中心问题。

正好在朝鲜战争爆发一年以前，在审议批准北大西洋公约之际，舒曼对法国国民议会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强调：“德国目前没有武装，今后也不会有武装。……接受德国加入北大西洋联盟，允许德国成为具有自卫手段的民族或成为能帮助他人自卫的民族，同样不可想象。”舒曼的声明代表了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愿望。但朝鲜战争使事态急剧发生变化。1950年7月25日，

美国的麦克洛伊也发表了一则声明：“如果爆发侵德事件，应该给德国人以自卫的手段。”声明的意义与舒曼声明调子完全相反，可以从两方面理解麦克洛伊的话，一方面表明美国人打算坚守欧洲防线，另一方面它又是在向欧洲各国元首暗示，美国当前不可能同时坚守东西方两条防线。

阿登纳当然明白美国人的意思。他对麦克洛伊说：“我相信世界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朝鲜战场，而是取决于欧洲的心脏。我也相信，斯大林不仅有对朝行动计划，而且还可能有对德行动计划。在朝鲜发生的一切，在德国都可能重演。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

他的行动同样是迅速的。6月底，阿登纳已就建设一支联邦警察问题向盟国高级专员们提出了请求。8月29日，他又就安全问题和重新调整西德与占领国关系问题向西方三国提交了一份备忘录。8月30日，阿登纳总理要求增加西方驻扎在联邦德国的军队，并要求联邦德国要有建立一支拥有重型武器的警察队伍的权利，与民主德国拥有的警察力量相等。

到1950年8月，北朝鲜军队在朝鲜半岛上迅速向南推进。对西方国家来讲，形势变得更为紧张。法国人本来抱着“有了舒曼计划，士兵们再也不用去打仗了”的观点，这回，即使是对军事问题向来不感兴趣的让·莫内也感到法国不能再躺在舒曼计划上安然睡大觉了。8月底，莫内在忧心忡忡中结束了在夏朗德的蕾岛小别墅的度假，迫不及待地给当时的总理勒内·普利文写了一封长信。他说：“我很担心的是我们各方面的情况发展得过快，以至把各方面的事情都混在一起了；甚至还没有明白过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便与背运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向普利文指出，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的困境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妨碍了法国在欧洲防务中发挥作用。而无论是放弃印支，向对方妥协，还是寻求中立，都不是法国的出路。法国“需要有一个新的、有力的和有建设性的思想作指导，使欧洲的防务和本国的经济同时发展并且使东方恢复和平。如果法国能够在一个有效的建议中提出这个建设性的想法，美国是愿意听取的”。莫内的意思是希望从一个广泛的共同体的范围内解决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

英国人已经作出了表态。8月11日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委员会的咨询大会上，“老雄狮”丘吉尔又作了一次震撼人心的讲演。他说：首先欧洲还不会大难临头，因为美国的核力量可以使苏联不敢在欧洲轻举妄动。但这只是个短暂的时期，它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所以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成立一支强大的欧洲军队。欧洲军应该有德国的参加。阿登纳在8月底的行动实际上是对8月11日斯特拉斯堡决议作出的一种响应。工党政府虽然没有在决议上签字，可贝文显然也觉得让德国人参加可以减少英国人的负担。

9月初，美国政府的姿态更加明朗化。杜鲁门总统下决心向欧洲增派美国部队，但条件是欧洲人必须在重新武装上作出足够的努力。美国国会的态度也很明确：没法想象让别人去保卫一块领土，而那块土地上的居民却在那里袖手旁观。国会认为要在欧洲尽可能向东设置防线，势必动用联邦德国的人力和经济资源。9月12日，美英法三国外长在纽约举行外长会议。会上，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便明确表达了美国的上述立场。他的话令法国外长舒曼大吃了一惊，他说：“我要在1951年秋天看见穿上军装的联邦德国人。”

美国人的步子迈得太快，确实令法国人感到有些措手不及。舒曼在启程去纽约之前去看望莫内，莫内提醒他，他那反对德国重新武装的立场有可能坚持不住。舒曼认为会议不可能提出此问题，重新武装德国不是随便在什么

条件下都能实现。这会儿，法国已经失去了莫内设想的主动提出建议的第一次机会。艾奇逊同时通知舒曼和贝文：“只有欧洲人自己武装 60 个师，美国的增援部队才会派往欧洲。”他还说，“欧洲的 60 个师中可以由德国人组成 10 个师。”到目前为止，法国政府的考虑只停留在让德国对欧洲防务作出经济贡献上。舒曼愤愤然大声质问道：“为什么？为什么如此急不可待呢？先去统率您自己的军队去吧！欧洲各国的军队是否能统一是以后的事；至于德国军队的参加，更是遥远的事。”舒曼原想得到英国同事贝文的支持，结果发现贝文赞成艾奇逊的观点。在 NATO 理事会上，美国正式提出武装德国的草案，法国行使了否决权，却遭到了孤立。法国政府一下子进退维谷，只能尽量拖延时间。法国政府从巴黎向在纽约的舒曼发出了指示：暂且避开重新武装德国的建议。美国答应于 10 月 28 日回纽约继续讨论，这样，法国才有了一个月的缓冲时间。

纽约会议放宽了盟国对联邦德国的限制，在外交事务、经济问题和立法监督上给了联邦政府以更多的自主权力。在外交事务方面，盟国在保留否决权（尤其是对苏联势力范围内国家方面，或是出于安全原因而特别提出的对其它一些国家关系方面）的基础上，授权联邦德国建立外交部，并独立自主地奉行自己的对外政策；在外贸和外汇管制方面，盟国高级专员只有在需要实现明确规定的目标时才行使其职权。例如，出于安全原因对某些产品的贸易进行监督，以便保证德国贸易政策符合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原则；在立法监督方面，原来事先经过高级专员委员会审核的办法予以取消，从现在起，联邦和各州的法律在德国主管部门公布后立即生效。高级专员委员会只有权对那些与盟国立法相矛盾、或严重危及占领基本目的的法律和指令予以废除或宣布无效。在实现上述目标之前，阿登纳向盟国作出了两项承诺：第一，承认战前德国所欠的外债和战后由于经济援助而产生的债务，以确认联邦政权的连续性；第二，保证与盟国的合作，并在共同防务所需的原料与产品不足时，予以公平分配。

决定还是需要由法国人自己来作出。用让·莫内的话来说，摆在法国人面前有三条路：或者无所作为；或者只在德国范围内处理德国问题，这可能会使正在讨论中的欧洲建设和舒曼计划化为乌有；或者在欧洲范围内作出某些决定，便可用广义的舒曼计划把德国并入欧洲联合之列。让·莫内倾向于后者，但事情来得太突然，法国舆论还必须有一个过程才能适应德国参加欧洲军事合作的问题。

阿登纳则敏锐地预感到这是一次非常有利的机会。用他的话来讲，自有国家以来，体现国家本质的军队始终是反映国家主权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联邦德国可以以支持西方重新武装西德的要求来换取盟国的政治经济让步——使重新武装成为西德争取主权有价值的政治手段！阿登纳明白西欧各国政府面临的问题不是坚决反对美国的提议，而是希望设法寻求某种妥协方案，以冲淡一支强大德国军队所构成的危险冲击，把德国的军事力量置于有效的制约机制之下。冷战态势表明：美国已经决心要推行新的政策，而西欧国家仍然完全依赖美国，如果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撤出欧洲，西欧将不能抵御苏联势力向易北河以西推进。联邦德国所应做的是配合美国政策，力求使盟国重新武装德国的政策服务于联邦德国争取主权和平等地位的外交政策方针。

9 月 24 日晚，美国高级专员来到阿登纳在勒恩多夫的寓所，征求他对重

新武装德国的看法。阿登纳向麦克洛伊的表白今后者兴奋。他说：“我们准备参加统一的欧洲军队，我们绝不会通过恢复本国的军事力量来复活军国主义。”他又把同样的意思向法国专员弗朗索瓦—庞赛作了说明，表示他和大多数德国人都不能容忍普鲁士精神，不打算复活德军参谋部，不想以军事力量统治本国，更不想把国家拖入新的战争冒险中去。这种又清楚又明确的态度传达到了巴黎，法国政府的态度有所松动。让·莫内提醒法国人：“这位伟大的爱国者（阿登纳）会毫不迟疑地提防着一切外国政客重建独立的德国国防军，这难道不是异乎寻常和前所未有的幸运吗？”法国既然不能阻止美国重新武装德国的要求，就应以全力抓住时机，把握问题的主动权，让武装的德国纳入自己可以控制的轨道。

于是，由莫内在幕后策划斡旋，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在1950年10月24日向法国国民议会提出了一项关于组成“欧洲防务集团”和“欧洲军”的建议，此即所谓的“普利文计划”。时距28日三国外长华盛顿聚会仅有4天。

莫内实际上是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他将正在讨论之中的欧洲一体化的概念引申到军事领域，以削减人们对控制德国军事部队能力的担忧。这同时有两个好处，一方面满足了美国人武装德国的愿望，同时又把不受欢迎的德国重新武装涂上了受人欢迎的“欧洲”色彩。当然，这种做法有可能使正在进行的煤钢联营谈判面临风险，但总的来说冒险还是值得的，它使法国走出了孤立的困境。当时除比利时以外，所有的北大西洋公约国家都同意了美国的建议，差不多所有的欧洲盟国，特别是荷兰、丹麦和挪威，都认为把大西洋防务扩展到联邦德国是确保其自身安全的必要条件。法国面临孤立处境，已是别无选择。

阿登纳希望重新武装为西德带来的是平等参与国际社会的机会，而普利文计划与美国武装德国并给与其平等地位的初衷有很大出入：法国人提出建立的“欧洲军”，是把德国的军事职能实质限制在辅助性的水平上。从计划内容来看，它含有一系列对联邦德国歧视性的规定，如西德加入“欧洲军”但却不能单独行动，不得设立自己的国防部、国防军以及参谋本部等；计划将防务一体化水平规定得很严格；设置一个部长级的“欧洲防务委员会”，还要设立一名向欧洲议会负责的欧洲防务部长等。按照当时的情况，这个防务部长只能由法国人来担任。显然，法国是想以尽可能小的代价，为自己获取最大限度施加影响的地位。

阿登纳既看清法国的意图，也懂得德国的处境，因此他在特别强调愿意接受欧洲一体化这个基本原则的同时，也清楚表明联邦德国的立场，即如果所有成员国在里面都是平等的话，联邦政府可以考虑接受普利文计划。11月7日，法国总理通过弗朗索瓦—庞赛向阿登纳递交了一份声明，对同年10月24日发表的欧洲防务共同计划中的某些措词作了必要的解释和补充，特别指出计划对德国不存在任何歧视，对德国与其它所有伙伴国一视同仁。阿登纳立即采取相应行动，准备从欧洲一体化的积极一面来支持普利文计划。

显然，需要有一个时间过程才能使公众认同阿登纳的言行。在阿登纳参加为欧洲防务效力的第一批计划讨论时，在德国，滑翔机和击剑运动因具有“军事性训练”性质，依然被禁止。赞成和反对重新武装成了德国政界和新闻界长期争论的焦点，是否让德国人穿军装成了基民盟与社民党再次相互纷争的话题。赞成阿登纳重新武装政策者五花八门，其中既有诚挚的“欧洲人”、

相信苏联侵略危险的人士，也有听天由命的怀疑论者、曾经“受屈辱”而现在看到复仇机会的人，以及认为联邦共和国在政治上大有可为的政治现实主义者，等等。反对者中不仅有担心德国民主前途的民主人士、具有很高道德标准而因良知拒服兵役的人，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或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认为德国必须拒绝各种限制。有关重新武装的争论，在联邦德国持续了整整4年。

争论在加入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国家中同样激烈，其中尤其以法国为甚。从1952年到1954年，法国的历届政府都被欧洲集体防务问题的争吵搞得瘫痪，公众辩论之热烈，令人想起德雷菲斯事件。欧洲军成为戴高乐派猛烈抨击的主要对象。戴高乐将军说：“所谓欧洲军计划，是一项奸诈的计划草案，它威胁看法国的主权，可能以法律形式剥夺法国的主权。这样，我们的军队就将消失在这一混合体中，就将成为在‘全欧洲’这一冠冕堂皇的名义下进行交易的筹码。然而，真正负责和享有主权的欧洲实体并不存在，建立这样的实体还需要巨大的努力，而且只有‘伟大的领导者美国’，才有能力领导欧洲，使欧洲的力量得到恢复”。戴高乐的全部理论归结起来，无非是说欧洲还未成为政治实体之时，建立欧洲军是毫无意义的，只能是美国的附庸。

戴高乐的话不无道理。欧洲共同防务体制远未具有法国政府最初所建议那样的超国家性质。防务一体化所涉及的领域远比煤钢联营的具体经济领域重要得多，也广泛得多。比、荷、卢三国尤其怕因此而被大国控制，都希望为自己保留最大的特权，荷兰人甚至要求把欧洲防务共同体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便使得这个组织一体化的程度大打折扣。况且，一体化的准备工作过于仓促，它的出台令人不禁想起早产的婴儿。朝鲜战争爆发后，欧洲冷战形势更加严峻。一时间，联合成为欧洲最时兴的政治口号，煤钢联营到防务和政治共同体的讨论都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戴高乐的谈话实际上反映了大多数欧洲政治家的谨慎态度。即使在1951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西欧国家关于欧洲防务一体化的讨论，仍看不到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景。

不过，阿登纳却没有让旷日持久的辩论束缚自己的手脚。他自始至终把德国参加共同防务作为联邦德国重获完整国家主权的契机。令阿登纳感到兴奋的是，尽管各国、包括联邦德国国内还在就德国加入欧洲军和欧洲防务一体化争论不休，但重新武装德国却已提上日程，并且如他所预料，将改变西德国际地位的问题摆上了谈判桌。在美国的压力与操纵之下，关于欧洲集体防务条约和德国条约的谈判已经开始了，阿登纳不可能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实际上他已经将联邦德国新的战略地位作为向盟国讨价还价的一块重要筹码了。

德国条约

“从今天开始，联邦政府郑重声明加入西方世界。”

——1951年11月22日阿登纳在德国条约草签日的发言

迄今为止，阿登纳对西方的种种让步政策都得到了回报。1951年3月，阿登纳以履行两个先决条件换得了西方盟国对占领法规的修改。这两个先决条件是联邦政府声明承担“战前德意志帝国的外债”以及战后所接受的经济援助贷款的债务；同时表示愿意参加共同分配军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这样，联邦德国在西方联盟内的地位得到第一次根本改善：经济、立法等方面的政策被放宽，并被允许设立外交部。1951年5月2日，联邦德国又被欧洲委员会接纳为正式成员国，这使它在建国后短短18个月中，为摆脱不独立不自主的处境、取得在欧洲集团中的平等地位的努力，前进了一大步。

朝鲜战争使美国政府感到建立有效的欧洲防务集团已经迫在眉睫，有关欧洲防务集团的谈判在普利文计划提出后业已展开。1951年6月23日，美国高级专员麦克洛伊在同华盛顿磋商后发表了一次记者谈话，他提出使德国联邦政府参加欧洲防务集团的三项条件。这三项条件是：第一，德国同组成欧洲防务集团的其他国家地位完全平等；第二，在德国驻扎足够的盟国军队，使德国人民感到安全；第三，在欧洲防务军中对德国人和其他国家人一视同仁。麦克洛伊的话代表了美国政府对改变联邦德国地位的看法。9月10日，西方三国外长迪安·艾奇逊、赫伯特·莫里森和罗贝尔·舒曼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德国参加欧洲防务有关问题。会议公布的声明强调：为使联邦共和国在平等基础上加入欧洲防务集团，三国将着手彻底改变同联邦共和国关系的性质。其后，高级专员们受各自政府的委托，尽快同联邦政府举行新的谈判，缔结对德平等条约来取代战后初期的占领法规。三国与联邦政府谈判的目标是要恢复联邦共和国的主权，使其有权订立欧洲防务共同条约。但是，由于德国分裂的事实和欧洲冷战形势，条约必须解决如下问题，即有关盟国在联邦德国驻军、柏林的地位以及德国重新统一问题等。有关德国条约的谈判自1951年9月24日起开始举行。

1951年9月24日，阿登纳按照预定的安排，来到法国高级专员弗朗索瓦—庞赛的住所埃尼希宫，与高级专员们就华盛顿决议所要缔结的德国条约开始进行谈判。会谈刚开始，弗朗索瓦—庞赛便交给阿登纳一份有关华盛顿外长会议结果的书面报告，同时还附加了一份有关德国条约的一般性协定草案，作为双方讨论的基础。

匆匆阅过，阿登纳立即发现协定草案既未维护华盛顿声明中所宣布的平等原则，也没有充分体现欧洲精神。华盛顿声明是以伙伴关系的思想为出发点的，而协定草案的内容实质上仅局限于废除占领法规。为了纠正这种偏差，阿登纳在会谈一开始便向高级专员们尖锐指出问题所在，并且指出协定草案中没有有关联邦共和国就东方集团的关系进行相互协商的条款，也没有有关安全保证的规定，以及在德国承担防务份额的情况下由盟国相应地承担军事义务的条款。

阿登纳提请高级专员们注意：一个国家只能在平等的和对等的基础上承担防务份额。华盛顿草案禁止联邦共和国生产飞机、重型武器和从事核子研究，而既然要建立一支多国参加的欧洲军，却对联邦德国施加如此禁令，显然是不平等和对联邦德国的不信任。特别是在当前德国人正要西欧一体化

最终作出抉择，表示赞成与否的时刻，联邦政府不可能就协定草案向德国人民作出合理的解释。既然要德国人准备牺牲生命和物质财富，而另一方面却没有相应地承担保卫联邦领土的条约义务，这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的。阿登纳还指出：1950年9月的纽约安全保证只是一种单方面的声明：单方面的声明也是可以单方面撤销的。阿登纳向高级专员们摊牌：“如果联邦政府在盟国所提出的条约草案上签字，那就是承认对我们的不信任是正当的了，我必须声明，没有一届联邦政府会在这样一种条约上签字的。”

在华盛顿会议开始前，阿登纳在同高级专员们的个别谈话中，曾经就将缔约提出过非正式的建议。在这次会谈之中，他把建议书交给了高级专员，要求以此作为谈判基础。在建议书中，阿登纳提出：首先，必须以联邦政府和西方三国政府之间的一项条约协定取代占领法规，明确保证联邦共和国的领土以及柏林的安全，使其免受外来的侵略。其次，对联邦共和国的领土和柏林应由下述联合保护：1.盟国部队，即美、英、法三国的陆、海、空军；2.德国部队。这两种军队必须在编制、结构、装备和指挥上按照完全平等的原则行事。最高指挥必须由有关各国共同组成，其最高司令职位应定期轮换，任期约为两年。同时，所有参加这一安全条约的国家，必须保证在它们的政策中避免做出危害联邦共和国领土或柏林安全的事情。缔约国一方或他方如果同东方集团国家签订特种协定，就必须对此加以考虑。必须清楚地表明，保卫联邦共和国领土是联邦政府和参加条约的西方三盟国政府的共同义务。所有同条约规定有关的政治问题，应由一个协商委员会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西方三国和联邦德国的代表在协商委员会中地位应完全平等。因此，应设想常设的大使会议来讨论所有原则问题，并监督履行安全条约赋予的义务。阿登纳还希望盟国认识到难民问题和被逐出家园者问题是联邦共和国异常沉重的社会负担，要求盟国承担责任，在必要情况下帮助联邦政府克服经济危机。

结合以上内容，阿登纳向高级专员们坦率表示，协定草案中有对联邦总理投不信任票和举行新的选举的规定，如果现在的谈判未能导致积极的结果，那就必然会为联邦德国内政造成严重后果。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再指望获得联邦议院批准舒曼计划。

高级专员们对阿登纳的意愿和处境表示理解，同时也对他的坦率表示感谢。英国专员柯克帕特里克说他曾参加过许多谈判，却没有遇到过有哪一次会议从一开始就像这样充满困难。柯克帕特里克和麦克洛伊设法协调双方的意见，表示西方盟国将尽力保证为德国建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柯克帕特里克认为目前的困难并非不可克服。麦克洛伊也向阿登纳强调，没有德国就实现不了盟国所希望的欧洲一体化。弗朗索瓦—庞赛向阿登纳解释，说双方在对协定草案中有关设置一个大使委员会的理解上存在误会。阿登纳认为，如果按照盟国草案设置了大使委员会，联邦德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将失去自由权。弗朗索瓦—庞赛指出，大使们只是在遇到需要就某些权利保留给三国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才举行会晤，并不干预各国的外交政策；大使委员会也决不会行使监督机构的职能，它除了保障条约协议在某些方面的履行外，并没有别的任务，相反，它是一个联邦德国也能发挥作用的混合委员会。

但在要求盟国承担经济义务和安全保障问题上，三位高级专员表示由于具体的困难，很难满足联邦政府愿望。麦克洛伊在看完阿登纳的建议书后不得不声明，没有一个盟国会建议在建议书上签字，只能将其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麦克洛伊告诉阿登纳，如果其建议书中阐述的有关安全保证和加强盟国在两德驻军的设想成为一项协定，那该协定必须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1950年9月的纽约安全保证虽然曾经得到了美国国会两院外交委员会的同意，但这些不过是如实反映情况的声明，无需经过国会批准。最有效的办法是将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所规定的北约组织义务的形式适用于德国，但北约组织条约中所规定的义务，对德国来说就不像纽约安全声明的内容来得有利。北约第五条规定，在发生侵略时，每个北约成员国可自行决定如何援助和以何种方式援助，这样的约束力是有限的。

对于驻扎军队和安全保障来说，要找到一种合适的形式也异常困难。驻扎的期限和兵力多寡是重要问题。柯克帕特里克认为就英国来说，这涉及到它所有军队的安全，并且存在宪法上的困难；而麦克洛伊则表示，在美国历史上，除了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承担过某些义务外，从来没有承担过这样的义务。

弗朗索瓦—庞赛也表示，联邦政府所建议的应把盟国承担在经济上帮助德国克服经济危机和失业的义务写进德国条约是办不到的。取消高级专员委员会、完全结束管制在盟国眼里已是一次重大的让步。

尽管阿登纳迫切要求尽一切努力不要把盟国的协定草案公诸于众，以避免引起公众对此的过激评议，不利于谈判的展开。但在第二天，9月25日，他接见社会民主党主席舒马赫和社会民主党联邦议院议会党团主席奥伦豪尔时，仍然惊奇地发现后者已详细获悉弗朗索瓦—庞赛向他所作的说明，以及盟国的德国条约草案内容。9月26日，当他向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有关谈判的报告时，再次惊奇感到议员们对有关内容的了解。阿登纳获悉是高级专员们同内阁和联邦议院成员的谈话使得消息透露，立即向高级专员们指出，在他所传达的谈判情况和高级专员们所介绍的情况之间出现分歧，只会引起不信任。

在德国国内，舒马赫和社会民主党正不遗余力地进行着一场反对舒曼计划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宣传。对于参加共同防务，舒马赫的理论是：“我们反正样样都会弄到手的。它们（西方盟国）反正非保卫我们对付东方不可，否则我们就会变成共产主义。”立足于此，社民党向公众宣传提高德意志民族主义要求，说通过舒曼计划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德国的经济力量和人力将被用来为法国的外交效力。社民党的宣传为阿登纳谈判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条约制造了很大困难。

法国对德国重新崛起的忧虑在德国条约的谈判期间表现得最明显不过。9月26日，法国政府给苏联政府发出了一份照会。照会申明法国无意触犯俄国，说法国十分关心维持1944年12月签定的《法苏条约》。很清楚，巴黎准备奉行两种政策：其一是追求实现欧洲一体化的目标，寻求同德国和解；其二则是想维持同苏联的关系，以牵制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影响的扩大。

10月10日，阿登纳在同高级专员们的谈判中，分别就德国在同苏联谈判时彼此协商的问题以及由于打算设置大使委员会所引起的问题达成谅解。作为交换条件，联邦德国也就德国尽快执行非卡特化向同盟国作出让步。缔结德国条约的主要问题逐一得到澄清。在这个过程中，普利文计划会议的工作进展得也很快。双方同意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草拟条约的具体条文。

专家们的工作进展迅速。1951年11月20日，阿登纳飞抵巴黎，与美、英、法三国外长举行会晤，这时关于德国条约的谈判已进入收尾阶段，只余

下了最后一项议程——举行签约仪式。

签约的前一天，美国驻巴黎大使布鲁斯设早宴款待阿登纳，并安排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阿登纳的单独会谈。

艾奇逊告诉阿登纳，未来 90 天正是命运攸关的重要时期，必须拟定并缔结关于重新规定联邦共和国和盟国关系的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必须抓紧时间。艾奇逊打算在 1952 年初把一大捆条约文件提交国会批准，其中将包括《对日和约》、《美澳新安全条约》、《美菲联防条约》、关于希腊和土耳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约，还有一俟埃尼希宫的谈判完成立即敲定的德国条约，等等。

阿登纳向艾奇逊表示感激和满意，同时，也急于摸清楚美国方面对法苏照会的看法，阿登纳解释说，“公众舆论中不时担心盟国有以德国作为筹码来同苏联达成谅解的企图。”

艾奇逊点头称是，望着阿登纳，慢慢他说道：“西方盟国之所以给人造成‘摇摆不定’的印象，主要是因为防务方面的财政负担非常沉重。由此影响了国内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选民强烈反对。”他又强调说：“尽管情况如此，但美国政府态度坚决，决不会摇摆不定，也下会将德国拿去同苏联作交易。”

看着神色凝重的阿登纳，艾奇逊觉得有必要再加以强调，遂道：“如果企图与苏联搞交易，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

阿登纳稍感释然。随后阿登纳和艾奇逊还就德国条约中有关和约和重新统一德国的第 7 条条文进行了详细的讨论。阿登纳提出对波德边界问题的担心，他说，“在奥得—尼斯河以东的领土问题上，联邦政府希望盟国不要对第三者，例如波兰，承担任何约束。并希望这一问题保留到将来的对德和约中去解决。”参加会谈的国务秘书哈尔斯但补充说：“联邦政府迫切希望通过援引某些原则，例如大西洋宪章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和约的内容。”阿登纳微笑着，瞧着艾奇逊。

艾奇逊明白他担心美国会扔下欧洲，撇开西德，于是保证美国将继续奉行现有政策。他说，“欧洲尽可以放心，美国会继续意识到它所承担的责任。”艾奇逊给了阿登纳一颗定心丸。在得到美国对边界问题的保证后，阿登纳长满皱纹的脸上笑意盎然。

11 月 22 日，在法国外交部举行了一次美、英、法、德四国外长会议。这是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阿登纳首次和西方国家的外长们坐在一起。四国外长草签了被称为“一般性条约”的德国条约。

阿登纳在舒曼致词后，不无兴奋地即席发言，他十分感慨地说：“我期望今天德国第一次参加的外长会议能有效地巩固德国的政治局势。联邦共和国可以说一向是悬空地处在东西方之间。从今天开始，联邦政府郑重声明加入西方世界。西方外长会议的决定使联邦共和国成为欧洲安全的一种强大因素和吸引苏占区的一个巨大力量。苏俄将认识到，它想用冷战手段阻挠德国参加西方一体化是不会成功的。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这将是巩固欧洲局势的一个重要步骤。”

艾奇逊、艾登也相继发言，纷纷强调这项条约的重要意义，认为它不仅是要把痛苦的过去一笔勾销，而且还要共同建立一个武装起来抵制未来危险的世界。欧洲一体化也许是几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事业，这个巨大的目标只能一步一步达到。今天就意味着这样的一步。

四国外长对现有的德国条约表示原则上一致同意，认为必须建立欧洲防务集团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的联系。这样，颇有争议的政治性问题在“一般性条约”中得到了解决。但是，各方在签订涉及技术性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所谓附加协定方面，尚未取得最后的一致意见。外长们决定将它留给商讨附加协定的专家委员会，并让专家委员会及早进行讨论。

按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表示的明确愿望，阿登纳估计，至迟到 1952 年 1 月，签署附加协定的时机就会成熟。但是，由于谈判过程中的困难以及国际形势的多变，使条约文本的最后完成与签署生效大大推迟了。

一波三折

“每当欧洲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时，萨尔问题总是一再冒出来，我感到这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1952年1月28日麦克洛伊写给阿登纳的一封信

1952年年初，当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时，法德两国之间突然出现了紧张局势。起因是法国从中作梗，挑起了萨尔问题与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

1952年1月25日，法国政府任命原法国驻萨尔布吕肯的高级专员格朗瓦尔为驻萨尔大使。此时欧洲防务集团的谈判行将结束，德国联邦议院已定于1952年2月7日和8日辩论参加欧洲防务问题，法国的行动又使联邦政府处境困难。

这时，国务秘书哈尔斯坦正代表阿登纳在巴黎参加一次外长会议，阿登纳立即指示哈尔斯坦，要求法国政府就突然任命格朗瓦尔一事作出说明。

舒曼对阿登纳的询问说明如下：格朗瓦尔虽然拥有大使头衔，今后的职务为外交使节，但其职能与此前法国驻萨尔地区高级专员的职能相同。舒曼用了一番外交辞令加以搪塞。然而，就在哈尔斯坦从舒曼那里得到上述答复的同一天，法国驻德国副高级专员贝拉尔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宣布萨尔地区今后将在巴黎设立一个外交使节作为代表，而在法国驻其他国家的各种外交代表机构中将增设萨尔地区的代表。贝拉尔讲话将舒曼的底牌和盘托出。

法国人在萨尔问题上演出的双簧戏使阿登纳大为恼火，他指示哈尔斯坦要求法国政府进一步就此作出澄清，并强调在没有接到进一步指示前，如果巴黎召开有关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会议，就拒绝参加投票。紧接着，阿登纳在1月27日发表了一份联邦政府新闻公告，宣布联邦议院目前能否按原定计划就参加防务问题举行辩论还是个疑问，他想以此向法国施加点压力，同时也好对国人有个交待。

法德就萨尔问题产生的新摩擦，使美国颇感不快。为此，麦克洛伊于1月28日给阿登纳写了一封信，敦促尽快解决问题。信中说，“每当欧洲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时，萨尔问题总是一再冒出来，我感到这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我希望我们能够立即再度抓住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且现在就把它解决掉，不要等到和会上再去解决。我感到，只要我们不是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它就会一直使我们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

麦克洛伊在休假期间滑雪时受伤，此时正住在慕尼黑的一所美军医院里接受治疗。1月30日，阿登纳派遣国务秘书哈尔斯坦、伦茨以及部务主任布兰肯霍恩前往慕尼黑，希望借麦克洛伊之口，要求美国国务院介入德法萨尔争执，提请法国政府遵循1951年4月18日法德两国交换信件中所规定的原则，要求其再次声明恪守诺言，不在萨尔问题上制造未经双方商议的既成事实。阿登纳希望美国政府向法国建议，允许在萨尔举行自由选举，并保证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

麦克洛伊更为关心的是阿登纳1月27日有关推迟联邦议院关于欧洲防务

即1951年4月18日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签署时阿登纳与舒曼交换信件，明确表示法德双方都不得事先确定萨尔的最终地位。

问题辩论的声明，这意味着必然打乱原来确定的许多日程期限。麦克洛伊建议发出通知，召开一次萨尔问题的会议，但哈尔斯坦和伦茨立即向他指出举行这种会议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如果这次会议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那就会使联邦政府的处境更加困难，更不能想象就防务问题在联邦议院的辩论能获得顺利通过。哈尔斯坦表示，如果法国人不就萨尔地区举行自由选举作出保证，联邦议院辩论德国参加防务问题也将十分困难。麦克洛伊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对法国采取的步骤几乎没有多少成功的把握，因为美国不久前拒绝了法国政府提出的在印度支那给予大规模援助的要求。

双方商议的结果是，麦克洛伊答应把阿登纳的要求转告美国国务院；而德国联邦议院关于德国参加防务问题的辩论，也将按原定计划于 1952 年 2 月 7 日和 8 日举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 月底在巴黎举行的讨论北大西洋公约问题的外长会上，哈尔斯坦根据阿登纳指示发表了讲话。法国报刊转载了这次讲话，并把它说成是德国突然提出要求参加北约组织，是要借此对法国施加压力。2 月份德法两国议会都将就欧洲防务问题举行辩论，上述舆论在法德两国都引起不小反响。如何排除干扰因素，捕捉发展时机的问题，尖锐地摆在德国领导人面前。

阿登纳认为欧洲防务集团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其思维逻辑是：如果联邦德国参加欧洲防务集团，则德国人必须要参加欧洲军；而只要目前世界的紧张局势持续下去，欧洲军就将由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指挥。当时的最高司令是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而艾森豪威尔又隶属于大西洋公约的其他机构。在欧洲防务集团成员国中，联邦德国是唯一没有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那么，只要联邦德国参加到欧洲防务集团，总有一天它会发展成为北约组织的成员国，这将是完全肯定并且顺乎自然。阿登纳认为在 1951 年 11 月的巴黎外长会议讨论时，外长们对欧洲防务集团和北大西洋公约之间必要的和自然的联系都表示赞同；在德国条约草案的序文中也明确指出，缔约国的共同目的是使联邦德国以平等地位参加欧洲集团，因而“欧洲集团本身包括在正在发展中的大西洋集团之内”。

正因为这样，1952 年 2 月 4 日，阿登纳向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联邦议院议会党团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讲话，说明德国条约和建立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谈判情况，并且声明对萨尔问题以及联邦共和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关系都要令人满意地予以澄清。

第二天，阿登纳的讲话在德国报纸上被刊载出来，声称阿登纳认为在德国有关萨尔和联邦共和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愿望得以实现以前，联邦政府不能签署德国条约、附加协定以及欧洲防务集团协定。这项报道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引起了一场风波，为即将到来的 2 月 11 日国会辩论投下了阴影。

1952 年 2 月 6 日，英王乔治六世逝世。阿登纳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接到了参加葬礼的邀请，他于 2 月 14 日飞抵伦敦。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法国外长舒曼当时都聚集伦敦。在英王的丧礼结束之后，2 月 18、19 两日，艾登、艾奇逊、舒曼三外长和阿登纳一起就迫切需要克服的有关障碍以及需要澄清的有关问题举行伦敦会议，充分进行讨论。

这实际上是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署之前法德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一次全面磋商。磋商结果将直接影响到法德两国就防务问题的议会辩论。这时，法国国民议会和内阁会议同时在进行。由于不能预测到法

国方面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阿登纳感到极为紧张。如果法国国民议会反对参加欧洲防务集团，必将封闭阿登纳重新武装走向主权恢复之路。

最棘手的问题，依然是法德两国相互信任问题。法国人最担心的是一旦联邦德国加入欧洲防务集团，甚至加入北约，德国人在欧洲将不受约束。法国曾经要求美英两国答应作出总的的安全保证，以防联邦共和国万一退出欧洲防务集团而自行其事。伦敦会议上，法国重提了这个请求。阿登纳为使法国放心，重申联邦德国将全力纳入欧洲一体化。他向艾奇逊和艾登声明，美英之中无论哪一国，为加强欧洲防务集团并维护其团结，均可作出安全保证，其前提是：“这种保证并非单方面针对联邦德国，而是适用于欧洲防务集团内所有的参加国。”

法国人关心安全保证，阿登纳更着重平等合作，双方并非绝对对立，法德两国在伦敦会议上协调立场，使寻求共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阿登纳和舒曼在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防务集团之间联系的问题上找到共同点。法国国民议会曾经在一项决议中声明，反对联邦德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由是：北约是一个纯粹防御性组织，而联邦德国却提出某些领土要求，法国担心联邦德国的参加会使北约组织的性质发生变化。阿登纳和舒曼以巴黎会谈建议举行的北约和欧洲防务集团部长理事会的联席会议为基础，一致同意加强这两个组织的联系以及就涉及两个组织的共同事件问题相互协商。具体来讲，双方确认，在北约理事会和欧洲防务集团部长理事会这两个机构中，只要有一个成员国希望举行联席会议，就应举行；此外，只要北约或欧洲防务集团的一个成员国认为，它们之中某一成员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或者北约、欧洲防务集团的存在或欧洲一体化受到威胁，也应举行这种联席会议。阿登纳向三外长申明，联邦德国一如既往保持成为北约组织成员国的愿望，并强调联邦德国只希望以和平手段实现德国重新统一，这样一来，北约组织的性质就不会由于接纳联邦德国而有所改变。

同时，阿登纳和舒曼还就解决萨尔出现的麻烦问题，举行详细的会谈。尽管没有达成最后的解决办法，但出现了取得谅解的可能。两人一致认为，除非萨尔居民自己表示态度，无论法国还是德国都不能对萨尔的命运作出最后的决定。

在伦敦还谈到有关合成员国承担防务问题、处理战犯问题、以及关于联邦德国建立军事工业问题、关于禁止和监督武器生产以及联邦德国普遍安全管制问题等，各方辩论极为激烈，阿登纳感到盟国，尤其是法国，对德国的威胁依然感到担心，盟国要求德国再三作出的保证也十分过分，于是向外长们指出：如果老是盯住一个伙伴，叫他必须证明自己有良好的意愿，那就会使人产生一种极坏的印象。他打了一个比喻，一个正在参加入伙的人还没有进来就得声明上三次，说自己是个老实人，抱的只是良好的动机。谁都会感到这是一个古怪的伙伴。联邦德国正处于类似情景。盟国还要求它就这个问题三番四次地许下诺言，以证明它的良好动机。任何人都会明白，如果没有良好意愿，声明和协定就毫无意义。阿登纳提醒盟国，德国的警察没有任何武器，人们没必要害怕赤手空拳的人。联邦德国内目前驻有配备重武器的美国师和英国师，而且随后还要驻扎欧洲防务集团部队，对联邦德国的过分担心是毫无道理的，尽管作为战争的经历者，他本人理解这种担心。

指联邦德国在当时不把奥得—尼斯河界作为波德之间永久边界，并且还希望实现德国东西部的统一。

伦敦会议总算澄清了联邦德国与法国之间的一些疑虑，这样，尽快促成条约的缔结成为各方抱定的共同愿望。阿登纳对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采纳了下述表述感到十分满意：“四国外长一致同意，应该继续采用民主和平手段争取德国重新统一。”

德国条约打通了联邦德国通向主权之路，却给人以阿登纳为恢复主权而不惜承认两个德国分裂现状之感，通过公报，阿登纳惜以向世人传达，他和他的政府决没有放弃在西方联盟的帮助下统一两个德国的愿望。

尽管初步解决了法德之间根本性分歧，但有关条约文本的讨论仍然进展缓慢。1952年4月中旬，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告诫阿登纳以及所有参加国政府，如果继续拖延时日，结果可能赶不上美国国会的议程，美国国会至迟要在5月中旬讨论有关目前安全援助拨款的问题。如果欧洲防务集团的努力得不到圆满结果，美国政府就难以提出充分理由使这笔款项得到国会批准。并且，艾奇逊提出，如果欧洲继续作出在这方面有进展的空洞诺言，他担心将使美国人感到丧气，他们会以为欧洲人在共同防务事业上只知争吵而无力联合行动。

艾奇逊的告诫发挥了作用，加快了缔约进展。转眼到了5月，缔结工作终于进展到可以具体确定签署的阶段，可正在这时，5月1日，联邦德国自由民主党全国执委会、自由民主党联邦议院议会党团理事会和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自由民主党代表联合举行了一次讨论，建议要对德国条约作出重大修改。5月6日，自民党主席、联邦副总理兼部长布吕歇尔给阿登纳写了一封信，要求考虑自民党提出的牵涉面很广的修改意见，并提出，由于条约本身的重大意义，即使缔约谈判因此需要推迟一段时间，也是值得的。有关德国条约的谈判成果看起来再次濒于危险。

阿登纳当天即给布吕歇尔回函，对他的请求予以反驳，指出：如果他考虑了自民党的建议，就有可能使其它议会党团以同样的方法要求提出修改建议，这种做法必将使整个条约陷于流产。倘使法英美三国采取同样的做法，谈判就会无限期延长，这样将会极其严重地危害德国的未来利益，并使整个事情陷于混乱不可收拾的局面。阿登纳在信中这样写道：“我相信，您的愿望无疑是好的。但是，看了您的来信，我几乎要认为，照此办理，一切外交政策都会完了，随后在内政上将会产生何等样的后果，我只要提一笔就够了。德国外交政策的前途因此将大成问题。我感到我们的许多先生们对咬文嚼字兴致勃勃，却忽视了事实和我们所处的危险境地。”

未了，阿登纳提醒布吕歇尔注意，在2月进行联合执政议会党团有关辩论前，已经就一般性条约的内容作过详细介绍，之后每一个内阁成员都收到了条约的全文，而自那时以来，一般性条约未作丝毫改动。西方三国已于1951年11月的巴黎会议上同意了条约，如果德国在签字前夕再要求修改，德国外交政策可靠性的信誉就会扫地以尽。

1952年5月中旬，巴黎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会谈与波恩德国条约会谈全面结束。根据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建议，决定于1952年5月26日在波恩签订德国条约；第二天，即5月27日，紧接着由参加国外长在巴黎签订欧洲防务集团条约。

5月23日，整个条约文本的缔结前夕，又险遭破弃之灾。这一天，法国内阁会议决定，必须根据新的条件，才能签署和建议批准以上两条约。

在2月的伦敦谈判时，法国曾要求美英对出现一个成员国（意指联邦德

国)退出欧洲防务集团时作出安全保证声明,之后法国与美英之间就此举行了谈判。此时法国内阁会议认为美英两国作出的声明的力度还嫌不够,要求作出更明确的保证,即要求美英声明保证反对德国重建独立自主的国防军,并要求盟国保证考虑法国在海外承担的军事义务,并把这一立场在一项总声明中确定下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消除法国国内的忧虑,即法国由于在印度支那、北非阿尔及利亚等承担了海外义务,将来有朝一日在欧洲防务集团中可能会处于比德国较弱的地位。

5月23日,三国外长聚齐波恩,艾奇逊、艾登、舒曼和阿登纳再度坐在一起,讨论舒曼带来的法国的新要求。

为了不影响条约的签署,使盟国各方几个月来的努力付诸东流,美英两国注意满足了法国的部分愿望。美英两国声明:如果欧洲防务集团的一体化或统一受到任何一方所采取的任何威胁步骤的话,美英两国政府就将把这样一种步骤看成是对它们本身安全的威胁。美英两国承担义务,在欧洲保持一支其兵力足以保护北大西洋区域和欧洲防务集团一体化安全的部队。法国政府这才表示满意。

关于支持法国的北非政策和印支政策的要求,美英没有立允作出声明,艾奇逊对法国的答复是这样的:支持取决于法国政府的政策。

阿登纳也力求争取美英的支持。在外长会谈中,阿登纳表示:截至目前为止,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生效已经彼此联在一起了。如果一个参加国(比如法国)由于某种原因而推迟或甚至反对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为了应付这种情况,联邦德国也需得到保证,至少使德国条约部分生效。按照原定的程序,联邦德国必须要等到所有参加国全都批准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时才能获得自己的全部主权,阿登纳请求作出保证,在迟迟得不到批准的情况下,不妨先让德国条约中规定的某些条款生效。艾奇逊和艾登立即声明准备同意这个要求。舒曼在一番犹豫之后,也表示了同意。

阿登纳得到了书面保证:倘使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推迟生效,就将召开一次三个占领国的会议,联邦共和国也参加,就德国条约的生效问题进行磋商并作出决定。这种可能的情况,后来竟被阿登纳不幸而言中,此乃后话。

5月25日晚,舒曼终于接到法国内阁会议通知,认为美英作出的保证声明已经足够了。签约的障碍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才完全排除。

1952年5月26日,星期一,上午10时整,《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三国关系的公约》(即“德国条约”或称“波恩条约”)的签署仪式在彼恩联邦参议院大厅隆重举行。参加签字仪式的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长舒曼以及联邦德国总理兼外长阿登纳。联邦德国社会各界的许多头面人物,如联邦议院各党派代表和各州总理,均应邀出席。

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派代表参加签字仪式。舒马赫自始至终强烈反对签署德国条约。在5月22日接见合众社记者时,舒马赫说“谁同意这个一般性条约,谁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但是,自1951年9月的华盛顿会议以来,经历了8个多月的反反复复,德国条约终于顺利签署。5月26日下午,阿登纳与艾奇逊、艾登、舒曼飞往巴黎;次日,即1952年5月27日,星期二,上午,由比、德、意、荷、法、卢六国外长在法国外交部钟厅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条约》(即《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或称“巴黎协定”)。

尽管德国条约只是联邦德国和西方盟国之间的一种暂时性和约,但是,阿登纳认为,对于战败的德国来讲,这已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巨大进步。由于

签订了德国条约，占领法规被取消了，将由大使取代高级专员；军事安全会和其他许多盟国管制机构行将解散；对德国经济、科学和研究工作的无数限制也将予取消。过去联邦政府所承担的防务费用中，有几乎四分之三是必须根据外国命令支付的，联邦政府根本无权过问这些款项的使用情况。现在，根据条约规定，由单方面强加的占领费用变成了有待协商确定的防务费用。条约中关键性的重要一点还在于，由于签署了条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了西方盟国的伙伴，西方国家承担了和联邦德国一起争取和平重新统一德国的义务，这样，西方大国不可能再撇开德国去举行谈判和达成协议了，西方牺牲德国去和苏联取得谅解的危险也就不会存在了。

德国条约的序文中明确写道：

“英、法、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四个缔约国的共同宗旨，是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加入欧洲集团，这个欧洲集团本身将纳入正在成长的大西洋集团之内。

“用和平的方法使德国恢复为一个完全自由统一的国家并通过自由谈判缔结和约，仍然是各缔约国共同的根本目标。”

俄国人的“诱饵”

在德国对外政策中，现实的想法和理智的前提是，要考虑现有的世界形势，从中为德国寻求一个最理想的地位。

——《阿登纳回忆录》（一）

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国际舞台事态的发展可以简单归结如下：

随欧洲衰落，美苏崛起，以欧洲分裂、德国分裂为标志，两个巨大的实力体系建立起来了：一个是苏联为领导的东方集团，一个是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集团。

苏联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条约牢牢控制了东欧；西方实力体系则表现为北大西洋公约和其他一系列防御性联盟和协定。

苏联在德国东部地区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并加强了它与这个政权的联系；而西方也筹划通过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使西部的联邦德国加入西方的安全体系。

从1951年9月起，西方便进行着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谈判，一俟这些条约生效，德国的东部和西部就将完全被割裂。德国统一至少在东西冷战尖锐对立时期是看不到希望的。

1952年春天，在阿登纳与西方三国就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谈判最为紧张的时期，苏联突然主动将德国问题提上桌面，再次建议召开四大会议讨论德国问题。

3月10日，苏联向法、英、美三国驻莫斯科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求消除“欧洲战争虽然已经结束接近7年，但对德和约仍然没有缔结”这种“不正常状态”，敦请有关各国“立即考虑对德和约问题”。照会还附有一份对德和约的草案，草案中指出“缔结对德和约对巩固欧洲和平具有重大的意义”，能“最终解决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种种问题”，并且强调“草拟和约时，必须有德国参加，亦即由一个代表德国的全德政府参加”。苏联提出了作为对德和约基础的一系列原则，主要包括：

在政治军事方面，统一的德国领土范围必须以四大国波茨坦会议各项决议中所确定的疆界为准，保证使德国发展成为独立、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保证德国人民享有基本民主权利，保证各民主党派团体的活动自由，但是必须取缔一切敌视民主与和平事业的团体；前德国军队的一切成员，包括军官和将领，一切前纳粹分子，除曾经因犯罪而被法庭判刑者外，一律享有和其他德国公民同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德国可以拥有保卫国土所必需的、自己国家的武装部队（包括海、陆、空军），可以生产军需物资和军事装备，但德国有义务保证不参加任何一个旨在反对曾经参加过对德作战国家的任何集团或军事联盟，军需生产的数量和种类亦仅以满足和约所规定的德国武装部队的需要为限，不得超过。

经济方面，苏联的条约草案对德国和平发展经济不作任何限制。

苏联3月10日的照会发出以后，阿登纳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领悟到苏联照会及其和约草案的意义非同寻常。由于正是两条约谈判最关键时期，阿登纳判断这只是俄国人借以阻挠联邦德国加入未来欧洲政治集团的企图。和约草案中关键的一点是，德国应当承担义务，不加入旨在反对任何曾参加对德

作战国家的任何集团或联盟。这也即是说德国应信守中立。如果这样的话，统一的德国就不能加入统一的欧洲，统一欧洲本身也就无法建立。中立化的德国只是一个没有权力的政治形象，而苏联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巨大优势将在德国取得决定性影响，能随时将德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借此控制整个欧洲。

阿登纳认为，如果只是看到苏联照会中所作的一些表面让步，看不到在受到孤立以后所面临的危险，那就大大错误了。这些让步只是为了蒙蔽德国人民。苏联政府的目的昭然若揭，其基本的政策目标一如既往，仍然是阻挠欧洲统一。苏联希望借此搞长期谈判，使这一时期本来就困难重重的有关欧洲防务集团的讨论陷入僵局。俄国人在照会中抛出了一个诱饵：“德国人本应拥有本国的陆海空武装部队”。这与法国人在欧洲防务集团谈判中竭力将德国军队打入另册，赋予多项限制条款形成对照，但是，更应该注意到，苏联在过去几年来的政策从未显示过那怕只是最起码的迹象，表明它说的这些话具有符合与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实际内容。阿登纳还认为在当今原子武器和遥控武器的时代，德国单靠自己的力量也不能建立起自己有效的武装力量。无论从经济方面或是在现代化研究方面的落后情况来说，德国都无法靠自己的武装部队来保卫本国领土。因此，苏联照会的另一企图，无非是要煽动德国人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

阿登纳对盟国方面感到担心，怕苏联在这个节骨眼上抛出的诱饵会破坏西方的团结，从而直接损害拟议中的两条约。3月17日，阿登纳将对苏联照会的意见向三个高级专员作了通报，并与他们一起就此进行了详细的磋商、交谈。

3月20日，阿登纳趁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开会的机会留在巴黎，与法国外长舒曼、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美国驻巴黎大使邓恩再次进行详细会商。

西方三国在充分考虑了阿登纳的意见并相互协调了立场后，3月25日，西方国家给苏联发出复照，提出只有创造了作为建立全德自由政府必不可少的基础——自由选举——这一先决条件，才能开始讨论缔结对德和约。美国在照会中特别指出：要“缔结一项结束德国分裂局面的公正而持久的和约”，“就必须建立一个体现德国人民意志的全德政府，这样的政府只有在联邦共和国、苏占区和柏林进行自由选举的基础上才能成立。只有在德国人民的民族自由和个人自由获得保障的情况下，这样的选举才能进行。”

针对苏联提出的波茨坦会议划定的疆界问题，美国特别强调了边界问题：波茨坦会议实际未对德国疆界作出最后规定，会议只明确了一点，即领土问题须留待缔结和约时作出最后决定。

其他西方国家的复照中都明确指出、无论在和约缔结之前或以后，全德政府都应拥有达成“符合联合国的原则与宗旨”协议的自由。这表明西方一开始就拒绝了苏联使德国中立化的设想。

4月3日，在阿登纳的努力争取下，德国联邦议院对西方国家与苏联交换照会一事也表了态，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基民盟—基社盟、自由民主党和德意志党的下列提案：

“联邦议院同意联邦政府1951年9月27日的声明，重申德国政策的最高目标，是在自由和统一的欧洲中使德国重新获得统一。”

“ 联邦议院认为 1952 年 3 月 10 日至 25 日苏联与西方三国互换照会 ,是对澄清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作出的重要贡献 ,并且证实联邦政府为重建一个全德的民主法治国家的努力是适宜的。联邦议院要求联邦政府再次敦促各占领国 ,以 1952 年 2 月 6 日旧联邦议院批准的选举条例为基础 ,并在国际保证下举行成立全德国国民议会的自由选举 ,同时保证在这种选举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机构拥有决定内政和外交事务的自由。

“ 联邦议院表示这样的期望 ,联邦政府与西方各国关于取代德国占领法规和关于安全条约的谈判仍将继续进行 ,并将谈判结果通知联邦议院。

“ 在进行有关恢复德国统一和缔结和约的国际谈判中 ,所有支持德国观点的有关材料 ,要求联邦政府整理后送交联邦议院。 ”

德国联邦议院在 4 月 3 日还作出如下决定 : “ 没有一个在自由中统一起来的德国 ,欧洲就不能建立起持久的、以各国人民广泛与密切合作为基础的和平秩序。因此 ,恢复德国的统一是欧洲的愿望和联邦共和国最主要的政治目标。 ”

需要指出并且肯定的一点是 ,苏联在 3 月 10 日的照会中的确抛出了一个诱饵 ,即是以使德国成为奥地利式的中立国为条件 ,来实现德国统一。从 1952 年 3 月起延续至 9 月止 ,俄国人加强了这一攻势。在此期间 ,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总共交换了 8 个照会 ,即苏联方面的 1952 年 3 月 10 日、4 月 9 日、5 月 24 日和 8 月 29 日照会以及西方国家 3 月 25 日、5 月 13 日、7 月 10 日和 9 月 23 日照会 ,形成了 1952 年的东西方 “ 照会大战 ”。苏联的照会攻势在当时西方国家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姑且暂不问苏联动机如何 ,但照会本身内容在西方国家间 ,以及西德国内曾经一度成为 “ 不和的苹果 ”。

苏联在 4 月 9 日的复照中走得最远 ,指出解决德国问题 “ 对巩固欧洲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符合对德国人民的合法民族权益采取公正态度这一要求 ” ,因此 ,建议西方三国能够同苏联一起 , “ 毫不迟疑地讨论有关举行全德自由选举的问题 ”。但对西方国家提出的要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一事 ,苏联以 “ 这种建议与联合国宪章相矛盾 ” 为由予以了拒绝。

苏联的建议大大激励了过去就持有中立化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社民党和一些自民党人都认为这是实现德国统一的良好时机。社民党一直在攻击阿登纳政府奉行西欧一体化政策使德国付出了不能实现东西统一的沉重代价 ,此时更多人对苏联的建议寄予了希望 ,主张通过认真的谈判来考察苏联建议的严肃性。4 月 22 日 ,反对党领袖舒马赫给联邦总理阿登纳写了一封信阐明了这种观点。

舒马赫指出 ,联邦政府 “ 必须向西方三国政府陈述德国的这一共同观点 :应当尽一切努力搞清楚苏联照会中是否提出了在自由中实现重新统一德国的可能性。为了搞清这一点 ,应尽速举行四大国谈判。

“对于保证所有四个占领区和柏林在同一条件下进行选举所必需的国际监督 ,德国方面应提出若干变通的办法 ,以供讨论。这些办法是 :

1. 四大国要求联合国在对选举进行国际监督中发挥良好作用。

2. 四大国一致同意由中立国家组成的、对选举进行国际监督的委员会。

3. 如果四大国愿意亲自执行监督，那就得保证四大国中的任何一国不得损害或偏袒德国的任何一个政党。……

“苏联4月9日照会，提供了由四个占领国组成委员会对自由选举的先决条件进行审议的可能性。实际上，这一建议意味着苏占区政府在研究自由选举的先决条件方面，认识到一向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是不对的。照我的看法，应充分利用这种审议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委员会开始工作，就可以提出诸如观察苏联设置的监狱等项要求，这当然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苏联的建议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假如联邦德国放弃加入西欧一体化，特别是放弃加入欧洲防务集团，德国的重新统一或许真的可以实现。战后德国中立主义、民族主义的势力很大，社民党的舒马赫和基民盟在柏林地区的头面人物雅各布·凯泽就是典型的代表。到底是促进上述西方两个重要条约尽快签订，使西欧一体化的重大步骤得以完成呢，还是迎合苏联以及本国反对派的意愿，争取一个中立化的德国统一的前景？这不是一次真正的实现德国统一的机会？——阿登纳总理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政治抉择。

苏联的攻势在西方国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部分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人也有类似想法。尤其是在法国，苏联照会中关于召开一次四国会议的提议得到了积极响应。1952年6月11日，法国政府发表了一项公告，这项公告使法国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活跃起来。公告表示：

“法国政府欢迎四国会谈，但此种会谈只限于对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的统一直接有关的内容明确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决定，应由有关四国全体作出。在目前谈判阶段，尚不能提供关于这一问题的明确内容。”

英国人的态度也很有意思。6月10日，当工党议员诺埃尔·贝克提出质询，说四国会议是否比继续交换照会能更快地弄清俄国人的意图时，艾登说：“我并不排除这样的想法。”

只有美国人态度强硬，美国人至始至终认为在这一时刻举行四国会谈是不适宜的。艾奇逊坚信，同苏联可能进行的谈判还不会有什么用处，他努力设法对法、英两国政府及社会舆论施加影响，以便最后作出明确的决定。

在这个时候，阿登纳坚定不移地表现了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立场。他不遗余力地驳斥社会民主党人有关响应苏联中立、非军事化统一德国的观点。

苏联第三次照会（即5月24日照会）的发出正好在5月26日、27日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定的前夕，公众中就批准两个条约是否意味着德国东西两部分无法统一的争论十分激烈。阿登纳全面反驳这种毫无意义的判断。他指出：一旦两条约生效，联邦德国将参加到历史上最广大的防务体系中，能得到可以设想的最大安全，并且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再也不是任人摆布的对象，并且成为合作共事者。这对于处于东西方两大实力集团间鏖战地带的德国来说，是通过和平途径，消弥现有紧张局势，实现在自由情况下统一德国的最好选择。

阿登纳设法让公众明白，联邦共和国没有西方国家的支持就不可能存在。他当时分析道，从政治观点来看，德国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它处在欧洲的中心，又无可保无虞的边界。自从上一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就在寻找盟友。最初“铁血宰相”俾斯麦想通过1872年建立的德奥俄三皇同盟为自己

找到盟友和安全，但俾斯麦很快看出，单纯地建立在君主制思想基础上的同盟不可能长期稳固。三皇同盟很快就破裂了，于是随后形成了两个同盟体系：1882年的德、奥匈、意三国同盟和英、法、俄三国同盟。俄法联盟早已存在，后来在德尔卡塞的倡议下，1900年至1904年成立了英法间的亲密协约，这一演变过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作好了准备。二战后，欧洲又形成了两大实力集团的对抗，为了确保自由，联邦德国比任何时候都要依靠同盟者，在权力真空的游离只会使德国像东欧一样，失去自由，完全为苏联所控制，只有西方防务体系才能确保欧洲和德国得到自由与和平。

另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是，联邦德国加入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组织，是否会刺激苏联转而发动进攻。阿登纳指出，尽可能保持软弱并不能阻止一个高度武装的极权国家进行侵略。近20年来的历史提供了两个最好的例证：当希特勒扩充军备的时候，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方面最初毫无动静。由于希特勒知道这些国家军事上软弱无力，所以等到他自以为强大到足以很快赢得胜利时，他就动手干了起来。如果在希特勒开始扩充军备时其他国家也加强防御力量，希特勒决不会胆敢发动战争。

1945年后的情况也类似。由于苏俄保持了战争时期强大的武装，而其他各国则在裁减军备，所以苏俄肆无忌惮地使用它的军事优势征服了现在的东欧卫星国。尽管苏联当初有这个实力，但假如苏联不得不担心其他国家会出面阻止的话，它是不会这样干的。

因此，结论只有一个：西方防务力量加强一分，苏俄不会转而搞热战的可能性也就增长一分。

东西方以后的照会交换内容停留在双方原则以及具体问题的分歧上，西方国家主张以自由选举和确定一个公正的调查委员会作为重新统一德国和缔结和约的第一步，这一委员会应对两部分德国进行调查，以便确定为成立一个有资格的自由的德国政府而举行的自由选举是否业已具备先决条件。而苏联在原则上是不同意一个代表自由政府的德国举行谈判和缔结和约的，因此坚持于己有利的德国中立和非军事化统一的立场。“照会战”以苏联对西方国家1952年9月23日的照会置之不理而告终。显然，西方不想冒让德国实现中立化统一这样的风险。对此，艾奇逊之后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经讲过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如果必须让我在一个中立化的德国和一个苏联阵营中的德国之间进行选择，那么似乎是选择处于苏联阵营中的德国更好一些。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中立化更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选择。”这段话说明当时西方国家对德国问题的基本政治考虑，是必须使德国成为一种“可以预测的势力”，而“一个由共产主义分子和分子统治的德国”却是完全不可能预测的。阿登纳的立场赢得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他的绝对信任。

从这时开始，俄国1952年的照会成为联邦德国和西方国家激烈讨论的重要话题。直到1958年西德联邦议院的一次辩论中，还就此发生了剧烈争执。支持阿登纳的人认为苏联在1952年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为德国重新统一提出过可接受的条件，即实现全德自由选举，牺牲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照会攻势的目的是在于“安内”和“干扰”，即以主动出击的态势全力以赴巩固自己的阵营，促进民主德国的稳定，同时借此把西方拖入一场无休止的谈判中，以拖延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签定。另一种说法则是所谓的“机会错过说”，认为1952年斯大林照会是准备认真对待德国重新统一，而

问题仅仅在于斯大林到底想走多远。因而西方国家应该通过直接谈判来进一步探测斯大林的意图。然而，阿登纳和西方都不愿选择德国实现中立化统一这一“危险的解决办法”，认为西德加入西欧一体化，在欧洲统一实现德国统一更有益，所以提出了苏联人不可能接受的建议，如全德政府要享有行动自由等，从而错过了德国统一的一次历史性的机会。

这已成为一个争辩不清的历史问题。无论怎样，若是出于干扰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署的目的看，苏联的照会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发挥了作用。无论在巴黎或是在伦敦，人们对批准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总是迟疑不决，德国国内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抵制而延搁。各国对这两个条约迟迟不作出进一步决定，最终使其束之高阁。这一结果令阿登纳最为痛心疾首。

三读条约

这是一项在制定基本法时根本谁也不敢设想的成就。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成就，这是因为联邦政府自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选择了一条演进的道路，一条逐步继续前进的道路；这是因为它没有采取那种吃了败仗的人民会具有的一些执拗而颇不聪明的立场——“要么全部，要么全不”。

——《阿登纳回忆录》（二）

缔结德国条约表明阿登纳政府向盟国争取独立的自决权的工作暂告一段落。正当需要巩固这些所取得的成就和通过批准这些条约以恢复联邦共和国自决权的时候，反对党又一次来阻挡阿登纳的道路。

1952年5月26日签定德国条约的这一天，舒马赫和他的党拒绝出席签字仪式。直到1964年阿登纳下野后写回忆录的时候，仍然感到社会民主党反对这些条约的态度，对他来说“简直是个谜”。阿登纳认为德国条约的签定可以为联邦德国带来恢复主权的前景，从而可以最终避免西方三盟国背着联邦德国去和苏联搞政治交易的巨大危险，防止联邦德国成为四个盟国不同利益的牺牲者，他认为，“检验任何政策的最终尺度是看它的成果”，条约签定后，联邦德国将摆脱仰人鼻息和完全孤立的地位，并将成为欧洲联盟的先驱，这与1949年德国的情况相比，将会发生质的变化，社会民主党完全没有理由要如此强烈反对它们。可事实确实如此，社会民主党不仅反对这些条约，而且搬出了法律武器，联邦德国国内为此而展开的激烈辩论使对两条约批准的时间一直推迟到了1953年3月，签定条约时对德国有利的国际形势到那一刻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前面已谈到，社会民主党拒绝订立两条约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苏联1952年春夏的那些照会中看到用中立化方式重新统一德国的希望。以此推论，社民党反对这两个条约，是认为条约将联邦德国同西方捆在一起，使联邦德国完全失去周旋于东西的立场，从而也就失去通过东西谈判缔结和约统一德国的希望。社民党尤其反对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认为这个条约尽管说是防御性质，却是针对苏联，联邦德国没有必要因此开罪激怒苏联，失去统一良机。社民党声称，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上没有规定要建立武装部队，因而如果要在法律上批准联邦共和国加入欧洲防务集团，就意味着变更宪法。

1952年1月31日，在有关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缔约国政府会谈正在全面进行时，社民党联邦议院议员阿道夫·阿恩特和伯恩哈特·赖斯曼受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全体联邦议院议员在内的144名议员委托，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了一项对基本法原则的监督诉讼，要求联邦宪法法院确定，“未经补充和修改基本法就规定德国人参加军事武装力量或者使德国人承担服役义务的联邦法律，无论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不符合基本法。”此即所谓防御性的“准则控制诉讼”。社民党议员希望通过起诉，在议会通过之前就断定它违宪。

这项有关基本法原则监督诉讼的提出，在当时为联邦政府签定这两个条约造成了很大困难。条约签署后，又直接影响到它的批准。

按有关规定，联邦共和国必须是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和德国条约的第

一个缔约成员国，如果连德国议会是否同意这些条约都不能确定，又如何使得其他国家政府在它们的议会中争取批准这些条约呢？尤其是法国人对德国人的不信任仍然根深蒂固，主张法德和解的舒曼和让·莫内并不代表法国的多数派，著名政治家爱德华·达拉第、爱德华·赫里欧均公开表态反对法国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夏尔·戴高乐更是反对缔约的关键性人物。

对阿登纳政府来讲，如果联邦共和国参加欧洲防务集团的法律确属改宪性质，则意味着改宪首先需要得到德国联邦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赞同。阿登纳不能确定他能够取得这个三分之二的多数，因此，他找到联邦总统豪斯教授商量对策。

豪斯本人对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是否符合基本法精神也没有很大把握。他在1952年6月10日给联邦宪法法院院长赫尔曼·赫普克尔—阿朔夫博士写了一封信，请他作出评定意见。

联邦政府引基本法第24条作为加入欧洲防务集团的宪法根据。第24条规定，联邦可以通过法律把主权转让给国际机构；此外为了和平，它还可以加入互惠的集体安全体系。

反对武装力量参加安全体系的论点是，联邦不享有国防主权，因此也就无国防主权可转让。

豪斯问联邦宪法法院院长：“如果说根据基本法第24条规定，有关成立欧洲防务集团的上述条约使欧洲防务集团的国际机构有权以成员国公民的兵役制为基础行使欧洲防御最高权力的话，那么这项条约是否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有抵触呢？”

阿登纳并没有坐待联邦法院对上诉提案作出表态，在组织法律专家对此问题研究的同时，他决心以最快的速度争取条约的通过。1952年7月9日，阿登纳提议向联邦议院初读条约文本。

初读条约中遇到了可以想象的社民党的挑战。卡洛·施密德指责阿登纳签定这些条约是强要将联邦德国典质给西方国家。基督教社会联盟议员施特劳斯针锋相对回敬道：“我的社会民主党先生们，你们可实在不能要求阿登纳在战争结束了7年之后，还要去用这些条约赢回那场战争呀！”

初读的条约文本得到了大多数议员的赞同，社民党处于劣势。接着，条约被提交联邦议院各委员会作进一步的审议。

7月30日，在联邦宪法法院院长赫普克尔—阿朔夫主持下，根据社民党144名议员的联名上诉，在卡尔斯鲁厄宣布第一庭裁决：该项上诉“在目前是不允许的”，因为立法机构尚未结束其讨论。

可以想象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结果并不令人乐观，它没有排除在条约获批准后社民党可以重新提出上诉的可能性，阿登纳原来想赶在联邦议院开始夏季休会以前批准这些条约，这种希望落空了。二读和三读原定于9月3日和5日举行，但各委员会修订条约的时间拉得比阿登纳预期的要长得多。这期间，8月22日，社会民主党领袖库特·舒马赫博士逝世了。阿登纳与舒马赫一直是政敌，见解对立，在如何判断德国的政治前途方面，两人各抒己见，在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署之后，两人的关系迅速恶化，极为紧张，不断发生争吵。舒马赫的去世，使阿登纳在感到十分悲痛的同时，也产生某种希望，即能同他的继任者埃里希·奥伦豪尔弥合关系，协调两党立场，在外交上找到共同语言。1952年9月19日，阿登纳专门与社民党的新领导人第一次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讨论的结果仍然让阿登纳感到失望，奥伦豪

尔像舒马赫一样固执而强烈地反对这些条约。阿登纳同社民党的论战还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条约的二读一直拖到了1952年12月3日。由于涉及有关联邦共和国承担防务份额的讨论，二读尚未开始，已被舆论界吵得沸沸扬扬，有人宣布要搞巨大的抗议行动，据说在联邦议院进行二读的那一天，鲁尔地区将开着满载人群的卡车到波恩示威。阿登纳估计到那一天会发生很大的骚动，事先在联邦议院大厦和通向联邦议院大厦的街道布置了警察部队担任警戒。果然，12月3日，联邦议院大厦的辩论激动人心，大厦外面的街道上出现了骚动，乱成一团，最后由警察控制了局势。

9月份在多特蒙德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社民党中有人称，如果社民党执政，他们就要选择另一条道路和另一种方法。阿登纳在二读一开始就向社民党人提出质问，要选择哪一条道路和哪一种方法。归根到底，主要的并不在于道路和方法，而在于目标。在议会辩论时，阿登纳十分激动，连珠炮般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针对性指责：

“正如事态的演变一样，谁否定了欧洲防务集团，谁就否定了欧洲。谁否定了欧洲，谁就是把西欧各国人民，特别是我们德国人民拱手交给布尔什维克主义奴役。谁否定欧洲，谁就是放弃欧洲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的生活方式。谁否定了欧洲，谁就是德国人民的掘墓人，因为他剥夺了德国人民生活下去的唯一可能性；而这种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富有意义和宝贵的，这是他们的自由的、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生活。我不认为反对党的社会民主党愿意这样做。可是，既然事关整个德国人民，这一回就应该将党的策略性的考虑撇在一边！”

当阿登纳刚开始演说，德国共产党议员即喧嚣起来了；后几句话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呼吁他们不要同德国共产党搞在一起，引起了社民党议员的暴怒，齐声大叫：“可耻！”“这是丢人的话！”有人讲：“这就是当总理的水平嘛。”大厅里混乱一片，直到教长摇铃过了许久，大家才重新静下来。阿登纳指出，通过西方三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联邦政府做到了使它们同联邦共和国共同努力，以和平和自由的方式重新统一德国。他说：

“单是三国承担了这种条约的义务，就必须使我们对于处在铁幕后面的德国人负有赞同这些条约的义务。对于条约所确定的、三国的这一番好意加以拒绝，对此又有谁能承担这个责任呢？我们终究应该从过去吸取一下教训。从1871年以来，德国一直在努力寻找朋友和同盟者。因为大家知道，德国尽管在当时是强大的，但没有强大的朋友它是不能生存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在整整几十年中，由于德国本身的过失，由于对另一方提出的建议蒙昧无知——我请大家回忆一下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谈判——以及由于过于自信，它几乎一直没有找到朋友。今天德国的局面比在它悠久的历史中任何时候更加危险。它是分

裂的，它是支离破碎的，它是被解除了武装的，它是毫无防御的，它同一个庞然大物相毗邻，这个庞然大物想奴役德国，吞并德国。如果局势像现在一样继续下去，存在的危险将越来越大。面对历史和德国人民，我不禁要问：在这种局势下，难道一个德国人负得了这个拒绝西方向我们伸出援助和拯救之手的责任吗？”

面对群情沸腾的大厅，阿登纳提高了嗓门，他那痛心疾首的语气把所有的心牵动了：

“你们想一想，这是什么问题！铁幕这一边和那一边的全体德国人民都必须知道这是为了什么。签订这些条约事关德国的自由、德国的生存以及德国子子孙孙的前途。我号召全体德国人民要领会作出这个决定的意义，而且是永远领会这种意义。这是攸关德国命运的问题。眼前我们要在奴役和自由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我们选择自由！”

阿登纳富于情感与逻辑的讲演鼓舞了在场的大多数人。二读表决的结果，多数赞成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这时，发生了评定书事件，使本来应紧接着进行的法案第三次讨论戛然而止，三读的日期也交给元老议员委员会去作决定。

还在二读时，阿登纳就获悉，联邦总统豪斯教授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的评定要求，有可能不符合联邦总统的期望，而且可能得出相反的结果。尽管这将是建议形式而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评议书，但它可能对三读造成恶劣影响。本来按规定二读之后应紧接着三读，但如果评定书得出相反的结果，提出评定要求的豪斯总统就不得不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这种情况下，阿登纳认为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三读改期进行。

阿登纳立即召集联合执政党的代表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12月6日，讨论决定以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和德意志党三党联邦议院议会党团的名义提请联邦宪法法院确定：“德国联邦议院有权根据基本法第42条第2款第一项多数票的规定通过关于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法律。”阿登纳担心的问题是，无论联邦宪法法院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定，在三读顺利结束后，德国社民党必将向联邦宪法法院的第一评议庭再次上诉，要求裁决，这样又会使得最后完成缔约程序再耽搁几个月。目前在二读和三读之间，由联邦政府向联邦宪法法院第二评议庭提出起诉要求裁决，虽然会使三读耽搁几个星期，——此事是不可避免——但却可以加速总的批准程序。

12月9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这一天联邦宪法法院开始讨论联邦总统豪斯提出要求评定的问题。联邦宪法法院宣布了一项全体大会决议，认为“这项评定意见和所有其他全体大会的评定意见，对两个评议庭均具有约束力”，这样，“可以杜绝两个评议庭之一对迄今悬而未决的或今后类似情况的诉讼作出不符合实际的裁定。”

参加会议的联邦政府代表司法部国务秘书瓦尔特·斯特劳斯和外交部国务秘书瓦尔特·哈尔斯坦立即打电话通知阿登纳联邦宪法法院的这一决定。

这时阿登纳正在举行内阁会议，会议立即讨论了这个问题。阿登纳一方面指示施特劳斯和哈尔斯坦设法在联邦宪法法院推迟有关评定的讨论，同时又在内阁中详细讨论了法律地位问题。内阁一致认为联邦宪法法院的这一决定，越出了它解释法律的职权范围，同时也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及联邦宪法法院的条例。

这天上午，阿登纳毫不迟疑，专程拜访了联邦总统豪斯，向他转达联邦政府内阁会议讨论结果，阿登纳对豪斯表示，后者提出要求联邦法院作出评定的申请，有可能使联邦宪法法院对其评定成为一项最终有约束力的法律裁决。豪斯说他只是想得到一份谘询意见，而不是要得到一项最终的有约束力的法律裁决。阿登纳进一步说，由于联邦宪法法院作出这样的决定，会使他（豪斯）所要求的一项“谘询意见”成为先例，并宣布它具有约束力，这样也会有使联邦宪法法院被卷入到政治责任中去的危险。豪斯表示这样的事万万不允许发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将收回自己要求作出评定的动议。

但豪斯自己也不愿作为联邦总统卷入到联邦议院的党派之争，豪斯决定在他将这个决定通知联邦宪法法院之前，要先听听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奥伦豪尔的意见。当天下午，他们之间就此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会谈，奥伦豪尔恳切地劝戒豪斯总统不要收回他的评议申请，豪斯已下定决心。

第二天，12月10日，豪斯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解释了他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他说，“我习惯从自己的判断中作出我的决定。在历史和我的良心面前，谁也打消不了我的这些决定。”豪斯的举措是对阿登纳的有力支持，同时他也树立了联邦总统超脱于政治斗争之外的形象。

豪斯教授放弃要求作出评定意见，遭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抨击，反对党又借机激烈攻击阿登纳，将联合执政党上诉联邦宪法法院说成是“律师的诡计”。阿登纳为自己辩解道：“既然反对党认为自己有权而不惜使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反对和拖延批准条约，联邦政府就有权在宪法范围内尽一切努力使条约迅速得到批准。这些条约是有益于德国人民的。”阿登纳对这种攻击的烦恼已是习以为常。

德国社会民主党显然对事情的进程非常激怒。新主席奥伦豪尔在12月12日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把当时的情况说成是“很接近一次宪法危机”，并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宣布，“这些条约没有通过联邦法院的法治程序确定其合宪性，因而这些条约是不具有约束性的。”

但在这次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中，奥伦豪尔原则上同意德国为西方自由世界的防务作出贡献，只是不承认以当前的这些条约（指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作为基础，他认为“应该在德国形势和国际形势中，根据新的观点来重新讨论和重新处理这一系列复杂问题。”这种说法鼓舞了阿登纳，阿登纳再次萌发了试图说服他相信这些条约对德国未来的必要性和意义的念头。12月18日，阿登纳再度会晤奥伦豪尔。

阿登纳向奥伦豪尔摆明了国际形势，并十分严肃地强调了联邦德国有可能面临的危机：1953年华盛顿将由新一届共和党政府上台执政，在共和党内部，艾森豪威尔和塔夫脱之间存在着有关外交政策问题的根本分歧：到底是欧洲重要，还是亚洲重要。如果由于欧洲防务集团未能组成而使欧洲局势混乱，美国就有可能改变对欧洲的态度。阿登纳告诉奥伦豪尔，就在这一天，艾奇逊已经让美国高级专员通知他，如果欧洲防务集团由于德国的过错而不能组成，那么美国为了安全起见，会使占领法规重新生效；而如果这样，就

德国条约重开谈判也就无从谈起。阿登纳还说，就在头一天，法国高级专员弗朗索瓦-庞赛也对他讲过类似的话。

但是奥伦豪尔对此却毫不动情，他认为这些条约充满了对德国的不信任，即使签署了这些条约，德国在事实上也是不平等的。阿登纳请奥伦豪尔将他的意见书面提出来。1月7日，奥伦豪尔致信阿登纳，对社会民主党反对条约的观点作了充分说明。

奥伦豪尔在信中谈道：

“条约仅仅是从表面上废除了占领法规，这些条约没有为我们提供发挥联邦共和国更大作用的机会，而是结合其他条约全部或部分地剥夺其有关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自主权的行动。而事实上却以协议形式继续保持占领制度。

此外，我们还认为，条约不符合联邦议院几乎一致同意的，而且也是您，联邦总理先生一再表明过的见解，即联邦共和国政策的最高目标是在自由中重新统一德国。我们坚信，接受这些条约决不会促进德国重新统一的政策，而是给德国重新统一的政策增加困难，如果不是完全阻挠德国统一的话。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符合我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也不符合欧洲的持久稳定和安宁的政策。

我们相信，由这些条约开创的道路，既不会导致德国人民安全的增强，也不会导致自由世界防务力量的提高，而是孕育着严重削弱德国安全、延长德国分裂、并从而产生再一次分裂自由欧洲的危险。

在当前呈现的国际形势中，必须在最广泛的国际基础上寻求一种解决办法。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主张在国际基础上举行新的谈判，其目的是在所有异常重要的领域内，包括共同防御在内，建立一个共同安全体系范围的所有自由国家的合作共同体。

这个合作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必须是，它的所有参加者能够在相同的条件下和相同的前提下在共同体中共同合作；而且继续给联邦共和国对德国问题保留每一个机会，以便积极地推行重新和平统一德国的政策。

尊敬的联邦总理先生，我们认为这是使德国人民和自由世界得到最大限度安全的唯一可行的道路，而且它同时还给我们开拓了在我们的时代实现德国人民最重要的民族政治目标、即在自由中重新统一德国的道路。”

奥伦豪尔向阿登纳再次明确表态：他和他的议会党团拒绝同意当前的条约文本，主张“在国际基础上举行新的谈判”，以“建立一个在共同安全体系范围的所有自由国家的合作共同体”。

这确实是两条道路的选择，阿登纳对说服奥伦豪尔失望了，他确信要成立一个像奥伦豪尔所要求的所有自由国家的合作共同体，将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在目前却决不可能实现，因为进行这种划分国家群的谈判就会使联合

国分裂成“自由国家”与“非自由国家”两个部分，这也许意味着联合国的垮台，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为德国承担这个风险，包括美国在内。

1月16日，阿登纳以联邦政府的立场给奥伦豪尔写了一封回信，回答了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问题：

“关于决定对德国人民的未来具有这样根本意义的问题——像条约所反映的那样——乃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司法行政问题。联邦政府对联邦宪法法院竟然受理这些问题感到遗憾，因为这样做，联邦宪法法院就承担了德国人民生死存亡的责任，这是一种应该属于主管政治机关的责任。因此，对联邦政府来说，没有必要自愿地服从一种评定意见，从而规避自己的责任，并将责任推卸于与此事无关的机关。总的说来是否允许提出这种评定意见，我不作结论。您自己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方面的另几次讲话相一致，在1952年10月7日给联邦宪法法院的函件中也明确表示，法律上不容许这样一种评定意见。此外，即使政府、联合执政党和反对党服从这样一种评定意见，也可能其他机关再次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上诉。联邦政府认为，在这个德国人民命运攸关的问题上，联邦宪法法院的决定只有获得普遍的法律效力时，才能具有它的意义。

……

我还想概括地谈谈下面这些情况。西方世界对批准这些条约重视到何等程度，正巧在最近几个星期中变得一清二楚了。我可以提出美利坚合众国下一届总统艾森豪威尔给李奇微将军和我的电报以及法国总理梅耶的声明在华盛顿所引起的反应。我们也不应忽视，对联邦共和国来说，拒绝这些条约将意味着继续保留占领法规。至于在盟国让联邦共和国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这种努力失败之后，它们今后在联邦共和国将以什么形式行使占领法规，那就完全不敢说了。

您认为缔结条约会加深德国在自由中重新统一的困难——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我认为您的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恰当的。我相反地确信，没有西方国家的援助，德国要在自由中实现重新统一是不可能的，而西方国家在这种条约中已经明确地承诺了这种援助。您的建议没有为在丧失这种援助时具有同等价值的弥补办法。

如果您反对自由欧洲分裂，那么，我相信可以把这一点理解为您在原则上是主张欧洲联合的。我也想和您在这一方面取得一致认识：无论如何联邦共和国应该避免一切足以阻碍这一联合的行动，而这些条约正是达到这一联合的一个重要步骤——尽管还遗留着许多事情要做。此外，正好这几天，丹麦社会主义党议员雅各布森、英国工党议员罗本斯和英国保守党议员朗登在斯特拉斯堡以十分坚决的态度表示拥护欧洲一体化，并对欧洲一体化表现出完

全的同情。

您坦率地向我说明了您对联邦共和国在德国当前危急情况下应走的道路的看法。我仔细研究了您的建议，并且同样坦率地对您作出了答复。今后还将存在意见分歧，特别是在联邦共和国所执行的对外政策方面。但是在对外政策的目的上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这一点使我有理由表示希望，我们需要尽速继续进行会谈，不会是没有收获的。

致
最崇高的敬意

您忠实的
阿登纳（签字）”

与社民党协调立场的希望破灭了。阿登纳一如既往，决心使条约文本尽快得到批准。他不愿让自己被任何事情引离这个目标。

1953年1月初，法国政府走马换将。阿登纳的朋友，罗贝尔·舒曼，不再担任外交部长，改换为由乔治·皮杜尔继任。新政府不再不遗余力推动法德和解政策与欧洲一体化。新总理雷纳·梅耶在他的就职声明中宣布，他不能同意目前形式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梅耶要求修改草约，以使法国对德国保持较大的安全。实现欧洲防务集团的机会开始减少。防务一体化笼上了一层阴云。

1953年3月8日，联邦宪法法院终于就联邦政府的上诉提议作出判决，判决结果有利于联邦政府。

3月19日，联邦政府得以在德国联邦议院开始条约的三读。在阿登纳多方努力下，两条约终于得到令人信服的多数赞成。

5月15日，联邦参议院对这些条约进行表决，结果以27票对15票通过条约。

1953年9月6日，联邦德国进行了第二届联邦议院的选举。选举结果对阿登纳大大有利，基民盟—基社盟获得绝对多数，社民党的票数被压低至三分之一以下。这样一来联邦政府可以提请联邦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一项“有关基本法疑问的解释说明”的法令，从而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些条约是否符合宪法规定的争论。这项法令明确地规定了包括兵役和民防在内的防务都属于联邦的主管权限。

1954年3月28日，联邦总统豪斯签署了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条约文本。

“ 一场危机发生了 ”

不论什么时候，真正的抉择余地就是欧洲的衰微。

——《阿登纳回忆录》（一）

由于各种争议颇费时日，阿登纳直至 1954 年 3 月才完成了批准条约的手续。这引起了其他缔约国，尤其是法国的不安。只要对德国联邦议院能否赞同这些条约存疑，可以理解法国各届政府就难以将这些条约提交国民议会讨论。因为没有德国的率先同意，这些条约本身只能是一纸空文。既然如此，法国政府又何苦冒着风险，将这些很成问题的条约提交国民议会去辩论呢！法国政府与议会的关系是微妙的。第四共和国权力的核心在议会，政府必须对议会中多数派负责，而议会中却党派林立，观点立场各异，内阁更换频繁是第四共和国的政治特征，历届法国政府都没有勇气将这些条约交国民议会讨论，这将很有可能导致内阁倒台。从 1953 年春天起，法国政府就不能肯定能获得支持批准条约的多数票了，因而法国的疑虑也越来越重。

阿登纳感到担心，美国人也感到同样的担心，因为重新武装德国的要求是美国率先提出来的，也是美国为确保西欧的全球战略的需要。艾森豪威尔 1953 年就任总统后，派出国务卿杜勒斯到西欧各国去游说，重点对象是法国。美国将法国议会能否批准条约看作是欧洲防务集团能否实现的关键，杜勒斯威胁法国：如果法国人不愿成立欧洲军的话，美国将重新考虑它是否要参加欧洲防务。这种压力反而在法国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让法国人感到欧洲防务共同体显得是从外部被人所强加的，于是对批准条约的疑虑也就越来越大。

不久，法国新外长皮杜尔将法国政府的疑虑公开挑明。皮杜尔呼吁人们警惕任何“把欧洲孤立起来”的动向，他担心西德重新武装后美国和英国都会从大陆“脱身”，从而使法国在防务上受制于西德。皮杜尔说，至少在西德获得武装之前，美国和英国必须向西欧国家的“超国家机构”提供防范德国再起的“平衡力”和“保证”；美国必须承诺，拟议中的欧洲防务集团存在多久，北约组织也应该存在多久。因为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有效期是 50 年，而北约的有效期是 20 年。

为打消法国的疑虑，美国和英国先后作出决不会离开欧洲大陆的保证。1953 年 12 月，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先后表示，美国 1954 年对西欧援助的一半是给欧洲防务集团的，其前提是这个集团必须在 1954 年新年前后建立起来。英国在 1954 年 4 月与西欧大陆六国签订了协定，重申英国对欧洲防务承担的义务。美国也宣布，它将保证它在欧洲的武装部队（其中包括驻德部队）“需要呆多久就呆多久”，杜勒斯在与法国政府的会谈中也重提美国将为欧洲防务集团承担责任，但在同时，美国强调这一保证将以法国批准欧洲防务集团为先决条件。

这些保证并没有能使法国感到安心。法国政府仍然一直举棋不定。

继 1953 年 3 月联邦德国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后，尽管经过很艰难的议会辩论，法国的伙伴们都先后批准了这个条约。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条约通过时都获绝大多数赞成票。在意大利，众议院率先给予了批准，但由于国内政治问题和解决的里雅斯特事件，最后批准被拖延。不过各党派已达成一致意见，批准获通过也是不成问题的。

1954年6月，由于法军在越南奠边府战役中的惨败，拉尼埃—皮杜尔政府垮台。法国重新组阁，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出任法国总理，他同时兼任法国外交部长。

法国的新形势对阿登纳所寄望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通过来说仍然是不利，新内阁仍然面临舆论和议会中深刻的、无法弥补的分歧。印支战争的结束丝毫没有改变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形势。国民议会的各个委员会都对条约进行了讨论，许多委员会已经发表了反对意见，但问题还没有被提到全会上来讨论。孟戴斯—弗朗斯尽管在6月17日就职时宣布，他打算尽快地，即在议会开始夏季休会前，提交国民议会讨论条约，但他对这个问题还是心里没底。也许他本人并不太支持条约的立场，因而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他把印支问题和经济问题放到了绝对优先考虑的地位，在没有使这些问题接近解决以前，根本拒绝同欧洲防务集团伙伴谈判。对此阿登纳和其他四国均毫无办法，只好等待。

孟戴斯—弗朗斯倒是履行了他就职时许下的诺言，不过，他在没有和其他国家商量的情况下，自己准备了一份新的执行议定书，并自陈其目的是想在向法国国民议会阐述条约之前，先得到些补充的保证，以使条约在议会中能获顺利通过。这份议定书在8月中旬向欧洲防务集团的伙伴国们提出来了，它的主要内容是想消除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超国家特性，让每个成员国在8年内享有否决权。另外，孟戴斯—弗朗斯预想军事力量的一体化将限于驻扎在防范地区的部队，即驻扎在联邦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部队；条约的期限将和北大西洋公约的期限一样，如果北大西洋公约被否决、或者英美部队撤出欧洲大陆、或者德国重新统一的话，这个条约也可以被否决；在一国的要求下可以进行重新修订条约的程序；共同预算将由各成员国议会事先投票通过的分担额组成；规定成立欧洲联邦或邦联程序的第38条将不受到执行（除了民主选举欧洲议会之外）等等，最后还要求这份议定书本身也要列为条约的附件。

显而易见，法国提出的议定书涉及了对条约的重大修改，当它向各成员国提出之后，立即引起五国的强烈不安。各国决定8月1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一次协商会议，设法消除法国的不安。

阿登纳在揣摩法国的真实意图。有人告诉阿登纳，孟戴斯—弗朗斯是一个政治赌棍，他甚至连按他的建议来修改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也丝毫不打算付诸实施，他只想利用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作为同苏联谈判的筹码，以欧洲为工具，通过在苏美之间保持平衡，使得法国起到所谓的“第三外交力量”的领导作用。阿登纳自己也感到孟戴斯—弗朗斯似乎想把欧洲防务集团垮台的责任推诿到联邦德国身上，因为后者提出的修改意见显然是无法实现的，但这样一来他和法国在欧洲公众面前就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了，尤其这是对美国的交待，法国还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也许孟戴斯—弗朗斯推测阿登纳会率先反对法国的建议，阿登纳也估计到了这种可能性。为了避免将联邦德国同使欧洲防务集团垮台的恶名连在一起，阿登纳决心尽一切力量避免给人这种印象。

在布鲁塞尔会议召开的前一天，阿登纳和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亨利·斯巴克就法国议定书问题举行了一次详细会谈。

斯巴克告诉阿登纳，在与他见面前，他曾经与孟戴斯—弗朗斯举行过会谈，他告诉了后者其建议的不可实现性。斯巴克向孟戴斯—弗朗斯提议，不

建立欧洲防务集团而寻求一种类似让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解决办法是否更好？孟戴斯—弗朗斯对此一口拒绝。

阿登纳向斯巴克提到了法国的另一项建议，这项建议说任何一个欧洲防务集团成员国的军队人数都不得超过法国。阿登纳向斯巴克指出，既然法国要将军事力量派驻海外，总共只打算出3个半到4个师参加欧洲防务力量，那么德国也只能出同样数量的师，这么一来，欧洲防务集团总的武装部队也就没有军事价值了。同时英美方面的动向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美国已经腻烦了欧洲人的态度。美国权威人士戴维·布鲁斯曾毫不含糊地对德国表示过，妥协毫无意义，必须现在就作出选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7月12日写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信中也这么表示。美英两国要在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也被批准的前提下再批准德国条约，如果孟戴斯—弗朗斯建议大幅度修改欧洲防务集团条约，那还必须同美国和英国再度谈判。

斯巴克也表示了同样想法。两人商定必须在布鲁塞尔外长会议一开始就宣布条约无须再在各国议会进行辩论；而同孟戴斯—弗朗斯的辩论，则必须让他局限在他的建议本身，免得其他各国议会会再为了条约的批准重新展开辩论。斯巴克还建议不能让大会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草草收场，倘不能与法国达成协议，便可发表一项五国声明。

1954年8月19日至22日，布鲁塞尔六国外长会议如期召开。会议进展的情况不出阿登纳的预料，会议上，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提出了众所周知的提议，强调倘若这次会议不能接受其提议，那么就很难想象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得到法国国民议会的多数赞同。为保证取得预期结果，阿登纳同外长们商议把会议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进行，每个代表团只派两名代表参加。会议让德高望重的斯巴克主持，以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

五国代表的态度使阿登纳感到满意，这当然是要做给美国看的。法国的要求令五国既厌烦又尴尬，因为对条约进行如此的改动将迫使已经获得议会批准的国家重新同议会打交道，并且很可能遭到议会的否决。各国政府都拒绝发生这种变动，阿登纳反对法国要求的立场不再孤立。此后几天里，阿登纳都尽可能地表现得克制，以免法德之间出现矛盾，影响条约的签定。只有遇到其他重大问题时，阿登纳才参与辩论。

主持会议的斯巴克竭力设法寻求和解的方式，他运用特有的幽默方式，使争执双方的激烈情绪平息下来。为使法国满意，五国在执行条约的措施上作出了一些让步，如：在缔约后的3年内不采取一体化措施，放慢成立政治组织的步伐，设立便于解除条约的条款，等等。但是，在阿登纳看来，孟戴斯—弗朗斯似乎并不希望会议取得成果，总是认为这些让步无足轻重。于是，五国不可能再作退让，双方意见分歧不可调和，会议以失败告终。会议发表的公报只重申各国仍确认“使统一欧洲的事业继续下去”的信念，公报的具体措词如下所述：

“六国政府代表确认，欧洲政策的主要目标仍然未变，这些目标是：

- 加强欧洲合作，以防西欧遭受强权的威胁；
- 防止任何形式的德国中立化；
- 支持德国重新统一，支持德国参加集体防务；
- 探索西方一体化的政治和经济形式。”

法国明白美国重新武装德国的意图。孟戴斯—弗朗斯已经感到：即使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被法国议会否决，美国也会通过其他途径恢复联邦德国的主权。因此，孟戴斯—弗朗斯渴望在布鲁塞尔与阿登纳单独会晤，以充分表达他对法德友好的善意，这当然是要做给美国看的。阿登纳也希望借助孟戴斯—弗朗斯在法国的威望，影响法国国民议会对条约的最后表决结果。8月22日，即布鲁塞尔会议的最后一天，阿登纳同孟戴斯—弗朗斯在斯巴克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私下的会晤。

双方再次谈到了法国的政治情况对即将到来的国民议会有关条约辩论的影响。阿登纳问孟戴斯—弗朗斯，通过法德之间的紧密经济合作，是否有助于改善氛围，例如让联邦德国长期承担收购法国小麦的义务。孟戴斯—弗朗斯感到这个主意“很精彩”，而且会在农村地区产生广泛的政治影响，高兴地表示准备同专家们在巴黎或在波恩讨论这个问题。

这次会谈给阿登纳带来一线希望。他相信孟戴斯—弗朗斯本人会支持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并会很快将其交付国民议会表决。会谈后，阿登纳立即给丘吉尔拍了一个电报，因为孟戴斯—弗朗斯过一天将访问英国，阿登纳希望丘吉尔在这方面能再对孟戴斯—弗朗斯施加积极影响。

1954年8月29日，法国国民议会就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举行辩论。孟戴斯—弗朗斯总理首先发表一篇政府声明，但这篇声明的基调就是含糊其辞，所以，会议的动向从一开场就令人难以捉摸。联邦德国驻巴黎大使豪森施泰因告诫阿登纳，在这个时候发表任何形式的声明去影响法国议会辩论都是不恰当的，“最明智的办法就是等待”，但这种等待让人心急火燎。

直到很多年以后，阿登纳和许多人一样仍然对这次辩论的戏剧性变化记忆犹新。他认为条约拥护派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错误。当时，考虑到选民的情绪，法国政府各个委员会的报告人大多发表了对通过条约辩护不力的报告，条约反对派奥默朗提出了一项具有表决优先权的预先提案的建议，这样导致议会的缔约辩论停止，并使讨论无限期推迟。尽管后来激进党人勒内·梅耶和人民共和运动的代表阿尔弗雷德·科斯特—弗洛雷为条约进行了猛烈的辩护，但它的效应远不及政界元老赫里欧发表的一篇动人心弦的劝告。这位老态龙钟的前议长因行动不便，让人把他抬到席位上，他劝说大家否定条约。奥默朗预先提案最后以319票拥护、264票反对得到了通过，12个议员投了弃权票，31位议员未去投票，其中有23名政府成员。投票结果一公布，会议大厅里人声鼎沸，激动的共产党人和戴高乐派。236人唱起了《马赛曲》，庆祝胜利；人民共和运动的成员则沮丧离开了议会大厅。这样，在经过了4年的谈判和彷徨之后，法国人否决了自己提出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

这一天是1954年8月30日。阿登纳在他的回忆录中称其“欧洲的不幸日子”。

阿登纳的心头笼罩着一片阴霾。5年来，他作为联邦政府总理所推行的欧洲政策，在这一刻遭到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而欧洲政策又直接关系到联邦德国恢复主权，以及他为之孜孜以求的欧洲联合的命运。

“一场危机发生了！”可是，阿登纳实现欧洲防务集团基本方案的决心并未因此而动摇，他在寻找新的时机。8月31日，即法国国民议会否决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给阿登纳以有力支持。在美国政

府发表了一篇声明，声明中强调人们不可能长时期地压制联邦德国单独和集体的防务权利，“西方国家有责任尽快地尽一切力量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主权，并让它有机会对国际和平和国际安全作出贡献。”悲观失望和听天由命都无济于事，一切必须从头做起。

阿登纳闻风而动，立即召集内阁和各联邦议会党团会议主席到巴登—巴登的比勒赫厄（当时阿登纳还在那儿的疗养院度假）出席紧急会议。9月1日，会议召开。阿登纳和与会者们统一立场，首先确立了联邦政府所奉行的欧洲政策基本方针不变的原则，并决定进一步向占领国提出恢复联邦共和国的主权和不受歧视地加入西方防务的要求。

会议发表了如下决议：

“在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既定的德国外交政策的情况下，并本着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能使德国在自由、和平中获得重新统一的信念，特制定下列目标：

1. 同一切愿意实现欧洲统一的各国人民一起，并在一切与此相适应的范围内继续执行欧洲统一的政策。同已批准和即将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国家进一步商讨军事一体化的问题；
2. 恢复主权；
3. 一视同仁地参加西欧防务；
4. 通过缔结条约合理地解决其他国家在联邦共和国的驻军问题；
5. 立即同美国和英国举行谈判。”

这一决议成为联邦德国在伦敦九国会议以前及谈判期间的行动指南。

从伦敦到巴黎 ——主权的恢复

谁想保险，总得付一笔保险费。
没有风险的政策是不存在的。

——《阿登纳回忆录》（一）

缔结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流产，使美英的欧洲政策遭受严重挫折，重新武装德国以加强西欧抵御东方苏联力量的意图也遭到沉重打击。美英随即行动起来，竭力克服由于欧洲防务集团失败而产生的欧洲政策危机。机遇再次降临在阿登纳的面前，这是他推行向西方一边倒政策的直接回报。

继8月31日杜勒斯发表声明之后，9月2日，英国高级专员弗雷德里克·霍耶·密勒爵士又专程到比勒赫厄看望阿登纳，向他陈述英国内阁对局势的看法。

霍耶·密勒给阿登纳带来了一封丘吉尔的亲笔信。丘吉尔在信中告诉阿登纳说，对于他和德国联邦政府来说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好机会，可以向世界清楚地表明德国并不企求无限度的武装，而是打算把自己限制在欧洲防务集团范围之内。为了这一点，英国政府将尽一切力量对联邦德国进行帮助，丘吉尔最后诚挚地说：“我请求您把这一点看成是这样一个人的想法而加以考虑，这个人经过如此多年的斗争之后，除了希望看到德国人民在自由国家的世界大家庭里占有他们真正的位置之外，几乎再没有更强烈的愿望了。”丘吉尔的话令阿登纳大受鼓舞。

霍耶·密勒还带来了英国政府对形势的看法，并希望就此与阿登纳交换意见。

密勒告诉阿登纳，英国政府尤其想从军事角度来了解德国政府对其防务政策的具体想法。数星期来，英国政府考虑了两种选择：或是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是采取一种松散的欧洲防务集团的形式，它不具备超国家的性质，而能保持与英联邦的联系。对两种抉择的研究结果，英国政府更倾向于前者，因为人们不容许出现不受监督的德国国防军。因此，也许可以考虑把欧洲防务集团范围内有关德国重新武装的限制应用到北约组织中来。如果德国武装部队的规模不超过欧洲防务集团或欧洲盟国最高司令部所规定的规模，那就完全可以设想一种实际的解决办法。密勒表示这首先取决于德国的态度，但同时也必须在北约组织成员国之间取得一致意见。

再有在政治方面，好几个月来，美英联合工作组已在伦敦拟定出一项在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万一失败时的变通方案。该方案认为可以在解决军事问题的同时，给予德国的政治主权，全面解决德国问题，英国政府可以保证对这个方案的支持。

英国方面的建议使阿登纳感到振奋。他立即答应霍耶·密勒，他将把德国的想法和意见书面送交到英国以及各国政府手中。阿登纳向霍耶·密勒透露，他将非常愿意发表关于德国自愿接受限制的声明，并请他将这个想法转告丘吉尔和艾登。考虑到法国和孟戴斯—弗朗斯的态度，阿登纳让密勒提请英国政府注意，务必要考虑到法国可能反对德国加入北约，因而在外交上尚未作好最充分准备工作之前，无论如何不能指望一次会议解决所有的问题。

欧洲防务集团缔约失败后，各国外交活跃，努力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

以消除4年来围绕欧洲防务与德国主权问题产生的纠葛。霍耶·密勒的来访，成为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为引导欧洲人走出死胡同而迈出的第一步。正如丘吉尔在信中对阿登纳所说的那样，对德国来说，出现了外交上的“大好机会”。

艾登于9月11日开始了前往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各签字国的巡回访问，其目的是要向这些国家政府说明英国政府的看法，并摸清欧洲防务集团各国的意图。9月12日，艾登飞抵波恩，同阿登纳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谈。阿登纳和艾登协商后一致明确了下述3点：（1）应当尽早终止对联邦德国的占领状态；（2）应当修订布鲁塞尔条约，并邀请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参加；（3）联邦德国应当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为欧洲防务作出贡献，不歧视联邦德国应是指导这个行动的准则。

艾登刚刚离去，9月16日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又抵达波恩。杜勒斯飞赴欧洲，是要直接与德国和英国政府进行接触，波恩是第一站。而杜勒斯有意不访问巴黎，既是为表明美国政府对法国的不满，也是为了明确地表示，即使没有法国的支持，美国也要执行其欧洲政策。阿登纳对杜勒斯的访欧意图心领神会，当后者飞抵瓦恩机场时，亲率阁员前往机场迎接。杜勒斯在机场发表了明确支持联邦德国的声明。他的话很朴实，也让人感动，他说：

“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同联邦总理阿登纳博士商讨如何恢复联邦共和国的主权以及如何才能使德国作为平等的伙伴加入自由各国人民大家庭的途径……联邦政府在战后一直奉行着一条如此一贯的和进步的政策，以致今天它的观点不能不受到人们极大的尊重。因此我到波恩来，以便同联邦总理进行磋商。”

在波恩，杜勒斯与阿登纳主要讨论了美法问题及德美关系等问题。杜勒斯告诉阿登纳，目前美法关系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必须对法国施加必要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又不能过于强大，以免法国和俄国联手。此外，美国正在考虑经济上对法国施加压力的各种可能性。

阿登纳相信，孟戴斯—弗朗斯无疑最能理会这种措施，因为他的首要目标是要振兴法国的经济，美国一向在经济上给法国十分有力的支持。阿登纳用了一个贴切比喻说：“必须把龙头拧得紧一点，但不能把它关死。”同时，因为孟戴斯—弗朗斯曾经向法国国民议会的各委员会解释说，美国只不过是威胁罢了，决不会把这种威胁付诸行动。所以也必须使法国相信，美国的讲话是严肃的。

杜勒斯问：“根据您的看法，您是否认为我此行不飞巴黎做得正确呢？根据我目前从巴黎的报告，法国方面对此大为震惊。”

阿登纳道：“您的行动果敢而且非常正确。我认为法国与其说是‘大为震惊’，还不如说是‘深受触动’更为确切。孟戴斯—弗朗斯是非常敏感的，这一行动将不会不起作用。”

阿登纳对杜勒斯谈到了几天前艾登对波恩进行的访问，说他已相信艾登将不会奉行中立主义政策。杜勒斯也澄清了阿登纳的一个错误印象，即美国认为在恢复联邦德国主权和加入北约问题上，没有法国就做不成什么事。杜勒斯说，“这是一个明显的误会。当然，为了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重要的

是在这些问题上要同英国合作。”

阿登纳向杜勒斯谈起得知巴黎拒绝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时的沉重心情。他说：“如果最近几周内还不能显示出明确结果，那么德国在今后6至12个月的时间内就有滑向东方的巨大危险。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他接着强调道：“我所关注的是，使民主生活在德国得到巩固，并使联邦共和国与西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把这看作是我迫切的任务之一。否则，以我这么大的年纪，就根本用不着来操这样的心了。”

杜勒斯更为担心的也正是联邦德国有转向东方的危险，急于了解阿登纳是否会同意采用妥协性的解决办法。阿登纳向杜勒斯保证，他不会同意任何妥协，联邦德国将坚定地站在西方一边。

阿登纳对孟戴斯—弗朗斯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表现一直耿耿于怀，他不无担心地提醒杜勒斯：只要孟戴斯—弗朗斯还在当权，法国所奉行的欧洲政策就始终值得怀疑，因为孟戴斯—弗朗斯奉行反欧政策。为了使艾登所建议召开的伦敦会议不至于无果而终，必须考虑到孟戴斯—弗朗斯将可能采取类似1954年8月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手法，在最后时刻提出一些无法实现的要求。也许孟戴斯—弗朗斯还会对英国准备参加欧洲联合一事作出歪曲性的解释，乘机鼓吹放弃超国家原则。

对此，杜勒斯也有同感，认为必须谨慎。杜勒斯的原话是：“孟戴斯—弗朗斯曾说：让英国人进去，叫超国家原则出来。”他还担心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经受不住一次非常沉重的压力，不能发挥它的作用。杜勒斯提到在巴黎最近来电中，孟戴斯—弗朗斯同意接纳德国加入北约，但附加了一系列条件，其中包括由阿登纳声明放弃要求，接受监督，同时他还要求美国承担在欧洲长期驻军的义务。杜勒斯担心，由于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挫折，已使美国政治家和舆论界颇感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美国再次重申上述义务。

最后，他们一致认为，无论如何都必须对艾登所计划的伦敦会议作好充分准备，即使推迟开幕时间也在所不惜。对阿登纳来说，更长时间的等待并非关键，重要的是依靠美英两国，继续捕捉时机。

希望之光已经在闪现，这就是艾登想利用布鲁塞尔条约来给武装德国的邻国提供保证，这些保证对联邦德国来说将不是歧视性的，并且将全面恢复联邦德国的主权。

所谓“布鲁塞尔条约”是1948年3月17日比利时、法国、英国、荷兰和卢森堡五国一起，为抵御对它们中任何一个缔约国所发动的任何武装侵略而签定的，有效期为五十年。这个条约是英法之间1947年3月签订的敦刻尔克同盟条约的扩大。当时英法两国签约的目的是为了防备一旦“同德国发生的敌对行动”。布鲁塞尔条约的重点虽在于促进缔约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但在它的序言中却有“万一德国侵略政策复活，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这样针对德国的话。因此，要使联邦德国成为这个条约组织的成员国，事先对条约以及一些结构的修改是必不可少的，需要使它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要求。

英美的反应使法国在否决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之后处于受孤立的情势之下。国际舆论对法国政府也是一片谴责之声。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已经把伦敦会议的日程订在了9月28日。在艾登的努力之下，孟戴斯—弗朗斯终于准备赞同德国同时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修订后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孟戴斯

—弗朗斯与艾登之间仍然存在原则性的分歧：孟戴斯—弗朗斯希望把对德国防务贡献的监督和限制完全置于布鲁塞尔条约体制的范围内，而艾登则认为应首先考虑利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机构。艾登回国后，法国政府拟定了一份备忘录送交英国政府。9月18日，一份同样内容的备忘录假法国高级专员弗朗索瓦—庞赛之手，交到了在勒恩多夫的联邦总理阿登纳手中。

这份备忘录包括了法国政府对解决危机的想法，尤其有关法国政府对德国防务贡献的设想。按照法国政府新的观点，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对处理有关德国防务贡献的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联邦政府必须保证，除了将提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支配的武装部队外，不保存其他的武装部队。

第二、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并入盟国联合部队而且以大单位的并入，这种纯粹组织性的一体化必须根据华盛顿的常设小组的推荐，经七国（布鲁塞尔条约）理事会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的协商同意后进行。

第三、德国必须发表一项声明承担义务，在处理领土问题——如奥得—尼斯边境、重新统一——不使用武力。一旦违反了 this 诺言，其后果将是在紧要关头取消给德国的安全保障与任何援助。

第四、英国必须全面地参加布鲁塞尔条约体系，而且必须承担在欧洲大陆上始终保持一支最低限度军事力量的义务。英国必须作出保证，它将不会把自己在大陆上的军事力量撤到某种最低限度之下。同时，法国也期待美国作出类似的保证。

第四、必须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对军队部署的监督。今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部队只能根据欧洲盟国最高司令的明确指令进行调动。

至于具体的程序，孟戴斯—弗朗斯考虑在即将召开的伦敦会议上针对北约和布鲁塞尔条约达成一项简短的原则性协议。

阿登纳对法国的这项建议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根据他与英美会谈后得出的结论，阿登纳判断，法国的建议仅仅是一种讨论题材。因为首先法国的建议中没有提到结束占领状态，而英美和德国在签德国条约时已就这一点明确，如果不事先结束占领制度，德国的防务贡献是无法解决的。再，备忘录中也没有把联邦德国立即加入北约组织的问题作为有待达成协议的组成部分提出来。而根据这种协议的性质，联邦德国立即加入北约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第三，按法国建议，有待着手进行解决的方法仅仅适用于北约组织管辖下的武装部队，这实际是说，其他成员国可以拥有不隶属于北约组织而由各国自行指挥支配的武装部队，而联邦共和国却不能拥有这样一支自行支配的武装。很显然，这其中包含了对德国苛刻的歧视。最后，法国设想中要建立一个“军备机构”，它所规划的管辖范围大大超过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所规定的管辖权。从根本上说，这些管辖权干预了有关国家的经济生活。根据联邦政府的观点和以往的经验，这样的管辖范围实际也是不合理的，其它欧洲国家也不会答应。

阿登纳将他的意见告诉了弗朗索瓦—庞赛，请后者转告孟戴斯—弗朗斯，他认为孟戴斯—弗朗斯所提的目前形式的法国建议是行不通的。同时，阿登纳让联邦政府也拟定了一份备忘录，明确提出联邦德国参加伦敦会议的目的，并将这份备忘录在9月23日送交到了伦敦会议的参加国手中。

联邦德国的备忘录综合了阿登纳与英美讨论后的观点，同时也包含了他

所认为的德国备忘录中没有提到的有关问题。备忘录在递交给美国政府后不久，阿登纳就获知它很合美国人的胃口，在华盛顿受到了政界和舆论界的欢迎。

这一切工作完备之后，阿登纳已经能够有充分把握地确认，在此期间他与英美一起新酝酿的计划，已经为伦敦会议各国进行卓有成效的谈判打下了基础，但具体会有什么变化则必须等到伦敦会议时才能看到。很快，艾登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向欧洲防务集团六国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发出了与会邀请。

在开会前夕，阿登纳得到来自各方的消息，其中许多是令人振奋的。法国舆论界已开始作出表示，认为在伦敦磋商将布鲁塞尔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在一起并同时加以监督的做法，已成为避免法国遭西方孤立和在德国出现真空危险所剩的唯一可能的办法。有关人士甚至认为，即使孟戴斯—弗朗斯不愿意，也会被迫在伦敦签订一项协定，并使这项协定在议会中通过。来自罗马、布鲁塞尔、卢森堡以及海牙的消息也表明这些国家是站在英国建议的立场上的。阿登纳感到这次伦敦会议的结果和对德国前途的总的决定，将取决于西方舆论界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对待联邦政府的“总气候”，而对此他完全可以乐观。退一万步说，即使伦敦会议再次无果而终，世界局势发展也不会停滞不前，那时候，人们会设法谋求另一条途径来保障欧洲的安全、自由与和平，只要是这样，联邦德国在西方联盟内恢复主权就会有希望。

1954年9月28日，西方九国伦敦会议如期召开，阿登纳怀着愉快而紧张的心情率领联邦德国代表团欣然赴会。

会议在伦敦兰开斯特大厦开幕，参加开幕会议的有：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亨利·斯巴克、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法国总理兼外长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意大利外长盖塔诺·马蒂诺、加拿大外长莱斯特·鲍尔斯·皮尔逊、卢森堡首相兼外交大臣约瑟夫·伯克、荷兰外交大臣约翰·威廉·贝恩，以及作为联邦德国总理兼外长的康纳德·阿登纳。艾登作为东道主国家的外交大臣，被选为会议的主席。

按会前的商议，会议需要讨论的议题主要有三：1．关于终止在联邦德国的占领制度和有关联邦德国的国际法地位；2．关于在布鲁塞尔条约的基础上促进欧洲的联合以及有关接纳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加入布鲁塞尔条约；3．关于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组织。

各国观点的差异在9月28日进行的第一次会议上立即清楚地暴露出来。孟戴斯—弗朗斯抢先发言，马上将法国向各国代表团致呈的备忘录中的问题提出，引发各方展开了就联邦德国如何为防务作出贡献以及对德国有关限制和监督的论战。孟戴斯—弗朗斯对法国安全和欧洲安全的担忧振振有词，而阿登纳则对他的建议中所体现出的对德国人的不信任进行了猛烈的反击。28、29日两天的讨论充满了火药味，法国陈述了种种理由，中心仍然是不愿为此作丝毫的让步。

9月29日下午进行的第四次全体会议，成为九国谈判第一阶段的高潮。杜勒斯和艾登两人各发表了一项真正能使法国人平静下来的重要声明，使伦敦会议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

杜勒斯向与会者们指出，美国人对欧洲的态度和他们的援助政策，一向是有如反映欧洲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如果欧洲充满了团结一致的气氛，那么美国国会就会同意给予欧洲各种支持与援助；但如果欧洲上空笼罩着分裂、不和睦，再度出现战争威胁和战争连绵不断的阴霾，那么美国人便倾向于后

撤。

杜勒斯坦率地讲，由于当前有一股强烈的失望浪潮冲击着美国，人们普遍感到欧洲局势最终还是毫无希望，欧洲国家希望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承担新的义务显然不可能。但是，如果通过这次伦敦会议使美国得出相反的结论，情况就会大为改观。杜勒斯说：“如果能把寄托于欧洲防务集团的希望富有意义地转化为协议，从而成为这次会议的成果，那么，我一定愿意向总统建议，请他像去年春天对创建欧洲防务集团条约那样，提出新的保证。这项保证就是，美国将继续把它在今天看来是必要和适当的武装部队留驻欧洲（包括德国），只要这一地区的威胁存在一天，这支部队就将在负责北大西洋地区的共同防务中作出它应作的那一部分贡献。美国将配合大家一致商定北大西洋战略，为这一地区的防务使用这支部队。……你们可以相信，如果这一边争取统一的活动依然存在下去，如果依然有一个鲜明的目标，如果我们并不感到正处在一个分水岭上，一边是所有对于欧洲统一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另一边就是使我们陷于长期不睦的深渊，那么，这种态度将体现为一种适当规模的真诚援助。”

杜勒斯这番保证调动了与会者们的积极情绪，扭转了局势，打开了法德之间就“军备监督”和“在战略上处于危险的地区”问题讨论的僵局。大会主席艾登趁热打铁，立即称其具有“优异的质量和值得高度评价的坦率”。艾登慷慨激昂地接着说：“在我看来，他对我们欧洲人所说的一番话，在当前的条件下，就是我们对美国方面所能希望的一切。我们所有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应该尽一切力量来报答美国对欧洲寄予的这种信任。我们应该证明我们欧洲有团结一致、力量强大的能力。”

为了作出这个表率，接下来，艾登也提出了一项英国的保证声明，其内容是：“联合王国将继续在欧洲大陆上——包括德国在内——保持现在受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统辖的联合王国部队的作战实力——四个师和战术空军部队，或维持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认为与此相应的战斗力量。联合王国愿意承担下述义务：不违背布鲁塞尔条约大多数成员国的愿望撤走这些部队，这些国家在作决定时应征询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意见。”

该项义务附有保留权，即在海外发生严重紧急情况时，可能迫使英国政府不受这项程序的约束。艾登解释道，英国是一个岛国，英国人在传统习惯和心理思想上仍然是一个岛国民族，对英国人来说，要把他们的命运和大陆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障碍重重的，之所以这样做，同杜勒斯讲话的精神一致，是希望能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一份贡献，能恢复人们对欧洲大陆团结一致的信心。

艾登的声明同样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一直对英美反应冷淡的孟戴斯—弗朗斯这时感到是一个机会，他立即表示，法国将把这两项声明看成是重建欧洲的“重要因素”。他称赞这是对实现欧洲建设共同目标的“巨大贡献”。

这两项声明实际上解除了法国长久以来的疑虑，孟戴斯—弗朗斯态度的转变使得接下来的会议得以在一种融洽的协商气氛中进行。从这时开始，阿登纳一颗悬着的心稍稍落下，人们普遍带着一种乐观的情绪注视着会议的结果。

但是，在10月1日下午深入讨论法国和比利时为“军备监督”和“在战略上处于危险的地区”的问题拟就的备忘录时，孟戴斯—弗朗斯再次出乎大家意料地奏出不谐之音。他宣布他决不全部或部分地放弃法国对这个议题提

出的最初意见，而是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将备忘录作为法国政府对解决德国防务贡献的核心问题。

杜勒斯与贝恩、斯巴克在磋商后，向法国提出了一个折中建议，但孟戴斯—弗朗斯断然拒绝。孟戴斯—弗朗斯强硬地表示要坚持法国政府建议的全部监督体制、包括军备的联合生产在内，并且威胁即使会议因此失败也在所不惜。与会者一片沉默，这显然是一个过份苛刻的要求。法国的态度使会议再度陷入僵局。

阿登纳明白，老政客孟戴斯—弗朗斯是借机在要大价钱，对法国来说，这是防备联邦德国重起的最后一道保障。但是，如若不满足法国的要求，眼看要到手的主权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想到这里，阿登纳什么也不顾，倏地站了起来。

他以一种沉着而冷静地声音说道：“我明白我们的邻国法国的疑虑，我也清楚我们的盟友美国和英国为使德国为欧洲防备作出贡献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在这里，我作为德意志联邦总理，将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名义，作如下声明：今后，联邦德国将在国内限制制造原子、生物、化学武器（即 ABC 武器）和一系列其他重型武器，包括导弹、超限定吨位的军舰和轰炸机等，并同意让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有关机构来监督这些义务的贯彻执行。我的发言结束了。”

阿登纳发表了这项声明之后，杜勒斯立即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并从会议长桌的另一头向阿登纳走过来。他一走，一边高声说——以使大厅中每一个人听得见——：“联邦总理先生，您刚才声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愿意放弃在国内制造原子、生物、化学武器。然而，您这项声明的意思是一——如同所有的国际法声明和义务那样——只有在情势不变的情况下才有效！对不对？”

阿登纳也同样高声回答道：“是。您正确他说明了我的声明。”

还有什么能比联邦德国放弃这些武器的生产更成为最有效的安全保证更明白的呢？阿登纳已作出主动态势，孟戴斯—弗朗斯无话再讲，讨论再度得以顺利进行。在会议结束前不久，情况又再次恶化。这次是涉及参加国要求对原子、生物、化学武器实行普遍监督的问题，孟戴斯—弗朗斯不肯接受对法国的有关监督。艾登和孟戴斯—弗朗斯争得面红耳赤。直到第二天早上，气氛才平静一些，终于达成了一项折衷的解决方案，决定对这些武器的研究和发展工作不作监督，同时把需作重大修改的孟戴斯—弗朗斯关于军备监督的提案，委托给一个专门委员会去作进一步讨论。

这样，在 10 月 4 日伦敦会议发表的《最后决议书》中，基本上解决了所有的原则性问题，对有待详细起草的解决办法也提供了指导方针。其中包括以下三方面的成果，基本上确立了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加入西欧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的原则：

1. 三大国和联邦德国专家委员会将安排结束对德国的占领；
2. 邀请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并提供十二个师和一支拥有一千架飞机的空军部队（与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中规定的一样）；欧洲最高盟军总司令的权力将扩大到足以制止德国武装力量的独立部署；
3. 对布鲁塞尔条约的既定目标作了修改和扩充，改名为西欧联盟（WEU），接纳联邦德国和意大利。这个组织将确定欧洲大陆各成员国对北约提供兵力的最高数额并控制所有的武器制造。

10月4日至16日这个期间，波恩、伦敦和巴黎的三个专家小组按照伦敦会议最后议定书所确立的基本方针，起草了各项协定的文本，阿登纳和孟戴斯—弗朗斯也就重新调整整个法德关系全面地交换了意见。按照在伦敦确定的时间，接下来一系列重要的会议将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巴黎召开，以使伦敦会议的成果最后确立。在巴黎关键性的会谈包括：关于终止占领制度的四国会议；关于扩大布鲁塞尔条约的七国会议；关于接纳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十五国会议以及关于法德关系特别是萨尔问题的法德会议。

10月20日，九国在巴黎续会。23日，九国最终签订了“巴黎协定”。“巴黎协定”确认了伦敦会议的各项决议，阿登纳终于实现了奋斗多年的目标：盟国对德国的军事占领彻底结束，联邦德国成为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加入北约和西欧联盟，成为西方军事集团的一员。

但是，孟戴斯—弗朗斯在伦敦时就曾声明，这些决议是否能获通过，将取决于对萨尔问题的解决。在10月7日法国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中，法国国民议会也把萨尔问题的解决作为议会批准协议的先决条件。因而，为了争取巴黎协定能获通过，阿登纳在同孟戴斯—弗朗斯关于萨尔问题的讨论中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同法国签署了萨尔协定，阿登纳同意法国保持同萨尔的密切经济联系，而联邦德国将通过一段时间才能达成同样的安排。这项协定使阿登纳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因为它包含着萨尔完全脱离德国的危险。阿登纳得到的唯一保留是将萨尔法规的决定权留给了萨尔居民，公民投票表决的时间推迟到一年以后。

阿登纳和孟戴斯—弗朗斯就萨尔问题的谈判一直进行到10月23日午夜才有结果。下半夜，阿登纳和孟戴斯—弗朗斯分手之后，避开了人们的注意悄悄地回到了下榻的饭店，他后来说这是他做了联邦总理之后心情最为沉重的一夜。

巴黎协定在各国的批准进行得相当顺利、由于英美的保证，阿登纳放弃ABC武器的声明以及法德萨尔协定的签署，使巴黎协定在交法国国民议会批准时也没有遇上麻烦。

苏联方面，1954年3月，苏联把主权授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样苏联对西方重新武装西德再也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明确的反对表示。

1955年5月5日，巴黎协定生效，联邦德国成为主权独立国家，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和西欧联盟。持续五年之久的联邦德国重新武装之争，终于像阿登纳所预料的那样，为西德带来了完全主权，并使它作为平等的一员登上了欧洲国际舞台。

阿登纳实现了争取国家主权地位的第一大外交目标，此时距联邦德国立国仅六年。

第六章 美苏之间

谁要是作为西德政治家想为德意志民族谋利益,就必须弄清楚我们东西邻居的利益和趋向。如果他要现实地估计自己的活动余地,就必须设身处地用东西邻居的眼光来估量局势。

——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大国》
——施密特回忆录》

“最好的欧洲人”

“他们完全明白,他们作为人类领导者和所有人类理想的保卫者所应负担的巨大责任。”

——1953年4月阿登纳在美国参议院
外交委员会的讲演

按照阿登纳自己的说法,他完全是根据联邦德国现实利益的需要来决定联邦德国在东西方冷战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倒向的,但实际上,他对美国和苏联的立场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经验体会的判断。他出身于莱茵,笃信基督教,决定了他要将国家置于西方自由世界而反对苏联无神论极权主义。同时,他永远都记得,在二战中他为纳粹所迫害的时候,是美国人到来解放了他,并使他再度当上科隆市长。

总起来看,阿登纳所有外交政策的制定也是以美国的对欧政策为基础的。他是“美国坚守欧洲”口号的坚定支持者和呼吁者,在他看来,没有美国的支持,战争中衰落的欧洲各国无论如何无法抵御苏联极权主义对西欧的侵害,欧洲将失去自由,失去民主,沦落到共产主义的“奴役”之下。他常讲,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联邦德国和欧洲将不堪设想,而他作为联邦共和国的总理,没有四位杰出的美国人提出的明智意见和给予的支持,也绝不可能取得他所取得的成就。这四位美国人是:迪安·艾奇逊、卢修斯·克莱、约翰·麦克洛伊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说,在欧洲处于失望、苦闷、徬徨和危机之际,是他们鼓起了欧洲人的信心,拯救了欧洲,也振救了联邦德国。他有一次对杜勒斯不无感慨他说:最好的欧洲人在美国。在阿登纳眼里,美国人以他们无私慷慨的行动,支持着欧洲,并推动了欧洲的前进。

从马歇尔计划开始,阿登纳便极为关注美国的政策动向。在有关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和德国条约的谈判中,阿登纳和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关系大为增进。1952年11月4日,美国举行了新一届总统选举。结果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将军取得了胜利。这样,阿登纳最为关心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否会继续贯彻民主党和属于该党的杜鲁门总统所制定的现行欧洲政策?

在艾森豪威尔没有当总统时,阿登纳曾经见过他两次。第一次是在1951年6月,艾森豪威尔作为北约组织最高司令官访问过联邦德国,阿登纳接见了。第二次是1952年5月,艾森豪威尔因御任前来向联邦总理阿登纳辞行。

当然,在公开场合中,阿登纳对艾森豪威尔大加赞扬,说他在担任北约组织最高司令官时坚决顶住了苏联压力并促进了欧洲各国的团结,这两次会

面也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但是，这一时期在美国和欧洲流行的一些论调却使阿登纳感到有些担心。舆论界屡屡称美国新政府对苏俄和欧洲将来采取一种不同于杜鲁门政府的态度。考虑到美国政府可能会立即接受与苏谈判，以消除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因而它对欧洲、对联邦德国的关切心情将会消失。阿登纳决心接受杜鲁门总统时期发出的访美邀请，尽快将白宫易主之后德美关系的核心确定下来。艾森豪威尔就职后，又重申了这一邀请。

1953年2月，美国新任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安排了一次到欧洲各国的巡回访问，其目的是实地考察欧洲政治形势的现状，以便于尽快确立美国新的对欧政策。阿登纳把杜勒斯此行看得极为重要，一方面他想通过杜勒斯对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态度，了解美国新政府对欧洲政策的新立场，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将其作为协调德美立场和密切两国关系的重要契机。这将有利于他安排确定访美事宜。

杜勒斯后来把这次访问看成是他与阿登纳终身友谊的起点。阿登纳和杜勒斯都是属于不太能与人亲近的一类人，他们都冷漠、坚定，在待人接物方面有时甚至有些僵硬。但是，在交谈过程中对对方敏锐政治洞察力的钦佩使他们从一开始就互相喜欢并且相互尊敬。这种友谊在以后两人交往的岁月中大为加强，也极大地促进了德美关系的进一步密切。由于两人都笃信基督教，有人曾说，“把他们联结起来的最强大的纽带，也许是他们对上帝的忠实信念和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憎恨。”这种说法也许有它的道理，他们都从宗教信仰出发厌恶无神论，反对共产主义，他们的名字以坚决的反苏斗士而并列在一起。在两人认为是最关重要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各自国家如何取得最佳地位来对付苏联人的问题上，他们的见解往往不谋而合。阿登纳很早就发现，同美国政府打交道远比同英法打交道更富有成效。1954年，在法国否决了建立欧洲军计划之后，阿登纳告诉杜勒斯，他发现美国是联邦德国最可靠的盟友；而杜勒斯的批评者们也宣称，出于同德国领导人个人的友谊，杜勒斯使美国国务院实际上是在为阿登纳的外交政策效劳。

在杜勒斯1953年2月首次访德期间，阿登纳为他作了详细的安排，使杜勒斯在联邦德国停留期间尽可能多地与德国各党派政治家会晤，听取他们的广泛意见，并向他们明白无误地阐明美国的政治态度。杜勒斯向阿登纳交了底牌，美国的欧洲政策是由美国的利益所决定的，而美国的利益在于欧洲的统一和加强，艾森豪威尔总统交给他的特别任务是，再次促使欧洲防务集团燃起“生命的火花”，美国希望联邦德国尽快作出表示。

1953年3月19日，阿登纳终于争取到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在联邦议院的三读中，以多数获准通过。这算是可以作为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答复，有了这个作保证，阿登纳把他的访美行期确立在1953年4月初。

阿登纳首次访美相当及时，刚好是在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引起国际关系捉摸不定的时刻，也刚好是在艾森豪威尔确定其政治战略的时刻。此行对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德美特殊关系的形成意义非同一般。

1953年4月2日，阿登纳乘“合众国”号客轮从勒阿弗尔港启程赴美。“合众国”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客轮。由于在第一、二天遇上了暴风雨，足足经过了五天的航程方抵达目的地。

4月6日，“合众国”号抵达纽约港。港内汽笛齐鸣以示隆重欢迎，从而代替了会令人尴尬的礼炮鸣放，因为这时联邦德国的地位还是一个被占领国。行前，阿登纳并不期待通过这次访问能缔结协定，或得出什么明确结论，

因为前不久法国总理梅耶、外长皮杜尔以及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对华盛顿的访问均未能取得重大成就，他只是希望能与美国政府逐一讨论双方特别关心的问题，并就世界总的政治形势交换意见。他把设法协调两国对政治形势和欧洲形势的看法，为共同的政治行动创造先决的心理条件，作为访问的主要目的。

阿登纳在轮船的甲板上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他的讲演天才令他大得人心。他告诉记者们，在他踏上美利坚合众国国土时的第一个感想，是一种对美国人民感激的心情。他说：

“一个战胜国的人民能像美国人民那样对战败者肯伸出他们的慷慨援助之手，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而且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是用一切方式表现出来的，从个人对个人、组织对组织，以及通过国会的决议和美国政府的措施等等。德国人民由此重新获得勇气，恢复自信心，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德国人民因而深信，暴力和自私并非是推动人民生活的唯一动力。

.....在我们时代的包括这多么黑暗篇章的历史中，将用金光闪闪的大字谱写下这样一句话：‘美国忠实于它的传统和依靠它的力量，已担当起保卫世界自由的责任！’

他的讲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新闻媒介对此进行了热情的报道和宣扬，称他是“新德国的总理”。掌声之中揭开了阿登纳的访美序幕。

第二天一早，阿登纳乘坐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哥伦拜因”号专机飞抵华盛顿。天空下着微雨，在华盛顿的军用机场上，阿登纳受到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以及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的欢迎。

当时美国对德政策趋向还很不明朗，美国政府和国会内的孤立主义思想很严重，许多有权威人士正在建议美国应当拒绝卷入欧洲防务，国会为此争论不已。阿登纳非常明白美国政府这种微妙的处境，在讲话中他小心谨慎，极力避免助长这种孤立主义的倾向。

副总统尼克松是个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人，他明白德国对美国欧洲政策的意义，当然舆论影响也很重要，所以他特意将其欢迎词所要表达的中心，确立在认为阿登纳访美是“德美两国人民之间关系的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开始上，他从历史上追溯德美关系，提醒美国人，德国人一开始就曾帮助过美国建立国家。他举出了德国的冯·施托伊本男爵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曾给华盛顿将军以有力援助的事。他说：“美国人既没有忘记斯托伊本，也没有忘记数百万的德国人，他们到我们这里来，为增强我们共和国的力量和内部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这种长期的传统友谊悲剧性地中断了一段时期。我们两国因诉诸武力而彼此疏远了。今天，我和我们千百万同胞一起祈祷，愿我

弗利德里希·威廉·冯·斯托伊本男爵是一名普鲁士军官，1777至1778年冬，在福吉谷他曾服役于乔治·华盛顿军中，主管大陆车队的训练工作，并取得卓越成效。美国在阿登纳下榻的布莱尔大厦附近的公园中，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们本着古老的传统精神，跨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和平和友谊的新时代。”

尼克松的讲话令阿登纳心悦，他对这个年轻人充满了好感。国务卿杜勒斯也发表了一篇同样热情的欢迎词。他说：

“……在过去八年中，美国政府和人民站在那些勇敢和卓有成效地设法清算过去的遗产和建设一个新德国的德国的男男女女这一边。他们正站在一个新德国的大门口，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并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同所有热爱自由、愿意保卫这种自由权利的国家联合在一起的新德国。我真诚地希望，我们在华盛顿的会谈将促进我们的共同事业。并对形成和实现一个新的自由国家人民的大家庭作出贡献。”

阿登纳感谢美国人的真诚，也借答辞表达了他的决心。他说：“德国人民将站在自由世界一边，站在为维护各国人民的权利和正义这一边。联邦德国将是在走向自由和平道路上的忠实热情的伙伴。”

阿登纳将访问的一大重点放在努力弥合二战创伤带来的德美关系裂缝上。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阿登纳向冯·斯托伊本男爵的塑像敬献了一个花圈。阿登纳又向美国提出要在阿林顿国家公墓无名战士墓前献花圈。他将其看作是战后历时8年艰苦工作的顶点，希望借此克服仍然对德敌视者的巨大心理障碍。美国政府把这次活动安排成了一次非常隆重的仪式。

这次活动在美国引起空前的反响。阿林顿国家公墓的无名战士墓是美国政府为在二次大战中死难的士兵塑建的，阿登纳以这样的方式向美国、向全世界表明他将结束敌对时代的决心，同时也表达他对二战中纳粹德国所犯下罪孽的深深忏悔。这把他在美国访问引向高潮。

多年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阿登纳对这个历史性的场面作了下面的描述，他说：

“到达墓地时，我受到一位美国将军的欢迎。他伴送我走到墓前。我们后面跟着三位掌旗的美国人，当中一位执的是一面德国国旗。墓前广场上排列着美国武装部队各军、兵种的连队。当我和那位将军走向墓碑时，德国国旗紧跟着我。这时墓地上鸣起了二十一响礼炮。在响彻云霄的号令声中，我在墓前献上了结有黑红金三色彩带的花圈，这个花圈是献给两国人民死者的。一个美国军乐队奏起了德国国歌。我看到我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位在流泪，我也深受感动。从1945年彻底崩溃的年代起，直到1953年德国国歌在美国荣誉公墓上空响起的这一刻止，经历了一条漫长而又艰巨的道路。”

这次访问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令美国人大为感动，作为一个忏悔的战败国的总理，同时又是作为欧洲事业的热情捍卫者，阿登纳在美国受到了热烈欢迎。他随时随地都在使美国人感到他对美国坚守欧洲的感受和他准备参加以美国

为领导的自由世界的决心，这种态度使美国人感到他甚至比英法的领导人更为亲切。他接受了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学位证书中称他为“自由的先驱者和欧洲统一的朋友”。他在授予学位仪式的致词中说，他将努力致力于自由世界反对无神论极权主义破坏势力的艰苦斗争之中。在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为他所设的早餐欢迎会上，他向无冕之王们表示：“我们要自由。我们厌恶共产主义。因此，我们要把德国人民的未来紧紧地同西方民主国家联系在一起。……我们准备为了共同保卫自由而贡献我们的一切。”在他参加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谈时，他得到了政治家们的热情赞扬，称他是“致力于那种使世界上的人能更多地相互了解活动的领导者之一。”他的言行时时表示出他对人们所寄予深切厚望的领悟。

阿登纳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他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会谈极尽人意。这次（同新政府领导人的）会谈使阿登纳获得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即白宫的新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西欧防务的必要性，并将全力支持欧洲防务与欧洲一体化建设。在有关德国统一的问题上，阿登纳得到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坚决支持。美国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称美国将尽力促使在和平和自由的情况下重新统一德国。在历时三天的会谈中，双方自始至终都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在进行，并且在观点和目标方面取得了广泛的一致，真正加固了德美友谊的纽带。

此次访问成为阿登纳同艾森豪威尔政府友好合作的开端，他同杜勒斯的个人友谊也从此确立起来。正是这次有意义的美国之行，加深了德美双边的真正了解，阿登纳在大洋彼岸找到了他欧洲政策和德国统一政策的真正拥护者，而美国则明白认识了一位在欧洲抵御苏联进攻的坚强斗士。此后在阿登纳执政期间，总共七次访美，每一次他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人对这位新德国的领导人具有相当的好感，他们为他的正直、刚毅、顽强不屈的个性和精神折服。这些访问也使他在美国政界和新闻界拥有了许多朋友，通过他们他了解了美国，也使美国了解了联邦政府的意向。这些成为今后德美关系巩固不可或缺的基础。

警惕俄国人！

“这是从国际革命、世界革命的观点出发的，因为这一链条的主要环节是德国，因为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而世界革命的成功多半取决于德国革命。”

——1918年10月22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见《列宁全集》1956中文版第28卷第106页

他们不折不扣地按列宁的口号行事：“谁有了德国，谁就有了欧洲”。

——《阿登纳回忆录》（一）

就像阿登纳自始至终都在呼吁欧洲团结，促进德美关系一样，阿登纳自始至终都在不懈地告诫西方世界要警惕俄国人的阴谋。

从冷战一开始，阿登纳就是西方冷战政策的坚决拥护者。他认为俄国人在战后的目标就是要继续自彼得大帝以来历代沙皇的侵略扩张政策，要向西方推进，要在欧洲占有或征服新的地盘。对德国，阿登纳认为，俄国人表示得很清楚，首先他们决不会放弃已经取得的德国领土，而且他们还有野心致力于进一步吞并整个德国，西方无论如何必须对此高度重视。

1952年，俄国抛出了中立化、非军事化统一德国的方案。联邦德国和西方国家中中立主义的观念陡然盛行，阿登纳从苏联人政策的各个方面对西方分析，呼吁这只是俄国人的一次狡猾伎俩，是引西方上当的圈套。阿登纳非常同意美国驻莫斯科外交代办乔治·凯南当初对苏俄的看法，后者认为苏联人对理智的逻辑不感兴趣，却会屈服于武力的逻辑。阿登纳说，占有苏占区和柏林从各个方面来看苏联的政策都是相当重要，俄国决不会放弃。首先苏占区和柏林是苏联可以对西方施加决定性影响的一个重要阵地。其次，如果苏联松手放开，其后果即使不是苏联在东欧建立起来的整个卫星国地带全部瓦解，也是要引起卫星国的严重的动摇。阿登纳指出，即使西方与苏联的和解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也只能是在时机成熟时才会实现，而在眼下看不到这种可能性。阿登纳不辞劳苦地寻找途径向西方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有关这一切。由于阿登纳的坚持，西方国家顶住了苏联的压力，坚持了阿登纳提出的在自由与和平中统一德国的主张。

1953年春天，斯大林去世，这使得一向高度极权的苏联内部受到一次强烈的震动。苏联最高领导层一度出现权力交接过程中的不稳定事件，这使得苏俄在外交政策上放松，显示出了一种比较容易接近的态势。西方国家以一种开朗的心情关注着来自克里姆林宫失去最高权威后的一切变动。4月份，艾森豪威尔主动向苏联提出了一个和平倡议。5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又就建议召开四国首脑会议在英国下院发表了演说。

为了给相互谅解指出一条可能的途径，丘吉尔在讲演中提到了洛加诺公约。一次大战后，德国是借助于它冲破凡尔赛条约约束的。邱吉尔将洛加诺公约作为解决德国问题的一个办法提出。

这种微妙的变化立刻引起了阿登纳的担心，长期以来在东西方关系中他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西方盟国越过联邦德国去与苏联搞谈判妥协，这不仅将损害联邦德国的利益，而且会使得他的德国统一政策失去基础。按照阿登

纳的构想，德国统一必须要在西方足够强大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只有西方足够强大，才能迫使苏联按照有利于西方的意愿条件统一德国。否则，不以实力为谈判基础而和苏联搞妥协，必将损害德国的利益。5月15日，飞抵伦敦的阿登纳在唐宁街10号与丘吉尔就他对当前形势的担心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尽管丘吉尔保证英国不会越过德国去进行谈判，但阿登纳的担心却仍然不能解除。

阿登纳也完全有理由作这样的担心。因为西方三大国并不是联邦德国，他们的国家没有分裂，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在波茨坦，西方在与苏联讨论时就是这样讲的：让我们以牺牲德国为代价而相互达成一致吧！正是这样，德国分裂了。以一项大国的共同政策加于德国的危险自1945年以来就一直存在。在联邦共和国建立以后也是如此，阿登纳从一开始起，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竭力摆脱这种危险。最后的对德和约尚未能达成，西方国家只在口头上而没有在法律上，承担同联邦德国一起为实现德国在自由中统一而努力的义务。因此，阿登纳政府不得不经常强调这一点，以重新得到这样的肯定和保证。阿登纳打了个比方，说联邦德国随时处于四大国磨盘上，如果它被卡进磨盘当中去，它就完了。所以他必须随时警惕这一点。

艾森豪威尔的4月声明和丘吉尔5月11日演说之后，苏联方面通过《真理报》社论发出了一个信号，说“苏联一向愿意极其认真地考虑任何旨在保证和平与促进各国之间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尽可能紧密联系的建议”，美英法三国决定召开一次三国外长会议。阿登纳感到大国外交进入了一个十分动荡的局面中，这种形势要求德国人特别小心谨慎，因为它将直接涉及德国问题和德国的利益。阿登纳决定要赶在西方三国外长会议之前，再次通知西方三国重新确认重新统一德国的立场。1953年5月29日，阿登纳向艾森豪威尔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6月10日，根据联邦政府的倡议，阿登纳向联邦议院也提交了一份决议，再次确认和平和自决是重新统一德国的先决条件。

1953年6月17日，在东德和东柏林地区暴发了一次起义，使得阿登纳的要求在西方国家看来合理而及时。

这次起义直接的导火线是民主德国的部长会议在1953年5月28日作出的一项决定，其中规定将生产定额平均提高十个百分点。这一决定在工人中引起了很大的骚动。6月16日，柏林斯大林大街（即过去的法兰克福大街）建筑工会工人团宣布抗议提高生产定额而举行罢工、游行，行动得到许多人响应。人们涌向市中心莱比锡大街的占领区政府所在地，要求取消提高生产定额，并要举行自由选举，乌布利希政府下台，等等。尽管德国统一社会党当天发表声明，建议取消提高生产定额，形势并未好转，反而是整个东部德国都骚动起来，许多城市，甚至农村都发生了示威游行。在柏林，苏军出动了几百辆坦克和战车进行封锁，苏联军事司令官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并对起义者实行镇压。起义后，苏军全面加强了对东德和东柏林地区的封锁。

起义事件让阿登纳感到东部事态的危急，认为有必要借此重新提醒西方大国警惕俄国人的阴谋。原定于6月中旬召开的西方三国外长会议由于丘吉尔患病而推迟，改期在7月10日。阿登纳给外长会议主席杜勒斯去了一封信，突出阐述了他对德国问题和欧洲防务集团问题的想法。他委派部务主任布兰肯霍恩飞往华盛顿向杜勒斯递交，并指示布兰肯霍恩在会议期间留在华盛顿设法参加会议。

西方三国已决意要召开一次四国会议来讨论德国以及欧洲安全的问题，

阿登纳无力阻止，但他仍然想借此提醒三国重视俄国对德国怀有的野心。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杜勒斯的帮助和布兰肯霍恩的机智，阿登纳成功地对三国发挥了影响。三国会议并没有邀请联邦德国派代表出席，而未受邀请径自出席难免会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尽管是不速之客，但布兰肯霍恩却以机智灵活的方式充分表达了联邦德国的意愿，完成了阿登纳交给他的艰巨任务。杜勒斯也帮了阿登纳一个大忙，他在三国外长第一次会见时，就宣读了阿登纳写给他的信。这封信对会议的进程起了积极的影响，三国外长同意了阿登纳在信中所提的各项要求。

7月2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给阿登纳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因东柏林起义事件而对德国问题和欧洲防务集团问题产生新的想法。英国外长索尔兹伯里勋爵在他向英国上议院报告关于华盛顿外长会议经过情况时，也指出英国应支持德国的自由选举和自由的全德政府的根本原则。勋爵说，“我相信，至于德国是分裂还是重新统一，则将由全体成员来共同作出抉择，而不会听命于某一个国家的野心，这是千真万确的。”法国皮杜尔虽未明确表示支持联邦德国的要求，却也显示出对苏联照会的谨慎。在这种情况下，阿登纳对行将于1954年1月到2月召开的四大国柏林外长会议方稍许放心。

1953年12月，阿登纳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防务集团参加国召开外长会议的机会，在巴黎再次主动找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单独谈话，并与他们就苏联人的态度和将要召开的柏林四国会议深入交换了意见。

阿登纳向他们仔细分析了苏俄政策的特点。

他说，他曾经反复研究过俄国人的政策理论，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论证苏俄统治者以他们的意识形态、强权感确信共产主义总有一天将统治全世界，西方国家反复出现的不团结加强了苏联人这种意识，苏联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作为资本主义体系主要基地的美国，总有一天会发生经济崩溃，那时共产主义胜利的时机就成熟了。苏联人也确信，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永远不会达到团结一致、足以抵制以共产主义苏俄为领导力量的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资本主义世界行将崩溃。这一点使苏联不会放弃对西方的分化瓦解。

从历史上来讲，俄国一直是受着不断的扩张欲所支配。近两个世纪来，这种扩张欲通过泛斯拉夫主义在滋长。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它又借共产主义而获迅速蔓延。基于俄国人的这一心理状态，他们在1945年后征服了东欧国家，又使东欧成为俄国共产主义的侵略火网和在资本主义国家前的一道屏障。如果有人要确切理解俄国共产主义，那么他必须明确，它是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混合物。

阿登纳继续说：“从苏联的扩张欲以及主宰全世界的意图出发，遂有冷战的手段产生。这种冷战手段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从大规模的压迫一直到某些几乎无法觉察的行动，但主要是通过威胁性的恫吓手段。几年来，苏俄在苏占区（东德）里驻有三十个左右装备精良的作战师，对德国和西欧进行威胁，我们在联邦共和国很了解苏占区和东欧卫星国的情况。从目前来看，并没有出现什么迹象，表明俄国已放弃它的企图。在俄国，尤其是在西线，军备扩充丝毫不减。眼下苏俄在卫星国中驻有七十多个师，配备着最现代化的武器。后面还有一百四十个俄国师，配备有好几千架喷气式飞机。苏占区内正在建造喷气式歼击机机场，可以在二十分钟内飞临波恩，三十分钟内飞临

布鲁塞尔，五十分钟内飞临巴黎上空。自由国家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并保持高度警惕。”

接着，阿登纳又谈起了在1952年10月初，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斯大林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这篇文章里，斯大林明确苏联仍然是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行将崩溃的那种信念作为政策的依据。斯大林在文章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这种观念在斯大林死后的今天，仍在苏联继续。

谈话中，阿登纳也提到西班牙教授萨尔瓦多·法·马达里亚加所写的一篇文章关于东西方政策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53年5月3日的《新苏黎世报》上，它对这方面作了十分形象的比喻。作者在文章里将所有各国的政治家比作一列汽车队，为首的是俄国人开的车，俄国人开得快，大家就开得快；俄国人说：“停！刹车！”大家就刹车。文章说：无论如何，在今天已经形成的新形势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欢迎和必要的警告，这一警告就是一个征兆，说明迄今全世界按照莫斯科的旨意亦步亦趋已到了何种程度。莫斯科命令“全速”，全世界就高速奔驰；克里姆林宫说：“慢点！”，于是速度就会都降低。如果维辛斯基狂叫，全世界就跟着他狂叫；他微笑，世界上其余的人也就跟着微笑。他只要在半天时间里比平时稍稍收敛侵略性，全世界就会开始看到新时代的一轮红日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阿登纳向他们郑重指出，没有西方国家之间的以及西方国家同联邦德国之间的团结一致，参加四国会议就等于是自杀！

艾登点点头，表示了同感。他认为西方盟国首先必须在针对俄国人的问题上意见一致。他说，苏联人在采取拖延的策略，想使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处境更加为难，目前最重要的是，应该警惕苏联人想通过这种拖延策略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搁置起来的企图。杜勒斯也表示，应立即解决欧洲防务集团的问题并着手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否则会加深美国人对欧洲的失望。

这次会谈也是在1953年9月6日联邦议院选举基民盟大获全胜后阿登纳同杜勒斯的第一次见面。杜勒斯为这次选举的结果向阿登纳表示了衷心的祝贺。他告诉阿登纳，在欧洲有一个能够作出坚强而果断决策的政府是重要的，这将会创造同美国人紧密而良好地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许多小国政府是随大流的。美、德两国政府应该对政治发展发挥指明方向的影响。

阿登纳由衷感激杜勒斯对他如此的理解和信任。

杜勒斯和艾登同意了阿登纳对举行这样一次会议应注意的必要性的看法。在与法国商议后，四国取得了一致。

阿登纳的苦心呼吁得到了收效。1954年1月25日，美英法苏四大国柏林会议一开始，杜勒斯就在接受莫洛托夫所建议的议程之后，表示他主张优先讨论德国问题和奥地利问题。皮杜尔和艾登也立即跟上，说希望“尽快地转入重要性的事务”，避免一连数月的辩论议程而把会议拖延下去的危险。西方三国立场的统一，成功地使苏联回到集中讨论重新统一德国这个双方纠缠了很久的问题上。阿登纳认为这是对苏的一个巨大胜利。

柏林会议进行中，艾登和莫洛托夫各提出了一个德国计划。

艾登计划与德国联邦议院在1953年6月10日提出的要求大致吻合，代表了西方三国包括联邦德国对德国统一的立场观点，包括了下列要点：

1. 进行全德的自由选举；
2. 召开经过选举而产生的国民议会；
3. 草拟宪法和准备有关缔结和约的谈判；
4. 通过宪法并成立负责谈判和约的全德政府；
5. 和约的签署和生效。

艾登计划的出发点是，必须以自由选举作为统一德国基础上的第一步。只有通过自由选举才能产生国民议会，才有权利制定宪法，并在宪法的基础上成立起合法政府，最后由合法的全德政府和谈，缔结对全德具有约束性的和约。

莫洛托夫对艾登计划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抨击，他认为它没有给德国以足够的自由。莫洛托夫的理由是：这是按照西方计划组成的德国政府，由于随即它要受到加入欧洲防务集团的约束，它就已无权决定有关两个德国的问题。

莫洛托夫旋即提出了他的四点计划，其内容与艾登恰好相反，其顺序是：先让两德代表共同拟定和约，由两德议会组成临时政府，再由临时政府负责全德选举，最后组成统一后的全德政府。莫洛托夫还提出，在举行全德选举前要先撤出占领军，选举后德国还要做到“不结盟”。

莫洛托夫等于是重提了 1952 年苏联人在照会中所谈到的中立化的观点，他的建议遭到西方一致反对。西方反驳道：“如果选举前撤出军队，西方就无法有效监督选举的进行；而且，德国是否结盟则应由统一后的德国自行来决定，他国无权干涉。”双方坚持己见，会谈又无果而终。柏林会议唯一的成果是，四大国达成一项在日内瓦召开一次关于亚洲问题国际会议的协议。

阿登纳自始至终都关注着会议的进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飞返华盛顿途中，在德国机场稍事停歇。他向阿登纳通报了柏林会议进行的情况。阿登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西方国家没有“出卖”联邦德国。

杜勒斯告诉阿登纳，柏林会议是很说明问题的，因为俄国人表明，他们决不打算放弃他们占有的任何东西，而是相反试图得到更多的东西。苏联当权者害怕西方所理解的那种自由。

杜勒斯说，他曾在一次私人谈话中与莫洛托夫谈到了凡尔赛条约。当时他讲，不能允许凡尔赛条约重演。而莫洛托夫的回答是，“凡尔赛条约可一点也不坏呀！盟国本来就是应该对德国政府实施管制的。如果这样做了，而德国人又在凡尔赛条约下履行其义务，那么凡尔赛条约又有什么好反对的呢！”——杜勒斯话头一转，“联邦总理先生，您曾认为举行这次会议并将会议进行到底是重要的，以便向全世界揭露苏联的真正意图所在！现在，这次会议已经进行到底了，并且已经证明，就是在斯大林死后，俄国人也没有进行任何妥协的打算。我相信，会议的结果已使每一个具有理智的人信服这一点了！”杜勒斯确信了开会前阿登纳的判断，这使他俩的观点更加一致。

阿登纳从柏林会议得出的结论是，莫洛托夫在柏林以值得感谢的坦率程度说明了苏联的最后目标，是要称霸欧洲。阿登纳认为苏联现有欧洲政策的主导思想是，要维持占领和所有管制地区内的政治地位现状，并以现有地位为基点，一俟时机适合，就进一步染指欧洲。阿登纳告诉杜勒斯，“将整个欧洲置于苏联统治之下——这就是苏联所谓安全计划的含义；将德国置于苏联的统治之下——这就是苏联德国计划的含义。所谓中立化就是苏维埃化！

西方国家自由世界的人们必须随时把苏联人的欺骗性语言转译成体现他们真正意图的语言。”

1954年2月19日，阿登纳给社会民主党联邦议院议会党团主席奥伦豪尔写了一封信，再次向后者阐明他对德国重新统一的观点，他希望寻求两党观点立场的统一。他在信中写道：

“我们德国人的当务之急，必须是消除任何猜疑，以为德国可以像莫洛托夫公开认为能够做到的那样永远习惯于两个国家的存在。此外，我们首先必须向苏联清楚指出，皮克——格罗提沃政权想借助诸如成立一个临时政府或任何一种形式的全德委员会之类的方法，以拯救德国的将来，并且为德国准备一个卫星国的命运，那是毫无希望的。我们必须指明，在自由中重新统一德国将是欧洲秩序与和平的一个因素，它也能保证苏联各族人民的安全与幸福。

“联邦政府以及作为它后盾的联邦议院和参议院的大多数迄今所奉行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这一正确性在柏林令人信服地得到了证实。这为我们今后的道路指明了方向。我们必须始终站在西方这一边。我们必须坚持西欧联合的政策。我们依然奉行使用一切方法沿着各种道路——包括必要的曲折道路——使德国在自由与和平中重新统一的政策。”

遗憾的是，社会民主党对苏联的政策另有一套看法。奥伦豪尔认为采取像阿登纳那样强硬的对苏立场并不利于德国问题的解决。他拒绝了阿登纳的观点，表示社会民主党将奉行它自己的德国统一政策和对苏政策。阿登纳深感遗憾。但他坚信他所走的是一条正确道路，他仍然以极大的努力呼吁德国和西方：警惕俄国人！警惕来自东方的威胁。

微笑的会议

“我唯一的说明是，我们归根到底是在寻求欧洲的和平，因为它对于世界的和平是重要的。所以说，要能够取得进展，是不应该取决于其他任何东西的。这应该是无条件的。”

——艾森豪威尔在 1955 年 7 月日年瓦
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1955 年的世界局势发生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以一系列的事件为体现的。1954 年初的柏林会议尽管没有达成任何有建设意义的协议，却为东西方在尖锐对峙了几年之后坐下来谈判开辟了一条道路。有人在 1954 年日内瓦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决议中已经看到东西缓和的端倪，1955 年苏联把奥地利问题提上桌面，并协商解决，更加使人感到东西方缓和的曙光。

战争结束以来，美英法苏便就奥地利问题进行了长期谈判，但却一直未能达成协议。在 1953 年 1 月的柏林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仍然坚持德奥问题必须一起解决，而且认为必须等到签定对德和约以后，苏联才能撤出它的驻奥军队。进入 1955 年，苏联政局变动使形势出现变化。在苏联高层领导权力斗争中，马林科夫终于失败。随着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领导班子的登台，苏联人宣布要用一种全新视角来看待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他们改变了过去对奥立场。2 月 8 日，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发表了一项声明，一改过去坚持对奥和约必须以签订对德和约为前提条件的立场，建议美英法苏立即召开四国会议，讨论对奥和约问题。苏联的这一姿态最初被西方看作是阻碍伦敦条约和巴黎协定批准的阴谋，阿登纳毫不相信苏联诚意，曾尖锐指出苏联意在反对和拖延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西方阵营。但是，在 1955 年 3 月法国和联邦德国分别批准了两条约后，苏联在对奥问题上仍然保持的温和态度，这使西方改变了认识。苏联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即是保证奥地利中立。苏联的转变使奥地利问题的解决进展神速。4 月，苏奥谈判取得满意的结果。1955 年 5 月 15 日，苏美英法顺利地同奥地利签订了《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条约》，规定恢复奥地利为“一个主权、独立和民主的国家”，四大国保证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最迟于 1955 年底撤走占领军。

对奥和约的缔结，消除了欧洲的一个争执热点，美苏双方都感到十分满意，也使阿登纳看到德国问题解决的希望。他开始注意苏联的变化。西方各国认为苏联对奥问题的态度变化，反映出苏联政策方针的转变，于是邱吉尔向苏联发出了参加四国首脑会议的邀请。苏联也破天荒地在 5 月 26 日正式接受了这一邀请。各国开始就首脑会议事宜磋商。各方在互换照会，最后一致同意四国首脑会议将于 1955 年 7 月 17 日至 23 日在日内瓦召开，称届时美英法苏将共同协商解决战后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的办法，四国会议还将致力于消除至今还存在的冲突根源以及东西方的矛盾分歧。

会议召开前，西方国家在向苏联发出邀请时，就对会议的进行方式产生了分歧。艾森豪威尔和艾登认为要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丘吉尔则不以为然，觉得这应是一次无拘无束的首脑会议，不必规定具体的议事日程。根据过去经验，丘吉尔并不认为这次首脑会议会解决什么问题。为统一观点，西

方事先在巴黎举行了一次专门会商以研究这个问题。阿登纳应邀参加了这次会商。

巴黎会商的结果令阿登纳失望。大家观点虽统一，但美英法三国均认为通过日内瓦会谈而确立起东面方首脑会谈的机制更为重要。他们认为解决德国问题需要时间和耐心，因而讨论将是会议的重点，为此三国认为邀请书中并不应确定既定的会谈议题。阿登纳本寄望于趁热打铁，在奥地利问题解决之际，通过首脑会议进一步解决德国问题，但三国的想法与他完全相反，阿登纳告诫三国外长，同苏联这样的对手打交道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强调在向苏联发出邀请时必须提到德国问题，三国邀请书以这样的处理方式并不适合。但是他的抗辩一无用处。三国邀请书中并未确定讨论议题。

在对奥和约的讨论过程中，还把另一个问题的讨论搞得沸沸扬扬。苏联在使奥地利中立化的同时，顺带提出建立一个欧洲中立带的思想。欧洲和美国政界、舆论界的不少人对此非常感兴趣。比利时前外交大臣保罗·范·齐兰认为在欧洲中部横贯欧洲建立一个非军事化和中立化地区，同时对这个地区东西两边区域内的军队人数加以限制，将有利于调停东西方冲突。美国《新闻周报》在1955年5月16日刊登了一篇（阿登纳认为）“危言耸听”的有关报道，说美国打算提出自己的一项中立化计划，作为对苏联提出的在欧洲建立一个包括德国在内的中立地带的建议的答复。美国将建议把苏联的卫星国纳入中欧的大中立区。报道还明确他说，这项计划目前还在制定中，负责人士对哪些东方集团国家应包括在中立区内，意见还不一致。但制定者们在有一点上却是一致，即作为盟友的德国，其损失只能通过苏联军队撤退至苏联战前边界后边的地区得到补偿。另外，阿登纳还得到有关消息，说美国有些团体正致力于将满足美国的这一要求与俄国人使德国中立化的要求二者并在一起加以解决。

西方世界一再有人转弯抹角地谈到中立问题和德国中立化问题令阿登纳顿感紧张。他担心这个问题有可能在日内瓦首脑会议期间被提出来，这对联邦政府来说将会极其不利。

更让他担心的是美国政府的態度。1955年5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先后就中立化这个问题发表了讲话。17日，杜勒斯暗示美国对包括东欧卫星国在内的欧洲中立化计划并不感到厌恶。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则作了更为明确的表示。当时法国《世界报》记者问他：“总统阁下，您能否对苏联领导人即将访问南斯拉夫一事以及有关两个世界之间建立中立国家地带的普遍想法表示一下您的态度？”艾森豪威尔回答：“不行，这次访问的背景是什么，我说不上来，我只能说，希望取得某种形式的接近显然是存在着的。但是，对于这种接近的细节我们却一无所知。我想说下面这些话：横贯欧洲南北可以建立一系列中立化国家的想法看来正在发展。现在，请你们回忆一下：在关于奥地利中立化的条约中并没有说奥地利解除武装。它并不是真空，并不是军事真空。它是以瑞士为榜样的。瑞士负有维持自己中立的义务，我相信瑞士将为中立而斗争到底。这就是说，这种性质的中立与单纯的军事真空完全是两码事。”艾森豪威尔把话说得很明白，就是说美国政府显然愿就这一情形下的德国中立作出考虑。

阿登纳不能不重视美国政府这种意向，它将会严重损害联邦德国的德国统一政策。他立即嘱咐驻美大使克雷克勒要求会见国务卿杜勒斯，以转达他的忧虑。接着他又召回了驻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大使，指示其向有关国家政

府表明联邦政府的态度，同时，阿登纳请大使们提醒各国德国中立化后有可能落入苏联人势力范围的严重后果。

杜勒斯明白阿登纳的意思，他听取了阿登纳的意见。1955年5月24日，杜勒斯又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表示他的看法与德国中立化的设想是有距离的。紧接着，其他西方国家也接受了这种立场。阿登纳向他们建议，抵制中立化思想干扰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自己制定出一项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既能迎合苏联人多次申述的“安全需要”，又可以保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联邦德国内驻兵。于是，由联邦德国方面阐明的限制中欧和东欧军备的具体计划，成了西方国家对即将进行的日内瓦会议的一个方面的准备。

正在这时，苏联又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6月7日，阿登纳收到了联邦德国驻巴黎新任大使冯·马尔藏的一份电报。马尔藏转呈了苏联驻巴黎大使要求送交联邦政府的一份苏联政府的照会。照会中说：“苏联政府认为，和平和欧洲安全的利益，以及苏联人民和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都要求苏联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建议联邦总理阿登纳访问莫斯科，以便就建立苏联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会谈。”

阿登纳判断这是莫斯科的又一阴谋，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联邦德国分化西方阵营。他不愿擅作主张，想同美国方面磋商后再作答复，以免引起西方不快。趁着接受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聘他作名誉法学博士的机会，阿登纳专程去了一趟美国。6月中旬，这正好是日内瓦会议前西方三国外长在纽约最后一次商讨会议有关问题的聚会时间，在这个时候赴美，按阿登纳自己的说法，也是为了再三再四地提醒西方注意警惕俄国人，并对各方观点作进一步了解试探。

阿登纳感到，这一个时期以来有关中立化的讨论已经使西方很多人的眼前出现了迷雾，看不到局势的危险性，而他应该去拨开这层迷雾，让西方清楚苏联人的真实意图，他向纽约的外长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要求引起重视。他指出：首先要对苏联人再次提出的中立化建议作全面的思考，如果设立了这么一个中立地带，从挪威开始往下直达希腊，那么欧洲剩下来的只有比、荷、卢、法、意、葡萄牙和西班牙几个国家，（在目前意义上，英国还不能算在欧洲内）这样的地带一旦建立起来，就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北约已无存在的必要，西方各国苦心建设的欧洲政策将会被连根拔除，彻底毁灭。美国将不得不让出欧洲，而大部分是中立的欧洲将屈服于苏联的统治。

其次，要对苏联建议作具体分析，假若德国实行了中立化，英、美的军队就不得不撤出欧洲大陆，这就会在欧洲造成关系重大的一种实力变化：德国在发展过程中，将会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设立一个除德国外还包括其他国家的中立地区有更大的危险性。人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苏联人所谓的中欧“防疫地带”里，将有波兰、匈牙利这样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共产政权将继续充当莫斯科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使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共产主义化，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罢

阿登纳向在纽约的西方首脑与外长们呼吁，西方应该在日内瓦团结一致，并尽全力反对苏联有关中立化的一切建议，重申在自由与和平中重新统一德国的要求，应把德国问题当作一个首要问题来处理，这样做只会有利于欧洲和西方。

艾森豪威尔听取了阿登纳的意见，向他表示充分理解。阿登纳强调补充

道，“要是我们在重新统一的问题上不能叫苏联人作出让步，那我们也绝不可对苏联人作丝毫让步。”艾森豪威尔向他保证，在这一点上丝毫不用担心。“日内瓦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幽默他说：“如果西方对苏联人做出过早和错误的让步，联邦总理阁下，那么，这并不是出于什么恶意，而只是由于愚蠢罢了。”

仅此而已，艾森豪威尔并不愿对阿登纳作过多的保证。唯一使阿登纳感到放心的只有杜勒斯，只有他在对欧洲政治局势的认识上有着与阿登纳同样的忧虑。杜勒斯告诉阿登纳，他并不认为苏联在奥地利问题上的让步就能证明苏联有同西方缓和的意向，即使有，也并非苏联人主动愿意，而是情势所逼。杜勒斯向阿登纳详细透露他所掌握的俄国的情况。他告诉阿登纳说，苏联现在正面临着国内外许许多多它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政权更迭的不稳定是一个方面，俄国经济不能支撑它的耗费庞大的国防武装开支是另一个方面，俄国的农业生产正面临严重的危机，同时它还要承受中国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给它的负担和压力。正是因为这些，俄国人才得出结论，要暂时缓和一下紧张局势，借以改善他们的处境。杜勒斯说，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必须知道它自己该做什么”。

杜勒斯把目前这种形势比喻成拳击比赛。他说，东西对抗至今，双方都感到疲乏了。对方已经昏迷，悬在绳索上，只等一声锣响就宣告一轮结束。我方也同样盼望一轮的结束。但在这种情势下，最重要的是不能松劲，也不能让自己被疲劳征服。西方应该坚持住。针对俄国现在最大的经济困难，西方完全可以在这方面施加压力。西方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切不可轻易放弃它目前所占的优势。缓和紧张局势对苏联更为重要、更为迫切，如果西方保持强大，西方就可以确定出一些有利于己的条件，比如德国统一问题，迫使苏联低头。

阿登纳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谈到了苏联人向他所发的邀请，他们都表示，他可以考虑去。阿登纳和他们一起把到苏联访问的时间订在了9月，也就是说等日内瓦会议开过了之后。

1955年7月17日，为全世界所关注的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终于如期召开了。自从1945年波茨坦会议以来，东西方一直没有进行过这样的首脑会晤。可以说，全世界都对这次直接会晤、以及由此可能创造出的世界政局的新气象寄予了厚望。

参加会议的各方对这次会议可能产生悲观的结果都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没有人指望能把所有悬而未决的重大国际问题全部澄清，参加者们都感到，会议若能尽可能详细地听取各方意见，能为今后可能举行的外长和专家会议指示重要方针，就可以算作是有相当成就了，开会的目的和意义原不在于解决什么问题。因此，四大国，尤其是美苏两方，都不约而同采取了“微笑”的立场。会议洋溢着前所未有的轻松空气，在会议进行的一周当中，双方各唱各的调，也不进行尖锐的交锋。虽然看不到双方观点在会上调和的可能，但与战争后期几次会议要当真解决战后几个重要问题安排时唇枪舌战的情形，也大有不同。

为使自己离日内瓦更近一些，阿登纳选择在这个时候到瑞士的山区缪伦度假。日内瓦“微笑的”空气使在缪伦山中的阿登纳也感到了，可他丝毫不敢放松警惕，时时关注着会议的进展情况。日内瓦会议期间，缪伦山区的静寂环境与清新空气，并没有让他真正脱离现实政治舞台。他让在日内瓦的

官员每天向他报告会议的进程。随着会议的进行，现在阿登纳更为担心的，反而是由于东西方本着这种承认现状的心情而发出的“微笑”了，因为“微笑”有可能产生出使德国两部分分裂固定化的危险。

阿登纳完全有理由这样担心。他越来越觉得在日内瓦，东西方走得太近。在一次正式宴会上，布尔加宁大声提出，欧洲安全不应取决于德国的统一。艾森豪威尔既不肯定也不否认，而是说：“我唯一的说明是，我们归根到底是在寻求欧洲的和平，因为它对于世界和平是重要的。所以说，要能够取得进展，是不应该取决于其他任何东西的。这应该是无条件的。”阿登纳敏感的神经一下子紧张了，他感到他在华盛顿得到的有关建立欧洲安全体系和重新统一德国两个问题间紧密联系的保证并不可靠。得讯后，他立即毫不迟疑地派人向美国代表团陈述了他对这一点的极大疑虑。

但是，日内瓦会议的这种“微笑”的确反映了一种新的现实，这就是：东面方关系的现状已经固定下来了，德国分裂的现状起码在当时已经无法改变。经过几年的建设，苏联的军事实力已大大增强，艾森豪威尔也公开表示世界出现了某种军事平局。由于各具实力，苏联和西方都清楚，自己提出的方案是绝不可能为对方所接受的。讨论德国问题时，尽管东西方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放弃统一的口号，但这只是在口头上抓这个旗帜而已。双方早已知道随着两大军事集团成立，东西德分别加入华约和北约，德国统一的可能性会越来越渺茫。因而，双方愈是提对方不会接受的方案，就愈是承认了德国的分裂。日内瓦的微笑与和解精神，实际上是东西双方彼此对中欧、东欧现状固定的确认，这是阿登纳无力阻挡的。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阿登纳与杜勒斯一直保持了书信往来，这些书信反映出两人对时局的一些看法。

这里摘录两封。

(一)

“亲爱的杜勒斯先生：

还在日内瓦会议谈判碰到困难的期间，您就派人来缪伦送信给我；今天您又委托科伯恩·基德先生再次捎信给我，这些都使我感到无比的喜悦。同时您大大地减轻了我的忧虑。您对我表示的这些关怀鼓舞了我：这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友谊的表现。

我认为，西方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已经达到了它们的目标。双方的立场都明确了。任何有理智的人不会再对苏联的真正目的寄予幻想了。我认为积极的成果是：这次会议终于得以使俄国人确定参加今年10月举行的新的外长会议，并对这次会议的共同议程达成了协议，而这样的议程是符合西方利益的。

我知道，这次会议的积极成果和西方三国所表现的同心协力，首先应归功于您的孜孜不倦和始终如一的努力。对此，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我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

随着日内瓦会议的结束，我们进入了东西方关系的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的艰难险阻并不亚于过去，我们必须更加高度地注意苏联人的所谓缓和紧张局势的种种手法，它们旨在使我们各国公众舆论看不请苏联的真正意图而上当受骗，它们麻痹我们的人民，同时借以松懈西方的防御力量和团结，并破坏它的统一。我以为今天西方政府有必要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警惕和紧密合作。以便有效地对付俄国人的这种新策略。但是我把这次会议的结果看成是西方国家在今后与苏联的艰巨谈判中进行合作的良好预兆。

根据我所听到的会议过程情况，苏联人显得浑身都不舒服。西方的团结一致肯定

不会不给他们留下印象。我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从空中监督军备的建议是对解决裁军问题的一个十分卓越的贡献，我只希望这一建议能在联合国委员会中进行深入的讨论。我几乎不相信，这项建议会适合苏联人的口味。

我希望，经过前几个星期的努力之后，您能略事休养，过去您也难得有休养的时间的。

再一次表示感谢，并致以亲切的问候和祝愿，请向您的尊敬的夫人致意。

您的

阿登纳（签名）

1955年7月25日于缪伦

（二）

“亲爱的联邦总理阁下：

我对您7月25日的来信十分感谢。您坦率而又诚挚的表白，充分地说明了我们之间存在着信任和谅解的精神，令人欣慰。

总统和我竭尽一切努力把德国重新统一这一议题放在首位。现随函附上我在昨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摘要。

我满怀信心地认为，如果能够在整个欧洲目标明确地唤起要求统一德国的期望，那么就会发现统一的局面。

据我看来，只要德国重新统一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是能符合苏联人的一切合理的安全愿望的，那么，向苏联人提出任何一种解决安全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办法，都会证明是行得通的。

但是，我获得的印象是，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安全，而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后的政治后果。他们对待铁托态度的改变，以及从奥地利撤军，所有这些与其他三种联系在一起，已在卫星国政府中引起了对于它们自己前途的很大不安。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东柏林逗留了许多天，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打气，未始不是没有深远意义的。

我很想知道您对事件这一面的看法。我的夫人嘱我代为致意，感谢您对她的问候。

希望您在深山幽谷中得到真正的休息。我很想和您在一起，但是那样一来，也许我们两人都不会得到休息了！

谨致

衷心的问候！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签字）

1955年7月27日

对日内瓦空气认识清醒并与阿登纳有同感的唯杜勒斯而

到莫斯科去！

阿登纳博士同俄国人的谈判，无疑将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最微妙的时刻。

——美国著名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于 1955 年 8 月 28 日就阿登纳莫斯科之行的报道

迄至今日，阿登纳作为联邦德国的总理，一直是和西方的政治家们打交道。苏联人在 1955 年 6 月 7 日发出的邀请，给了阿登纳一个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们进行正面角斗交锋的机会。

阿登纳对苏联邀请他到莫斯科谈判的第一印象是，苏联人试图在联邦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他首先担心接受去莫斯科的邀请有可能动摇西方国家对联邦德国的信任，同时他也担心由此开创一条独立于四国谈判之外的德苏双边谈判道路，会扰乱导致德国统一的程序。他一向认为德国统一是四大国的义务，凡是把德国问题从日内瓦议程上抹掉的可能性都必须尽量避免。但是，因为俄国人已用邀请来表示他们对和解的善良愿望，阿登纳也绝不愿给俄国人以借口，说联邦德国既不希望和平，也不希望缓和紧张局势和德国重新统一，反过来，阿登纳感到这是一次机会，可以借以摸清俄国人的真实意图，并向全世界表明联邦政府是愿意缓和紧张局势和为德国重新统一作出努力。

阿登纳的结论是：必须到莫斯科去！为了避免引起西方盟国的不信任感，阿登纳立即将这种想法通知了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并且亲赴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一起将访苏的时间订在 9 月。

访问之前，阿登纳作了充分的准备，他设法通过驻各国大使去摸清苏联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具体情况。苏联在 6 月 7 日的照会中说，苏联愿就外交和贸易以及与此有关的各项问题进行会谈。8 月 3 日，苏联又作了一个补充，除外交关系、贸易关系讨论外，又加上了文化关系，希望“不附带这一方或另一方的任何先决条件”。阿登纳通过 8 月 12 日联邦政府的照会向苏联说明，除了苏联政府提出的要求优先考虑的问题之外，还必须考虑其他问题，特别是德国统一和遣返战俘问题，并将其看作是“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阿登纳明白，此行对德国统一问题的讨论将不会有什么意义，只是要使苏联人认识到德国统一是四大战胜国过去和现在都承担着的义务；真正需要和苏联政府交涉的，是要使苏联释放至今仍被拘留在苏联的德国人的问题。可以说，后者是阿登纳考虑是否同苏联建交的一个决定因素。

阿登纳心里对形势有一种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他认为东西方谅解的日子还没有到来，不能因为苏联人在日内瓦会议上发出了“微笑”，就对当前的国际形势表现出乐观。根据他的看法，可以想象有大量的因素使苏联感到有必要在同西方争执的过程中安排一个喘息时间，至于俄国人是如何理解这种喘息时间的，那西方就只能猜想了。当西方的政治家们忙于应付面临的大选或者是政党的角逐时，俄国人却一直作着长远的计划。目前苏联虽然在追求一个缓和的时期，以便能够解决国内外的种种问题，可是，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人打算放弃用共产主义来“统治”世界。如果在苏联没有作出相应的政治上的对等反应时，给苏联提供了一种机会，使它能恢复元气，摆脱

目前困境，这样，在过了5年、10年或更多的时间之后。苏联就会变成一个内部坚固、能够给世界以更大威胁，并且无法抑制的庞然大物。这绝对不符合西方的利益；西方也绝对不能给苏联人以这样的机会。

就这一点，阿登纳在莫斯科行前曾与杜勒斯交换过意见，杜勒斯对形势的估计比阿登纳乐观一些。杜勒斯告诉阿登纳，他相信苏联的政策已有所转变。杜勒斯说，根据他的分析，如果苏联人想长久地同美国的军备步伐并驾齐驱，那在相应的对比之下，这种做法对苏联经济产生的后果，就会等于美国人必须承担四倍于现有的军备开支，苏联经济将难以承受。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居民正在追求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对消费品的需求已大大增加，苏联政府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否则人民会发生动荡。再者，在巴黎协定批准之后，苏联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西方经过团结已经强大起来，它已无法再遏制这种力量。这几方面决定了苏联人要采用一种新的外交方针，并有寻求与自由世界接近的良好愿望。杜勒斯估计，由于苏联人态度的软化，也许通过两年到四年的时间，德国的重新统一就会到来。不过，要使苏联人甘心放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还需要一些时间。

尽管如此，杜勒斯还是同意阿登纳的观点，对苏联人不能放松警惕。法国总理安托万·比内和英国政府方面也向阿登纳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形势所及，阿登纳对参加莫斯科会谈也不抱任何幻想。在与西方国家商议后，阿登纳确立了对莫斯科谈判的最高准则是：对西方绝对信守条约，决不因此动摇同西方的牢固联盟。

阿登纳利用他的夏休假期为莫斯科会谈作了深入细致的准备。为此，他亲信的新任联邦外交部长勃伦塔诺、国务秘书哈尔斯坦及其助手外交委员会政治司司长威廉·格雷韦频繁出没于他在缪伦的休养地。美国《生活》画报后来刊登了一张这四个人边散步边讨论的照片，背景是瑞士的山区。这张照片中，走在最前面的是阿登纳，随后的是作讲话姿式的勃伦塔诺和哈尔斯坦，格雷韦跟在最后面。他们构成了阿登纳的外交智囊团。

当阿登纳回到波恩时，他已经对莫斯科之行有了充分的准备，他开始同内阁和联邦议院各党的议会党团领袖进行磋商。根据外交部长勃伦塔诺的建议，阿登纳决定访苏代表团的组成以小型为宜，成员以联邦议员为主。他谨慎地避免代表团成员的政治色彩过浓，这是为了免于向莫斯科作出任何承担责任的承诺。这样在讨论中他可以借以下理由获得遁词：他必须同负有专责的顾问们以及按照宪法建立的机构进行协商，而不能当场就作出决定。阿登纳还考虑到一点，就是不要让苏联方面得到宣传的机会，德国人可不是“只要苏联招招手，所有的人都来会”。

8月31日，杜勒斯的密使、亲信利文斯顿·麦钱特助理国务卿再次出现在波恩，以了解联邦政府访问莫斯科计划的最新情况。西方各国首都的人们都怀着某种不安的心情关注着波恩。不管怎样，这是刚成年的联邦共和国第一次用自己的双脚向一个新的领域迈开步伐。

1955年9月8日，星期四，17时整。阿登纳总理的专机抵达距莫斯科三十公里的伏努科沃机场。阿登纳受到一批苏联领导人的隆重欢迎。他们之中有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科和谢苗诺夫等。对联邦共和国来说这些大多是属于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物。战后阿登纳及其同事们和西方领导人有过许多接触，但同苏联代表人物打交道却毫无经验，他们以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打量着这些在西方早已闻

名的强有力的谈判对手。

苏联方面也怀有同样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对阿登纳也早有耳闻，并且知道这是一个强有力、自信、绝不妥协的谈判对手。冷战以来，苏联方面同阿登纳政府一直处于“间接交战”状态，从苏联人的立场看，阿登纳是欧洲反对苏联政策的各种努力的突出代表，是倔强的老头、“冷战的骑士”。

应该说会面双方的心情都极为紧张。当时去参加莫斯科会谈的威廉·格雷韦在他的回忆录中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了这个情景。说这就好像两个敌对的将军，在多次战役中戎马对峙，现在却要第一次当面锣对鼓，谈判停战，前途结局难以料测。

苏联人的欢迎仪式十分隆重。地上铺着华贵的红地毯，地毯两边，穿着沙皇时期古典式阅兵制服的仪仗队光彩夺目，鲜花簇拥着德国代表团成员，寒暄淹没在掌声中。布尔加宁作为东道主首先致了欢迎词，接着军乐队分别奏响了苏联和德国的国歌。仪仗队迈着笔挺的正步行进的分队从贵宾前走过。欢迎的车队长长地驶过莫斯科市区，整个场面十分动人。最后，苏联人把阿登纳及其随行人员安置在华丽堂皇的苏维埃饭店里，该饭店座落在著名的列宁格勒大街上。

阿登纳事前特意准备了一列专车，作为在莫斯科谈判期间的工作地点。这和苏联人先谈好了，苏联方面专门在莫斯科火车站不远处铺设了一段铁轨，作为德国专车停放处。德国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在几天前乘专列先期抵达莫斯科以作准备工作。这列专车号称是一个“流动的大使馆”，其中有防窃听的电台和电讯仪器间、写字间等多节车厢。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阿登纳就到这列车厢上去开了一次会议，为第二天开始的谈判作最后一次讨论。

入夜，望着闪烁在莫斯科上空的星辰，阿登纳十分紧张，久久不能入眠，他知道即将与苏联人短兵相接，赤膊交锋。久闻对手的顽固利害，他不能掉以轻心。他又把需要讲明的立场观点在心里重温了一遍。

9月9日，星期五，11时，正式谈判在莫斯科古老的斯庇里陀诺夫卡宫开始举行。

第一天的目的在于了解，所以会谈双方都采取了温和的基调，布尔加宁和阿登纳各作发言，讲明双方的原则立场，他们都注意避免使用伤害感情和刺激性的语言。在双方发表的原则声明中，苏联方面希望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不附带任何形式的先决条件。而阿登纳的立场是：只有当俄国人表示愿意释放战俘和讨论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时，联邦政府才愿意建立外交关系。

9月10日，第二个谈判日，预料中的激烈对战终于如火山一般爆发出来。

会议同样在斯庇里陀诺夫卡宫举行。根据布尔加宁的建议，会议的主席由他和阿登纳轮流担任。阿登纳是这次会议的主席。由于没有确定固定的议程，阿登纳提议就昨天双方原则声明中还需明确的问题首先讨论。布尔加宁立即要求第一个发言。

这是头一个回合的精彩交锋，布尔加宁拿起了他事先经过充分准备的讲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国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谈起，一直说到阿登纳在原则声明中所提起的两个问题，战俘和重新统一，尤其强调了战俘问题。布尔加宁说：

“阿登纳总理阁下是将战俘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提出

的。我们认为这里肯定存在着误会。在苏联并没有战俘，所有德国战俘都已释放，并已遣返到他们的祖国。在苏联只有从前希特勒军队的战犯，这些战犯由于对苏联人民、对和平事业、对人道主义犯下了特别严重的罪行而被苏联法庭判刑。按照人道主义的准则，这些人一定要监禁起来。这都是一些丧失人性的人。这些人是暴徒、纵火犯，残杀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刽子手。……苏联人民不能忘记这些刑事犯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布尔加宁把目光转向阿登纳，话锋一转，道：

“在苏联，人们就不理解，为什么在西德会把这些罪犯看成是无辜的牺牲品。再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也必须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这种谈判，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德国两个部分。而我们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现在的情况下并不欢迎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共同参加讨论上述问题，因此很明显，这个问题作为目前讨论的内容就不适合了。”

谈到德国重新统一问题，布尔加宁表示，在讨论巴黎协定时，苏联曾一再警告德国出现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但目前有鉴于联邦德国加入了北约和西欧联盟这类军事集团的事实，使在通往德国统一道路上出现了人们本来可以避免的障碍。苏联认为应首先解散欧洲任何军事集团。建立起一个全欧集体安全体系，然后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道路上，找到解决德国问题最可靠的方法。布尔加宁的发言完全否定了阿登纳的原则立场，他的话一完，阿登纳立即站起来。

“事实上”，阿登纳针锋相对地回击道：“如果人们现在想要在所有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之后重新使关系正常化，那就必须开诚布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

“部长会议主席阁下，您一开始就描述了上次大战中苏联人民所蒙受的苦难。我真诚地向您承认，这次战争使苏联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但如果您说德国人民是处于另一种情况，那我就想提请注意，不能把希特勒及其追随者与德国人民等同起来。德国人民有很大一部分出于内心的信念曾经谴责过希特勒主义，谴责过这次战争，也谴责了希特勒主义犯下的残酷暴行。但是，部长会议主席阁下，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与一部分德国人民达成协议，这一部分人民过去一直是，现在也还是怀着厌恶的心情鄙弃所有这一切的。”

“您说德国有人谈论‘实力地位’，我相信这里有很大的误解。德国没有一个人幻想能够从实力地位出发与苏联打交道。我相信，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人们必须看到整

个世界形势和欧洲形势,而不是仅仅看到苏联和联邦共和国的关系。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处于不安全和危险的冲突之中的我国是没有自卫能力和没有保障的。”

“部长会议主席阁下,您刚才谈到了战俘问题,我想提请注意,我昨天的讲话中根本没有出现过‘战俘’这个词。我有意回避这个字眼。如果您仔细研究一下我讲话的内容,您就会明白我所讲的是所有‘被留下’的人。而您讲的是‘战犯’和苏联政府的判决。我们在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关系中也有类似的事情;但在那里的人们承认,这些国家的法庭在战后初期宣告的判决并不是没有感情用事,也无法摆脱当时气氛的影响,证人供词也受这种气氛的影响,当时的整个气氛是不适宜作出如同经过心平气和地审查整个案件的实际情况之后所作出的那样的判决的。人们由此得出了结论,并通过特赦的途径使几乎所有被判刑的人不再服刑。”

“因此,我们应该真正以完全坦率的态度进行平心静气的谈判,力求达成协议。”

“德国军队侵入了俄国,这是事实;做了许多坏事,这是事实;但是后来,俄国军队——毫无疑问,我承认他们是出于自卫——也开进了德国,并且在德国也出现了许多战争中的可怕事情,这可也是事实。我认为,如果要使我们的关系进入新的时代——这是我们诚挚的愿望——我们就不应该太多地着眼于过去,因为这只能在我们面前设置障碍。一个时代的开始也必须首先在心里上扫除障碍。”

阿登纳讲话时,赫鲁晓夫明显激动起来,他几次迫不及待挥舞起了拳头,要求立即发言。一待阿登纳说完,赫鲁晓夫马上跳了起来。

“总理阁下,”赫鲁晓夫激动地喊叫道,“在您讲话时,您说苏联军队在越过苏联边境并继续深入贵国领土时也犯下了罪行。我绝对否认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事实。德国向我们提出这点是没有根据的。苏联军队将别国军队从本国赶出去,并继续追击他们,那是因为他们不投降。如果我国军队不去追击他们,那么敌人恢复了元气,就会重新来犯。我们不能半途停顿,而是必须把那些胆敢提起武器向我们瞄准的敌人消灭掉。”

赫鲁晓夫向德国代表团方向挥动着拳头:

“因此苏联士兵们才把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战争继续下去,并为此牺牲了他们自己的生命,从而为祖国完成了他们的神圣任务。这难道是暴行吗?如果某国军队侵占德国,德国起来自卫并将敌人消灭,人们能够把这称为暴行吗?这是民族的神圣职责。从这个考虑出发,我认为苏联军队在这里遭到了侮辱性的评语。这使我不得不在这儿作出这样的声明。”

激动、暴躁的赫鲁晓夫显然是谈判的一个强硬敌手，阿登纳立即作出了判断。这个狡猾的政治家，尽管在发言中再三强调他不是一个外交家，不懂得外交辞令，但在会场上，赫鲁晓夫并不沉默，反而因此不顾一切外交礼仪和外交辞令，“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威胁恐吓齐头并用，把外交谈判席搞得有如无赖的市井争斗，德国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愕然了。

联邦外交部长冯·勃伦塔诺发言时也专门谈到战俘问题。他希望能从人道主义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说，千万个德国人在等待他们的亲人回去，有千万人下落不明。未等他说完，赫鲁晓夫便迫不及待地插言咆哮着回击道：

“我能理解这些家庭的感情，父亲们、母亲们和妻子们的感情。但是，请你们也能勇敢些，把真正的罪人招出来吧！使这些人，使这些家长们不能回去，并使他们被判罪的是谁的过错？这是希特勒干的！如果说有千百万人死亡了，那么我们这里也有千百万人死亡，我们应该为这些人向谁提出要求呢？”

“意大利人也可以提出要求，问他们的士兵在哪里。他们在我们这儿被装进了棺材！被装进了棺材！这不是我们的罪过，不是我们越过国界，不是我们发动这场战争的！理所当然必须从开始发动战争的人中间去找罪人。这些人的死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不要在将来重演这样的事情，因为如果将来还有人胆敢从谈实力地位出发跟我们谈话，并重蹈希特勒的覆辙，那他们必将以同样的、甚至更坏的下场而告终！”

赫鲁晓夫演员式的虚张声势的表演并没有吓倒阿登纳。他自始至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样的谈判看上去已经不是在进行外交会谈，倒像是一场公开的争吵。

在莫洛托夫讲完话后，阿登纳利用他做主席的身份，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以一种沉着的语调，向俄国人指出道：俄国先生们刚才说过，我们会晤的目的是谈判关于如何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按照过去所交换的照会，我们对于会晤的目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重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正常的和良好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正常的外交关系，后者只是我们任务中的一个小部分。“我们特别希望的也是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相信应该把所有被留下来的人的命运在这儿提出来谈判的理由，这也就是为了欧洲安全，把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提出来谈判的理由。”

接着，阿登纳把话锋一转：

“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先生都说，我谈到苏军开进来之后也犯下了罪行。我要着重地指出——我查看过国务秘书哈尔斯坦先生的记录——，我自觉和有意地没有讲这个词。我说过的是，苏军开进来之后也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如果大家不去深究这件事，那是对的。”

他开始进行反击：

“莫洛托夫外长说，德国人没有能力摆脱希特勒主义。我要请问：是谁曾经和希特勒订过协议呢？是你们，还是我？诸位先生勿怪我这样说，事情并不是只有苏俄一国，还有一系列别的国家也是这样。为什么那些大国听任希特勒在 1933 年之后变得那样强大呢？这可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当我想到，譬如说，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许多大国如何向希特勒表示尊敬，请你们理解，我为什么要动感情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希特勒撕毁那些国际条约时，每一次都没有受到制裁，这样一来，人们把这个家伙在某些德国笨蛋的心目中搞成了一个英雄，而在另一些德国人中间却引起了绝望。人们看到——我从 1933 年起就看到——如何让这个家伙爬得那么高，而我们，我指的是我们联邦政府和我们议会的议员先生们，现在却成了所有这一切的可悲的继承人。我们必须努力重建德国，因为德国在战争中也遭受了极其重大的创伤；我们也必须重新取得外国的信任，包括你们的信任。我知道这是一桩困难的任务，但这一任务必须得到解决。”关于战俘问题，他再次作了进一步阐述道：

“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些情况，有许多作为士兵而被俘的德国人——为数并不算少——，据说他们是在停止敌对行动之后因犯罪而被判刑的。苏联人民是一个富有善心的民族，我认为我们的人民也是一样。因此，先生们，这个问题对我们的人民恰恰十分重要。我们所期望的不是别的，就是和你们共同对这个问题作一次审查。我衷心地请求你们同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请你们不要叫我带着这样一个声明回家去：苏联政府根本拒绝同我们谈这个问题！”

同时，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权问题，他声明：

“莫洛托夫外长先生说过——我相信，布尔加宁先生也说过——，德国人应该自己主动重新会面。这里有许多道理，我完全承认。但是，先生们，我们有这样一个看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还没有资格能自称是苏占区一千七百万或一千八百万德国人的代表，因为居住在苏占区的人民并不承认他们是代表。——只要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苏占区的政府得到人民真正的承认，我们就会在什么时候同他们坐在一起。我相信，那时候德国人就会明白，他们的任务和职责是什么。”

“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相信，如果四大国能够明智地继续谈判下去，就像他们现在在日内瓦开始做的同样，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做的事就可以用来为欧洲集

体安全体制工作。布尔加宁先生，猜想一想，我们德国人对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清楚，您再也想象不出更有利的因素，去反对有人试图随时在欧洲发动一场战争，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受害最大的就是我们！”

在一口气讲完了这些话之后，阿登纳终于停了一停。他扫视着到场每一个俄国人的脸，从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到葛罗米柯、谢苗诺夫，谁也没有说话，也没有再提出什么来。赫鲁晓夫的表情极其复杂，惊愕、愤怒、无奈，什么都有。阿登纳内心涌起一种胜利的兴奋。赫鲁晓夫看来轻视了阿登纳，一直不相信人们对这位德意志联邦总理的传闻，直到这一刻他才感到这些传闻的真实性，直至这一刻他才感到遇到了真正的对手。阿登纳表现的理智、冷静和充满逻辑的讲话与赫鲁晓夫狂暴、嚎叫般的虚张声势的表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竟不敢相信他的对手已经是一位七十九岁的老人，不敢相信他的冷静与严密的逻辑思维。阿登纳没有看任何讲稿说出了上面那一大堆话。

这时，阿登纳适时中止了双方关于战俘和德国统一问题的争论，因为它不会有任何结果，他建议双方结束有关分歧，将其交于外长和专家协商，把议题转入双方经济关系的讨论。阿登纳明白俄国人在这方面是渴望的，但他却说，我们对你们的工业和经济的能力很少了解，我们完全不清楚你们和我们之间的经济关系能互通有无到怎样的程度。他表示在缔结贸易协定之前，除了成立特别代表团进行深入研究外，别无办法。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显然失望了，但却无可奈何。

第一个回合的交锋双方可以说互不相让，阿登纳略占胜面，他捅破了赫鲁晓夫道德说教的气泡。赫鲁晓夫显然不甘心这样的结果。

阿登纳向布尔加宁指了指表，布尔加宁明白了意思，正准备点头。但赫鲁晓夫却不管这一套，又重新来了一次“开场白”。

“我的看法是”，赫鲁晓夫道，“我们今天十分有益地交换了一次意见。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控制了感情而是感情用事，我认为今天的会议将是会很有趣的。”

阿登纳感到赫鲁晓夫又要激动起来了。后者接着讲道：

“我们觉得，现在的困难在于我们的意识形态不同。你们对待我们，正如对待一些不妥协的共产党人那样。资本家们要把共产党人煎了吃掉，而且吃的时候连盐也不放！你们认为共产党人是纵火犯，是暴徒、恶棍。可事实是什么呢？世界上存在着你们资本主义体系，也存在着伟大的社会主义体系。它存在着！”

赫鲁晓夫又激动起来，大声说道，“它不仅存在，并且还在胜利地发展着。苏联从落后的半封建国家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俄国变成了一个强国，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不仅如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中国也跟上了我们，还有许多国家在寻求他们自己继续发展的道路，许多国家里也还在进行着国内斗争。”

阿登纳幽默地插话说：“但愿我们国内的共产党人也像您——赫鲁晓夫先生——那样聪明。”

赫鲁晓夫却不放过这句话：“请允许我回答您：是你们把马克思带到世界上来了，还带来了恩格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自己烧好了饭，那就应该请你们自己吃。”

阿登纳还击道：“您听说过费尔德门格斯这个名字吗？他还是恩格斯的一个近亲哩！”

阿登纳是想暗示赫鲁晓夫，在同一个家庭里尚有世界观完全不同的人，更何况在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德意志。恩格斯在他的家庭中也并非典型，费尔德门格斯就是一个激进的反马克思学说者。

赫鲁晓夫显然对此无知，但他却并不受阿登纳影响，继续道：

“多少年来，全世界都坚持认为，列宁是一个空想家，俄国在列宁所缔造的那种体制下没有可能存在，可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建立起来了。西方说苏联的根基是不稳固的，许多人说过这样和那样的蠢话。美利坚合众国有十六年之久，不承认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了，它也没有被承认。新事物的诞生总要历经折磨，而且不被旧事物所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目前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地位。”

“当然，我绝不是要求您声明同意我的观点，只是我要告诉您，我知道您是不会同意我的观点的，但是——”他握拳挥舞强调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基础，就是未来，这不仅是德国人民的未来，而且也是全人类的未来。而且这不是我说的，是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

赫鲁晓夫露出了胜利的眼光。阿登纳明白这种眼光的含义，德国人的命运是掌握在四大战胜国之手，而德国东部的命运，只有苏联人才能作出决定。阿登纳很镇定，他并不是那种容易被吓唬得住的人，在他出任联邦共和国总理的时候，对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他平静地说道：

“赫鲁晓夫先生的发言今我十分感兴趣。我来到这里亲自认识你们，和你们交换意见，也使我高兴。我可以作一些设想，反之，你们也可以作一些设想。我可从来也不认为你们每天要用铁串烤一个资本家，而且是不放盐就咬。我倒总是得到这样的印象，就像人们从远处所能够判断的那样，你们以非凡的精力使俄国这样一个幅员极其辽阔、拥有那么多民族，曾经是十分落后的国家变得富强起来了。一百年以后将是什么样子：在你们这儿，在我们那儿，以至于全世界将是什么样子，你们不会知道，我也不知道。而我们今天要做到的，只是寻求和睦相处。我改变不了你们，你们也决不会改变我，这决不是今天我们相互要做的事！”

一席话讲得在场每人个个点头，布尔加宁同意了阿登纳的话，赫鲁晓夫也不再发表他的哲学观，建议转入实质性问题的讨论。这次会上，德国代表团的人对赫鲁晓夫能在顷刻间停止慷慨激昂的控述，转而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又大为吃惊。赫鲁晓夫建议授权外长们共同协商找出一个基础，以便进一步谈判。谈判时那些确定的已经成熟了的问题可以解决，不成熟的可以留待日后。他说，现在正是秋季，或许天气对成熟会有利些。这句话使得一天来紧张的空气稍稍变得轻松了一点。

第二个谈判日又无果而终。阿登纳感到布尔什维克党人很可能不会同意释放德国战俘的请求，如果是这样，联邦政府也绝不答应苏联人的任何要求。阿登纳作好了空手回去的准备，尽管这不是他当初的愿望。赫鲁晓夫的表演和他的谩骂，也使德国代表团每一个人为之心灰，甚至作好了早早打道回府的准备，所有人对德苏谈判都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君子协定

演出结束以后，观众连续鼓掌达几分钟，突然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向总理伸出年来。阿登纳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同他们握手。摄影师们把这瞬间拍了下来，于是这张照片就出现在世界各国的报纸上。

——费利克斯·封·埃克哈德的报道

苏联人在阿登纳访苏期间为他准备了一幢乡间别墅，俄语称为“达恰”，地点在莫斯科郊外。这所达恰曾是苏联政府赠给苏联著名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在高尔基死后，苏联政府又接管了它。星期五的谈判开始前，布尔加宁建议阿登纳同他进行一次小范围的单独会谈。阿登纳把会谈的地点选在这所达恰里，他想也许晴朗的天空和清新的田野空气能使双边都敞开些胸襟。这次私下会谈时间是9月10日，星期六的下午。俄国方面参加者是布尔加宁、赫鲁晓夫以及外交部副部长谢苗诺夫，阿登纳只带上了外交部长冯·勃伦塔诺。

莫斯科河畔的和风将上午会议炽热的空气吹散了。达恰座落在绿树环抱之中，空气格外清新，优雅环境使这次会谈本身有了一种平静与和谐的气氛。

谈话是从私人寒暄开始的，在扯了一遍有关飞机工业的闲话之后，赫鲁晓夫迅速切入共同关心的政治话题，俄国人显然急于进一步了解阿登纳的观点，甚至想听听有没有什么秘密的话。

阿登纳一开始就捕捉到了俄国人的胃口，所以也很坦率。他说，东西方的不了解与不信任是产生一切弊病的根源。从西方来说，如果说有一个国家真诚地关心维持和平的话，那就是德国。因为德国人对战争的认识已经够多的了。同时，他也可以绝对保证那些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对战争没有兴趣。“至于说到美国”，阿登纳顿了顿，说：“我内心深信美国也不想战争。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总统以维护和保证和平而自豪。此外，早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争大多是由某些政治家的愚蠢惹起来的，将领们多数是不愿打仗的。”

“不错、不错！”鲁莽的赫鲁晓夫热情地喊叫起来。

阿登纳继续说他对苏联的看法。他说，苏联是一个极大的国家，肯定没人胆敢哪怕是想一想侵略苏联。每个人都知道苏联在最近十到二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了极大进展，并且还在继续发展中。大战以后，苏联领土扩大了，经济发展了，为了进行和巩固国内的建设，它有许多事情要做。

赫鲁晓夫打断了阿登纳的话，“必须更正一下，苏联并没有扩大它的疆界！”

阿登纳笑一笑，“不管怎么样，苏联经济意义的疆界毕竟是扩大了。苏联现在已经成为——不管是进行了战争也好，还是由于战争的结果也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俄国从来未曾拥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实力基础——当前的情况是，东方和西方的人都不愿进行战争，但却使人感到了战争的威胁。如果政治家们是明智和有责任感的，那么只要大家都相互信任，就能在当前的局势中找到一条出路。人们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这一点：一旦发生战争，原子武器对于任何国家都意味着毁灭。”

“既然是这样，”赫鲁晓夫迫不急待地追问，“联邦德国为什么还要加

入西欧联盟，为什么要在俄国的西面成立起一个对俄国有威胁性的军事组织呢？”

“我建议俄国先生们对我们这个联盟的章程再仔细研究一下，”阿登纳说，“西欧联盟根本没有侵略的意图。我要为欧洲讲句公道话。战后欧洲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如果我们不团结，我们都会完蛋。欧洲再也没有强国了。对此，人们都十分清楚，而我们——欧洲的一些较大的国家——如果不联合在一起，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同美国和苏联相比，我们所有的国家都微乎其微。”

赫鲁晓夫忽然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为什么不接受苏联加入西欧联盟呢？”

阿登纳说，西欧联盟的过程中包含着很严格的军备监督。我不知道苏联在认真研究过这些章程之后，是否会真有参加的愿望。

赫鲁晓夫有些狼狈，感到提了个愚蠢的问题，只好说：对这些章程我们有所了解。

阿登纳继续说，“欧洲的合作首先应理解为经济的和政治的，因为所有欧洲国家由于事态的发展已经变成小国了。艾登在一次谈话中就公开向我承认，大不列颠已经不再是强国了。欧洲的联合，实际上只是出于自卫的本能。事情在于对将来的忧虑。因为欧洲是重要的地方。”

“现在请你们设想一下德国的处境。为了能够正确判断今天的局势，人们必须考虑一下，德国和苏联之间 1939 年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于 1945 年，也将完全不同于 1965 年。我们确实处于一种可以想象的恶劣地位。我们在战争中被打败了，我们的国内建设还远远没有走上正轨，对于受战争后果之苦的人们的供应问题也伤透了我们的脑筋。此外也要考虑这一点：事情很清楚，在战争中德国总是会成为战场的，而我们大家很了解在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中这将意味着什么。”

俄国人承认这种论断。赫鲁晓夫补充说：“当然，战争将会在你们的和我们的国土上进行。”

阿登纳点点头，继续就这个论题发挥。他说到了二次大战的痛苦，也说到当时俄国的可怕情形。他把话题逐渐转向了留在俄国的德国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开始皱眉了，因为阿登纳说他不认为那些拘留在俄国的德国人会 是主要罪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都不能同意这种说法。两人把话题拉回关于美国对和平的态度问题上，他们提到杜勒斯，也提到好战的格仑瑟、雷福德以及尼克松等人。布尔加宁提请阿登纳注意，这些人都是在美国或北约组织中的掌权人，苏联可不是瞎子，它完全清楚五角大楼和欧洲在搞些什么事情；它知道所有包围着它建立的和针对它建立的全部军事基地。布尔加宁说：“我只要叫人打开一张画着这些军事基地的地图就清楚了，我就会看到苏联怎样被包围着，作为负责的苏维埃国家领导人显然不能对此置若罔闻！”

阿登纳承认这些说法中很多是对的，尤其是有关军事基地。但是，这是朝鲜战争进行的后果，并且随着时间的消逝，它们将会逐渐全部拆除。而最重要的，是相互间的信任。阿登纳强调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谈判的时期，日内瓦首脑会晤开东西缓和风气之先，它将不会是绝无仅有的，当前的紧张局势肯定是可以消除的，而刚才苏联提到的这些人，他们有的只是对苏联的疑虑。苏联早已成为一个别人不能对它发动战争的巨大强国，任何国家决不可能对它发动一场战争的。最后阿登纳着重强调，“这是我在漫长的一生中

积累的经验并得出的结论。”

赫鲁晓夫点了点头。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以一种认可的语气说，“一场战争意味着神经错乱，而且对苏联和德国是特别不幸的。一句话：除了破坏和毁灭外，战争不会给任何国家的人民带来别的东西。”赫鲁晓夫表示苏联不愿意战争，并愿意用行动来证明。比如：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以后，苏联裁减了六十万武装部队，这个数字比德国能够配备的还多；苏联从奥地利撤回了它的部队并且随即让士兵复员；苏联还撤出了中国的旅顺港——“我们还能干些什么呢？我们是政治家，国家领导人，可别的国家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呢？在美国，人们天天能在报纸上看到对苏联要挑起战争的煽动。”

阿登纳问这究竟是指谁。布尔加宁引证了三个月前杜勒斯的一次讲话，并说这次讲话只能看作是一次恫吓，美国的将军们以及有影响的人物也有类似的讲话，并且大家也知道美国人飞越苏联领空的那些事实。

阿登纳说：“苏联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相互恐惧，我想这种恐惧感是造成目前这种局势的根由。”

“话虽如此，”赫鲁晓夫道，“美国与苏联相距七八千公里，但他们的军事基地却紧紧包围着苏联。有些地方相距只有几个飞行小时。”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相互恐惧感是唯一根由，情况是能够改变的。”阿登纳说，“并且，我也要为杜勒斯作一下辩护。事实上由于他审慎的态度和生硬的作风，难免使初见他的人感到有些可怕。但当你进一步了解他时，你可以感到他的出色，你将不得不相信他是正直的，并且可以值得信赖的。”

赫鲁晓夫不想让阿登纳说杜勒斯把话题引开，他说，的确如此，在进一步了解之后，杜勒斯完全不像在他的言论中表现的那么危险，并且他也没有给我们造成一种太可怕的印象。他继续道：“在我们这里也听到过许多关于西德和您——总理阁下的不愉快的说法。人们在我面前把您描述成一个‘好战’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现在看来也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阿登纳莞尔一笑。气氛更加轻松了。

克里姆林宫里的领导人甚至很坦率地讲起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赫鲁晓夫告诉阿登纳：“你看，我们俄国人有下列任务：首先，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二，我们必须像美国一样扩充军备；第三，赤色中国将会怎样发展？”对中国，赫鲁晓夫表现出一种“病态的担忧”，他把它说成是最大的问题。他说：“请您想象一下，中国现在已经有六亿以上的人口，每年还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这些人都靠一把米活着。这该会——”他把手做成一个杯状，然后又双手一拍，“这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

阿登纳没有作声，他心里想：也许你在西面不用维持军队，就不会有如许忧虑了。

赫鲁晓夫相当突然地向阿登纳冒出一句：“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很困难的。因此我请求您帮助我们。您帮助我们对付赤色中国吧！”他还犹豫着补充了一句，“并且，还有美国人……”

这个令人吃惊的请求在阿登纳逗留莫斯科期间曾被赫鲁晓夫提到了三次。阿登纳认为这样做的后果无异于“把头伸到狮子口里”。赫鲁晓夫显然

指 1955 年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正筹备期间，苏联在白令海峡打下了一架美国海军巡逻机。杜勒斯向莫洛托夫表示抗议，而莫洛托夫则表示“遗憾”。

也并不作这样的指望。在这个晴朗的下午，呼吸着田园清新空气的交谈，无疑对双方的平心静气起了很大的推动。赫鲁晓夫甚至诚挚地邀请阿登纳一定要在离开俄国之前，一起去花园散散步，看看秋天的花卉。阿登纳对园艺的喜好，赫鲁晓夫显然相当了解。

这一天是周末，继下午在达恰愉快的谈话后，晚上，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大剧院为联邦总理一行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著名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由最著名的天才女芭蕾舞家加林娜·乌兰诺娃主演。

晚会的表演相当精彩，也相当成功。乌兰诺娃的舞姿伴着同样著名的普罗科耶夫的音乐，把所有的观众带到有如梦幻般的世界里。音乐与舞蹈交织，时而柔缓行情、甜蜜柔美，时而又激昂慷慨、挫骨悲怆，把人们带到那遥远的中世纪的城市家族中。然而，观众的注意力始终为并坐在荣誉包厢里的布尔加宁、阿登纳和赫鲁晓夫所吸引。每一场幕间，人们都掉转身对着荣誉包厢鼓掌喝彩。

晚会的高潮在最后一幕。当舞蹈终于结束，两个敌对家族的首领凯普莱脱和蒙太玖相互拥抱时，人们看到荣誉包厢里阿登纳与布尔加宁的手也握在了一起。这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新闻记者们抢拍到了这难得的镜头。

第二天这张照片就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甚至有些报刊认为，这是已经僵化了三天的德苏谈判即将取得进展的一个征兆。

演出结束后，俄国人安排了一次冷餐招待会，席间也显出一种轻松的气氛。当天是国务秘书格洛布克的生日，赫鲁晓夫得闻后，按照俄国的风俗同他换了杯并为他的健康干杯。酒过三旬，赫鲁晓夫存心要试一下阿登纳的酒量，看看在谈判桌上难以对付的阿登纳是否会被酒精搞垮。尽管阿登纳更喜欢葡萄酒，他还是跟赫鲁晓夫连干了十五杯伏特加。七十九岁的阿登纳的胃同他的意志一样坚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都很高兴。布尔加宁问阿登纳生日是哪一天。阿登纳告诉他是1月5日。布尔加宁说到了那一天他一定会给他发生日贺电。阿登纳追加了一句，“您可不要忘记了。”后来布尔加宁果然寄来了贺电，此是后话。

第二天是礼拜日，一大早，阿登纳就到苏维埃饭店附近的一个小小的波兰教堂里去做弥撒。这里普通的苏联人给阿登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尽管在教堂里挤满了人，可是有人对他讲，宗教在苏联几乎已经绝迹了，只有在很偏僻的农村才是例外。阿登纳觉得莫斯科的人都看上去灰心失望，大多数人显得十分颓丧。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曾经在大剧院看过一次了不起的演出。但是除此之外我所看到的却是令人震惊的东西；这些人使我深深感到难过。人们必须看一下街上的俄国人的面孔，才能得到一幅真实的图像，了解共产主义的幸福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感到在这里自己接近俄国真实的另一面。

下午，阿登纳在达恰为双方代表团举行了一次露天野餐会，赫鲁晓夫也来了，但他脸色发青，这是头一天晚上喝了大量的伏特加酒所致。整个下午的气氛也像头一天下午开始时那么轻松。席间，阿登纳送了赫鲁晓夫一瓶黑森地区产的“樱桃烧酒”，并鼓励他喝。赫鲁晓夫庄重地接过酒瓶，按照礼貌的要求，他先给自己斟满了一大杯，然后向阿登纳敬酒，一饮而尽。这不是伏特加，以这种喝法，喝樱桃烧酒只会令赫鲁晓夫直皱眉。果然，赫鲁晓夫一喝完就大声叫嚷，说这种酒只能给牛喝，不是人饮的。众人一阵大笑。

酒又一次给双方人助了兴。俄国人酒兴大发，频频举杯。德国代表团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灌了很多酒，不过由于他们有所准备，每个人事先都喝了一勺解酒的橄榄油，德国人适应了这种俄罗斯人的作风。

9月12日，星期一，休会期结束，迎来了第三个谈判日。若以为休会时的轻松有助于打开谈判僵局那就大错特错了。阿登纳和勃伦塔诺都曾认为可以把愉快的心情看作是让步的标志，谈判桌上才发现一切非然。或者正是由于双方这样认为，谈判才无法进展。第三个谈判日又是一场长时间拉锯战式的辩论，火药味比第二天更浓。赫鲁晓夫以他善辩的口吻，把外交关系描绘成是通往永久和平的真正关键，并且极尽全力凭借德俄历史上所有黑暗篇章，大动感情地控诉攻击和诅咒发誓。阿登纳与他唇枪舌战作辩论，毫不相让。阿登纳一提起释放战俘问题，赫鲁晓夫便向阿登纳吼叫道，“在我同意您的这个意见之前，我要先到地狱去拜访你！”阿登纳亦针锋相对，一字一句予以反击：“如果你在地狱里看到我，那只是因为比你比我先到那儿！”他的回答使赫鲁晓夫暴跳如雷。当赫鲁晓夫气急败坏挥动起一个拳头的时候，阿登纳也从椅子上跳起挥舞两个拳头。

最后的一幕，阿登纳说：

“我实在感到难过，赫鲁晓夫先生。经过我们的会谈——在我这一方面完全是坦率的——您竟会认为我冒前所负责的政府参与了反苏战争的准备。这不是事实，我可以这样对您说。我也向您说过，我相信联邦共和国和联邦政府不管参加什么样的组织，都将维护和平，它是和平的真正保障。”

赫鲁晓夫道，“你们把军队搞起来准备是为了让他们吃干饭的吗？”

阿登纳说：“如果这代表了您和您的政府的立场，我对这个插话表示遗憾！”阿登纳感到无法再谈，说完这话，他拿起了他的文件夹，站了起来就想走。

作为会议主席的布尔加宁赶紧宣布会议结束，并通知第二天10时续会。阿登纳掉头而去，会议不欢而散。

赫鲁晓夫不顾外交礼仪的赤裸裸的侮辱谩骂令德国代表团所有人感到愤怒。阿登纳认为再在这里呆下去也是无益，一回到饭店，他立即吩咐命令他的座机即刻从汉堡起飞到莫斯科机场待命。预定的回程本是后天，9月14日，他命令座机准备第二天一早提前飞离莫斯科。

傍晚，布尔加宁邀请德国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出席专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阿登纳认为提前飞走就足以使俄国人感到震怒了，没必要拒绝赴宴，引起更强烈的反应，于是欣然赴会。

像往常的宴会一样，阿登纳坐在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之间。克里姆林宫的巨型镀金吊灯把宴会大厅照得如同白昼，除了德国代表团外，苏联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家、当权者都来了，大厅容纳了近一千人。也像往常的宴会一样，人们在自由交谈，嘈杂的声音淹没了一切，谁也没有想到转机在这个时候出现。

晚宴开始的时候，布尔加宁忽然把阿登纳拉到一边，悄悄问道：“现在我们打算怎样结束谈判呢？”东道主显然知道了阿登纳所发出的提前离开莫

斯科的消息。

阿登纳表示了和前几次谈判中同样的立场：“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几天的谈判已经表示我的政府和您的政府在很多原则问题上是不能有共识的。”

布尔加宁答道，这几天来他一直在绞尽脑汁地考虑，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阿登纳总理拒绝就建立外交关系达成一致协议。他小声试探道：“您向其他国家承担了什么义务吧？”

阿登纳断然否定。“我向您保证，您也可以相信我，我没有承担任何义务！”

“也许是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布尔加宁追问道。

“这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可以作一个保留。”阿登纳听出布尔加宁话中有话，所以这样说道。

布尔加宁点了点头，喃喃地道：“嗯，对，正是……”然后又重复了他的第一个问题：阿登纳拒绝苏联立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阿登纳极坦率地告诉他，由于德国人民经历了种种磨难，战俘问题和被拘留在苏联的德国人问题有极端重大的心理作用，这个问题不解决，德苏关系正常化就无法得到德国公众的同意认可。阿登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事实：在最近两年中，西德方面收到了约有十三万封德国人的来信，申诉他们想离开苏联而受阻。而他之所以没有把这些材料摆上谈判桌面，是不愿因此破坏谈判的气氛。

布尔加宁又点点头，说：“这些人是否还活着，我不知道，也不相信。有可能他们早就被埋葬了，比如赫鲁晓夫所讲的那些被判了刑的人。”

阿登纳回答说，他当然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活着。

布尔加宁似乎在沉思。停顿了片刻之后，他突然望着阿登纳令人吃惊地讲出一席话。他说：“让我们来取得一致吧！您写一封信给我，我指同意建立外交关系的照会，而我们将把他们全部交给您。全部！在一个星期之后！我向您庄严保证！”

由于冲动，布尔加宁的话听起来有些语无伦次。

阿登纳有些迷惑，他不敢确认俄国人态度真正转变了。他立刻追问道：这里是否也包括“其他一些人”，不仅仅是判刑的。布尔加宁点点头说，“是的，全部！全部！”

阿登纳想进一步确认：“布尔加宁先生，您的话让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

布尔加宁打断他，说：“苏联政府说了话是算数的。我将把我们达成协议的消息立即通知赫鲁晓夫。”

转过头去，赫鲁晓夫表示他也正在同州总理阿诺德谈同样的问题。赫鲁晓夫又进一步补充道：“联邦总理先生，您知道我们不能作出担保或保证，不管是书面的或是口头的，但我们向您庄严保证，我们讲的话是作数的。”

赫鲁晓夫也这样讲，真使阿登纳感到意外的惊喜。转折点就这样出现了，似乎丝毫不费周折。

阿登纳很清醒，他判断俄国人并没有对他说谎话或者有什么理由会不履行承诺，这种清醒度在他和俄国领导人喝酒碰杯时也表现出来。当时，精明的阿登纳竟然当场抓住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以水代酒在作假。

宴会一结束，阿登纳立即通知代表团所有人到专列上开会，向他们宣告

这件事。会议争论得很激烈，不少人怀疑俄国人的诚意，不相信俄国人的口头承诺。外长部长勃伦塔诺和国务秘书哈尔斯坦鉴于经常发生俄国人违反协定的事，都坚决反对与苏联建交，只是为了一句关于战俘释放的口头诺言吗？怎么能根据这么一句微不足道的诺言就接受俄国人的一切呢？这只是口头上的“君子协定”，可俄国人是君子吗？并且重新统一问题也还没有取得进展。联邦政府承受这个诺言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勃伦塔诺和哈尔斯坦劝阿登纳千万不要理会布尔加宁的口头诺言，他们提醒他如果得不到一份书面承诺，他联邦总理阿登纳作出的决定就根本得不到内阁同意，也根本得不到联邦议院多数的批准。但阿登纳说他决心试一试，尽管要冒很大的风险。他努力想说服众人。

第二天，9月13日，星期二，按原定计划进入了第四个谈判日。

在会谈开始之时，阿登纳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波伦获得了一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私人通知。通知中说，艾森豪威尔理解并尊重导致阿登纳作出任何决定的原因。不管作出什么决断，他都将支持他。

阿登纳十分感激艾森豪威尔对他的信任，尤其在需要作出这样困难的决断之时。这份通知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阿登纳主持了第四个谈判日的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讲，关于昨天晚上的谈话，他有三个问题还需说明：第一，联邦政府要起草一个关于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信件；第二，双方交换同昨晚谈话主题有关的文件；第三，起草一个关于谈判的最后公报。

果不出所料，苏联人对第二点提出非议，苏联人坚持，他们的君子诺言应当是足够了，要求提供文件依据是对苏联领导人不信任的表示，并且是带有侮辱性的。最为重要的是，赫鲁晓夫说按这种做法就使建立外交关系附有先决条件，而这些早已被苏联政府在互换照会中明确加以拒绝了。

“我的先生们，”阿登纳很严肃地说，“至于说不信任，那是确实谈不上的！在我个人来说，有了你们的诺言就完全可以了。但这不是我一个人就能作决定的，还有联邦内阁和联邦议院。我请求你们考虑了下我的年龄。人们不可能知道我会活多久，如果对这样的问题只有诺言的话，你们可以想象到其中的困难。”

无论阿登纳怎样要求，苏联方面仍然毫不让步。赫鲁晓夫居然断言联邦德国也拘留了二十万以上的苏联公民。莫洛托夫紧随其后，责难说美国一些反苏组织通过联邦德国的帮助放出带有反苏东宣传资料的大气球。

反复激辩之后，苏联方面在阿登纳坚持的国际法保留权问题上作出了些让步。阿登纳要求毫不含糊地明确：无论如何不能由于德苏建交而承认所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者是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苏联人最后认为，既然联邦德国方面要考虑国际法后果，他们也不反对联邦政府持有这些保留，并且，保留权的声明形式可以由联邦政府决定，可以以信件形式，也可以向新闻界发表有关声明。

阿登纳选择了书信形式。国际法上，只需把这单方面的声明传达到另一方，保留权就有了法律效力。在飞离莫斯科的那天，阿登纳给布尔加宁发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部长会议主席阁下，趁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机

会，我声明：

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并不是承认现时双方领土的占有状态。德国疆界的最终确定留待和约来解决。

2. 和苏联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不意味联邦政府改变了关于在国际事务中有权代表德国人民以及关于在那些目前尚处于联邦政府的有效统治权之外的德国地区政治状况的法律观点。”

在关于释放战俘和其他被拘留在苏联的德国人问题上，阿登纳尽管没有获得有关书面保证，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却当着德国全体代表团成员的面，一再重复作过了的保证，并放宽了获释德国人的范围。赫鲁晓夫表示，“我们向你们保证，按照你们提供的清单找到的人，只要他们是德国籍公民，我们就会交给你们。请相信我们的诺言。”阿登纳和布尔加宁一起把释放人员的时间订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一周。

1955年10月7日，苏联人履行了他们的诺言。第一批遣返回国的德国士兵到达弗里德兰军营，数目将近一万。以后大约有两万多被拘留在苏联的平民又陆续回到了联邦德国。

9月13日，阿登纳与布尔加宁代表德苏两国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建交的换文。西德在给苏联的换文中指出：“两国人民的建交将促进整个德国问题的解决，从而有助于解决德国人民全民族的主要问题——恢复德意志民主国家的统一。”

第二天，阿登纳带着苏联人答应释放战俘的口头承诺——他与布尔加宁的君子协定——以及德苏建交换文，飞回了波恩。

后果 ——“哈尔斯坦主义”

在整个莫斯科谈判过程中，联邦德国方面只有一个意志和决策的中心——联邦总理阿登纳。尽管每一个重要决定的作出都是在代表团里详细讨论和商量过的，在争论最激烈的讨论会中，阿登纳甚至要求每一名成员发言，讲出自己的意见，但是，事实上，是阿登纳在用他的观点说服每一个人接受。在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中，这一点都很清楚地反映出来了。

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中，由于双方意见观点的分歧，会议经常中断，以便于给各代表团进行内部磋商的机会，直至那时，阿登纳的两个最亲密的顾问勃伦塔诺和哈尔斯坦仍然极力劝阻阿登纳不要同意苏联的建议，并恳求阿登纳至少在莫斯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建立外交关系。

他们一来担心俄国人不会遵守诺言，再呢，担心与苏联建交会引起国际法上的一些困难。打一个比方说，如果将来建交后在莫斯科出现两个德国大使馆，那么如何体现联邦政府一向坚持的“单独代表权”呢？更进一步，联邦政府是否也得在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开罗和新德里容忍这种情况呢？如果西方国家也向民主德国做出类似妥协，岂不意味着将两个德国分裂的现状合法化地固定，那么，德国统一的长远目标又怎么办？

莫斯科的“君子协定”达成之后，所有这些问题全都冒出来了，阿登纳责成有关国际法专家立即去研究。

1955年9月14日，阿登纳在莫斯科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强调了西德的保留权。他声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代表全体德国人民的，德国的东部边界不是最终的边界。

9月16日，苏联塔斯社也发表了一则声明，指出：苏联政府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看作是德国的一部分，德国的另一部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的边界已由波茨坦协定解决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它主权范围领土上行使自己的管辖权。

从这两则声明看，在建交问题上，德苏双方都作了保留。

阿登纳带着德苏建交的“君子协定”回国，引起了意料之中的联邦议院的激烈争辩。社会民主党再次攻击这是以牺牲德国统一为代价。当时一名著名的女评论家玛丽奥·格莱芬·多恩霍夫极其尖锐地评论道：

“建交换来了战俘的遣返……这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同莫斯科建交的代价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容忍了德国一分为二……因此，以建交换取遣返战俘的条约意味着……一万人的自由换得了一千七百万人的被奴役？”

阿登纳决定使联邦政府对这件事暂时保持沉默，让时间把这件事带来的冲击冷却下去，但苏联人在阿登纳莫斯科之行的后一个礼拜，便做出了令联邦政府处境更为尴尬的一个举动。9月20日，苏联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定了重新安排它们间相互关系的“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条约”，给了民主德国以主权地位。条约中称：“鉴于巴黎条约生效后产生的形势，根据平等、相互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自由决定他们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包括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以及同其他国家发展

关系。”同时，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撤销苏联驻德高级专员一职，对德管制的各种条例在民主德国停止生效。

这对阿登纳单独代表权原则是一次大冲击，联邦政府必须尽快作出反应，不能让民主德国从此不受限制地进入国际社会中来。9月22日，阿登纳在联邦议院作了一个关于莫斯科之行的报告。他说，“我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联邦政府今后也将把与它保持正式关系的第三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视作不友好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将会加深德国的分裂。”

于是，对德国外交政策影响深远的“哈尔斯坦主义”便应时而生，这是国务秘书哈尔斯坦和他的助手外交委员会政治司司长威廉·格雷韦共同想出来的，并且以哈尔斯坦的名字来命名。也有人将其称作“阿登纳主义”，它可算是德苏建交后阿登纳政府单独代表权原则的一个延伸。阿登纳在9月22日的联邦议院发言中对它作了第一次表述。但是，当时它对很多问题没有作出解答，最重要的是，联邦德国对这样一种行动（与它保持关系的第三国与民主德国建交）将作出如何的反应，是否应继续拒绝同那些与民主德国持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关系，威廉·格雷韦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思考。1955年12月7日，他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交到波恩举行的一次使节会议上作详细讨论。

根据格雷韦的建议和使节会议的讨论，哈尔斯坦主义的内涵明确了，简言之就是：为了在国际法上解释德苏建交后出现

了两个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情况，西德政府坚持联邦德国代表整个德国，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同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建交，并同所有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断绝外交关系，只有苏联是例外。格雷韦表示，这是西德政府自成立后一直坚持的“单独代表权”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它成为西德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坚持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

从法律上来说，德国继续存在，因为战胜国并没有吞并德国，而只是出于占领的目的，将1937年12月31日以前确定的德国疆域，暂时划分成了四个区分区占领，直到对德和约缔结生效时为止。因此，在对德和约缔结前，德国虽然具有法律上的能力，但由于缺少一个整体国家权力而没有行动上的能力。

从实践上来讲，联邦德国是德国整体中唯一具有行动能力的实体。作为一个国家，它与原来的德国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空间上暂时还没有与过去的德国取得一致。必须强调联邦德国是德国和德国人民利益的合法代表。

哈尔斯坦主义的核心，是联邦政府一直坚持的单独代表权。在阿登纳的领导下，联邦德国政府从1949年成立起就一直坚持强调这一点。阿登纳在每一次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都要向盟国突出强调它。他要使所有国家都确认，只有联邦政府才是全体人民利益的唯一合法代表。

阿登纳政府，强调单独代表权的第一个突出事例是在1953年6月17日发生东柏林起义事件时。当时斯大林逝世，苏联对德政策出现某些“松动”迹象，苏联打算建立一个中立的芬兰式的德国，因为同中立的芬兰的关系要比同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好处得多，这样牺牲民主德国也是值得的。克里姆林宫以“全德派”著称的弗拉基米尔·S·塞米扬诺夫被任命为驻民主德国高级专员，准备开始实行新的路线。6月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根据苏联的意见发表了一个公告，提出德国统一是最大目标，为此德国两个部分要采取接近措施。但是不久爆发了因提高工人劳动标准而引起的罢工游行，

直至蔓延全国，酿成起义流血冲突，苏联不得不动用坦克才平息这一事件。阿登纳在这次事件之后，发表了一则公告声明，借此突出强调民主德国政权的非法性和联邦德国的合法性，以形成联邦德国“单独代表权”的影响力。

第二个突出事例是 1954 年 3 月 25 日苏联政府就苏联和民主德国关系发表声明之时。该声明宣布民主德国是一个主权国家。阿登纳竭尽全力驳斥这一观点，并且努力争取美、英、法对联邦德国“单独代表权”的支持。他一边出面反驳那些认为德国问题从此将会出现一个新局面的猜想，一边又强调指出：“苏联声明丝毫没有能够驳倒这一事实，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只有一个德意志国家，这就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今天仍然代表着这个从来没有消亡过的国家”——更进一步，“只有联邦德国政府才有权代表另外一千七百万德国人说话和行动。”

第三个突出事例是 1955 年巴黎协定生效之时。阿登纳代表联邦政府宣布自己获得主权。他强调：“长期以来，我们在不断赢得信任的基础上作出的努力，今天已经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现实”，联邦德国已经以平等的地位成为西方自由大家庭中的一员，结成了真正的伙伴关系，因此，只有联邦德国拥有对整个德国的“单独代表权”。

“单独代表权”的问题成为整个阿登纳时代阿登纳与西方盟国交涉的重要内容。他一再要求西方盟国确认这一点。

在 1955 年 12 月 8 至 10 日的波恩德国使节会上，威廉·格雷韦提出了一个警告，即不要过分拘限于笼统的规则，而应在判断事实时保持灵活性。但是，格雷韦的警告并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由于存在这么一个原则，也由于联邦德国基本法里关于联邦德国是唯一合法政府的实际规定，联邦政府就很难在东方政策上作出创造性的举动。正如在哈尔斯坦主义出台时外交部地区司里有一批东方问题专家所担心的那样，东欧国家一坐下来就带有同民主德国保持关系的“天生缺陷”，该如何对待它们呢？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同德国渊源很深，“哈尔斯坦主义”原则无疑是完全放弃了这些国家。同时，他们提出，只同承认联邦政府是全德人民唯一合法代言人的国家打交道，必然使联邦德国局限在一定的国际范围内，对国家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再有，阿登纳强调要以实力政策、实力基础统一全德，局限性的发展与实力基础，实力政策也相矛盾。因而，尽管哈尔斯坦主义解释了“在莫斯科出现两个德国大使馆”的国际法问题，但是，它实际也将束缚联邦政府外交政策的手脚。

德苏建立后的十年是西德有关德国问题的政策的一个“不妥协的时期”。阿登纳尽管与苏联建交，却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与东方国家的关系。根据哈尔斯坦主义的原则，阿登纳拒绝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方国家愿同联邦德国接近或建交的友好表示，并且在 1957 年断绝了同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理由是南斯拉夫承认了民主德国。1963 年，阿登纳政府又以同一理由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

阿登纳是很为难的。他感受到 1955 年日内瓦高级首脑会晤后东西方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但是，他也不得不坚持他政策的延续性，这种政策从公众舆论的反映来看是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在阿登纳与苏联建交之后，当时有人曾在德国的汉堡作过一次民意测验，要求回答对那些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的人作何看法。结果是：56%的人认为，那些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的人无权在汉堡作报告；57%的人认为，不能让这些人在电视中发表讲话；68%的人认为不能让他们在高等学校中任教。对德国公众来说，仍然必须坚持

同东方仍不妥协。阿登纳如果突然改变政策，就得难保证能够得到公众的继续支持。

应该说，德苏建交的意义是积极的，而哈尔斯坦主义的出台则是被动与消极的反映，是阿登纳政策老化的开端。

第七章 振兴欧洲

通向统一欧洲的道路将是漫长而艰辛的。

——《阿登纳回忆录》（三）

“欧洲统一是我们时代的福音和希望。”

——让·莫内 1954 年 11 月 9 日在辞去欧洲
煤钢联营高级机构主席时讲话

欧洲新制度的设想

我不认为欧洲的统一是一种空想。

——《阿登纳回忆录》（三）

1950 年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提议建立煤钢联营时，阿登纳率先响应了他的号召。1952 年这一计划实现，缔结协定的六国一致同意，六国必须通过扩大共同机构，继续为创建一个经济和政治结成一体的欧洲而努力。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欧洲感到联合的紧迫，在美国支持下，关于欧洲联合的讨论一时勃兴。人们积极地筹划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方案。1954 年 8 月，法国国民议会否决了讨论达 4 年之久的欧洲防务共同条约，使得欧洲统一运动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一蹶不振。之后，政治共同体的讨论又告破裂，欧洲一体化只有煤钢联营还在运作，整个运动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地步。

但是，真正致力一体化事业的人，谁也没有放弃将政治统一运动继续进行下去的希望。让·莫内没有，阿登纳也没有。他们都在等待更有利时机的到来，等待创造这个时机。

防务条约失败以后，阿登纳和莫内就统一欧洲的命运进行了一次探讨，他们共同感到，在欧洲防务集团失败之后，欧洲虽然出现了一个政治真空的局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统一欧洲必要性已经丧失，联合的目的也并非只针对苏联人对欧洲的威胁，莫斯科只是西欧联合的一方面原因，联合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欧洲自己的发展。“欧洲之父”让·莫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欧洲应该做的首先是把自己组织起来，而无须过多地考虑他人的企图或可能作出的反应。期待自古以来就不属于同一范畴的人们都接受有关欧洲统一的全面安排，那只能是幻想。莫内对阿登纳谈到了他的打算，他说他从防务集团的失败这一点来看，在欧洲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政治性困难是其决定性的阻力，应该努力使各种政治力量不再成为欧洲统一的阻力，而将它们变成统一的动力。为了实现这一点，莫内说在他 1955 年 2 月 20 日作为欧洲煤钢联营主席任期届满时，他将会提出辞职，并且拒绝参加政府公职，以便于以民间自由的身份，专门从事振兴欧洲工业的工作，协调各国的各种政治力量，推动欧洲前进。

莫内的话令阿登纳感到振奋，阿登纳坚决支持莫内的想法。他告诉莫内，欧洲防务集团的失败至少让他看到了一点，这就是不能再操之过急地要求一个尽善尽美的欧洲统一政策。他说他感到在执行政策中，运用健全的现实主义审时度势适应情况是很重要的。如果所追求的目标一时还达不到，那么，

至少应该试图实现目前可行的部分，未来则必须依靠继续发展的力量。因为政治中总是存在着无法预料的新形势。他也对莫内谈起了他的打算，按照阿登纳的设想，实现欧洲政治联盟是欧洲各国应该追求的首要目标，而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将会使得一些国家产生离心趋向，因而在实现了政治联盟之后再着手经济一体化，将有利于加快欧洲统一的速度。“防务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失败证明在各国政治上的吵吵嚷嚷远比经济合作的分歧更为难缠，我们应该吸取教训把视线重新转移到经济合作问题上，设法通过经济联盟的创建来达到建立政治联盟的终极目的。”他说，“为了追求更好的、但还不能实现的东西而忽略好的东西，我以为是错误的，同样，为了追求更宏伟、更深远、只有到明天才能实现的步骤，而忽略今天可行的步骤，我也认为是错误的。”

让·莫内对阿登纳的话表示由衷赞同，他点头道，“的确，我们现在欧洲军的计划被搁置一旁，政治共同体计划也被抛弃，军事欧洲的道路被关闭了，政治欧洲也无路可走。发挥经济一体化功能将是我们的唯一出路。这既没有忽视欧洲统一的长远目标，在体制方面也不会显得过于雄心勃勃。”

阿登纳和莫内不约而同考虑到以经济为推动力归功于欧洲煤钢联营四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六国自从成立了共同联营机构，对煤钢的生产、投资价格、原料实行统筹分配与安排之后，六国的联营领域都飞速发展，远远超过了没有参加煤钢联营的英国以及北欧各国。1951—1954年期间，德、法、意、荷、比、卢六国的煤产量增加了23%，钢产量增加了14.5%。除此之外，煤钢重要工业的发展还大大促进了六国工业的发展，这便使得六国都从实际的利益中感到了联合的好处。

同阿登纳磋商后，莫内也同样到五国中去寻求共同语言，他得到一大批从煤钢联营中看到实际好处的政治家们的支持。这时，经济利益成为欧洲联合再掀高潮的推动力。各国已经不满足于在“小欧洲”范围内所进行的单一部门的经济初步一体化，而积极酝酿着更广泛的一体化以及成立全面关税同盟问题。既然政治和军事一体化牵涉的范围太广，触及的问题太根本（国家主权），何妨从不那么敏感的经济一体化重新来着手。各国对这个问题都兴致勃勃。

让·莫内奔走于各国政府间，穿针引线，协调各方意见。在他的努力之下，各国又重新行动起来，这一次的目标是建立更广泛的经济一体化。

1955年3月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参议院批准了巴黎协定。法国方面感到，在失去了欧洲防务集团对德国的约束之后，只有重新将德国拉回欧洲轨道，才能减轻它的威胁。于是埃德加·富尔总理分别给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法国外长安托万·比内以及意大利外长埃塔诺·马蒂诺写信，建议“重新推行欧洲思想”，把欧洲煤钢联营集团权限扩大到运输工具和包括原子能在内的其它能源形式的领域中。

阿登纳在原则上同意富尔总理的建议，但鉴于法国曾使欧洲防务共同体流产，因而他希望待建议讨论成熟之后，再作表态。法国外长比内也拟就了一份提议建立一个欧洲邦联委员会的计划，阿登纳对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因为法国的局势是不稳定的，即使比内的计划很好，但如果比内不能留在政府里，计划就无从实现。法国国民议会的选举定在1956年，所谓的孟戴斯—弗朗斯集团与安托万·比内集团两相对峙，阿登纳对选举的结果没有把握，更何况比内在制定计划时，尽力想把自己集团内对欧洲政策的各种不

同见解统一起来——他能做到这一点吗？或许计划本身就包含着可能引起比内集团在欧洲问题上溃散的危险。考虑到这些，阿登纳认为比内有关建立欧洲邦联国家的想法是不成熟的，因此他把它撂到一边。

在莫内的推动下，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的外交大臣保罗·亨利·斯巴克、约翰·威廉·贝恩、约瑟夫·伯克也行动起来。贝恩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他说，“任何不完全的一体化只能通过损害其他部门或者是消费者利益的措施，才能解决某个部门的困难，这样还会导致排除国外竞争，自我封闭的危险。这决不是提高欧洲生产率的办法。另外，分部门的一体化也不能像全面的经济一体化那样有助于加强欧洲团结和统一的概念。为了加强这种概念，最重要的是要把欧洲国家对于共同利益共同负责的观念溶化到一个关注普遍利益的组织中去。”因此，“应成立一个超国家的共同体，其任务是实现一般意义上的欧洲经济一体化，通过关税同盟实现经济同盟。”这样，一个全面的经济一体化建设目标提上西欧六国日程。

荷、比、卢三国外长就贝恩的建议进行了充分的协商，最后三国共同拟定了一份备忘录，明确提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概念，备忘录尤其强调必须建立起一个有实权的共同权力机构。5月9日，让·莫内在欧洲煤钢联营集团共同议会上，也提出了欧洲建设的两种办法，他认为新的部门一体化和全面的经济一体化，能够同时进行。这样，5月14日，议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即将召开的六国外长会议讨论有关事项，并起草一份关于分阶段实现欧洲一体化的必要协议。

三国备忘录与莫内建议关于建立经济共同体的提议引起联邦德国国内重视，并引起阿登纳和他的著名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之间的分歧。阿登纳对经济同盟所包含的潜在政治同盟的意义非常感兴趣。他曾经说过，为了达到欧洲统一，他随时准备将刚刚获得的主权“纳入一个欧洲各国人民的超国家的共同体中”。艾哈德却反对这种部门的“统制经济”和超国家性，赞成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范围内实行贸易自由。经济上艾哈德是专家，阿登纳尊重他的意见，经过多次的磋商磨合，联邦德国最后拟定的备忘录成了两人观点的综合，一方面主张要扩大欧洲煤钢联营集团的活动领域，同时也模棱两可地建议采取类似政府间合作的办法。

对欧洲的进一步联合与发展，阿登纳有着自己的考虑与设想。

首先，阿登纳认为，从1945年以来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应该看到：欧洲一体化运动不应该是死板的，绝对的，它应该是伸展自如而且富有弹性的。“它不应该是束缚欧洲各国人民的紧身衣，而必须是他们赖以发展的共同依靠，是一种健康的、适应各自正常特性发展的共同支柱，”在这种考虑之下，一体化政策就应该是灵活的，超国家机构并非确定无二的选择。许多国家，例如英国，便是由于对超国家原则不能接受而拒绝加入到一体化行列中来。

其次，“欧洲联邦或者邦联的作用和作用的发挥，不应该取决于某一个成员的意愿或者它所谓的利益，”这将使一体化失去凝聚力，必须尽可能地找到大家的共同意愿和共同利益，从而推动整个欧洲一体化的建设，最终改变欧洲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软弱地位。

第三，欧洲一体化也应注重现时的国际形势，注意协调它与各方面的关系。具体来讲有两方面。一是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再是同美国的关系。虽然阿登纳认为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实质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范畴

都大大超过欧洲的联合，否认欧洲联合会有损或侵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作用，但是，阿登纳也承认，在遇到二者职权范围彼此相接或交叉的地方，相互间是需要进行调整和调节的。对美国也是如此，从目前来看，虽然统一的欧洲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是有效维护欧洲地位的前提，并且这种作用是相互的，但是，美国不可能永远承担保卫欧洲的责任；美国的切身利益也不可能总是与欧洲国家的切身利益相一致，因此，双方“势必出现政治见解的分歧，从而会导致独立自主的政治行动。”而且，从各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大国支配、小国依附的状况都不能持久，长久下去双方都不能忍受。

防务集团条约失败后的第一次煤钢联营六国外长会议终于于 1955 年 6 月 1 日至 3 日召开了，地点是在意大利的墨西拿。阿登纳派去了精明能干的国务秘书哈尔斯坦。其他各国出席会议的有法国的安托万·比内、比利时的斯巴克、荷兰的贝恩和意大利的埃塔诺·马蒂诺。主席是卢森堡的约瑟夫·伯克。这次会议的中心是讨论欧洲的振兴问题。从荷、比、卢三国的备忘录开始，会议上各国代表各抒己见，哈尔斯坦充分明确地表达了阿登纳和联邦政府的意见。反复讨论取得共识之后，六国最后一致通过了一项协议，即《墨西拿宣言》。

哈尔斯坦一回国，立即把墨西拿会议的进行情况向阿登纳作了汇报，阿登纳说他是“怀着惊喜参半的心情评介墨西拿的决议”。令阿登纳感到惊讶的是尽管六国为各种意见争论不休，却是真的在经济合作方面达成了共识，但他担心的是“经济工作将会使我们离开主要任务，即政治联盟的创建”。他为《墨西拿宣言》中六国所表现出来的共同政治意愿感到由衷的宽慰。六国政府在宣言中一致明确：

“在欧洲建设的道路上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刻已经到来，它们一致认为欧洲建设应该首先在经济领域内实现。它们认为，应该通过扩大共同机构，有步骤地联合各国的民族经济，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和逐步协调它们的社会政策。这对于创建一个统一的欧洲是必要的。在它们看来，为了使欧洲保持它在国际舞台上所占的地位，为了恢复它固有的影响力和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政策必不可少。”

在欧洲经过了 1954 年 8 月 30 日的那个“不幸日子”之后，六国终于再次振作起来了。年近八旬的阿登纳也精神抖擞，他相信一个欧洲的新时代即将到来，他又接着为他的欧洲统一的政治理想奔走于各方了，他感到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迫切地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欧洲统一哪怕最初步的实现。

德英、德意与德法之间

必须为奉行一种强有力的共同的欧洲外交政策创造条件。

——《阿登纳回忆录》（三）

《墨西拿宣言》发表之后，六国开始积极筹划建立经济共同体的具体事宜。阿登纳密切地注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看起来总的国际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欧洲建设的重新推动。

最可喜的是法国。1956年1月，法国进行了新一轮国民议会选举。一向反对欧洲统一和煤钢联营的戴高乐派遭到了惨重失败，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组成的联盟——共和主义阵线获胜。由于戴高乐派在议会中消失，一个欧洲多数派在法国议会中形成。新议员大多是一体化事业的积极拥护者，这与1954年国民议会的情况大相径庭，在法兰西终于有了能使欧洲政策顺利通过的可靠保证。

法国在选举基础之上成立起了一个“欧洲内阁”。社会党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居伊·摩勒受命组阁。居伊·摩勒对欧洲统一有强烈的信念，他是让·莫内的“争取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成员。由于人民共和运动的反对，埋葬欧洲防务集团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被请出内阁，社会党人、赞成欧洲运动的克里斯蒂昂·皮诺成为外交部长。激进社会党总书记、莫内行动委员会成员莫里斯·富尔也成为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强大的阵容使居伊·摩勒内阁决心给欧洲振兴以有力的推动。从此，法国的政治形势对欧洲建设越来越有利。

同时，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法国人某些心理方面的障碍也消除了，民意测验表明法国舆论对政府的欧洲政策也趋向于认可和支持。况且墨西拿会议之后欧洲振兴的问题基本上是属于经济范畴的，这方面不如政治军事敏感；在墨西拿，人们有意地回避了某些词句，比如用“欧洲建设”代替了“欧洲一体化”，“超国家机构”、“放弃主权”等词也被小心地抹掉，机构问题不再被首先提及，等等。这样，自尊的法国人感到欧洲概念更容易接受了。连坚决反对煤钢联营与防务一体化的戴高乐将军，也感到形势的变化，不再发表反对声明。这一切给了法国政府以相当广泛的行动自由度。

阿登纳带着欣喜之情感受着法国的种种变化。

在新形势下，美国根据它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一贯政策，也对欧洲的振兴表示支持。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分别发表声明，说美国对欧洲的信念始终如一，认为一个强大、繁荣和更加统一的欧洲不仅可以把联邦德国归并进来，而且可以巩固西方对苏联的阵线，这符合美国人利益。而且，在欧洲防务集团失败之后，美国人也懂得了不要把欧洲统一强加给欧洲人这一点的重要性。因此，美国政府一方面表示了对墨西拿发出欧洲振兴信号的强烈热情，但另一方面策略性地采取了一种审慎支持的立场，更多地让欧洲人自己去作决定，只是在关键的时候出面加强欧洲人的信心。

第三方面形势的变化来自国际形势再次出现了阿登纳频频告诫的紧张状态。1955年奥地利和约的签定与日内瓦的高级首脑会晤只给世界带来短暂的缓和，从1956年秋天开始，苏伊士运河事件与匈牙利事件连续发生，东西方关系又趋紧张。这种一张一弛的变化使六国政府神经保持高度紧张，要加强

团结，要使有关欧洲振兴的谈判迅速取得成果成了六国的共同信念。1956年9月20日，莫内的“争取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发表了一则声明，呼吁“在当代世界上，只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才能使人听到它的声音，并得到别人的尊重”。国际紧张局势的再次出现激励起欧洲政治家们实现欧洲振兴的政治意志。

对于阿登纳来讲，联邦德国必须坚决地和不折不扣地贯彻墨西拿决议，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该如何去做。为了实现目标，通过外交渠道协调好各国的关系，消除通往欧洲道路上的障碍，尽可能地加强欧洲的团结，并使统一的欧洲变得更加强大有力，这一切说起来容易，但各国间的意见分歧却并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大不列颠加入。

阿登纳向来认为英国参加欧洲统一和英国对欧洲统一所持的态度对欧洲的未来具有重大意义。振兴欧洲的口号首先是英国人提出来的，海牙大会也是在丘吉尔的决定的参加之下才成为欧洲统一强有力的讲坛的，丘吉尔曾经大声疾呼要恢复欧洲民族的大家庭，使这个大家庭在自由、安全、和平的制度下重建，“必须建立起一个欧洲合众国”，可是丘吉尔却令人遗憾地将英国排除在这个“欧洲合众国”之外。尽管英国人一直游离在欧洲之外，阿登纳却一直希望争取英国加入到共建欧洲大家庭的行列中来。他曾在1953年5月主动和丘吉尔谈过这个问题，当时丘吉尔向他描绘了一幅世界未来的蓝图，在这幅蓝图中，丘吉尔把美国、英国和英联邦、统一的欧洲并列为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的三个区域。很显然，丘吉尔仍然不愿放弃大英帝国的昨日梦想，去把英国和统一的欧洲放在一起。在1954年10月九国伦敦会议期间，阿登纳同英国当时的外交大臣艾登再次谈起这个可能性。艾登向阿登纳解释道，一个英国人在海外可能有十个或二十个熟人和亲戚，而在欧洲大陆大约只有一个，因此，从心理上对于英国人来说，要把英国人的命运和大陆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将会障碍重重。

但是，阿登纳从艾登在九国伦敦会议时为解决欧洲法德矛盾争端所作的不懈努力中，受到了某种启发。当时为解除法国的担心，英国主动提出参加西欧联盟，将英国和欧洲大陆联在了一起。阿登纳由此设想如果在欧洲组织中增添一支像英国那样稳健而沉着的力量，将更能促进欧洲未来的政治发展，或许通过西欧联盟能够使这个愿望得到满足。

当然这还仅仅是个设想，关键得看英国人自己的态度。六国在墨西拿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明确声明，他们将在适当的时候也对其他关心谋求联合的国家发出邀请，也在决议中明确要求英国加入这一倡议。六国等待英国政府作出表态。不仅是联邦德国，荷、比、卢三个小国家也殷切盼望英国人的加入。法、意也感到英国参加会使经济共同体符合欧洲的共同愿望。

1955年11月19日，阿登纳收到一份英国政府有关能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照会。照会中，英国人思虑再三，再次拒绝了六国的邀请。照会说：英国称英国方面完全明白经济一体化是促进政治稳定，达到较高生产率和更有效地利用一切资源的手段，但是，在经过仔细的审议之后，英国还是决定不能参加这样一种规划。理由如下：第一，六国建议中所提出的经济共同体这种形式不符合英国与英联邦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第二，参加这样的经济共同体也不符合英国所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第三，组成这样一种经济共同体将有把西欧分成两个集团的危险性：一个是由共同市场成员组成的六国集

团，另一个是由其余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组成的集团。英国表示，如果建立六个墨西拿国家之间更紧密的联合将会造成削弱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后果，那么它不仅对西欧的政治联合毫无裨益，而且会对其有所损害。英国政府认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把全部问题都放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内进行讨论才是最理想的。最后，英国还希望联邦政府不把英国的态度通知其他六国，而它会在适当的时候同它们进行直接接触。

在墨西拿会议中拟议实现振兴欧洲的三个目标分别是：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和共同的关税同盟，现在英国的照会使六国对英国参加经济共同体的希望落空了。由于英国在核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六国对英国参加原子能联营也寄予了很大希望。同样，11月19日英国又给联邦政府送来一份照会，表示拒绝参加墨西拿的原子能联营。理由是：英国民间的原子能研究计划是与军事方面的原子能研究计划紧密相联的，这就存在着许多妨碍与欧洲原子能联营合作的障碍，因为没有一个是墨西拿国家有军事方面的原子能研究计划；并且，英国也非常重视它与欧洲原子能联营以外的其他国家所签定的双边协定。

英国政府对墨西拿建议的拒绝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它之所以给联邦政府发出一份单独的照会，是试图对联邦政府施加外交压力，迫使其放弃。在布鲁塞尔进行的专家会谈中，英国人有一种担心，他们既不愿意放弃靠英联邦和英美特殊关系维系的英国特殊地位，同时又害怕由于共同体出现会以法国和德国为中心形成一个欧洲大陆集团，这对英国长远利益来说是不利的。于是英国唯一能做的，便只有反对墨西拿宣言并极力阻止六国共同体的出现。阿登纳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但英国人的态度并不足以使他改变对欧洲一体化的决心，墨西拿会议时他早已把建成经济同盟看作是达到政治同盟的有效途径了。

12月初，联邦德国外交部长冯·勃伦塔诺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委员会的部长委员会会议和西欧联盟部长理事会议。回国后，他立即向阿登纳汇报了这两次会议的情况。他告诉阿登纳，英国不仅在联邦德国，而且也在其他五国政府那里采取了类似的外交活动。斯巴克在西欧联盟会议上已发出了警告。勃伦塔诺认为如果联邦政府不采取行动，英国还会继续试图阻挠六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努力。鉴于联邦政府内也有对英国的建议感兴趣者，联邦德国必须尽快作出一个表态。

1955年12月22日，阿登纳便就英国11月19日照会作出答复，给英国人作了一个明确的表态。照会说：

“联邦政府获悉，大不列颠王国政府决定不参加关于创建共同市场可能达成的协定，目前煤钢联营的六个成员国的专家还在讨论这个共同市场的问题。

联邦政府并不认为，专家会谈迄今所取得的成果，会与联邦政府和英国政府共同遵循的较为自由的贸易和较为自由的支付制度的目标相矛盾。同时，它也不认为对于这些成果可能会削弱欧

此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已于1955年6月10日成立了一个有关核能工业应用研究的委员会，以英国为主。此外英美在核能等方面也有合作。

指它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

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它倒是认为，这些工作将促进它与英国政府共同遵循的目标。

因此，联邦政府将继续在它这方面，为实现欧洲煤钢联营六国外长在墨西哥拿所通过的创建共同市场的决议而作出贡献。

此外，外交部拟对此采取保留态度，即在适当的时机，再考虑大不列颠王国政府关于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范围内讨论与墨西哥拿决议有关问题的建议。

联邦政府的最后一项保留是根据两点作出的，一是联邦经济部长艾哈德认为建立共同市场和关税同盟会束缚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而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作为成员国之间展开自由贸易的范围对经济发展更为有利；再是阿登纳自己也寄望于通过谈判协商消除英国与六国之间分歧，从而最终促使英国参加到共同市场中来。

1956年7月，在六国和英国关于共同体问题之争的高潮时期，阿登纳应意大利政府的邀请访问了意大利。此次意大利之行的目的在于全面协调注意两国有关共同体问题的立场分歧。

这次访问使战后德意双边关系的协调升至顶点。在意大利，阿登纳与总统格隆基、总理安东尼奥·塞尼、国防部长保罗·埃米略·塔维亚尼等分别进行会谈。对方谈到了德国问题，更着重谈到了目前的局势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问题。阿登纳对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找到共同点感到欣慰。

阿登纳希望通过德意合作而对共同市场的建成起到关键的促进作用。英国与墨西哥六国有关共同市场的争吵已急剧升温，而法国由于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内政一直是个大问题，目前殖民地的情况又有突变，法国甚至存在着爆发革命的危险。六国与英国矛盾的处理及共同体内同法国的关系，成了阿登纳与塞尼和塔维亚尼讨论的重点。双方一致感到，为了推动一体化前进，德意合作关键是两国必须携手共进。阿登纳说，欧洲联合的政策不应再由于法国的内政困难而遭受失败，一体化即使没有法国的参加也要努力实现，不能由于法国的瘫痪而使一体化瘫痪，同时，也必须永远为法国的随时加入、参与协作敞开大门。塞尼完全同意阿登纳的观点。

在谈判如何对待英国人时，阿登纳告诉塔维亚尼一个想法：是否能够让欧洲防务集团以一种略微改变的形式重新出现呢？这样也许可以找到一条共同的道路。他说也许可以先通过同英国的秘密接触，试探一下英国人的态度。如果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使英国相信能够参与协作，那么或可因此缔造出欧洲统一的美好前景。当然，在这个期间首要的还是实现共同市场的规划，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英国进入欧洲大陆另开新径。

阿登纳显然仍然没有放弃把英国拉入欧洲的希望。他把意大利作为商议此事的最好伙伴。阿登纳进一步设想了使英国更加接近欧洲两种可能性：首先，可以邀请英国参加墨西哥六个国家的协商，即使仅仅是以联系的形式；其次，可以重振西欧联盟，广泛扩大西欧联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权限，使之成为一个有约束力的有效欧洲组织。西欧联盟成员包括了英国和墨西哥六国。意大利方面答应阿登纳，将对这种可能性引起重视。

1956年12月初，意大利总理格隆基回访联邦德国。阿登纳同他再次讨论了英国和欧洲的关系问题。格隆基也认为西欧联盟在斯特拉斯堡的年会纯粹是一种形式，必须设法改变这种状况，使西欧联盟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

他们设想应设法赋予西欧联盟议会以更大的权力，使它成为欧洲议会的核心。阿登纳提议把它的机构搬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在地区，并建议七个西欧联盟国家驻北约大使兼任驻西欧联盟大使等等。

尽管德意两国对英国寄予了许多美好希望，设想了种种可能性，甚至认为英国政府或许会因为苏伊士运河事件从根本上修正它的欧洲政策，但是，阿登纳与意大利为使英国靠拢欧洲而作出的努力一无成效，英国拒绝了这些建议。英国对欧洲的政策也许可以说因苏伊士事件而转变了，但这种转变并不是阿登纳所希望的那样，英国打算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组织欧洲——它想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而不是经济共同体。这样墨西拿六国与英国之间的分歧就越来越不可弥和了。

1956年5月，墨西拿六国在威尼斯通过了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巴克就建立共同市场的详细方案，在这些方案的基础上，六国政府全权代表会议从1956年6月起在布鲁塞尔召开，着手拟定条约。因此，到了1956年夏天，六个国家在墨西拿所设想的政治合作基础上的经济联合有了一个固定的轮廓。

由于六国的共同努力，布鲁塞尔的一体化谈判进展迅速。英国眼看无法干扰六国共同体建成，便从1956年7月起开始进行反击。

英国人反击的场所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在这个机构里，英国渴望得到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和一些小国的支持，它可以对理事会和秘书处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英国的反攻是在核能源和贸易开放这两方面展开的。

在原子能方面，六国原是指望英国参与合作，但英国却拒绝了。由于美国支持欧洲振兴并答应六国将向原子能联营提供技术和铀两方面的帮助，六国便不再理会英国施加的压力。英国大为恼火，它利用了它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中的核优势地位，于1957年12月成立起了一个欧洲原子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的与原子能联营集团相似，却不具有超国家性。英国得到了六国以外其余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支持。

在贸易方面，英国人也鸣锣张鼓，树起大旗。当时英国的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理事会主席，他建议在该组织成员国之间建立起一个工业品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内成员国之间将逐步取消关税，同时对非成员国则仍然保持关税。这样可以不通过关税同盟而达到取消内部关税的目的。麦克米伦建议受到英国经济界和工业界的热烈欢迎，因为欧洲大陆市场要比英国市场大一倍；也受到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中大多数国家的欢迎，甚至包括联邦德国和荷兰。莫内和斯巴克甚至感到这是英国和欧洲、和六国接近的开端。但是英国想和欧洲接近却不愿纳入一体化轨道，双方仍然是不可调合的。六国担心英国的分化瓦解，因而加速了六国罗马条约的缔结。可以说英国拆散六国的企图适得其反。

虽然为了拉英国，阿登纳和意大利走得很近，但是，阿登纳一直认为“法德两国的关系对顺利完成欧洲统一事业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法国人的心情仍然是矛盾的。尽管政治家们将法德关系看作未来欧洲的支柱，公众却依然担心德国强大后的威胁，仍然把军备方面的紧密合作看成是防止德国可能入侵的最好保障。因此，法国政府于1956年4月28日和9月25日，两次以备忘录的形式向阿登纳提出关于法德两国更紧密合作的建议，法国人尤其希望法德两国加强在军备方面的紧密合作。

阿登纳把这两个照会看成是法国政府愿意与联邦政府进行真正合作的标志。他也看到在目前情况下，法国人要求的紧密的双边合作愿望是不可能实

现的。尤其在军备方面，欧洲已经有了北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西欧联盟、法意荷比的常设军备委员会以及西欧联盟国家总参谋部会议等等如此繁多的机构，若再出现这种只此一家的法德合作，必然会引起其他西欧联盟成员国的抗议。并且联邦德国在军备方面还受着这些多重国际组织的限制。不过阿登纳对法国方面的任何一个友好的暗示都是心神领会。

1956年9月29日，阿登纳同法国总理在巴黎的埃尼希宫进行了一次全面会谈，欧洲政策与法德的合作是两人谈论的主题。阿登纳向后者表示，联邦政府在原则上欢迎为法德紧密合作而采取的所有措施，并愿为此努力，但是，至于军备方面的紧密合作，联邦德国将不得不把这种合作严格地保持在联邦德国在西欧联盟和北约组织内部所承担的义务范围内。对这种非不愿乃不能的表示，居伊·摩勒也无话可说，不过他们却在对于欧洲合作的必要性以及对于实现这一目标途径的看法上达成共识。阿登纳称摩勒是一位明智、冷静而富有远见的法国政治家。摩勒向阿登纳表示，欧洲联合是迫切需要的，不仅为了苏联、美国，也是为了欧洲自身发展。两人一致认为，欧洲共同市场的建成是实现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步骤，法德两国应全力推动。

阿登纳在居伊·摩勒那里看到了欧洲政策自罗贝尔·舒曼之后的重新继续下去的希望，他早就致力于法德谅解，也随时准备为法德谅解与欧洲联合作出切实行动。

通向罗马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锲而不舍地工作，那么欧洲的统一就会变成明天的现实。”

——《欧洲第一公民——让·莫内回忆录》

六国为《墨西拿宣言》展现的目标所振奋，决心为振兴欧洲大干一场，但涉及到一些具体原则，六个国家却各有分歧，尤其是在对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方式上，法德的分歧很大。

联邦德国非常赞成全面的经济一体化，阿登纳一向把政治一体化看作是最高目标，他认为实现全面经济一体化将为理想中的政治一体化迅速铺起一条道路。联邦德国工业界和经济界人士也乐于看到消除关税壁垒。因为经过六年的经济恢复，德国经济已经有了很强的竞争实力。到1955年，联邦德国的工业产值已超过英法，再次成为西方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出口贸易一直稳步在发展。取消关税壁垒、全面的经济一体化对一直奉行自由贸易原则的联邦德国经济来说更为有利。正因为这样，联邦德国对共同市场的设想十分广泛，不仅认为商业贸易应该自由流通，资金与劳务流动、人员往来也应在共同市场内自由畅通。

相反，法国则坚持部门经济一体化的意见。他们考虑到了原子能、电力、煤气、运输和邮政电信等领域，认为欧洲机构可以在这些各自不同的部门中，采取共同行动和实行某种统制经济；同时，法国也对一个全面的共同市场感到担心，因为法国商品的价格水平高于其他五国竞争者的价格水平。法国有很多人主张贸易保护，他们担心这个共同市场仅仅是一种贸易自由，既无保障也无重新适应的可能性。在涉及资金、劳务流动与人员往来问题上，法国关心的是社会和税收负担的协调与劳动力的再适应问题。

其他国家也有不同看法，有时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法国，有时又在那个问题上支持联邦德国，意见极不统一。比如，荷兰的出口能力较强，荷兰人就赞成联邦德国提出的消除关税壁垒的全面的经济一体化，可是他们在资金、劳务流动与人员往来问题上却支持法国的立场。意大利和联邦德国、荷兰一起拒绝法国提出的部门经济一体化，可又在资金、劳务流动与人员往来问题上站在与法、荷、比、卢相同的立场。

由此出发，各国在关于机构的问题上，态度也是有分歧的。阿登纳与比、荷、卢一起，要求建立拥有实际权力的共同组织，而法国则反对超国家性，也不愿将欧洲煤钢联营的权限扩大到其他领域。所有这些，各国在墨西拿会议上都没有作出抉择，只决定对可能的选择进行研究，即要么选择部门经济一体化，要么是全面的共同市场。至于机构问题，则决定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再来确定所设想的组织权限有多大。由于分歧太多，六国把这项使命交给了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让他负责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研究具体问题。

斯巴克委员会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座小城堡瓦尔迪谢斯举行了会议。参加委员会的有各国政府代表团和欧洲煤钢联营集团的专家。阿登纳派去的是他亲信的国务秘书哈尔斯坦。率领法国代表团的是费利克斯·加亚尔，他是让·莫内的老合作者。斯巴克作为独立派人士担任委员会主席，负责委员会的政治仲裁。斯巴克委员会的任务是要将各国的观点放到事先确定的范围里

进行总体、全面协调，它将超越各个国家的独立观点。

由于各国本着欧洲振兴的精神共同努力，斯巴克委员会的工作卓有成效，进展迅速。1956年4月，委员会向六国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回答了墨西拿分歧的种种问题，并且指出了要达到会议目标的各种措施。结论是：或者进入一种全面的共同市场，或者在某些部门实行单一部门一体化。

斯巴克委员会报告研究了一个全面的共同市场的性质和实现的措施，主张建立对外实行共同税率的关税同盟体系，并且，斯巴克委员会报告也为防止各国关税税率的不平衡和失调规定了必须具备的条件。阿登纳感到由衷的满意，因为共同税率的关税同盟体系将更适合于导致全面的经济一体化，因此也将更利于导致政治一体化，阿登纳禁不住对斯巴克委员会的工作大加赞赏。

斯巴克委员会也着重研究了有关法国人的建议，即在能源（原子能、石油、煤气、电力）与运输部门实现单一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报告认为除了在原子能领域里，其他部门的一体化将是困难的。因为在其它能源中，石油是属于大大超过欧洲范围的国际大公司的业务，相反，煤气和电力则基本上在国家内分配。石油的范围使它不可能包括在欧洲煤钢联营集团的权限内，而在国家范围内分配的煤气和电力则不存在很大的国际贸易问题。在这些部门内实行经济一体化会提出非常重大的特殊问题，所以将非常困难，而且也终将不能带来什么明显的好处。至于运输部门，困难则更大，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放弃对铁路运价的监督，比如荷兰就强烈要求保持它在内河运输工具方面的行动自由和特殊地位。当时在各国内部铁路和公路的联营问题尚且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实行六国运输一体化的困难更是可想而知。

只有原子能部门的单一部门一体化是可选的。当时原子能运用只是处于研究开发阶段，成立一个专门组织机构着手对欧洲原子能的综合发展开展工作是可行的，这不仅集中六国之力，同时还有利于对原子能开发与应用实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六国对此都有着共同的要求。

这样一来，斯巴克委员会将墨西拿会议宣言体现的各种愿望归并成为两大块，即实现全面的共同市场和建立欧洲原子能联营集团，并且提出了有关方案，提交到1956年4月21日举行的六国外长会议讨论。

欧洲联合正在积极的建设与努力之中，阿登纳对这种形势感到由衷的兴奋。1955年11月四国日内瓦外长会议破裂，使他更难以坐待结局，他加紧了欧洲政策的推行。1956年1月19日，阿登纳满怀激情给联邦政府各部部长写了一封信，明确了他的新指示。这封信对于理解阿登纳的欧洲政策有着重要意义，因而在此全文转录如下：

部长先生阁下：

当前的外交局势隐藏着异常巨大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这些危险并打开一种有利的发展局面，就需要采取一种明确而积极的态度。

正如我同比内和斯巴克的谈话以及美国某些十分坚定的政治声明所特别指出的那样，西方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从这个欧洲一体化中看到了形势发展的要点。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一体化成功了，那么无论在关于安全问题或是重新统一问题的谈判中，我们就能把一个统一的欧洲的法码作为一种新的重要因素投

到天平盘上去。相反地，只要欧洲这种不统一的局面使苏联抱有把这个或那个国家拖到它那边去的希望，从而分裂西方的联合并逐步把欧洲纳入它的卫星国系统，就不能期望苏联作出重大的让步。再则，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只有在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上才有可能长期地保持下去。如果一体化由于我们的反对或由于我们的犹豫不决而失败，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不能预测的。

因此，我们政策的原则就是：我们必须坚决地和不折不扣地贯彻墨西拿的决议。必须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重视这个决议的政治实质。这个决议不是单纯从业务角度考虑的技术合作，而应是促使一个共同体的产生。这个共同体——也是为了重新统一德国的利益——保证了政治意志和政治行动的一致方向。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范围还不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所有业务性的考虑必须为这个政治目标服务。

下列几点特别应作为贯彻墨西拿纲领的做法：

1. 必须用所有（阿登纳自己标出——引者）考虑到的方法促进首先在六国之间的一体化，这不仅仅是指总的（横向的）一体化方面，而且也涉及到适当的（纵向的）部分性的一体化。

2. 因此，一开始就要在可能范围内努力建立一些合适的共同机构，以便本着这个伟大政治目标的精神建立起六国之间的牢固联系。

3. 这次开得不错的，关于商讨建立欧洲共同市场——这是一种类似国内市场的市场——的会议必须强调把它开到底。同时必须建立拥有决定权力的欧洲机构，以保证这个市场履行它的职能，同时促进政治方面的继续发展。

4. 从共同市场这一思想出发，也必须努力在交通方面建立一个六国之间真正的共同体，这特别适用于航空事业；对有关这方面的生产、购置和管理的一体化计划在原则上加以拒绝或拖延执行，在政治上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5. 这对于动力，特别是核能方面是同样适用的，在政治方面迫切需要消除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怀疑，而怀疑我们是否还跟过去一样仍然拥护墨西拿声明，根据这一声明，应该成立一个拥有决定权的、设有联合机构和有着共同资金以及其他实施办法的欧洲原子能联营。美国人如他们正式声明过的一样，在欧洲原子能联营看到了一种政治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欧洲原子能联营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相反，它有着自己的权利和责任，美国人准备大力支持这样一种原子能联营。

另一方面，根据世界上普遍的看法，和平利用原子能实际上是与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分不开的。因此，德国试图完全由自己控制原子能可能会引起外国极大的猜疑。如果个别原料由欧洲共同经营是出于安全方面的需要——德国当然不应受到歧视，而且它的研究工作和工业必须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发展余地——，那我们是更不能加以拒绝的。

我请你们把上述所提出的几点作为联邦政府政策的原则（基本法第 65 条），并照此执行。

阿登纳（签字）

1956年1月19日于波恩

这篇指令，实际上概括出阿登纳对欧洲一体化振兴所持的所有基本观点，在这里全部将它引述出来。像阿登纳所说的，它也代表了这一时期联邦政府政策的基本原则。

斯巴克报告出来之后，各国结束了有关全面和部门经济一体化之争，但在具体方式上仍有很大分歧，比如关于原子能问题。从阿登纳的指令中可以看出，联邦德国出于安全与平等方面的考虑，愿意实现欧洲原子能联营，它倾向于同美国人合作，因为，美国人不仅支持，它的技术也是最先进的。但是，法国对欧洲原子能集团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于联邦德国的一种保障，同时法国又可以凭借它对其它国家的核优势在这个组织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联邦德国及荷、比、卢、意都对法国这种潜在的大国主义企图感到不满；并且从利益上，他们也都认为同美英在原子能方面的合作远比同法国合作有效，这样可以直接从美国人那里获得帮助，迅速建立起自己强大的核工业。于是，五国同法国做了一个微妙的交易：联邦德国等法国的伙伴国提出，只有法国接受了全面的共同市场，它们才将对欧洲原子能联营集团予以支持。法国无可奈何，要保证五国对原子能联营的支持，就必须作出些让步，不能两全。法国被迫同意交易，却提出了很多异议。

首先一个是有关共同市场的过渡时期问题。六国在墨西拿宣言中明确，欧洲共同市场应该分阶段来实行。

五国认为，为了使共同体的开放能促进工业的适应，应该尽量缩短过渡时期，比如说10年，这个期限在布鲁塞尔专家拟定的条款中已作出明确规定。相反，法国接受了共同市场计划不可逆转的同时，却认为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并且，从过渡时期的一个阶段转到下一阶段不应当自动进行，而应由各国政府来决定。同样，五国希望未来的关税同盟规定的共同对外税率应是低水平的，以免各国为进口原材料和食品支付更昂贵的价格；而法国却坚持高税率可以使共同市场的实现变得更加容易，并坚持贸易的自由化要与经济、财政和社会方面的协调联系起来，因为法国的竞争能力比较弱。法国甚至提出货币政策与一般经济政策要由各成员国自己作主，对出口货物应进行补贴，等等。

争来争去，由于法德两国之间的实际利益与具体主张差异最大，矛盾集中在法德之间，又体现成为法德之争。法德是大国，两国的意见对其他国家有决定性的影响。从经济上来讲，建立一个较大的欧洲内部统一市场完全符合西德的利益。西德工业生产，尤其是重工业，在加入煤钢联营后开始了高速发展，到1955年，西德的经济实力又大大超过尚未恢复元气的法国。1957年，在西方世界工业生产总额中，西德所占比重为10.1%，而法国仅占1%；而且西德也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出口国，占世界出口比重的8.1%，法国仅占5.1%，因此，西德在谈判中主张在对内、对外关系中尽可能地实行自由竞争，把国家干预限制在最低限度。法国则强烈反对这样做。战后多年的殖民战争把法国搞得财政空虚、经济不振，法国想通过参加共同市场重振经济，并要力求获得一些特殊权益，如有调节的市场机制和某种对外保护，以提高竞争力。

阿登纳深知法德关系对于顺利建成共同市场有决定性意义，谈判迟迟不

能取得进展将会直接影响到各国的批准。因此必须尽快与法国达成一致。阿登纳决心从大局出发，对法国的要求作出些让步。

在确定共同对外税率上，阿登纳决定放弃联邦德国要求低税率的立场，接受了1957年2月初法国提出的比较高的对外税率。其后，法国再次表现了它的犹豫，进一步提出：要求在社会负担的协调、农业政策和吸收海外领地参加这三个问题上得到保证，才能签约。

在社会负担协调的问题上，法国要求在六国内部协调社会负担。由于战后初期执行大规模经济计划和国有化政策，法国的社会负担很重。法国希望这种协调能在贸易自由化之前完成。阿登纳在征求有关专家意见的情况下，同意法国在进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进行社会负担的协调，并答应法国所坚持的条件，即在从过渡时期的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时，将不是自动进入，而需全体一致决定。这样，法国就有权在这种同时进行的做法得不到遵守的情况下，能够进行抵制。法国的要求得到实际的满足。

关于农业政策方面，阿登纳也接受了法国方面提出的共同农业政策的要求。本来在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建设之后，联邦德国已成为工业国，农业只占国民经济中次要比重、政府对国内农业实行保护，每年都从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进口大量廉价的农产品。而法国农业发达，是农业出口国，希望制订一项共同的农业政策，扶植农业，从而扩大本国农产品的出口。共同农业政策有利于法国农业发展，却有损西德农业。阿登纳在经过再三考虑后，决定从大局出发支持法国这一要求，加速缔约，避免再次的节外生枝，贻误时机。

最后，法国提出要求吸收它的海外领地参加到共同市场中来，理由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它不想因为共同税率而与海外领地分割开来。法国的要求得到与法国同样拥有海外殖民地的比利时的支持。失去殖民地的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犹豫了，它们怕被卷入法比“殖民主义”的矛盾纠葛之中，也不愿意让共同体为开发这些海外殖民地付出代价。法国的要求被三国强烈抵制，法国国民议会声称法国将把吸收海外领地的加入当作接受条约的条件之一。阿登纳为了加快条约签署的进程，终于从政治上的考虑出发，接受了居伊·摩勒的这一要求。

阿登纳向居伊·摩勒作出的广泛妥协使得犹豫的法国政府在联邦政府方面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法国立场坚定明确了。法国人终于与阿登纳一起成为欧洲振兴的推动力量。1957年3月25日，在罗马美丽的卡马托利塔山上，来自西欧六国的代表聚在一起，签署了对未来欧洲发展有决定意义的“罗马条约”。阿登纳不无感慨地说：“除了这个受人景仰的城市罗马之外，我们还能够找到什么比它更有意义的签字场所呢？这里是查理曼大帝开创其伟大事业的地方。如果我们现在设法为欧洲共同的未来打下基础，那么继承我们欧洲伟大的共同遗产就是我们的责任。罗马将作为我们继承欧洲伟大遗产的见证人。”

1957年3月，国务秘书哈尔斯坦受阿登纳的委托，向联邦议院解释了联邦政府加入罗马条约以及找到建立欧洲经济共同条约体系解决办法的基本立场、路线。哈尔斯坦说，只有领会到完成这样一种共同事业的所有参加者都应作出牺牲——在某些情况下还要作出非常显著的物质牺牲——的情况下，才能在判断整个事物的时候得出正确的结论。条约涉及的方面包罗万象、错综复杂，丰富多采的现代经济技术生活使条约必须是如此。当然，也并非条约的每个细节能尽加人意，决不可以仅仅由于这些细节而忽视取得成绩的真

正伟大的一面：只有六国的不断巩固的联合，才能保证国家的自由发展和社会进步。

罗马条约的签署是欧洲振兴的重要步骤，接下来必须争取条约在六国顺利获得通过。哈尔斯坦在联邦议院对签约的解释正是为此目的。阿登纳必须首先争取条约在联邦议院尽快获得尽可能多数通过，让·莫内的“争取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帮了他一个大忙。行动委员会不仅对条约的起草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且为各国批准条约作出了极大努力。1956年7月，让·莫内亲赴波恩，与联邦德国反对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伦豪尔进行了会谈，他说服了奥伦豪尔放弃社民党历来所持的反对阿登纳欧洲政策的立场，转而支持罗马条约。1957年7月5日，德国联邦议院就罗马条约表决，尽管社会民主党批评海外领地的加入，并对德国重新统一表示担忧，但仍然对罗马条约投了赞成票。让·莫内在他的回忆录里称：“德国各政党自行其是的局面从此宣告结束，德国舆论界转向西欧联合，那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再也不复存在。至此，开始了法德全面和解的新时代。”

几乎是在同时，法国也进行了对罗马条约的辩论。让·莫内的行动委员会也在法国作了大量工作。阿登纳对居伊·摩勒绝对放心，他相信法国政府会为条约的通过竭尽全力。来自法国议会的消息是令人振奋的。法国政府向议会强调了欧洲建设的必要性，强调了五国对法国困难的理解，强调了法国提出的各项条件已获得了满足，最后指出国民议会必须在条约和孤立之间作出选择。这样，法国议会没有再次出现像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批准时那样激烈辩论的场面。由于六国对罗马条约的技术性问题和机构问题的谨慎处理，也没有引起议员们的有关争论。7月10日，法国国民议会也以342票对239票批准了罗马条约。

之后，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陆续批准了条约。到1957年年底，罗马条约在六国全获通过。

1958年1月1日，罗马条约生效。根据罗马条约产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联营正式诞生。

需要指出的是，在阿登纳的努力下，联邦德国也获得了两项让步。首先，东西德之间的贸易不受共同市场对外贸易壁垒的妨碍，这样也就避免了在两德间的政治、军事壁垒之外再建立新的经济障碍，两德间贸易被共同体视为国内贸易。再就是一旦德国重新统一，阿登纳要求“统一后的德国对于以前一部分德国新签订的国际公法的条约应该有完全的政治行动自由”，六国对此表示谅解与承认。这样，阿登纳政府也就可以作出“不把任何形式的约束强加在重新统一后的德国身上”的保证

罗马条约明确宣布，它的签字国“同意把共同市场作为建立欧洲联合的下一个阶段”，它将导致六国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的融合，通过这样产生的经济融合，使今后实现政治上的统一成为可能和必不可少。这正是阿登纳所希望，他已仿佛看到欧洲合众国的曙光。就像莫内所说，从签约这一刻起，“无论是德国人、法国人，还是意大利、比利时、荷兰或卢森堡人，他们都不仅仅代表他们自己的国家，像早已形成的欧洲文化一样、他们都是，而且还将越来越坚定地是欧洲公民。”

从这一刻起，阿登纳将自己也看作是“欧洲公民”。他很乐意有这个新的身份。

第八章 国际关系复杂了

“在德国领土上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两个德国，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是德国历史上的转折点，也是整个欧洲历史上的转折点。……”

——1955年11月8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
在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上的讲话

我的政策的出发点是坚定地信赖美国。

——《阿登纳回忆录》（三）

日内瓦的空气

必须警惕：不要成为苏联“和平攻势”的牺牲品。

——《阿登纳回忆录》（三）

正如两战间召开的和平裁军会议一样，中立的瑞士首都日内瓦再次成为战后国际活动的重要场所。1955年7月，美、英、法、苏四国在这里召开了继波茨坦会议之后的四国首脑会议。阿登纳称之为“微笑的会议”，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定，却把未能解决的欧洲安全与德国统一、裁军以及东西方接触三个问题，留给了10月27日到1956年1月16日在日内瓦继续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

日内瓦首脑会议虽然收效甚微，但却带来了推动东西方缓和的“日内瓦精神”。在它的影响下，西方舆论界开始转向，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本着新的“日内瓦精神”能够促使国际形势缓和，以“和平共处”代替冷战对峙。

这种精神也振奋了西方的政治家。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上，英国首相艾登提出了建立一项“视察制度”的建议，规定在东西方之间仔细确定一个区域范围，再经双方协商同意，派遣共同的视察队进行工作。艾登认为，通过这种东西方机构的合作，可以在建立起来的视察区内创造一种“信任的精神”，这种精神将成为全面解决问题重要的先决条件。为了筹备日内瓦外长会议，英国人对这项计划作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并在外长们谈判之前将其送交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和西方三国“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小组”。

阿登纳事先对此并不知情，只是在计划书送到“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小组”以后，才得知这项计划的细节。所谓的视察区域在阿登纳看来似乎有一个中立区，阿登纳怀着极其不安的心情给艾登写了一封信，恳切地向后者陈述了他对此项计划中所包含的对德国歧视及对德与西方危险的担心。艾登回信向他保证，“视察计划”并非对德国抱有成见或是宣告英国政府对这一要害问题有了转变或更改，在阿登纳所担心的这些问题上，英国决不会采取危害西方共同目标的行动。

然而，日内瓦外长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西方三国已以艾登方案为蓝本提出了一项计划。10月28日，西方三国向苏联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尽管三国仍然承认四国对德国统一负有共同责任，应举行

全德自由选举来实现德国统一，以及“没有德国的统一，任何欧洲安全体系都将是虚假的”等等立场，但是，三国却在备忘录所附的一份安全条约草案第3条中，默许了建立欧洲裁军地区应以两德之间边界作为军事分界线这非常重要的一点。莫洛托夫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立即撤销了苏联在谈判第一天所提的安全计划，于10月31日重新提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方案相吻合的计划，并声明他接受艾登“视察计划”的思想。

如果不是莫洛托夫在11月8日开始的新一轮谈判中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令人吃惊地拒绝了西方国家关于通过自由选举重新统一德国的方案，艾登提出的“视察计划”还不知应该以怎样的结果收场。在西方盟国中，阿登纳坚决反对以两德之间边界作为裁军地区分界线；法国政府也对此抱怀疑态度；杜勒斯更不用说。日内瓦外长会议最后是由于苏联方面反对举行全德自由选举而彻底失败。西方坚持欧洲安全问题要与德国统一问题联系起来同时解决，莫洛托夫则猛烈抨击东西方“自由交流思想实际上只不过是战争的自由宣传罢了”。所以，会议有关欧洲安全、德国统一和裁军三个议程都没能达成协议。但是，这次会议暴露出西方国家在外交政策上已经出现了很大分歧，而这种分歧正是阿登纳所担心的“日内瓦精神”的影响所至。

阿登纳既感到失望又感到担心。他失望的是这次会议没有使德国向重新统一迈进，苏联人一口回绝了在1952年曾经答应过的全德自由选举，甚至连杜勒斯在信中所说的“重新统一有了苗头”所唤起的希望也被对会议的失望搞得烟消云散，他更担心的是会议所显示的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国家不再像从前一样，保证将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西方会不顾联邦德国的要求去与苏联搞妥协，从而将会牺牲德国的利益。此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了阿登纳这种担心是完全有理由的。

艾登的计划只是一个方面，日内瓦空气也为阿登纳协调联邦德国国内政治带来很大困难。

联邦议院的选举每四年一届。在1953年秋天联邦议院的选举中，阿登纳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党团获得了绝对多数票。日内瓦会议之后，阿登纳政府外交政策的局促渐渐暴露，加之反对派的推波助澜，对阿登纳政策的攻击也越来越多。眼看再过两年就将再度面临议会大选，这种趋势会对执政党选举越发不利。

从10月到11月，阿登纳接连经受打击。已八十高龄的他患了支气管炎，病痛使他不得不在家休养了七个星期。这期间，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对阿登纳的对外政策发动了一次强大的冲击，使建国以来联盟党与自民党的联合执政陷入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

发动这场攻势的是自1954年春天开始担任自由民主党党主席的托马斯·戴勒博士，以及自民党副主席弗里德里希·米德尔豪韦、议员拉德马赫尔、黑德戈特等人。他们起而反对阿登纳的外交政策。在建国初期自民党与基民盟联合执政时，自民党是拥护阿登纳政策的，1949年12月在慕尼黑举行的自由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戴勒曾经说：“阿登纳这个人，不愧是德国人的幸福。”1950年的另一次选举集会上，戴勒也曾称阿登纳是一位“德国应该为之感谢仁慈的上帝”的人物。但是从1955年初开始，担任自民党主席的戴勒就开始在公开场合攻击阿登纳的对外政策了，尤其对阿登纳的重新统一政策和巴黎协定表示了极大的怀疑。3月，《世界报》、《法兰克福汇报》

的记者们请戴勒畅谈他的政治观点，戴勒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关巴黎协定与重新统一是否一致的问题时说：“无论如何要在德国人民中间保持这样的觉悟，即感到我们与西方是休戚相关的。对阻碍在和平和自由中重新统一德国的协定（指巴黎协定）进行修正，看来是必要的，否则俄国人怎么会交出占领区呢？”4月24日，在巴黎协定尚未得到所有参加国的批准之际，戴勒又在贝恩卡斯特发表了对阿登纳政府极其不利的一个讲话，宣布自由民主党将制定一个以“不结盟”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所谓“第三种解决办法”的外交政策纲领。此举把阿登纳搞得很狼狈，他不得不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向盟国强调联邦共和国将恪守同西方国家所签定的协定，并将一如既往地忠于这些协定，以确保盟国的信任。

9月，阿登纳与自民党的矛盾斗争升级。阿登纳去莫斯科与苏联政府举行了一周的谈判，带回的成果是苏联答应释放在苏的德国人员，同时还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9月24日，戴勒在耳岑发表讲话，说在巴黎协定继续存在的情况下要重新统一德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指望俄国人同意重新统一。这种说法与联邦政府的政策完全矛盾。本来阿登纳就担心他访问苏联会引起西方国家对联邦德国的不信任，戴勒的讲话无疑会证实盟国的怀疑。阿登纳向戴勒要求澄清他的讲话同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并让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作明确表态：它是否同意、愿不愿意执行现行的外交政策。9月27日，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讨论了这一问题，之后，戴勒以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名义致信阿登纳，说自由民主党将“忠于巴黎协定”，有关他讲话的报道是报社“混淆视听”。阿登纳并不满意这一点，他要求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对现有政策作一次明确的表态。第二天，阿登纳得到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联邦政府外交政策的声明。

此外，基督教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之间还就另一些主要问题发生过摩擦，如在有关萨尔协定、筹建中的联邦国防部国务秘书的人选、联邦国防军指挥权、选举法以及欧洲政策等问题上分歧重大，事情并没有就此简单了结。日内瓦外长会议结束之后，阿登纳与自由民主党纠葛得火势忽旺，直接关系到联合执政是否能够得以维持。

1955年11月15日，自由民主党发动了一次重大攻势。自由民主党利用机关刊物《自由民主通讯》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日内瓦会议得出的结论》的文章。文章对阿登纳政策作了一番极其尖锐的抨击。文章写道：日内瓦会议上，“从联邦首都向这位赤裸裸的日内瓦会议的否定者莫洛托夫发出了口号：‘现在该进一步实现欧洲一体化’，莫洛托夫对于日内瓦毫无结果的德国问题的会谈，感到十分失望，并正寻找着发泄之处，于是他瞅准了西欧经济大区域。墨西拿这个名字成了未来欧洲胜利的希望，（同时它也是苏联人憎恶的目标）……如果我们现在向公众提出一个二者择一的目标（指重新统一与欧洲的政策），这个目标（指欧洲政策）值得努力追求，但又必须用现在所保持的口气而避开主要目标（指重新统一），那么，这种追求会有利于我们的主要政治目标吗？”

文章继续写道：“日内瓦会议失败后，（联邦政府）没有变换未完成事业的政治工作位置，没有因重新统一遭到拒绝而想到失望，从而，（联邦政府）使我们陷入无人知道将如何使我们更接近我们目标的欧洲事务中去。

“德国为了实现重新统一的目标，自由行动的范围已经限制得很狭窄了。我们已经放弃使用任何武力，我们不愿意解除四大国在重新统一问题上

所承担的义务。这意味着，没有西方国家的同意，我们不签订任何条约。但在德苏互派大使中，我们应抓住阿登纳从莫斯科回国以后在联邦议院所谈的那些机会……”

在文章里，自民党除了对阿登纳的统一政策攻击了一通外，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德苏建交后的对苏政策问题，认为联邦德国忽视了由于和莫斯科建交而产生的使波恩与莫斯科直接接触的可能性，并暗示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失败以后，联邦政府应该就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与苏联进行直接谈判。11月19日，

自由民主党主席戴勒又在鲁尔河畔的米尔海姆尖锐批评了“德国观察员代表团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上不甚积极的态度”，认为他们在那里不同苏联接触是个错误。他说：“如果我们无所事事，就不可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何况重新统一问题已经是当前我们政策中最重要的任务。”同时，戴勒还尖锐指出在日内瓦会议失败后阿登纳重新加强西欧一体化政策是“完全错误”的。

继戴勒之后，自由民主党副主席、联邦议员弗里德里希·米德尔豪韦于11月19日又在韦尔茨堡对阿登纳外交政策进行了抨击。当天合众社立刻作了报道：

“……日内瓦会议的失败使得人们有必要修改巴黎协定，以便能在重新统一德国的问题上更进一步。米德尔豪韦同时表示支持处于反对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反对巴黎协定的立场，他们之所以反对，理由是日内瓦会议证明了阿登纳强硬政策的失败。米德尔豪韦然后重复了共产党人提出的两个德国政府之间进行直接谈判的要求，并最后主张西德在莫斯科和北京建立大使馆，以促进西德的商品输出。”

在这次讲话中，米德尔豪韦大肆谴责阿登纳在莫斯科苏维埃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出卖“长子权以换取释放俘虏的红豆汤。”他在另一次公开的发言中，又高呼口号，说人们不能装作好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存在的样子”，联邦共和国自己总有一天非要作出这个结论不可！

阿登纳愤怒了，他认为作为联合执政党的自民党不应该未经事先商量就发表如此不负责任的讲话，同时，在勒恩多夫休养的阿登纳还得到另一个确切消息，说11月16日自由民主党外交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关于重新统一德国的讨论，自民党议员奥伊勒制定了一份计划，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如果能够实现德国统一，那么统一后德国就应该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二、德国应该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武装起来以保证自身安全。为此，德国可以参加普遍安全条约；第三、作为一项补充的假设方案，考虑建立一个中立化的和裁减军备的安全地带，由现在是苏占区的德国部分，加上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希腊组成。

尽管自民党外交委员会对这项计划尚未作出最后说明，但在自由民主党机关报所刊登的有关报道中却已宣称，外交委员会期待“尽快与莫斯科举行会谈”。

阿登纳一直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称作苏占区。

这一切极为痛切地击中了联邦德国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以后所处的外交地位，执政两党的不和更会直接影响盟国对联邦政府的信任。不多日，阿登纳接到联邦德国驻美国大使克雷克勒从华盛顿寄来的一份有关新闻舆论的报告，克雷克勒在报告中陈述了美国舆论对于联邦德国国内政治运动的重视。阿登纳再也不能安于病榻了。11月22日、12月1日和2日，联邦议院即将举行外交政策辩论会。阿登纳郑重其事地给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托马斯·戴勒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戴勒先生：

一些时候来，在您的党和您的议会党团中要求修改联邦政府和联合执政的外交政策的呼声增高了。由于这种讲话尤其在美国有着不利的结果，因此我已于9月26日不得不请求您的议会党团作一次明确的表态，并且鉴于您在次日（9月27日）信中的答复使人捉摸不定，我要求您的议会党团发表明确的声明，表示它一如既往地支持联邦政府的外交政策。

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西方三国按照我们的要求并和我们密切配合，为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重新统一和建立欧洲安全体系竭尽了全力。俄国代表莫洛托夫外长极其粗暴地拒绝了通向这一目标的一切方案。他甚至表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党政权无论如何必须继续存在，接着还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成就必须也在重新统一以后的德国保持下去，并扩展到联邦共和国，换一句话说，共产党政权必须扩展到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毫无疑问，由于苏俄的这种态度，会议没有取得结果。

如今，修改巴黎协定的要求更加强烈，现有外交政策的基础再次被自由民主党重要成员置于不信任的境地。我指的是您于1955年11月19日在鲁尔河畔米尔海姆和接着在慕尼黑所作的讲话，以及贵党副主席米德尔豪韦先生于1955年11月19日在维尔茨堡所作的讲话。我再举出议员奥伊勒先生向自由民主党外交委员会所提出的方案，它的目标是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全副武装起来，然后和苏联谈判。贵党的外交委员会没有拒绝这个方案，相反地，却委托奥伊勒先生拟定这项方案，以使他能够提交给贵党的外交委员会作出决议。

这些事态使我忧心忡忡。毫无收获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之后，世界形势极为危险和紧张。对德政策可靠性的任何怀疑都将增强苏俄的力量，削弱自由人民的努力。

在我看来，12月2日联邦议院以明确的立场进行辩论是正确的。一个联合的议会党团的任何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都会引起苏俄人的希望，认为整个政府联盟已经变得不牢靠了，同时也引起自由人民的恐惧。因此我请求您的议会党团在12月1日和2日联邦议院辩论前，就以下问题作出决议：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一如既往地站在巴黎协定的立场上，而且对协定不加修改……

请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先生们相信，我提出在1955年12月1日前作出明确答复的要求只是出于严重的忧虑。对德国来

说，在联邦议院的讨论中，宁可要一个缩小了的，然而却是团结的多数，而不要一个实际上已经不是联合的联合。

顺致

崇高的敬意

您忠实的阿登纳（签字）

1955年11月22日于莱茵河畔勒恩多夫

阿登纳向戴勒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和联邦政府政策立场保持一致，留在政府中，要么联合执政垮台。戴勒没有理会阿登纳的信。两天后，11月24日，自由民主党的《自由民主通讯》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幽灵般的十一月之雾》的文章。文章继续了自由民主党以往的观点：

“……联盟党要坚持认为重新统一‘首先’是四大国的事，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那么，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说：这种观点是如此之荒谬，以致在这种基础上波恩的联合是绝对不能实现的，而且将来也是不能实现的。”

阿登纳尚未作出行动，自民党这种偏离联邦政府立场的讲话很快从国外得到信息反馈。联邦德国驻伦敦大使冯·赫尔瓦特派他的参赞里特尔回来报告，说自民党的观点在英国引起极大反响，后果对联邦政府外交政策处境极为不利。几乎同时，阿登纳也得到一份来自美国大使的密报，说美国舆论界也已对此作出反应。于是，他立刻要求联邦外交部长冯·勃伦塔诺立即致函戴勒，向后者指明自民党对联邦政府外交立场态度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11月24日，勃伦塔诺致信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领导，尖锐指出：如果在联合政党中第二大党的权威发言人明显地与联邦总理和联邦政府的声明唱反调，那么，德国的外交政策在国内外就会变得不可信。这将会使西方世界采取疏远德国的政策，将会把西方逼上另一条道路，即是要“在现有地位的基础上同苏联和解和牺牲德国人民及其安全以换取紧张局势的缓和”。

眼看联合即将陷于破裂，自由民主党党内终于顶不住压力，开始分裂。11月27日，自由民主党联邦议员与部分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领导聚在科隆，一致要求戴勒辞去议会党团领导职务。11月28日，人们又力图劝说戴勒这样做。戴勒在党内失去支持，最后作出妥协。11月29日，戴勒给阿登纳作出一个书面保证，说自“巴黎协定通过以来，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对这些协定的态度没有改变”。同时，自由民主党也以党的名义向外长勃伦塔诺表示，任何怀疑自由民主党不忠于联合政府、怀疑它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信任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把误解的责任推给新闻媒介，维护自由民主党的对外形象，这一切并不能掩盖日内瓦会议之后基督教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之间在原则和立场上的分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此基础上的阿登纳政府的联合执政仍然是脆弱的。

没过多久，自由民主党与基督教联盟党有关选举权之争。终于为这脆弱的联合敲响了丧钟。这是后话。

联邦议院就外交政策的辩论终于来临。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如既往大唱反调，坚持了它反对阿登纳德国统一政策与巴黎协定的立场。1955年12月2日，在辩论中，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伦豪尔声明：从日内瓦外长会议的结局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确认，联邦政府以往外交政策的全部计划已经表明是错误的。阿登纳所认为的“联邦共和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迫使苏联放弃

它的德国占领区最有效的方法，……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相反，他的扩军政策至少给了苏联一个称心的借口，拒绝重新统一。”奥伦豪尔又明确反对有关联邦共和国扩军的义务。这是阿登纳为向西方确保联邦政府绝对遵守巴黎协定而提出的。

这就是日内瓦会议为联邦德国国内政治带来的结果，它使联邦德国国内政治分歧加剧了。按阿登纳自己的说法，日内瓦精神是不现实的，也是极其不幸的，这种精神将联邦政府的对外政策拖入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阿登纳设想的联邦德国第一步应首先争取在西方联盟内获得主权，建设西德统一的实力基础，因此阿登纳选择了向西方一边倒。但是这种做法必然会使需要面向东西双方的德国统一受到影响，阿登纳于是寄望于西方在冷战中战胜苏联，这样会迫使苏联按有利于西方的方案解决德国问题，这种设想的依据是东西冷战尖锐对立，西方实力超过苏联。阿登纳只要坚持两点，这种基础上的德国统一就会有希望，即必须确保西方承认联邦德国是整个德国唯一合法政府，以及德国统一必须遵循和平与自由原则。但是，日内瓦缓和的空气使得西方国家对德政策出现了变化迹象，东西双方都显露出使德国分裂固定化的意向，尽管西方还没能公开表示承认民主德国，却已默许东西关系现状，这对阿登纳政策是一个极大的“毒害”。社民党和自民党完全有理由就此认为巴黎协定的签署也就意味着德国分裂的合法化，也就意味着德国统一的遥遥无期。因此，日内瓦会议之后，阿登纳非但没能赢得他尽力争取的反对派——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也失去了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对他政策正确性的信任，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都对阿登纳及其政策失去了信心。

《纽约时报》当时评论道：

“经过八年的民族自我训练，西德从纷乱之中变得拥有主权与繁荣昌盛，德国的民主又开始转向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权势的政策，这种政策曾经导致魏玛共和国的灭亡。这一点表现在反对联邦总理阿登纳正直的亲西方的隐秘叛乱之中，这种政策已经使德国获得今天这样的地位。这场叛乱只会在德国的新盟友中引起忧虑。”

受日内瓦空气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联邦德国的政治家，西方世界其他国家同样也受到了一次大的冲击，这在苏共二十大后西方舆论的反应中很清楚地表现了出来。阿登纳所担心的西方国家会将德国统一与欧洲安全分裂开来的做法终于发生。

苏共二十大以后，法国政府率先跳出了欧洲裁军必须和德国统一问题相联系的框子。法国新总理居伊·摩勒3月4日发表了一通对记者谈话。摩勒说：“我们以满意的心情指出苏联政策中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假设，苏联已认识了它过去所犯的很危险的错误，并且将不会再重犯这些错误。”法国新外交部长斯蒂昂·皮诺干脆告诉法国外交委员会：法国政府应该赶快就裁军问题进行谈判，以便从日内瓦会议结束以来的死胡同

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作了一篇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所犯的许多鲜为人知的错误，引起世界震惊。

中走出。他说：“我们是拥护共处的……”

法国必须和东方各国保持最良好的关系。苏联人为了策略方面更大的灵活性而修正了他们的立场，我们也会无庸争辩地向他们靠拢，他们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做到什么程度。”摩勒进而要求“在处理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之前，必须使裁军问题取得进展”；而在裁军范围内使德国中立化，也成为法国新的对外政策考虑的问题。

3月12日，摩勒访问了伦敦，与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就新的形势进行会商。会商之后，就有消息说英法两国准备采取相同立场。阿登纳指示外交部长勃伦塔诺前往伦敦询问，英国副国务大臣安东尼·纳丁告诉他，英国人的新立场是：德国问题不应妨碍东西方裁军问题取得某种进展，虽则德国问题自然也决不应忽视。英法准备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一个介乎迄今东方和西方两种方案之间的折衷建议。

西方三大盟国中仅余下了美国还坚持着原有立场，即主张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裁军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195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妥协的倾向是否也将会在美国占上风呢？美国在英、法的压力之下是否会让步呢？阿登纳不能不考虑到这一切。英法的转变并非仅仅是西方三国立场不一致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德国的命运，关系到德国重新统一能否实现。

因此，在英法伦敦会晤之后，阿登纳立即给美、英、法三国领导人各起草了一封信，并委托联邦德国驻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大使转呈。信中，阿登纳向三国致意，要求重申过去三国所作的保证，即没有联邦德国的同意，决不允许商定与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军事以及它的领土等有关问题。同时，阿登纳请求盟国允许联邦政府了解即将在伦敦开始的裁军谈判的进程，让它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裁军问题与联邦共和国的统一与安全问题直接相关。

尽管阿登纳作此强烈呼吁，但他很难改变形势造就的联邦共和国政策的矛盾处境。一方面在法国、英国、甚至美国，要求普遍裁军的呼声越来越高，不仅是由于财政考虑，也是出于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另一方面在波恩、在联邦德国，却必须要执行重振军备的政策，因为巴黎协定恢复主权是和联邦德国重振军备联系在一起的。要重振军备，联邦政府需要修改基本法、通过兵役法，才能实行并取得财政预算中相应的财政支出，这必须要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而在德国人最关心的德国统一问题上，盟国却再也不愿继续作出相应承诺，保证首先解决德国问题。阿登纳无能为力，只能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这一切的转变都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发生的。

1956年1月5日，阿登纳度过了他八十岁的生日。联邦政府为他举行了盛大庆典。八十高龄与前不久的一场病令阿登纳感到有些担心。这是他第一次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毕竟到了这个年纪还依然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人并不多了。阿登纳问他的医护顾问马蒂尼教授，他的身体能否支持到他可以保证他的政策能继续贯彻的那一天。马蒂尼告诉他，“在1949年您初任联邦总理时，我担保您在总理位子上能干一年或许是两年。现在我知道当时我的估计是错误的。我不像您那些不做医师的朋友们那样，为您的八十高龄而担心，因为我了解您是有潜力的。我只是提醒您要适可而止。”另一个人，欧根·格斯登美尔告诉他，年龄在一个永无止境地变动着的时代意味着经验的多少，而经验是任何东西所代替不了的。

这种安慰使阿登纳感到了新的勇气和希望。他知道，他必须使联邦德国尽快摆脱这样的处境。责任在召唤、战斗在等待，作为船长的他必须扬帆前进，去与风浪搏击。

再度访美

我们没有安全地位。特别是在我们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和平和自由乃是必须用生命换取的财宝，并且必须谨慎地、细心地加以保护。

——《阿登纳回忆录》（三）

苏共二十大以后，阿登纳对西方国家表现出对苏联事态入迷似的关注深感忧虑。在他看来，苏联领导人虽然抛弃了斯大林的学说，并对斯大林的统治加以批判，但这一切却并没有触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本，而且到目前为止，苏联也并没有就斯大林对西方的政策加以谴责，当然更谈不上要给东欧和德国人民自由了。与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不过是运用了一种新的比较灵活的方法而已，谈不上立场的根本转变，也绝不是什么人们鼓吹的“东方新纪元的曙光”。阿登纳得出结论，苏共二十大的结果仅仅是赫鲁晓夫权势和影响的极大增长，苏联追求统治世界的终极政治目标与斯大林时期没有两样。

1956年3月19日，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在伦敦开始了裁军谈判。美国人并没有附议3月12日摩勒和艾登公布的联合建议，而是通过代表哈罗德·史塔生提出了一项自己的计划。苏联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也拿出一个详尽方案提交讨论。裁军会议的进行令阿登纳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裁军谈判无论成功与否都会给德国带来危险。

阿登纳很清楚，如果伦敦谈判能够达成裁军协议，那么作为军事战略防御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会失去原有作用。尽管北约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但它绝不会再发展，北约的政治作用也将逐渐下降，这样，人们对联邦德国为加强北约组织实力所作努力的关注自然也会不可避免地减小，人们也必然会把裁军协议的结果强加在联邦德国的头上，最后人们就会自然地、合乎逻辑地考虑使德国中立化，或者最多是有武装的中立化。这种结果等于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彻底投降。即使像有些人所说，裁军可以开创一个保障和平的新纪元，这对联邦德国来说也等于是政治上的自杀，会彻底牺牲德国，因为它是以德国两部分分裂合法固定为代价。

另一方面，即使不达成裁军协议，而把已经开始的谈判在现行的基础上继续下去，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西方显得似乎迫不急待，苏联掌握着使谈判拖延下去的主动权，它就会利用这种可能性，不断提出新的建议，每个建议都足以继续扩大西方三个盟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并且，苏联会以抛弃了斯大林主义作为宣传口号，将自己打扮成民主的、能够进行合作的集团。这样、要使西方重新回到日内瓦首脑会议期间始终坚持的、符合共同想法的原始立场上去，就必然越来越困难。德国问题将会在世界舆论中失去它的重要性。这种形势的发展必然会使西方对德国重新统一变得再也不感兴趣。

阿登纳怀着如此忧虑的心情关注着伦敦裁军谈判的进展。

和日内瓦会议一样，东西方伦敦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东西方关系更进了一步。4月底，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应艾登之邀访问了伦敦；5月中，苏联人又把法国总理居伊·摩勒请到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向英国人和法国人都作了表示，苏联认为德国应该处于解除武装的状态，德国的分裂也应该持久下去。居伊·摩勒后来向阿登纳谈起了他同赫鲁晓夫会谈的

情况。他说，赫鲁晓夫很直率地向他表示，他宁可手中有一千八百万德国人，也不愿看到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即使这个德国是中立的。

阿登纳的忧虑进一步加深。日内瓦会议后，他曾经私下设想通过联邦德国与俄国人之间直接谈判解决德国问题的可行性，但是赫鲁晓夫对摩勒的讲话却证明，苏联政府根本不会考虑放弃苏占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相信苏联会允许联邦德国通过苏德谈判来实现德国重新统一，无疑就已十分荒谬了。

阿登纳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他想通过他的朋友杜勒斯在美国起作用。杜勒斯却只重复了他过去说的一句话，在欧洲，美国只推行美国的政策。这说明美国人的态度也在开始。发生转变，美国已经出现了主张外交政策方针改弦易辙的征兆。

1956年5月，阿登纳间接得到一份美国外交备忘录，它的起草者是曾经在参与杜鲁门“遏制”政策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乔治·凯南。凯南在美国政界有相当的影响，这份备忘录据报道曾在美国最高层领导集团内部进行过认真讨论。它的内容却使阿登纳感到极其不安。在备忘录中，凯南一改遏制立场，认为苏联政府的政策和立场事实上已发生了“有重要意义的转变”。

凯南说，过去斯大林时代的整个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侵略西方，而今俄国却发生了“方针性转变”，“毫无疑问，这一转变对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作出了贡献”，它“意味着在一切斗争运动中迟早总会发生的解冻过程的开始。这种发展对于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我们这些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对苏联问题也不认为完全是绝望的——来说，是希望的源泉。这一方针性转变指出了通向揭开铁幕——而且要足足揭开一大块——的道路，而且也指出了俄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特别是与我们之间重建较为正常和较有希望的关系的道路。这里开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途径……”

凯南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应抓住东方出现的机会。德国的中立是可取的，应尽快使德国重新统一和中立化，这样就将在中欧起到“搞钝欧洲军事两极的锋利刀口”的作用，并在最后能使东西方冲突的激烈程度得以缓和。

凯南的建议得到美国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久也发表了类似的主张。艾森豪威尔对来美访问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说，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曾保持了将近一百五十年之久的中立。中立地位并不意味着是非不分、善恶不明。凯南的备忘录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评价中立地位的讲话都使阿登纳感到一种不祥的征兆。为此阿登纳迫切感到有必要赶快到美国，去与美国政府方面就形势广泛地交换一次意见。

正在这时候，阿登纳接到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给他发来的一份通知，邀请他于6月初赴美，授与他法学系名誉博士学位。阿登纳又一次意识到一顶博士帽所具有的巨大潜在价值，这无疑给了他一次能尽可能多地同美国政界与舆论界人士直接谈话、陈述观点的机会。阿登纳欣然接受，并把访问期定在了6月8日至15日。

当然，单是说服美国人重新重视自己对德国统一负有责任并警惕苏联人玩的狡猾的诡计，这是远远不够的，美国的舆论显示出1956年春苏联发动的“和平攻势”已在美国起了作用。阿登纳此行是要重新唤起美国对西方、对德国具有的信念。他想告诉美国人，俄国人的“和平攻势”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西方阵营自己的不团结也助长了俄国人的气焰。世界外交形势好

比是一架天平，从天平一端的盘里拿掉一些，那么另一端即使不再加码，也会变重。此番美国之行以加强西方团结为第一目的。

6月8日，阿登纳起程飞美。到纽约后他首先去看望了老朋友丹尼·海涅曼。第二天，阿登纳便十分高兴地从报纸上得知，他的朋友杜勒斯当天在衣阿华州州立大学演说时采取了与艾森豪威尔讲话相反的立场，把中立化原则称为一种过时的观点。杜勒斯说只有建立军事联盟基础上的集体安全体系，才能保护自由世界免遭共产主义的“统治”。这一点阿登纳大加赞同。

对阿登纳的来访真正感到欣慰的也正是杜勒斯。近几周以来，由于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形势看法出现分歧，他受到了美国公众的猛烈抨击。所以当他一见到阿登纳，就告诉他，“我认为，我们不要为我们的会谈确定议事日程，我乐意准备探讨任何您希望讨论的问题。”这当然也正是阿登纳所希望的。

老朋友相见，分外亲切，在一通简洁的寒暄之后，两人立即把话题切入共同关心的政治形势问题。阿登纳将他对苏联近来分裂西方一系列行动所感到的担忧全部告诉了杜勒斯，尤其向他警告了苏联分裂北约的危险。

阿登纳首先提到布尔加宁近来给北约部分成员国发动的一场信件攻势，他告诉杜勒斯，北约一定要对此相当警惕，这肯定是苏联人玩的一个阴谋。如果北约成员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不协调一致的话，那么西方反对苏联的军事联盟将来就很难继续存在下去。阿登纳主张让北约组织共同协商后再给布尔加宁一个统一的答复，他希望杜勒斯能从美国方面对此事施加影响。杜勒斯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阿登纳又说到5月14日苏联政府关于单方面将武装部队裁减一百二十万人的声明，他认为这一点也应引起足够重视，决不能因此而认为苏联人有了和平的意图。他说，“我看苏联并非在裁军，而是在进行军备更新，就像朱可夫元帅在一次演说中确认的那样，苏联是在进行组织上的改造工作。”阿登纳对苏联裁军作了一番细致解说。他说苏联的经济能力促使它的战线收缩以确保它在原子武器方面与西方的对抗，即使苏联裁减一百二十万人，它还是拥有远远超过一百个经常处于战备状态的师，来对付北约组织在欧洲所拥有的总共只有四十个的常备师。从这个角度看，苏联仍然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进攻者。此外，那些置于华约严密集中控制下的东欧卫星国，也还拥有八十多个师，其装备在过去二三年中不断地得到改进。应警告西方，千万不能因为苏联裁军，便把它当成是主动放弃在欧洲争夺的先兆，而放松了应有的警惕。

“北约组织成立之时，”阿登纳继续说，“世界存在着热战的危险。我认为只有使北约组织继续保持强大，才能有效制止热战的发生。自从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领导人采取的手法有了决定性的改变，可以说冷战已从军事方面转到了政治经济方面。北约组织应该尽快适应这种变化。近来西方北约成员国之间意见分歧连续出现，而人们还因为因循守旧而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赋予北约以新的生命力便十分紧迫。应该对北约实施一系列改革使其在政治上更加强有力，比如应扩大北约组织秘书长的决定权，加强北约与各国政府之间政策协调、常任国务秘书必须定期会晤，等等，必须竭尽全力促使苏联政府在将来收起它分裂北约的任何企图。”

“您的话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杜勒斯同意阿登纳的意见，“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联盟，如果没有外交政策方面的基本一致，就不能是强大的和稳定的。在美国，曾经有人煞费苦心地寻找使北约各成员国外交政策

协调的方法，但迄今为止还没能取得大的收益。从美国的立场来看，这一问题多少是有些困难的，因为美国有着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更大的、世界性的利益。即使存在着实现彼此协调的愿望，美国也不可能把它的世界性政策交给其它国家去审核。

“但是，您所建议的北约应在加强政治经济作用方面继续发展，这一点我完全赞同。您对西方国家所持的忧虑，我也有同感。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就绪，让常驻代表们在北约组织理事会内部处理布尔加宁的信件，美国也倾向于作共同的答复。但是，在 NATO 组织国家商议这样的事情，争取一致意见，将会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我想我们或许在一定范围内会采纳您，联邦总理先生的建议。”

阿登纳也和杜勒斯谈起欧洲大陆将来的一体化问题。6月1日至3日，煤钢联营六国刚刚在墨西拿开会，发表了即将建设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声明。杜勒斯向阿登纳表示了美国对这个问题的忧虑，他说，美国人担心欧洲在经济上的合作会对美国产生某些副作用，按照美国的观点，规划中的欧洲原子能联营和共同市场对于拯救西欧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不应当导致出现这样的局面，即：使参加这些组织和没有参加这些组织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之间出现政治上的分裂。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正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它拥有一个八亿人口的共同市场。从这一点出发，西欧依赖过时的经济机构或者依赖一些小小的市场和耗费巨额资金的生产也能够生存下去的设想，体现出一种与军事威胁同样严重的经济危险。这是杜勒斯第一次表现出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担忧。

阿登纳访美期间正值艾森豪威尔总统因患肠病在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医院刚做完手术，艾森豪威尔的身体尽管已在康复，但还是很虚弱。阿登纳到医院里去探望了他。会见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两人来不及就形势深入交换意见，这点令阿登纳颇为遗憾。

1956年又是美国大选年，6月，美国已经全面进入大选的准备期。由于艾森豪威尔在公众中崇高的威望、共和党决心继续推举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还在犹豫，没有作出抉择，它的候选人的对象是艾德莱·史蒂文森和艾尔里夫·威廉·哈里曼。3月份，波恩驻华盛顿大使克雷克勒曾向阿登纳报告过一次他与艾德莱·史蒂文森会谈的情况。根据克雷克勒的汇报，史蒂文森虽然对德国的情况感兴趣，却不甚了解。因此，阿登纳决定同民主党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哈里曼举行会谈，后者曾担任驻莫斯科大使，并在执行马歇尔计划时起过重要作用，是一个俄国问题和欧洲问题的专家。

与哈里曼的交谈使阿登纳感到满意，哈里曼曾长期任驻苏大使，他说他自己和斯大林打了五年之久的交道，他简直不能设想，如果没有一个最高权威，没有一个大圣哲或者独裁者，苏联政府如何能够维持下去。他认为在苏联，目前赫鲁晓夫正在成为这样的最高权威。在判断克里姆林宫的事态时不应该忽视，斯大林的被诅咒仅仅是因为他的行为给党带来了损害。

阿登纳称这是“一种和我的判断完全吻合的判断。”哈里曼也完全同意阿登纳对克里姆林宫内部事态发展的判断。

哈里曼向阿登纳保证，一旦民主党人获胜，美国的基本政治原则将不会改变。但是，他认为在过去一个时期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杜勒斯国务卿有向沙

文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妥协的一面，如果西方能够在斯大林刚死时利用苏联政治的混乱，执行一项像杜鲁门时代那样强硬、甚至更加强有力的政策，今天的形势就会完全改观。

阿登纳还会见了美国最大的工会代表乔治·米尼和洛夫斯通。他们告诉阿登纳，美国现在正是选举年，执政的现政府正力图绘制一幅吉祥图，这是相当自然的。也许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感到目前的和平不是一种巩固的和平，但艾森豪威尔必须给公众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所以在美国现在似乎显现出危险的政治软化倾向，但是美国公众对这种危险看得很清楚，美国人的政治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国不可能再执行孤立主义、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自由机会正在受到苏联扩张主义的威胁。总的说来美国人对欧洲、对德国是关心的，而且是抱着积极的态度。这番谈话使阿登纳对美国公众舆论稍感到放心。

除了对艾森豪威尔总统有关中立地位的谈话感到不太愉快外，阿登纳的美国之行总体来说大有收获，对美国大选的担心和对美国公众的担心基本解除，他也在美国找到了众多的支持者。美国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欢迎这位新德国的总理，并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友好，舆论界称阿登纳“使德美关系发展至和谐之最”。

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德美关系一如既往的真正保证，美国方面既没有承诺将坚持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裁军问题必须一起解决、或是德国问题优先解决的立场，也没有再提德国分裂与统一。希望美国给予的保证落空，自然更谈不上通过美国来统一英法的观点。在华盛顿，阿登纳带去了联邦议院 3 月 6 日刚通过的基本法中有关第二次防御补充条款和初读的义务兵役法，他向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都作出了联邦德国将履行它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承担义务的保证，但是除了杜勒斯告诉他美国政府正在努力使国防预算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军事情况外，美国人并没有向他透露美国政府进一步的打算，反倒是有不少迹象表明德美之间在利益方面的差距在拉大。

这种分歧仅在阿登纳回去一个月之后就公开了出来。

裂痕

巩固西方是当务之急。

——《阿登纳回忆录》（三）

1956年7月13日，阿登纳在绍姆堡宫接见了前来联邦共和国访问的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正是在这一天，《纽约时报》公布了一份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阿瑟·雷福德将军签署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将美国防务政策中讨论了多年的实行以核武器为威慑核心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变成了一项即将逐步实现的具体计划，这项新计划中对联邦德国和欧洲最关键的一点是，雷福德主张为了集中力量发展核武器，美国将要削减八十万常规武装部队（其中陆军四十五万人）。此计划一公布，立即引起了波恩和整个欧洲“触电般的震惊”，尤其是对阿登纳。因为巴黎协定签署前，美国曾作出保证，它将无限期地为欧洲大陆上的北约武装提供相应份额。现在美国在巴黎协定批准后一年就改弦易辙，不论是物质上，还是政治上，都将使联邦德国在组建巴黎协定所规定的十二个德国师时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不能不让德国人有被抛弃的感觉。

当然，阿登纳并不是一个黩武主义者，但他对军事决定的政治含义特别敏感。他不能不立即对雷福德计划作出相应反应。

7月21日，夏休季节刚开始，进入休眠状态的联邦政府机构就被阿登纳在绍姆堡宫召集的一次闪电式的会议所惊动。应召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波恩驻华盛顿大使海因茨·克雷克勒、驻伦敦大使汉斯·冯·赫尔瓦特、驻巴黎大使福拉特·冯·马尔查恩、驻罗马大使克莱门斯·冯·勃伦塔诺，以及国务秘书哈尔斯坦、国防部长布兰克、联邦国防军总监阿道夫·豪辛格、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威廉·格雷韦等，阿登纳自己则推迟了去比勒赫厄度暑假的启程时间。

晚上，阿登纳和这些人一道就雷福德计划进行了讨论。计划的内容大家都已熟知，但关键的问题是联邦德国应该如何作出反映。迟到的驻华盛顿大使克雷克勒给大家带来了美国方面的情况，他说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内部意见尚未能统一。虽然国务卿杜勒斯7月18日曾表示支持雷福德计划，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本人却尚未对计划作出最后决定。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仑瑟将军也坚持北约前线中段的常规防卫至少需要三十个师兵力的原方案。有一点可以确认，华盛顿似乎不太考虑盟国对美国急剧裁减军队所作出的反应。

驻英大使赫尔瓦特说，在英国人们认为雷福德方案的结果将是减少包括莱茵军在内的陆军数量、取消普遍义务兵役制、削减军费预算和依赖核威慑，而英国只有在听取了所有有关国家对削减军队问题的看法之后，再通过专门委员会审议，才能制定出具体相应方案。

马尔查恩和勃伦塔诺则表示，可以指望法国和意大利反对雷福德计划。法国是由于军队被陷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对美国大规模削减驻欧部队非常不满，而意大利则是从自身的微弱地位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豪辛格从联邦德国军事战略的角度提出了对雷福德计划的疑虑。他认为这个计划执行的结果将是：一旦发生战争，会立即升级为核战争；一旦联邦德国成为核战争的战场，美国所谓的“大规模报复性”战略就将变得毫无用处。对于欧洲来说，即使

是小型的常规战争爆发，西方国家也抵挡不住东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其中联邦德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阿登纳担心的也正是最后这一点，不能因为美国一意孤行而使整个西方面临巨大危险，必须向美国说明这个危险性并充分表达联邦德国的意志。在阿登纳主持下，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规定了以下步骤：1．向西欧联盟的伙伴国发出照会，要求北约组织立即讨论雷福德计划；2．向华盛顿提出外交交涉，并派豪辛格将军专程赴美国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接触。有关照会和指示的措辞，则由外交部政治司来负责处理。

这是波恩和华盛顿有关军事防务问题产生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准确地说 是绍姆堡宫和五角大楼之间的冲突，雷福德计划是五角大楼制定的。

7月31日，由于德法为首的欧洲国家的强烈抗议，美国方面退后一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篇否认声明，说美国国务院既不知道政府关于削减驻欧洲的后备和供应部队的决定，也不知道目前有这样的打算。美国国防部也通过美国驻北约代表利昂·约翰逊陆军中将发表了一份公告，说雷福德计划的目的主要在于强调美国对北约组织承担的义务，美国政府既不会单方面改变，也没有想到要去改变它对北约组织的义务云云。

8月11日，阿登纳接到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一封长信。杜勒斯在7月18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表示，如果军方领导人建议裁减常规部队，他不会从政治上提出异议。这时他也让步了。8月25日，白宫派出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弟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前来拜访阿登纳，意在安抚。言传雷福德计划的出台主要是由于美国意在削减在欧洲的军费开支，因而艾伦·杜勒斯告诉阿登纳，有关提出预算一事正在审议之中，没有作出决定，还没有任何打算削减军费的迹象。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问题只是在于应该如何 在制造新式武器和常规武器之间分配这些费用。美国方面绝对没有低估裁军的危险性，也明白保持常规武器的重要性，联系到这一点，美国仍然认为联邦德国加入西方防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阿登纳却不敢掉以轻心，他向艾伦·杜勒斯指出联邦德国并非想要危言耸听，因为目前北约组织内的法国武装部队几乎全部驻在北非，英国将撤走它的海外兵力，而联邦德国才刚刚开始扩军，如果在这种时候美国也在北约组织内大规模地减少它的常规部队兵力，北约组织会面临垮台的危险。而且，比起1950年北约成立时机构的有效性来说，北约现在已明显老化，面临种种问题，许多人认为它成了高级军官的俱乐部。部队撤走了，政治上的合作更谈不上。“1950年时苏联的危险可是要比今天小得多。”阿登纳不无忧虑，加重了语气，“未来的前景是可怕的，如果不向北约组织输送新鲜血液，不给它新的政治力量，那么整个欧洲都会处于危险之中”。

艾伦·杜勒斯把阿登纳的意见传达到了华盛顿，豪辛格将军在美国的倾情陈述也引起美国人重视。美国不能无视欧洲伙伴们的反对，一意孤行，终究把雷福德计划搁置起来。

美国虽然没有立即撤走驻欧部队，但雷福德计划的公布对于阿登纳及其政治地位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赞成阿登纳政策的人数明显减少。尽管反对的人数并没有增加，但摇摆不定持观望态度者人数却明显增加。阿登纳一向视美国为其政策的坚定靠山，如果这一点上发生变化，将会对他的政府产生严重的反作用。

1956年是国际政治风云动荡的一年，夏季雷福德计划余波未止，秋天两

件举世瞩目的大事的发生使东西方两大集团均陷于空前的内乱之中。

第一件大事是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它使西方集团的分歧表面化。

中东局势的紧张从夏季就开始了。埃及的纳赛尔总统要在尼罗河上建起一座庞大的阿斯旺水电站，需耗资约十亿美元。

纳赛尔向世界银行和英美政府求援，双方举行了谈判，美英要求以财政监督为贷款条件。眼看谈判即将取得成功，苏联插了进来，向纳赛尔提出了更为优厚的条件，并且不要求财政监督权。这样，埃及方面对美英态度立即强硬，拒绝了美英。美国本来就考虑到埃及是巴格达条约的一个敌人，现在它又公然投靠苏联，于是杜勒斯便断然宣布取消美国政府对建造阿斯旺水坝所提供的一切援助。随后英国和世界银行也同样拒绝了埃及全权代表的要求。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纳赛尔得讯立刻回国，并作出积极反应，宣布埃及将与苏联合作，并决定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用运河公司收益来兴建水坝。

以后几次有关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国际会议都开得毫无结果。埃及收回运河主权主要打击了长期在中东经营的英法的利益，美国在这一地区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因而在事件中表现出与英法不一样的立场。美国支持英法关于运河管理国际化的要求，但反对英法为此不惜使用武力的态度。这样英法便把目标转向与埃及敌对的以色列，企图利用阿、以冲突来达到目的。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在英法支持下发动了对埃及的进攻，运河危机演变成一场以色列、英法为一边、阿拉伯国家为另一边的军事冲突。最后由美国和苏联一起通过联合国大会出来收拾局面，干预制止了双边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苏伊士运河事件暴露出美国和英法之间严重的分歧。阿登纳痛心地看着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矛盾冲突在加大，西方国家的不团结再次给苏联以渗透分裂的机会。在整个事件发生过程中，阿登纳曾多次向英法提出警告，但于事无补；他向美国呼吁，美国也自行其事，不得不眼睁睁看着事态向不可收拾的局面发展。

几乎是在同时，东方阵营里也出现裂痕。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执行松动政策后，东欧国家都在酝酿着体制改革，进入1956年，改革进一步发展，反对苏联对东欧国家内政干涉。10月，事变酿至高潮，在要求改革最强烈的波兰和匈牙利甚至爆发了起义，苏联最后出动军队才把波匈骚乱镇压下去。西方强烈抗议苏联出军，东方集团内部裂痕也暴露于世。

在如此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之下，德国问题自然黯然失色，谁也不愿在这敏感的时刻再提此敏感的问题。苏伊士运河危机与波匈事件之后，东西方集团均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巩固各自阵营上。阿登纳在1956年夏天曾经认为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7条来要求在全德举行公民表决，实现德国统一，并为此于9月给美英法苏四大国各递交了一份内容广泛的备忘录，重新阐明联邦德国对重新统一德国的观点。但是，局势的发展使四大国再也无暇理会已经稳定了的两个德国是分裂还是统一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阿登纳只好将战略目标重点转向巩固西方联盟、促进东方演变上，即放在促进欧洲一体化建设和支持北约的改革与扩大两个方面。他认为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北大

在美国支持下，1955年2月土耳其和伊拉克在巴格达签订了土、伊互助合作和防御条约，即巴格达条约，随后，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分别加入，它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一起，组成美国对苏全球军事包围防御体系。埃及总统纳赛尔认为这个条约旨在分裂阿拉伯世界，使之屈从于西方，因而强烈反对它。

西洋公约组织受到极大震动，出现了严重裂痕，必须尽力地——首先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弥补这一裂痕。

1956年10月31日，欧洲盟军最高总司令格仑瑟将军来到波恩。阿登纳对他再次谈起了他对雷福德计划的看法。阿登纳指出，在中东和东欧局势如此动乱的情况下，减少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是完全不恰当的，当务之急是加强西方的团结并增强北约的威慑力。在两大事件之后，阿登纳对美国撤军问题仍然是很不放心，格仑瑟答应将阿登纳的意见转告艾森豪威尔总统。

11月6日，美国进行了总统选举，艾森豪威尔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总统选举后，乔治·米尼和洛夫斯通的话应验了，美国对大西洋的政策开始出现变化。美国又开始重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于11月初正式宣布不再从欧洲撤军。

11月30日，阿登纳通过格仑瑟将军反应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意见得到了反馈。艾森豪威尔给阿登纳回了一封信，告诉阿登纳他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在西方阵营内部重新取得完全的统一目前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时，北约组织各政府之间的政治协商，也应该取得更好的谅解。艾森豪威尔在信中写道：“单靠协商的办法还不够，必须付诸行动。……期待我们在有关北约组织范围内以外的事务上一直能够取得一致看法。”艾森豪威尔重新表示对北约的重视以及对德国武装力量的重视令阿登纳感到新的希望。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即将主持12月11日召开的北约组织理事会会议，12月8日，阿登纳又给杜勒斯去信，直接陈述了他对北约和欧洲重要性的看法，希望能在会前对杜勒斯的观点产生影响。

苏伊士运河事件和波匈事件算是给西方人敲了一下警钟，让他们感到联盟团结的重要性，它带来了西方至少是表面上的团结。在12月11日至14日召开的巴黎北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三贤人”委员会的报告受到了普遍欢迎，成员国十分热烈地讨论了在北约组织范围内如何在非军事领域里进行改革和扩大合作，以及如何在大西洋共同体内部取得更大统一等问题。一系列有利于巩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团结、统一和内部联合的实际建议被提出，西方的坚强团结与统一似乎又充满了希望。

和平与安全的问题重新引起人们重视，但对于保障和平的方法，人们的见解却是各有千秋——谁都不能否认德国的分裂是欧洲紧张局势的一面镜子。因此，在1956年夏秋紧张事件过去之后，1956年末和1957年春天，要在欧洲建立一个中立区以达到保证和平的计划又再次冒了出来。支持这一观点的有美国参议员赫伯特·H·汉弗莱、威廉·F·诺兰以及英国工党的休·盖茨克尔、安奈林·比万等人。

汉弗莱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裁军小组委员会主席，他在1956年9月15日声明中指出，有关重新统一德国问题十年谈判毫无结果表明，现在是考虑采取可能较快达到目的的其他方法的时候了。他提议在欧洲中间地带建立一个缓冲地区，必须使缓冲地区内双方的武装部队保持均势。12月21日，汉弗莱在纽约海外俱乐部的一次演说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在可能缔结的欧洲安全协定中，美国部队撤出西德和苏联部队撤出东德

1956年5月4至5日，在巴黎举行的北约理事会春季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三十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研究加强北约力量及北约各国在非军事领域内的合作。这三个专家是意大利外长盖塔诺·马蒂诺、挪威外长哈尔伐德·兰基和加拿大外长莱斯特·皮尔逊。他们被称为“三贤人”。

必须是协议的主要内容。进入 1957 年，他又多次向公众宣传这一观点。

诺兰是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1956 年 12 月中旬，他在接见华盛顿外国记者时发表了他关于在中欧地区建立中立地带的观点。按照他的设想，这个中立地带应该包括奥地利、芬兰、瑞典、瑞士、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以及现有的东欧卫星国，这些国家应分别退出北约和华约，它们的边界由大国给予保证，此外，还必须保证在这些国家中能进行普遍的自由选举。

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 1956 年 12 月 19 日在英国下院中提出的观点是，应在东欧和中欧建立一个大型的中立区域，东西双方都应该从这一地区撤出武装部队，并应缔结一项安全条约来保证这一地区的中立。盖茨克尔 1957 年 1 月和 3 月分别在欧美一些著名大学的演说中重复了这一思想。

汉弗莱、诺兰、盖茨克尔等人的观点异曲同工，都主张德国中文，这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回应。这种意见在美国政府中也大有市场，阿登纳不得不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进入 1957 年以后，苏伊士事件的潜在影响暴露出来。英国和法国都先后表示要发展并拥有自己的核力量。苏伊士危机中美国的态度显然大大动摇了英法对美的信任，一种希望独立并摆脱美国的要求在英法两国盛行起来。英国和法国都开始把发展独立核力量作为一件重要的政治事务。在 1957 年的头几个月里，整个欧洲都为了核的问题忙碌不堪，并且政治局势也日益复杂，英国和法国都不愿作出承诺，一旦拥有核武器，将把它交给北约组织来统一指挥，他们对欧洲保护神美国和在它领导下的北约的信任度已经大大降低了。英法还说：“我们虽然信任现在的美国总统和现在的美国政府，但是三年后将由谁当总统呢？又将是什么样的政府在华盛顿承担责任呢？我们不可能让我们人民的幸福和痛苦，取决于大洋彼岸美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

英国人胆子最大，第一个唱出不谐音，他们一直不愿把自己的命运和欧洲大陆捆得太紧，更何况欧洲防务要花钱，发展核军备也要花钱，两相权衡，还是后者更重要。1957 年 2 月，英国外长塞尔温·劳埃德在伦敦举行的西欧联盟外长会议上提出，由于英国 1954 年以来军费支出增长过快，经济面临危机，所以不得不对它过去的防务方针作出实质性的修改。此言一出，劳埃德立即遭到外长们联合一致的反对。人们毫不含糊地提醒他，艾登在 1954 年伦敦九国会议上曾代表英国承担了在欧洲大陆驻军的义务。比利时外长斯巴克称英国这样计划的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他指出，如果有朝一日美国和加拿大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欧洲的安全靠什么来保障呢？劳埃德避开了英国核军备费用的问题，只强调英国经济面临崩溃。英国既然已决心一意孤行，西欧联盟外长会议自然很难阻止英国继续推行它的计划。4 月 4 日，英国公布了修改防务方针的白皮书，对英国的莱茵军而言，新的计划意味着将其兵力从原有的七万七千人减至六万四千人。5 月 15 日，英国在太平洋的圣诞岛上爆炸了第一枚氢弹，西欧联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一个有核力量的英国和一支缩小了的英国莱茵军。

这是自苏伊士危机以后欧洲国家所表现的第一次自行其事，毫无疑问，它对于阿登纳反复强调的西方团结又是一次巨大冲击。

从 1957 年春天开始，由于 56 年的双重危机而冻结的东西方关系也逐渐

此也包括有欧洲原子能委员会和六国建立原子能共同体的种种问题。

松动，3月份在伦敦举行的裁军谈判使东西方重新开始对话。裁军这个题目由于同欧洲安全和德国重新统一联系在一起，使得由这三个问题组成的总题目再度成为公众讨论和各国政府外交活动的中心。汉弗莱、诺兰、盖茨克尔等人的建议再加上德国社会民主党1957年5月23日提出的《德国计划》，以及波兰外长亚当·腊帕茨基10月2日提出的中立计划，引发了这一年有关使中欧地区脱离两大军事集团，即中立化的争论，“脱离接触”成了这一时期有关欧洲安全讨论的核心。

形势的发展使阿登纳要贯彻他自己的德国政策已越来越困难。如果说西方国家最初的立场是只有克服了德国的分裂，才能讨论裁军和安全问题的话，那么，从1955年日内瓦首脑会议开始，它们便在逐步偏离。日内瓦首脑会议上西方承诺可以同时着手讨论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一年以后，在伦敦裁军会谈中英法便宣布放弃裁军和德国重新统一之间的“关联”，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放弃了德国问题的优先地位，也放弃了它的同等地位。1957年3月，伦敦裁军谈判重开，各种中立化建议的提出必然会加剧这种危险趋势，为了在1957年9月的联邦议院大选时给选民们一个有说服力的交待，阿登纳决心再到美国以便制止这种政治态势的发展。

访问的时间是在5月底。在华盛顿，阿登纳受到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热情款待。艾森豪威尔甚至把他请到了自己的葛底斯堡农场作客。杜勒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愿意照顾到阿登纳的处境，但他却不愿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杜勒斯详细地向阿登纳和勃伦塔诺解释了美国的裁军计划及其根据。

美国看来真的要走裁军这一步，杜勒斯在这个问题上力图说服阿登纳。根据当事人威廉·格雷韦的回忆，杜勒斯认为，苏联人也许真的对限制军备感兴趣，因为像在美国一样，军备对苏联的经济来说也是个沉重的负担。按经济能力看，苏联的负担远比美国更加沉重。而且苏联人无意用核武器来装备东欧的卫星国，他们在最近一轮伦敦谈判中，甚至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了强烈的兴趣，并对不扩散核武器表示了关注。当然，杜勒斯也同意单凭苏联的声明，并不应采取任何足以削弱自己地位的行动，但如果苏联的口头声明同它的实际利益相吻合，西方就应当给予重视。从这一点出发，杜勒斯进一步阐述了美国对视察与监督、核武器以及常规武装力量这三个问题的主要设想。他说在核武器方面，美国首先谋求暂停发展和生产，非核国家应当放弃购置和生产核武器，但并不强迫他们这样做，核试验要在视察和监督系统建立后才能放弃。在常规武装力量方面，美国同意把自己的和苏联的力量固定在二百五十万人的额度，联邦德国不在此例，而进一步裁减则要在解决政治问题取得进展以后才谈判。最重要的是美国认为，要在欧洲规定同等的视察区而又不强调和不固定德国的分裂是困难的，因为苏联方面肯定不会同意。

阿登纳和勃伦塔诺勉强接受了杜勒斯的观点，但提出了尖锐的反问。阿登纳追问杜勒斯：“苏联人真的准备达成裁军协议吗？以什么来相信苏联人的诚意呢？”杜勒斯保证说，根据他多年的国际经验，美国决不会去促成以后会证实是陷阱的任何协议。阿登纳说，既然谋求裁军协议是重要的和必要的，那么，就应该重视时机的选择。在目前德国面临大选，对德国来说，如果产生一种西方似乎在谋求一项不需要同时解决政治问题（德国问题）的裁军协议，将会是灾难性的。

杜勒斯表示美国方面理解阿登纳对大选的担心，答应他不到时机成熟，不把这些公诸于世。

1957年5月28日，德美联合发表了关于阿登纳与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公报。这个公报比任何时候都强调，在达成一项全面的裁军协议之前，必须解决德国重新统一问题。艾森豪威尔也向阿登纳作出公开保证，美国绝对无意采取任何有损德国重新统一的裁军措施。这些措辞最后在1957年7月29日写进了《柏林宣言》里。

《柏林宣言》可以说是德国条约签字国最全面、最具纲领性的共同德国政策，它详尽阐明了西方在德国政策上必须遵循的原则，包括四方面内容，即：1. 自由选举作为建立一个全德政府的先决条件；2. 全德有决定外交政策的自由权；3. 四国负责重新统一；4. 欧洲安全与德国统一结合起来。

阿登纳原本想为《柏林宣言》的签定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它的原订签字时间是8月5日——波茨坦协定签字的纪念日，以象征性地显示从德国历史的这一最低点算起十二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但是，当礼宾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际，有消息说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将于8月初访问东柏林。联邦政府方面感到这两件事同时在柏林发生，从许多角度来说都是不可取的，况且，法国人也因为没有参加波茨坦会议对这个日子不中意。如此一来，签字的时间就提前了。

不过，从内容上看，《柏林宣言》在当时已经改变了的形势下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显然，在裁军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的情况下，它是否具有持久的价值，那是极为可疑的。它不能改变世界的进程。除了在9月的联邦议院大选中它成为阿登纳反驳社会民主党的有力武器外，《柏林宣言》几乎谈不上什么特别的意义。在阿登纳自己的回忆录中，阿登纳也没有像对德国条约、巴黎协定那样对《柏林宣言》大书特书、大肆赞扬。从另一个角度，《柏林宣言》签定于东西方裁军谈判开始热烈进行之时，它所包括的内容与当时的形势本身就是矛盾的，因而它的签定似乎应该算作阿登纳谋求德国统一努力失败的一个见证。把德国统一问题确立在这一纸宣言之后，西方国家便很少再提起会妨碍东西方缓和进程的德国统一问题了，即使重提，也只是为了某种特殊目的。德国分裂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已经固定下来，阿登纳对此无能为力。从此以后，阿登纳把精力投入欧洲建设中，认为谋求联邦共和国的实力地位，才是实现统一最有效的途径。这样，曾经因为德美关系密切而一度冷淡的德法关系，又成了阿登纳外交的重点课题。

1957年的联邦议院大选越来越近，阿登纳为竞选不辞辛劳。八十一岁的他以超人的精力和意志历经了几千公里的竞选旅程。他的足迹遍布联邦德国大小的城市，他发表了无数次竞选演说。9月15日，德国第三届联邦议院的选举结果表明，阿登纳所在的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获得了绝对的多数，阿登纳以党主席身份第三次当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对阿登纳来说，这意味着他的政策将能再继续四年。

德苏关系

现在是该使世界重新回到理智的时候了。

——1957年12月13日阿登纳同
苏联大使斯米尔诺夫的谈话

1955年9月德苏建交之后，如何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成为阿登纳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苏联掌握着德国统一的钥匙。

从战略上说，阿登纳从冷战对峙、欧洲衰落的国际形势出发，选择的是一条面向西方一边倒的路线，这条路线本身就包含了同苏联的对立。他选择与西方结盟，那么同苏联的接触，有活力的东方政策便会损害他的对美对欧政策，使他不能顺利实现在西方联盟内部谋求联邦德国政治经济恢复的目标。西方国家对德国与苏联的接触随时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戒，这种情况下，阿登纳面向西方的政治经济复原政策与需要面向东西双方的德国统一目标，从一开始就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在阿登纳当政时，我们看到的联邦德国的外交情形是：一方面是它经济的日益繁荣和它的政治地位在西方联盟范围内的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它面向苏联和东欧集团的东方政策却显得极为僵硬和消极，东方政策成为它面向西方和欧洲政策的附带部分。1955年以前，阿登纳一直没有和苏联打过正面交道。德苏建交以后，受德国统一问题和政策延续性的制约，阿登纳对苏联方面的态度也基本上停留在过去水平。

从全球的角度来说，自从1953年苏联氢弹爆炸成功以来。苏联的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都随之大大增强入东西双方的冷战实力开始进入某种均衡。1955年1月，艾森豪威尔公开发表演说，承认“世界进入一种军事平局”显示出美国不愿在双方都具有摧毁对方实力的情况下，与苏联迎头相撞的思想。此后召开了日内瓦首脑会议，西方国家开始承认中欧地区但持的现状。这一切使得阿登纳的政策处于某种尴尬的情形：他想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出发，对原有政策作出某些适应性的调整，但西方国家对他的要求却太高；西方希望他像他们一样承认中欧现状，但是德国人却不能这么快就接受国家彻底分裂的事实。这样一来，阿登纳虽然感受到国际形势的变化，但他的思维仍然不能突破旧观念的制约，公众舆论对政府在对待德国问题上软弱元力的批评始终牵制着他，所以在考虑德苏关系时，阿登纳始终没能跳出解决德国问题的框架。

看看阿登纳对苏联政治现实的分析就可以明白他处理德苏关系的立场。德苏建交后，阿登纳列举了四个现实作为处理联邦政府同莫斯科关系的出发点：

其一，苏联存在着经常性的潜在的威胁。自1945年以来。苏联一直保持着500万左右的武装部队，其中有22个师驻扎在德国苏占区（东德）内，这些师拥有大约7,500辆现代化坦克。此外，苏联还拥有强大的空军、潜艇舰队以及致命的原子武器等。

其二，尽管呼吁缓和，但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并没有放弃他们使全球布尔什维克化的信念和使命，他们在许多公开讲话中一一承认了这种信念。

其三，苏联有侵占别国的历史。只要看一看地图和历史书籍，就可以发现苏联1939年的边界和今天的边界完全不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于1940年并入了苏联版图，战后苏联又取得了芬兰、波兰、罗马尼亚、捷克

斯洛伐克和东普鲁士的部分领土。苏联继续不断地向西部推进。哪里有苏联部队驻扎，哪里就建立起共产党的政府。

其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之后，苏联的势力范围不再扩大，这也是一个现实。这证明北约组织的建立对遏制苏联的侵略扩张是有效的。柏林本该于 1948 年陷落的，但 1949 年 5 月，在 NATO 组织成立一个月之后，苏联人就解除了对柏林的封锁。阿登纳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联邦德国和欧洲在平安无事的情况下重建，应该归功于北约组织的保护伞。

这些对于理解阿登纳 1955 年后处理对苏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1956 年 9 月，阿登纳向四个战胜国，也包括苏联，送交了一份有关德国重新统一问题的备忘录。西方三国支持了阿登纳的立场。苏联方面在 10 月 22 日的复照中拒绝了阿登纳提出的将重新统一与欧洲安全联系起来观点，重新强调存在两个德国的现实，同时认为重新统一应是两个德国之间的事。由于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建交后的德苏关系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冻结起来。联邦德国方面对苏联第一任驻德大使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佐林也采取冷遇。佐林到波恩未满一年就被召回国，毫无建树。

在阿登纳看来，能够促进同苏联人缓和的因素远远还没有到来。1957 年 3—9 月的伦敦裁军谈判为他的观点提供了佐证。尽管东西方都作出了努力，但双方的矛盾依旧无法克服。9 月 6 日，伦敦裁军谈判无果而终，对阿登纳来说，与其说是失望，不如说是高兴，这又是苏联人没有解决问题诚意的充分论据。而且，在西方仍然沉浸在对伦敦打击的纷纷议论之中时，紧接着，苏联人再次给了他们当头棒。1957 年 10 月 4 日，整个西方世界就像受到震荡那样被惊醒：苏联成功地发射了它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阿登纳怀着接受“天赐的礼物”的心情接受这个事实。他说，没有它（人造卫星），自由世界可能继续处于半昏迷状态中。

同阿登纳强硬的对苏态度相比较，苏联人在对待联邦德国时，显得温和并主动一些。1955 年德国两部分分别加入北约和华约之后，苏联对德政策的核心便已放到使两个德国合法化固定下来的问题上了。1956 年 7 月，莫斯科在撤回佐林大使之后，换来了经验丰富的驻奥地利前任大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称得上是一个德国通，由于他的努力，莫斯科驻波恩大使馆的工作日益活跃起来。斯米尔诺夫也频频向阿登纳表示莫斯科愿同联邦政府善意地接近。

从 1957 年 2 月开始，莫斯科频频向波恩摇晃橄榄枝。2 月 7 日，刚从莫斯科归来的斯米尔诺夫受苏联政府的委托来拜访阿登纳，转交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致联邦总理的私人信件，并转达了苏联政府进一步发展德苏关系的愿望。阿登纳给斯米尔诺夫的回应是：收到布尔加宁的信他十分高兴，他认为双方完全有可能进行一次有成效的、坦率的会谈；但遗憾的是，世界政治形势表明，在各国人民之间很少存在着信任；现在对德苏两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和巩固这种信任。

真正使阿登纳拒绝布尔加宁的是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毫无回旋余地的立场，因为布尔加宁在信中强调：

“只要企图回避存在两个德国的这个事实，德国统一事业就将不会取得进展。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证明：只有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接近，才能找到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同样清楚的是，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限制德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对毗邻德国的爱好自由国家推行不

友好政策的方针，都不会促进德国的统一。”

阿登纳也注意到在布尔加宁信中也透出许多比以往进步得多的观点，比如，布尔加宁建议两国在贸易方面改善关系，缔结“一项关于文化、科技合作的协定以及领事协定”等等。布尔加宁甚至说，领事协定将规定双方有权保护它们的公民，这会有利于解决有关德国公民遣返问题。只要与苏联人打交道不影响联邦德国与欧美的关系，阿登纳还是愿意与苏联方面加深接触，因为有关德国的问题必须通过与苏联的谈判才能解决，发展双边关系对联邦德国来讲是有利的。

1957年2月27日，阿登纳给布尔加宁回了一封信，表示联邦政府愿意通过外交途径举行关于扩大贸易关系的谈判，并讨论科技合作的问题。不过，阿登纳把苏联人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和在苏的德国人的遣返问题作为严重障碍提出。他着重强调指出苏联应对德国统一负有责任。他说：

“您，部长会议主席先生和总书记赫鲁晓夫先生，在莫斯科谈判时明确地承认，苏联作为占领国，有义务同西方三个国家一起重新恢复德国的统一。这就是苏联的义务。如果要使我们所希望的德苏合作充分发挥作用，以有利于两国人民以及欧洲和世界和平，苏联就必须履行这一义务……您和您的政府同意在全德自由选举的基础上立即统一德国两个部分，除了以此能够证明你们真正尊重民族自决权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更有助于德苏关系，有助于欧洲和世界和平了……”

战俘遣返是1955年阿登纳访苏时达成的君子协定，遣返工作本应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而苏联一直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拖延平民释放。阿登纳请求布尔加宁在这一点上履行他在莫斯科时作出的承诺。

此后，阿登纳和布尔加宁又交换了两次信件，双方在重新统一德国问题的立场上都不肯作出让步。阿登纳本着在波恩和莫斯科之间创造良好气氛的愿望，同意与苏就发展贸易、从苏联遣返德国公民以及缔结领事权的条约进行谈判。谈判旋即于1957年7月23日起在莫斯科开始。与此同时，阿登纳更急切关注伦敦裁军谈判以及谈判失败后世界形势的变化，他把握的尺度是，决不能让德苏谈判影响到东西方裁军进程，并给苏联人造成自由世界内部不团结的印象，他不时把谈判的进展通知美国和其他的西方盟友。因而，德苏谈判的进展也是可想而知。

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再次给西方敲了警钟，也弥合了美国白宫与国务院以及美国同西方盟国间的分歧。人造卫星的率先发射表明苏联在发展洲际导弹方面领先于美国，由此也就产生了苏联可以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可能。阿登纳和杜勒斯的警告不幸而言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心加强西方防务力量。一年一度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将于12月在巴黎举行，艾森豪威尔决定把这次原本是外长和国防部长级的年会，改为首脑级的，他宣布他将亲自出席。1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宣布美国准备在核领域满足他们的北约组织伙伴的需要。美国的反应令阿登纳很高兴，他特意在会议进行前先到巴黎，与法国盖伊阿政府就把北约改革成为一个“具有充分效力、军事上有威力的权力组织”全面协调立场。在这样团结一致的气氛中，1957年12月召开的北约理事会巴黎会议取得令阿登纳颇为振奋的结果。为了加强欧洲前线防御力量，美国答应西欧盟友用最先进的中程导弹和发射基地来装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由于这一措施，北约的力量将大为加强，这样，联邦德国也就可以实现在北大西洋公约统一指挥下的原子武装。

在原子武器的使用上，西德也取得了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平等权利。

阿登纳不想因为联邦德国同苏联的交道妨碍了北约的改革和原子化，所以，与他促成北约加强核防御的努力相比，波恩同莫斯科的谈判显得是毫无生气。12月10日，在赴巴黎开会之前，阿登纳收到了布尔加宁有关德苏谈判的一封信。阿登纳把这封信带到了巴黎，并在北约理事会议上披露。他的以下发言体现了他对苏联人频频摇晃的橄榄枝可是一点儿都不领情。

他说：“我们正处在每天必须考虑莫斯科集团的那些突然的政治袭击的时代里，据我看，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必不可少的是：我们要及时对我们政策的某些共同的基本方针取得一致意见，这些基本方针，应成为解决不同地理地区问题的具体行动纲领。……我们不允许让东方集团在世界范围内的宣传把我们挤到被动的地位上去，但是，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投入为争取世界舆论优势的斗争中，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性、更多的幻想、更多的活力去达到我们的目标呢！……”

阿登纳想要传达的主要意思是，为了保卫和平和自由，北约做出一切必须做的事情都是值得的，不仅应扩大西方的防御力量，也应该同东方进行卓有成效的会谈。他使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得到所有人的谅解。实际上，其他国家担心的只是德苏结盟，从阿登纳的发言来看，两国在德国问题上不可调和的立场使这点在目前看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完全可以把阿登纳看成是一个可以放心的伙伴，有时他们担心的反倒是后者对苏态度太僵硬会妨碍东西方谈判进程。德苏在莫斯科谈判或可能在某种意义改善两国关系，促进东西方和平进程，这一点得到与会者公认。

从北约国家在巴黎开会起，苏联方面就开始进行反击了。北约改革与扩大的主要目标都是苏联，苏联也未敢掉以轻心。1957年年底到1958年年初的几个星期内，布尔加宁给80多个国家分别递交了长信和备忘录，建议召开北约和华约组织成员国及联合国所有国家参加的首脑会议，讨论在欧洲建立无核区以及德国重新统一等问题。1月8日，阿登纳收到这封信，信长21页，还附了一份长达22页的备忘录。

在阿登纳看来，布尔加宁要讨论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联在一起的。布尔加宁提出首脑会议的议题是：在欧洲建立一个无核区，缔结一项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联邦政府在安全问题上向来的出发点是：缔结安全条约必须同德国重新统一联系在一起，裁军与安全无论如何都不允许事先放弃重新统一的谈判目标。因此，阿登纳认为苏联人不安好心，布尔加宁的建议实际意味着要使联邦德国跨出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合法性、使德国中立化的第一步。它不仅抛开了德国重新统一的优先地位，而且会对联邦德国的安全造成很大程度的危害。计划一旦实现，苏联就可以利用它在常规武装方面占的优势，总体上削弱北约组织的威慑作用。

美国人也很清楚苏联的意图，苏联人摆明了要为了反对美国加强北约防御力量。建立布尔加宁所建议的这样一个无核缓冲区，等于迫使美国放弃北约原子化，这无疑意在迫使美国解散北约，也意味着把美国从欧洲赶出去。美国拒绝了布尔加宁的建议，仍然以德国问题作为拒绝理由。1958年3月6日，美国政府给苏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醒苏联政府在1955年7月日内瓦首脑会议上已承担了促使德国重新统一的责任，现在却拒绝在即将召开的首脑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并把它看成两个德国之间的事，这是自相矛盾的。美国政府不能理解，如果不讨论包括德国分裂在内的造成国际紧张局势

的主要原因，未来的首脑会议怎么能够给国际关系带来重要的转变呢！

从苏联建议提出起；东西方又展开一场照会战。短短几个星期，双方换文二十多份。苏联方面也没有放弃对联邦德国的工作，驻波恩大使斯米尔诺夫不停地穿梭于莫斯科和波恩之间，充当传话筒。阿登纳坚持苏联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以及 1955 年访问莫斯科会谈时苏联人对德国统一的承诺。而苏联则通过斯米尔诺夫表示，形势已经发展到必须由两个德国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地步，否则在首脑会议上讨论会干扰这次会议的其他议程。斯米尔诺夫说，首脑会议必须有两个德国出席，两德可以在开首脑会议的同时进行有关谈判。阿登纳坚决反对，认为这不仅将从事实上，而且也从国际法上承认了两个德国。由于双方意见的严重分歧，德苏会谈也陷入僵局。

1958 年 3 月 19 日，大为恼怒的苏联通过斯米尔诺夫大使交给了阿登纳一份措词严厉的备忘录：

“……联邦政府非常了解这一事实，即苏联政府断然反对关于在首脑会议上讨论德国重新统一的现有方案，其原因是这一任务除了致力于重新统一的两个德国之外不能由其他任何人来解决。苏联的这一立场仍然没有改变。如果联邦政府不顾苏联这一立场，仍然坚持要求在即将到来的首脑会议上讨论德国重新统一，那么这只能说明是要阻挠会议的召开，并以此继续拖延德国问题的解决……”

阿登纳想从对话的这种僵局中走出，从联邦德国一方来提出一个解决德国问题的具体方案。趁着斯米尔诺夫再度拜访绍姆堡宫时，阿登纳小心翼翼地向他提出：苏联政府愿意给苏占区以奥地利那样的地位吗？奥地利人承担了和约中规定的军事上保守中立的义务，也因此获得决定自己命运的可能性。对德国问题苏联是否也能这样解决呢？

斯米尔诺夫本人不能就这个问题正面作答，但他不愧为莫斯科外交老手。他解释道，奥地利当时是另一种情况，它处于四国共同管制之下，德国今天的问题却是事关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苏联人无权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另一种地位。这样做意味着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

斯米尔诺夫出色地充当了苏联政策的讲解员。阿登纳还想等待苏联政府的回音。1957 年 7 月起，德苏开始在莫斯科举行关于缔结一项贸易协定、建立领事代表机构及协商遣返留在苏联的德国人的谈判，到 1958 年 4 月 8 日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这期间苏联领导集团又发生了人事变动，布尔加宁被撤职，赫鲁晓夫兼任部长会议主席。阿登纳在莫斯科时曾认为布尔加宁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看来他犯了一个大错。人事变动之后，苏联政府派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纳斯塔斯·伊·米高扬率团于 4 月 25 日至 28 日访德，出席协定的签字仪式。

米高扬成了阿登纳时代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来联邦德国的苏联高级领导人。

这次访问比阿登纳到莫斯科时气氛轻松、友善得多，双方在许多问题上交换了意见。显然，阿登纳与米高扬谁都明白不可能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服对方，也就不打算这么做。苏联政府最忧心的是联邦德国国防军的扩军和计划中的原子武装。阿登纳告诉米高扬：担心完全没有必要。联邦共和国无论有

无核武器，对欧洲和世界来讲都将是一个和平的因素。他本人就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不仅联邦政府，而且整个联邦议院、所有政党都能保证这一点，联邦德国绝对不要战争！米高扬最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是“满怀欧洲和平是可以得到保证的信念”返回苏联的。

当然，阿登纳也没有争取到米高扬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让步，他原以为苏联政府作出回应对他 3 月 19 日提出的给予东德像奥地利式中立地位的建议，米高扬却未作任何表示。德苏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真正僵住了。

阿登纳和米高扬会谈中也出现过一些有意思的插曲，使整个访问增色不少。

4 月 26 日，阿、米第一次会谈。阿登纳为米高扬一行准备了一次便宴，两人谈得十分专注，以致忘记了时间，来宾已于 13 点 15 分全部入席，而到 13 点 30 分直到有人来提醒，阿登纳才记起来。这对严谨守时的阿登纳来说是极难得的。记者们甚至误以为德苏会谈取得了进展，但晚上在外交部举行的晚宴会，双方又各作攻击。

4 月 27 日，阿登纳设宴请苏联代表团。鉴于在头一天晚上外交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米高扬作了通篇攻击联邦共和国的讲话，阿登纳在宴会前向米高扬指出：“米高扬先生，我听到了您昨天的讲话。但您在我这里不应该这样做。这样您将迫使我不得不进行非常尖锐的回答，而我并不乐意这样做。”阿登纳向米高扬念了自己即将发表的讲话的部分讲稿，并向米高扬索要他的，以便断定这篇讲话是否友好。米高扬不得不划去其中几个阿登纳认为措词尖锐的句子。

绍姆堡宫的宴会上，阿登纳和米高扬谈起了后者曾经在神学学校学习的经历。米高扬说，就在他快要接受神职时，他突然对信仰怀疑起来，他认为他不能再相信上帝了，这时，他读到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米高扬说，是这本书启迪了他，他开始改变信仰。

阿登纳非常惊讶地看着米高扬，说：我也曾经读过《资本论》，但我简直不能理解它。

米高扬进一步解释：我也是读了两遍之后才理解这本书的。

接着，阿登纳又饶有兴致地问米高扬，苏联是否对中国有所顾忌。米高扬说，苏联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除了西部边界外，苏联没有在中国驻军。

阿登纳摇了摇头，进一步说：您把我的问题搞错了，我注意的并不是目前苏联同中国的关系，而是以后十年至二十年中的事态发展。中国每年人口增长一千二百万，它的人口在十至十五年之后几乎可以达到十亿，它又没有足够的土地。苏联那时最多有二亿五千万人口。倘若我是俄国人的话，我不希望有一个人口如此众多而又没有足够土地的邻居。

米高扬沉默了，开始沉思……

米高扬是在 4 月 28 日回国的。这次访问后，德苏有关德国统一问题的谈判被冻结起来，德苏关系也因此而僵住。准确他说，是 1955 年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失去了解决德国问题的时机，而阿登纳又坚持原有立场，这才使德苏关系不能打开局面。阿登纳给斯米尔诺夫 3 月 19 日的提议是他试图打开僵局的一种尝试，之后，1959 年，阿登纳又授意制定了一项关于解决德国问题的“格洛勃克”计划，主张在十年过渡期内缓和两个德国的紧张关系，然后就德国统一问题在两德和东西柏林举行公民投票。这些迹象表明，阿登纳已经开始准备改变哈尔斯坦主义不建交不承认的立场，探索新的东方政策，以

尽量协调同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分歧。但是，情势所限又使阿登纳不可能走得太远，达到苏联人谋求的使东德合法化的要求。苏联对阿登纳的这些表态保持了缄默。在阿登纳看来，承认东德等于放弃了过去的一切原则，这也等于是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美国的国际分析专家卡尔·多伊其曾说，政治家和领导人“往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为保持其世界形象的一贯性和一致性的习性与需要的俘虏”。阿登纳正是如此。已经树立的“冷战骑士”的形象是很难再作出变更的，迈出任何一步都要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

第九章 德法关系的新纪元

“……我现在要讲几句话，也许使诸位感到惊奇：在重建欧洲家庭方面，第一步必须是法德两国之间的携手并进……没有一个精神上强大的法国和一个精神上强大的德国，欧洲是不会复活的。”

——1948年5月邱吉尔在海牙欧洲联盟
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萨尔回归

政治是一种艺术，它要把在道德基础上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变为现实。

——《阿登纳回忆录》（三）

1954年10月，为使法国签署巴黎协定，阿登纳作了执政中最具冒险性的一次决定：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签订了萨尔协定。

萨尔问题自阿登纳上台就令联邦政府困扰不已，是法德关系一个解不开的节。法国和德国都想争夺对萨尔的主权，由于德国战败，法国利用占领的机会成功地在萨尔扶植了亲法的自治主义地方政府，法国力图先使萨尔从德国分离出来，使这个政权得到国际承认后，再逐步将其归并到法国。自1950年起，萨尔问题经常使法德关系发生混乱。在签订欧洲煤钢联营条约时，法国政府坚持要让萨尔作为第七国参加联营条约，阿登纳不得不以退出联营为威胁，迫使法国放弃了这个打算，但法国最终以法国——萨尔经济联盟的名义在煤钢联营条约上签了字。后来，阿登纳和法国领导人都同意应该在欧洲范围内解决萨尔问题。萨尔自治政府总理约翰内斯·霍夫曼提出使萨尔“欧洲化”并保持与法国经济联系的建议，阿登纳从欧洲联合的角度考虑，与法国一起采纳了这个建议。但是，究竟该以何种方式实现萨尔欧洲化，法德两国从未有过共识，阿登纳对解决这个问题心里也没底。

1952年11月，萨尔举行了议会选举，在法国的干涉下，亲德政党被排除在选举之外。结果，自治主义政党获得胜利。阿登纳强烈反对法国这种做法。选举后，法国根据事先许下的扩大萨尔自治的诺言，于1953年5月20日与萨尔政府签定了有关萨尔问题的总协定。同时，欧洲部长理事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萨尔欧洲化的章程。很快，范·纳泰尔斯计划出台。该计划将萨尔划归欧洲共管，设计了欧洲机构和地方政府，规定在经济和货币方面，萨尔仍属法国——萨尔经济联盟，保持同法国的密切联系，同时，由欧洲部长理事会派遣一位向理事会负责的欧洲专员负责掌管萨尔的外交和防务，代替原来的法国代表。法国和萨尔政府都接受了范·纳泰尔斯计划，但阿登纳认为一旦贯彻这个计划，将会进一步割断萨尔与德国之间的有机联系。阿登纳倾全力反对并威胁说，他将向欧洲理事会提出控诉，因为它损害了萨尔的民主自由权利。法国坚持以这个计划作为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先决条件之一，德法为此争吵不休。

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失败以后，联邦德国寻求重新武装恢复德国主权的替

代方案，法国也寻求解决萨尔欧洲化问题的可行办法。于是在巴黎协定签署时，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提出，要使法国承认德国平等权利的条件是必须签定一份法德萨尔协定。巴黎会议上，阿登纳和孟戴斯-弗朗斯就萨尔协定的内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直到巴黎协定签署的头一夜，在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的晚宴上，阿登纳和孟戴斯-弗朗斯还在英国大使的图书室里就萨尔协定的内容争论不已。接近午夜，双方才各作一些妥协。阿登纳的妥协非常大，他基本上承认了将范·纳泰尔计划作为法德萨尔协定的主要内容，唯一争得的让步是孟戴斯-弗朗斯没有将萨尔最终脱离德国写进协议中。按规定，萨尔协定须经萨尔公民投票表决后方可生效，阿登纳要求进行两次表决。如果在第一次公民投票中萨尔协定获得通过，那么在缔结对德和约时，将把萨尔协定再次提交给萨尔居民进行表决。阿登纳寄望于通过欧洲统一的推进、以及联邦德国地位的巩固，会在萨尔居民重新决定归属时产生有效影响。

可以说从签定萨尔协定的那一刻起，阿登纳就面临着有萨尔脱离德国的危险，他把萨尔的命运交给了萨尔人自己去做决定。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签字那天下半夜，在同孟戴斯-弗朗斯分手之后，阿登纳避开了新闻记者，也避开了在宴会上等待的艾登等许多人，独自悄然回到饭店。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形与他一生的坚定、果断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阿登纳自己说，当他同意这样措词的萨尔协定时，他“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如果说有希望的话，那也是未卜的。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难渡过的一夜。

从那以后，阿登纳以极其忐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1955年7月开始进行的萨尔选举。这次选举也牵动了每一个德国人的心。在西欧联盟部长理事会的监督下，萨尔所有的政党都参加了竞选。1955年西德经济情况已经好转，国际地位也开始在西方树立，这一切为亲德派提供了最有力的竞选说明，他们在竞选中取得了绝对胜利。萨尔选举的结果扭转了法德对萨尔的关系。同时，由于德国经济复兴，洛林地区具有竞争能力的强大工业的逐步兴建，萨尔与西德的自然的经济联系恢复并加强了，越来越多的萨尔居民出于对德国的民族感憎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日益倾向于要求与联邦德国直接合并。10月23日，萨尔就萨尔法规举行了全民公决。当公民投票结果显示萨尔居民以423,344票对201,973票否决了有利于法国与萨尔关系的萨尔协定时，阿登纳因为紧张而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法德关系由于这次表决而骤然轻松。从理论上说，对萨尔协定的否决意味着萨尔地位维持现状，但在实际上，萨尔人要求萨尔与德国归并的呼声却越来越高。自治主义的霍夫曼政府辞职，法国政府不得不顺应形势，声明准备就萨尔回归德国问题进行谈判。法国人这次主动的慷慨大方令阿登纳十分满意，他以前所未有的愉快而平静的心情接受了法国人的善意。随后，法德就萨尔回归德国的谈判展开。法国既然不能使萨尔脱离德国，也就把目标转向密切法国与西德同萨尔的关系上，以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法德间的友好合作本就是阿登纳的奋斗目标，萨尔回归又解决了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因而，阿登纳也愿意尽量考虑法国的要求，作出些让步。最后，1956年10月，阿登纳和法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法国同意萨尔和德国自1957年1月1日起，实行政治联盟，并在三年过渡时期以后，实行经济联盟；作为交换条件，阿登纳也保证每年向法国交付大量的萨尔产煤，并特别保证疏通摩泽尔

河，以使法国和萨尔的各种工业得以向德国西南部各地扩张。

1957年1月1日，萨尔回到联邦德国，法德重新划定边界，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的领土之争。萨尔问题的解决，为阿登纳以法德和解为中心的欧洲政策的实现铺平了道路。阿登纳说，“1957年的第一天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1月1日，萨尔的德国人同我们重新合并在一起。我们政策上坚持不懈努力以赴的一个目的达到了。”

阿登纳将萨尔的回归与联邦德国建国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联系在一起，称“联邦共和国有幸得到了某种程度上堪与圣经所记的‘一个大丰年’相媲美的岁月”。自1943年以来，经过7年的奋斗，阿登纳领导联邦德国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内部政治秩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并在西方边界赢得了当之无愧的地位。萨尔的回归实际是经济在起决定性作用。从萨尔回归的那一刻起，希特勒战争创伤最为沉重的方面消除了。阿登纳将这一天作为一个开端，作为法德两个唇齿相依的民族建立友好关系的一个基础。他不无感慨他说：“现在，法、德两国真心实意携手并进的道路畅通了，在它们特有的以两个民族睦邻为基础的利益范围内进行活动的道路畅通了，为了欧洲合作紧密地共同工作的道路畅通了。”

萨尔问题的解决把法德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通向科隆贝

“我们必须合作，而不要成为美国的工具。”

——1958年9月14日戴高乐在
科隆贝与阿登纳会晤时的讲话

1958年5月，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长期以来积聚的种种问题终于以不可挽回的政府危机的形式总爆发了。一个昔日辉煌一时的大帝国终于因海外殖民地问题面临着崩溃。

第四共和国走到这一步绝非偶然，从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政局就一直不稳，政府软弱是其根本。当初立国之时戴高乐将军就曾让法国人作出选择，是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呢，还是要一个强有力的议会，结果法国人选择了议会，戴高乐愤然拒绝出任总理，并退出了政坛。国民议会党派林立意见不统一使任何一派都难以取得优势，政府必须靠向大多数议员妥协才能维持。政府很容易倒台，整个第四共和国期间仅有两届政府任期超过一年。同时，战后法国的经济社会形势也一直未容乐观，殖民地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届政府，北非阿尔及利亚几次出现叛乱，乃是历届政府的一块心病。阿尔及利亚与法国隔地中海相望，历来与法国本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牵动法国政局。1958年5月13日，一直动荡不安的阿尔及利亚酿发了一起重大武装叛乱，叛乱直接波及国内，并眼看要引发一场军队暴动，局面将至不可收拾。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害怕了，纷纷退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国民议会不得不再请二战英雄戴高乐出山，希望借他在军队和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安定人心，平息事态。

戴高乐再度出山并受命危难，他提出了一个重要条件，宣布他只能接受共和国授与的全部权力。他说：“如果人民愿意的话，我就像过去发生民族重大危机时那样，来担任法兰西共和国首脑。”国民议会别无选择，民众呼声很高，阿尔及利亚局势不容拖延，最终答应了戴高乐的全部要求。

蛰居12年之久的戴高乐将军再度出山，令阿登纳极度担心，戴高乐将军会继续奉行第四共和国前任政治家们制定的对外政策吗？会把迄今已经取得一些成效的法德合作和欧洲一体化继续下去吗？戴高乐的思想是极端民族主义的，阿登纳对战后初期戴高乐反美反德的言论记忆犹新。“伟大的民族”、“法兰西的光荣”等诸如此类的话在戴高乐1954年和1956年出版的《召唤》和《统一》两卷回忆录中随时可以看到。戴高乐一向主张压制德国、防范德国，谁也不会忘记戴高乐在1944年12月10日在莫斯科同苏联签定了法苏同盟互助条约，其防范德之心昭然若揭，戴高乐也一直反对德国重新武装和欧洲一体化，最近的舆论表明苏联人乐意看到戴高乐执政，戴高乐周围亲信中，也有一批思想是极端民族主义、反欧并且留恋着法俄联盟的政治家，如此等等令阿登纳忧心。

阿登纳焦虑地关心着法国的政局，也关心着戴高乐的一举一动。他让人们给他送来了戴高乐的回忆录，想对戴高乐的思想作一番仔细的推敲。阿登纳看到，戴高乐在谈到法国对外政策目标时是这样说的：

“很明显，当前法国在为达到它的目标和面临其他国家的谋算方面来说，还处于软弱的地位。这些国家自然希望从这种局势

中捞取好处，并且企图乘我们争吵之际对我们施加压力，或者甚至企图把我们驱赶到缔造和平集体的二等地位上去。我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同时我相信，德国的崩溃，欧洲的分裂和俄美之间的对抗，好像奇迹般拯救了法国似的，给了我们采取行动的极好机会，而且一个新的时期也许能让我们开始贯彻一项伟大的、由我为我的国家制定的计划。

这关系到保证法国在西欧的安全，以免法国可能再次受到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威胁。法国应该同东方和西方合作；需要时，应同这一方或另一方缔结必要的联盟，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自己处于从属地位。为了预防法兰西联盟可能分裂的危险，这个联盟应逐渐变成一个自由的共同体，这关系到要使与法国接界的莱茵河流域、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一带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战略方面同法国联合起来，并把这一组织变成世界三大势力之一……”

在这些话中，阿登纳看到在戴高乐思想中一些根本质的东西，把它与戴高乐的作为以及外界对他的评论联系在一起，阿登纳在心中勾画出戴高乐将军的基本轮廓。

首先，这个人法兰西有一种天生的使命感，他决心要捍卫和发扬法兰西的光荣和伟大，阿登纳对这种感觉相当理解。戴高乐不容许法兰西被降到世界第二流国家的地位，要尽一切力量拯救法兰西，使它重新定位，和大国平起平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戴高乐正确估计了东西方的国际形势，准备利用美苏对抗，欧洲衰落德国被分裂、很难短时期再起的机会，使法兰西尽快强大起来，他虽然反对欧洲一体化，但却希望法国扎根于欧洲，并通过联合起来的欧洲同美、苏对抗，成为世界第三大势力。当然，阿登纳很清楚，戴高乐的一切思维都是法兰西式的，因为后者把欧洲当成了法兰西共同体的延伸。

戴高乐上台之后，尽管法国方面对阿登纳所关心的北约组织和欧洲联合还没有作出表态，阿登纳却已听到来自各方的各种各样的推测了。有人说，戴高乐在欧洲和大西洋地区可能推行一种有益的政策；也有人认为，戴高乐会破坏这一切，并参与苏俄的赌博；还有人对戴高乐的思维方式作了如下描述，说他受着一种思想信念的支配，各种客观现实都不能使他放弃这种思想——他很骄傲，并且以感情用事来作出政治决定，当他的骄傲受到损害时，就会引起他态度的摇摆。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作出结论的根据，阿登纳决心耐心听取有关法国各方面情况的报道，等待法国事态发展至明朗和稳定。对法关系是联邦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阿登纳不愿草草作出决定。

事态发展渐渐明朗了。1958年6月1日，法国国民议会以329票赞成，224票反对，通过了对戴高乐的总理任命。6月2日，法国议会又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戴高乐修改宪法。戴高乐在内阁中保留了前政府的一些人，其中包括阿登纳所熟悉的居伊·摩勒、弗林姆兰和安托万·比内，前法国驻波恩大使顾夫·德姆维尔也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宽慰的迹象。戴高乐在发表就职宣言时说他将遵守欧洲条约，对阿登纳来讲，这些人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就是法国将贯彻这项声明的保证。6月25日，法国外交部长

顾夫·德姆维尔在巴黎向新闻界宣布：第四共和国尽管历经长年的危机和动荡，但其外交路线却是稳定和连贯的，这条路线是根据国家若干道义职责，以及地理、历史、经济和文明的特性而制定。过去曾经决定了的因素今天仍然决定着法国的对外政策。如果说今后外交存在变化的话，那将主要在外交政策的执行方法和手段上。阿登纳以一种欣慰之情感受着法国结束政权交接时期的政策混乱，步入正轨。

法国政局稳定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后到巴黎去作了访问。1958年夏天，法国政治家们一再到波恩，邀请阿登纳访问巴黎。但阿登纳感到目前的时机和客观条件尚不具备。7月8日，阿登纳接到了老朋友杜勒斯的一封信，谈了谈他访问巴黎的情况。杜勒斯说，他与戴高乐将军的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两人对法德紧密合作问题也有一致看法。他询问阿登纳什么时候去巴黎。

但阿登纳仍然担心，他认为他和杜勒斯、麦克米伦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杜勒斯和麦克米伦是作为二战中与法国并肩作战的美英代表去与戴高乐会晤的，麦克米伦在战争中还是戴高乐的老朋友。而他，阿登纳，却是作为一个战败国的代表，戴高乐会不会另眼相看呢？而且，阿登纳认为他在1956年11月应总理居伊·摩勒之邀访问过巴黎，至今法国没有安排回访，在这种情况下到巴黎去也不适合。阿登纳将这种顾虑告诉了前来波恩访问的法国荣纳省省长莫里斯·皮卡尔。皮卡尔刚被任命为法国广播电台总经理，并且同戴高乐过往甚密。皮卡尔让阿登纳无需有此担心，他保证阿登纳将在巴黎受到热烈欢迎，只要他提出一个访问的具体日期，一切都将会圆满解决。阿登纳却还想等等，感到眼下时机并非最佳，他想为首次同戴高乐的会晤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确切理由。

7月，中东形势发生变化。伊拉克爆发了革命，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约旦王国也面临同样的危险，黎巴嫩又发生暴乱。赫鲁晓夫在这时又提出要召开首脑会议。7月29日，法国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受戴高乐之命来到波恩，转告阿登纳，戴高乐将军切望听听联邦总理对局势的看法，并邀阿登纳赴法。阿登纳仔细考虑了一下，接受了，但他表示会晤应是私人性质，这样更有利于双方自由交换看法。8月初，阿登纳派出驻巴黎大使冯·马尔藏访问爱丽舍宫。戴高乐向马尔藏大使表示愿意把地点订在他的家乡科隆贝双教堂的私人别墅。阿登纳很满意这种安排，他建议把会见时间订在秋天，届时他在科摩湖畔的卡德纳比亚度假结束后，在归途中稍事停留，可以从巴登—巴登向东前往科隆贝。见面的安排就这样确立了，时间是9月14日。

为了拟定的科隆贝会晤能够顺利，8月，法国副总理安托万·比内到卡德纳比亚看望了正在度假的阿登纳。比内向阿登纳谈起了导致法国政府更替的那些事件。他说在法国人们都确信，只有戴高乐将军才能克服法国目前所面临的危机。他想解除阿登纳最大的顾虑：法国会不会继续它的欧洲政策——所以他说，众所周知，作为个人来讲，他不是戴高乐派，摩勒、弗林姆兰以及其他几个议员也不是，他们之所以参加政府，是发觉在某些欧洲问题上与戴高乐有相似的想法。正如阿登纳已经了解到的，不久前戴高乐已发表谈话，说他不打算撕毁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而过去，戴高乐一向是反对“莫内先生的欧洲”的。阿登纳说他愿把这看作是戴高乐要对欧洲表示友好的前兆。比内强调戴高乐法国的意愿是，它将不会改变过去有关德法合作和共同市场的外交政策。

由于对这位伟人各种讳莫难测传闻的兴趣，阿登纳特意询问比内，能否从戴高乐的回忆录中看出他的性格呢？

比内回答说，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找到戴高乐为人的性格。不过，这些性格也适应不了目前的状况。戴高乐将军已经变得“不那么冷淡”、“不那么高傲”，“更合乎人情了”。这也许同他的年龄增长有关系。戴高乐今年已经六十六岁，他这个年龄所有的经验和阅历能使他对所有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同比内的谈话使阿登纳的心又安定了几分。

终于到了可以揭开庐山真面目的这一天。1958年9月13日，阿登纳结束了在卡德纳比亚的休假，在巴登—巴登停留一夜之后，9月14日清晨，驱车途经斯特拉斯堡前往科隆贝双教堂。一路上阿登纳一言不发，心事重重，他考虑如何与戴高乐将军更好沟通。他担心由于思维方式不同，造成他与戴高乐之间取得谅解的困难，也担心由此使他为法德友好所作的努力尽付东流。这次会面对今后的法德关系有着决定性意义。

科隆贝双教堂坐落在海拔约五百公尺的高地上，周围环境肃穆而空旷，极为幽静，戴高乐的住宅原是建于十九世纪的一座侯爵邸宅，周围有一宽阔美丽的大花园衬托着这幢古老的建筑，使它与环境融在一起，显示出主人高雅的情致。

阿登纳一行穿超过了法国的工业区与乡村，在午前到达了科隆贝。他受到了戴高乐和他那娇小热情的夫人的殷勤迎接。欢迎虽不拘礼仪，气氛却非常亲切。陪同阿登纳前往的有他精心挑选的外长冯·勃伦塔诺和国务秘书卡尔·卡斯滕斯。前国务秘书哈尔斯但已被让·莫内推荐去担任欧洲经济共同体主席。戴高乐方面则由外长顾夫·德姆维尔、秘书长若克斯以及驻波恩大使赛杜作陪。

共进午餐后，戴高乐与阿登纳留下了一名译员让·梅耶，让其余随员驱车前往离此四十公里的肖蒙去，以便不受打扰地进行谈话。阿登纳懂一些法语，戴高乐也懂一些德语，他们之间的会谈常常不需要经过翻译就能直接进行。

由于是私人会晤，会谈没有确定议程，双方可以自由地交换意见。他们谈到了世界形势，谈到了北约、美国、也谈到了欧洲、法德以及英国。两人一见如故，除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外，阿登纳感到没有哪个政治家像戴高乐一样，和他有这么广泛的共同语言。阿登纳折服于戴高乐振兴法兰西的崇高理想，戴高乐也对阿登纳缔造出一个新的联邦德国感到由衷钦佩。两人互为推崇，相见恨晚。

戴高乐首先消除了阿登纳对法德合作的担心。他坦率地向阿登纳承认，同大多数法国人一样，他在德国崩溃之后也曾担心，一旦德国复原，将会对法国进行报复，因此在他担任总理期间，他导致了法国和苏俄的合作。今天，他认为这种形势已经完全起了变化，德国人民并没有这种复仇情绪，现在除了来自东方的威胁外，德国不再对法国构成威胁了，法国人的恐惧也不复存在。法德紧张关系的消除，会有助于两国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有效和亲密的合作。

戴高乐接着说，法国对其他国家并不抱幻想，无论是苏联、美国还是英国。“对法国来说，欧洲只可能有一个伙伴，甚至是理想的伙伴，这就是德国，今天的德国。这是一个历史的奇迹，”但未尝不是事实。在我还执政时，

在德国有人曾谈到了我，说我对德国执行了一条傲慢的、强权的和复仇的政策。我可以向您提供反证。在战争末期，我不知道这个德国将走怎样的道路。在1944年和1945年，我不得不在德国可能作出的愤怒反应面前保护我的人民。我希望德国永远不再掌握进攻法国的手段，但我不希望用敌对手段达到这一点。关于这一方面，您也许记得，我早在战争期间就已声明，欧洲必须演变，但没有德国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两国除了共同走一条路之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这条道路是极其艰难的。我们这里存在着某些妨碍走这条共同道路的东西，你们那里也是这样。你们那里领土分裂。俄国人占领了你们一部分地区；我们在非洲、在马达加斯加、在太平洋、在美洲岛屿，甚至于在美洲新承担的责任和新负的广泛任务，妨碍着法国走这条共同道路。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们的一切利益只限于欧洲。……我们必须把和平扩大到东方……我们必须合作，而不要成为美国的工具。”

戴高乐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方才停顿下来，阿登纳仔细地听着戴高乐的每一句话，他感到每一句话都说出了他心里想要说的。阿登纳激动得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不时爬上微笑，他频频点头。

阿登纳向戴高乐表示，他完全同意戴高乐的说法，这正是他所要追求的目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存在终究是一个事实，这就是欧洲必须团结一致，法德必须加强合作的原因。

阿登纳进一步说，法国和德国必须进入一个经常对话的时代。这种对话不能单限于一些个别事件的磋商，而是需要对国际问题保持非常紧密的、经常性的和持久的接触。戴高乐肯定了他的这个建议，说他正准备这样做，这关系到发展整个欧洲或失去整个欧洲的问题。戴高乐列举了一些能够进行经常协调的国际问题：如裁军、对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政策、在铁幕两边加强经济合作、着手共同研制武器，以及在对待英国为干扰欧洲共同市场而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等。阿登纳对前面几项均表示同意，但他不同意戴高乐说英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就是要消灭共同市场的见解。

他们还就北约问题交换了看法。阿登纳对北约的现状感到不满意，他认为北约长期以来受到美国的忽视，而这个组织本身有待改善和加强。戴高乐肯定他说，对北约事实上也不可能满意，因为北约组织中没有政治上的统一。一旦出了问题，譬如在近东或金门岛出了问题，就不可能指望北约拿出一个共同的政策。戴高乐相当尖锐他说，就目前情形看，在北约组织内部充其量只能是分分武器而已。

戴高乐接着说：“北约只有当美国与欧洲紧密结合在一起时才有可能统一。而目前还不存在这条纽带，除非发生战争。我祝愿欧洲自成一体，因此还是让我们从我们两国的紧密接触做起吧！”

阿登纳同意戴高乐的意见，要加强欧洲的力量。他还认为应该尽一切力量把北约联盟保持住，欧洲国家为此更需要同美国加强团结。“倘若美国脱离欧洲，那将是极不幸的，”阿登纳不无感慨他说。

会谈进行了四个多小时，他们有时在戴高乐的书房中，有时一起走在花园的小径上。戴高乐把阿登纳带到了一个小坡上，从这里可以远眺园外景色。戴高乐伸开双臂，陶醉地说：您看，不管您的目光能看多远，在这幽静的地方您看不到一个居民点，这就是大自然的景色。多么的空旷！”阿登纳深以为然。他说：“是的，如果没有公务的一切，我也会被吸引到这里来的。”

他发现他们在对大自然的热爱上也找到了如此相似的感觉。

晚餐时，代表团的成员都回到了科隆贝双教堂。戴高乐夫人准备了简朴而隆重的晚餐招待客人。餐后，代表团又回到肖蒙，阿登纳则留在戴高乐寓所过夜，以便两人继续交换意见。

所有的担心都解除了，阿登纳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和戴高乐取得一致意见，阿登纳相信即使出现分歧，他们也是可以协调的。阿登纳确信这次会晤之后能带来法德关系一个质的飞跃。他似乎为戴高乐本人的魅力和他的理想激情所迷醉。

第二天清晨，在用过早点之后，阿登纳向戴高乐辞行，离开科隆贝。归途中路经阿尔萨斯—洛林和上马恩省时，阿登纳受到了法国人的热情欢迎。喜悦的心情和刚刚确立起的对戴高乐及其法德友好的信念交织在一起，使阿登纳感到这次科隆贝之行幸运而又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回到波恩，阿登纳着手拟发了一份公报，公报采纳了同戴高乐相同的口径：

“联邦总理和戴高乐将军在他们会谈结束之后，发表声明如下：

我们两人对许多事情进行了长时间的、坦率的和诚挚的会谈。我们两人深信，我们这次会晤的重要性和意义。我们认为，必须一劳永逸地消除以往的敌意，法、德两国人民必须和睦相处，并肩工作。

我们确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的合作是欧洲一切组织建设的基础。同时这种合作有助于加强大西洋联盟，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认为，这种合作必须加以组织，与此同时，这种合作必须包括与我们两国紧密结合的其他西欧国家。我们希望，这种合作在重大的世界政治问题上有利于各国人民，并希望这种合作扩大到尽可能多的欧洲国家。”

戴高乐比阿登纳小十九岁，在科隆贝会晤时戴高乐六十七岁，阿登纳八十二岁。两人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别，一个骄傲、清高，一个严肃、刻板；一个充满了法兰西民族浪漫的理想主义，另一个则是德意志精明的现实主义者。人们为他们这种迟到的友谊感到迷惑。也许这就是政治家之间惺惺相惜的一种戳契！在科隆贝的会谈中，戴高乐与阿登纳曾有一次谈到年龄的问题。戴高乐说，按年龄他比阿登纳年轻许多，而实际看上去阿登纳的体质和精神都比他为好。阿登纳告诉戴高乐，这是长期以来紧张的政治工作所致。政治工作能给人新的力量，将军可以很快感受到这一点。战后他刚开始工作时，起先也以为胜任不了工作，而事实却正好相反；一旦戴高乐从事现在的工作，就能立刻从工作中找到新的力量。

事后证明的确如此。戴高乐胜任他的工作直到1969年4月被迫辞职。阿登纳说得一点不错，政治对他们俩来说是生命的源泉，在科隆贝第一次见面时，双方都感觉到了。

阿登纳和戴高乐后来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两人在科隆贝结下的友谊对他们今后政策的影响。阿登纳在回忆录里说，这次“会见是确证了我九年来始

终不渝地执行政策”。戴高乐则不无感叹地回忆道：“从那以后直到 1962 年，康纳德·阿登纳和我互相之间写信约 40 次，我们互相之见面 15 次，或在巴黎、马利或朗布依埃，或在波恩和巴登—巴登。我们用了 100 多个小时进行会谈。或是秘密的、或是有我们的部长在场、或有我们的家属陪同……后来直到我的杰出的朋友去世之前，我们的关系是以同一步伐、同样的热情向前迈进的。总的说来，我们之间所说、所写、所表达的一切都不过是使 1958 年缔结的友好协定适应事态的发展。”

事实如此，法德关系因为这次历史性的会面而全面改写，阿登纳和戴高乐一起把法德友好推向了一个历史高潮。

法德友好条约

我坚信，这项条约将被看作是战后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条约之一而载入史册。

我坚信，它将有损于两国人民，有利于欧洲，有利于世界和平。

——1963年1月23日签定德法条约时
联邦总理阿登纳发表的电视讲话

从科隆贝双教堂离开的那一刻，阿登纳便雄心勃勃、决心把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重心重新拖回以法德和解为中心的欧洲建设轨道上来。

前面有述，阿登纳一直把西德加入西欧一体化作为实现联邦德国对外的政策目标的必由之路，而在西欧联合推进中，阿登纳又把德法关系作为其政策的重点，但是，自从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失败以后，阿登纳感到自己对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期望值太高，第四共和国本身政局的动荡也妨碍了它的政治家们致力于欧洲联合的决心。此后，阿登纳加强了同美国的关系，强调欧美联盟的重要意义。他同杜勒斯之间曾就国际问题看法达成广泛一致，联邦德国的许多要求也多通过美国表达出来。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国在赫鲁晓夫频频发出的“和平攻势”之下，政策逐步在转化，艾森豪威尔越来越倾向于同苏联缓和。美国的缓和论调与阿登纳政策所要求的对苏强硬立场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显露。阿登纳无法阻止美国想要固定德国分裂来同苏联搞缓和的趋向，不得不寻求新的外交政策的支点，以减少联邦德国对美国政策的依赖。正是在这时候，戴高乐向他发出了重建法德友好合作关系的信号。阿登纳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法德合作与欧洲联合又再度被强调。

然而，尽管戴高乐结束了第四共和国政治混乱的局面，法国人也不再感到德国迫切的威胁，但是，新时期国际关系的复杂化仍然使得这种合作进行起来困难重重。在科隆贝双教堂，阿登纳和戴高乐都认为双方合作的基础是“不能永远指望美国”、“必须设法使欧洲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是，德法的利益所在与阿登纳和戴高乐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看法的区别，为两人理想中合作关系的实现设置了重重障碍。阿登纳和戴高乐分别想为德国和法国在大西洋联盟中找到一个有利的最佳位置，这个位置除了两人认为得让各自国家立足于联合强大的欧洲之外，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更多共同点。

从对美国的认识来看，阿登纳和戴高乐都对美国现行政策感到不满，但是，这种不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不同。阿登纳只是批评美国在东西方对抗中表现得越来越软弱，以致让俄国人利用了时机，在东欧站稳了脚根，他不想损害德美关系；而戴高乐却想从根本上摆脱美国控制，建立一个以法国为领导的独立欧洲，组成“第三种力量”，同美苏相抗。阿登纳抱怨北约组织的衰落，指责美国没有利用它“道义上的领导权”巩固西方联盟，防止联盟分裂；而戴高乐则拒绝美国以一个领导人姿态凌驾于法国之上，要求法国与美国平起平坐。当美国拒绝了他要在北约起大国作用的要求时，戴高乐断然采取逐步背离北约军事一体化的行动，并致力于发展法国独立的核武装力量。显然，阿登纳是从维护和加强西方联盟的统一与合作这一大前提出来看待欧洲同美国的关系的，而戴高乐却是要以和美国闹独立来加强法兰西的国际地位。两者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完全不同。

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阿登纳与戴高乐也有截然不同的认识。阿登纳一生都在警告西方防止俄国进攻、谨防俄国分裂西方的阴谋，他对俄国人的任何举动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东西方的分界线在他头脑里泾渭分明；戴高乐虽然也谴责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却认为俄国人是“误入歧途的欧洲兄弟”，他对欧洲的设想也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从这一点以及重振法兰西的理想宏图出发，戴高乐一直没有放弃利用传统的法苏“特殊关系”来制衡美国的想法。而阿登纳却最担心美国同苏联搞“越顶外交”牺牲德国利益。阿登纳一生都不愿对俄国作出丝毫的让步。

即使是在对两人共同立足的西欧联合运动问题，阿登纳与戴高乐也有不同看法。“一体化”顾名思义，是要让参加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国家主权，将其让渡给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掌握。阿登纳在联邦德国恢复主权的那一刻起，就表示“随时准备把它（主权）纳入一个欧洲各国人民的超国家的共同体中”，但戴高乐从根本上反对超国家，不愿意看到他所珍视的“伟大的法兰西”国家主权在任何意义上被减弱。成为“欧洲人”的“德国人”将能抹去人们对德国挑动战争的记忆，在“欧洲”中的“德国”也意味着国家地位的提升；而将法国纳入欧洲则意味着法兰西伟大的被抹杀以及法国从原来超越欧洲地位的下降。有鉴于此，阿登纳呼吁超国家的联合——“欧洲合众国”；而戴高乐则只主张“多祖国的欧洲”或“各国家的欧洲”。

联邦总理与法兰西总统之间的分歧曾以两人含蓄的对话表现出来。

阿登纳说，“我不理解你，你要欧洲以宏亮的声音说话，却没有躯体。”

戴高乐说：“我不理解你，你要欧洲有躯体，却容许它装上美国灵魂。”

尽管如此，戴高乐那“富有使命般浪漫色彩的民族主义”使阿登纳惶恐不安，戴高乐那种“对欧洲近乎宗教般狂热的信仰”又令阿登纳着迷。人们对阿登纳在这时把这么多的希望寄托在分歧重重的法德关系上感到非常不解，许多人认为处于如此危险国际关系中的联邦德国应更侧重于修复它同美国的关系。这时候在联邦政府内部产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欧洲派”和“大西洋派”外交政策的辩论。“大西洋派”着眼于西德的安全利益，倾向于对美而不是对法作出让步、改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有联邦经济部长艾哈德以及后来的外交部长盖尔哈特·施罗德等人。但欧洲派的阿登纳则认为法德关系是德国立足欧洲最重要的保证，他下决心要与戴高乐走在一起。年事已高的阿登纳越来越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法德和解以一种持久的、不因人而异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即使在他下台之后，法德友好政策仍能一如既往地得到贯彻。

促进法德关系走向密切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戴高乐提出了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倡议。这符合阿登纳长期以来的梦想。煤钢联营和共同市场成立之时，阿登纳一直坚持要把建立欧洲政治联盟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1960年5月，美苏首脑会谈由于美国“U-2飞机事件”而宣告破产后，夏天，戴高乐再次提出讨论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问题。阿登纳积极响应了这一建议。7月初，戴高乐致信阿登纳，建议举行法德首脑会晤。

1960年7月底，阿登纳与戴高乐的会晤在朗布依埃举行，为期两天，戴高乐提议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新政治组织的计划。阿登纳颇为兴奋。戴高乐特别提出应建立法德之间有组织的合作，在这一点上阿登纳也深有同感。两人一致认为，为了实现欧洲政治联盟，法德两国应进一步协调政策。双方确定：法德首脑会晤应当三个月举行一次，部长们也应经常会晤接触，以便在

有关两国的一切重大议题上确定共同的态度。

朗布依埃会晤推动了六国共建欧洲政治联盟的决心。在法德共同倡议之下，1961年2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巴黎召开。与会六国首脑原则上同意就建立欧洲政治联盟进行讨论。会议决定设立一个由六国政府代表组成的研究委员会，为下届首脑会议拟订出一个有关建立政治合作组织的具体建议。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由法国大使富歇担任，这个委员会而因此被称为“富歇委员会”。

同年7月18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及政府首脑再次聚会波恩，商议有关发展欧洲政治合作问题。六国一致决定举行定期的政治协商，“以便交流观点、协调政策、统一认识，从而促进欧洲的政治统一及加强大西洋联盟”。六国发表了“波恩声明”，并委托富歇委员会为欧洲政治联盟拟定法规草案。

富歇委员会的工作进展由于各国之间意见分歧很大并不顺利。波恩声明的发表也并不意味六国之间分歧的弥合。戴高乐提出的政治联盟与联邦主义的“一体化”并非一码事。法国希望的是主权国家之间实行联合的原则，比利时、荷兰等国却希望借此推动较大进度的“一体化”。在1961年2月的巴黎首脑会议上，荷兰外交大臣约翰夫·伦斯就已提出一个具有“超国家”性质、有英国参加的欧洲。而在1962年11月，富歇委员会提出的一份“关于建立欧洲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即第一个“富歇计划”，却基本上反映出戴高乐主权国联合的观点。双方争执不下。阿登纳站在四国一边，认为这一草案反映出戴高乐民族国家的观点，它在某些方面甚至背离了“波恩声明”。五国一起反对法国削弱“超国家”原则。富歇委员会只好继续工作修改草案。

1962年1月，第二个富歇计划提出。这只是第一个富歇计划的改稿，基本精神不变。有些地方甚至还不如原来的草案，因为法国想用欧洲政治联盟来削弱北约组织和现有共同体机构的意图变得更加明显。第二个富歇计划遭到五国的一致反对。富歇委员会的谈判工作陷入死胡同。

为扭转这种僵持局面，1962年2月15日阿登纳和戴高乐在巴登—巴登会晤。戴高乐同意要维护共同体本身的存在和作用。阿登纳也同意了戴高乐认为法德两国应该协调一致的要求。这样由于法德率先协调立场，六国之间频繁的会晤和磋商又开始了。

新的问题是英国是否应加入共同体。荷兰、比利时等国提出这个要求时本身也是矛盾的：它们要求欧洲是“超国家”的，因而反对戴高乐，而在此时，它们却希望把抵制“超国家”原则的英国拉进来以对抗法德联合。从根本上来说，荷兰、比利时担心的是法德联合将会支配未来的欧洲政治联盟。强调超国家性和拉英国成了荷比反对“戴高乐欧洲”的手段。戴高乐的确设想法德共同支配的欧洲，而荷比正是担心这种局面，他们想要以英国加入来平衡法德可能产生的霸权。戴高乐反对英国加入共同体。阿登纳的表态是既要支持法国，又要设法冲淡富歇计划中排斥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色彩，因为法英两国对联邦德国来说都很重要，联邦德国只能在法国、美英和共同体其他成员之间协调立场。因此，当后来荷比等国把英国加入共同市场问题作为继续进行谈判和准备放弃欧洲政治联盟超国家成份的先决条件时，各方矛盾尖锐爆发，直至不可调和的地步。1962年4月17日，六国外长谈判失败，各自回家，欧洲政治共同体成了共同的失望。戴高乐与阿登纳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尝试也终于告吹。

欧洲政治联盟尝试的失败反而成为法德两国关系进一步密切的契机。为

了挽回这种失败的不利影响，阿登纳与戴高乐开始了频繁的互访和双方会谈，1962年7月2日至8日，阿登纳到法国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此行受到法国人的热烈欢迎，也受到戴高乐的高度重视。两人再度就共同关心和进一步密切法德关系广泛交换了意见，都希望在欧洲政治联盟失败的情况下，以密切法德关系来作些弥补。阿登纳邀请戴高乐回访联邦德国。

这年秋天，戴高乐将军对联邦德国进行了轰动一时的访问。德国人用了高度的热情来欢迎这位在二战时期同德国打过仗、现在又全力推动法德友好的法国总统。这两次访问给公众一个印象，那就是法德间的友好已经是个完美的事实。阿登纳在法国和戴高乐在德国受到的接待都是空前的。戴高乐乘着“德国号”汽艇从波恩出发沿莱茵河到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阿登纳陪着他，两人的亲密与德国人的欢呼使报界对这次访问大加赞美。不尽人意的国际关系使阿登纳和戴高乐越发珍惜这得之不易的一切。在为期6天的会谈中，阿登纳进一步向戴高乐明确表示德法关系是“欧洲一切发展的支柱”，尤其在计划建立的欧洲政治联盟失败以后，深化德法关系对维护“自由欧洲”有重大意义。阿登纳恳切地向戴高乐提出了签定友好条约而使法德友好关系固定下来的建议。

阿登纳告诉戴高乐，他一直在考虑调整法德关系。来自东方的威胁越大，法德寻求一项共同的政策就越加必要。从眼前欧洲来看，意大利政治局势十分严重，可能还会出现更大程度的左倾。意大利不稳定；比利时倾向中立；荷兰无所适从。欧洲面临政治分裂的危险。而这正是苏联所希望的。在欧洲政治联盟建立处于这样风雨摇摆之中的时候，法德的职责就应是继续前进，这样别的国家才会跟上来。至于英国，则只能安心等待。

戴高乐问阿登纳，在不放弃六国观点和不排斥英国加入的条件下，他是怎样来设想这个法德之间的友好协定的呢？

阿登纳说，这项协定签定的主要目的是法德两国能够一起办一些别的国家办不到的实际工作。他接着举出一些例子，如在柏林问题、东西方关系问题、防务问题、非洲问题及发展政策等等问题上法德可以有更好的外交合作，从而使两国的政策有较有份量的表决权。阿登纳重点指出了防务问题。他说，法国和德国两个国家无疑地有一种独特的、双方共同需要的防务，因为两国直接受到来自东方的威胁，远比英国或美国更为直接。虽然两国应该依靠大西洋联盟，但是由于这样特殊的防务地位，两国在联盟内部关于军备计划和武装力量的合作方面，有着自己的要求。这种合作应该组织起来。

戴高乐完全赞同阿登纳的这一观点。

阿登纳接着说，这个协定可以保证法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真正协调一致。如果愿意的话，法德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可以发展得更好。例如组织青年人大会师，让法国青年到德国，德国青年到法国，促进他们的融合，加深他们间的了解。两国教育系统也可以互为沟通，大学间彼此承认学位等等。

阿登纳向戴高乐强调，德国打算在各个方面同法国真正统一协调起来。戴高乐补充说，加强两国的政治合作才应是首要问题。这一点阿登纳当然有同感，他一向把政治联盟作为最高目标。而最关键还应该是行动，分手之前，戴高乐再次提起这个问题，他说他回国之后将尽快把两人之间口头协定的草案寄送给阿登纳。然后就可以委托外长们综合拟定有关合作条款。

这时，阿登纳已八十六岁，他对法德两国关系以条约固定有一种十分急

迫的心情。联邦德国内部对他与美国的疏远而与桀骜不驯、颇有独立精神的戴高乐关系密切颇有微词。同时，对阿登纳以“总理民主”独揽大权不满的人也越来越多。阿登纳政策在国内也面临很大的阻力。过去，阿登纳曾悄悄地对他的亲朋好友说：“我控制着这个政府的70%。”现在，他甚至难以挑选一个中意的人做他的继承人。基民盟议会党团推举了具有浓厚“大西洋色彩”政治观点的经济部长艾哈德。阿登纳对艾哈德的评价是：管经济行，政治上十分幼稚。他不能设想在没有作好具体规划之前，将联邦政府总理重任交给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人。阿登纳怀着急切心情争取以条约形式固定法德关系可以说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要保证在他去职后，欧洲联合政策能得以继续推进，因为他认为这是使联邦德国在未来欧洲，自由欧洲在未来世界的发展中取得它们政治上和军事上应有地位的唯一、并且是最有效的途径；再是，也可以借助于此，使联邦德国保证它的实力地位，以法德联合的形式在美国面前强调德国利益，从而可避免美国同苏联搞“越顶外交”而使联邦德国利益蒙受损失。阿登纳将它看成了欧洲政策继续下去的最后保证。

1963年1月22日，阿登纳终于和戴高乐一起在巴黎签署了法德友好合作条约。这个条约规定法德两国政府首脑一年定期会晤两次，部长们每三个月会晤一次，以便在外交、防务和文化等方面合作发展。条约还提到法德准备成立一个委员会，促进两国青年之间的交往。同时，条约还规定两国政府在采取任何对外政策上的重要决定之外，都应该相互磋商等等。

1月23日，阿登纳在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之后，发表了一次电视讲话。他对这个条约赋予了极其崇高的意义。他说：

“……法国外交部和联邦共和国外交部对这项条约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极其细致的准备工作。我相信，这项条约的形式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而且因为它考虑到维护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关系。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应该维护这种友谊。

“法国总统戴高乐把签订这项条约称为载入史册的一项事件，我认为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在看到这项条约时，必须清醒地回忆到以往的岁月。四百多年以来，德国和法国之间存在着经常流血战争的紧张局面和争执。请允许我回忆一下，同法国最近的一次战争还过去不久，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是失败者。请允许我也回忆一下，当时德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危险，也就是德国被分裂和肢解的危险。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相互统一起来。因而这项条约和过去同其他国家订立的条约一样，也列入了有关柏林的条款。

“我们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眼前的变迁，这种变迁的一部分已经在两国人民的关系中实现，一部分将通过这项条约来进一步促其实现，事实上，我必须说，这两个民族历史上的进步是多么巨大啊！这两个民族位于欧洲的中心，他们是近邻，他们共同面临着危险的威胁，过去他们的命运也跟世界的命运休戚相关；将来，他们的命运也跟世界的命运休戚相关。现在这两个民族经过探索接近了，这是多么巨大的幸福啊！”

“……要是没有法国和德国的真正和解作为先导，就不会有欧洲；要是没有法国和德国的合作，而能出现我们迄今已经创建

的所有这些欧洲的机构，那是不可思议的。我十分郑重他说，如果现在同法国还存在着战争结束时的那种紧张状态，那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来就不可能享有现在所享有的地位。

我坚信，这项条约将被看作是战后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条约之一而载入史册。

我坚信，它将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欧洲，有利于世界和平！”

法德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正如阿登纳在讲话中所说的，在法德两国关系史上是划时代的。但是，它并没有带来此后德法关系令人鼓舞的发展。在西德国内，很多人不能理解阿登纳签定它的真实意义，条约在联邦共和国内引起很大争议。1963年5月联邦议院在批准条约时给它加上了由社会民主党人、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提出的解释性的序言，序言着重强调大西洋联盟军事一体化、与美国的合作、尊重经济共同体以及共同体接纳英国的必要性。戴高乐本来打算将两国条约作为在美苏间制衡的武器，但附加的序言却抵销了条约在政治上的大半意义。戴高乐对它也不尽满意。在国际上，法德条约还招致各种非议：苏联指责戴高乐是打开了禁锢“德国复仇之神”的瓶塞；欧共体伙伴国批评条约违反了“罗马条约”的精神，在共同体内建立法德特殊关系；美国干脆粗暴地让波恩在法国和美国之间作出抉择。有人说，阿登纳想踩上法、美两支船却不能踏实：有人认为阿登纳成了戴高乐政策的附和者，将联邦德国变成了服务于法国政策的工具。各方的责难一齐涌来，如何协调、处理好这些问题，阿登纳已没有时间和精力了。他只是把这个政策给固定了下来。

他已经是八十七岁了。

第十章 危机

柏林墙筑起来了

柏林墙，淋漓尽致地把康纳德·阿登纳的德国政策的界限，但也把西方国家德国政策的界限勾划出来了。

——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

1957年初，萨尔终于回归联邦德国。春天，阿登纳又同西欧五国一起签定了罗马条约。这一切使得阿登纳的执政生涯达到辉煌顶峰。回顾联邦德国建国以来的历程，每一时期都留下了阿登纳历史足迹：政治上，西德这时已经不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且有了相当程度的行动自由和国际地位；军事上，西德取得了防务主权，并在此范围内建立起了联邦国防军，成了大西洋联盟内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经济上，西德的发展被人们称为“经济奇迹”，它从无到有创造了一切，并且越来越成为西方最稳定的国家之一。1957年秋天的联邦议院第三次大选是这一切成就最有力的说明。阿登纳所在的基督教联盟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胜利，赢得绝对多数选民的支持，从而组成了一党执掌的政府。阿登纳的个人威望也达到空前。西方各大报纸竞相报道，盛赞阿登纳缔造了一个新德国。

但这样一个“鼎盛时期”却危机四伏。1958年下半年，国际形势突变，一直伴随阿登纳成功的幸运星辰开始陨落。

1958年7月，首先是伊拉克政变引发了又一次的近东危机。两个月之后，远东的金门、马祖危机使东西方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卷入了台湾与中国的冲突。莫斯科的语调也变得强硬，东西双方都加强了戒备。在德国，由于东德关闭了与西德之间的私人旅行通道，事态也引人注目。东德在这一年所发的旅行签证比1957年减少了80%以上。赫鲁晓夫在他多次的讲话中，也以越来越刺耳的语气攻击联邦德国。

1958年9月22日，赫鲁晓夫接见了莫斯科《真理报》记者，他用极为强硬兼威胁恐吓利诱的话攻击了阿登纳和法国新领导人戴高乐刚刚发表的科隆贝双教堂公报。赫鲁晓夫说：

“……法国统治阶层寻找西德军国主义分子的共同语言和外交政策的共同舞台的种种企图引人注目了。这些阶层显然是想得到欧洲的一个极端反动的政权，譬如说西德政权的支持，因而也就是想牺牲法国民族的切身利益，在东方边界建立一个愈来愈强大的军国主义势力……”

可是，现在阿登纳总理到达了法国。……这样，在慕尼黑事件之后二十年，又重新试图把法国绑在德国战车的绳索上，并唆使法国成为反对东方的远征军。要是谁当真指望在欧洲东部进行的某种冒险还能取得胜利，那他一定是丧失了任何现实感。

也不得不指出的是，最近几天，在巴黎狂热地掀起了一股反苏热潮。这股热潮是在法国官方的知悉和赞同下，完全仿照美国的众所周知的方式推动的。某些报纸更是把苏联说成‘头号敌

人’。法国老一辈的人还能记得，二战以前是怎样同德国军国主义分子进行这种调情的。但是，这一切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当法国当权者们深深地拜倒在奴役法国的人们脚下的时候，苏联人民却为了帮助法国摆脱这种奴役而不得不洒出自己的鲜血。

目前，在法国却有人鼓吹，戴高乐和阿登纳的会谈永远结束了法德矛盾。法国反动阶层同西德复仇主义煽动分子的友谊不是导致和平，而是导致战争。推行这种企图不仅违背法国的民族利益，而且也违背德国人民以及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

赫鲁晓夫的这次讲话是他准备采取行动的先声。10月14日，苏联大使斯米尔诺夫受本国政府的委托，带着一份备忘录到绍姆堡宫前来拜望阿登纳。备忘录的内容是所谓苏联政府对联邦政府对苏联不友好行为的责难，其中包括苏联方面掌握的联邦国防军最高统帅豪辛格将军、国防部长施特劳斯等人声称要使联邦国防军继承前德国国防军传统，以及联邦德国从事反苏文化宣传方面的内容。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已作好行动的准备。10月27日，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发表了一项声明，称“……整个柏林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上。整个柏林都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范围……”。乌布利希显然是受赫鲁晓夫的摆布。紧接着，赫鲁晓夫宣布同意这一立场。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体育宫发表的演说更进了一步。赫鲁晓夫挥舞拳头说，“西柏林已经变成了一个毒瘤，会有导致十分不良后果的危险”，因此，“我们决心动外科手术，也就是说，要消除西柏林的占领状态”。他宣布，四国占领柏林的状况已经过时，苏联将不再受波茨坦协定的约束，因为其他三国也没有履行这一协定。修订协定是必要的。苏联政府将把它的柏林职权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

赫鲁晓夫是准备要拿柏林问题开刀了。1958年11月27日，苏联政府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指出西方三国在西柏林的占领制度已经没有法律基础。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西方三国将它们在西柏林的驻军六个月内全部撤走，把西柏林变成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并威胁说，如果届时仍然未能就此与西方国家达成协议，苏联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单独缔结协定，让它“实施其在陆上、水上以及天空的主权”。当天，阿登纳也收到赫鲁晓夫发来的内容相同的照会。

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使世界政治局势骤然紧张。时隔十年，苏联又一次利用柏林这个敏感的东西方利益的交叉点，制造出紧张的气氛。

东西柏林比东西德国更能体现东西方冷战的尖锐气氛，它将东西方冷战对抗浓缩到一个城市的空间之内。

柏林问题产生的法律基础最早是1944年9月12日美英苏三国在伦敦发布的“关于德国占领区和管制大柏林的议定书”。议定书中规定：除在德国建立各大国的占领区外，还要专门建立一个由所有大国共同参与管制的柏林占领区。柏林占领区的管理权由参与管制国城防司令组成的盟军司令部统一行使。盟军司令部隶属于盟国对德管制的最高权力机构——盟国管制委员会。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根据这些协议，美英法苏四大大国

接管了德国最高行政权力，并建立了对柏林的管制机构。1945年7月1日，四国根据战时达成的占领区协议开始进驻各自占领区，苏联让出西柏林，让西方三国进驻。

1948年，苏联对英美合并双占区作出强烈反应，当6月18日，西方宣布在西占区范围内实行币制改革时，苏联即于6月24日起宣布对西柏林实行全面封锁。这是第一次柏林危机。苏联对柏林的封锁长达一年，西方只能依靠三条“空中走廊”保持同西柏林的联系。在此期间，苏联完成了在苏占区和东欧建立人民民主政体和社会制度的基本过程。直到1949年5月12日，当西方同意苏联就重开四国外长会议解决德国问题的建议后，苏联才解除了对柏林的封锁。

从那以后，西柏林的存在成了苏联的一块心病。西方国家日益将西柏林作为显示西方“自由”、“平等”及社会福利的展览橱窗。在这里，西方自由经济国家的高生活水平与共产党国家的相对贫困形成鲜明的对比，它诱发了许多东德居民对西方自由世界的向往。尤其在西德经济奇迹显示之后，西柏林成了东德人逃向西方的收容所和中转站。从1952年到1961年间，离开东德到西方寻求避难的人共达2,245,000人。大量的逃离使东德人口由1949年的18,292,000人下降到1959年的17,298,000人。移民中大部分是正当工作年龄的人，有许多能工巧匠。这种人口流失对东德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由于冷战对峙，东西柏林各有一套行政制度和政治制度。东柏林是东德国家政府所在地，人们可以从东德任何地方毫无困难地到达东柏林。东西柏林又是同一个城市，人们又能通过东西柏林间的十九个通道路口到达西柏林。在西柏林，法航、泛美和英欧航空公司都能自由通航，他们可以从这里毫无困难地转飞西方国家，尤其是联邦德国。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对此极为恼火，苏联对此也极为不满。赫鲁晓夫早有意图想拔除西柏林这个“毒瘤”。

此次赫鲁晓夫重提柏林问题令西方各国感到十分突然。阿登纳开始认为赫鲁晓夫只是虚张声势。因为在同一时候，美、英、苏三国代表在日内瓦进行了一项旨在停止核试验协定的谈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谈判的结果作了肯定。阿登纳断定赫鲁晓夫本人并非想要战争，也并非真正想以柏林问题重新挑起东西方冲突，之所以如此，是他面临着国内即将于1959年1月27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的巨大压力。

设身处地，阿登纳感到赫鲁晓夫在内外政策上面临相当严峻的形势。首先，联邦德国同戴高乐法国的友好戳着了赫鲁晓夫的痛处。这一点在9月22日赫鲁晓夫接见《真理报》记者谈话时反映了出来。再者，11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的初选中法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11月30日第二轮选举的结果又使法共议席从1956年上届选举的145席降到了仅10席，共产党几乎被赶出法国国民议会。法共一直是西方国家最强大的共产党势力，法共这次失败，对赫鲁晓夫来说滋味可不好受，共产党在西欧一无成果会让他在苏共二十大上非常难堪。此外，尽管赫鲁晓夫在1958年2月粉碎了马林科夫、布尔加林和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但是赫鲁晓夫在国内的地位并不巩固；苏联人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与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也将使赫鲁晓夫面临困难；同时他也不得不考虑中国日益发展壮大对苏联造成的威胁。阿登纳认为，赫鲁晓夫是个十分聪明的人，在这么多危险存在的情况下，重提柏林问题，无疑最能起到转移视线的作用。赫鲁晓夫可以充分利用他做导演和演员的天

才，将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引向他的表演。或许，阿登纳这样想，赫鲁晓夫可以神圣地借机大做广告，让苏联人感到好像全世界的命运全靠着他们，靠着他们额上的皱纹，靠着他们的思想。

基于这些，阿登纳认为西方国家用不着在苏共二十一大以前采取重大行动，赫鲁晓夫决不敢封闭东西对话的渠道，东西方仍然存在着通过谈判取得澄清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阿登纳不相信六个月期限的最后通牒就是赫鲁晓夫的最后决定。

并非所有的西方政治家都这么想，有许多人认为，既然赫鲁晓夫敢于将柏林问题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来，那他一定会有所准备。最后通牒大大加深了西方国家对国际局势的危机感。如果苏联真的在六个月以后单独和东德签订和约，将西柏林的交通要道交给东德，那么西方国家要么不得不为了柏林通道问题和东德进行谈判——这样做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东德；要么不得使用武力保卫交通——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引起原子战争的危险，因为苏联答应给东德进行军事援助，不能设想战争有可能会升级。前一种做法阿登纳绝不会答应，因为盟国曾经承诺过联邦德国的“单独代表权”。如果盟国向苏联作出这样的让步，可以想象联邦德国将以退出大西洋联盟相威胁。后一种做法的危险则令许多人不寒而栗。西方国家事实上存在着两种态度，一是以英国麦克米伦为首，倾向于向苏联作出一些让步，以使赫鲁晓夫最后通牒的态度缓和下来；再是阿登纳力主，认为必须坚持下去，决不也没有必要在西柏林问题上作任何妥协。戴高乐对阿登纳的友情在这时候显露出来了，法国坚决站在联邦德国一边，认为不应该“在最后通牒的形势下举行谈判”。对在这样关键的时候戴高乐挺身而出，阿登纳感动万分。

西方联盟分成两派，互不相让，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态度很关键。美国显然很难下决心是否应该为了保卫西柏林一小块遥远的土地而打一场原子大战，牺牲十亿人，因此，美国显得很犹豫，摩棱两可。在苏联递交最后通牒的前一天，11月26日，杜勒斯在华盛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当有人问美国是否可能与作为苏联代理人的民主德国代表进行谈判时，杜勒斯的表示是“是的，可以”，但这种谈判并不表示承认民主德国，而苏联也不能因此而推卸所负有的解决德国和柏林问题的责任。阿登纳对杜勒斯的“但是”很担心。幸亏形势发展有如他的准确判断，苏联的“最后通牒”并非真正最后通牒的意义。1959年1月初，赫鲁晓夫派米高扬到华盛顿。米高扬对杜勒斯解释，赫鲁晓夫提出的6个月期限只具有指示性质，实际上并不是最后通牒。米高扬的解释让阿登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尽管如此，苏联的态度依旧阴晴不定。在派米高扬去美国作解释之后，赫鲁晓夫又采取了新的行动。1月10日，苏联政府照会美、英、法三国及二战中对德作战的所有国家，并递交了一份对德和约草案。阿登纳政府也收到了。赫鲁晓夫的草案把德国一分为三，强调德国除了按目前情况分成两部分外，柏林还将成为德国的第三部分。整个德国将实现中立化并脱离西方，接受美苏两国监督，监督不仅扩大到军事方面，也包括不能损害最惠待遇的条款。这意味着德国将脱离欧洲，并取消欧洲机构。当然，西方拒绝了苏联的对德和约草案。阿登纳立即指示联邦国外长勃伦塔诺向西德电视台记者发了一项声明，作出明确表态：“德国人民和整个自由世界对这些要求只能作出这种答复，一个明确的‘不’字”。

这期间有几件事令阿登纳感到恼人并在他看来对柏林问题的解决明显不

利。头一件事是 1959 年 2 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跑到莫斯科去探听虚实。当 2 月 3 日英国驻波恩大使克里斯托弗·斯蒂文来通知他这个消息时，阿登纳第一个反应是这次访问将在整个俄国被看成是赫鲁晓夫的一个胜利，苏联会认为这是西方不团结的一个标志，“所付的代价太大了”，阿登纳对杜勒斯说。第二件事是他的老朋友、以与俄国人打交道不妥协著称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 2 月 7、8 两日访问波恩回国后，被确诊患了癌症。杜勒斯把他的工作移交给了助手克里斯瑟·赫脱，后者在与俄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方面远不如杜勒斯丰富。第三件事是 1959 年 3 月 15 日法国来了一个急转弯的通知，说法国将把它的地中海舰队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率范围中撤出，以便执行法国在地中海领域的特殊任务。尽管阿登纳从应改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角度理解戴高乐并给以支持，但牵一发而动全身，法国在这时同美国闹独立无疑是对西方联盟阵线的损害，这些情况加在一起足以使西方在协调对苏立场时面临巨大困难。

1959 年 5 月，由美国代理国务卿赫脱提议召开日内瓦外长会议以解决柏林问题。参加者是苏联的葛罗米柯、法国的顾夫·德姆维尔、美国的赫脱以及英国的塞尔温·劳埃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期间，5 月 24 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去世，会议因此而中断，四国外长赶到华盛顿前去参加杜勒斯葬礼。阿登纳也撂下手中公务赶到华盛顿。

或许因为杜勒斯的死使西方表现出团结一致，日内瓦外长会议上西方阵营的论点与苏联针锋相对：西方国家提议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统一，苏联则要求两个德国以两个国家的身份自己谈判统一问题。虽然会议没有从实质上取得任何成就，但西方看起来在形式上取得很大成功。因为赫鲁晓夫仿佛忘了六个月的期限，并且在 6 月 19 日的声明里也忘记了要与东德签订和约的问题。之后，美国政府邀请赫鲁晓夫访美，赫鲁晓夫接受，笼罩在柏林上空的紧张空气自动消除，危机似乎淡化，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 1959 年 9 月的赫鲁晓夫访美之行。

在 9 月对华盛顿访问时，赫鲁晓夫又是另一番表演，冷战阴云一扫而空，他又换上了一副要和平共处的和蔼面孔。在白宫宴会上祝酒时，赫鲁晓夫意气风发，大谈和平共处，他满面春风，频频举杯，并且很认真他说，“我们认为我们的制度最好，你们认为你们的制度最好；当然，我们不会把这个争论变为公开的战争……如果我们发生争吵，不但我们的国家要受到巨大的损失，所有的国家都要同归于尽。”看上去他充满理智，令人不禁怀疑东西方在柏林紧张关系一触即发的真实性。

美国政府安排赫鲁晓夫到各州去看一看。在旅途中，赫鲁晓夫充分发挥了他即兴表演的天才。顷刻之间他能从任意开玩笑转到进行威胁，当然也能从威胁、尖锐批判转到热情的赞美。美国舆论界被他牵着鼻子跑。在匹兹堡参观了炼钢厂以后，他看起来是不无惊讶，说：“我是来看看资本主义的奴隶是怎样生活的。哎呀，我不得不说，他们生活得不错。”反过来，他又能大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回到莫斯科之后，赫鲁晓夫口气空前温和，他不仅声明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一位伟大的总统，而且还高声赞美“美苏友谊万岁！”令人们完全忘了几个月之前的柏林最后通牒。赫鲁晓夫俨然是和平卫士、缓和推动者的形象。

这只是一个插曲，如果不是因为出了一架美国 U—2 间谍飞机在苏联上

空执行侦察任务时被苏联空军击落的事，赫鲁晓夫的表演不知会如何收场。U—2 飞机事件刚好出在巴黎首脑会议前夕。5 月 16 日，四大国首脑聚齐巴黎爱丽舍宫，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要他就 U—2 飞机事件作公开道歉、惩罚罪犯以及保证不再作这种飞行，并对艾森豪威尔说了许多侮辱性和威胁的话。当然，艾森豪威尔并没有被吓倒，他仅仅表示在他任职期间将停止这种飞行。艾森豪威尔的总统任期即将在 1961 年 1 月结束，这种保证几乎不具有什么意义。双方僵持不下，巴黎首脑会议几乎还没开始就宣布休会，双方不欢而散，首脑们各自回国，东西形势又告紧张，一切恢复原有状态。这正好是符合阿登纳的警告与判断。阿登纳并不认为这种情况下召开首脑会议会有什么重大意义。

赫鲁晓夫看来又是虚张声势的了。从巴黎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又经常谈论阿登纳紧张的苏联和东德单独缔约的可能性。9 月，赫鲁晓夫到纽约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对美帝国主义再度强烈控诉，称其在联合国以“强盗行为和背信弃义来代替国际法”。10 月 12 日，当美国和菲律宾代表在联合国发言中提到必须解放生活在铁幕里的各国人民时，赫鲁晓夫作出了使人意料不到的惊人之举。他脱下自己的皮鞋，使劲地敲桌子，大声抗议，令与会每一个人目瞪口呆。

这期间，通过西柏林而流失的东德人数已经到了乌布利希政府不能忍受的地步。1960 年，有将近 20 万民主德国人离开了东德，其中有 152,000 人是通过柏林这个重要渠道。1961 年，民主德国人口流失继续增加，1 月和 2 月两个月超过了 3 万，其中 21,000 人是经过柏林逃走的。3 月和 4 月又走掉了 42,000 人。东德的人口增长此时已处于停滞状态。据统计，在 1960 年走的人中，49%的人是在 25 岁以下，23%的人在 25 岁到 40 岁之间，其中主要是能工巧匠。

1961 年 8 月 5 日到 7 日，西方三国和联邦德国外长聚在巴黎，准备协商解决柏林问题的措施。8 月 6 日这一天，东德人口流失到达最高潮。有 2.305 人离开东柏林到达西柏林。在这种人口流动不可遏制的情况下，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决心要采取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他取得了赫鲁晓夫的认可。

8 月 12 日夜里，东德当局悄悄地在东西柏林分界线上用带刺的铁丝网筑起了一道墙。8 月 13 日清晨，当西柏林人从睡梦中醒来，突然发现柏林两部分之间的分界线变成了一座牢固的不可穿越的屏障。这一天，华沙条约缔约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它们赞同东德政府的这一决定。一切都静止了，东西柏林之间的通道被封锁了，只在交界处开辟了 9 个过境站。东德的人口流失戛然而止。西柏林市市长、社会民主党人维利·勃兰特作出反应，他立刻向西方盟国发出了求援的呼救。

但是，除了抗议之外，西方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反措施，甚至人们意料中的爆发性的报复行动也没有发生。盟国这种沉默令维利·勃兰特感到十分不满。后者四处奔走，呼吁西方保卫柏林，捍卫它们在西柏林的利益。为形势所迫，肯尼迪派了他的副手约翰逊以及克莱到西柏林作安慰性视察。

由于忙于第四次联邦议院大选，阿登纳行动也颇为迟缓。“墙”筑起后的第三天，8 月 16 日，阿登纳接见了苏联大使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告诉阿登纳，筑墙措施并非针对联邦德国，而是民主德国为了防止人口流失而采取的。阿登纳这时说出了一句令人十分吃惊并不解的话：他说：“联邦政府

不会采取任何不利于德苏关系和恶化国际局势的措施。”整整九天之后，阿登纳才姗姗来到柏林。这种延误再加上头两天说的含混不清的话，使他遭到社会民主党的猛烈攻击，所有德国人，尤其是西柏林人对他十分不满。

8月22日，阿登纳终于走在西柏林的波茨坦广场上。阿登纳在距柏林墙铁丝网四、五码的地方停了下来。他凝视着铁丝网的另一边，一动不动地站了很长的时间，才缓步由联邦官员们陪同离去。尽管理解他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他内心此时正受着的人生最为痛苦的煎熬，可是，这并不能驱散许多人对他姗姗迟到的不满。他的脸上毫无表情，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柏林墙的修筑对阿登纳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的挫败。阿登纳一直坚称，他的欧洲政策和大西洋政策与他重新统一德国的努力并不是矛盾的。就眼前的事实而言，柏林墙的修筑证明他的做法已经失败了。1961年8月13日构成了1949年以来德国外交政策发展最明显的中断。如果两个德国之间的深渊不再进一步深化，如果人们不会被排除在东西方缓和进程之外，那么，从这一刻起，联邦德国就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德国统一政策。新的形势是，一方面柏林墙将柏林问题强制解决了，也将德国分裂变成不可更改的现实，两个德国之间的大门砰然关闭；而另一方面，缓和正在为两大阵营之间提供着越来越多的渠道。已经坚持了十二年的阿登纳政策必须有一个新的选择。柏林墙的修筑，不仅是柏林墙两边内心幻想的破灭，也是阿登纳重新统一政策有待调整的明证。阿登纳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

半年之后，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在1962年5月27日社民党科隆代表会议上就柏林墙的修筑讲了一段话，表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勃兰特说，“联邦德国必须首先去掉试图在东西方冲突中渔利的污点。”事实上，既然德国分裂是东西方冲突造成的，德国重新统一只有同东西方关系的改变联系起来才能够有现实意义，因而，东西方紧张局势的缓和，是实现民族自决的最重要的条件，联邦德国所应做的就是促进现实的变化。“那种把东西方关系固定下来，使之一成不变的作法，能对谁有利呢？”勃兰特的讲话，表明一种与阿登纳冷战一边倒政策完全不同的新的政治观点，已经在联邦德国产生了。

1961年9月17日，联邦德国举行了第四届联邦议院的选举。由于柏林墙事件的影响，阿登纳的威望明显下降，他失去了在德国公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这次选举中，基督教联盟党在联邦议院丧失了绝对多数。阿登纳勉强组成与自由民主党的联合政府。外交部出现了重大变化，坚信冷战持久和忠实执行阿登纳政策的冯·勃伦塔诺由格哈德·施罗德接替，阿登纳在党内的威信也因为他与艾哈德就联邦总理人选的争执大受打击。

由于柏林的这场危机，一切问题都冒出来了。

联邦总统 ——联邦总理

对我来说，决定性的关键是：我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保证我的政策继续执行下去？

——《阿登纳回忆录》（三）

1959年联邦共和国最重大的事，就是要选一位新的联邦总统来代替规定任期已满的豪斯教授。

1949年9月，豪斯当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54年豪斯又获连选连任。根据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二章第54条规定，联邦总统只能连选连任两次。豪斯的第二届任期将于1959年9月期满。从1959年年初开始，联邦共和国就面临着要选举一名新的联邦总统的问题。

按照基本法规定，联邦总统是由专门的“联邦选举院”选出的，联邦选举院是由联邦议院的议员和各州议会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从1959年初的情况看来，拟于1959年7月1日组成的联邦选举院将由995个有表决权的代表组成（不包括柏林代表）。如果1959年各州州议会选举的结果与过去一样，那么这995个代表名额在各党派的分配情况就该如何如下：

基督教联盟党	497名（不到总数的一半）
德国社会民主党	361名
自由民主党	85名
被逐出家园者与被剥夺者权利联盟	20名
巴伐利亚党和德意志帝国党	8名

根据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54条第6款规定：谁得到联邦选举院多数代表的选票，谁就当选联邦总统。如果在头两轮选举中没有一位候选人得到多数选票，则在下一轮选举中谁得票最多，谁当选。

1959年年初，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他们极具竞争实力的联邦总统候选人——卡洛·施密德教授。卡洛·施密德从政多年，在公众中拥有很高声望，甚至在基督教联盟内部施密德也博得了许多人的赞许。阿登纳认为施密德曾投票反对联邦德国参加欧洲委员会，反对参加北约，反对实行兵役法，让一个十年来一直投票反对与西方结盟政策的人当上联邦共和国国家元首，会为联邦政府政策的贯彻带来很多麻烦。在过去几年中，阿登纳与豪斯总统一直合作愉快，两人的政策观点也基本一致。所以，阿登纳认为，基督教联盟党必须提出一名与卡洛·施密德旗鼓相当的候选人。阿登纳和一些党内领导人磋商之后，决定首先组织起一个有15至20人参加的小范围的选举委员会专门筹划这件事。

2月的头两个星期内，阿登纳与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州总理赛德尔商谈了两次，赛德尔同意阿登纳的意见，即联盟党提名的候选人最好能在第一轮选举中以绝对多数票当选。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定于2月24日举行。2月23日上午，当时担任联邦内务部长的格哈德·施罗德向阿登纳推荐了深孚众望的联邦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

2月24日，选举委员会第一次开会讨论联邦总统继承人问题，到会的有联邦议院议长格斯登美尔、联邦议院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议会党团主席克罗内博士、州总理冯·哈赛尔、州总理赛德尔、联邦部长布兰克、

施罗德、施特劳斯、州议会议长约南、教长西利恩、前任国务部长弗里克博士、基督教社会联盟秘书长齐默尔曼、联邦议院议员赫歇尔和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治家伦辛等人。像以往所有的会议一样，阿登纳担任会议的主席。

会议讨论了两个相关问题。第一，这次联邦总统的选举对 1961 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会起什么影响？第二，选举谁为联邦总统候选人比较合适。

阿登纳首先发言，他一开始就讲到这次联邦总统的选举面临与第一届和第二届总统选举完全不同的情况。十年前第一届选择组成的是基督教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的联合政府，豪斯的当选是由于自由民主党和基督教联盟党联合推举。当时情况非常明确，联盟党支持自由民主党的豪斯担任联邦总统，而自民党则赞成阿登纳担任联邦总理。第二届总统选举也大致是如此情况。

“但是”，阿登纳停顿了一下，扫视了在场诸人，一下子转移了话头——“1955 年以后，各党派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自由民主党退出了内阁，它的一些党员采取了一些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的激进方针，所以我们目前谁也不能预言 1961 年党派之间的政治阵势会如何。柏林危机已经使联盟党的政策面临一些困难，现在和今后是否有可能出现在联邦议院内把基督教联盟党排除在外的多数，这一点我们谁也没有确定的把握”——与会者一片沉默，望着阿登纳等待下文。

阿登纳不慌不忙，接着道：“所以我们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保证我们联盟党在议会中的多数，保证我们的政策能够顺利贯彻。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我们要使联邦总统的选举顺应这种形势。目前我们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选出一个最适合的候选人。”

是谁最适合呢？是州总理冯·哈塞尔，还是施罗德建议的经济部长艾哈德？

与会者们各抒己见，争论不已。阿登纳提议经济部长艾哈德。他指出，由于艾哈德担任经济部长所作出的出色成就，他在联邦共和国南北都深孚众望，只有他才堪与像卡洛·施密德这样有影响的人对阵，并且他还能够保证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 497 名选举人都投他的票。

会后，联盟党发了一则公报：

“应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的邀请，两党领导人于 2 月 24 日举行了会谈。与会者一致决定向有关选举委员会建议，推荐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博士为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联邦总统职务的候选人。”

阿登纳用电话把这个决定通知了正在格洛特温泉疗养的艾哈德。艾哈德表示，如果党内大多数人推荐他的话，他原则上同意做联邦总统候选人，但他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

消息发布之后，在基督教联盟党议会党团内部引起激烈争论。许多议员反对艾哈德当选联邦总统，提出的理由是，根据基本法，联邦总统应当是超党派的，一旦艾哈德当选，按照豪斯做总统时开创的先例，必须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这样一来，联盟党在 1961 年联邦议院竞选时就会少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有可能失去选票。过了两天，艾哈德也来找阿登纳，告诉阿登纳，联盟党议会党团以及所有与他谈过话的人都坚决要求他放弃候选人资格。艾哈

德问：“现在我该怎么办？”阿登纳的回答是：“您如果是一个聪明人，那就回到格洛特河谷去，什么话也别说。您安心地等着，看有关选举委员会对整个问题的态度！”按阿登纳当时的估计，选举艾哈德当总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天有不测风云，阿登纳对党内情况的判断出现失误。2月24日的会议之后，阿登纳因患流感病倒了。他在勒恩多夫躺了一个星期。在这期间，联盟党内为提名艾哈德担任联邦总统候选人的事吵翻了锅。联邦议院议长格斯登美尔坚决反对提名艾哈德。原本是举棋不定的艾哈德自己也公开表态他不准备当联邦总统候选人。阿登纳对艾哈德这种做法感到非常气愤，因为艾哈德不仅没有遵守他与阿登纳的口头协定，也没有等议会党团全体会议商议以后再作结论，就擅自主张提前把他放弃总统选举权的决定通知了报界。3月3日，当阿登纳重回绍姆堡宫时，发现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等待他的还有早已定好的国事访问。

3月3日晚，阿登纳前往巴黎去同戴高乐会谈。3月5日傍晚一回到波恩，阿登纳立即召开了一个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各州主席参加的会议，继续讨论总统候选人问题。鉴于前一次的经验，阿登纳提议会议成立一个扩大的选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有联邦党主席团、州主席团、联邦议院议会党团和各州议会基民盟和基社盟议会党团的代表参加，这样可以求得相对广泛的协调意见。阿登纳相信他对党内的影响，想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取得支持。

在一次习惯性的午后散步时，陪同他的国务秘书格洛布克小心翼翼而又似漫不经心地告诉阿登纳，选举委员会将有可能推荐后者出任联邦总统。阿登纳非常吃惊，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4月6日，选举委员会进行预备性讨论时，冯·哈塞尔、赫歇尔、克罗内以及迈尔斯等人就正式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他们说只有阿登纳能够在总统选举的第一轮中以绝对多数当选。当然，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如果不推举艾哈德的话。

阿登纳感到这个问题有必要作出研究了。他已经八十三岁，由于健康的原因不可能再长久地担任联邦总理，所以必须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尽管这是很令人痛苦的。如何在卸任之后保持政策的延续，是他考虑问题的关键，阿登纳曾经设想外长勃伦塔诺，但后者健康状况不佳并且近年来在外交政策上与他出现分歧，不是最佳人选。他中意的人是财政部长弗兰茨·埃策尔。

阿登纳进一步问哈塞尔等人设想谁来当联邦总理。他们含糊表示可以考虑财政部长弗兰茨·埃策尔。这个回答正中阿登纳下怀，他一向认为埃策尔是保证他政策继续的最好人选。因为埃策尔对欧洲一体化和德法关系的看法同他相吻合。

这毕竟是要他放权的变向请求，阿登纳心里很清醒联邦总统只是一个荣誉职位，不具有实权，人们是为了让他体面下台。他明白艾哈德在党内已经有相当实力，很多人会支持他继任联邦总理，所以，阿登纳为了第二天行将举行的选举委员会会议，特意向赫歇尔、克罗内等人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会议将不提任何候选人的名；第二、他要先作一个关于联邦总统应有法律权限的报告。他们答应了。

从第二天（4月7日）阿登纳对选举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基本法所规定的联邦总统权限的报告中，可以明显感到阿登纳想通过对宪法的解释来扩大联邦总统的权限，阿登纳想把这些作为他当联邦总统的一个前提。看看他的发言报告这一点就会非常清楚。

可以想象阿登纳经过一番怎样艰苦的思考想顶住党内对他发动的这次猛烈冲击。正是这样才使他的发言尤其耐人寻味。阿登纳在选举委员会上一开场就强调说：“我是定期地不断地向联邦总统报告政府工作情况和国内外总形势的。如果联邦总统出于特殊的原因希望我在某一方面作报告的话，只要他邀请，我就到他那儿去。此外，各个联邦部长也经常向联邦总统汇报情况，即使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汇报，可能这个联邦部长汇报得多一些，那个少一些，但也能使联邦总统经常了解发展中的形势，同时也使他能够完成根据基本法所赋予他的职能。从开始以来，联邦总统豪斯都是由他的国务秘书代表他出席所有的内阁会议，然后再由国务秘书向他报告内阁会议的全部情况的。假如人们全面地看一下联邦总统这一职位，那么也必须承认，联邦总统必须多听汇报，并且可以派他的国务秘书参加内阁会议。这一点从来也没有受到哪一方面的否定。当然，联邦总统也能在他认为适合的情况下亲自参加内阁会议。不消说，尽管他没有投票权，人家肯定也会由于他的国家元首地位让他主持会议。”

这一番开场白的中心是让人明白，联邦总统有权听取联邦部长们的汇报，也有权参加内阁会议。既然联邦总统有这样的权力，那为什么豪斯时期总统权力没有显示发挥出来呢？接下来，阿登纳转了一个弯，说这是由于基本法赋予总统特权里诸多不明确之处所致。阿登纳列举了三大不明确。

第一个不明确的是联邦总统对联邦总理的提名权。阿登纳指出，基本法第 63 条规定，联邦总理由联邦总统在联邦议院提名选举，无须经过讨论，但是，这一条文后面所规定的程序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来讲却不明确。比如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使联邦议院占多数的议会党团不同意，也有可能是在联邦总统提名的基础上取得联邦议院的多数，即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占比例多数的议会党团，而是多数议员。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总统会有可能解散联邦议院，这一点应该引起重视。

第二个不明确的是基本法第 64 条，“联邦部长经联邦总理提名，由联邦总统任免”。这一条中没有明确联邦总统是否有责任立即任命联邦总理提名的人选为部长。如果反对该怎么办？由此延伸，可以认为联邦总统能对联邦部长的任命起重要作用。

第三个不明确源于基本法第 58 和 59 条，这两条规定联邦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享有特别权限的地位。作为国家元首，对外又是联邦共和国代表，联邦总统首先必须了解要求他做的事情，只有在以经常向联邦总统报告情况为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联邦总统才能作出自己的判断。并且，根据传统，联邦总统要接见每一个返回波恩述职的大使和公使，他也接见外国派驻波恩的大使和公使，在这种场合他要致词，他可以颇有份量的政治口吻讲话而不受约束。这些特别权限，联邦总统发挥起来可大可小，完全有可能对政权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阿登纳还谈到联邦总统在联邦官员的任命、联邦法律的签署、紧急状态的确定等等问题上，基本法都未能就联邦总统权限作出很明确的规定。他的结论是，联邦总统在这些方面完全可能越过目前权限，起到很大作用。除去这些，也没有人能够禁止联邦总统发表政治演说，想根据基本法规定给联邦总统的嘴巴贴上封条也是不可能的事。

正因为如此，阿登纳又一转话锋，强调指出必须估计到如果出现了社会民主党人当选联邦总统这样的情况。他语重心长地说，“卡洛·施密德先生

诸位是熟悉的，他在国内的影响诸位先生也是清楚的。社会民主党人全力推举了他。我想提醒诸位的是，一旦施密德先生当选，我刚才陈述的一切可能性就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毫无疑问，联邦政府目前进行的政策就会受到沉重打击。”

这些话听起来是阿登纳在提醒与会者，必须防止出现社会民主党人当选联邦总统的可能性，但联系到头一天克罗内等人的建议，意义又耐人寻味，阿登纳故意没有把问题说得很透，但一切又似乎很清楚。最后，阿登纳不无用心地呼吁到会的人要正确估计联邦总统的地位和总统地位的具有的可能性，提出“一位按照他的身份有较大可能获得联邦选举院绝对多数的候选人。”

当然，艾哈德已经宣布放弃，这个报告做完后的结果只能是使大多数到会者产生阿登纳愿意提自己当联邦总统候选人的印象。大多数人可能还没有理解阿登纳的真正目的，更多人认为让已经八十三岁的阿登纳接受联邦总统这样一个荣誉职位将是最好的结果、当然也有像哈塞尔、赫歇尔、克罗内、格斯登美尔这样的知情者，不过谁也不愿把话挑得太明。于是乎在阿登纳作完报告离开后不久，人们似乎是激情所致，以致于不顾昨天不公布候选人的约定，一致决定推举阿登纳作为基督教联盟党联邦总统候选人。联邦议院议长格斯登美尔专门发表了一篇讲话。

格斯登美尔的讲话听起来也十分有意思。尽管通篇是在对阿登纳十年以来功绩的赞美，请求阿登纳接受做联邦总统候选人这一最高荣誉，但是作为知情者的他却有意回避了阿登纳在作联邦总统宪法权限报告时的另一层含义，并让人感到似乎在欢送阿登纳辞职。

格斯登美尔在讲话中用了这样的措词。他说：

“……联邦总理先生！十年以来是您掌管着这个国家的命运，这个国家不仅代表大部分德国的呼声，也代表一心热爱自由的整个德国的呼声。如果现在要想对您个人的功绩再作一番赞颂的尝试，那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那样做多此一举。……正因为同您本人，同您的丰功伟绩是那么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当然还有许多诚挚的男女人士，长期以来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失去了这位联邦总理，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首先对我们的党，其次对我们的国家，会有什么影响？或者根据另一种情况反过来说，首先对我们的国家，其次对我们的党，会有什么影响？”

联邦议院已经变得如此强大，能够自己排除日常政治问题中的所有困难……我们扪心自问，如果这些困难和操劳以即使对钢筋铁骨的中年人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方式，再要求您花费精力，将会怎么办？如果我们失去了您，而无法保证根据您的思想和遵循您的政见的制度发挥作用，无法保证按照合乎人情的观点像过去那样发挥作用，又将怎么办？……

现在，这个使命落到我们身上了。……今天早上，一个想法具体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即是否会有这么一种可能性；我说的是任职十年之久的现任联邦总理辞职之后，延长阿登纳时代掌政的可能性。

……联邦总理先生，就事情本身来说我们一致认为，在您接任了联邦总统职位之后也会继续保持政治上的影响，而且您还能够——这对我们大家是非常重要的——对至今尚处于成长和巩固阶段的我党给予影响，虽然国家元首的职位排除了现在的党员的身份。……

联邦总理先生！如果您答应我们——即使您形式上不再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在您的新岗位上也能在这方面给予指示和领导，那么我们要为此向您表示感谢，我们承担在提出这一请求的同时需要作出的牺牲。这一牺牲在于：我们现在请您在屡获成功和执掌政权之后，改就这个新的职位。这是一个重大的牺牲，必须加以洞察和表达出来。我们作出这一牺牲是考虑到人生的有限之年；我们作出这一牺牲是怀着希望和期待。上帝保佑我们，使您在另一个地方为了我国人民的利益，并且——您将允许我还要说这一点——为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利益使您长久地保持您的精力。

……”

这一番话让阿登纳听起来有另一番滋味。刚刚作过的有关联邦总统权限的报告难道就只是要产生这样的结果？不知道是议会党团的先生们没有明白，还是他们有意忽略。格斯登美尔的讲话摆明了是要将他送到一个只有荣誉而没有实权的地位。阿登纳决心把话讲得更明确一些，以免让人产生他真的要自动退休的感觉。

他即兴站起来，挥摆双手接受人们的欢呼也示意人们安静下来。在巡视会场一周之后，阿登纳有意识地挺了挺腰板，然后用沉着的语气，不慌不忙地作出一通精彩答词：

“……

我的朋友们，现在我的立场是，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的称心与否，愿意与否，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必须对个人本身有关的问题作现实的和客观的思考。……我终于坚信，对这一点我是义不容辞的。……如果人们在事情发展的进程中召唤我的话，那么尽管有不少顾虑，我还是必须听从召唤，因为对于这个问题肯定是多于否定的。

我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可是不叫我继续战斗却使我感到为难，这多难受呀！我十分坦白地告诉你们这一点。刚好上星期在下萨克森州，接着在莱因兰—法尔茨使我兴致勃勃地重新投入战斗。当然，不言而喻，还有比战斗更为重要的事情。我现在也将试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面前表现出我公平正直的真正本性。

非公平正直不可！

……这将是作为一项使命。摆在我面前的另一项使命，刚才格斯登美尔同事已经讲过了。使我也深受感动的一种思想是，一个人只要叨天之佑还在工作，我们就必须关心巩固我们的党，去保卫我亲爱的朋友们，即使处在党的创始时期的那些人已经不在时也是如此。

我还得说一点，我不打算告老回乡颐养天年。这种想法和我毫无缘份。我不想使人怀疑，也根本无可怀疑，作为基本法缔造者之一的我，将提倡扩大解释基本法。

先生们！我是非常讲究客观的。根据我们执行基本法取得的十年经验，我完全主张扩大解释。我希望——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样做也合乎我党同志的心愿，因为基本法的确必须同所有法律一样，从有些方面加以扩大解释。

我的朋友们，还有什么要叫我多费唇舌的呢？我已经承认了乐于战斗，然而今后我却不得不加以放弃。我再一次承认，这将使我十分为难。但是我向诸位保证，仰仗你们的支持和基于我们十年的经验，我将克己奉公地并力求完全客观地为德国人民，为以基督教义作为基础的我们的党，奉献出我的力量，毫不计较我个人的得失和自己的意愿。”

这一通讲话使阿登纳立于不败之地，他既没有表示他不愿接受做联邦总统的提名，也没有说他必须接受提名。他只是说他不打算退休，并要义不容辞地听从客观和现实的召唤。未来是难以预料的，而他的决定要取决于未来发展情况。第二天，4月8日，阿登纳又发表了一次外交形势的电视讲话。不失时机地在公众知道他接受联邦总统提名时告诉公众：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作出这一决定目的是为了保证多年以后继续执行我们的政策。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同我的朋友们也是完全一致的——凭着我的经验和国内外寄予我如此充分的信赖，我将克尽职守，起到与联邦总统崇高职务相称的作用。我要用两句话强调指出：联邦总统的职务、使命和工作在德国公众的心目中，因此也在世界公众的心目中看得微不足道了。其实它比人们一般所想象的要重要得多。除此以外，我还要告诉你们，不论是对我们友好的国家还是对我们不友好的国家，这一点都是适用的，联邦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问题的态度不仅在本届会议期间，即使在今后的岁月里都不会有丝毫改变，一个字也不会改变。我们现在是，并且永远是我们伙伴们的忠实伙伴，我们朋友们的忠实朋友，而且是坚决对抗那些反对我们提出和平与自由的正义要求，反对我们在和平与自由中重新统一的人。”

但是，阿登纳犯了一个错误，他对自己的估计过于乐观了，他太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和德国公众对他不可或缺的依赖。4月8日晚，在事前没有同任何人就整个事件再作更多讨论的情况下，阿登纳去了卡德纳比亚度假。或许他认为无需再说了。他一离开波恩，基督教联盟党内，德国的舆论界整个都活跃起来。

党内第一个积极反应就是成立了一个名为“艾哈德突击队”小组，这个小组的目标是争取艾哈德成为联盟党联邦总理候选人。正在休假的阿登纳乍闻这个消息，惊呼“努力全白费了”。按照他的设想和他事先与联盟党联邦议院议会党团主席克罗内等人的约定，他若竞选联邦总统，联盟党将推举财

政部长弗兰茨·埃策尔作为总理候选人，这样，在他当选之后，就可以保证过去政策的继续。并且，阿登纳设想联邦总理与总统在政见上的一致，可以加强联邦总统对政权的影响力，而他就有可能在德国起到戴高乐在法国类似的作用。他可以超越议会党派不受干预地贯彻自己的某些意志，同时联邦总统职位又可以使他避免日常琐事的干扰，浪费他的精力。总之，按照他精心准备的对本法法的解说，联邦总统绝不仅仅限于是个荣誉职位，他仍然可以起自己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作用也许更为有效。阿登纳原想在7月1日联邦总统选举之后再考虑通过总统对总理的提名权来提出联邦总理人选的，这样一可保证埃策尔当选，再可避免在此之前的舆论争论，但是，党内却在这时候将联邦总理候选人提出来争论，并且提出了他认为并非适合的人选，一切的一切和他的想象大相径庭。

仿佛议会党团的成员们有意和阿登纳作对，推举艾哈德做联邦总理候选人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人来到阿登纳休假的卡德纳比亚为艾哈德做说客。其中有他的老朋友费尔德门格斯、议会党团主席克罗内。他们告知阿登纳，艾哈德的大规模竞选运动已然取得显著成绩，议会党团内部多数人已表示将支持艾哈德参加联邦总理竞选。

阿登纳真正忧虑了。他不相信艾哈德当选能够确保他的政策继续下去。在卡德纳比亚，阿登纳向费尔德门格斯举出艾哈德反对法德和解和欧洲一体化政策的一贯态度，他愤愤然表示，此种例子不胜枚举。他举出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

1958年5月，艾哈德作为联邦经济部长在挪威奥斯陆曾对国际新闻界代表作过一次讲话。这次重要发言中，当有人问到已不再坚持宪法民主制度原则的法国是否有可能指望得到联邦共和国给予的贷款时，艾哈德的回答是：“不能”。这件事在法国引起公愤。5月25日，法国《世界报》报导了艾哈德的讲话，标题为《M·路德维希·艾哈德先生说：如果将军（戴高乐）重新执政，德国将不再弥补法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赤字》。阿登纳把这篇报道递给了费尔德门格斯，说：“我可以肯定，艾哈德先生在奥斯陆的讲话在法国是不会被遗忘的。”

阿登纳又给克罗内看了罗马电台3月23日对艾哈德在罗马发表的有关欧洲经济合作见解讲话的报道节录。“看看我们的经济部长对欧洲的态度吧！”阿登纳用了一种几乎是恼怒的语气。报道是这样写的：

“联邦经济部长艾哈德星期一在罗马对经济领域方面狭隘的‘欧洲主义’十分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怀疑态度。他热情地支持建立欧洲自由贸易区。”

报道称艾哈德的这次讲话令意大利人感到吃惊，意大利总理塞尼在讲话一结束就去找艾哈德，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不同意艾哈德关于欧洲重组的说法。阿登纳又指给克罗内着了一堆放在他桌上的有关艾哈德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材料。克罗内哑言了。

“德国的伙伴们显然对德国的政局都很关心，”阿登纳对克罗内说，“事后，意大利总理塞尼专程来到卡德纳比亚，告诉我艾哈德的讲话使人产生一种他不支持六国欧洲的印象。法国也曾委婉地向我作过类似表示。我们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啊！”

由于对事态的担心，阿登纳匆忙结束了为期四个礼拜的休假和克罗内等一起赶回到波恩。5月6日，他接待了前来访问的法国总理德勃雷，后者在欢迎晚宴上说：

“先生们，你们根本不要相信，经济问题会掌握世界命运。恰恰相反，世界的命运是由伟大的政治家和政治问题来决定的。事实上，世界的命运，我们的未来和自由都取决于那些伟大的政治家和政治问题。你们大概已发觉，我说的只不过是重复戴高乐将军对你们已经说过的话。”

德勃雷这几句暗示的话击中要害，阿登纳的心情为之更加沉重。这已不仅是由谁当选的问题，还涉及到德国将来能否与伙伴们合作，是否能赢得他们的支持和信任。阿登纳决心直截了当地与艾哈德谈一次，使他放弃参加联邦总理竞选，这也许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谈话的时间是1959年5月13日下午。两人都各怀心思。艾哈德认为自己可以做联邦总理因为他有当联邦总理的经验和资历：在所有的联邦部长中，他参加联邦共和国建设的时间最长，他参加过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的工作。艾哈德试图说服阿登纳同意他参加联邦总理竞选，他向阿登纳保证他持与阿登纳相同的政治立场。

阿登纳直言不讳地告诉了艾哈德他对他竞选的顾虑。他对艾哈德说：“您是个经济专家，在经济方面你做出了很大成就这一点我毫不否认。但是，外交与经济完全是两码事。外交政策涉及到所有的事情，掌握它的人必须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而你，联邦经济部长先生，在这方面的经验是不足的。您的一些讲话使联邦德国的伙伴们都不把你作为欧洲一体化的拥护者。为了这一点，我希望您考虑放弃竞选。”

艾哈德希望争取，阿登纳则毫不让步，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艾哈德表示决心不放弃他的目标，两人谈话毫无结果，不欢而散。阿登纳说服艾哈德的可能性失败了，他认为“艾哈德沉醉在一种无法抑制的野心中”，只好把目标转向议会党团，希望议会党团能发挥作用，不提艾哈德当联邦总理候选人。

议会党团的态度同样令阿登纳失望。议会党团主席克罗内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州小组代表赫歇尔告诉阿登纳，议会党团内部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赞同提名艾哈德当联邦总理，也就是说埃策尔几乎没有当选的可能，因此，议会党团决定不投埃策尔的票。

阿登纳已无力改变艾哈德将作为他继承人的事实了，他毫无退路，考虑再三，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1959年5月19日，他给议会党团主席克罗内写了一封长信，以书面形式列出反对艾哈德竞选的理由，并且表示，如果议会党团的多数拒绝他提名埃策尔为联邦总理的建议，他就声明拒绝参加联邦总统竞选。

他写道：

按照基本法规定，联邦议院有义务采纳联邦总统有关选择联邦总理的提名建议。但是基本法第63条全部内容以及关于联邦总统提名权的全部条文都说明了，联邦议院有义务慎重考虑联邦总统的建议。联邦议院和联邦议院议员不能再根据联邦总统的建议

所进行的第一轮选举中提出另外的候选人，而只有当联邦总统所推荐的候选人落选时，才能举行新一轮选举。

我认为，如果联邦总统与议会党团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存在着矛盾，联邦总统必须辞职。他将不再具备足以履行其职责所必需具备的威望。如果联邦总统和联邦议院多数议员属于同一个党或者属于具有密切关系的党，那就更是这样。我还想指出，联邦总统和议会党团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将给整个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

在我作出了最周密、最谨慎的考虑，并对其进行了反复推敲之后，我作为联邦总统将不能向联邦议院推荐我的同事艾哈德先生为联邦总理，尽管他为我们获得的成就、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所作出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我将我的理由简要地归纳如下：

.....

从他那经济方面的知识、工作的活力以及他那具有感染力的乐观主义方面来说，艾哈德先生是我们所能期望得到的最好的经济部长。因此，他作为经济部长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威望。但在外交政策这样一个如此敏感和棘手的领域内，他没有经验。从他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来说，我们的朋友对他甚至持完全不信任的态度。我再一次强调，欧洲一体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整个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美国对待欧洲态度的基础。.....

艾哈德先生作为经济部长是很杰出的，但在目前外交形势越加严重的情况下，选举他为联邦总理是很危险的，因为他必须以联邦总理名义决定外交路线和领导外交部。

这决不是对艾哈德先生的功勋和能力的贬低。因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外交家。德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它过去的历史，现在正处于异常危急的情况下。如果德国在外交政策上再犯错误，就会对遥远的未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将不仅对经济、对 1961 年联邦议院选举的结果，而且对今后几十年，甚至几代人都会产生决定命运的影响。因为我们正处于共产主义和基督教西方世界以及自由之间的斗争中，这一斗争是极为严酷的。

我相信，议会党团中绝大多数人也不会挽留他的。但是，假如议会党团坚持要他担任联邦总理职务的话，我就要考虑，我是否应该同意参加联邦总统竞选而放弃联邦总理的职务。我认为，我不应该这样做，而应该收回我原来对推选我为联邦总统的建议所表示的赞同态度，并继续留任联邦总理。我必须毫不迟疑地召集一次党和议会党团为联邦总统选举之务而设立的委员会会议，把我的决定告诉它，并请求提出另选一位总统候选人。

.....

提名我为联邦总统候选人以及我接受这一建议，目的是在于确保继续奉行我所制定的政策。我认为，如果选举艾哈德先生为联邦总理，就不能确保这一点，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毫无意义。

为此，我再一次强调，我必须放弃参加联邦总统的竞选。”

此信的结果是阿登纳同议会党团两方都较上了劲。议会党团主席克罗内、联邦议院议长格斯登美尔、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布勒辛以及费尔德门格斯等人先后来请阿登纳改变看法，阿登纳主意已定，不愿更变；艾哈德也再度表示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放弃竞选联邦总理。双方都不愿作出让步。阿登纳连续不断地同议会党团主要领导进行了一系列谈话，但毫无进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5月份开始，双方一直僵持到了6月初，阿登纳终于确信议会党团已决心不再接受他的主意，失望之余他作出了一个决断：放弃联邦总统的竞选。

阿登纳为他的这一决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由于他的崇高威望，议会党团尊重他的这一决定，但他与议会党团之间的分裂已是不可避免的了。阿登纳虽然仍然是联盟党议会党团领袖，但是党内团结与统一的基础丧失了。新闻舆论将此事大作渲染，炒得沸沸扬扬。

最失望的是经济部长艾哈德。当阿登纳宣布这一决定时，他仍然在华盛顿。据德新社6月7日的报道，艾哈德在华盛顿发表了讲话，认为阿登纳继续担任联邦总理的决定，无论是对于德国的利益，还是对“民主传统精神”都是遗憾的。艾哈德发怒了，他要求阿登纳为此公开向他道歉，他感到自己受到侮辱，因为舆论界的报道已使人产生出他没有能力继续奉行联邦政府政策的印象。阿登纳拒绝了艾哈德的要求，他认为无需如此。阿、艾之争削弱了联盟党的内聚力。议会党团试图在中间充当和事佬，于是在进行调解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本身也是模棱两可的，它说：

“议会党团赞同联邦总理先生的声明，对于联邦经济部长的任何贬低都是与他无关的。议会党团对艾哈德教授表示特别的信任。它对于有损于他威信的言论表示遗憾。”

在议会党团的调解下，阿登纳和艾哈德和解了、但和解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公众对这事件本身感到深深的失望。人们的议论是：基督教议会党团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国家领导职位是不应该的。社会民主党更是竭尽全力使火上浇油，促进了这场危机。于是，阿登纳由“伟大的民主总理”形象转变成一个“顽固的、贪恋权势的老头”了，阿登纳的国内政治形象从此蒙上了一层阴影。再加上8月13日柏林墙的修建，彻底分开了两德，使统一的梦想破灭，联盟党大失人心。

1961年秋，在联邦议院第四届大选中，联盟党失去了绝对多数，不得不再次求助于自由民主党以组成联合政府。阿登纳仍然出任政府总理，但他不得不接受自民党提出的在新的四年执政期内以“自愿辞职”为先决条件。联盟党支持这一点，还决定以艾哈德作为他的接班人。阿登纳已经无力反对了。这一切深深刺痛了阿登纳的心，一种迟暮的感觉油然而生。

大洋彼岸的不谐之音

火炬已经传到新一代的美国人手中……

——1960年1月1日 美国第35
届总统约翰·肯尼迪就职演说

过去已经提到，阿登纳的外交政策是以对美关系和对法关系为支撑的。与法国友好是为了稳固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而美国对德国政策的支持则是联邦德国实现外交政策目标不可或缺的条件。自从马歇尔计划和第一次柏林危机以来，绝大多数联邦德国人都认识到联邦德国必须获得美国的信任，阿登纳一直极为老练地处理对美关系，这一点使他获得了同胞们的赞赏。阿登纳在美国也享有很高声誉。他不仅善于同美国政府方面打交道，而且在美国公众面前他也大得人心。许多美国知名人士认为，阿登纳也许是雇用专门宣传机构争取美国舆论的第一位外国的政治家，他比任何人更善于利用报刊去增强两国公众的新闻感受力。事实的确如此，克里夫兰的《实话报》是阿登纳借助的第一家美国舆论机构。它虽然不是一家大报纸，但他在1949年12月就通过这家报纸吐露出新生的联邦共和国对它防务的关切。阿登纳不在乎报纸的大小，只要它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他说，“请看，金斯伯里·史密斯先生是非常有名的美国记者，他撰写的文章登在两千家的报纸……我不认为不利用这个机会去向美国公众说明一些问题是不智的。”

阿登纳做得很成功。他赢得了美国人对他的普遍好感，从华府官员到普通百姓。1953年4月阿登纳在首次访美期间，他就掌握了赢得美国人支持的诀窍。他有演说的天才，他也知道他们要听些什么。从那以后，他对美国的每一次访问都进行得相当顺利。他在美国拥有了理解他政策的最好的朋友。这些对德美关系的增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德美关系的正确估计使阿登纳从担任联邦总理开始，就有意识地从美国方面寻求最可靠的支持者。第一个是美国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他与阿登纳是亲戚，麦克洛伊夫人是阿登纳亡妻的表妹。但更为重要的是阿登纳知道麦克洛伊在支持联邦共和国恢复最低限度主权的政治观念上与他是一致的。信任和友谊使麦克洛伊给了他相当的行动自由。之后，是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阿登纳利用了艾奇逊对他的充分理解和同情取得了不受约束的广泛行动自由。到1951年3月，通过艾奇逊，阿登纳实现了从占领法规的小修改到成立权力有限的外交部这一重大意义的转变。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接替艾奇逊之后，阿登纳又和杜勒斯发展了一种新的信任关系，双方把这种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同的政治观点再加上密切的私人友谊。防御无神论共产主义渗透的信念将这两个人，也将他们各自的国家牢牢地拴在一起。阿登纳曾经说，杜勒斯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在杜勒斯不幸去世后，阿登纳将他的签名照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当有一次有记者问他他认为谁是他最钦佩的当代伟人时，他指向了杜勒斯的照片。

但是，在阿登纳与杜勒斯的个人关系发展后，他渐渐忽视了两个因素。

第一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外交决策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在杜勒斯六年国务卿任期内行动相当自由，总统的决定也大多根据他的建议，但是，在日内瓦会议以后，两人对有关欧洲中立化问题还是有了明显的分歧。难怪乎1958年5月杜勒斯患癌症不幸去世，使阿登纳感觉意味着“双倍沉重的损

失”，杜勒斯的死使德美关系出现了难以填补的空白，而这正是在阿登纳内政外交的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第二是由于对某个人的依赖，使阿登纳很难适应1961年美国总统变更所带来的人的变化和政治的变化。1960年又是美国大选年，阿登纳盼望着艾森豪威尔的副手、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当选，因为他们私交甚深，政治观点有许多接近。1960年3月，阿登纳第七次访问美国时，还专门登门拜访了尼克松的家。当时的专栏作家路丝·蒙哥马利为此写道：“八十四岁的德国总理同这位四十七岁的美国人之间的友谊迷住了华盛顿官方。这两位政治活动家至少在早先举行过多次会晤和商谈，但最近这一次无疑是最为亲切的。——如果尼克松人主白宫，那阿登纳似乎就已经为再一次建立像他和已故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有过的那种亲密无间的联系奠定了基础。”1960年11月，美国大选揭晓，结果令阿登纳大失所望。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肯尼迪以微弱优势战胜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人主白宫。肯尼迪很年轻，进白宫时仅四十二岁。他代表了美国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治家的思想和观念。这与老牌政治家阿登纳的观念相去甚远。肯尼迪想开风气之先，他有一个很年轻的智囊团，他和他的班子主张按理性而非按感情行事，要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称“火炬已经传到新一代美国人手中”，要求美国人去“开拓新边疆”，号召建立“全球大联盟”以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暴政、贫困、疾病和战争本身”。这种全新的视角与阿登纳一切从同共产主义对抗出发的政治理论显然有着质的差别。

肯尼迪入主白宫之后，1961年4月中旬，阿登纳到华盛顿去会见了这位新的美国总统。尽管阿登纳盛赞肯尼迪是“一位明智而有远见的人”，但这似乎并无助于两人的相互理解。当时人们对阿登纳和肯尼迪的关系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两人肯定分歧很大，因为年龄和时代的差异造成如是情形，他们一个八十五岁，另一个则四十四岁，一个会把自己的对话人看成是从另一个时代来的遗老，不能察觉世界在发生变化，另一个则以经验不足为由不能给对方以真正的信赖。无论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肯尼迪拒绝在柏林问题、德国统一问题上继续承担前任所保证过的义务，这一点令阿登纳大失所望。因为这就证明了阿登纳统一德国政策的失败。而当肯尼迪想彻底修改美国战略，以“灵活反应原则”代替“大规模报复原则”之时，阿登纳政府未作切实响应，也令肯尼迪对这个来自帝国的遗老深为恼火。对阿登纳来讲，他对白宫的这位年轻的新领导人的失望和担心是难以言表的。

这种失望和担心使得阿登纳更加同戴高乐将军走到了一起。他想借助于法国的力量巩固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并在德国问题上寻求法国的支持。这样的做法使阿登纳不可避免地要卷入一场法美的纠纷之中。这样一来，他与肯尼迪政府的关系就更加难以协调了。

1961年后，由于阿登纳这种做法，肯尼迪、戴高乐与阿登纳之间的三边关系变得相当微妙。在美法有关核问题的争执中，阿登纳扮演了一个不太成功的角色。

建立一支独立于美国的核防务力量，是戴高乐的一贯主张，也是戴高乐要振兴法兰西，恢复法国大国地位宏伟计划的第一步。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法国成为核国家。戴高乐因此加强了在核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而美国方面，肯尼迪为了保持对苏联的核优势，在对外政策上作出调整，采取了灵活进攻的姿态。肯尼迪修改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决定代之以“灵活反应战略”，即用核武器对核武器，用常规武器对常规武器和打“两个半战争”的战略，同时，肯尼迪提出美国要同西欧建立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欧洲政策，以便协调欧美在“灵活反应战略”上的协作。把欧美“伙伴关系”同“灵活反应战略”联系在一起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美国在1960年拿骚会议上提出的让北约各国加入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拿骚计划的核心是美国用核武器武装北约各国，但核武器部署与使用的决定权却集中在美国手里，美国将其他北约成员国的任务规定为发展常规武器。此后，美国在北约组织范围内反复强调了这一计划，并希望得到西欧各国支持。

决心恢复法兰西光荣的戴高乐怎么会允许美国干预法国掌握独立核打击力量的自主权呢！戴高乐根本不愿理会美国“多边核力量”建议。他明确告诉肯尼迪：法国决心要成为核大国，因为这是法国应该掌握的，它是使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不冒风险就妄图毁掉法国的唯一手段。戴高乐的表现是寸权必争，寸土不让。为此戴高乐拉住联邦德国。他要与法德联合来增强与美对抗的实力，甚至想用法国的核保护伞来取代美国。

戴高乐的做法让阿登纳很尴尬。一方面阿登纳要强调法德联合，并借法国力量改组北约，增强北约实力，另一方面他仍然认为美国的核力量才是联邦德国安全最有力的保障。他两边都得罪不起，但这事做起来却很难，往往自相矛盾。为了保住法德联合，阿登纳支持戴高乐独立于美、独立于北约的一些做法，甚至为了法德关系的巩固，他默许了戴高乐反对肯尼迪“多边核力量”的立场。他说，这个计划本身对西欧来说是不公平的。但他确实不愿开罪肯尼迪政府，因为德法两国地位确实不同。肯尼迪显然不理解阿登纳的良苦用心。这个老头处处为戴高乐行动作解说惹恼了正想大干一场的肯尼迪，后者认为阿登纳没有搞清楚是谁在真正保卫欧洲，保卫联邦德国。至少在欧洲安全问题上，这一老一少失去了相互谅解的可能性。而阿登纳想要欧洲，也就注定了他会被卷在法美的泥坑里出不来。

接下来就是柏林问题了。自“最后通牒”以后，赫鲁晓夫一直借此向西方施加压力。在华盛顿，总统顾问们众说纷纭。过去迪安·艾奇逊要求坚决不让步，毕竟时代不同，肯尼迪班子里的人都坚信总得要同赫鲁晓夫谈判。争来争去也想来想去，最后肯尼迪在1961年7月的电视讲话中明确规定了美国不能作出让步的三项条件，即：美国在西柏林的存在、美国对这个城市的进入自由、以及居民的安全和他们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这就是美国人的回答吗？这就是他们决心捍卫西柏林权利的保证吗？肯尼迪根本没有提到四大国对整个城市的权利。阿登纳不能不对肯尼迪很失望。过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至少在口头上不会吝惜对联邦德国的承诺。肯尼迪太自行其事，他竟然没有事先告诉联邦德国美国的立场。

8月13日发生了筑墙事件，美国作出的最大反应，就是派了副总统约翰逊去了一趟西柏林，而约翰逊除了“有声有色地向柏林人民表明了美国将在这个围城中留下来的决心和意志”外，什么也没有做。美国其实也不想再做什么，只想承认现状。肯尼迪不会屈从苏联的压力而放弃柏林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但他同样也不会为了柏林或德国问题而把同苏联人的谈判引入僵局。在阿登纳看来，肯尼迪7月电视讲话的发表时美国就准备放弃支持德国

统一的口头保证去同苏联人谈判了，而这一点正是德美联盟的基础。

1963年8月，美苏英三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阿登纳再度认为订立这个条约是为了在核问题上摆布欧洲人，于是在政治观念上，他便更倾向于法国和欧洲。如果说在柏林墙修起时肯尼迪派来的一支军队曾唤起阿登纳的一些幻想和希望的话，那么到这一刻，这种幻想和希望彻底落空。

从这个意义上，阿登纳也不得不重视与法国的戴高乐建立某种形式的冷战阵线，这成了阿登纳外交政策的唯一依靠。西方联盟中只有戴高乐支持他在柏林问题上对苏采取强硬立场，同时也只有戴高乐支持他不承认波德之间奥得—尼斯河边界的立场。德美联盟基础的丧失使阿登纳不得不倾全力于欧洲政策，修补法德关系，戴高乐的每一个支持声明在他看来都包含了巨大的信任与理解。到这一刻，他已经顾不上与戴高乐欧洲观存在着巨大差异了。

这里我们再看1963年1月阿登纳和戴高乐签定的法德友好合作条约就会有一种新的认识。它不仅仅把法德友好推向了高潮，同时也将阿登纳后期外交政策引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从整体来看，西德长远政治目标的实现必须有赖美英的支持，西德的安全必须仰仗美国而不是法国的保护，西德根本经不起削弱它与美国的军事政治联系；而法德条约却成为戴高乐将军谋求独立于美苏、作为第三种力量在世界政治中起大国作用的借助工具，美英对此均极为不满。更重要的是，阿登纳是以默许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为代价签署法德条约的，这必然使得50年代后期开始的法国和美英之间发展起来的矛盾冲突，也波及到联邦德国，这也就使得阿登纳想通过法德友好而使德国和欧共体发展起来的任务大大复杂化。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阿登纳虽然确立起法德轴心，但却没有带来他所期望的前景，国际社会一片反对之声，使他在外交上树敌重重。而这时他已经没有精力和实力再对外交政策作出进一步调整了。

这两年国际社会的情况也可谓是遭透了。美国在家门口闹出了古巴危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战火不断，远东中苏之间也吵得不可开交，60年代初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危机叠起的年代。肯尼迪想作出反应，因而抛出了“新边疆”和“多边核力量计划”；戴高乐想作出反应，要通过建立“欧洲人的欧洲”来巩固法兰西实力地位；甚至一向远离大陆的英国也提出了加入欧共体的要求，要增强与欧洲大陆的联系。这其中只有西德的地位是最脆弱的，它不得不对每一方的变化作出反应。这些变化本身是矛盾的，因而它的反应也只能是矛盾的。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要搞缓和，可是世界上却又发生了柏林危机、古巴危机这样的事，这本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年代，缓和的大势中危机四起。况且，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要用柏林墙固定德国的现实，这难道阿登纳可以改变的吗？如果不承认这个现实，肯尼迪和西方国家必然会与赫鲁晓夫一起，指责阿登纳坚持冷战立场，阻碍东西方缓和；如果承认了这个现实，也就等于承认联盟党向德国人保证过无数次的德国统一政策的彻底失败。不论怎么做，阿登纳都不可能摆脱厄运，这并不是他造成的。

实际上，阿登纳自己也确实想解开与美国的这个结，修复德美关系。他不能在公众面前改变他的立场观念，却在暗地推行一种“双轨政策”。1958年，阿登纳向苏联大使斯米尔诺夫试探给东德以奥地利式的中立；1959年他授意制定“格洛布克计划”，1961年西德分别同东欧的波、匈、罗、保四国建立了贸易关系。这些再加上1962年他授意起草的一份将两德置于平等地位上的对德和约，都反映出他想迎合美国缓和的调子，跟上时代的节拍。

但是，阿登纳的步子太慢太小了，既不能使苏联人满意，也没有引起肯尼迪政府的重视，好象他就注定了要被抛弃了。

这一时期内，阿登纳偏重于欧洲的外交政策引起了国内广泛的争议。联盟党内部阿登纳与艾哈德的总理之争，实际上代表了“欧洲主义”和“大西洋主义”两种政治观点之争。后者主张遵循一条更为灵活的方针，倾向于向英美作出妥协，在欧洲共同的政策和大西洋联盟问题上、以及更有想象力的东方政策上支持英美立场。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也在 1959 年通过了一个《哥德斯堡纲领》，破天荒地承认了阿登纳外交政策“在西方联盟体系中为德国人民所起的作用”，并且宣布社民党要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采取新的适应性政策。社会民主党已经准备要作出变革了，维利·勃兰特和埃贡·巴尔正在考虑用一种新的东方政策来打开西德的外交僵局。这种新东方政策的基础，就是承认东欧和德国的现状。无独有偶，作为西柏林市市长的勃兰特与大洋彼岸的肯尼迪非常谈得来……

1963 年的秋天，阿登纳因为《明镜》报事件的影响，引发了政府危机，内外交困中不得不提出辞职，从而结束了联邦德国长达 14 年之久的“阿登纳时代”。他已经八十七岁了。

1963 年对整个西方来说也是糟透了的一年。1 月 14 日，由于戴高乐拒绝多边核计划和英国加入欧共体，肯尼迪“全球战略”的宏图破灭，英国也遭受沉重打击。5 月 8 日，德国联邦法院为法德条约加上了一个限制性序言，戴高乐建立一个以德国支持法国政策为基础的欧洲的雄心，也在波恩宣告失败。阿登纳和麦克米伦都在 10 月交出了政权。肯尼迪在一个月之后也被暗杀。

1963 年使所有西方大国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十一章 夕阳余辉

“做出新的开端，为时始终不晚！”

——康纳德·阿登纳语

“明日犹如往日”

他说：“明日犹如往日！”

我悲伤地久久凝视。

看着他举步走下山来。

他的面颊如此红润，

他的目光眺望远方……

勒恩多夫的书房里，阿登纳坐在安乐椅上，对着窗外莱茵河的雪色，轻轻地吟出了这首叫做《何日君再来》的小诗。

这是1963年圣诞节前的周末，阿登纳正在审阅送礼的名单，看看他是否遗漏了谁。每年圣诞他想到的都是这些人。莱茵河岸上已经积盖了一层薄薄的白雪，彼岸的罗兰兹博根在昏暗的暮色中若隐若现。一艘艘拖驳船神秘地向前移动，消失在莱茵河谷那模糊不清的景色里。阿登纳说，他不喜欢雪，下了雪，万物毫无生气，使他伤感。拖驳船发生阵阵低沉的号声，增添了忧郁的气氛。

离开权力的顶峰已经有一年多了，阿登纳常常会生出一些忧郁的感情。有时他沉思，有时他会吟出一些忧郁的诗句。

1963年秋天的那一幕有时会浮现在他的脑际。

1962年秋，《明镜》报的所谓“法莱克斯”报道揭露了联邦德国防御系统的某些弱点，警察发动了一次午夜行动抄了《明镜》周刊办公室，并且在汉堡逮捕了周刊出版人鲁道夫·奥格斯泰因等人。结果却抓错了人。警察搜捕是因为得到情报机关提供的错误消息——认为奥格斯泰因可能是苏联特务——而造成了这次错误行动的。与这件事直接相关的是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借机而发，鼓动公众舆论，将矛头指向阿登纳，攻击政府触犯新闻自由。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强烈推动下，《明镜》事件转变为一次真正的政府危机，自由派司法部长辞职、国防部长施特劳松下台也不足以平息事态。最后，阿登纳在一片滥用权力的抗议声中不得不引咎辞职。

1963年10月15日，阿登纳在联邦议院中作了最后一次演说，离开了他工作了十四年的绍姆堡宫。

这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是自1958年柏林危机以来内政外交危机的总爆发。

为了使这位昔日的联邦总理习惯于他离休后的生活，辞职后不久，阿登纳身边的人就建议他到卡德纳比亚去休假。阿登纳犹豫再三。因为阿登纳一向喜欢卡德纳比亚，他身边的人希望这里和煦的太阳、清新的空气，以及阿登纳最爱玩的意大利滚木球，能够将他与波恩的政治空气隔开，习惯并享受去离公职后的生活。

卡德纳比亚到处是阴沉苍翠的柏树，长着节节斑斑的老橄榄树以及树叶

光亮如镜的月桂树，一派田园生活的景象。春天的阳光格外明媚，阿登纳经常外出散步。这个地方的多数人并不富裕，但却生活得恬静而安详。房子的墙头大多装饰有彩色的圣像，阳台的铁栏杆构有美丽的图案，到哪里都能望见垂吊的淡紫色的豆花，令人感到有浓浓的乡土气。阿登纳常常从那条阴沉沉的小石巷走过，常看到周身着黑的老妇人，也遇到神态倔强、皮肤晒得发亮、干活的男人，所有人都友好而亲切地向阿登纳致意：“联邦总理先生……！”他们都习惯于看见他，因为他常来，也习惯于他旧日的称呼。

科摩湖畔美丽的自然风光让阿登纳的心渐渐有些平静下来。德意志出版社和阿歇特出版社跟他约了稿，订下了他回忆录德文版和法文版的版权。回忆往事、写回忆录，成了他在卡德纳比亚的工作，但这个工作的进展却很慢。阿登纳的心还想着波恩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他仍然担任着党的主席。尽管很多人觉得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只是个象征性的荣誉地位，但是阿登纳并不这么认为，新闻界对这点也有同感，他们还是积极地追踪报道他。悠闲的隐居式生活，阿登纳从来没有想过。到卡德纳比亚来，他只想散散心，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积蓄力量，重新投入战斗。

1964年秋，阿登纳回到波恩。当他从瓦恩机场走下飞机时，受到基督教民主联盟要人们的欢迎。他容光焕发，皮肤晒得红红的，显然卡德纳比亚的阳光使他重新焕发了精神。新闻记者们团团围住了他，在镁光灯此起彼伏地闪烁、聚光灯炫目地对准他时，他又找回了昔日的感觉。他畅谈了自己回忆录写作的进展情况，非常自信地表示他将以旺盛的精力和斗志重新投入波恩繁忙的政治活动之中。

转瞬之间，那令人难忘的卡德纳比亚又被置诸脑后了。他焕发出昔日雄风，成为新闻关注的焦点。

阿登纳回来后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联邦议院全体大会举行预算辩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团会议、与国内外政治家的会谈……

回到波恩的第二天，就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克里姆林宫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被人赶下台了。这个消息震惊了西方各国，事先没有一点征兆。——“俄国真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国家”。阿登纳评论道，“一切都是那么捉摸不定！既然他们能用这种手法干出推翻赫鲁晓夫这样的事情来，那么一切的一切又会如何发展，还有什么主意打不出来呢？”他越发感到他对俄国认识的正确性，这件事再度成为他向联盟党和德国人阐述对苏强硬政策的最好注释。

阿登纳对西方国家中有人对赫鲁晓夫的同情感到无法理解。柏林墙一再有人被枪杀都已经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现在竟然去为赫鲁晓夫一掬同情泪，简直滑稽、荒谬。他说：“一想到去年（1963年），我今天还要发火！西方简直没领会到俄国粮食危机所包含的重大政治意义，简直不了解！1963年夏秋两季，这个人不是已经到了非常困难的地步吗？西方本该换取俄国人同意实行真正有监督的裁军并结束柏林的烦恼，可他们退缩了，一个多么好的良机失去了！”显然，说归说，起的作用已经很小了，接替他的艾哈德正在积极修复同美国的关系，他可不愿因为阿登纳而得罪了美国人。

对俄国人的警惕和与法国人的友好，仍然是阿登纳时时告诫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内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他也不忘记随时为他的党和他的主张作最有效的宣传。他与新闻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对艾哈德的不满仍然在继续。1964年7月，戴高乐将军访问波恩，受

到艾哈德政府的冷遇。阿登纳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艾哈德不仅冷落了他的朋友，而且完全偏离了他所确定的法德友好的路线。1964年10月，《星期日图片报》为即将到来的联邦议院选举采访了阿登纳。他借此大发一通。第二天，一篇大字标题为《艾哈德对此无能为力》的报道，引起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联邦议院议会党团内部一场哗然大波。

记者采访是以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北莱茵——威斯特伐伦、莱茵兰——法尔茨、萨尔等地方选举中失利揭开话题的。

记者问：地方选举以后，波恩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出现了紧张气氛。请问有利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股逆风从何而来？基督教民主联盟能刹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挺进吗？”

阿登纳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上升的趋势，表明了对联邦政府工作的不满，也是对联邦政府中执政党工作的不满。如果我说情况不是这样，那显然是愚蠢的，……您想想历史上的几次反复吧！根据我的经验：德国人民要求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和领导，如若不然，他们就感到不满。我对竞选颇有经验。德国人民宁愿喜欢强硬的明朗态度，而不喜欢软弱的不明朗态度……如果本届联邦政府和联合执政党真能果断、灵活和坚定地进行工作，同时能作出成绩来，那么，两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前景并不会坏，这些确实是先决条件。

记者问：那您是否在考虑什么具体的事情？

阿登纳一笑：我考虑的事情多着哪！

记者追问：是考虑外交政策，欧洲经济共同体吗？

阿登纳道：我在考虑整个社会领域，这方面一直占很大的份量。但我也考虑我们的外交政策……

我认为，外交形势方面，特别是对联邦共和国来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局面：在苏俄，竟能秘密准备并搞出像推翻赫鲁晓夫这种更班换马的事来，而对此竟没有一个国家的大使，没有一个情报机关，没有一个记者事先能得到点滴消息，这确实反映了一种危险性，如果再考虑到俄国拥有核武器的话，足以使人不寒而栗。同时还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会怎么样呢？英国人、戴高乐对此将持何种态度呢？所有这些我们都不清楚。

记者插问：那么，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保持最高度的警惕，是吗？

阿登纳语气坚定地肯定：永远保持警惕！

记者转而又问：您对戴高乐总统很尊敬，但他为什么会制造这么多的麻烦呢？现在他跳了出来，和俄国人签订贸易协定，对莫斯科如此曲意逢迎。戴高乐不是以抵制欧洲经济共同体、甚至以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威胁吗？

阿登纳答道：我认为戴高乐的这一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今年7月他在波恩受到联邦政府冷遇有关。像戴高乐这样一个人物，不论是从他在世界上的整个地位来考虑，还是从他的全部性格方面来看——对他的性格我有所了解，显然都是不能容忍这一点的。

记者问：其中也有个人的恼怒起作用吗？

阿登纳说：您对戴高乐不能这么讲，再说，他和德国结下了友谊，而这是其他法国人所没法办到的。当然，他这样做是出于法国的利益，并不是对我们有特别的好感。好感在外交政策中是不存在的，而是本国的利益，即法国的利益起着作用，因为欧洲的局势由于苏俄的侵入已经完全改变了，而这两个国家又是邻国。现在戴高乐突然感到德国经常找麻烦，这点我是根本不理解的。

记者问：您相信戴高乐会改变对德国的态度吗？是否可能出现巴黎——莫斯科轴心？

阿登纳回答：对，肯定的。但这与戴高乐毫无关系。戴高乐也不会长生不老，在法国，共产党是所有政党中最强大的，而且也是组织得最好的一个党。

记者试探地问：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趁戴高乐还健在的时候，尽量争取时间，是吗？

阿登纳肯定答道：是啊，我们必须作最大的努力，好趁戴高乐还健在，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得到巩固。这对我们确实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德国多项外交政策必须着眼于此。

可以想象阿登纳的这次公开谈话得罪了新总理艾哈德，也得罪了联邦政府里所有的人。阿登纳捍卫了他自己的观点，也热情维护了他的朋友。对这个拥有崇高声誉与地位的老头，无论是新总理艾哈德，还是基督教联盟党都是无可奈何。

不过，形势发展证明阿登纳有关艾哈德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的预言完全正确。艾哈德的胜利多因于他在经济方面的成功，他的权威也仅因于选民的拥戴，一旦真正执掌大权，他外交上犹豫不决、政治上优柔寡断的个性很快暴露出来。艾哈德在争取本党支持、协调各种矛盾、驾驭各种困难形势等方面的能力远不如阿登纳，他不仅没能摆脱阿登纳时期内政外交的困境，反而使各种矛盾大大激化。他面向大西洋的修复政策同样未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威信越降越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声望却不断在上升。

1964年11月，长期重病的前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勃伦塔诺去世了。这对阿登纳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凄伤，他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战友。从二次大战结束、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以来，阿登纳和勃伦塔诺就密切合作，阿登纳曾对勃伦塔诺寄予过莫大希望，称勃伦塔诺为“我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的必要保证”。现在勃伦塔诺却先他而去，阿登纳不能不感到莫大悲痛。他去参加了勃伦塔诺的葬礼，其后一直情绪低落，直到1965年初，他去了法国，见到了戴高乐，并接受了法兰西学院隆重授予他为伦理学和政治学院士的荣誉，他的心情才开朗得许多。这次去法国，报界评论说他在法国“红得发紫”。在这种恭维客套之辞中，他感受到法国人的极大诚意，并为此十分愉快。

1965年1月5日，阿登纳度过了他八十九岁的生日。在几天前圣诞节的讲话中，阿登纳就已经表露出他对世界形势的极大忧虑，况且人到这个年龄对本人来讲也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就好像是做展览，他希望不搞大型庆祝。

生日这一天，他只接受了基民盟在小范围内对他的祝贺。在他心里有更多的事还等着他去操心。1965年对他来说充满了问号：联邦议院还面临着选举，基民盟形势岌岌可危；英国工党政府又上了台，谁知道他们会对东方有什么新的举措？克里姆林宫换了新人马，去向未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它又会有什么更深刻的影响？刚刚赢得竞选的约翰逊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还不得而知……他最关心的北约改组和欧洲联合问题更是前途未卜。

1月24日，从伦敦传来了丘吉尔的噩耗。又少了一个同路人，阿登纳的心情再度沮丧。曾与他一起搞政治的人越来越少，圈子也越来越小了，世界形势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从旧有的逻辑出发，阿登纳认为政治局势与其说在继续发展，不如说在不断恶化。

他仍然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联邦德国同法国和美国的关系。自从艾哈德和戴高乐总统再度会晤之后，德法关系看来已经摆脱了夏季以来的冰冻状态，出现了某些好转。虽然对法关系有了些希望，但同美国的关系却一点也不容乐观。这些年来，阿登纳利用一切谈话的机会向他大洋彼岸的政治伙伴们灌输：美国的命运同欧洲的命运休戚相关，欧洲应是美国外交的决定性重点，是美国利益真正的所在。但是，这一基本事实是否也为华府官员们所看到呢？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代过去之后，白宫的新主人虽然继续着这一路线，但从柏林危机、北约改组这一系列事件中，让人不能不感到欧洲的重要性在华府的心目中已经丧失。难道欧洲已经安然无恙，再也不会来自苏联的危险了吗？阿登纳决不相信这一点。他希望美国人也能看清这一点。

2月5日，阿登纳在波恩联邦参议院侧屋的办公室里接见了《纽约时报》的发行人C·L·苏兹贝格。阿登纳认识他已多年了，苏兹贝格对美国舆论有重大影响。他们畅谈了几个小时。

1965年2月10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报道：

当问起八十九岁的康纳德·阿登纳，谁是他赏识的最重要的人物时，这位前总统拿起他写字台上一张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签名照说：“就是这一位，他头脑精明，有预见，并且遵守诺言。”

阿登纳悲观地认为，当前在华盛顿找不到一个这样有才能的人。他认为，美国热衷于东南亚，忘记了更为基本的欧洲，而他却在为欧洲的前途担忧。他说，“欧洲大陆是美国的弱点所在。如果美国失去了它，俄国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当代德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也不能摆脱这种疑虑，即华盛顿同莫斯科为了维持现状而有着默契。他相信，这是美国决定不发展中程导弹的原因，而阿登纳把这种中程导弹看成是对付苏联炮兵的不可缺少的平衡力量。

此外，阿登纳还在想，戴高乐一旦退出政治舞台，则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就将取得政权。到那时，他预料西德抵抗苏联的意志就会涣散。

阿登纳相信欧洲今天在军事上是没有防御力量的，而明天在政治上也将没有防御力量。由此他得出结论：“我们正处于1945年以来的最危急的时期，而你们的国家，西方最大的国家，却无所事事，不肯正视这种危险。”

阿登纳宣称，他同肯尼迪总统曾就美国发展机动中程导弹和把它们设置在欧洲以抵销俄国在这种武器上的优势一事达成过协议。尽管如此，但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均未履行这一协议。

阿登纳说，这就使人怀疑，并促使德国去依靠法国给予迅速的、尽管是微小的核援助的保证，以抵抗苏联的任何进攻。波恩和巴黎都不幻想它们能单独对抗俄国的力量，但是它们相信，它们能迫使美国使用原子武器进行干预。

在政治方面，阿登纳确信，俄国人正在等待他们能够取得欧洲的时机。阿登纳抱怨说，西方民主国家接二连三地向它们的追求赢利的商人让步，因而减轻了苏联的内政困难。他们提供了机器和粮食，而没有要求对等的让步。而莫斯科还在等待着。

“您设想一下克里姆林宫是怎样看待欧洲的，”阿登纳说，“戴高乐七十四岁了，如果他一旦不在人世的话，除了共产党人之外，法国再也没有重要的政党了。人民阵线将获得政权。接着就将轮到意大利。我们夹在这两个国家和俄国之间该怎么办呢？莫斯科紧紧抓住德国中部不放，以此作为重新统一的诱饵来引我们上钩——按照俄国人的条件来压我们就范。

“但是华盛顿却无动于衷。约翰逊总统委托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副手花了半年时间进行调查，看美国部队撤出欧洲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您以为，搞这种调查的无聊想法能使我们高兴吗？”

“美国对欧洲不再感兴趣了，也不领导了。我支持你们多边核力量计划，但从不相信它会有什么前途，它不能代替中程导弹。戴高乐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欧洲没有美国就会完蛋。你们再也不能把这里看成二等地区了。如果你们仍然沉湎于你们在越南的战争，美国人民将会厌倦的。美国人民的心理有一定的限度，将会逼得你们退回到孤立主义中去。”

莱茵河上往来的船只在老人的办公室外突突作响，工厂烟雾腾腾，笼罩着一片繁荣、幸福的景象。

“你们不要被今天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老人说。“你们要想到明天。我希望你们及时地醒悟过来。”

当天的其他报纸也对阿登纳的这次谈话作出了转载并发表了各式各样的评论。《图片报》用了醒目的标题：《阿登纳：美国在欧洲失灵。美国的眼睛一味瞟着亚洲。美国对危险视而不见》。在标题下的通栏写的是：《德国疑虑重重》。《世界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用一种相当尖锐的语气写道：

“康纳德·阿登纳还从来没有像他现在在同《纽约时报》的谈话中如此明确地表示过对美国政策的保留意见。由此可见，在他担任联邦总理期间，脑海中已充满了这些批评意见。所以他的话直至今现在还说明他最后执政年月中的这些矛盾态度。

怀有这种忧虑的绝不仅仅是他阿登纳一人，在这一点上并不受党派的局限，阿登纳所谈的美国人在欧洲的安全政策尤为如此，连与华盛顿有密切关系的热心追随者也为之弄得极度混乱。

美国通常以核武器的先进技术作为改变战略的理由，可是主

张削弱欧洲大陆核力量的动机，则是一种变化了的外交政策思想。美国人本身固有的、日益严重的弱点，促使他们去寻求同苏联人搞世界政治平衡，而这种思想一旦占了上风，就往往与欧洲人在军事上的安全需要不相吻合。这就促进了戴高乐主义，这一政策即使在波恩也不是没有影响的，尤其是因为感觉到缓和政策、战略和冻结中欧政治现状几方面牵连在一起也有碍德国问题的解决。约翰逊总统在外交政策上明显放弃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的积极性，加深了这一恐惧，而路德维希·艾哈德想以调整同巴黎的关系作为对策……”

这次记者谈话再加上新闻界的有意宣传，引起了从大洋彼岸到联邦德国国内的强烈反响。此时正值大选之年，联邦德国各党派正积极地筹划联邦议院的竞选事宜。消息一出，社会民主党立即在它的机关报《议会政治新闻》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动物的人民之友”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一次拙劣的效劳》。该评论说：“阿登纳的谈话是为了把美国和联邦共和国之间早已不牢固的关系再次搞糟……艾哈德政府将要费点力气才能把前联邦总理昨天打碎的瓷器重新胶合起来。”

联邦总理打碎了瓷器吗？阿登纳不理睬这一切反应，在他看来，他是必须要说出他想说的话，他不会袖手旁观、装聋作哑，或是卑躬屈节、忍气吞声。他是为了基民盟，他要使基民盟的竞选有一个鲜明的立场。阿登纳又挑起了一场论战。

眼看距离秋季的联邦大选越来越近了，形势对基督教民主联盟相当不利。在这一次联邦议院的选举中，人们感到无所适从，因为两个大党的观点日益接近，对政党几乎不能再真正从政治上作出选择了。阿登纳当然认为这种观点是荒谬的，两党有着根本的差别。“事关德国的前途！”他决意全力以赴地投入本届竞选，以证明这一点。

同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进行全面磋商、广泛地作竞选旅行、发表竞选演说，这是阿登纳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他每天都到波恩，常常是一早去，直到深夜才回到勒恩多夫。

1959年，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哥德斯贝格纲领》，在外交领域和安全政策上改弦易辙，阿登纳对此进行了集中揭露和攻击。即席演说是他的拿手，阿登纳不放过每一个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机会。在德国公众面前，他嘲笑社会民主党的改弦易辙朝三暮四：如果一个政党对谬误的东西顶礼膜拜达十年之久，人们还能对它表示信任吗？他又讽刺社会民主党人的鼠目寸光，也连带批评自由民主党人。他说：“如果说它们今天在许多观点上接近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治路线，那么，对选民来说，这就是反对党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政策错误，并证明了我们政策的正确性。”他极力为基民盟的政策作辩护。

阿登纳当然也明白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他这次竞选采取的策略是“搔痒”，不是他往年竞选中所习惯用的“敲木槌”。他解释说：“要是我从中得不到我所期望的东西，又何必去激怒别人呢？……当然，我能够激怒人，要是于我有益的话，我会毫无顾忌地大胆去干。我的宗旨在于：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我们联邦议院需要进行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改革，要进行改革，得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没有德国社会民主党，我们办不到这一点。如果一开始就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那就不能得到这个多数了。这确实是个问题。那

样一来，合作就非常困难。为什么要采取粗暴的态度呢？那种做法是愚蠢的！”

八十九岁的阿登纳不辞辛劳，到各地作了大量的竞选演说。有些日子他甚至一天要演说七、八次。但这样没有使他精疲力竭，他反而感到精神振奋。他走出了办公室，广泛地和普通选民接触，这种接触不断地给他补充了能量，他不仅精力充沛，而且显得越来越有活力。阿登纳并不为演说作大量的准备，因为他随时能即席而发，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直接接触自己的听众。每次演说中，他总是仔细观察听众，掌握会场的情绪，以判断他所讲的内容是否在起作用。听众的反应，无论是热情的喝彩还是恶意的嘘叫，都是对他的鞭策，尤其是插话更能激励他，鼓舞他。遇上有人插话时，阿登纳常常施展全身解数，谈笑风生。他最擅长的是把复杂的关系简单扼要地表达出来。尽管他的词藻并不见得华丽，也很难说出句句金科玉律，但他能以开门见山和生动活泼的方式，以饶有幽默、风趣盎然的语句使听众为之着迷，体会到他的个性所焕发出来的力量。这一切使他的演说获得巨大的成功，听众如痴如醉，每到一处，他都大受欢迎。

此次竞选期间，阿登纳的体重增加了三磅，这使他的私人医生异常高兴。熟悉他的人都说，政治斗争使他欢乐，使他精神振奋，也使他胃口大开。

自1965年春季起，美国和苏联开始在日内瓦就不扩散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阿登纳认为，如果华盛顿和莫斯科在目前的力量对比基础上达成协议，那么欧洲各国要想奉行一项自主的欧洲政策，肯定是为时过晚了，要让欧洲成为一种独立的因素，使它能够随时以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那肯定也是为时过晚。而且，这个谈判也会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构成极大的危险，北约防御联盟的墙脚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挖空，从而也将危及联邦共和国的安全。阿登纳很忧虑。8月，日内瓦谈判进入具体化阶段，美国人提出了一项条约草案，艾哈德政府在8月17日发表了一项拥护声明。阿登纳尽全力反对艾哈德的这一做法。由此，引发了作为基民盟主席的阿登纳与联邦总理艾哈德一场公开的冲突。

8月19日，阿登纳在明斯特作了一次演说，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一针见血指出：“美国企图把核大国的范围永远局限于三国的计划令人发指。这个计划是如此可怕，因为它要把欧洲拱手奉献给俄国人！……日内瓦裁军会议名不副实。我对美国人的建议深感失望。他们想阻止我们联合起来进行防御。这不是我们和欧洲应得的报酬。……拯救世界的唯一办法是，所有国家都放弃原子弹生产。但是，只要其他国家不能以组织形式对这种武器进行监督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小的核俱乐部就意味着不幸。我担心、美国人和俄国人在撇开我们取得谅解。我们要大声疾呼地反对日内瓦眼下发生的事情。局势强烈要求我们更强硬、更有力地推行我们的外交政策。”

第二天的《图片报》在醒目的位置对这次讲演作了报道评论，大标题赫然是：《这不是欧洲应得的报酬！》，副标题：《阿登纳为美国的核计划深感忧虑》。明斯特的演说在波恩犹如扔下了一颗炸弹。8月21日的《斯图加特报》刊登了社会民主党的反应。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弗里茨·埃勒谴责阿登纳“不负责任地大放厥词”，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说得更为刻薄：“老总理阿登纳狠狠刮了二总理艾哈德一顿胡子。——没有理由怀疑美国人要牺牲联盟，没有理由发出错误的警报。”报纸的评论在其中更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是这家报纸，在当天的评论中写道：

“众所周知，康纳德·阿登纳具有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地予以概括、把真实的情况夸大地予以阐明的才能。谁要想得到广大阶层的了解，谁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见解，谁就必须具有这种才能；如果说现在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团因美国的建议而把日内瓦裁军会议称之为‘德国人的悲剧，’那么，他所再次展示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才能。对于这件事，他像通常所做的那样，确实是有几分夸张，但也不能断言他的忧虑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

离联邦议院竞选只剩下三个星期，联盟党内对阿登纳的讲话感到恼怒，因为这样的讲话归根结底是对联盟党政府政策赤裸裸的批评，联盟党党内意见的分歧将很容易引起社会民主党的攻击，为联盟党的竞选带来很大困难，社会民主党显然也牢牢抓住了这一点。

浪越高，阿登纳劲头越足。他认为这只是他一生与政治风浪博击中很平常的一次。他劲头十足地说：“一个人讲话如果没有勇气单刀直入，到头来他就活该被砸烂。”他相信他既具有掀起政治风浪的能力，他也就能够驾驭。

8月23日，阿登纳主持召开了一次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团会议，联邦总理艾哈德怀着满腹怒怨参加了。会议的目的是要医治一下受到创伤的联盟阵线。会上，两人吵得一塌糊涂，谁也不能说服谁，艾哈德指责阿登纳干涉了联盟党政府的政策实施，阿登纳也抨击艾哈德不重视外交关系，结果不了了之。

从第二天的报纸上可以看到，他们谁也没能说服谁，但却力图弥消公众对分歧的印象：《法兰克福汇报》的标题是《主席团明确表示赞同艾哈德》，而《波恩评论》日报则登（波恩：必须注意德国问题——联邦政府支持阿登纳的要求）。——会议公报用了一种相当巧妙的措词，以致人们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阿登纳本人在当天雷克林豪森的竞选集会上，对选民们高呼：“为党内的不一致而流的鳄鱼眼泪可以立即收起来了！”使风向为之一转。8月26日，《波恩评论》顺着阿登纳的口气，再次报道：

“联盟党的竞选战略家们舒了一口气。他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同僚们在竭力防止出现坏事。这些不同的反应的引起，除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康纳德·阿登纳博士外别无他人。他三言两语就打乱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战略。他对美国关于限制核军备的建议所作的评论，一下子就把外交政策重新推到了联邦德国竞选的中心……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战后的竞选中曾首次成功地主动迫使基督教民主联盟接受竞选斗争的题目……现在由于阿登纳的攻势，面貌已经改变。”

正如《波恩评论》的报道，阿登纳玩的这个政治花招又告奏效，他又一次稳住了舵，平息了由他掀起的政治风浪。

阿登纳说他很想在这时候就看到一个联盟党和社会党的大联合政府的出现，以促进一系列重要的立法改革的实现，但是，他的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1965年11月大选揭晓，联盟党赢得了多数而非绝对多数的选票，各方活动的结果是，它又一次组成了与自由民主党的联合政府，联邦总理仍然由路德

维希·艾哈德担任。

阿登纳曾竭尽全力地想对政府的组成施加影响，最重要的是对他所历来重视的外交部人选问题施加影响，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他虽然仍然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但这一地位并没有给他以所期望的份量，党内许多人对他是敬而远之了，他对来访的记者们抱怨，但几乎不能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了。他带着一种惆怅的心情，开始了10月底到科摩湖的秋季休假。他要在卡德纳比亚专心致志地继续撰写他的回忆录，他要把这种惆怅的心情抛在脑后。很早以前阿登纳就明白，政治就如同人们生活一样，必须把那些无法改变，不合心意的事实如实地承受下来，只有耐心、冷静地坚持自己的希望和目标，事情才会有转机出现。政治家的信念应该是坚持不懈。他知道他该作怎样的调整了。

卡德纳比亚的金秋美得令人迷醉。阿登纳以一种闲适的心情迎接在那儿一个月的生活：写写回忆录、听听音乐、看看小说，到科摩湖边曲曲折折的小径上散散步，或者坐在科林纳别墅的平台上，看沐浴在温煦的夕照中的山峦、树林以及闪烁着金色余辉的科摩湖。这种生活使他的身心重回清新的大自然。

留声机里常常播一首埃布尔唱的赞美诗，每当这时候，阿登纳总是一个静默着、沉醉着、感受着自然的神圣与辉煌：

“噢，天父，你的世界多美啊，
当她放射着金色的光华！
你的光芒一旦向人间撒落
涂染得凡尘闪闪生辉……”

那透过薄云的红霞，
直泻在我这静谧的窗纱上！
我还能悲叹，还应害怕？
还会对你怀疑和自感渺茫？
不，我要敞开胸怀拥抱一切，
这儿就是你那极乐的天堂。
只要我心犹未碎，

它就吮吸着热和光！”在落日余辉的科摩湖畔，歌声使阿登纳的心回复到一片宁静与肃穆之中……

九十岁

幸福常在彼岸。

—— 1965 年秋，阿登纳对前来卡德纳比亚的意大利前总理塞尼如是说

从圣诞节前开始，基督教民主联盟就在为它的主席九十岁的寿辰作筹备了。九十岁的人依然活跃于政坛，这是极为罕见的。一过新年就是阿登纳的寿诞。它将非常有纪念意义，整个德国都在谈论这件事。不仅仅是基民盟，所有的德国人都想借此表达他们对他的感激之情与祝贺之意，因为是他缔造了这个国家，是他把他们从迷茫与痛苦的深渊引向安宁、自由与幸福的。

贺信、贺电和祝贺文章从圣诞节开始便如雪片一样飞至勒恩多夫。为了庆祝阿登纳的九十寿诞，基督教民主联盟作了周密而隆重的安排。生日前夕，联盟党先在贝多芬大厅举行了一次大型招待会，邀请了阿登纳在各界的亲朋好友参加。而到 1 月 5 日生日的那一天，安排更是紧凑：上午在联邦议院大厦举行祝寿盛典；下午在绍姆堡宫召开内阁特别会议，应邀参加这次会议有曾经在阿登纳总理领导下担任过联邦各部部长的全体人士；晚上将由联邦总统举行国宴，届时各届来宾贺客将云集于霍夫花园……

阿登纳仍然每天准时到波恩去。所有的报纸在这几天都把阿登纳的寿诞作为报道的中心。所有的记者都想得到有关头条新闻。这种没完没了的道贺并没有让阿登纳感到愉快。有一天，阿登纳赶去出席联邦议院全体大会。路上，《明星》报记者瓦尔特·亨克尔斯主动跟他打起了招呼。亨克尔斯请求为阿登纳拍张照片以作封面。阿登纳没好气地说，“现在免了吧！我得首先看几期《明星》报，以便确定我在拍照时衣服是不是穿得太多了。”亨克尔斯只好讪讪作罢，类似这样的情形还发生好几次，阿登纳都生硬拒绝了。他感到有些愤怒，他不想在这种情形下成为新闻关注的焦点。

所有人都在为他的九十大寿而大作准备，阿登纳感到有些怅然，甚至人们对他表示的敬仰和举行的所有庆祝仪式，也没有使他真正开心起来。他对即将到来的这一天有一种莫名的心情。对他周围的人自嘲地说：“人到九十岁，就是一个负担了。而如今还来这么一大套……有点像博物馆的展览品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1966 年 1 月 5 日，阿登纳九十岁的寿诞。联邦德国举国为之欢庆。尽管情绪不高，阿登纳还是强打精神，出席了各种庆典。在波恩的贝多芬大厅、在联邦议会大厦、在哈默施米特别墅，阿登纳同数百人握手，若无其事地接受所有人向他的道贺。没有人感到他情绪的变化。庆祝活动以这种令人疲劳的方式进行，九十岁的阿登纳仍然没有显出一丝疲劳的迹象。他那风趣而又确切的即席插话，令所有人感到他的生气勃勃。“喧闹使他感到高兴，他轻松自若”——《基督与世界》周刊这样写到。“在波恩贝多芬大厅那潮涌般的人群之中，他挺直腰板、气概凛然地一一握着那无数双手”——《莱茵信使》周刊如此报道。他的办公室和家成了花的海洋，他每天收到大量的鲜花向他表示祝贺，其中大部分是他所热爱的玫瑰。凡是阿登纳不愿让人知道的，他就不形于色，莫名的心情被压在了心底，人们看到的仍然是那个刚强、坚毅的德意志联邦总理。

九十寿诞一过，阿登纳就决意在春天辞去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职务。

尽管他心里难以割舍，但“负担”的心情影响着他。由于他和艾哈德的不一致，基民盟在人们心中的印象里变坏了，这一点他也感受到了。3月初，基督教民主联盟召开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阿登纳让出了党主席的职务，改选的结果是使得他不喜欢的艾哈德又一次作为他职务的接班人。他只能听之任之了。

辞职后，阿登纳再次去了暮春的卡德纳比亚。这一次除了继续撰写回忆录之外，他还要做两件事：一是让著名画家奥斯卡·科柯施卡为他画一幅肖像画，后者曾经给联邦总统豪斯教授画过像；再是为5月的以色列之行作准备。

最初阿登纳并不情愿让人为他画像，但当他看见科柯施卡教授时，他改变了这个主意。科柯施卡刚过了八十岁的寿辰，一见面他们就感到一种油然而生的、只有历经过沧桑的老人才能有共鸣的和相互间的亲近。科柯施卡为他画了将近一个月的像，这期间他们成为朋友。科柯施卡的画完成后被放在了联邦议院大厦里。

1966年5月2日，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载着阿登纳一行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附近的利达机场着陆。这是一个德国著名领导人第一次出访这个新建的犹太人国家。前来机场欢迎的有以色列前总理本-古里安、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以色列魏兹曼科学研究所秘书长梅耶-韦斯加尔、世界犹太人组织主席内厄姆·戈德曼博士以及其他以色列社会名流。阿登纳为这一天等了许多年。

刚一下飞机，阿登纳又被新闻记者团团围住，在麦克风、电视摄影机镜头，和林立的聚光灯前，阿登纳沉着地发表了他的到达演说：

“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沉重和最为美好的时刻之一。之所以说是最为沉重的时刻之一，是因为它使我想起了特别是贵国人民所遭受到的不公正的事；但也是最为美好的时刻之一，因为我在这里能够看到贵国人民的创造。你们来到了这里，重新争得了你们的独立，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成就之一，这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事。上帝给了你们以建立新的生活的力量。我欣赏犹太民族的勇气和才干，上帝赋予这个民族的使命，就是向世界表明，希望和仁爱具有何等力量。”

讲话结束，所有的人都为 him 鼓起掌来。在场的以色列人为这位德国前联邦总理的高尚情怀而感慨不已。

阿登纳对这一天的到来是有所准备的。从当上联邦总理的那一天起，阿登纳就决心履行道义上的义务，在支付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减轻由于纳粹德国的罪恶给犹太民族造成的苦难和不幸。联邦德国成立仅三年，1952年9月，当时国内还有许多困难，阿登纳就顶着各方面的压力，与以色列政府和世界犹太人联合组织签定了向犹太人支付赔偿的卢森堡协定，尽可能地赔偿遭受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的损失。此后，他又积极主动改善德意志和以色列两个民族关系。这一切做法使他受到以色列政府的欢迎与崇敬。1956年，当阿登纳访问美国时，他在华盛顿遇见了以色列总理本-古利安。本-古利安热情地邀请他访问以色列。但是当时舆论显示并不适合作这样的访问，阿登纳将访问一直推迟到了这一刻。

即便是此时，阿登纳访问以色列仍需要有巨大的勇气。战争结束只有十几年，犹太人对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仍记忆犹新，激进的犹太人主义者强烈抗议德国人进入以色列。在阿登纳一行离开利达机场的那一刻，气氛骤变。一百多名以色列人手举着“阿登纳，滚出去！”的标语牌，高呼口号抗议示威，并散发传单。阿登纳默默承受着这些，他已经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他并不打算退缩，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他明白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犯下的罪孽太深重了，今天的德国人必须为之偿付道义上的责任，此刻以色列人这种冲动的表现只是由于痛苦的过去所引起的极度仇恨的爆发。他知道在这里，人们反对的也不是他本人，他作为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当了十四年，人们把他作为新德国的一个象征，仇恨使它们要打击一切带上德国烙印的东西，以表明他们没有忘记过去。阿登纳曾经经过国家社会主义的暴政时期，他理解这种仇恨的心理。而他之所以踏上这块土地，正是为了要化解这种仇恨。

这样的情形在阿登纳访问期间还发生过好几次，他都泰然处之。

令阿登纳感到欣慰的是并非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怀有这种永远仇恨的心情，还是有许多有思想有远见的以色列领导人，他们像他一样对这两个民族的美好怀有希望和信心。也正是为了这些，他才来到这新兴的国家，踏上这新的国土的。

第二天阿登纳到以色列著名的魏兹曼科学研究所接受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科学研究所所长梅耶—韦斯加尔盛赞了阿登纳为了促进两个民族的理解、沟通所作的一切。他说：“我们赞赏阿登纳忠诚不贰地坚持民主的理想，他始终不渝地维护民主的理想，并为此而在希特勒政权下吃了苦头……阿登纳对以色列给予他的所有荣誉足以当之无愧……他对当代政治的贡献就在于：他理解‘负责’这个�的概念，并且不断地努力使之以现代的政治形式发挥作用。他知道，国家不能逃避自己历史上所作所为而应承担的责任。这就是阿登纳对这一代人所要讲的话……”

这是以色列给德国人最高荣誉的赞扬，阿登纳第一个荣获了此项殊荣。

阿登纳住在特拉维夫伊尔通饭店。以色列官方为他安排了严密的保安人员。当天傍晚，他信步走到附近的海滩去散步。海滩上安放着一只十分普通的小船，阿登纳看到了它，走了过去，他发现了在小船旁边竖着的一块牌子，上面用希伯来文写着：

“1948年犹太人在为建立自己的以色列国而进行斗争的最后阶段，果敢地乘船航行到他们祖先的土地上来，这只船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寄托在这种船上，抱着死里求生的希望。这是面对着残忍、似乎是冷酷无情的现实而采取的一种过激的态度。岸上无人欢迎，后退也不可能，他们作了孤注一掷。这是来到既古老又新鲜的家园的最后一段路程。许多人试图以这种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少人惨遭翻船灭顶、或被枪杀。这是1948年以色列国建国时期航行抵岸的少数船只之一。”

阿登纳沉默了，他久久伫立于前，凝视着这只黑黝黝的小船心潮翻滚。他想起在纳粹时期曾经帮助过他的两位犹太朋友，也想起希特勒对犹太人迫害的惨状。周围是随同出访的人和以色列的保安官员。不远处海涛拍岸，蔚

蓝色的苍穹渐至深暗，徐徐沉入大海的夕阳，把天边染成血一般的鲜红。他很久都没有讲一句话，心情沉重地回到了饭店。

在以色列访问的一星期中，阿登纳除了拜会了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外长埃班、耶路撒冷市市长特迪·科勒克，前总统夏扎尔及前总理本—古里安等政府要员、世界犹太人联合组织主席内厄姆·戈德曼博士等人之外，还广泛地参观了整个国家。他去看了耶路撒冷的新城区和老城区（为约旦管辖），到列维德—瓦舍姆参观了纳粹时期殉难者纪念馆，去领略了昔日古罗马犹太领地首府凯撒城遗址的风采，还到耶稣曾作过登山训众的福音山去做了弥撒。走进拿撒勒的耶稣教堂时，阿登纳不无感慨地说，“谁要是在一生这样艰苦的时刻，劳累而忧郁地来到这个宁静的地方，谁就会懂得他此刻异常感激的心情。”——他理解了个国家，理解了这个民族为建立这个国家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和艰辛劳动，他对这个民族肃然起敬，他也看到了十几年来这个民族的建设成就。他在最后一天拜访本—古里安的家时告诉后者：“和我一生中的许多重大经历相比，我在以色列这里内心感到更为激动。”阿登纳对本—古里安再次重复了踏上以色列国土时说的最后那一句话：“希望和仁爱具有何等的力量！”

以色列之行过去了很久，阿登纳仍然沉浸在这样一种激动的心情之中，他把这次出访以色列的意义看得极为深远，认为这是化解两个民族仇恨的开端。而作为他个人，他本人则感到是偿付了心灵之债。

阿登纳的下一个访问地是西班牙。西班牙宣传和旅游部长弗拉加·伊里瓦内 1966 年夏天向他发出了这次邀请。他从未去过西班牙，但却极其渴望到西班牙去，所以一接到邀请，他就开始筹划这次访问了。尽管是作为一次礼节性的和旅游者身份进行的访问，但阿登纳仍然认为此行会很有意义，西班牙人邀请他在马德里政治与科学报告中心作一次有关外交问题的报告。西班牙由于地理位置长期被欧洲中心视为外围，他希望西班牙人也能尽早加入到欧洲大联合的行列。

但是，从 1966 年秋天开始，阿登纳被一种顽固的老年性支气管炎感染了。病一直在发作，他不得不在勒恩多夫躺了三个星期，也不得不推迟了行期。就在他躺在勒恩多夫的时候，波恩政局发生了突变：艾哈德政府垮台了，政府危机以一种新的形式得到解决——组成了大联合政府。1965 年秋天，阿登纳曾经希望搞大联合，据他判断，克服经济的不景气，希望联邦财政好转，只能靠议会中能挑重担的执政党多数对此采取强有力的举措，这当然只能靠各主要党派的大联合。现在大联合出现了。阿登纳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赫伯特·魏纳寄予了希望，他一改过去不信任态度；表现了对社民党领导人的宽容与忍让。他希望社民党能与联盟党一起，克服内政困难，重新确定并稳定外交政策的轮廓。

在此期间世界局势也令人瞩目地发展着，在阿登纳的眼中，欧美密切协作对付苏联的希望越来越暗淡：莫斯科和华盛顿正越来越频繁地接触；美国要撇开欧洲单独同莫斯科缓和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有关防止核扩散条约的谈判及其以维持现状为基础的种种后果亦日趋明显。阿登纳与戴高乐关于欧洲前途忧郁阴暗的预言已经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成为现实了，欧洲处于莫大危险之中！

阿登纳不能保持沉默。1966 年秋，阿登纳在卡德纳比亚科林纳别墅发表了一次电视讲话，他以一种灰心绝望、却又是最激烈不过的语气，再次提出

了他的警告。

他说，他强烈反对现在到处流行的那种认为来自东方的威胁已经减少、欧洲已经不再处于共产主义危险之中的观点。他指出：华约国更换了现代化军事装备，同时又铺设了新的铁路线和新的可以行驶装甲车的公路，所有这些线路都是指向联邦共和国的，所有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威胁西方。最近华约举行的代号为“摩尔达”的军事演习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说：“这次空军演习的有关通盘计划，目的在于必要时突然入侵德国，以摧毁机场，那样，美国就根本不可能调来增援部队，因为增援部队无法再着陆了……”

记者问他：“阿登纳博士先生，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如果不能阻止美国人在不久的将来至少是部分地撤走自己的部队的话，那么根据您的看法，欧洲大概也就只有德法两国——人们可能一直这样认为——不得不努力去填补这个军事上的空白罗？”

阿登纳回答道：“我们无法填补这个空白。我不知道，我们如何能填补这个空白……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我们没有核武器，苏俄有……”

记者问：“您试图使您在这里所阐明的政策，首先是您的忧虑，在您的党内产生作用吗？再说——也许——您怎样做呢？”

阿登纳回答：“我愿意告诉您，我已经下定决心，在政治上无论如何不再出头露面了。但是……如果祖国的困难像我所认为的那样深重，德国遭受到危险，那么我也将公开地提出我的政治观点。今天我就要提。”

记者问：“眼下您就要提，这就使我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眼下您想提些什么呢？”

阿登纳回答：“提醒注意那咄咄逼人的危险：提醒美国注意，把欧洲输给了俄国人是美国最重大的损失，这一损失是美国人无法想象的……”

当然，美国不会听他的，启宫不会理睬欧洲这么一个从德意志帝国过渡来的顽固的老头发出的警告，美国要执行美国的欧洲政策。阿登纳感到，欧洲今后的任何独立性被粉碎在萌芽状态的危险越来越严重了，欧洲国家想有一天能自己维护自己利益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他感到呼吁欧洲政治联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他要尽自己的努力，他要去马德里，他要去巴黎……

阿登纳积极准备着他去马德里的演说，他把它定名为《欧洲与世界发展》，他把这看成是敲警钟的绝好机会，他要让欧洲人清楚地看到危险，他的责任是呼唤他们的理智，让欧洲能最终得以团结起来。

他终于到了西班牙。“参议员”型喷气式飞机载着九十一岁的阿登纳，越过高耸入云的比利牛斯山，降落在卡斯蒂利亚高原的马德里机场。一下飞机，高原的寒风迎面扑来，灰暗朦胧的天空下着大雨。由于是作为旅行者身份的访问，前来迎机是西班牙新闻和旅游部长弗拉加·伊里瓦内、欧洲保卫基督教文明协会主席索利斯·鲁伊斯、马德里市市长以及德国大使等人。热闹而简短的欢迎仪式之后，阿登纳一行被安排在古老的里茨饭店下榻。

演说的时间是1967年2月16日，这是联邦总理阿登纳最后一次出国访问。这天晚上，马德里政治与科学报告中心盛况空前，人们从各地涌来，为了一睹这位号称“德国之父”的战后欧洲极负盛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的风采。好几个星期以来参加大会的入场券已经发空了，举办者在只能容纳一千人的大厅里安排了一千五百个座位，仍然不能满足渴望一睹阿登纳风采的各方听众。马德里各届精英济济一堂，在演说厅耐心等待阿登纳的到来。

掌声与欢呼揭开了这个夜晚的序幕。阿登纳迈着坚定稳健的步子，走上讲台。他拒绝了主人让他坐着讲演的盛情。他笔直地站在讲台上，扫视听众之后，待会场安静，开始了他的发言。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了整个演讲大厅：

“谈起欧洲历史和欧洲文化，恰恰在西班牙是那么吸引人，因为西班牙有着伟大的历史，因为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和欧洲其余国家通过政治、艺术和文化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因为西班牙的光辉照耀了欧洲文化。

但是，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带来了一种发展，这种发展威胁着欧洲各国人民的自由，从而也从根本上威胁着欧洲文化的存在，其结果可能导致欧洲和欧洲各国的彻底削弱。

因此，我想谈一谈这种危险，谈一谈为了拯救欧洲，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这是阿登纳的开场白。西班牙人给了他最热烈的回应、经久不息的掌声。待掌声响过之后，阿登纳抖擞精神开始了他的正文：

“我谈的欧洲，是指除了苏俄之外所有的欧洲国家。苏俄，不包括它西边的卫星国，本身就是一个广袤的大陆。要是谈欧洲统一，那就不能以欧洲其他国家必须联合的那种方式，来考虑同苏俄的联合。……欧洲国家同苏俄联合，那就等于把欧洲并入苏俄。”

阿登纳讲述了他对欧洲的理解，分为东欧和西欧。

“如果考察一下世界上力量的分布情况，那么就会清楚欧洲各族人民处在岌岌可危之中，同时必然会断定，欧洲国家政权的丧失是多么地快啊！”

接着，阿登纳描述了本世纪初与本世纪60年代世界力量分布对比情况，他说，今天的世界人们能够看到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正在崛起的赤色中国，而欧洲却衰落了，欧洲各国应该从这种形势中认清自己的形势，从中得出结论，实现欧洲的政治统一。“超级大国可能漠视欧洲个别国家的强烈不满，但是，一个统一起来的欧洲的声音，一定会被它们所重视，它们也会出于自身的利益而加以重视的。”

阿登纳追溯了欧洲为了实现这一统一目标所作的努力——这些努力都未见成效。他大声疾呼欧洲各国赶快行动起来。他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历史的车轮飞速前进。如果欧洲国家的政治影响应该继续存在，那就得行动起来。如果一时不能求得最妥善的解决办法，那也必须求得第二种或第三种的最妥善解决办法；如果不是所有的成员国愿意一起干，那么准备干的国家都应该行动起来。……不管成立联邦还是邦联，或者不管采取什么样

的法律形式，首先是要行动起来。开头是最重要的！”

他谈到了统一后欧洲同美国的关系，和当前的形势，他说尽管有的地方利益不一致，但也存在利益根本一致的东西——和平与自由是美国和欧洲的共同目标。他也谈到了使他为欧洲现状担心、忧虑和深深不安的迫切原因——莫斯科和华盛顿正在谈判的防止核扩散条约。他说：“只有无核国家应该接受监督，有核的国家倒不需监督，从欧洲利益上来看是行不通，甚至是荒谬的。”最后他向聆听他讲演的所有人呼吁：

“欧洲面临在俄国监督之下为和平目的生产原子能的危险。这种危险表明，为了欧洲的所有国家，多么急需建立一个欧洲政治联盟。因此，大家必须想方设法地尽快制定一项欧洲法规，建立一个欧洲政治联盟。这个联盟的声音，是连超级大国和世界良心也不能等闲视之，无动于衷的！”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讲演稿上的内容讲完了，阿登纳没有倦意，他的眼睛扫视着听他讲话的人们。听众期待的眼神使他精神为之一振。老战士的本色又出来了，阿登纳的声音更为铿锵坚定——他开始自由发挥：

“我认为，多年来我本就从事外交；我认为德国和欧洲外交形势的危险，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大——世界上的整个经济生活也是一样。俄国人完全明白，一个受压迫的和贫穷的欧洲将会倒向莫斯科。我衷心希望美国能认识这一点。我们面临着困难的年代。任何一个搞政治的领导人都必须睁开眼睛，以便使自由在世界上能够继续存在下去！”

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所有的人都钦佩九十一岁的阿登纳为了捍卫理想信念而迸发的钢铁般的意志，所有的人都为他为欧洲所怀的忧虑之情所感动，人们为他的精神而震撼，大厅内掌声经久不息。

第二天，西班牙所有的报纸都热情报道了阿登纳讲演的盛事。记者华金·卡尔沃·索特洛在《阿贝赛报》上写了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极富感情：

“尽管未曾扬名显姓，能够待在历史大人物的身旁毕竟毋庸置疑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而阿登纳肯定是属于这类称号的人。在一些君主和部长招待他的时候，我有机会怀着崇敬的心情仔细地端详这位年迈体健的先生。在一段长时期里，他那阿特拉斯的肩膀曾经承担着一个战败了的、似乎是气息奄奄的民族。看着他从挤满了掌声震动的人群的政治与科学报告中心过道上走进来，就好像是看一出戏……这是一个人，一个艺术上完美无缺的人，是振兴祖国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是一个衰朽垂危的集团的复兴者……他讲起话来并不矫揉造作，而是慷慨激昂，长这一小时之久……在普拉多街空前未有的稠人广众面前，他成竹在胸，精力充沛。然而，比他的青春般的活力更为引人注目的，却是这次演说本身。‘扣人心弦’是描写这次演说的独一无二的恰如其分的

形容词。他向欧洲的良心发出了一声告警的喊叫，一声惊恐的呼号，一声有力的呼救。”

九十一岁高龄的阿登纳在西班牙的演说和访问引起了空前的轰动。西班牙的报纸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人们更把他奉若神明，老远赶来一睹风姿。主人的殷情使阿登纳越发精神百倍、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这个古老国家的许多历史文化遗迹，并去了普拉多——西班牙国家博物馆，和埃斯科利阿尔宫——腓力二世建造的西班牙国王的修道院。他过人的精力使人感到惊讶。

2月19日，阿登纳一行离开了西班牙。归途中在巴黎稍作停留。阿登纳在爱丽舍宫见到了他的老朋友戴高乐将军。会谈之后，戴高乐设宴招待了阿登纳一行。宴会上，戴高乐站起来为阿登纳祝酒：“总理先生！——”

“此次我的老朋友，伟大的政治家阿登纳联邦总理先生的来访，令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和光荣。他为自己的国家和国际上所做的工作，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正确和卓有成效。……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可以这样说，最主要的目标和最重大的成就在于：让人类健全的理智取得非凡的胜利，使德法两国友好积极的合作一劳永逸地取代了长时期的、使生灵涂炭的敌意……

请允许我衷心地为您的健康干杯！”

阿登纳容光焕发，起而举杯道：

“请让我们为我伟大的朋友——戴高乐将军和法德两国的世代友好干杯——”

觥筹交错，宾主尽欢。

这是阿登纳最后一次出访了。从西班牙和法国回来，阿登纳的身体状况很快大不如前，老年性的支气管炎开始折磨着他，他只好留在勒恩多夫。

这又有似于当年深居简出的情形了，他每天问园丁，他的那些玫瑰花怎样了，可否忘记为它浇水剪枝？春寒料峭，医生不允许他在户外呆的时间太长，他以一种焦虑而又安详的心情等待着这一切的过去。

1966年4月19日午后1时55分，阿登纳被一次急性的支气管炎夺去了生命，他走得那么突然，一个月以前，他还和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进行过一次重要的政治会谈，一个月以后，他便去了。在临终的那一刻，他仍然在担心欧洲的不团结和孱弱，担心核战争的危险，担心他的人民成为他们自己幻想的牺牲品……

“噢，天父，你的世界多美啊！

当她放射着金色的光华！

你的光芒一旦向人间撒落，

涂染得凡尘闪闪生辉……

……

不，我要敞开胸怀拥抱一切，

这儿就是您那极乐的天堂。

只要我心犹未碎，
它就吮吸着热和光。！”

卡尔·埃尔布的歌声不时在勒恩多夫飞起，康纳德·阿登纳的花园里花团锦簇。他曾在这里踟躅漫步，他熟悉这儿的一草一木。勒恩多夫还是那么美丽宁静，它的主人却再也不会回来了。

全世界的政治家们都来到了波恩，向这位奋斗了近一个世纪的斗士告别。他们称他是“俾斯麦以来德国最优秀的政治家”。他的遗体安放在科隆大教堂里，周围撒满了鲜花，有他最喜爱的红玫瑰。成千上万的人前来瞻仰他的遗容，他们在他生前都目睹过他的风采。4月25日，科隆大主教主持了阿登纳的安魂弥撒。教堂的钟声敲响了，联邦议会大厦降下了半旗，德国人沉浸在一种无法抑制的悲痛之中。

根据阿登纳的遗愿，人们把他安葬在勒恩多夫，和他的两个妻子合葬在一起。

一颗巨星殒落了，一个时代也为之结束。

1969年10月，大联合政府为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权所接管。维利·勃兰特出任总理。基督教联盟党成为在野党。勃兰特提出“新东方政策”。新政策的基础是承认中欧东欧现状，承认两个德国的分裂，勃兰特把阿登纳时代面向西方的一边倒改为适应国际关系变化的两面看。

联邦德国历史上又一个时代拉开帷幕。

终章 ——阿登纳时代述评

1963年10月15日，阿登纳辞职下野。对战后联邦德国来说，阿登纳离开绍姆堡，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挂冠解任，人们对阿登纳时代及阿登纳执政的功过得失，褒贬不一，众说纷纭。

英国首相丘吉尔赞扬阿登纳在艰难困苦中，独具慧眼、开拓前进，结盟美英两国，致力欧洲联合，不愧为“战后欧洲秩序的设计师”。

法国总统戴高乐向来以孤傲尖刻著称，战争期间曾高举自由法国的旗帜，与纳粹德国殊死搏斗。即使是这样一位对德国法西斯刻骨仇恨的老战士，在战后与阿登纳的交往中，也对阿登纳致力以德法和解为基础的欧洲联合事业的胆识与坚韧不拔的毅力表示钦佩，称赞阿登纳为奉行和平主义的联邦德国的“带路人”，并视其为“一位伟大的朋友”。

美国总统尼克松眼光敏锐，擅长开拓新局面，并能准确地对世界级的政治家们作出评判。在尼克松的印象中，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虽然年逾古稀，却具有青壮年人的行动能力，他“善于捕捉时机”，沿着现实可行的道路前进，一步步实现其目标。

巡行世界各国，博学多才、黯熟国际政治和大国领导人底细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虽非与阿登纳同时代的人物，然而在研究了战后初期的世界格局演变历程后，不禁由衷地承认阿登纳是一位“取得惊人的成功”的“真正的伟人”。

欧洲运动德国委员会主席恩斯特·玛容尼卡认为阿登纳在东西方对峙中，从现实主义出发，断然推行对美一边倒的亲西方方针，从而使联邦德国绝路逢生，奠定了其恢复主权、发展经济、重新崛起的基础。对新德国的创立来说，阿登纳功不可没。

在冷战对峙不断加剧的年代，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宣传报道和书刊杂志中，阿登纳是德国复仇主义的象征性人物。其漫画形象是：瘦长的面庞上爬满皱纹，横眉冷目、穷凶极恶，一个跟着美国冷战战车狂奔不止的老纳粹，歇斯底里的年迈战争狂人。

作为阿登纳的政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新东方政策的倡导者维利·勃兰特虽不得不承认阿登纳取得的成就，却竭力贬低、抹煞其个人的作用，认为“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种机会主义的作法取得的，它不是我国人民对自身和自己的过去作全面的斗争的结果。”

联邦德国学者格斯塔·冯·于克斯屈尔援引100多年前奥地利宰相梅特涅发出的勿与西欧结盟反对俄国的警告，猛烈抨击阿登纳对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认为联邦德国地处欧洲心脏地带，应该成为既不偏重东方，也不倒向西方的“中央之国”，而阿登纳却把这个“中央之国”变成了“西方之国”，甚至成为西方反对东方的桥头堡和急先锋。

可谓见仁见智，毁誉判然。

在笔者看来，阿登纳首先是一位信念执著的政治家。以虔诚、严肃的天主教和坚持西方议会民主原则为其政治信念的深厚底蕴，并以多年沉浮政界、在政坛搏击中所积累的从政经验以及长期置身显要地位的自尊自信为驱动力，使他像战后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丘吉尔、戴高乐、吉田茂等一批西方

阵营的政治家一样，对走出战争废墟、重建祖国有着近乎狂热的执著精神。概言之，构成其为之奋斗不息的政治信念，即献身议会民主原则，体现无所不在的基督精神，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为联邦德国、也为欧洲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作为一个欧洲战败国的领导人，阿登纳更对德意志民族的消沉与徬徨，对国土分裂、经济文化毁之于希特勒燃起的战火，对德国人的贫困破败、流离失所而有切肤之痛，并油然而产生了恢复主权、复兴德国经济文化、鼓舞民族自信、重谋国家统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上述信念始终支撑着阿登纳，使这位年趋暮岁的政治家焕发出年轻人一般的活力，纵横捭阖于国内外政坛，竭尽全力。

作为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的政绩有目共睹。他的外交成就是诸多政绩中最耀目，并使之足值自豪的主要方面。尤其是在 1949 年至 1955 年 6 年期间，新建立的联邦德国在阿登纳的领导下，经过一番曲折磨难，终于恢复了国家主权并跻身西欧大国行列，成绩斐然。在这一期间，阿登纳先后实现了他所设定的前进目标、其威望跃至顶峰，给世人留下极为深刻印象。

法德和解与欧洲联合，乃是阿登纳外交方针的重要支柱。至少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法国与德国的前期国家普鲁士结下难以消除的历史宿怨。普法战争更使法国蒙受奇耻大辱，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被生俘，铁血宰相俾斯麦故意选择了凡尔赛宫的镜厅，作为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消息发布地点。此消彼长、势同水火，似乎成为法德两国再也走不出的怪圈。此后法德两国的争夺范围超出欧洲，扩大到非洲、中东地区，并分别加入同盟国或协约国，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列强火并。法国虽在这次大战中成为战胜国，却不得不耗费巨资修筑防范德国西进的马其诺防线，承受希特勒德国崛起后的巨大压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纳粹德国再次灭亡法国，德国官兵的军靴声震颤着凯旋门和枫丹白露大街，法国人吃尽了法西斯德国恐怖统治的苦头，亡国之恨刻骨铭心。在巨大的战争创伤尚在流血的日子里，实现法德和解谈何容易。

对建国不久的联邦德国来说，要从国际孤儿变成西欧国家群中平等的一员，迈出结束占领恢复主权和重建经济的关键，首先是实现同法国的和解。为此，阿登纳付出了不懈的努力。50 年代初期，他利用各种时机，与罗贝尔、舒曼、让莫内等联手，促成欧洲煤钢联营的实现，并在推进欧洲防务共同化的过程中，表明对法国友好与期待，竭力建立信赖关系，将法德和解作为联邦德国争回主权平等、重返国际社会的奠基石。在 50 年代中后期，阿登纳又给好法国总统戴高乐，把法德两国间的进一步和解与合作作为组建欧共体的支撑点。同时，通过欧共体的共同行动，加强法德合作，为联邦德国的发展创造所必需的国际环境。

阿登纳外交的另一重点，是与西欧各国政治家们寻找并坚持欧洲联合的发展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伤痕累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元气大伤，照耀在女王王冠上的太阳无可挽回地殒落了；法国成了主要战场，凭借戴高乐的精神鼓舞、国内地下抵抗运动的持久斗争和法属非洲殖民地的支持，法国洗刷了战败的耻辱，却也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德国遍地废墟，损伤惨重，人们饥寒交加，一片凄凉；其他西欧小国，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也无不面对着战争恶梦醒来后的成堆难题。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主宰过世界的欧洲不得不低下傲慢的头，无可奈何地从属于美苏支配全球的雅尔塔两极体制。

在战后初期，西欧政治家经常徘徊在联盟与孤立主义之间，不知计之所出。冷战骤起，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一批有远见的西欧政治家开始思索欧洲联合起来，以求生存、求发展的治国之策。阿登纳即是其中一位最热心倡导并努力坚持欧洲联合的有眼光的政治家。作为西欧大国联邦德国的总理，阿登纳充分运用其职权、地位和声望，不遗余力地推动欧洲联合运动，对战后欧洲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正如阿登纳最初所设想的那样，以西欧国家联合为驱动力的欧洲共同体的形成，为联邦德国和其他参加欧共体的欧洲国家提供了一个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构成一支日趋独立的力量。对联邦德国来说，欧洲联合运动越是强劲有力，则其生存、发展的空间就越加扩大。从欧洲煤钢联营缔约到欧洲共同体的组建，在这一过程中，联邦德国逐渐在欧洲确立起不容置疑的强国地位。联邦德国不仅成为欧洲煤钢联营和欧共体内拥有主权的平等一员，而且以迅速增强的经济、科技实力为后盾，并通过德法轴心的运转，到 50 年代中期成为西方阵营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在同民主德国的和平竞赛中，无论是在科技水平、外汇储备、生产效率，还是在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等方面，联邦德国逐渐占据优势。许多东德人冒死攀越柏林墙，投奔联邦德国，是民心所向的生动体现。从中也勾画出两德以联邦德国为中心、实现统一的远景轮廓。换言之，两德统一虽然实现在阿登纳作古 23 年之后，但其基础却是在阿登纳执政的期间奠定的。

对西欧国家来说，欧洲煤钢联营形成的相对单一的经济实体，通过欧洲共同体的组建，扩大到实施共同的农业政策、关税互惠等诸多方面。各参加国均沾利益，在共同体内部加强相互间的经济联系，积累力量，并以集团势力加入国际经贸大循环，无形中构成西方阵营中与美国、日本并列的第三支势力。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削弱、日本经济慢速稳定增长乃至长期低速徘徊，欧共体日益作为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崛起于国际舞台，呈现出美、日、欧三分天下的鼎立之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当美苏两极支配世界的雅尔塔体制崩溃、世界进入多极化新时代的时候，欧洲共同体进一步壮大力欧洲联盟，向美国、日本发起越来越有力的挑战，并大举东进亚洲、南下非洲、西扩拉丁美洲，成为多极世界中不可小视的重要一极。国际力量分化组合的过程，令人惊异地看到阿登纳欧洲联合思想的前瞻性。

阿登纳认为自己是政治、外交的行家，经济的门外汉。在其执政期间，将联邦德国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重任，委之于经济部长艾哈德和财政部长合泽尔等一批经济专家，任其运筹帷幄，施展满腹经纶，为联邦德国的经济腾飞建功立业。然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与阿登纳无缘。在经济立国方针的确立、知人善任以及创造联邦德国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国际环境等方面，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的把关定向作用，显然是其他人所无可取代的。概言之，在评论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时候，不应忽略阿登纳的贡献与作用。

作为一名政治家，阿登纳的外交业绩之所以辉煌的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懂得适时适地地运用外交艺术，坚韧不拔地开拓前进。他从德国战败的现实出发，摒弃任何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尽管理想主义往往用漂亮的言辞加以包装而颇具煽动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阿登纳方式”，即以一种明智的现实主义态度，为实现外交战略目标而主动作出妥协。

在实现德国统一和恢复联邦德国主权的目標面前，阿登纳首先选择了恢

复主权，并以依靠美国和西方的一边倒政策，迅速达到目的；为了实现政治主权恢复与经济重建的目标，阿登纳采取了欧洲政治联合与法德和解的策略，主动与法国和解，并以法德和解推动欧洲联合，摆脱了对联邦德国政治经济的禁锢。在处理对法关系上，阿登纳更是表现了一名资深政治家的老练与手腕。战后德法两国处于不同的政治地位，西欧一体化意味着联邦德国从无主权地位上升到有主权地位（只不过是把主权交给了超国家机构），阿登纳自然乐于全力推动。但是，对于法国来说，西欧一体化却意味着让法国放弃它已经拥有的主权。阿登纳明白这一点，也理解法国人对德国人的心理状态。他在追求自己外交目标实现的同时，十分注意满足法国的愿望，努力争取德法步调一致，共同促进西欧联合的总目标。以让步求和解，于被动之中寻求主动的妥协艺术，贯穿了阿登纳处理德法关系与推进欧洲联合运动的外交全过程。为取得更大的成果，阿登纳总是乐于先接受一些不利于己的歧视性待遇，再以主观努力来消除。具体表现在：为加入欧洲委员会，使联邦德国成为欧洲平等伙伴，他不惜以参加对德歧视的鲁尔国际署为代价，签定了波得斯贝格议定书；为使法国同意签署恢复联邦德国主权的巴黎协定，他主动声明放弃 ABC（原子、生物、化学）和其它重型武器的生产，以迅速恢复主权，避免再度节外生枝；为推动欧洲联合运动的发展，他在对联邦德国经济不利的情况下，接受了法国制定的共同税率，同意实行共同农业政策，从而保证了法国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与发展的支持，确立了共同体内部法德的统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阿登纳以主动让步的姿态，化解了法德的历史宿仇，解决了萨尔问题，为法德间建立起了良性的友好发展关系。这种关系在欧洲联合的范围内确立起了法德轴心。德法两国均通过这个轴心的运转，相辅相成，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发挥着重要影响和作用。

可以把阿登纳的外交分成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致从 1949 年联邦德国立国直到 1955 年获得完全的主权。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阿登纳外交的上升阶段，一切目标均在阿登纳预想的范围内圆满实现。联邦德国通过向西方的一边倒和对法国的合理让步，实现了与法国初步的和解。它参加了欧洲煤钢联营，通过重新武装，它取得了完全的主权并平等加入国际社会，在经济上也取得巨大成功。这一时期，阿登纳以联邦德国缔造者、“联邦德国之父”的形象，其威望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均升至巅峰。

从 1955 年日内瓦会议美苏缓和开始，阿登纳外交开始步入第二个时期。这时，国际关系复杂化，阿登纳的一边倒立场使他很难很好地适应国际关系的变化，他外交政策中矛盾的一面逐渐显露出来。首先是四大国不再理会德国统一的口头承诺，接着西方又倾向于以固定中欧东欧现状来与苏联搞缓和，这样一来，阿登纳寄望于西方以“实力”统一德国的目标彻底落空；其后，阿登纳又致力于法德和解与欧洲建设，但是，他同法国的亲近由于戴高乐与美英大闹独立而影响了德美、德英关系，使得他面向法国的欧洲政策与他面向美国的安全政策不再能协调统一。这一时期里，尽管阿登纳外交也取得了很多人瞩目的成果，如推动了欧共体的建成与发展，与戴高乐签订了法德条约、将法德友好合作以条约形式确定下来，等等。但是，这些成果至少在当时看来，并不足以大到能掩盖上述矛盾。尤其是法德条约，由于它是以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为代价的，更激起了各方非议。最后，1963 年秋天，阿登纳是在矛盾重重、内外交困中下台。正是由于第二个时期里众多复杂的事件，人们对阿登纳的评价才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应该看到，阿登纳的外交政策是东西方冷战国际关系大环境下的产物。阿登纳外交战略制定的前提是欧洲衰落，美苏崛起，德国被一分为二，欧洲也被铁幕劈分东西。其一边倒的战略完全是面向西方的。向西方一边倒使他在战略中就存在着矛盾性。这种矛盾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选择先主权后统一的道路，本身就意味着他放弃了东方，他对东方对苏联的政策也就必然成为他对西方政策和欧洲政策的一个附带。因为立足西方，所以阿登纳为德国统一设想了“实力政策”。实力是西方战胜东方的实力，并不需要同苏联正面接触。日内瓦会议后，美国承认美苏进入某种军事平局，这实际是宣告实力政策在新形势下破产，想再以实力政策来对待需面向东西双方的德国统一，必然是不可能的了。其二，阿登纳向西方的一边倒战略倚重的是德美和德法关系。这两个关系协调的前提是冷战尖锐对立，美法在安全目标和利益上一致。这时，美国支持欧洲联合强大，法国也仰仗美国的安全保护，阿登纳面向美国的安全目标与他面向法国的欧洲联合政策目标也由于美法利益协调而能得以顺利实现。一旦离开了这个前提，美法在安全目标和利益上不一致，阿登纳的安全政策和欧洲联合政策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美苏缓和后，戴高乐对美奉行独立的民族主义政策，直接侵害到阿登纳战略的本身。

正由于阿登纳的外交战略是冷战产物本身，使他很难把握 1955 年以后国际关系走向缓和的动向。他在西方联盟内恢复主权求强盛的做法，使他在任期内的德国统一政策和东方政策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表现。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猛烈抨击他以牺牲统一换主权。德国的统一是最终通过一个长远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至少在阿登纳时代，人们没有看到这种希望。他把这个重大课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们。同时，美苏走向缓和后，西方安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都相对减少，法国不再单纯借重美国的安全保护，而美国也怕欧洲联合强大威胁了自己的地位而减少了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美法利益的不协调使阿登纳每一个外交决策都举步维艰，也导致了基督教联盟党内部的分裂。如果说阿登纳在前一个时期外交的成功是他正确地估价和判断了美苏冷战的国际形势的话，那么，在后一个时期，他的失败也正是因于他对冷战形势顽固不化的判断立场。访苏之后，他也试图作出些调整，但是，这种小步的调整是在冷战对立，拒绝承认东德合法性的原则下的调整，无论苏联还是美国，都不可能对他感到满意，他的下台在所难免。

尽管如此，德国人还是给了阿登纳以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们把联邦议会大厦称为“阿登纳大厦”，把阿登纳的巨幅画像悬挂在其中醒目的位置，并给了他“联邦德国之父”的崇高荣誉。这在战后德国是首屈一指的。人们把阿登纳同缔造德意志的另一位伟人冯·奥托·俾斯麦作对比，认为他们都为德意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对这两位伟人作一番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虽是同一目标，但阿登纳与俾斯麦的做法完全不同。

第一，俾斯麦走的是一条军事大国的道路，他是以“铁和血”的武力战争来作为实现德国外交目标手段的。二战后德国实行非军事化，被盟国彻底解除了武装，军事武力之路显然是不可行也不可取。阿登纳选择的是以经济立国之路，他通过推动经济发展、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来提高联邦德国的国际地位，并努力以经济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阿登纳借助美国支持与欧洲联合，利用联合欧洲所扩大的共同市场，也捕捉住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结果，他成功了。他的经济专家们在他创造的有利外部环境中，创造出了联邦德国的

经济奇迹，使它成了“经济巨人”。经济发展之路的选择，使联邦德国完全摆脱了它作为战败国所受的政治军事限制。阿登纳时代打下的经济基础，大大增强了联邦德国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在国际舞台上发言的份量。正如西德财政部长施特劳斯所谓“今日之经济力量取代了德皇凯泽时期的步兵师团”，在全球经济联系与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经济实力越来越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的战后时代，经济实力奠定联邦德国的大国基础。

第二，俾斯麦善于在东西欧之间搞平衡，他执行的是同时面向东西欧双方的政策；而阿登纳的外交政策则是不折不扣的向西方一边倒。这也是俾斯麦与阿登纳不同的。一边倒却是阿登纳从冷战国际关系现状中得出的结论，也是阿登纳要从根本上打破德国“中欧地位”传统，结束德国在东西方之间荡秋千命运的现实选择。阿登纳认为，这种“荡秋千”导致了德国的邻国对德国地缘政治地位的恐惧，只有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恐惧，才能使邻国不再对德国的发展设置障碍。可以说，俾斯麦的两面外交是以一种实力地位为基础的，而阿登纳的一边倒是在追求一种实力地位；俾斯麦政治军事实力后盾给德国的邻国以巨大的威胁，而阿登纳经济立国却努力寻求与西方盟国共命运和平共处。结束德国“中欧地位”，对战后联邦德国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阿登纳否定了自中世纪以来就发展起来的具有强烈军事扩张色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这与俾斯麦强调发扬提倡“将个人失意转变为与国家、集体共命运”的德国式民族主义也完全不同。阿登纳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要求巧妙地隐藏在宗教感情之下，大讲基督教伦理道德原则和自由平等的精神，要求德国人认同于西方，摈弃已被希特勒纳粹搞得声名狼藉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以一种信奉“欧洲主义”的“欧洲人”新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俾斯麦帝国有着穷兵黩武、军事扩张的民族主义色彩，而阿登纳德国则极力避免使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措辞，注意树立“朋友和邻居”以及“好的欧洲人”形象，使战后联邦德国改变了世人对德国人长期形成的印象。

战后德日发展的相似性，也使得人们禁不住把阿登纳与战后日本的奠基者吉田茂作比较。许多人认为阿登纳为联邦德国、吉田为日本确立的经济立国的发展战略是异曲同工。人们看到这两个人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的经历。比如他们同是保守派政治家，同是帝国时代出身的跨世纪老人，在执掌国家大权之前，他们都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并且，在确立兴国大计时，这两人都不约而同考虑到利用美苏冷战的国际形势来完成国家复兴的目标，采取了倒向西方的立场等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尽管由于以上共性使阿登纳与吉田确立起德日冲破雅尔塔体制约束，在废墟上重新立国的外交战略方针，但是，日德两国国情的差异与阿登纳、吉田个人政治观念的不同，又使他们的外交政策各有其特点：

其一、吉田向西方的一边倒是一条腿式的，吉田的战略侧重在美国，其一边倒的目的是要通过把日本纳入美国战略轨道建立日美特殊关系；而阿登纳的一边倒则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依靠美国，一是立足欧洲。对阿登纳来讲，由于德国地处欧洲中心，冷战前线，它不单要重视德美关系，也不能忽视它与西方联盟内其它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关系。在阿登纳面向西方美国的政治经济复原的战略目标之中，也包含了他以法德和解为中心的欧洲联合战略，这与吉田单一向面向美国寻求国家政治、经济与安全目标的战略有所区别。

其二，由于阿登纳与吉田对民主政治的理解认识不同，同是帝国遗老的阿登纳和吉田为各自国家建立的发展走向，也有很大区别。阿登纳在观念上认同于西方民主制，他对德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有着深刻反省，从西方自由平等观念出发，阿登纳认为德国应该同纳粹主义和国家主义彻底决裂，在基督教伦理道德原则和自由平等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国家，而他也正是为此在奋斗。相反，吉田则不然。吉田对日本近代历史缺少反省，他认为天皇制是日本最好的体制，推其为重新立国之本。他大力提倡明治以来的日本建国精神，认为日本的战败仅仅是由于军部外交失败后的孤注一掷，军部上台也只是日本对外政策“受到阻力”以及一批野心家权欲薰心的结果。这种认识使吉田对日本国家主义及其侵略罪行毫无反省之意，他在否认军国主义建立新国家的政治体制时，因袭了天皇制的意识形态。

其三，正是由于认识观念上的差别，使阿登纳在具体政策的贯彻实施时，也与吉田明显不同。阿登纳不仅在经济上提倡自由经济，在政治上也力求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以求从根本上防止极权主义再度滋生，他尽管采用的“总理民主”式的独裁做法，却成功地完善了联邦德国的议会民主奠定了基础。吉田茂却在政治民主方面明显有所保留，吉田在倡异经济自由的同时，政治上仍带有复旧的保守色彩。后者激化了日本在教育、治安、防卫等问题上的国内政治矛盾，使战后日本民主化进程在很长一个时期受阻。正因为这样，战后联邦德国政局一直相当平稳、基督教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轮番执政，而日本自吉田后到 90 年代初，一直是保守政党执政，议会民主并不完善，右翼思想言论也一直是大有市场。

由于这些，某种意义上说，阿登纳在联邦德国做得更为成功。

政治是令政治家们着迷的一种事业，他们在政坛上搏击，从中感受着乐趣。阿登纳在一生之中，对政治正有着这样一种近乎狂热的追求。他有一种信念、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鞭策着他，这种信念支持着他直至九十高龄仍然活跃于政坛。通过这本书，读者将对阿登纳其人和他的政治活动有一个粗概的了解。通过这种了解，读者也将会看到：虽然阿登纳的政策并非十全十美，但对于德国这样一个战败被分裂的国家来说，它却是现实和有意义的。阿登纳面向西方和欧洲的外交政策，使联邦德国迅速顺利地实现了政治主权恢复，经济重建和平等参与欧洲和国际社会的目标。阿登纳时代的经济腾飞，为西德奠定了基础，使它朝向大国地位迈出了第一步。阿登纳也一直没有放弃他统一整个德国的梦想，在某种意义上，1990 年联邦德国成功地以经济实力实现了“以西统东”，亦可算是他实力政策的最终胜利。阿登纳所倡导的以法德和解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更为德国和欧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美国占领区军事长官卢修斯·克莱一到德国时就说，德国需要一位献身于民主原则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他能把自己的人民带回自由国家的大家庭，同时面对东方正在出现的新的危险，他又能保护他们。事实证明，阿登纳正是克莱所说的这种人，“联邦德国之父”的最高荣誉，他当之无愧。他将全力投入到了为德国和欧洲开创一条新道路的事业之中。今天，他一手创建并苦心经营的联邦德国，已通过参加欧洲一体化，在欧洲和世界树立了牢固的地位；阿登纳时代奠定的经济基础，已经成为联邦德国实力地位不可动摇的载体。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与法国的政治、军事力量一起，支撑着欧共体内法德轴心的运转。欧共体发展为欧洲联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作用

与地位日益上升，也确定了联邦德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客观历史地看，阿登纳不仅从战略上、而且在实践中，为战后德国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他对德国和欧洲历史的影响，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日益扩大，联邦德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将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大事年表

- 1876年1月5日 康纳德·阿登纳在科隆出生
- 1888年 德皇威廉二世登基
- 1889年 阿道夫·希特勒在勃劳瑙出世
- 1894年 阿登纳从科隆的使徒高级文理中学毕业
- 1901年 阿登纳通过国家文职官员复试，进入考森律师事务所
- 1904年 阿登纳与艾玛·魏埃尔结婚并成为科隆市代理市长
- 1914年 艾玛·阿登纳去世
- 1917年10月18日 阿登纳当选科隆市市长
- 1918年11月 德国11月革命。威廉二世退位
- 1919年 斯巴达克团起义失败。魏玛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就任首任魏玛总统。凡尔赛条约签定。
- 阿登纳与古丝·吉塞尔结婚
- 1921年 阿登纳当选普鲁士参议院议长
- 1925年 科隆市庆祝莱茵兰归属德国一千周年
- 1926年 阿登纳拒绝接受德国总理提名。英国占领军撤出科隆
- 1928年 世界新闻博览会在科隆举行（普列沙展览会）
- 1929年 阿登纳连任科隆市市长。世界经济危机爆发
- 1933年 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阿登纳被撤去市长职务
- 1934年6月30日 在所谓的“罗姆暴乱”的同一天阿登纳被捕，两天后获释。为躲避纳粹迫害，阿登纳隐居马利亚拉赫修道院
- 1935年 阿登纳举家迁勒思根多夫
- 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 1944年 阿登纳因被怀疑参与密谋刺杀希特勒事件而再度被捕
- 1945年 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阿登纳被美占领军重新任命为科隆市市长。波茨坦会议召开，德国被分割为四个占领区。基民盟党小组成立。阿登纳被英占领以“不称职”为由撤销市长职务并被逐出科隆
- 1946年 阿登纳担任英占区基民盟主席。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马歇尔计划公布。杜鲁门主义出台
- 1948年 美英双占区成立，进行币制改革，发行新马克。苏军封锁柏林。第一次柏林危机。阿登纳作为议会委员会主席参与制定西德基本法。
- 1949年 联邦德国成立，阿登纳出任首任联邦总理。民主德国成立。阿登纳与盟国签署《彼得斯贝格议定书》
- 1950年 朝鲜战争爆发
- 1951年 阿登纳兼任外交部长，签署欧洲煤钢联营条约
- 1952年 德国条约与欧洲防务共同条约签署
- 1953年 斯大林去世。阿登纳首次访美。东柏林和民主德国其他城市工人起义。阿登纳再度当选联邦总理
- 1954年 法国国民议会否决欧洲防务共同条约。伦敦—巴黎会议召开，巴黎协定签署
- 1955年 阿登纳访问莫斯科。德苏建交。萨尔公民投票回归德国
- 1956年 联邦议院赞成重新武装。联邦法院宣布共产党违宪
- 1957年 阿登纳三度当选联邦总理

1958年 赫鲁晓夫发出柏林问题“最后通牒”，第二次柏林危机。戴高乐成为法国总统

1959年 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去世。阿登纳一度打算竞选联邦总统职位

1960年 阿登纳访问法国，会见戴高乐

1961年 阿登纳与肯尼迪在华盛顿会晤。柏林墙筑起。阿登纳四度当选联邦总理

1962年 《明镜》事件迫使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下台。阿登纳内阁重组。古巴危机

1963年 德法友好合作条约签署。阿登纳宣布辞职。路德维希·艾哈德接任联邦总理。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

1966年 阿登纳将基民盟主席职务交与艾哈德。艾哈德下台。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阿登纳访问以色列

1967年 阿登纳访问西班牙。4月19日，阿登纳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5

出版说明

本书是法国出版的题为《民族与文明》丛书的第十四卷。《民族与文明》是一部以欧洲和法国为重点的世界通史丛书，其中第十三卷《法国革命》和第十四卷《拿破仑时代》是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撰写的。

乔治·勒费弗尔（1874—1959年）是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从1914年发表第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到逝世前的四十五年里，一直从事法国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1932年他继阿尔贝·马迪厄当选为“罗伯斯庇尔学会”会长和《法国革命年鉴》杂志主编，1935年起在巴黎大学主讲法国革命史。勒费弗尔保持了马迪厄学派注重社会和经济问题和推崇雅各宾民主专政的史学传统。他对革命前和革命期间的农民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著有《法国革命期间诺尔郡的农民》、《恐怖时期的农民问题》等著作。关于法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也都有专著论述。

本书是勒费弗尔于三十年代初执教斯特拉斯堡大学时，边讲课边撰写的，1935年完稿出版，到1953年已出了第四版。他的学生阿尔贝·索布尔在他逝世后负责整理他的遗著，1965年印行了由索布尔增订的第五版，1969年值拿破仑诞生二百周年之际，又印了第六版。索布尔对原著正文增订不多，但对勒费弗尔开列的参考书目则有所补充。这部书从出版后四十多年来，一直被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公认为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一部优秀著作，并译成多种文字。

本书不是一部拿破仑个人的传记，而是一部从拿破仑·波拿巴取得政权到他失败这段历史时期（1799—1815年）的法国和欧洲的历史。作者不仅把拿破仑时期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从纵的方面衔接起来，使读者看清这两个阶段的连续性，而且把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法国放到世界史范围内加以考察，从横的方面同欧洲各国历史联系起来。勒费弗尔一方面肯定了拿破仑顺应历史潮流，在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推进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与封建势力的妥协和对雅各宾派的压制。在论述拿破仑通过征战把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推广到欧洲其他地区所起的积极影响时，作者也揭露了拿破仑建立欧洲甚至世界帝国的野心和他所进行的战争的扩张侵略和掠夺的性质。此外，本书对当时欧洲列强的争霸以及英国和俄国的扩张侵略政策也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揭露。总的说来，作者对这段法国和欧洲历史的叙述比较全面细致，条理清晰，对当时法国国内外各种矛盾也有所剖析，对拿破仑本人性格的刻画，有些地方也是比较深刻的，有助于我们了解法国和欧洲的这段历史。

《法国革命》一书最初系由勒费弗尔与居维萨尼亚克合著，1930年初版；1951年由勒费弗尔全部改写。从这一版起改由他单独署名出版，1968年印行了第六版。

应该指出，勒费弗尔对于拿破仑的对外政策的分析是缺乏说服力的。尽管他也谈论法国同欧洲之间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冲突，法英、法俄争夺霸权的矛盾，以及欧洲民族主义反对法国统治的斗争，但是他没有紧紧抓住这些对立和冲突，进行阶级分析，揭示它们的转化规律，却认为拿破仑所追求的各种目的是互相矛盾的，因此断言：“没有任何合乎理性的解释可以把拿破仑的对外政策统一起来，……归根结蒂，还是要回到他的‘野心’上来。”（161页）但是这种“野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作者无可奈何地又归之于拿破仑的“性格”：“勇于冒险，迷于幻梦，任性冲动而不能自制”（同上），并概括地说：“拿破仑其人主要地就是他的气质。”（68页）

我们并不否认一个英雄人物的性格对于历史发展所起的某种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¹但是任何性格都脱离不了一个人的思想倾向，特别是政治思想，而政治思想也不可能是抽象的，超阶级的。拿破仑的称霸野心正是法国大资产阶级本性的集中表现。

勒费弗尔无法解释为什么拿破仑既满足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时又进行“没完没了的战争”，以致损害了法国的民族利益。于是他又用“此人的性格较之他的天赋更不能安于和平与节制”（64页）来说明。实际上，在当时欧洲的政治制度下，一国之所得就是他国之所失。而且每次战争总是以拿破仑作为胜利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告终，从而播下了新战争的种子。归根结蒂拿破仑“野心”的根源不应从他的“浪漫主义”性格中去寻找，而应该从他作为大资产阶级代表的特殊政治观点和政治利益中去寻找。正如马克思指出：“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

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这就是说，拿破仑建立帝国这个政治上层建筑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但是，拿破仑的称霸野心又是无止境的，他把建立霸权看作最高的政治利益。“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

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拿破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也同样毫不珍惜它们。”正是拿破仑的不断战争论导致了法国的失败和帝国的崩溃。

作者还多次嘲弄“历史决定论”，宁愿强调偶然因素，例如他认为“拯救英国的不是自由主义经济的‘自然规律’，而是俄国的冬天。”（144页）他也未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在涉及亚洲和中国的部分，他只把远东地

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57页。

同上，第158页。

区看成殖民和传教的对象，而抹煞了这个地区的独立发展。他还主观地推断，如果不是由于欧洲战争，远东早已被西方列强占据了，“欧洲的内哄拯救了远东达四分之一世纪有余！”（299页）这些错误论点希望读者加以注意和批判。

原著书名为《拿破仑》，为了更符合本书的内容，中译本书名增加“时代”二字。本书原为一卷本，中译本分上下卷出版。上卷由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出版的英译本译出；下卷由中山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根据法文原著第六版译出。圣书由中山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端木正同志根据法文原著参照英译本进行了校订。中译本除增加一些译注外，还选用了英译本的少量注释。

原著开列大量的参考书目，分别附在各编、各章节的页下。我们只择其要者选录，把参考书目集中附在上下卷正文后面。

原著索引全部译出，索引中的页码和译文旁边的页码均为原书页码。

1977年7月

拿破仑时代(上卷)

第一编 革命的遗产

第一章 旧制度与革命的冲突

十年的演进，而尤其是战争，深刻地改变了法国革命的进程。欧洲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法国领土向“自然疆界”的扩张显然打破了欧洲的均势。波拿巴所接受的遗产对他的政策有重大影响。阿尔贝·索雷尔认为波拿巴是他的命运的产物而不是他的命运的创造者；即使我们不同意这个论点，明确他所接受的遗产的一些特征还是适当的。

在这些特征中，最深刻的是法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与欧洲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社会冲突：特权阶级和受第三等级的其余阶层支持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其次是政治冲突：因为君主专制象特权一样受到了责难，此外，把贵族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的帝王们，冒着和贵族同归于尽的危险。最后，还有宗教冲突，这种冲突是由于人们一般把法国革命理解为笛卡尔理性主义的产物而发生的，因为笛卡尔的无情批判摧毁了神秘和传统，人们认为这是构成旧制度的基础。各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使上述各种冲突模糊起来，但却没有把这些冲突从当代人的意识中消除。这些冲突顽强地支配了拿破仑时代的历史。

一、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

热月9日以后，法国革命的退潮已经很明显了。共和三年（1795年）宪法使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他们虽然真诚地拥护新秩序，但却反对民主，他们不能把民主和雅各宾主义的经验加以区别。他们同斯塔埃尔夫人和空论家们一道，设想了一种寡头政治，它比英国的寡头政治更加现代化，但在本质上相类似；它要在富人的利益和“贤达”的智慧之间搞平衡。同时，资产阶级逐渐着手摧毁山岳党人的成果，甚至对制宪议会议员的成就也不放过。他们废除了家庭法庭和仲裁程序，恢复了债务监禁和公证人费。共和二年遗产继承法的“追溯既往”的特征消失了，私生子的权利受到了猛烈打击。国有产业_—的出售，除对富人外，不再对任何人有利；共和七年，把那些被抵押的国有产业，无代价地给予了持有这些产业的人。村社公地的分配中止了；政府又力图把农民从1789年以来就自由使用的森林中驱逐出去。

但是这一切对于欧洲贵族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尽管法国革命是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理想的实现，可是它仍旧是一场争取公民平等的革命。它的军队所到之处如比利时、来因地区、荷兰、瑞士，法国革命都摧毁了旧制度；教皇成了囚徒；奥伦治亲王、来因的选侯们和瑞士的贵族们都逃跑了。只有苏沃洛夫的胜利夺回了意大利，恢复了那些正统王侯的地位。颠覆性的宣传秘密地渗入了法国的邻邦，到处都在议论法国农民的解放以及无套裤汉胜利的消息。作家和新闻记者所作的努力，其效果比不上这些不胫而走的传闻；

他们几乎都由于恐怖时代的过激行动而感到幻灭，或者

被迫沉默了。希望和法国人一致行动的人到处都能找到，例如在南部德意志就有。甚至在普鲁士，拒服劳役和抗交封建赋税的也越来越多。谣传国王将废除这些苛捐杂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即位时就收到了大批请愿书。在大洋的彼岸，纳里尼奥翻译了《人权宣言》；在美国，华盛顿及其随从怀疑杰佛逊和共和党人已被平等狂毒害了。

各处的贵族，甚至在辉格党的各大家族中，都吓得惊慌失措而聚集在国王的周围；各国的政府都加紧了控制。除了屈服于保罗一世的残暴专制下的俄国之外，奥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在那里，科洛雷多从此成了实行愚民政策的警察国家的化身，而梅特涅后来又被认为是始作俑者。在普鲁士，直到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死前企图实行同样制度的沃尔纳险些被解职。在耶拿，费希特因为宣传无神论而被控告，遭到了魏玛公爵的抛弃，并在1799年被迫放弃了教授职位。在英国，1794年以后，人身保护法停止执行，“煽动性的”社团和出版物也遭到了禁止。1799年，皮特强迫印刷商表明他们的忠顺，把非法组织的成员流放七年。在美国，联邦党人利用和督政府断绝关系而通过了针对法国民主主义者的“移民法案”，还通过了针对社团和报纸的危害治安取缔条例。在拉丁美洲，已经有人为自由事业献出了生命。“雅各宾派”所激起的恐怖，虽然并非全无根据，但却是被人夸张了。那些少有的赞美法国的人，象康德、费希特和在着手批判伯尔尼的贵族和符腾堡的寡头政治的年青的黑格尔，都非常谨慎地规定自己只响往合法的与和平的进步。没有一个国家自发地效仿法国；传播法国革命原则的，就是法国的军队。

虽然反动势力很猖狂，但不能说它们谴责了所有的改革。开明专制已经表明：某些改革是可以同君主专制政体和贵族社会相调和的。旧制度的各国政府承认法国制宪议会的成就并非一无可取，因而羡慕法国行政上的统一和它对财政特权的废止。英国的例子进一步向欧洲大陆上的农业国表明了圈地的优越和农奴制的落后。然而，只有在德意志，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才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把西方影响和本国传统结合起来。

德意志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学者中间失去了威望，但已经教育了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员。在巴伐利亚新掌权的蒙特热拉伯爵就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之一。在柏林，奥国的大使尖刻地说过，普鲁士的官僚谴责法国的敌人想“把理性的统治从地球上清除掉”，而普鲁士的伟大正应是归因于理性的统治。普鲁士的高级文官形成了社团，事实上采用互荐的方法吸收成员，保持了强烈的团体精神。他们很不高兴地注视着国王不断扩大“内阁”权力，以至一切都由国王和他的“秘密顾问”来决定；国王及其“顾问”对西里西亚和波兰的一些省份的亲自治理，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大官愿意把国王置于法治之下；1794年完成了弗里德里希法典起草工作的威廉·卡莫，就在法典中写入了关于个人自由、法官的终身任职以及宗教宽容等条文。他们同时也认识到：弗里德里希的国家实行的是农奴

制，各省都珍惜自己的特殊制度，彼此为关税壁垒所分隔，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自治的“民族”，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最后，象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一样，普鲁士二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量出口粮食和纺织品的国家。开明人士注意到，萨克森的农学家阿尔贝·塔埃开始把英国的农耕方法介绍到丹麦的范例。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样感到兴趣，这种学说在汉堡由比施讲授，在维也纳由瓦特罗特讲授，而在科尼希斯贝格以克里斯蒂安·克劳斯的讲授最为著名。他对这个君主国的两位杰出的治理者舍恩和施勒特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最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人都是普鲁士从德意志西部或国外招来的客卿：弗兰科尼亚的卡尔·阿尔滕施泰因，汉诺威的卡尔·冯·哈登堡——他治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从丹麦来的施特吕恩塞，尤其最重要的是来因帝国骑士的后裔施泰因，他在1804年出任大臣之前治理过克累弗和马尔克，这两个省从来没有采用过“普鲁士的制度”。

这还不是一切。和某些历史记载相反，施泰因和某些政治家仔细地考察了法国的实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让国民在法律、赋税和行政管理等问题上有一些发言权，政府就能增加力量和威望。然而，因为他们只把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看作国民，所以他们就注意力首先转向英国。在他们看来，在皮特的领导下，英国似乎已经把王室特权和宪法准则、党派竞争和维持秩序与政府稳定，贵族优势和资产阶级野心、贵族利益和全国利益等等都协调起来。勋爵们的“私囊选区”、“腐朽选区”保证了皮特在议会里获得多数，因而皮特也就迁就他们，但他并不同意他们的偏见。在他提名晋封的九十五名贵族中，有很多“新人”，他们是银行和商业的巨头，他们使贵族恢复了生气，并帮助贵族保持富裕生活和活动能力。由于伯克的缘故，这种平衡和智慧的奇迹使得许多法国革命的敌人归附英国，尤其是象马莱·迪庞和德·伊韦尔努瓦那些资产阶级和新教徒出身的人。甚至在法国亡命者中间也有赞美英国的人。在德意志，亲英派在汉撒城市和汉诺威数以倍增是很自然的，汉诺威的格廷根大学完全受他们的支配。雷贝格和布兰德斯给施泰因介绍了英国的思想，而施泰因运用它充实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们能在威廉·冯·洪堡的个人主义教义中找到这种思想的痕迹，因为他主张国家只掌握警察和军权，而象在英国一样把其它各项管理职责都交给公民的自发组织；在洪堡的思想中，这就意味着使几乎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贵族的保护之下。

特权阶级中大多数人象憎恨“雅各宾派”一样地憎恨这些改革家；面对着特权阶级的抗议，君主们动摇或退缩了。皮特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虽然没有摈弃早年的计划，但却把它推迟到后来再实行。在奥国，约瑟夫二世的土地改革被利奥波德二世中止了，后者的继承人弗兰茨二世在1798年终于保留了封建义务和劳役。在里沃尼亚省，保罗一世满足于使省议会通过某些和缓农奴制的措施；在多瑙河各公国，他的特派专员吉谢廖夫也没有更多的作为。在普鲁士，容克地主已经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修改弗里德里

希法典。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很快地放弃了他在 1798 年考虑过的废止豁免赋税等财政特权的改革计划。的确，他在自己广大的领地上坚决地继续解放农民，并改革农业经济，但他不敢把这些改革扩展到领主们的领地上去。普鲁士的贵族仍然垄断着高官显职。1800 年，在六、七千名官员中只有六百九十五名出身平民。施泰因自己只在财政方面实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他甚至没有能够废除国内的关卡。

就这样，法国以外的改革家几乎和“雅各宾派”一样无能为力。只是拿破仑的统治，或者说，是他的军队的猛烈冲击，才使旧世界得到更新。因此法国一直成为欧洲帝王们和贵族的眼中钉。那不勒斯的玛丽亚-卡罗莉娜写道：“我不同情，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同情法国人；我将永远把他们看成是杀害我的妹妹和王族的凶手，是一切君主的迫害者。”德意志作家施托尔贝格把法国人称做“西方的匈奴”；英国的纳尔逊虽然不是出身于贵族，但也轻蔑地把他们叫做“法国坏蛋”。执政府和帝国虽然日趋保守，也一直没能使这些人显著地平息下来。关于反法联盟，过去惯用国家利益来解释，而将整个这场大搏斗归结为一个均势问题，或者归结为如皮特所说的安全问题。这个结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对法国人的恶感从来没有妨碍过各国君主在认为有利的时候同法国打交道；但尽管如此，各国君主并没有放弃顽固的敌视态度，而且他们的亲信也一直公开表示他们对法国的憎恨。这是一个难以衡量而又不容轻视的因素。只是为了安抚辉格党人，托利党人自己才公开否认企图强加给法国一个由他们挑选的政府。1795 年 12 月 22 日，格伦维尔在和平条件中包括了大赦亡命者以及归还他们的产业，这就透露了他的真实思想。1800 年 1 月，他在和平条件中又增加了一条恢复君主政体。这位高贵的勋爵由于必须同共和派谈判而感到厌恶，因为他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正人君子”。而皮特不得不容忍那个被他在 1800 年 2 月 3 日称之为“革命彩票的最后冒险家”的人，这对他也决不是件愉快的事。

二、思想的冲突

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必然会在思想界反映出来。权威和传统再次流行起来，为数日增的作家和政论家公开地宣扬这些思想。有些人是从信念出发，另一些人却由私利所驱使，因为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并为这个目的而拨了一些款项。在那些人中，重要的是法国和日内瓦的亡命者，象里瓦罗尔和巴吕厄尔方丈、德·伊韦尔努瓦和马莱·迪庞。在英国，坎宁由于出版《反雅各宾》杂志而加入了这一行列。法国发生的事件通常都被用来对人民进行恫吓。巴吕厄尔方丈一直很成功地恢复了霍夫曼对“光明会”和共济会的攻击。但是某些作家在反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中，把为传统思想提供新的论据从而提高论战水平，视为一种个人荣誉攸关的事。

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崭新的东西，因为十八世纪期间由于休谟而变得

保守、由于边沁而变得更加保守的英国的经验主义，曾想要重新树立权威和道德习俗。这个学说的论点是：正象理性能够通过观察和经验而找出物质世界的规律，并顺应这些规律而支配物质世界一样，理性也能够通过观察社会生活，从而证实传统制度由于能长期存在而完全符合“事物本质”。在伯克的哲学中，这种实用主义由于增加了从医学上借来的社会生机论而变得复杂起来，这种生机论十八世纪在法国蒙彼利埃医学院讲授过，督政府时期由比夏讲授过。它认为人是由自发的幼芽发展而成的，这种幼芽产生于一种被称为生命的非理性的力量。同样地，伯克把社会看成是一种植物或动物，而个人只是它的器官之一，因而社会的权威是作为个人的生存条件而强加在他身上的，他不能拒绝这种生存条件就象他不能拒绝身体的需要一样。这种和神秘主义混合起来的、有些类似浪漫主义的经验理性主义，从英国传到了德意志，对雷贝格和布兰德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据说，早在 1793 年就翻译了伯克的《法国革命感言》的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甚至梅特涅，都是从这个思想学派中得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哲学的。

和这些思想非常接近的是路易·德·博纳尔和约瑟夫·德·梅斯特；1796 年，前者的《政权与教权论》和后者的《法兰西论评》同时出版。他们也把个人放在从属于社会的地位，而且博纳尔也经常引据事物的本质，但他们都用上帝的创造来代替生机论。主张专制和威权的博纳尔象醉心天主教教义一样珍爱王政的传统；他认为上帝为社会安排的结构是永恒不变的。具有历史感的约瑟夫·德·梅斯特，作为一个忠实的教皇至上论者，不大在乎世俗政府的形式；在他看来，上帝满足于以其无限明智和灵活手段来保护这个社会；因此，人必须在事实面前低头。

有时甚至连政治经济学也不免对崇高的理性进行攻击。马尔萨斯对当时的英国加以观察，在 1798 年他坚持认为，人类无限进步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种妄想；因为尽管有科学技术的努力，人口增长的趋向仍然比生活资料的增长迅速得多。因此，有助于增加人口的一切社会改革只会产生加重祸害的恶果；而只有疾病、瘟疫、饥荒和战争才能调整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可是，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马尔萨斯，通过规劝穷人禁欲而找到了一种解脱。然而传统主义的思想家一致认为，马尔萨斯对孔多塞和戈德温的希望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传统主义者把法国革命和理性主义等同起来，他们毫不迟疑地以理性主义所遇到过的最可怕的敌人，即仇视智慧至上的运动，来全力反对革命。这个曾经启发了卢梭和“狂飙运动”的运动，在十八世纪末年正在向着通常被称为初期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发展。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断定智慧将能够解释宇宙之谜，并且主张理性要保卫自己的自由，不受本能和感情的侵犯，而本能和感情则是受原子机械运动的物质所支配的。这是一种奋发努力的哲学，科学和幸福就是这种哲学的报酬。但是，总有一些神秘主义者期待着体验纯属天赐的启示的神迹；总有一些放荡不羁的人希望偶然的机会有能给他们带来幸

福，或者甚至在冒险中寻找乐趣；总还有一些艺术家倾向于想像和幻觉。现在，时代的车轮带来了新一代，他们为了赢得发迹的机会而探索崭新的东西。因此，他们恢复了感情的地位，提出了一套形而上学的提纲，这种形而上学赋予感情以通过直觉而达到“绝对”意境的能力，而认为理性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有些哲学家具有与此完全相同的见解。特别是康德，他摧毁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然后又借助于道德感而创造了另一种形而上学，这种道德感归根到底就是神圣的直觉。

另一方面，一直没有被理性主义所窒息的神秘主义，在十八世纪末期非常流行。它通过斯韦登堡、德·帕卡利斯和圣马丹的神灵学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并且开始渗入到共济会和光明会教义里。它伪装立足于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从医学上它也借用了生机论，从物理学上借用了磁力学，磁性也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梅斯梅尔的讲道坛象梦游一样，使精神达到恍惚昏迷的状态，于是精神便接触到超自然的世界了。甚至天主教教义也不能使约瑟夫·德·梅斯特那样虔诚的教徒不受神秘主义的诱惑。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这样的运动，如果只考虑到它的思想意识，而不考虑到它的拥护者的气质和社会状况的话，就不能看出它的深度。大多数神秘主义者都不能使自己适应社会环境，或者去适应而还没有成功。他们之中包括病患者和精神不安者，这些人内心空虚，一筹莫展，便注定了他们陷入忧郁，甚至自杀；也包括一些青年人，他们渴望自立和欢乐，但却受到社会的限制因而愤激；还包括那些谋求出路的人，他们受到那些因地位、财产或名望而享有特权者的阻塞而不能得志。这些人想使扶善锄恶的“绿林好汉”的形象理想化，那是不足为奇的；其中很多人后来由于年龄和成就而变得聪明起来，那也不使人感到意外。过去总有一些“浪漫主义者”，但在十八世纪，这些人数以倍增，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多的有才干但很贫穷的青年人变得愤世嫉俗或是心灰意冷。

文学和艺术或多或少受到反理性主义的反动影响。法国人以理性的名义，强制人们接受一些严格的美学准则，这些准则大大限制了人们发挥独创性的机会。法国作品成为各地的样板，因而评论家们，尤其是德意志的评论家，就很容易把这种“古典”艺术斥责为外国进口货。在文学艺术这个领域里，没有修养的个人主义者有获得成功的许多机会而很少需要冒险，而且实际上还大有成名的希望。在大自然中，在不为人熟知的国度里，在东方、中国和美洲，或在被遗忘了的过去的著作中，有人到处寻觅新意创见。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心醉神迷地欢迎伪造的奥西安的诗，法国人发明了“行吟诗体”。文学体裁的分门别类遭到攻击，法国古典戏剧中的时间、地点和情节的三一律也遭到攻击，而莎士比亚则被人用来证明这一切攻击都是正确的。为了摈弃十七世纪的审美观点，甚至引证刚刚开始发现的希腊精神。变化较少的造型艺术没有得到同样程度的解放。十八世纪末，从古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寻找源泉的古典精神，由于达维德和卡诺瓦的天才，再度赢得了胜

利。与此相反，器乐的发展有力地激发了新精神。器乐是现代的艺术，它创造了自己的规律，而且因为它采用的方法是暗示而不是描绘，同时它的感染力主要是感觉上和情绪上的，所以就特别富于浪漫色彩。

革命的大动荡似乎在许多方面必然有利于这种新精神。法国革命解放了个人，并向一切传统宣战，宣告了出版和戏剧演出的自由，取缔了以确保古典清规戒律为己任的特权团体。革命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它的瞬息万变和恐怖转折使很多人心慌意乱，他们对变幻无常和情节恐怖的东西养成了一种病态的癖好，安娜·拉德克里夫的小说风靡一时就足以证明这种倾向。最后，法国革命使一种悲剧感又流行起来，这是从许许多多的不幸事件的景象以及人对大自然和命运的无情力量作斗争的景象中产生的。然而这个运动并不是在各地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欧洲南部各国当时几乎还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在法国和英国，浪漫主义也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尽管有威廉·考珀和湖畔诗人__，1800年左右在英国风行起来的却是威廉·海利的古典主义，而乔治·克雷布则仍忠于朴实适中的现实主义。在法国，革命的激情鼓舞了演说词和歌曲的写作，但它没有使戏剧、小说和诗恢复生气。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在英法两国，青年人在思考和艺术的范围之外，找到了活动的领域。在英国，他们被商业和议会政治所吸引，而反对法国的斗争又渐渐加强了对英国国教的信仰。华兹华斯、科尔里奇和索赛在被社会孤立的压力下，最后屈服了。在法国，青年人或者参加革命队伍，或者亡命国外。到1815年止，战争一直在吸引着他们的想像力，诱使他们追逐荣誉和财富。拿破仑本人就是个浪漫主义诗人，后来转化成一位活动家，夏托勃里昂则没有经历同样的转化，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必须如此。

德意志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仍旧被束缚在中世纪的框框里。热情而意志脆弱的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是和韦尼奥__同类的人，他原来并不熟知革命，就连战争也没有能吸引他；因为德意志的爱国主义当时还不是政治性的，只是领导政治的那些王侯和贵族的事。

事实上，德意志的两位大诗人歌德和席勒在度过狂热的青年时期之后，也随波逐流，前者成为魏玛公国查理-奥古斯特的大臣，后者成为耶拿的教授。他们研究了古希腊，宣称发现了怎样能使人的不同倾向在艺术领域内和谐起来，即使生命的活力与激情同理性调和起来。他们的新人文主义号召个人自我孤立起来，以便“整体”地自我教养；这种人文主义在哲学上倾向于泛神论观点，在一段时期里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威廉·迈斯特》（1794—1796年）、《沃伦斯坦》三部曲（1798—1799年）和《钟之歌》（1799年）等杰作引人入胜，传诵一时。威廉·冯·洪堡投入了古典主义运动，弗里德里希·赫尔德林也并非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

然而，这种吸引力是短暂的，这也不是偶然的現象。在任何其他国家，神秘主义都没有这样强大。它是路德教派的核心；通过虔信派和摩拉维亚修

士派，人们可以发现十七世纪的鞋匠和通神论者雅各布·伯梅和浪漫主义者之间的联系。象亚伯拉罕·维尔纳、卡尔·里特尔和弗朗茨·巴德尔这样的学者都读过伯梅的著作，他们以自己对他的著作的实际理解，竟作了一些最意想不到的象征性的解释。康德之后，直觉主义继续在德意志哲学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终于把哲学引到了先验论的唯心主义。费希特在 1794 年出版的《知识学基础》一书中，通过精神的洞察力，把“自我”当作纯粹活动中出现的唯一真实。然后，他又树立了“非我”，以便给“自我”提供一个企图吸收“非我”的动机。后来，谢林又赋予“非我”一种独立的存在，尽管这种存在纯粹是唯心主义的。他相信自然和“自我”只是“绝对”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无意识的同一性被思考所分开，但是艺术家的天才可以通过直觉掌握它们，并把它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最后，音乐在德意志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海顿那时候正在创作他的最伟大的乐曲《四季》和《创世纪》，他的艺术仍然散发着十八世纪的满面春风的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的气息。另一方面，贝多芬的悲剧精神已在他某些初期的奏鸣曲中有所激发。

十八世纪将近结束之前，一群脱离了歌德以及更脱离了席勒的人，把“浪漫主义者”和“浪漫主义”作为他们号召的旗帜，并且因而取得了成功。1798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兄弟奥古斯特的帮助下，在柏林发行了一个叫做《雅典娜神殿》的杂志，这份杂志出版了三年。他们 1798 年在德累斯顿，1799 年又在耶拿（奥古斯特在这里任教）会见了诺瓦利（他的真名是冯·哈登堡男爵）、谢林和蒂克。当时，蒂克刚刚出版《一个艺术之友、世俗修士的倾诉》，这部著作是他的一位早逝的朋友威廉·瓦肯罗德留给他的。他们共同议论出一种哲学，1804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文学教程里采用了这种哲学，但是它本身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连贯的思想。由于他们都是古典作品的门徒，他们首先把世界看成是生命力创造物的无穷无尽的变化。在谢林和其他学者的影响下，他们把“普遍同情”的概念引入了他们的哲学，这种同情，例如在化学的亲合力中、在磁力中和人类之爱中，到处都显示出来。后来，他们被施莱尔马歇倾吐的宗教思想所感动，从伯梅那里借用了“中心”的概念；所谓“中心”就是世界的灵魂和神圣的原则。无论如何，只有天才的艺术家通过直觉，或甚至通过梦幻和魔术，才能接近真正的现实：在他的手里，这种神秘的体验转化成艺术品。这是一种奇迹哲学，诗人变成了传教士。不幸的是：还不能说有人真正地创造过这种奇迹，因为这些浪漫主义者没有留下伟大的作品，最好的也不过是诺瓦利的那些作品，其中主要的是《夜之颂歌》（1798—1799 年）。

然而他们的确播下了丰富的思想种子。在这方面，1801 年至 1804 年间，奥古斯特·施莱格尔在柏林的一些讲演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那些演讲里，他给浪漫主义下了定义，并且宣称艺术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民族灵魂的象征。施莱格尔给历史以这样的教训：美没有普遍性，研究和欣赏艺术必须首先联系艺术产生的环境。至于民族，它本身必然导致出这样的结

论：为了达到完全的民族自觉，最好的措施莫过于研究民族的历史遗迹。已经开始政治复兴和社会复兴的德意志，正是通过浪漫主义运动，才也成为欧洲思想的一个中心。浪漫主义运动波及到法国较晚，但传到英国却很快。已经发现直觉功效的科尔里奇在德意志旅行时，开始接触到浪漫主义哲学，并且满脑子吸收了这种哲学思想。

浪漫主义本身不是一种政治学说，但是因为它象在其它领域里一样，在政治方面也依赖于情感，所以它的信徒们也就随遇而安。随着反动势力的得势，浪漫主义的信徒也大有作为，他们很快便成为狂热的反革命分子。此外，他们从历史上发现了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统治。从 1799 年起，诺瓦利就歌颂为中世纪大增光彩的基督教的统一；天主教的祷告书和音乐使他们深受感动，诺瓦利并且为圣母玛利亚写了一首赞美诗。他自己仍然是新教徒，但由于在奥国有作官机会，而且奥国比较坚决抵抗拿破仑，所以诺瓦利的许多朋友就为奥国服务，而且改信了天主教。

不管这些思想是多么值得注意，但却决不能夸大它们对舆论的影响。大多数憎恶法国革命的人并不是由于哲学的动机所促使，假如他们感到需要哲学，他们总是到宗教里去寻找。十八世纪末年宗教势力一度重振，它得力于保守的实用主义和多情善感的直觉主义的赞助，但它也是自行滋长起来的。贵族象聚集在君主政体周围一样，深感与国教休戚相关，并且同意这样的看法：魔鬼就是雅各宾派的始祖。此外，大灾大难和旷日持久的战争总是把那些心神不安和胆战心惊的群众引回到祭坛面前。

天主教亟需这样的复兴，因为，它首当其冲，创巨痛深。法国及其所占领各国只不过是“传教区”而已。在德意志，新的灾难迫在眉睫：巴塞尔条约和坎波福米奥条约宣告了一项普遍的世俗化运动的来临，而甚至反对革命的新教徒也都热心地盼望“把黑袍军赶出来因河地区”。另一方面，开明专制一直把教会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在德意志和奥国，国家在大学里培养僧侣，并把教区神甫更多地视为小学教师而不是教士；在西班牙，戈多伊的继任者萨尔维拉和乌尔基霍，从 1798 年以来就一直以哲学家自命；1799 年，禁止向罗马教皇法庭上诉，要开辟财源时就想攫取教会的产业庇护六世作为督政府的俘虏刚刚死去，奥国几乎不掩饰它想和那不勒斯王国一起瓜分罗马教皇世俗领地的愿望。可是同敌人的期望相反，教会的不幸反而变得对它有利，因为不幸引起了同情。英国热情地迎接了被放逐的法国神甫，这些人后来为英国天主教的复兴播下了第一批种子。伯克为了同爱尔兰人妥协，也一直不停地主张他们应享有宗教自由。在德意志，明斯特一个叫做“神圣族家”的热心的小组聚集在菲尔斯滕贝格和奥韦尔贝格的周围，哥里津郡主和蒙塔居侯爵夫人（拉法叶特夫人的姊妹）这样的人物也活跃在这个小团体里。对于他们来说，施托尔贝格在 1800 年的改变信仰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喜讯。俄国皇帝保罗一世也激起了很大的希望。约瑟夫·德·梅斯特和格律贝尔神甫已经说服他要求重建耶稣

会，而且他已经把马耳他骑士团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被选为骑士团的首领。

直到这时几乎还没有受到法国革命触动的新教，从宗教的恢复中得到的全是好处。在德意志，施莱尔马歇在他 1799 年出版的《论宗教》一书中，重新激发了新教的神秘的热情，而威廉·瓦肯罗德和浪漫主义者正在通过美学直观的方法寻找他们返回宗教的道路。在荷尔斯泰因的恩肯多夫，雷文特洛是一个虔诚的团体的领导人，这个团体和明斯特的“神圣家族”很相似。施托尔贝格在改变信仰之前曾在这里面呆过，甚至天主教徒波塔利斯也和这个团体有联系，他在签订教务专约后出任宗教大臣。在英国，卫斯理已于 1791 年逝世；他既建立世俗传教士制度，又创立了一个互选补充成员的教阶组织，从而使循道教派更加接近英国国教。__这种情况在 1797 年引起了循道会派内部的第一次分裂，可是这个教派由于在群众中煽动神秘主义而继续得到发展。循道教派对“非英国国教信徒”__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浸礼会派__由于效仿循道教派的做法而得到了进展，而普利斯特利的索西教__的长老派和普顿斯的理性主义的长老派却在迅速衰亡中。甚至在英国国教中也形成了一个福音派的小核心，其中最出名的是威尔伯福斯，他们想使国教恢复生气，但是没有成功。复振后的非英国国教信徒抛弃了对法国革命的同情，他们对于人民群众的保守的影响即使有被夸大之处，但这种影响的存在也是无可争辩的。

法国似乎依然是世界上理性主义的堡垒，至少是在批判的形式下，反对传统和基督教，就象十八世纪所采取的形式一样。理性主义的代言人德斯蒂·德·特拉西、卡巴尼斯、多努和沃尔内，都固守在国民公会设立的科学总院和高等学校的重要机构里。他们通过然格内控制着《哲学旬刊》，他们的门徒在各个中心学校里任教，这种学校几乎在所有的郡里都成立了。然而理性主义正在起变化。“空论家”中少数仍然是唯物主义者，大多数也不再留意形而上学，而在科学的影响下，只注意对现象的研究，日趋倾向于经验实证主义。因为法国革命在公共教育中给科学以显著的地位，所以科学在法国很兴盛。德斯蒂·德·特拉西和卡巴尼斯打算建立一种思想的科学，一种从形而上学分离开来，却和生理学联系起来心理学。加尼埃和萨伊研究政治经济学也想发展成为实验科学，但是基础不够。这是一个内容丰富多采的运动，但是直到很久以后它才充分展开。此外，这种实证主义由于反映了百科全书派的精神，因此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大不相同。这种实证主义也出现在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解说》中，出现在拉马克攻击生机论的著作中，以及迪皮伊的《一切宗教的起源》中。虽然从社会观点看来，政府和共和派资产阶级日益变成保守派，但他们却仍然敌视基督教。在人民群众中，宗教习惯的确大大淡薄了，因为红衣主教孔萨尔维在签订教务专约时写道：“大多数人民都是冷漠的”。

然而，不应该忘记，在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哲学不但远没有被所有法国

人接受而且遭到许多通常缺乏才能却并不缺乏读者的作家的攻击。在革命大动荡的高潮中，传统的卫道士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变得更加顽固了。他们的队伍由于一部分老资产阶级分子的参加而扩大了，这些人被通货膨胀搞得破了产，因而产生了对新思想的厌恶。法国也没有免于受到神秘的和情感的直觉主义的影响。神灵学在法国拥有一批忠实信徒，到 1800 年左右特别是在里昂和阿尔萨斯最盛行；在里昂是以韦雷尔莫兹为中心人物，在阿尔萨斯，奥贝兰把神灵学和德意志的影响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感情的哲学只是在法国才找到了它的最优秀和最有影响的首领；因为卢梭的吸引力一直没有消失，相反，摈弃他的政治理论的人恰恰是那些最热衷于在文学和宗教方面把感情置于首位的人，夏托勃里昂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最后，象在其它各地一样，有些法国人重新皈依天主教是象儒贝尔一样由于感情的缘故；或者是象丰塔内一样出于保守思想；或者是象罗兰夫人的朋友邦卡尔·德·伊萨尔一样，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慰藉。后来，当波拿巴改弦易辙而和教皇订立教务专约的时候，这些人都支持他，尽管遭到那些原来拥戴他上台的人的反对，甚至也违背了他自己军队的意志。

如果理性主义的传播因此而达到了它的极限的话，那并不是由于反革命的实用主义起了作用，因为博纳尔和德·梅斯特的著作是在国外出版的，还没有输入法国；德意志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影响。法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它的哲学；甚至在艺术上也没有取代古典主义。人们阅读北方文学只是为了要发现可以利用的主题，或者为了欣赏它生动的描绘，或者观摩它刻划感情的笔法。当时最流行的是“奥西安”的诗，玛利—约瑟夫·谢尼埃把它译成了法文。在“奥西安”著作的影响下，阿尔诺写了《奥斯卡》和《高卢人之歌》。波拿巴也和别人一样喜爱“奥西安”的著作。但在 1800 年，当斯塔埃尔夫夫人第一次把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加以对照时，她只奉劝法国古典主义者从北方文学那里摹仿那种忧郁伤感的情调。法国公众中的大多数对哲学上的理性主义与传统的冲突仍然漠不关心，而这种重要情况的确最能说明波拿巴的成就了。那些从出售国有产业中、靠投机和政府合同而发财致富的、不学无术的新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很少关心伯尼奥所说的“原则病”。政府中那些出身旧贵族的人，象巴拉斯和塔列朗等，都是公认不讳的贪污腐化分子和叛卖的专家，他们对此表现了冷嘲热讽的蔑视态度。经常出入于塔利昂夫人、阿姆兰夫人或者雷卡米埃夫人的时髦沙龙的上层人物所想的只是寻欢作乐。更为严重的是，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学浅识少还不以为忧；这一代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只想出人头地的发迹问题；战争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而勇气则是一个足够的条件。只要波拿巴无往而不胜，这些现实主义者就听任波拿巴为所欲为，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决不愿恢复旧制度。他们对各种思想都漠不关心，把法国革命的成就当作既成事实来接受下来，因为他们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也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业，而法国和欧洲之间的鸿沟则继续存在下去。

三、民族的觉醒

法国革命和旧制度之间的斗争具有普遍性，它是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民族情绪起初似乎还没有起作用。而且在十八世纪里，人们并不认为这种感情是重要的。君主们和各个分支的贵族构成了一个统治者的世界性的社会；他们不考虑各民族的起源特性，把各族人民当作交他们看管的羊群一样地彼此瓜分；当时有国家而没有民族。尽管有见识的资产阶级很明白人类可以分为各种不同的种族，但他们基本上把人类看成是能够具有共同文明的一个整体；而且，虽然理性主义使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世俗化了，但却也使这个概念延续长存下去。法国革命一开始，路易十六就呼吁各国君主团结一致，而且法国亡命者也向所有贵族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这种呼吁并不是毫无效果的。1790 年以来，伯克就鼓吹建立反对法国革命的十字军，1800 年左右弗朗索瓦·德·伊韦尔努瓦也这样地鼓吹过。同样，对革命者来说，所有的人都是兄弟，所有的暴君都是他们的敌人。直到 1815 年，斗争大致都保持着这种特性；法国在国外始终有一些朋友，而在国内，也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可调和的敌人。

法国革命号召人民起来治理自己，根据同样的原则，它确实也唤起了民族的意识。革命党人自豪地把自己称做“爱国者”；对他们说来，法国是“民族”。然而，当革命一开始他们深信一切民族都会欢迎法国的福音，并且深信，这样一来，文明就会保持它的普遍性。他们从没有想到各民族会变成敌人，他们深信只是暴君才挑起了战争，民主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和平与博爱。相反地，君主和贵族都敌视民族这个概念，因为它好象是与人民主权和公民平等联系在一起——“民族这个词，听起来象雅各宾”。在尼德兰，贵族和僧侣宁可回到奥国的奴役之下，也不愿意丧失他们的特权。在波兰，同样的恐惧削弱了民族反抗的事业。在匈牙利，豪绅们仍旧忠于哈布斯堡皇室，这些人一旦被允许对农民为所欲为时，他们甚至自愿局部日耳曼化。至于君主们，他们除了自己的利益以外，仍然什么也不考虑。他们完成了瓜分波兰。匈牙利议会要求维也纳作出一些让步：以匈牙利语为官方语言，给以关税的优惠待遇，以及通过合并达尔马提亚或阜姆以便取得出海的通道，可是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尽管匈牙利摄政王约瑟夫大公多次提出建议，但皇帝弗兰茨二世却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爱尔兰在 1798 年爆发了起义，皮特决心摧毁爱尔兰还残存的独立地位，取消了都柏林的政府和议会。此后，一百名爱尔兰议员和三十二名爱尔兰勋爵便参加了英国议会。这个岛屿保留了它的债务和国内税收，但要负担帝国的开支十七分之二。英国答应向爱尔兰开放英国市场，更重要的是皮特在康华里总督和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国务大臣的支持下，透露了他的企图，即要废除禁止天主教徒参加议会的“宣誓条例”；他甚至还暗示把天主教“树立”为爱尔兰国教的可能性，如果政

府有权对主教的选择进行监督的话。对这一点，有十个主教表示同意。而只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很多爱尔兰的新教徒起来反对合并，这些人起初由于害怕曾拥护过这个合并计划。皮特无奈，只好采取分封爵位和奉送大量金钱进行贿赂，不过这些钱还是出自爱尔兰身上。合并问题终于在 1800 年 2 月 5 日在都柏林表决通过，5 月间在伦敦得到了批准。

逐渐引起从世界主义转变到民族主义的是战争。受到各方面攻击的法国人，首先从自己的思想上倒退了。他们蔑视那些仍然处于“奴隶”地位的外国人，而以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自高自大起来。共和国在转向对外征服的时候，利用这种感情来激发自豪感和自利心；然而，这种感情同时也就开始背离革命的理想主义，从而失去了它的纯洁性。波拿巴从一开始就喜欢这种大大有利于他准备执掌政权的演变。与此同时，英国由于对法国作战，最后也染上了民族狂热症。起初，仍留在辉格党内的人士在福克斯的领导下附和了民众各阶级的情绪，认为战争只是皮特和托利党的事。但是当法国准备入侵爱尔兰，并且去征服埃及的时候，情绪就开始转变了。对瑞士的入侵改变了科尔里奇的态度，他在《法兰西咏歌》中斥责背信弃义与不敬神奉教的敌人是轻浮与残酷的民族。从这时起，皮特就能要求全国作出努力了，但在公众情绪改变以前，他慎重地还没有这样做。

同时，法国在荷兰、西沙尔平共和国和瑞士根除了旧制度，从而实现了领土统一和国家统一；这就促进了这些地方民族情绪的觉醒和发展。法国的干预特别有利于意大利，那里的民族统一派比通常人们所想像的要多得多，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但是，法国迫于战争的需要，把这些国度当做前哨阵地来对待，而它们由于担负了供应法国军需的重担，不久就体会到独立的价值。于是，罗伯斯庇尔曾预见的一种致命的逆转局面出现了：法国引起了这些国家的仇视。1799 年当俄国人和奥国人侵入意大利的时候，他们被当做解放者而受到了欢迎。这种危险还不太大，因为德意志还没有受到影响。虽然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以及浪漫主义所激起的“回到过去”的思潮，都在知识界大大激发了民族情感，但这种民族情感还没有采取政治的形式。同政治上已经组织起来的民族，及这些民族之间的野蛮厮杀相对照，德意志是个“文化之邦”；德意志人甚至从自己弱点中找出优越性和神圣使命。这种傲慢的自甘落后态度在法国入侵以后就不复存在了。

同时，针对法国革命的民族概念，德意志已经提出自己的民族概念，法国人认为，民族实际上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虽然并不忽视决定个人选择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但是民族是在个人自愿加入的“结盟”公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反地，赫德尔和他以后的浪漫主义运动，都把民族视为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象其他的生物一样，也是从生命力（即“民族精神”）的无意识的活动中产生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民歌以及艺术，无非都是这种“民族精神”的表现。我们再次发现，德意志处在欧洲发展转化的中心。它将成为反对革命法国的集结地，这不仅因为它作为一个民族出现，而

且还因为它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民族概念——民族是一种集体存在；在这种集体存在中，个人丧失了全部自主权，而自由，则象神秘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存在于愉快的逆来顺受之中；这种集体存在否认理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文明，并且赋予自己的需要和激情以神圣的价值。

大约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发展。在那里，汉学学者早就赋予他们的讲学以批判的理性主义的调子；他们争论天皇的祖先是否是太阳，他们宣称：天神并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但是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在贺茂真渊和他的门徒本居宣长（死于 1801 年）的领导下，日本重现了一种神秘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在尊崇佛教和它的戒律的同时，重新树立起神道和这个民族过去的威望。这个运动的政治影响非常深远。按照这些革新者的意见，天皇又成为天神之子，幕府将军成为篡权者，日本人成为注定要统治一个世界帝国的优等民族。在松平定信的独裁和改良的摄政（到 1793 年为止）之后，幕府将军德川家齐同京都宫廷和解了。尽管如此，皇室革命的种子还是播下了。在这里又看出人类思想中两种永恒的趋势在交替，这是不足为奇的；然而，由于欧洲和远东之间还没有文化上的联系，处于世界两端的这种不谋而合的情况却是很值得注意的。

第二章 战争的后果与和平的条件

由于不存在民族仇恨的问题，各国的传统野心从一开始就使法国和欧洲的冲突复杂化起来。反法同盟各国投入战争时，不仅仅是要扼杀法国革命：大陆列强还要肢解法国，英国要夺取法国的殖民地并摧毁它的商业和海军，以便有利地结束从路易十四以来的英法竞争，并恢复它那由于美国独立战争而受到危害的海上霸权。但是，十八世纪期间使列强彼此冲突的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普奥同盟终于因波兰问题而垮台；俄国在东方和地中海的野心使皮特忐忑不安；西班牙一直对英国心怀忧惧。各同盟国从来没有有效地使彼此的作战努力协调起来；他们各自所得到的利益是悬殊的，这只能有助于加深他们的分裂。大陆各国被打败了；法国能够同普鲁士议和，并且能把西班牙争取过来，同自己结盟，还能够到达和越过它的“自然疆界”。1799年，第二次反法同盟又夺回了意大利和瑞士的一部分，但象第一次反法同盟一样，它本身已处于瓦解之中。相反地，英国在海上取得胜利，但它缺乏陆军，因而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法国，它的经济形势也不是没有弱点的。问题在于，从欧洲的分裂中得到了好处的法国，能否取得胜利并获得持久和平，以保持它的“自然疆界”。所有研究拿破仑的史学家都认为，这是支配他的命运的问题。

一、大陆各国

欧洲各国的君主都是非常庸碌无能的：在奥国，弗兰茨二世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庄严君主，他不重用他的兄弟查理大公，而愿和他的忠诚的但能力有限的首席顾问大臣科洛雷多伯爵一起指挥一切。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一个诚实、善良但却不大机敏的人，他虽然优柔寡断，但却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威。俄国的保罗一世，是个半疯的人，残忍而反复无常。甚至战争也没有使这些君主们学到什么教训。例如，奥国仍旧实行强制在农民中招募或以抽签的办法来征召新兵，仍是终身服役。军官差不多都是贵族，他们仍旧是购买军职。1798年，查理大公打算把团改编为师，但是战争迫使他放弃了这个计划。无论是战术、战略、或是后勤供应，都没有任何改进。

大陆各国并不缺乏兵员。据估计，从1792年到1799年，他们的损失是：死亡十四万人，受伤二十万人，被俘十五万人；这个数字无疑是很庞大的，但他们的人力远远没有耗尽。最缺乏的是钱。在奥国，尽管增加了赋税，但年度赤字却从约瑟夫二世统治末期的二千万盾（或福林）增到1796年的九千万盾。政府不得不采用强制公债的手段，而债务就由1793年的三亿九千万上升到1798年的五亿七千二百万。英国给予奥国以补助金，另外还保证或准许在伦敦向私人借款。尽管如此，财政偿付能力只能靠发行纸币来维持，而纸币的价值又不得不强制规定，以便为1800年的战役提供经费。流

通的纸币总额由 1793 年的二千七百万增加到 1801 年的二亿。从那时起，奥国的盾就开始贬值了。1801 年，在奥格斯堡交易所里，盾的价值下跌了百分之十六。俄国的卢布更为虚弱，在来比锡只按它的票面价值的百分之六十来兑换。保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主要在荷兰欠下的债务就由四千三百万盾上升到一亿三千二百万盾，而且政府每年还要发行一千四百万新的纸卢布。瑞典也采取了印刷纸币的措施，纸币的价值在 1798 年下跌了四分之一以上。如果没有英国的补助金，反法同盟各国的确很难继续进行战争。但是，这个同盟是否仍然存在呢？

虽然保罗一世大事宣扬他如何仇视法国革命：他把路易十八庇护在米塔瓦，并且维持了孔代的军队，然而要等到埃及战役才使他决心参战。这是因为从那以后东方问题对于俄国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不满足于肢解土耳其帝国各属邦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已经在那里赢得了特权地位：即对这些地方的基督教臣民境况有一定的权利过问，以及俄国商船自由通过两海峡的权利。这种特权只是在 1799 年才给予英国，1802 年才给予法国的。土耳其帝国的瓦解给俄国人得寸进尺的机会。1793 年以来，塞利姆三世一直在竭力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但是在很多省份里他的权力有名无实。阿里-泰布兰尼在阿尔巴尼亚和埃皮鲁斯为自己开拓领地；帕斯万·奥格卢占领了维丁，并且在向亚得里那堡进军时自封为帕夏；杰扎尔控制了叙利亚；瓦哈比教派的首领阿卜杜勒·阿齐兹征服了整个内志，并且威胁着圣城和巴格达的帕夏。希腊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也在引起人们的忧虑不安。前者乘战争的机会，利用土耳其当时守中立而遍布于地中海；他们乘着俄国的船只深入黑海；在各大港口都形成了希腊人的集居点。他们从柯勒爱斯和来格斯的作品中知道了法国革命，并且看到了飘扬在爱奥尼亚群岛上的法国三色旗。这一切使希腊精神复苏。被土耳其近卫军步兵的掠夺所激怒的塞尔维亚人在上次土耳其战争中曾经援助过奥国。他们的首领卡拉—格奥尔吉和奈纳多维奇只是在等待时机，以便帮助俄国对土耳其重开战。

波拿巴远征埃及的结果使俄国获得了进入地中海的机会。保罗一世变成了土耳其苏丹的盟友后，使土耳其对俄国军舰开放了两海峡。他伙同土耳其人和艾奥尼纳的帕夏，占领了爱奥尼亚群岛，在这个群岛上建立一个受他保护的共和国。保罗在被选为马耳他骑士团大统领后，企图久据该岛；1799 年 11 月 3 日，格伦维尔不得不答应他：英国如从法国手里夺到马耳他，也不会留在那里。保罗还垂涎科西嘉岛，他的军队在那不勒斯王国登陆，并且答应使撒丁国王复辟。这样，保罗一世通过改变俄国对土耳其的传统政策，获得了一种俄国从未有过的势力。一心想重新占领埃及的英国，只得坐视俄国势力的扩张。但是弗兰茨二世却不愿意让俄国人在意大利为所欲为，保罗把苏沃洛夫在苏黎世的战败归因于奥国的背叛，因而召回了他的军队。由于反对参加反法同盟的罗斯托普钦接替潘宁出任外交大臣，俄国军队回国后也就不会再度出征。保罗脱离反法同盟的结果使奥国陷于孤立，并且可能带来更为

严重的后果：如果英国认为今后它得以放手占有马耳他的话，则将导致英俄冲突。以前，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曾纠集过一些中立国家反对英国的海上霸权，__并对英国关闭了对它的商业无比重要的波罗的海。

在此期间，奥国不得不单独承受战争的重担。帝国议会正式地支持这场战争，但是自从巴塞尔和约签订以来，神圣罗马帝国只不过是个影子罢了。普鲁士保证了包括汉诺威在内的北德意志的中立。在分界线以北——奥国的胡德里斯特称之为“迷人地带”——的德意志诸邦，享受着和平和大量商业利润带来的益处。普鲁士的威望因此大大提高，弗里德里希-威廉很快地成为一颗“北极星”，成为一位“与皇帝抗衡的皇帝”。根茨在 1799 年劝说弗里德里希-威廉坚持中立政策，其实这是完全多余的；因为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并指望成为一个北德意志邦联的首领。他还做着扩张领土的美梦，他急不可待地要实现教会产业世俗化，垂涎汉诺威，同时还策划要吞并纽伦堡。被赶出北方的奥国，由于丧失了来因河左岸而在南方感到耻辱；它还感到关于巴伐利亚的意图被出卖了，虽然在 1799 年继承了查理-特奥多尔的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时刻在为他的继承权担心。至于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他已被卷入到一场与各省等级议会长期纷争的局面里，这些议会已经擅自向巴黎派出了密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德意志的诸王侯只是出于恐惧才跟随着奥国，他们都在等待和法国和好的时机。因此，一个反法的德意志诸邦的同盟就不可能实现了，而神圣罗马帝国本身的消亡则看起来非常可能，戈雷斯甚至已经讽刺地为它拟好了死亡证。奥国大臣图古特并不为此过分担忧，更不惋惜尼德兰的丧失。他没有忽略在波兰寻求补偿，但是象他的十八世纪的前任们一样，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意大利。在吞并了威尼西亚诸邦之后，他希望在这个刚刚驱逐出法国人的半岛上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他估计总的看来，奥国最终将无可怨尤，这不是毫无根据的。

法国会不会把俄国人争取过来，并且通过把意大利让给奥国从而使它保持中立呢？假如是这样的话，英国起码会因此而孤立无援。

二、英国的战争努力

英国的行政制度也没有经历什么变化。它依然是陈旧过时和叠床架屋的，充满闲差冗员并日趋腐败。然而，议会制的政府证明是稳定的，并且具有政策观点的连贯性，这是会使大陆上的专制君主们羡慕不已的。统治英国的寡头集团把国家当做是自己的世袭财产，这一集团中富有才干的人虽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却能用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一定的纪律来捍卫英国。他们的领袖威廉·皮特主政以来饱经忧患，__但是他们却称赞他的使英国人免受强制和牺牲的坚韧性和谨慎的经验主义，直到最后，他们认识到处境危险时，才开始大声疾呼，要求强化统治和做出牺牲。英国强征海员和招募士兵派出去参战，这些人都是来自贫穷的阶层。他们都是由出身贵族的志愿参军的人率

领的，这些军官的职位都是用钱买的。为了保卫本土建立了国防军，民兵逐渐扩充到十万人。原则上，这些士兵都是由抽签办法挑选的，但实际上可以雇人顶替，许多教区往往用钱买足征兵名额；这样一来，正规军招募的兵源最终变得枯竭了。1794 年到 1799 年间，招募的正规军被用在殖民地上，而那些靠英国补助金维持的盟国则担任了大陆上的牵制攻击任务，这对英国很有利；格伦维尔坦白承认，他宁可资助大陆各国也不愿给他们增派援军，因为后者将会剥夺英国工业上的人力；此外，由于那些钱还是化费在英国市场上购买军需品，所以钱并没有白白损失掉。

这是一种代价很大的政策。支出从 1792 年的二千六百万英镑上升到 1801 年的九千一百万英镑。皮特稍微提高了间接税，这些间接税在 1797 年提供了百分之七十五的岁入，但是这还是不够的。1792 年，岁入只抵偿了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八，而 1797 年则抵偿了不足百分之二十九。英格兰银行只好谨慎地贴现财政部证券：1792 年为八百五十万英镑，1797 年为一千七百万英镑。由于黄金支付的中止，英格兰银行变得比较慷慨了，以至于在 1801 年流动债务超过了二千四百万英镑。但是最重要的来源还是只付利息的固定公债，它的本金从 1792 年的九百万英镑上升到 1801 年的三千六百万英镑。皮特在偿还债务时能保持兑换率不变，这表明英国贵族对自己的未来的信心达到了何种程度，并且也证明英国已经从它的贸易和殖民地中获得巨款。尽管如此，英国的支撑力还是依靠信贷。由于英国资本家的活动也是依赖于信贷，所以在法国人看来，这个在当时不为人熟知的制度是虚假而脆弱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法国在整个时期一直对英国进行了经济战。

从 1794 年起，当欧洲大陆的战局变得恶化时，英国政府竭尽全力激励全国做出新的牺牲。然而，只是到坎波福米奥条约之后，当英国陷于孤立，在爱尔兰遭到攻击并在埃及受到威胁时，形势才有了决定性的变化。随着 1797 年黄金支付的中止，皮特坚持要进行财政改革，以限制通货膨胀。这一次，那些拥有土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较少受到照顾：土地税增加了，并且实行了所得税。与 1792 年的三百万英镑相比，1801 年直接税的收入达到一千零五十万英镑。但是，决不能夸大这些改革的重要性，因为在 1801 年间接税仍然占岁入的百分之六十五，而公债则相当于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到这时已变得很明显，要继续进行战争就需要再做出新的努力。

改进新兵的招募更为困难。在 1794 年如遭入侵要征召数以万计的志愿兵是容易的，因为在没有遭到实际入侵之前他们都是呆在自己的家里，并且免除在民兵里服役。他们是民间自动组织起来的，并且同意在由他们自己所确定的一定地区内作战。人们期望他们会象在旺代暴乱那样地作战；事实上他们与法国革命的志愿军唯一共同之处只是个名称而已。对英国说来，侥幸的是他们从未经受过同样的考验。与此同时，正规军里的情况非常危急，因此，在 1796 年政府要各教区用抽签方式提供一万五千名正规军士兵。如有

不足，课以罚款。然而这一着完全失败了，因为各教区宁愿交付罚款。最后，在 1798 年，只得建议民兵转入正规军，凡转入者给以奖金。但是这个意见遭到各郡郡长的强烈反对。他们任命民兵的军官并且用土地税的收入来维持民兵，因此他们把民兵当作自己的私有部队。不过，这个办法最后在 1799 年 7 月 12 日还是在议会里通过了，而且一直延续采用到 1815 年。民兵响应了号召，参加了对荷兰以及后来对埃及的远征。皮特到此止步，没敢再进一步实行强制兵役制。皮特也没有结束在军政方面的混乱状态，当时军政是由邓达斯、温德姆、约克公爵和内政部共同掌管的。实际上，作战则是由皮特、格伦维尔和国王指挥的。但是，军事技术还是有了一些进步：1797 年创建了骑炮兵中队，1799 年炮兵被编成一支独立军团。除了驻防部队之外，英国军队能派出的远征军只有一万人左右；这支远征军队除了 1799 年在荷兰遭到惨败外，在 1794 到 1807 年间只是在殖民地作战。首先是法属岛屿，接着是荷属各地，后来是特立尼达岛，最后在 1801 年瑞典和丹麦的安的列斯群岛都相继被英军占领。但是 1798 年当杜桑-卢维杜尔与松托纳 结成同盟从圣多明各岛驱逐英国人时，七千五百英军死在这个不得不放弃的岛上。在殖民地作战的这些胜利自然应归功于舰队的战斗行动，这是英国对反法同盟的主要贡献。

舰队扩充得更加庞大了，但是它的扩充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商船队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扩大着。从 1793 年起，英国军舰不得不招募外国人，直到全部水兵的四分之三由外国人组成。各国的水手、战俘、罪犯、罢工者和政治嫌疑犯都一律被强迫服役。由于船上生活仍然令人难以忍受，所以哗变层出不穷。1797 年，哗变发展成一次蔓延甚广的叛乱，这次叛乱通过杀一儆百的办法，但主要靠增加军饷和战利品奖金的办法，才被平息下去。造船工艺几乎没有变化。标准的战列舰的船身仍然是二百呎长，船体中部横梁五十呎宽，装备七十四门大炮，有两层战斗甲板和六百名水兵；高耸的三层舰的数量也还是逐渐增加了。1801 年前一直是海军大臣的斯潘塞勋爵，在建造战列舰方面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障碍，英国的橡木和冷杉木或者苏格兰的林木仍然可以弄到。美洲的白松和从波罗的海地区来的木材也都能用上，而法国人再也买不到这些。

1796 年以前，海战一直进行得毫无效果。冬季里，豪和布里德波特把他们的军舰停泊在港口里，这样就中断了封锁。而后，与西班牙的决裂导致了对科西嘉和地中海的放弃。1798 年，当圣文森特伯爵杰维斯海军上将组织了辅以军需供应和定期轮换的经常的近海巡逻时，封锁就又恢复了。如果法国人企图冲破封锁，巡逻舰队就奉命在英吉利海峡的入口处集中。同年，皮特决定强行进入地中海以援救那不勒斯；他虽然没有成功，但却设法夺取了西西里和梅诺卡岛；这时，那不勒斯和葡萄牙的海军加入了英国舰队。

1799 年，荷兰舰队被拿捕了，纳尔逊已经在阿布基尔摧毁了布律埃斯的舰队。在埃及的法国军队完全被隔绝海外，马耳他也被包围了。看起来，除

非保罗一世加以反对，否则地中海即将落到英国手里。但是法国海军还没有完全被清除出地中海：1799年4月，海军上将布律克斯还能从布勒斯特启航而到达土伦，并且又回到原泊港口。英国舰队的将领们至少能保护他们的交通线，制止私掠船的活动，以及摧毁敌人的商船。由于采用了军舰护航的航行办法，英国船主平均每年只损失五百艘船只。这个数字占英国船只总数的百分之三，几乎不多于通常在海上遇难所造成的损失。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海上的保险率曾高达百分之五十，而在1793年到1800年间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到1802年和平以后，甚至降到了百分之十二。英国拿捕了七百四十三艘海盗船，而从1798年起俘虏了二万二千名水手。法国人只剩下了二百艘二百吨以上的商船，这仅仅是他们1789年实力的十分之一。

在所有的反法同盟国家中，只有英国达到了它的目的。它的盟国认识到这一点，都谴责它没有给它们派遣军队；而这不能使同盟得到巩固。但是英国还没有懂得：仅仅靠它的海军力量是不能迫使法国投降的，最后胜利必须在大陆上赢得。

三、法国及其盟国

随着反法同盟各国的分裂，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地位却正是十分强有力的。除了阿维尼翁、蒙贝利亚尔和牟罗兹之外，法国还吞并了比利时、马斯特里赫特和荷兰弗兰德、来因河的左岸（至少是一直到科布伦次以下离开来因河、到达并顺沿罗尔河一线）、以前的巴塞尔主教邦（包括波伦特鲁伊、圣伊米耶山谷和明斯特山谷以及比尔）、日内瓦、萨伏依和尼斯。法国仍然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战争使它死伤和失踪了约六十万人；然而，这些被公认为骇人听闻的损失并没有危及到法国的有生力量；法国如果善于使用这些有生力量，无疑能击败任何攻击。何况法国已不再象1793年那样孤立了。

在“全国皆兵”的名义下作为临时措施而采用过的强制兵役制，根据共和六年果月19日（1798年9月5日）的儒尔当法已被规定为永久性的征兵规则。除非处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这项法律只要求那些用抽签或征募的办法产生的一定的人数服兵役。但是在共和七年，那些适龄的青年人利用共同招募志愿兵以凑足他们所在公社的军队数额的办法，而得以逃避这项法律的规定。波拿巴后来只不过是增加了个人顶替的规定，这项办法是原曾实行过，以后被他的前任又禁止了的。此外，督政府还使“混合编制”臻于完善，显著地改进了骑兵队，并改变了军官的产生办法；由士兵选举军官的办法已因共和三年芽月14日（1795年4月3日）的法令而大大减少了。军队的精神面貌起了变化。如同在市民生活中那样：追求荣誉，甚至追求金钱逐渐代替了革命的热情。然而，尽管有受王党煽动宣传而发生的哗变，军队依然是法国革命的后盾。作为战争的工具，它是无与伦比的。任何勇敢的人都有迅速晋升的机会，这仍然是深得人心的平等象征，它吸引着雄心勃勃和富

于战斗精神的青年人。法国革命使激发个人力量成为现代世界的主要原则，这个原则在战争中显示了它的价值；这个社会原则的优越性使法国军队显然比旧制度的军队高超得多。

和它的敌人一样，法国的弱点也在于筹措战费日益困难。督政府不得不用宣布破产的办法来废除纸币而恢复了硬币。由于只剩下税收，督政府格外地陷于通货紧缩常有的窘境：价格调整、经济瘫痪、收入减少。这种本不应由督政府承担罪责的财政状况一直贯穿在它整个的历史中，而使它声名狼藉。实际上，督政府尽了很大努力来改善这种财政状况。它调整了直接税的基数，甚至还制定了新的基数；它催促编造纳税名册并设法加速税收，多少获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又不至剥夺选举产生的各机关的职权。督政府还增加了间接税，并且在共和七年成立了征收注册税、印花税和抵押税的机构；又开征了运输税和公路通行税，并且还授权城市征收城市通行税来帮助它们。督政府完全懂得，要确保大量的经常的收入，必须对重要的消费品（例如盐）征税，但是这些是它自己也感到没有足够力量去冒险采取的措施。因此，它除了削减支出别无它法，而这种削减接着又迫使它拒绝支付公债的三分之二，并且置公共事业于不顾。

即使督政府还能保持正常预算的平衡，它也还要为战争提供军费，这只有依靠借贷才能做到。可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强制公债成了借贷的唯一手段。银行家都不愿意贷款给政府，以维持国库的运转。因为收税官尽量长期地保存税款以便从中牟利，所以有人谈论要恢复“期票”，这就是说，1789年以前包税人对预定的税收开出的期票。然而，谁会来贴现这些期票呢？银行家确实曾建议成立一个国家银行，但那将只不过是一个要用来贴现他们自己的票据的银行。简而言之，督政府不得不用债券偿还债务，支付养老金和薪金等，这使人们极端憎恨督政府；它也不得不把军需供应让给诈取政府钱财的私人公司去筹办，而政府还得把国有产业、木材采伐、预收税抵押给它们，或者用没有银行能兑现的支票给它们作补偿。

这些构成变相通货膨胀的权宜措施，引起了狂暴的投机浪潮，而且也使许多政府官员和政客腐败起来，因为承包商贿赂他们以取得付款。军队深受其害，他们对这些“中间人”很气愤。由于警察缺乏战胜盗匪的手段，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恶化，盗匪为数日增，公共秩序越发难以维持。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生活和道德：穷困使督政府为了养活军队而剥削荷兰，并且扩张到意大利和瑞士去，军需承办商推波助澜；将军和军事特派员都热衷于追求自己的私利。军队，甚至国家，都依靠战争过活；这样就从战争中产生出一个主战派，它具体体现在波拿巴身上。

正如执政府后来所表明的那样，社会秩序和财政的恢复需要时间，但最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有权威的当局。督政府很好地组织了自己的工作；例如它的“国务秘书部”后来被波拿巴重新采用；再如它的警务部，其中就有富歇，他是在共和七年进入警务部的。但是督政府却没有能巩固自己的权力。首

先，共和三年宪法重建了广泛的地方分权制，而且在巴黎也实行分权制度，这种分权的情况剥夺了战争所需要的国家行政机构的活动能力。行政机构没有控制国库，它和立法机构之间，或立法机构两院彼此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妨碍了它的工作。其次，只要原来的特权阶级还是不向新秩序屈服，在法国就仍然存在着酝酿叛乱、内战和叛国勾当的顽固的骚乱因素，这种因素削弱了政府的力量，或者迫使政府采用暴力。共和七年，法国西部就曾再次发生武装叛乱，西南部也有叛乱发生；在普罗旺斯和弗朗歇—孔泰，有人勾结外国并拿英国的钱，也正在策划到春季发动暴乱。

只要反革命还得到部分天主教僧侣的支持，那么就不能指望它放下屠刀。1794年9月18日，“教士法”随着宗教预算的取消而不复存在。现在对神甫的要求只是宣誓忠于共和国，但许多神甫仍拒绝这样做。这些人遭到了追捕，被拘禁在罗什福尔或雷岛的囚船上，然后流放到圭亚那。他们都和罗马以及先前那些顽抗的主教多少有些联系，这些主教多数都靠拿皮特的津贴住在英国。无论他们主观愿望如何，他们的忠实信徒都可能参加叛乱。那些已服从法律的罗马派教士和恐怖时期以后曾经改组过教会的老宪政派教士对督政府都没有好感，因为督政府和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空论家一样，总不放过任何机会表示对天主教的敌意。督政府卖掉了许多教堂，强迫实行第十来复日制，根据法律禁止一切公开的宗教仪式，甚至把第十来复日礼拜和“博爱宗教”__引进了教堂，以同天主教相对抗。果月18日以后，督政府开始攻击私立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是天主教办的。除非它们保证进行市民道德的教育，否则就得关闭；而且禁止政府公务员送自己的子弟进这些学校。假如共和国对宗教放弃这种敌视态度而实行一种真诚的中立政策的话，它无疑将会把宪政派教士和宣誓派教士争取过来，并且将会削弱那些顽抗派教士的影响。不过，这是个长时期才能见效的政策。为了迅速取得成就，有必要和罗马教皇达成协议，可是已经监禁和流放了教皇的督政府处于无可转圜的局面。而无论如何，督政府的支持者也决不会允许它同教皇谈判。全国的统一，即使至少是表面上的统一将能加强国家，但是要实现全国统一，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在法国的同盟国中，唯一名符其实的是西班牙，它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它的一支舰队甚至就停在布勒斯特。但是对于西班牙来说，战争却是灾难性的。它在圣维森提角__被击败的舰队已不能防止梅诺卡和特立尼达的丧失；西印度群岛的白银好不容易才能运来，西班牙对美洲的属地提心吊胆；而罗马教皇以及巴马和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室的命运使查理四世感到悲哀。然而，督政府对这个盟国却诛求无已。它鄙视这个仍有异端裁判所的国度，由于王后与戈多伊关系暧昧，它也鄙视这样一个国王；它垂涎路易斯安娜，它抗议西班牙对葡萄牙所表示的体谅，而没有注意到正是被葡萄牙人所贿赂的塔列朗在暗中捣鬼。被法国触怒了的西班牙终于听从了英国的建议。虽然还不是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但是法国和这个财力有限、只能缓慢行事的

旧制度的君主国言归于好还是必要的。西班牙的财政状况也很可怜：1799年，票面金额下跌百分之五十的皇家债券才有了固定的兑换率。同圣卡洛斯银行创办人卡瓦鲁斯有联系的乌弗拉尔已经承担供应西班牙舰队的给养，他梦想在这个被法国人视为黄金国的国度里进行大规模的投机。

除了西班牙这个盟国外，法国还有一些附庸共和国。在意大利的附庸共和国都丧失了。在苏黎世战役中，马塞纳仅能解救出半个黑尔维谢共和国。巴达维亚共和国几乎不保，英国人夺走了它的军舰。这两个卫星国都供养了法国军队，并提供了战略要地。要它们提供比这更多的东西，就需要有稳固的政府，但是督政府却没有给它们建立起这样的政府。在这两国里也存在着社会秩序问题。因为法国人宣告了旧制度的结束，所以那些特权阶级不是移居国外就是退隐不出；而资产阶级是比较乐于参加政府的，只要法国人授与他们政治权力的话。这种权力也是唯一真诚的亲法分子雅各宾派所要求的。这两派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代表人物密谋发动政变。荷兰的温和派资产阶级领袖席梅尔佩宁克希望在和平带来独立之前，能重建一个和法国关系融洽的荷兰。但只是在1798年7月，他才建立起一个具有确定的组织的巴达维亚督政府，而这个政府仍然还是不稳固的。在瑞士，战争使得拉阿尔普能够强制推行他的独裁统治，但是温和派却在策划推翻他。承受着军事占领的沉重负担的平民各阶级，在荷兰表现出情绪敌对，在瑞士则是态度犹豫。要想把他们争取过来，就需要象在法国那样去帮助农民。在荷兰什么也没做。在瑞士，1798年无偿取消了对人的封建赋税以及非主要农作物产品的“小什一税”，但对物的赋税和主要农作物产品的“大什一税”却是要赎买的。虽然国家承担部分补偿，但那是打算用国有产业来进行的，因此这些补偿几乎到不了农民手里。而且，旧的封建赋税还没有废除，就又实行了土地税。结果，法国的统治使人人都感到不满。在这些国家里，国家的改革也势在必行。督政府也是这样想的，它甚至着手进行了一些在本国内也不敢进行的改革尝试，不过它却缺乏实行的权威。法国在同欧洲的斗争中最欠缺的是一个具有救国委员会的毅力的政府。

四、封锁与中立国

可是，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使法国要成功地争夺英国海上霸权的希望破灭了。因此，法国在经济斗争方面制定了一个新的方针：它试图用十八世纪英国人已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对付英国。十八世纪期间，封锁虽给敌人造成麻烦，但它却不能使敌人瘫痪。按照重商主义的原则，海上强国把封锁主要看做是一种制止敌国的出口以夺取它的市场，并取代敌国而垄断硬币的手段。即使这样，还是存在有购买敌国某些原料，或是乘机购买敌国食品的好处。从重商主义的观点看来，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把货物卖给敌人，除非是战时违禁品。这样，英国就以一种明智的经验主义运用封锁，按照它的需要颁发

特许证，甚至准许开放那些被它的舰队有效地封锁着的港口。由于这些港口从来为数无多，所以中立国也就总有办法回避这一封锁政策。英国还以它独特的方式制定了一个海洋法：即使是用中立国船只运载的敌国货物也被宣布为合法的捕获品，而且敌国的全部或部分海岸都被宣布处在“虚拟封锁”之内——这样，任何往来于这些海岸的船只都被视为破坏封锁的船只。最后，英国通过在公海上临检所有商船而强制实行这个制度。于是，海洋就被置于英国的统治范围之内了。

中立国对于这个针对着殖民地的规定特别不满。在国际贸易中，殖民地的贸易一向是极为重要的，在和平时期每个宗主国都垄断与自己殖民地的贸易。但是正在同英国交战的法国，后来是西班牙，都放弃了他们的“专营贸易权”¹，并对中立国开放了它们的殖民地。1793年以后，同1756年一样，英国禁止中立国获得这个意外的好处，它企图强使英国船只到敌人的殖民地去。然而，为了安抚美国人（他们认为自己受损害最重），英国允许走“迂回路线”，即允许那些要到欧洲以外的中立港口去的中立国船在西印度群岛装货，然后，如果这些货物成了中立国的财产，就又允许他们再运出这些货物。此后不久，由于缺乏船只和希望利用中立国向法国出口货物，英国的航海条例暂时中止实施。1798年，中立国船被允许在西印度群岛为英国或者为它们自己的国家进行贸易。这样，英国就在保持对殖民地产品几乎完全垄断权的同时，把中立国变成了它的帮手。英国根据自己的需要，还颁发给中立国一些特许证。这样一来，它的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管制经济的面貌。那些中立国商人——斯堪的那维亚人、普鲁士人、汉撒人和美国人，纵然心怀不满，却是获得了巨额利润。荷兰被法国占领以后，汉堡继起成为英国和德意志之间的中转站，成了欧洲大陆上最大的银行业中心；反法同盟是通过汉堡的帕里什银行才得到英国补助金的。美国的销售额（其中一半来自殖民地产品）从1790年的二千万美元上升到1801年的九千四百万美元。他们供应粮食给安的列斯群岛和西属美洲，把木材和谷物运往英国，并且在法国市场和汉堡都赢得了重要的地位。美国人那时正在改进他们的造船技术，把巴尔的摩的“飞剪式”快船视为标准式样。由于中立国贸易兴隆，它们的商人和金融家都成了坚定的亲英派。

法国是否要维持大部分海上贸易关系，甚至同英国的贸易关系，现在只取决于法国；由于中立国无不竭力违犯英国的规定，所以情形就更加如此。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接受了这样一个办法，即，除禁运品外，中立国船有权保护它们的货物。这一办法使得法国能继续进行贸易，并赢得了与荷兰的同盟，而第一次武装中立联盟则是针对英国。后来国民公会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其基本原因是1786年的条约使得法国工业受到英国竞争的打击，战争为法国提供了一个与英国抗衡的极好机会。纺织企业家大声疾呼要求恢复禁止英国货入口，鲁昂的大商人丰唐内就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支配着国民公会，就象后来左右拿破仑一样。而且人们坚持认为，英国的经济以及随

之而来的信贷是依赖于货物出口的，因而，对英国的沉重打击莫过于对它关闭法国这个最好的主顾的门户。这就是 1793 年 1 月布里索和凯尔圣的论断，后来这也成为皇帝的逻辑。5 月 9 日，一项法令宣布，中立国船运载的敌货为合法捕获品，并于 10 月 9 日禁止英国商品进口。

只要允许中立国与法国通商，这些措施就不能奏效，因为英国允许中立国船到法国完全是为了推销它自己的商品；此外，由于中立国来法国采购货物而使物价上涨，所以人民对这些国家深感不满。于是法国于 8 月宣布了禁运令。这样，法国使这次封锁达到了连英国人没有做到的那样严密的程度。没有多久，法国就感到殖民地产品和原料的缺乏，首先是棉花的不足。这当然不是企业家所希望的。他们认为，这次封锁应该灵活一些，就象英国的封锁一样，以方便贸易利益。因为急于供应军队，救国委员会又重新对中立国开放了港口，热月党人恢复了中立国根据条约取得的特权。于是，英国货很快地重新出现了。但是在签订坎波福米奥条约之后，英国仍是唯一的敌人，而法国陆路贸易得以恢复时，那些保护贸易主义者又重申前议。督政府再次禁止英国货入境，并于共和六年 1 月 29 日（1798 年 1 月 18 日）采取了一项空前措施来对付中立国：如果发现中立国船只运载任何英国产品或者只是在某一个英国港口停泊过，这些船就被视为合法的捕获品。这样一来，中立国的船只不再出现了，而美国则与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货物走私仍旧猖狂地进行着，而且法国的盟国也参与了走私活动。1798 年法国合并日内瓦和牟罗兹的部分原因是为了限制走私活动。法国和荷兰两国在 1792 年进口了英国出口货物的百分之十八，1800 年仍占百分之十二。督政府充分意识到，法国要想贯彻一项既行之有效而又可以接受的封锁政策，就需要开拓广阔的大陆市场。于是对别国的征服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经济斗争的需要。被占领各国和西班牙对英国是封闭的。人们指出，占领汉撒各城市会打开德意志的市场。这样便开始露出大陆封锁的苗头了。世界正在分为极不相等的两部分：法国及其盟国为一方，英国及所有其它各国为另一方。这两个主要交战国现在被迫巩固各自的阵地，以图生存。

法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最沉重的打击就是失去了它的殖民地贸易。1789 年与殖民地的贸易占法国进口货物的三分之一，占出口货物的五分之一。欧洲大陆的一部分仍然对法国实行封闭；在其它地方，法国仍不能恢复其原有的地位。尽管法国的版图扩大了，但它的贸易额却从 1798 年的四亿四千一百万法郎下降到 1800 年的二亿七千二百万法郎。革命的危机已经影响到各个工业部门。有些工业历经困难才得以恢复。在里昂，开动的织布机不到一半。从 1789 年以来纺织品生产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遭受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折磨之后，法国现在又发现自己成为通货收缩的受害者，这就又加深了已经普遍存在的不安情绪。硬币仍旧缺乏，信贷不复存在。月利率浮动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七之间，物价下跌造成了工业瘫痪。连年丰收本身应该起到一种稳定的作用，然而却招致了物价的进一步跌落，从而降低了农

民的购买力。督政府除了多方鼓舞大家以希望之外无计可施。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危机。假如政府恢复力量，并且在欧洲大陆上重建和平，硬币就将会逐渐在市场上再度出现，新的销售市场将得以重开，生产将得以恢复。

法国革命已经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由于废除行会而获得的经济自由；通过取消内地关卡、减少通行税和采用十进制制而实现的全国市场的统一；在被合并的各地区开辟了新活动场所，例如，法国的冶金业可以使用比利时和萨尔的资源。农村仍富有大量的劳动力。如果实行封锁不单是为了追求战争的目的，而是相机行事的话，那么就会给初期的资本主义提供必要的保护，从而只会产生有益的结果。事实上在冶金业、化学工业，特别是在纺织工业方面，封锁的确起到了有益的影响。纺织业仍然是最富于创造发明的工业，是对资本家最富有吸引力的部门。“珍妮机”得到大量采用，1797年奥伯坎普夫已经开动第一台花布印染机。一些工业界巨头出现了，并且建立了一些工厂：其中有图卢兹的布瓦耶-丰弗雷德，夏隆的里夏尔与勒努瓦，帕西和根特的鲍文斯。那时机器还仅仅处于幼年时期，在布匹织造方面还没有使用机器。一位跨过海峡来到大陆的英国机械师科克里尔刚刚被请到维尔维埃。丝纺仍旧采用沃康松的方法，雅卡尔还没有使他的织布机臻于完善。冶金术没有任何进展，除去昂赞矿之外，蒸汽机还没有被采用，直到1799年根特的鲍文斯才开始使用。但是免于受到英国竞争的法国却有暇发展自己的机械化。

不管怎样，法兰西共和国的人口大多数是主要保持自然经济的农民，如果十分必要的话，它是能够依靠自己的资源生存下去的。农业虽然已经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发展仍然缓慢。村社依然保留着老习惯：如保留着强制轮作制、无用的公用牧场和其它习惯的权利。这种对于旧习俗的依恋是如此强烈，以至在历届革命议会中从来没有人敢于提出强制重新调配土地的建议，以便根除这些习惯。大量的村社公地也还没有分配。虽然人造牧场、烟草、菊高苣和马铃薯的收获略有增加，但土地的排水和灌溉，以及栽树育林则反而倒退了；道路失修，乡间警察尚未派驻。但是乡村的社会结构还是在改进之中，全国抵抗外敌的力量因而大有增长。小土地所有者的数量有了相当大的增加，至少在某些地区是如此，如：摩泽尔郡增加了一万三千名，科多尔郡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诺尔郡增加了一万名。与此同时，大规模的耕作一般地在减少之中，从而有利于中等规模的土地占有。当然，农村中仍旧还有很多没有土地的、几乎沦于乞讨的零散工，而乡村人口的平衡总是要看收成如何而定。但是自从什一税和封建赋税取消以后，政府除了要应付一些短暂的骚乱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其它担心害怕的事。

英国既不能用炮舰打败法国，更不能用封锁迫使法国投降。而且，如果共和国能够恢复大陆的和平，它的经济地位就可能再变得令人满意。在这方面，要预料英国是否会面临崩溃的局面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五、英国资本主义的力量与困难。 欧洲向全世界的扩张

英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进展中获得了利益。物价的上涨继续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大约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物价上涨，经过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其基本原因在于：首先，由于美洲金银矿生产的增长，也由于信用货币在丹麦、瑞典、俄国、奥国、法国、西班牙和美国等国的出现而造成通货的大量增加；并且战争又往往加速了纸币的发行。革命的危机造成了资本外流，从而导致外国现金储备的增加。大量的法国硬币流到了英国、荷兰、普鲁士和汉堡。包括伦敦的巴林，阿姆斯特丹的赫普和拉布谢尔，汉堡的帕里什，更不用提在英、法两国都开业的博伊德，以及在巴黎的一些外国银行家（其中著名的是佩雷高）在内的国际银行家组合对不断贬值的指券__投机而牟取暴利；拿破仑以后也要对付这个国际银行家的组合。现在人们几乎不知道欧洲大陆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后果。从 1793 年到 1799 年汉堡的殖民地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很大，但是大量的货币似乎只是导致了投机的猖獗，而不是生产的发展。但无论如何，从通货膨胀中获利最大的是英国。

英格兰银行是发行纸币信誉卓著的唯一银行，因而在荷兰被法国占领以后，英国就变成最为可靠的资本避难所。1794 年，这家银行购买了价值约为三百七十五万英镑的贵金属，而不是以往每年平均化费的六十五万英镑。英格兰银行钞票的流通额从 1790 年的一千一百万英镑增加到 1800 年的一千五百万英镑。到 1795 年止，这家银行对商业证券的贴现率一直在百分之三以下；只是在 1797 年黄金支付中止之后，贴现率才开始增加：1800 年增加到百分之六以上。此外，英国是银行业发展到地方上的唯一国家：1792 年就有三百五十家地方银行不受任何约束地发行纸币，这些银行为地方企业提供了资金。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伴随着通货膨胀而来的信用膨胀。这些银行虽然在 1793 年的恐慌期间受到暂时挫折，但是后来比以往更加兴隆：1804 年，银行的数目接近五百家。物价几乎不断地上涨。以 1790 年的指数为 100，则 1799 年为 156。1780 年至 1789 年间，每夸特__小麦平均价格为四十五先令，但在随后的十年里却涨到五十五先令；而工资的相应增加则要少得多，这样就增加了利润的幅度。由于通货膨胀而使得货币贬值，因此一切都在激励着投资企业的热情。

价格的上涨会造成阻碍出口的后果，但是中止支付黄金使情况缓和些。货币充斥已能使皮特得到贷款，这样他就可只对付英格兰银行，但是皮特仍不得不迫使英格兰银行贴现为数日增的财政部证券。1795 年，英格兰银行的现金储备还不足五百五十万英镑，而它持有的财政部证券的总额竟接近于一千三百万英镑。此外，由于必须用现金支付远征军的费用，支付 1796 年购

买谷物的费用，以及给予外国的补助金（从 1793 年至 1799 年总数高达二千八百万英镑之多），皮特还无视法律，迫使英格兰银行在 1797 年初从不过一百多万英镑的现金储备中提取一部分支付给他。于是不得不宣布英格兰银行的纸币为不兑换纸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823 年。由于英格兰银行是支撑经济的整个信贷机构的拱心石，因此，不兑换的后果本来会是灾难性的。但是这样做并没有引起恐慌。不懂得约翰·劳的方法或纸币的人民没有意识到英镑处于危机之中。皮特也一再劝告资本家放心，用有力的财政改革来使他们相信他完全无意采用纸币。随着和平在欧洲大陆的恢复，他在 1797 年和 1798 年只化费了二百万英镑来维持在欧洲的武装部队和对外国的补助。英镑超过了票面以上的价格，英格兰银行 1799 年的现金储备达到七百万英镑。事实上，这家银行此后接受了一批数目更大的财政部证券，虽然存在着某种政府制造的通货膨胀，但还没有严重到象在法国那样毁坏通货的程度，这就使得英国免于遭受曾使督政府难以应付的通货收缩的祸害。但这只是暴风雨的暂时的平静。1799 年大陆战争重开，歉收又迫使政府购买了价值几达三百五十万英镑的粮食。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减少了，这一次英镑兑换率下降了。1799 年在汉堡，英镑的票面价值失掉了百分之八，在加的斯失掉了百分之五。这场危机很快就挫伤这个国家的士气，但是英镑贬值本身却使大资本家捞到了好处：他们出口货物换回的是硬币，却用贬值的纸币来支付工资。依照经验主义的方法制定的英国货币和财政政策证明运用自如，这是其它国家当时望尘莫及的。

工业革命得以继续进展应归功于这项政策，但是进展速度之慢有时出人意料之外。就是在发展最快的棉纺工业中，织布依然靠手工操作。埃德蒙·卡特赖特的动力织布机于 1801 年在格拉斯哥才首次被采用，只是在 1804 年左右威廉·拉德克里夫发明了上浆整理机之后，动力织布机的使用才得到推广。毛纺工业仍处于试验阶段，还很少采用“珍妮机”，而卡特赖特的梳毛纺纱机到 1803 年才完善起来。尽管扩建了铁路和使用了蒸汽机，煤矿业仍然处于落后状态。除了一些棉纺厂外，蒸汽机还没有在工业上使用；大多数棉纺厂依然满足于使用水力纺织机。在交通方面，注意力仍然侧重在开凿运河，结果是完好的道路寥寥无几。运输的迟缓和工资的不断下降使传统的制造业能够有力地维持下去，人们的集中注意力仍然是在商业方面，而不是在开办工厂。一些当时的工业巨头，如罗伯特·欧文的岳父达维德·戴尔和斯托克波特的拉德克里夫都是靠把活分散发给家庭制造的方式起家的。纺棉机虽然还没有被普遍采用，但却给予棉纺工业以巨大的推动力。针织品和机织的花边也蓬勃发展起来。冶金业广泛地实现现代化。工程师们——其中最著名的是水压机发明家布拉默——使工作母机的数量迅速增加。机器在各个工业部门得到采用，确保了英国在全世界的绝对优势。

按照十七世纪末叶通行的价格计算便览作出的海关官方估价，英国本应始终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如在 1799 年，英国的贸易支付余额达五百万英

镑。人们把这归功于工业的进步；但是实际上，参考一下进出口货物的实际价值却得出相反的结论：除去非常有限的几年（从 1798 年至 1815 年间只有 1802 年一年）之外，英国的贸易差额一直出现赤字：1799 年为一千零五十万英镑，1801 年将近二千万英镑。即使工业品出口的数量增加了，工业品的价格也是在下跌；然而，这一因素却使得英国不仅能够保持原有的市场，并且能够获得新的市场，尽管存在着战争带来的困难。英国变得更加富有了。英国的支付差额是靠运费、保险费、手续费，尤其是靠对海外各地的剥削：贩卖黑人奴隶，投资于种植园的收益，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薪水和养老金，私商在殖民地的投机生意，富翁们从殖民地带回的财富以及在那里投资的赢利等等来弥补的。

物价的上涨对农业也是有利的。当时英国已经不能再生产足够的粮食来满足本国的消费；战争使得粮价昂贵，因此，只要小麦仍然价格昂贵，“谷物法”就失去效用。因为种植小麦比畜牧业更为合算，结果是，小麦的种植面积扩大了。圈地空前大规模地扩展开来，这就为地主、同时也为农民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耕作方法在不断改进。1793 年，约翰·辛克莱和阿瑟·扬格被任命为农业大臣。土地革命也影响到苏格兰。那里的部落首领就是大地主，他们乐意把土地用来饲养牲畜，他们赶走了苏格兰高地的佃农，这些人只好移居国外。就粮食供应而言，农业的繁荣加强了英国的力量，使得它不再象以前那样脆弱了。这也使得一些小土地所有者能够继续生存，甚至在某些郡里，他们的人数还有所增加。事实上，尽管留下的小土地所有者为数不多，他们对于自己的命运还是满意的；这些人和佃农一起构成了稳定的因素。

英国的资本主义尽管取得了进步，但还没有想到自由贸易。地主和农民绝不是要废除“谷物法”，而是要求强化它。工厂主仍忠于重商主义，他们甚至要求禁止机器出口。但在国内，他们越来越多地违犯限制徒工数目和准许确立最低工资的规定。相反地，工人们则继续要求制定“劳工章程”，并且以抵制和罢工的方式作为支持自己要求的手段。虽然这样做在原则上是非法的，但是治安法官不愿对此判罪，因为雇主本人就已违法在先。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1799 年 7 月 12 日的“结社条例”。这项法案是在官方宣布废除有利于工人的法律时制订的，它规定要惩罚各种罢工工人的结社以及旨在支持罢工的募捐。对贫儿、女工和破产农民的雇用，以及机械化带来的进步，这一切使得工资下降。工资的增加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此外，实物工资和任意专横的罚款更加降低了工人的工资。但是，从 1795 年开始，工资由济贫税的收入来补充，补足数额以面包价格计算。这就是劳动者阶层比较能够安于他们处境的原因。

除法国外，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能与英国的工业竞争。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除了几个采矿场和西里西亚巨大的冶金工业——几个由大资本家或国家垄断的企业——使用机器以外，还没有采用机器，并且还没有超过商业资本

主义的形式。萨克森、瑞士和施瓦本的棉纺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但是直到 1786 年“珍妮机”才传到了克姆尼兹，而针织机在 1797 年才出现。此外，战争也损害了传统的工业，如西里西亚的亚麻工业从此一蹶不振。

在农业方面，为出口而生产的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开始仿效英国。首要的任务是实现村社的解体，并且把小块经营的土地调整集中起来，大片经营就要除掉强制轮作制和公用牧场——总之，是向着圈地发展。国家也试图废除农奴制和赎买什一税、封建义务和劳役，以便使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或挣工资的零散工。这种改革从 1781 年就在丹麦实行开来，1800 年基本上扩展到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普鲁士国王也在自己的领地上实行了这种改革。因为英国进口粮食，它只会从这些国家的农业改革中获得利益。它也同样以赞许的眼光看待美国的进步——当时美国还是个纯粹的农业国。“海岛棉”种植的发展使英国特别满意，这种棉花是 1786 年从巴哈马群岛移植到美国的；1792 年第一次运到格拉斯哥的“海岛棉”立即受到棉纺工的赞赏。1793 年，惠特尼发明的机器解决了轧棉问题之后，出口就增加到八百万磅，到 1798 年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一倍。“海岛棉”种植的发展对美国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从那时起，奴隶制在南方成为一种基本的制度，而种植园主开始垂涎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然而，在这方面当时北方所看到的还只不过是一个有利于投资和海运业的机会；英国机械刚刚开始传入，阿斯特家族和吉拉尔家族的巨额财富正在靠贸易、航运和土地投机积累起来。

失去了法国所控制的市场但却摆脱了法国竞争的英国，却以牺牲其盟国和 中立国的利益而得到补偿。它通过汉撒同盟各港口取得了德意志的市场：1789 年至 1800 年间，它对不来梅和汉堡的出口货物增长了五倍。在法兰克福和来比锡国际博览会上，英国开始和瑞士人、奥国人、波兰人和俄国人打交道。英国的棉织品，特别是棉纱，排挤了瑞士和萨克森的产品。金融世界都依赖于伦敦。黑森选侯在伦敦投了资，法兰克福的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依靠帮助黑森选侯进行投资而扩大了他的业务；1798 年，他的儿子内森在英国开业，很快就变成了富翁。另一方面，波罗的海地区也成为对英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势力范围，因为英国从那里取得海军装备、粮食和纺织品供应。十九世纪初叶，英国百分之七十二的进口货物来自普鲁士和俄罗斯，四分之三的粮食来自但泽一个港口。在地中海，法国比较能顶住英国的势力。法国征服了意大利，这使得英国大受干扰，但是法国没有能把英国驱逐出地中海。而在 1798 年以后，法国却被从地中海东部的沿岸诸国逐出。

海上战争增加了从地中海到北方诸海之间陆上交通的重要性。对来因河的封闭危及了通过法国、意大利、瑞士和荷兰的交通；而在这之前，陆上交通是靠通过这几国进行的。但是从 1790 年起，法国把海关推进到来因河上，这样就切断了沿来因河左岸的过境贸易；而法国对来因地区和荷兰的占领则是对这条贸易通道的一个新的打击。随着对来因河口的封锁，科隆的贸易到 1800 年就下降到原来贸易额的三分之一以下；只有通过埃姆登到法兰克福的

部分贸易在断断续续的进行着；在另一方面，瑞士通往热那亚的路被切断了。象在路易十四时代一样，横贯大陆的通道向东推移了，它要通过汉堡和来比锡到达威尼斯，而更多的是到达的里雅斯特。

虽然我们仅仅有以海关估价（官方估值）为基础的不太可靠的估计，用来说明到 1798 年为止英国商业的波动情况，但这种对情况的判断还是显而易见的。出口货物从 1790 年的二千万英镑约增加到 1801 年的三千五百万英镑，连同进口货物加在一起，总额就可能从三千九百万英镑增加到六千七百万英镑。以实际价值计算，出口货物从 1798 年的四千二百六十万英镑增加到 1800 年的五千二百三十万英镑，连同进口货物加在一起，总额就从九千九百一十多万英镑增加到一亿一千八百八十万英镑。离港船只的吨位也增加了三分之一，几乎达到二百万吨。伦敦各船坞就是在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船坞都设有保税仓库。棉纺工业从贸易增长中获得比其它任何工业更多的利润。它的出口从一百五十万英镑激增到 1800 年的六百万英镑；原棉进口从 1797 年的七十三万四千磅激增到 1800 年的一百六十六万三千磅。同年（1800 年），还出口了二百万吨煤和一百五十万吨生铁和熟铁。

英国运往美国的货物也增加了一倍。象美国一样，它一直盯着西属美洲，占领特立尼达主要是用来搞走私的。西属美洲的动乱给英国以可乘之机。美国的独立、“专营贸易权”的中止以及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奴隶制的废除动摇了整个殖民体系。首先是土生白人要求贸易自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贝尔格朗诺成为贸易自由的鼓吹者；西班牙被迫允许中立国的船舶进入它的殖民地港口。但是一些殖民地也开始渴望取得政治独立。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一些独立的密谋遭到了血腥镇压。米兰达将军首先求援于法国，但当西班牙变成法国的盟国后，他又转向英国。在伦敦他会见了纳里尼奥和沃伊金斯；他在伦敦似曾建立起一个“劳达罗支会”，准备发动一次全面起义。无论如何，1798 年他以一个由他发起在西班牙成立的委员会的名义向皮特求援，但皮特却只指使他到当时已与法国交恶的美国那里去求援。

称霸海洋的英国当时是唯一能够把白人权威强加于世界其它各地的国家，但是英国却不很愿意这样做。重商主义的舆论并没有采取边沁敌视殖民地的态度，但是美国的独立使英国人不愿进一步多占领殖民地；更确切地说，英国是商业帝国主义。然而大英帝国仍在继续扩大中，法属安的列斯群岛还是值得去占领的。由于大量资本投入荷属圭亚那，结果使那里的生产增长了十倍。海军需要象好望角这样的停泊地。贵族出身的殖民地官员自发地征服更多的殖民地来满足自己的战斗欲望。在非洲，1792 年建立了塞拉利昂殖民地；芒戈-帕克探查尼日尔河远至廷巴克图；从荷兰人手中夺了好望角。1788 年，菲利普船长把第一批囚犯运到澳大利亚的悉尼登岸。但是英国人扩张殖民地最多的是在印度，尤其是在莫宁顿伯爵，后来又封为韦尔斯利侯爵的理查德·考利到来之后。1799 年，蒂普·萨希布死后，理查德·考利霸占了迈索尔的部分领土，并在 1800 年确立了对占有迈索尔其余部分领土的海

德拉巴的尼扎姆的保护权；然后又进攻马拉塔人。他密切注视着旁遮普，在那里兰吉特·辛格于 1794 年迫使阿富汗人割让了拉合尔；他也没有放松对波斯和红海的注意。在波斯，1801 年约翰·马尔科姆和波斯签订了一项准许英国人到海湾沿岸贸易的条约；在红海，1798 年英国占领了丕林岛，以后又派遣霍姆·波帕姆去攫取阿拉伯咖啡生产的垄断权，并调遣在英军中服役的印度士兵准备远征埃及。

如果不是欧洲在进行着战争的话，远东也很可能已受到欧洲的侵略。在印度支那，法国的百多禄主教帮助阮福映从西山农民起义军手里夺回了交趾支那，他死前一直是阮福映的顾问。以后，阮福映逐渐再次征服了安南和东京，那里的黎氏王朝已被推翻，他于 1803 年称帝，年号嘉隆。然而法国的影响也消逝殆尽。在中国，乾隆统治时清朝达到了全盛时期，他平定了边远各省之后，于 1799 年死去。中国人不只移民到这些省份，他们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到了交趾支那和菲律宾，甚至远达暹罗和孟加拉。中国人是唯一被允许进入日本的外国人。在国内，他们只在澳门的葡萄牙洋行和欧洲人进行贸易。自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解散之后，除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经常来做买卖之外，其它各国人几乎不到澳门去。1793 年被派往北京的英国人乔治·马夏尔尼没有能够获得任何特权。但是在乾隆死后，他的酗酒和残酷的儿子嘉庆（1796—1820 年在位）由于受到秘密会党煽动的叛乱威胁，再也不能抵御任何人的大举进攻了；然而，英国人正在忙于其它的事务。至于日本则更是闭关锁国。尽管粮食不能自给，饥馑不断地造成大量死亡，日本却依然禁止粮食进口和移民国外。它每年只允许为数不多的中国船和一艘荷兰船在长崎进港，出售给他们一些铜。军事力量十分薄弱的日本怀着不安的心情看着到来的英国船，特别是到达库页岛、千岛群岛、甚至在 1792 年到达北海道的俄国船。

传教士常常为商人和士兵开辟道路，但是在当时，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美洲。在中国，乾隆迫害了耶稣会士的继承者味增爵会修士。他们发展新会员的活动因法国革命而中断，传教活动到 1800 年则完全停止。但是新教徒却有了新的发展，那时代表新教在海外的只有几个摩拉维亚修士。事实上，是英国改变了这种形势。1792 年，首先发动的是浸礼教徒；1795 年，英国国教会建立了“伦敦布道会”；1799 年，马香在孟加拉登陆，在这里他受到东印度公司的极端冷遇。

白人移民几乎停顿下来。在北美洲，主要是由于出生率过高才使得定居者大量增加，他们披荆斩棘，向西部迁移。肯塔基和田纳西先后于 1791 年和 1796 年作为两个州加入美国，俄亥俄是 1802 年建州的。但是到 1800 年，在五百多万居民总数中，西部还只有三十七万人。温哥华从 1790 年到 1795 年探查了太平洋沿岸，俄国人也刚刚开始出现在那里，但是从大西洋沿岸至太平洋沿岸之间的联系只有哈得孙湾公司的一些驿站，这些驿站的分布远至哥伦比亚河。1793 年，亚历山大·麦肯齐还宁愿深入荒僻的北极地带去探险。

当拉丁美洲市场还只不过是一种希望的情况下，欧洲和美国构成英国赖以生存的市场。这些市场迟早要受到威胁，这种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的。在欧洲大陆，工业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竞争的影响。为了拯救它们自己的纺织工业，瑞士，特别是萨克森，不得不革新它们的设备，1798年在克姆尼兹出现了第一台水力机。这样一来，禁止英国货入口就象对法国一样，对它们也是有利的。另一方面，英国的封锁政策也随时在引起外交上的困难。1794年，丹麦和瑞典策划结成一个新的中立联盟，但是它们本身的力量薄弱不足成事，如果俄国参加联盟的话，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就会随着加入，这样就会关闭整个波罗的海。来自美国的威胁就更显得突出。除了封锁问题之外，还有个美国水手问题。英国从中立国船上寻找和劫走志愿服役的美国水手，把他们和英国国民混在一起。华盛顿和联邦党人对此只是提出抗议。但是1800年杰佛逊就任了总统，他可能并不象华盛顿及联邦党人那样好说话。

但是也不能忘记，由于战争，世界贸易的情况不是十分健全的。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汉堡，殖民地商品的投机活动采取彼此间订立信贷协定的形式，而库存囤积造成了资金的冻结。1799年隆冬，当易北河整个封冻、航运停止时，汉堡的物价上涨到令人晕眩的程度；而在春季贸易之前，易北河解冻时，船舶开始进港，物价也随之跌落，糖价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二之多。同一时期，战争再起。到了8月，在被入侵前夕，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中断了信贷。在汉堡，一百三十六家商号倒闭了，帕里什银行的损失达一百多万马克。这次危机波及到全欧洲，特别是在伦敦，至少有二十个商人破了产。棉纺工业受到相当大的震动，工厂有的倒闭，有的削减工资。当时为了制止工人群众的骚动而通过了“结社条例”。财政金融形势适于此时恶化起来，再加上1799年和1800年的收成又特别糟糕，因而使得每夸特小麦的价格从1799年初的四十九先令上涨到1800年2月的一百零一先令。

法国没有达到把英国人拒之门外的目的，因为英国商业又找到了新的市场，并且比以往更加繁荣了。法国人认为英国的经济结构既脆弱又虚假，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懂得“信贷的奇迹”。但是，英国的经济结构也确实象一套需要不断自动检修的精密机械装置，若遇诸如其它国家的政策变化、歉收等一系列外部事件时，就可能被损坏。确实，这种威胁在英国隐隐约约地日益迫近着，因而一旦处境困难，英国也势必同意媾和。

六、和平的条件

为了从这样一种时机中获得利益，共和国就必须重建欧洲大陆的和平。因此它还要再一次战斗，并取得胜利；在签订条约之后，它还得重建国内秩序并解除反革命的武装。否则一遇危机，反革命又要向外国呼吁，而外国又会发动新的战争。但是能否获得大陆和平还取决于法国企图保留哪些征服地。

热月9日之后，法国政策就逐渐转向获得自然疆界的问题上。热月党人在共和三年宪法里规定，不得割让任何一块领土。在宪法通过时（1795年8月），通过武力征服的法国领土仅仅包括萨伏依和尼斯。但是在共和四年的葡月9日（1795年9月30日），国民公会合并了比利时，而这一新领土的获得被认为是经过合乎宪法的公民投票批准的。从这时起，1793年的几次公民投票又被用来证明法国保有来因河左岸是正当的；普鲁士在巴塞尔，奥国在坎波福米奥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在拉什塔特先后承认放弃来因河左岸。在果月18日之前一直是督政官的卡尔诺不赞成这样的领土扩张，就连那些把波拿巴推上统治地位的“空论家”实际上也持有同样的意见。1799年11月1日，他们之中就有一个人——大概是多弩——在《哲学旬刊》上宣称：共和三年宪法固定了共和国的疆界就等于宣告“没完没了的战争和全体法国人同归于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和派会象保王党那样，答应外国人以“旧边界”为基础进行谈判。法国仍旧可以向瓦伦区和萨尔扩张。法国全国大多数人肯定会同意这种有节制的行动，因为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和平，《哲学旬刊》这篇为政变做舆论准备的文章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然而，持这样一种态度所碰到的困难是决不可忽视的。在反对保王主义的斗争中，督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诉诸民族感情，以致共和派已经习惯于把革命与征服自然疆界看成一回事，从而就以完成了君主政体的事业而自豪。军队是不会赞成把他们征服的地方又丢掉的；如果军队以新的胜利赢得了和平，那么政府怎么可能会比它的前任要求更低的和平条件呢？

督政府已经听任波拿巴超出自然疆界建立了西沙尔平共和国，从而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后来督政府效法波拿巴又在罗马和那不勒斯建立了共和国；督政府还久据皮埃蒙特，为了控制阿尔卑斯隘口，它在伐累州也建立了共和国；在荷兰和瑞士它发号施令，主宰一切。但是人们还可以说，这样一种政策只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就是和约签订了，法国肯定不会对毗连“自然疆界”各地发生的情况坐视不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国必须在那些毗邻的国家驻扎军队：它完全可以满足于同其它强国一起保证这些国家的独立。在这方面，公众舆论无疑是会支持政府的。经受过许多的虚妄的经历之后，象吉伦特派那样对外宣传革命的热情变得淡薄了；没有人会因为波拿巴没有重建罗马共和国或帕尔瑟诺佩共和国而要责备他。

只要法国超越它的自然疆界，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但是如果法国不超越的话，大陆列强会不会因此而让它保有自然疆界呢？有人否认这一点，但却提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普鲁士想的只是在德意志其他各地得到法国所答应给的补偿；俄国参战也不是为了夺回来因河左岸；最难对付的是奥国，但是只要给它一些领土补偿，特别是如果法国放弃意大利的话，奥国也会安静下来。剩下还有英国。皮特多次宣称，在英国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拒绝谈判，并且说，只要法国占领着尼德兰，英国就不可能得到安全保障。他进一步申明，至少必须从法国手中夺回来因河左岸的大部分地方；后来，

格伦维尔在 1795 年又补充说，并且要把这个地方同在奥国手中的比利时重新合并起来。但是说他们只关心英国安全，这是不真实的；他们还想从法国手中夺去萨伏依。然而，不容争辩的是，英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始终是不让法国控制尼德兰。而现在不得不重新夺回尼德兰，而如果没有大陆盟国的帮助，英国就不能成功地实现这一计划。法国若同大陆列强达成协议，那么这就会是一场消耗战，那时英国的经济情况可能会使它安于现状，特别是如果没有其它国家与它争夺海洋和殖民地的话。1797 年的危机曾迫使皮特提出这样的和解建议。1799 年，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又会出现同样的局面。可是危险恰恰在于法国认为，英国的困难没有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法国为了对抗它的封锁而采取的封锁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引起法国把封锁扩展到整个欧洲，用增加压力的手段来与英国争夺海洋统治权。那么，大陆上的战争就会再次爆发，并会真正变成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但是战争的起因并不是因为法国到达了它的“自然疆界”，而是因为超越了这些疆界。

即使在法国明智占了上风，那也并不意味着，十分敌视弑君的共和国的欧洲，将永远放弃收复法国所有的或部分的广大征服地的想法。但是不能这样来看这个问题。1799 年同任何时期一样，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问题都不在于如何截断历史的进程。问题仅仅在于知道，法国在保住它所谓的自然疆界的同时，是否可能获得十年、二十年的和平；同时，法国是否可能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准备比以往更加有力地保卫这些疆界。毫无疑问，回答是肯定的。但是督政府的共和派能否抓住这样的机会？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决不是肯定的。但是到了 1799 年末，决定权不再属于他们了。他们自己心甘情愿把决定权交到了一个人物的手里。

第三章 拿破仑·波拿巴登台

法国革命转向建立起独裁统治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一种内在需要驱使它这样做，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这场革命终于导致一名将军的独裁统治，这也不是个偶然事件。而这位将军恰恰就是拿破仑·波拿巴，此人的性格较之他的天赋更不能安于和平与节制。因此，这样一个预见不到的因素就象一只砝码加在天平上，使天平向着“没完没了的战争”的一端倾斜了。

一、法国的独裁统治

很久以来，共和派就想加强政府权力，从他们颁发给各附庸国的宪法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荷兰，督政府的成员控制了国库；在瑞士，他们任命了政府官员；在罗马，甚至还委派法官；在黑尔维谢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各郡都已经有了了一名“郡守”。这里还没有提到西沙尔平共和国，它成了波拿巴个人的采邑。不幸的是，在法国，共和三年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至少要迁延七年。果月 18 日的政变给西哀耶斯、塔列朗和波拿巴提供了他们所要寻找的机会，但是他们却放过了这次机会。然而，在共和七年，他们希望制造一次新机会。自从内战和对外战争开始以来，就已存在一种趋势要把革命推向设立一名常任的并拥有绝对权力的行政长官，这就是说，朝着独裁统治推进；共和派不一定都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在顺应这种趋势。因为法国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而被推翻了的贵族的反抗决不止于掀起叛乱而已。依靠敌人资助的贵族，利用战争造成的种种困难——这是不满情绪的无穷源泉——特别是利用货币和经济危机，企图煽动人民起来反对革命政府。法国人并不想恢复旧制度，但是他们在遭受苦难，他们要自己的领导人对此负责。在每次选举中，反革命总是希望重新上台。在 1793 年，山岳党人意识到这种危险，才宣布延长国民公会任期，直至和平的到来。热月党人曾经打算恢复民选政府，但是他们随即利用通过“三分之二法令”的手段，重新采取了雅各宾派的权宜措施。接着，在共和五年（1797 年）的选举中被挫败的督政府于果月 18 日又重建了独裁统治。可是只要共和三年宪法继续存在，这个独裁统治每年都要经受考验，就要采取接二连三的暴力措施，所以始终不能建立起来。还是得恢复 1793 年的原则，并且长期贯彻这个原则，直到重建稳定的和平之日，只有到那时反革命才愿接受新秩序。正是在这一点上，拿破仑的独裁统治才与法国革命史紧密相连。不论他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他本人或者他的敌人都决不可能割断这个共同一致的联系，全欧洲的贵族也完全理解这一事实。

象在 1793 年一样，雅各宾派在 1799 年想依靠无套裤汉迫使立法两院建立起民主专政。他们利用苏黎世战役胜利前的危机成功地强行通过了几项革命措施：发行强制公债、废除兵役顶替、实行“人质法”，取消给予银行家

和军需供应商优先从国库收入中领款权，扣除所得税，以及实行各种征用。所有这些措施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以至使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在雾月 19 日当晚就恢复给予银行家和军需供应商优先向国库领款权，这是他们行动胜利的一个标志。聚集在奥德伊的孔多塞夫人周围或在斯塔埃尔夫人沙龙里的“空论家”们不想要民主专政，甚至也不要民主。1799 年，斯塔埃尔夫人在论述“结束革命”的手段和“共和国的基本原则”的某些片段中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设法建立一种能保证有钱的和有才的“新贵名流”享有权力的代议制度。成为督政官的西哀耶斯从“三分之二法令”中得到了启示。他想同他的朋友一起选择新成立的政府机构的成员，然后这些机构依靠互选办法补充人员，而只给人民选举候选人的权利；那些已经当官的人从这一企图看到了保持自己权力的可能性。

自从把人民排除出去以后，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就只有依靠军队。督政府于共和五年果月 18 日已经动用了军队，尽管文官政府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害，但它还没有丧失控制军队的优势。可是这一次的情况迥然不同；他们要驱逐的不是保王党，而是坚定的共和派。因此，这个任务只有一位深孚众望的将军才能完成；波拿巴的突然归来注定了这位将军就应该是他。有人用全民的意愿来替雾月 18 日政变辩护，其实全民意愿并没有在这次政变中起作用。波拿巴回到法国的消息使举国欢呼，因为人民公认他是一名能干的将军；可是共和国没有他也打了胜仗，而且马塞纳的胜利已为督政府赢得了荣誉。因而，雾月 18 日政变的责任就落到被称作“雾月党”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共和派身上，他们的领袖是西哀耶斯。他们本无意屈从波拿巴，他们选择他仅仅是把他当作工具用。然而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条件，甚至也没有事先给新政权规定大政方针，就把他推上权力的宝座，这就暴露出他们是一帮难以想像的庸才。波拿巴没有抛弃那些新贵名流，因为他也不再是个民主派，并且只有他们的合作才能够使他进行统治。可是雾月 19 日晚，在匆匆忙忙地拼凑起一个临时的执政府的班子之后，他们就不应当再抱有任何幻想了。军队一直追随波拿巴，而且仅仅追随他一个人。因此他主宰了一切。不管他和他的辩护士可能说过什么，他的统治从一开始就是军事独裁，也就是专制的独裁统治。这样，决定法国和欧洲命运的那些问题就将由波拿巴独断专行。

二、拿破仑·波拿巴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们很难给他勾画一幅肖像，因为他的形象异乎寻常地在不断演变：从在瓦朗斯和奥松驻防时一个勤学苦读和沉思默想的军官，甚至在斯蒂维耶雷镇战役前夜还是个召开军事会议的青年将军，一直到变成晚年时醉心大权独揽和自信无所不知的皇帝。但是有一些基本特性贯穿在他一生经历中：权力只能加强某些特性或减弱另一些特性。

他身矮腿短，肌肉发达，面色红润，三十岁时还很消瘦，但体格健壮耐劳。他的敏感和坚定令人赞叹，反应敏捷迅如闪电，工作能力无可限量；而又可以想睡就睡。然而他也有相反的一面：湿冷天气使他感到郁闷，引起咳嗽，排尿困难；与人顶撞时暴跳如雷；操劳过度时尽管有长时间的热水浴，饮食十分节制，适量而经常地喝点咖啡与吸烟，但仍往往引起短暂的神思恍惚，甚至黯然泪下。他的头脑是迄今最健全的头脑之一：永不松弛的注意力不倦地抓住各种事实与思想；记忆力就把这些事实与思想存入头脑并加以分类；想像力机动灵活地运用这些事实与思想，他的思想处于一种持久而隐秘的紧张状态，不稍懈怠地拟订着政策与战略的要点。这些政策与战略于忽而恍然大悟之机闪现出来，有如数学家和诗人的体验一般，特别是深夜猛醒之际，他自己称之为“精神火花的迸发”，“午夜后出现的精灵”。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现出的这种热烈的精神，使得这个“头发平滑的科西嘉人”在飞黄腾达时脸色仍然呈现“硫磺色”的面孔神采奕奕。正是这种炽烈的精神使他落落寡合，而并不是如泰恩要让人相信的，他从中世纪声誉欠佳的意大利雇佣兵队长继承来某种粗暴残忍，经过他野蛮地施加到全世界。他给自己一个公正的评价：“我甚至是相当善良的人”；而这是符合实际的：他为人宽宏大量，对接近他的人甚至是和蔼可亲的。但是，在一般人与拿破仑·波拿巴之间确实是没有共同语言，彼此毫无共同之点，因为一般人对工作草草了事，急于想多点休息消遣时间，而拿破仑·波拿巴则孜孜不倦，一心一意在工作。从他的身心体质产生出不可遏制的冲动要采取行动与发号施令，这就是人们所讲他的野心。他很有自知之明：“有人说我是野心家，说错了，我并非如此，或者至少可以说，我的雄心和我的存在是紧密交融，难以分辨的。”还能比这说得更好吗？拿破仑其人主要地就是他的气质。

他到布里埃纳念书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一个贫穷和受人嘲弄的，火热而又羞怯的异邦人，就从那时起，他已经从自高自大和藐视别人的意识中取得支持自己的力量。但是命运使他成为一个军官，这最适合了他要求别人绝对服从的发号施令的本能。虽然这位军事长官也多闻多问，甚至征求意见，但最后还是由他个人作主并作出判断。波拿巴的独断专行的自发倾向变成了职业习惯。在意大利和在埃及，他已把独断专行推广到政府中去。在法国，他想以一个文官的面貌出现，但是军官的烙印是难以磨灭的：虽然他多方谘询，但是他决不能容忍别人随意反对他；更有甚者是，他在习惯于展开讨论的一群人面前，就沉不住气，莫知所措，这就是他何以对“空论家”深恶痛绝的原因所在。群众虽然是一团混乱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然而却是令人生畏的，因此波拿巴对群众总是既鄙视又恐惧。夺取政权的是波拿巴将军，他也就是作为将军运用政权的。服装和称号的改变都丝毫不能改变其将军本色。

然而，在这身军服下面实际上有着几个人，而他的吸引人的魅力正是来自这多种多样的性格，也同样来自他的多方面的聪明才智。共和三年的波拿

巴，身无分文地浪迹于热月党人的宴饮作乐之中，周旋于当日的权贵、豪富与艳妇之间，他也燃炽过与常人无异的种种欲望。这个时期给他留下了某些终身的影响：使那些曾冷落过他的人屈居己下，他就感到某种乐趣；对富丽豪华的爱好；对家庭——这个曾同甘共苦的“氏族”——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某些资产阶级贵人的难忘的言谈，如在加冕典礼之日，他感叹地说：“约瑟夫，要是咱们的父亲能看见咱们该多好啊！”然而在这很久以前，他也并非不曾为一种更高尚的爱好所吸引，即想知道一切和了解一切，这肯定是对他有用的，但他求知本身首先就是一种满足，原无其他打算。

当他还是一个青年军官时，他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和搜集资料，也从事写作；显而易见，如果不是进了布里埃纳军校的话，他原有可能成为文人。领兵作战之后，他仍然是一个脑力劳动者；这个军人最愉快的事莫过于在自己安静的书房里，置身于公文卷宗之中。这项特征逐渐减弱；他的思想变得更实际些，他曾自夸已经摈弃了“空论”；然而他却依然是十八世纪的人，是理性主义者和哲学家。他远非凭直觉行事的人，而是依靠推理，依靠知识和有条不紊的工作。“我习惯于在三、四个月以前考虑我应该做的事，并且估计到最坏的情况”；“每次作战都必须按照一定方案进行，因为靠运气是不能取胜的”；他认为他的一些机智表现是坚毅的自然成果。他心目中的统一国家是按照一个简单而系统的方案由一个整体构成的，这个概念是十足的古典主义。在罕见的一瞬间，甚至在他身上以最鲜明的特征表现出理智主义：能剖析自己人格，既能正视自己的生活，也能忧郁地反省自己的命运。在获悉约瑟芬的不贞之后，他从开罗写信给他的哥哥约瑟夫说：“我需要离群索居。壮丽豪华使我感到腻烦，感情的源泉已经枯竭，对荣誉索然寡味。年仅二十九，却已历尽沧桑。”不久以后，他同吉拉尔丹在厄尔默浓维尔散步时说：“未来的事态将会表明，假如卢梭和我压根儿都没有在世间活过，也许会对世界的安宁更有好处。”——在陪同波拿巴巡视荒芜的杜伊勒里宫时，罗德雷感叹地说：“将军，这是何等凄凉！”才就任第一执政两个月的波拿巴回答说：“是的，有如权势尊荣一样。”由此可见，夏托勃里昂和维尼的浪漫主义的忧郁，通过惊人的转折，渗入这个坚定而庄严的人的理智主义里。但是这从来只是一刹那，他立即就会恢复常态。

一切都似乎注定他要奉行现实主义的政策，而实际上他在执行政策时，直到细枝末节全部都是现实主义的。在他飞黄腾达的过程中，他摸透了人的种种情感，并且学会了播弄这些情感。他懂得如何利用自私、虚荣、嫉妒，甚至利用品德不纯；他深知从唤起人们的荣誉感和激发人们的想像力中，能从他们获得些什么；他也没有忽视可以用恐怖使人屈服。在法国革命的成果中，他准确地分辨出哪些是全国人心所向的，哪些适应他的专制主义的。为了争取法国人的拥戴，他同时既以和平使者又以战神的面貌出现。因此之故，他应被列入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的行列之中。

然而，他只是在实际行动中才是现实主义者。在他身上还可以看到具有

英雄的某些特征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从他在学校读书时，出于要支配那个轻视他的世界的愿望中诞生的；尤其是从比拟普鲁塔克和高乃依著作中的半传奇式的人物的愿望中诞生的。他最大的野心乃是荣誉：“我只生活在子孙后代之中”；“死算不了什么，但是被打败而毫无荣誉，虽生犹死。”他的心目中只有世界上伟大的人物：东方的征服者、梦想征服世界的亚历山大；罗马帝国的创建者与重建者恺撒、奥古斯都、查理大帝，这些名字本身就意味着世界大一统的思想。这点并不涉及一个具体的概念，一个为政治事业提供规范、尺度与极限的概念；这些人物是激发丰富想象力的榜样，是赋予他的行动以难以形容的魅力的榜样。他最响往的还不是英雄的事业，而是这些事业所体现的精力充沛的热情。他是艺术家，是实践中的诗人，对于他来说，法国和全人类都不过是些工具；他在圣赫勒拿岛回忆洛迪大捷和他内心燃起的权力欲望时，表达了他对权势的感觉，他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我看到地球在我脚下旋转，仿佛我已腾空而入云霄。”因此，要想探讨拿破仑给他的政策确定了什么目标，或者他准备达到的极限是什么，都是枉费心机；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目标和极限。他的部下曾因此感到不安，他听到后说：“我总是这样答复：我不知道有什么目标和极限，”或者尽管用平庸的方式，却意味深长地说：“要取得上帝老爹的位子吗？啊，我才不想哪，那是条死胡同！”因此，在这里又可以看到，头一眼就给人印象深刻的、他心理上的强有力性格。这就是浪漫主义者的拿破仑，一种自行扩张的力量，对他来说，世界只不过是冒险行动的场所。而现实主义者不仅要善于运用手段，还要考虑在可能条件下明确他的目标；如果想象力和权势欲能够驱使他行动，现实主义者会知道到何等地步就应适可而止。

可是，正如莫莱十分精确地观察到的那样，虽然拿破仑不正视现实，他的精神在其它方面却是非常善于把握现实的；这不仅归因于他的天性，而且应归因于他的出身来历。当他从科西嘉岛初履法国本土时，他自视为异邦人，而且直到1793年被他同胞逼迫离开科西嘉岛为止，他还是敌视法国人的。当然，他已充分地钻研法国人的文明和思想，足以归化其中，否则他决不可能变成法国人的领袖。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完全和法兰西民族的社会融合在一起，遵奉法兰西民族传统，以致能把法兰西民族利益视为自己行动的尺度与界限。他始终感到自己是一个离乡背井的游子。他也脱离了自己出身的那个社会阶层而无所依附，他既不完全是尊贵，也不完全是人民，他相继在波旁王朝和大革命时期充当军官，但是他对哪一个政权都没有衷心拥戴过。而他后来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正在于此，因为他可以完全轻易地处于超党派地位，并以民族统一的恢复者的面貌出现。但是，无论在旧制度下，或者在新政权中，他都没有汲取出可供他作为规范和限度的原则。他不象黎歇留那样受效忠王朝原则的约制，这种原则使黎歇留把个人意志从属于君主利益；波拿巴也不受公民美德原则的约制，这种原则要求他献身为民族服务。

他是崛起于行伍之间的战士，是启蒙哲学家的弟子，因此他痛恨封建制度、社会的不平等、宗教的不容忍；他认为开明专制能够调协政府威权和政治与社会改革，他自己就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个开明专制君主，并且是开明专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属于法国大革命的人物。然而，他的极端个人主义从来没有接受民主，他屏弃了使革命理想主义生气勃勃的十八世纪的伟大希望，即将来总有一天，人类文明会发展到使人类成为自己的主人。他没有象其他人那样，为了顾虑自身安全而变得小心谨慎，因为，用一句通俗的说法，他已经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梦寐以求的只是通过英雄壮举与冒险行动而成就英名伟绩。还有道德约制问题；但是，在精神生活中，他与别人毫无共同之点；虽然他深知别人的情感，并巧妙地利用这些情感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可是他只留意那些能使人听他使唤的情感，却诋毁一切能激励人们牺牲精神的高尚情操：宗教信仰、公民美德、热爱自由等，因为他感到这些高尚情操对他个人企图构成障碍。这并不是说他对这些情操格格不入，至少在他青年时代尚非如此，因为这些情操能自然而然地导致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以后环境变了，使他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闭目塞听，高高在上。在权力欲支配下的既庄严又可怕的孤立中，准则限度毫无意义。

“空论家”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而没有察觉他身上的浪漫主义的冲动。能够遏制他这种冲动的唯一办法也许就是把他置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之下，让他在一个从属的地位上为国效劳。但是雾月党人在把他推上最高权力的地位时，恰恰就已放弃了一切这类防患未然的机会。

第二编 内安法国 外和欧洲 (1799—1802年)

第一章 法国独裁体制的组成

取得政权之后，拿破仑立即着手组织他的独裁体制。这项工作至少有一部分延续至今，构成现代法国行政机构的主体。但是这项工作不是能一蹴而就的，在倒台之前，他一直在进行工作，而其成效只能是逐渐地显现出来。同时，采取行动的需要又是不容迟缓的，他必须准备1800年的战役；因此波拿巴只得临机制策。这两个特点一直贯穿在他的统治的始终。他一生不停顿地致力于久远之计。但是，尽管他热切地想做力所不及的事，他却总是不得不临时对付每一项事业。

一、临时执政府与共和八年宪法

共和八年雾月19日（1799年11月10日）晚上，几名议员匆忙地批准成立一个负责起草新宪法的临时政府。行政与立法创议的大权全部落到三名执政手里：波拿巴、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20日，他们达成协议轮流担任主席；但事实上波拿巴从一开始就控制了一切。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两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分为三个组）取代了元老院及五百人院，其职能仅在于准备新宪法。

由于法国革命和共和国看起来似乎都没有成问题，所以这次事变并没有引起任何剧烈的反抗：这不过是又一次政变而已。人们不过是热心地等着瞧波拿巴如何着手工作——谁知道他是否能维持得下去呢？然而，少数的左派及右派还是很快地开始形成了。执政府就其起源讲是反雅各宾派的；因为发动雾月政变的借口毕竟是一个莫须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正是左派反对在圣克卢的集会，而且他们在外地某些地区也企图进行反抗。六十一名议员被取消了议席；五十六名雅各宾派，其中有二十名议员，被流放到圭亚那及雷岛，其他很多人被捕。共和七年的“恐怖主义的”措施——强制公债、人质法及强迫征用等——被废除了，这是军需供应商及银行家的胜利。“良善之辈”对此表示满意；保王党在他们的书刊里和讲坛上表示了同样的感情。他们希望波拿巴会成为蒙克。当那批顽抗派的教士又抛头露面时，各地都明显地有猛烈的教士骚动。但是波拿巴立即谴责了这种反革命活动，因为督政府的各郡行政机构依然保留着、并被置于由三执政任命的特派员的控制之下，所以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反革命活动镇压下去。警务部长富歇一开始就站到左派一边；他取消了对雅各宾派的放逐令。波拿巴仍然忠于雾月政变的精神，同那些“新贵名流”一起统治，他们不是大革命的参加者，就是追随者。

与此同时，宪法起草工作依然由特别指定担任这一使命的立法委员会的两个组负责进行。他们就教于西哀耶斯，但是这位“圣人”声称他毫无准备，不过还是口述了意见。他的意见要点被布莱（默尔特郡人）、多弩与罗德雷保存下来。尽管他们各人的记录彼此有些出入，但是有两点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雾月党人将在各组成机构内先取得席位，这些机构然后将采用互选的方法从“新贵名流”中来补足其成员。西哀耶斯认为，因为权力必须来自上面，所以公务员也将不是由选举产生。但是他补充说，既然信任必须来自下面，重新得到普选权而成为主权者的人民就有权制定“新贵名流”的名单。这样，导致雾月 18 日政变的主导思想——“新贵名流”的独裁统治——仍然得以实现。但在另一方面，必须细致地划分权力。立法权分给三个议院，行政权分给三个人，一个是由元老院任命的“大选长”和两个是由“大选长”指定的执政。“大选长”终身任职，但得由元老院“吸收”而去职；两名执政分别负责内政和外务。在他们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两名执政连同他们的各部部长和各自的参议院都享有完全的独立地位。这里表现出西哀耶斯的真正个人独创的想法。他设想出这些复杂安排的目的就是在于保护个人自由，使之不受国家的专制统治的侵犯。但他这样做却低估了加强政府权力的必要性——这曾是这次政变的第二个目的，同时也很不合乎政变中他的同谋者波拿巴的野心。

波拿巴对于民选政府的消失以及许许多多议院的建立当然并不反对，但是他却断然要求独揽行政大权。塔列朗安排了一次波拿巴与西哀耶斯的会见，但这只能加剧两位执政之间的冲突。参与起草宪法的两个组的成员由于宣称反对西哀耶斯，从而结束了这场冲突。他们设立一个第一执政，虽然有两个执政的协助，但赋予第一执政绝对的权威，并授予任命所有官吏的权力。他们甚至也不支持西哀耶斯计划的其余部分，决定恢复有财产资格选举权及选举制度，因为他们可能意识到，如果不这样做，议会各院在波拿巴面前将变得软弱无力。

当多弩刚把宪法草案誊正好，波拿巴立即在他的官邸召集了两个委员会的成员进行审议。在这次新的审议过程中，西哀耶斯又设法把互选原则、新贵名流名单以及普选权等写入了宪法。他这样做显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因为波拿巴不得不同意这些内容。作为交换条件，波拿巴显著地增加了他个人的权力，他的两位同僚被贬低到只有咨询的地位，而他自己则取得了制定法令权。保民院被剥夺了参与对立法创议权。这样，宪法的最后文本看来是一种妥协的产物，但在事实上，只要波拿巴把全部行政权集中在他自己身上，西哀耶斯所获得的成果就只能有利于波拿巴。毫无疑问，有些雾月党人跟着波拿巴走是为了想趋炎附势；然而另一些人支持他无疑具有更高的目的。他们认为拯救法国革命需要这样一位领袖。

由于这些辩论还不是正式的，法定程序的讨论应当先在五百人院的委员会内进行，随后再转到元老院。然而人们都希望结束这一讨论。霜月 22 日

(12月13日)晚上,当波拿巴要求议员们签字以表示同意这些条款,并立即要他们把三名执政的名字(波拿巴、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写进去时,没有人反对这次新的政变。为了要法国人民批准新宪法而举行了全国范围的公民投票,结果以三百零一万一千一百零七票对一千五百六十二票通过。这部宪法在准备过程中就不符合正常程序,而在正式批准前的雾月4日(12月25日)就开始生效了,这是再一次违法。

这部共和八年宪法,仓促拼凑在一起有九十五条,除了夜间不得搜查民宅以外,并无一处提到公民权利。在国家权力的组织方面,这部宪法的规定也是极不完善的。这部“简短而含糊”的宪法是符合波拿巴要求的,给了他自由行动的余地。最主要的是宪法规定了第一执政拥有无限的权力。除了媾和与宣战(这在当时还无足轻重)以外,拿破仑取得了全部行政权。他任命各部部长和其它高级官吏;只有治安法官才要通过选举产生。各部部长得受立法院弹劾,而这样其实使波拿巴更便于控制他们。至于第一执政本人以及他的官员则不对任何人负责,官员只有得到参议院同意才可被追究,而参政院的成员又是波拿巴自己指定的。他独自掌握了立法创议权。立法权只变成了一个单纯审议的过程,在听取了参政院的意见后立法院成员只是在波拿巴提出的法案上写明“同意”或“不同意”而已。即使如此,讨论与投票还是分开进行的:有一百名议员的保民院进行讨论,而立法院的三百名“哑巴”投票表决。最后,波拿巴还不受约束地行使颁布法律的权力——这是革命议会过去为了执行法令而赋予首席行政官的权力,并由首席行政官规定或解释法令的详细内容。维护宪政的元老院则可以取消它认为违宪的法律,然而元老院议员的职务实际上只是个闲差,因为该院成了一个主要是进行选举的机构。

因此,人们说从全部宪法中所能看到的,就是个波拿巴;这句话流传很广,确实表达出真相。然而还不是全部真相;议会各院之所以全然不起作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取消了选举。各院成员的产生是没有人民参与意见的,两位即将卸任的临时执政与新上任的第二、第三执政任命了第一批三十一名元老院议员,然后再由这些人来挑选出另外二十九名议员;以后,元老院就将继续以互选的方式来补足其成员。元老院指定保民院成员及立法院议员,并在现任三执政任期十年届满时任命新执政。结果所有那些被任命的人都确是在各级普选中选出的“新贵名流”。在每一个“乡镇区域”里,公民们选出为他们人数的十分之一的候选人,然后从这些“乡镇新贵名流”的候选人中又选出其人数的十分之一来构成郡的人名单。郡级人名单上的新贵名流通过相同的程序再构成全国新贵名流名单。这所谓“乡镇区域”指的是什么?谁也还不知道。不管怎样,这种制度是无从实行的,到共和九年最后好歹算制定了各级名流名单,但也几乎根本没有采用。

人民是主权者,这是明确的,但没有人理会他们。雾月党人满意了,因为他们现在身居统治地位。但是他们只代表自己,不代表任何人。波拿巴毫

不迟疑地告诉他们，“唯我一人代表人民。”尽管他们组成了所谓“代议制”机构，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是一伙被波拿巴召来、并在他认可的范围内协助他的新贵名流。以后在复辟王朝时，国王也是这么讲的。起初雾月党人不是这样想的。元老院成员是由西哀耶斯精心挑选的，由于他们控制了元老院，他们也就控制了保民院和立法院，所以这些人就自认为能够强迫波拿巴同他们合作。事实上，议会各院确曾表现出反抗的意图。但是由于宪法里没有解决这些争执的办法，于是就以一系列政变的形式加以解决，而唯有波拿巴才具有搞政变的手段。从一方面来讲，执政府的历史，甚至于帝国的历史，都部分地表现为立法权逐步屈从的过程。从一开始波拿巴就侵犯了立法权。共和八年雪月5日（1799年12月26日），他授权参议院以发布“意见”的形式来解释法律。他也时常毫不为难地按照自己的意向以行政命令的手段修改或曲解法律。共和十年宪法允许他授予元老院咨询权，从而剥夺了保民院和立法院的一切权力。这样，在极大地扩充他的制订法令权之后，波拿巴终于开始以直接发布法令的方式来立法。

有人津津乐道，说波拿巴和西哀耶斯让雅各宾派，即所谓“可靠的雅各宾派”充斥议会各院。他们才不这样傻呢！毋宁说，他们更为喜欢的是温和派。元老院成为仅次于法兰西科学总院的“空论家”的大本营。保民院的成员多是作家和演说家，诸如多弩、谢尼埃、然格内、萨伊，而尤其是邦雅曼·贡斯当；那些不太著名的人物则安排在立法院。总共有三百三十名议员曾在督政府的立法两院中占有席位，五十七人曾在大革命时期三届议会中占有席位；雅各宾派和归附的保王党贵族都只占极少数。波拿巴此时还不能摆脱这一批人，必须从他们中择优录用，因此参议院和政府各部的政治色彩，也不可能有很大差别。这就是为什么参议院甚至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在挑选其余两名执政的人选上，波拿巴就暴露了他的真实倾向。康巴塞雷斯曾经是国民公会的平原派，他仪表堂堂，讲究修饰，但忠心耿耿，极力对波拿巴施展一种温和主义的影响。勒布伦__曾任莫普__的秘书，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很不得意，波拿巴本人知道他是个保王党分子。在财政方面波拿巴依靠曾在革命前的财务总署任职的戈丹及莫利昂，结果造成了革命的资产阶级与那些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但已向新秩序妥协的人物混杂在一起，这是富有象征意义的情况。后来，波拿巴逐渐加大“旧人员”在政府里的比重，这样他就准备好了适应向君主政体过渡的人马。

二、波拿巴权力的组成与扩大

波拿巴于共和八年雨月30日（1800年2月19日）移居杜伊勒里宫，并立即进入了自己的书房，以便不受干扰地工作。唯一获准进入书房的人是笔录他口授命令的秘书——最初是布尔里埃内，随后是梅内瓦尔或者是凡。每当他想与他的属下议事时，他总是到和书房相连的另一个厅里去。旧制度

君主统治的先例也使他对部长们及其越权行为充满了不信任。他使部长们习惯于书面与他联系；不久他手边就有了以各部长，定期呈递给他报告的“卷宗”、陆军部的军事情报，以后又掌握了国内外额外的临时收益报告。他保留了督政府时期创立的国务秘书处这个机构，把它变成一个部并派马雷任部长。马雷负责集中政府各部、处的文件表报，并把他每天从早到晚从波拿巴那里收到的命令下达给有关部门。就这样，部长们变成只不过是波拿巴的办事员而已。波拿巴还增加了部长的数目：共和九年从财政部分出一个国库部；共和十年从参谋总部分出了一个军政部；此外，波拿巴还派参政官到一些部里，分别管理有关宗教、国民教育、国有产业、森林、公共工程等事宜。当今的督导官职位即由此发端。部长们因此感到不快；但是拿破仑也和路易十四一样对各部长间的倾轧感到高兴。只有外交部长塔列朗得到与主上一起工作的特权；塔列朗装出一副对波拿巴真正崇敬的样子。而蔑视他的波拿巴却不由自主地对他表示相当尊敬，这是一种暴发户对娴熟礼仪的名门贵族的尊敬。波拿巴对塔列朗的高贵气派悠然起敬，并非常乐于接见他。由于部长们被剥夺了决策权，并且也不构成一个团体，波拿巴就如伯尼奥__所说的“总揽一切”。象弗里德里希二世__一样，波拿巴是从书房里进行统治的。

波拿巴从未受过治国方面的正规训练，他缺乏很多必要的专门知识，关于他对任何事物都立即能理解的传说纯系讹传。他通过自学学到了很多东西，然而他真正的长处却表现在能器重那些在法国革命期间有过行政经验的人，不时地向他们请教，并善于使用他们。从共和八年雪月4日（1799年12月25日）起，他从这些人中挑选出组成了拥有二十九名成员的参议院的大多数。除了布律纳与雷阿尔之外，这些人过去都以温和派闻名。在他们之中只有三名前国民公会的议员，在这三人中仅贝利埃一人曾为“弑君者”，就是他也曾赞成过国王的死刑缓期执行。与这些人同时入选的还有诸如尚帕尼、弗勒里厄、莫罗·德·圣麦利等人，他们肯定是同情王党的，对旧制度的灭亡不胜惋惜。在以后的几年内，这两个派别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前者增加了蒂博多和特雷拉；后者增加了巴尔贝-马尔布瓦、波塔利斯、迪马、比戈·德·普雷亚梅纽以及米雷尔。他们并非都受到这位统治者的信任。共和八年果月7日（1800年8月25日），波拿巴从马伦哥得胜回来以后，即实行改进人事制度，从而使他能不动声色地解除那些引起他不快的参政官的职务，因为他认为人事变动引起太明显的注目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从此以后，波拿巴每隔三个月就准备两份名单，一份是那些执行正常公务的参政官名单，另一份为执行特殊公务的参政官名单，即那些负有特派外放任务的参政官名单；这样，这些人就不出席参议院会议了，虽然他们仍保留参政官的官衔和荣誉。任务一旦完成，他们就不必再重返原任，这就足以使波拿巴为掩盖某一参政官失宠而把他的名字从一张名单转至另一张名单。

参议院分为五个组，这五个组平时分别执行职务，不过定期召开全体会议，会议通常由波拿巴主持。参议院还设有一个由洛克雷领导的总秘书处。

由于参政官是由第一执政任免，所以他们就缺乏独立性。而革命前王政时期的国务会议是有独立性的，因为它的成员是买来的职位，因而官爵终身，并且具有由于社会出身和职业联系而产生的一种团体精神。由于参议院没有决策权，所以它只是发表对波拿巴毫无约束力的意见而已。

然而参议院的作用还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在最初几年。它有诸如罗德雷、勒尼奥、夏普塔尔、克雷特、富尔克鲁瓦、波塔利斯、贝利埃以及蒂博多等许多著名的行政人才。正是在参议院里制定出了那几部重要的组织法及法典。参议院具有最高行政裁决权，它在处理争议中起着逐步调整整个行政机器运转的作用。波拿巴很高兴参加该院的工作。他让参政官畅述己见，然后他自己就毫无拘束地以充沛的精力滔滔不绝地发表讲演。他只是把政治议题排除在参议院讨论范围之外，特别是教务专约与共和十年芽月 18 日法律即未交讨论，因为他知道这会遇到强烈的反对。

然而波拿巴不是单单听取参议院的意见，他还鼓励其他咨询团体发表意见。这些团体起初是临时召集的，但后来逐渐比较定期召集，称作“行政会议”。他经常召集有关的部长和他们属下各单位的负责人、一些参政官、甚至从各郡专门召来的某些官员来参加这些会议。这些“行政会议”虽然不如参议院那样有名，但却几乎起到了与参议院同样重要的作用。

象督政府一样，新政府从第一天起就为财政拮据所困扰。国库几乎一空如洗。这样，政府就不得不软硬兼施地几乎每天向银行告贷。这样，行政改革也就从财政部门开始。正是在这一部门，中央集权首战告捷。不等制订宪法完成，新财政部长戈丹在霜月初就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来开辟财源，充实国库。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霜月 3 日（1799 年 11 月 24 日）采取的剥夺地方政府确定每年税额分配的权力以及征收部分直接税的权力，改由中央政府指派的代理人负责征收。在这一新的中央财政机构中有一名总监及数名副总监分别负责直接税收及各郡的税收。在他们之下则有会计检查官和督察官负责分配各公社纳税人的税额。虽然这些副总监指派地方估税员协助他们工作，但是税则则由他们自己拟订。但实际上，暂时并没有人对新订的税额给予太多的注意，会计检查官就着手开列拖欠下来的税单，并根据以往的税单着手订出共和八年（当年）的税单。在每个郡，由政府任命的其它官员包括一名收税员和一名出纳员，以及叫作一般收税专员和特殊收税专员的税收经理人；在税额超过一万五千法郎的城市还有数名收税官。在另外一些地方，公社当局还保留了征税的权利，而一般都由出价最低的投标人承包。最后在霜月 6 日，一般收税专员规定的年度期票证券制度重新建立起来。这些期票按月份分十二次发行，但证券上规定的税额实际上在二十个月以上才付清。财政部内的主要机关——处理地产、关税以及公债的部门——很快地都有了参议院派来的督导官，国库当然采取了这一步骤；雨月 1 日（1800 年 1 月 21 日），它被置于迪弗雷纳的领导之下，他在 1789 年以前和在国民制宪议会时期曾经是国库雇员。直到共和十年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库部，由巴尔贝-

马尔布瓦领导。

困难的问题是销售由一般税收专员发出的期票。为了给期票提供信用支持，戈丹设立了一个抵押银行。他通过恢复由国库会计官发出的保证金券，和授权银行负责仓库及信托业务的办法为银行筹措资金。由莫利昂负责的抵押银行，还负责通过进行公开购买来维持政府公债的价格，以便降低利率，使国库的地位更加稳定。这样一来，这家银行很快就以“还债金库”而著名。但是期票的贴现仍然得依赖银行家。法国革命使得银行家有可能与一些大企业家联合创办若干发行纸币的机构，来满足他们各自的需要。这些银行中主要的是共和四年成立的由佩雷高、雷卡米埃和德普雷经营的“往来存款银行”，以及在共和六年成立的“商业贴现银行”。前者拥有准备援助国库的资金，当然假如有一国家银行来掌握这笔资金则会更好。往来存款银行的股东们正是想要得到国家银行的特权，以便能够扩大他们的业务。股东们就这样与政府达成了最后协议。雨月24日（1800年2月13日），他们的银行改组为法兰西银行，它拥有三千万法郎的基金，每股为一千法郎。二百名主要股东选出了十五名董事和三名监事；董事之中指定三人负责分配用于贴现的基金和制定贴现率。法兰西银行承担收购三百万法郎的期票。这家银行得到的报酬是，“还债金库”的一半保证金被划为该银行的股金，另一半则由银行用作现金支付。最后，法兰西银行还要经办政府公债利息及各种年金津贴。但是这家银行没有获准发行钞票的垄断权，因为有人认为，如果给予这一权利，它就会只给自己的股东贴现钞票，从而就会迫使各地的商人都走这家银行的门路；其实这正是作为协议基础的一项默契。尽管戈丹所做的工作值得称赞，但是他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只不过迈出财政改革的第一步而已，如果忘记这一点，势必会曲解执政府的历史。税则直至共和八年年底才准备出来，而且事实上仅有一小部分期票证券得到法兰西银行的贴现。即使法兰西银行贴现所有发出的证券，也不足以维持国家的开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波拿巴也象督政府一样听任银行家及承办商的摆布。

地方行政改革对于中央政府改革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见效较快。改革是由波拿巴在1800年1月间发动的，雨月28日（1800年2月17日）的法律作出决定，代表参议院提出这个法案的报告人就是夏普塔尔。郡、区以及公社仍然保留，由于取消了共和三年建立起来的区政府，公社又恢复了自治地位。介于公社和郡之间的真正的行政单位变成了县，这是旧专区的恢复，只是面积更大而已。各级行政区都由一名单一的行政长官领导：郡设郡守，由一名秘书长协助工作，取代了原来的“中心行政机构”；县设县长；公社设一名市长，连同一名或几名助理。同中央政府一样，地方行政改革的关键也是取消了选举制。从此以后，所有官吏均由中央政府委派，只有五千居民以下公社的市长及其助理则授权给郡守委派。虽然郡、县和公社各级的地方议会仍然保留下来，它们的议员则也要由中央政府或郡守委派，而且议会的会议次数和职权都大大地削减到所余无几：地方议会听取财政报告，郡

和县一级议会分摊租税，通过为地方所需的附加税，并且有权提出建议案；公社一级的议会有权规定公地的使用，并负责维修属于公社的公共建筑物。至于涉及到附加税及借款问题，公社议会只能发表意见。这样，公社就严格处在上级监管之下。各大城市于共和三年建立起来的割裂的行政区划被取消了。里昂、马赛及波尔多改由单一的市政厅管理，但在共和 13 年以前，它们一直还由几名区长负责。在巴黎，十二个区及其区政府依然保留下来，但是几乎所有的行政权都交给塞纳郡守；首都没有市政厅，而由塞纳郡总政务厅代行职权。

波拿巴对政治人员不够熟悉，所以他自己拟不出委派郡守的名单。这一任务就落到他的兄弟内政部长吕西安身上，或毋宁说，就是落到吕西安的秘书、立法议会前议员伯尼奥身上。但是康巴塞雷斯、勒布伦、塔列朗以及克拉拉克也参与提名，议会各院成员诸如肖夫兰、科尔多郡的克雷特等同样偶尔也参与其事。一般地说，波拿巴对吕西安提出的人选都是同意的。大部分郡守是在风月 11 日（3 月 2 日）任命的。这项人选又是主要来自温和派，其中约有半数在大革命期间曾任历届议会的议员。勒图尔纳甚至曾任督政府的督政官；让邦·圣安德烈曾经是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他的雅各宾派观点与其他人选的总的政治色彩截然不同，但他被派到一个并入法国的郡——托纳里山郡。除了这些人，还派了一些将军和外交官出任郡守。郡守全部是富有经验的人物，大部分人都很有能力。郡守的人选曾大有助于提高波拿巴的声誉，但这是法国革命的遗产之一。正象中央机构人选的情况那样，郡守的人选也越来越多地起用旧制度下的旧官吏。

郡守都不是从地方上选拔的；不象级别较低的官员或地方议会成员实际上是由郡守和地方政界人物就地录用的。一般地说，郡守也同样优先选择那些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充任过地方议会议员的或领导过公务部门的温和派新贵名流。例如，在下塞纳郡，参加过 1790 年郡议会的半数议员在 1800 年再次复任。乡村遇到较大的困难。由于乡村中只有极少数村民具有丰富的地方自治的知识，曾经受过具备公益感和廉洁奉公思想的培养训练，法国革命曾深感困难。郡守们遇到了同样的困难，这一事实常被用来作为把公社行政管理交给旧贵族的口实。

虽然中央集权成为波拿巴改革的首要特征，但改革也促进了官员之间职权的专业化，这些官员都是彼此独立而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的。他们的管理职能的熟练程度必然会提高，然而地方自治权却进一步被削弱。革命给了行政机构对处理行政争议、直接税收及治安的裁判管辖权。雨月 28 日法令授权实际上由郡守主持的郡政务厅处理争议事件；戈丹取消了行政机构的征税权；公社很快地将丧失对违法事件的审判权。

波拿巴也把警察从地方行政机构里分离开来，以便把警察置于中央机构的控制之下，这本是符合他改革制度的逻辑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保留了由富歇在德马雷帮助下改组的警务部。德马雷原是“红色神甫”，督政

府时期曾出任公职，作为警务部保安警察的头子，他成为富歇的左右手。风月 17 日（1800 年 3 月 8 日）在巴黎，以警察厅长的名义恢复了过去的警察总监，这给富歇提供了一个帮手。警察厅长负责维持首都秩序，后来在 1802 年 10 月 4 日建立的市卫队也归他管。曾担任高等法院检查官的杜布瓦当上了巴黎的第一任警察厅长，他是富歇一手提拔的人。警务部在郡里没有常驻代表。直至共和九年雾月 5 日（1800 年 10 月 27 日）才在各大城市及边境线上派设了地区警务专员接管了地方当局的警察权，在有些地点，如布伦港，还派驻了特派员。与此不同的是，在大部分郡里，只有郡守是警务部的常驻代表，他们就象过去的巡按使那样有权发出逮捕状和搜查状。但是他们的上司不只是警务部长一个人；而且，由于郡守缺乏有专业训练的部下，他们往往直接从部长本人或从他派驻到郡里的代理人那里得到有关的情报。与警察并存的还有在蒙塞将军统辖下经过周密改组的宪兵队，它是单独执行其任务的。

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机构从一开始就行使了极大的权力。富歇把侦探及告密者遍布各地，在这些人中甚至有从社会最上层的阶级里招募来的。由拉瓦莱特领导的书信检察室严格监视书信来往。肆意逮捕遍于全国，郡守本人就能签署“密札”，不但逮捕政治嫌疑犯，而且还徇情枉法，为了某些有权势家族的利害关系，而逮捕不能判定有罪的或已经法院宣告不予起诉的普通案件的被告。然而警察系统仍然缺乏政府其它部门所具有的那种统一和集中程度。这当然是由于波拿巴对富歇的不信任造成的；富歇在所有的部长中是最不可或缺的，最使人畏惧、也是最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从政府预算中要求极少，而从赌场中，从颁发护照和枪支执照的收费中、从没收反叛分子的资产中、从肆意向妓院勒索名目繁多的捐税中为自己开辟财源。因此，为了控制富歇，波拿巴宁愿有几个警察机构并存。他还有他自己的秘密警察，更不必说他有着一大批象菲埃韦，让利斯夫人以及蒙洛西哀那样的告密者；他还准许杜布瓦插手政治，支持他与富歇对峙。结果，这些相互竞争的警察机构都竭力想胜过对方，而不顾那些求诉无门的公民的利益。

行政制度的改革刚在开始付诸实施，共和八年风月 27 日（1800 年 3 月 18 日）法律也使得司法系统开始了改革。在民事方面，乡区保留了它的治安法官，每一县也象过去的专区的情况一样设有一个初审法庭。新设立的是二十九个上诉法院，这使人想起了高等法院。在刑事方面，治安审讯机关变成了简易警事法庭，而初审法庭和上诉法院则都有刑事宣判权；郡刑事法庭仍然保留下来，但从此有其专职法官。最高法院、起诉陪审团与判决陪审团，商务、军事以及海事法庭都保留下来。最后，选拔法院工作人员的方法也随之制订出来。公证人仍然由波拿巴指定；除了治安法官的执行吏之外，他还拥有决定执行吏的人选，以及检察官（或公诉人）的人选。对后者他又恢复了“辩护士”的命名，但是不再强迫被告延请他们代为辩护。只有律师的职业依然是自由职业。

但是司法系统的调整并不是风月法律的最重要的特征。首先，除了治安法官以及商务法庭的法官外，法官不再由选举产生。第一执政任命所有的法官，只有最高法院的法官由元老院指派。虽然他们确实是终身任职的，然而他们的薪俸和晋级从此却仰仗着国家。勒布伦看见莫普改革的实现一定会心满意足，他很可能也曾在其中插过手。其次，国家检察官的职务完全重新树立起来，由此可见促进实行改革的原因在于稳定公共秩序。这不仅是一个整顿司法人员并保证其效忠于政府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在动乱的国度里加强镇压的问题。刑事法庭的公诉人的职能是与作为中央政权代表的政府专员的职能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公诉人接受司法警官的领导。治安法官及宪兵队长仍然有权签发传票和进行预审。然后就象过去一样，这些预审的内容转给初审法庭庭长，他是起诉陪审团主席，但从此由国家委派。司法系统的集权化尚未彻底，但是集中的程度很快增长。

司法官的遴选比郡守的遴选困难更大，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得要从地方上就地挑选。所以波拿巴只得听从别人的意见。要求推荐官员的通知发到地方各级议会议员，并且要求提供各种背景不同的知名人士的情况。司法部长阿布里亚尔按照不同的地区准备了一份候选人名单；然后在该地政界人物的协助下，由康巴塞雷斯加以审查。尽管采取了这些谨慎的措施，法庭的组成还是带来一定程度的紊乱，并且在某些人选方面产生了令人遗憾的后果。在这一方面，参加过革命的人士还是受到了重用，由于法官是终身任职的，司法官员才不象其它机构的官员那样迅速地增多了旧制度下的旧人员。

共和八年的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在法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就其重要性来说，仅次于 1789 年国民制宪议会的成就；但是，它应归功于后者的成就之处颇多。国民制宪议会已经废除了特权和中层机构，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波拿巴只要盖上他的图章就行了，这就是他能够如此迅速进行改革的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只是重新开始了共和二年的事业。救国委员会没有足够时间同样彻底地实行中央集权，然而它也曾有过同样的意图。圣茹斯特曾经设想在每一个郡或区设置一个单一的长官，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夏普塔尔说，“行政制度的力量完全在于能够确保不折不扣地贯彻政府的法律和法令……执行法令要一竿子插到底，从部长直到被治理的百姓，不容中断；它要把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以电流的速度传达到社会组织的基层去。”罗伯斯庇尔本来也可能这样说的。这是无套裤汉非常喜欢做的一种比较。人们往往认为，共和八年的各项法律是波拿巴为了增加他个人的权力而制订的，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宪法中从未提到关于取消地方议会的选举，与波拿巴同时代的人都很明白，他的个人独裁统治又向前跨了一大步。然而，在这些法律背后却隐藏着令人不能反对它们的更为深刻的动机：国民制宪议会所实行的地方分权的政策曾使法国在战争时期受到了危害，而且只要战争延续下去，这种局面也会继续存在下去。为了应付这种局势，救国委员会才又抓紧对政权的控制，在热月党人的手中政权又松弛下来，波拿巴再次抓紧政

权。他把一时权宜之计变成了统治的理想措施。他所以能够使他个人的统治欲望得到满足，只是因为这种理想当时完全符合革命的法国的利益，雾月党人就同意这种看法。

当波拿巴忙于建国工作时，他觉得不得不自卫以免受到非难。新贵名流已经摆脱了民主的威胁，并且占有了所有的重要地位。但是，因为任何事情都不再由他们决定了，于是这些人就心怀不满；斯塔埃尔夫人曾经希望通过波拿巴，至少是通过邦雅曼·贡斯当来统治法国，现在毫不掩饰这种不满情绪。保民院还有活动余地，于是反对的呼声就从这里爆发出来。保民院是常设机构，它选出自己的办事机构，并且推选多弩为议长。它有权发表“意见”，讨论请愿书，谴责各部部长，当它认为政府的措施违宪时，可向元老院提出弹劾。最重要的是，人们能把它作为一个发表演说的场所，当第一个议案提交保民院讨论时，邦雅曼·贡斯当于1800年1月5日就开始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波拿巴听到这种情况之后很愤怒，于是所有的人都躲避起来。西哀耶斯隐居到他的乡间住宅，接受了一份养老金，这使他大为丢脸。为了驯服那些温和派，波拿巴只要说一句“你们要我把你们交给雅各宾派吗？”就够了。雅各宾派自然更加感到不满。在外地，特别是在法国西部，他们受到“白党”威胁的压抑。郡守的任命使雅各宾派在原有的行政机构中失去了支持。他们经常攻击政府，如在第戎和图卢兹，直到夏季才真正遭到挫败。至于保王党，他们改变了腔调，因为波拿巴在接见他们的代表伊德·德·纳维尔和当迪涅时拒绝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由于他们控制了大多数报纸，于是就大喊大叫地反对新的议会各院，要求立即进行清洗。但是在1800年1月17日，波拿巴利用这一骚动一举封闭了当时七十三家报纸中的六十家。后来又有些报纸停刊了，到1800年底只剩下了九家。1799年12月27日以后，《政府通报》成为政府的机关报，并由马雷掌管。检查制度虽然没有正式恢复，事实上却由富歇执行起来。1800年4月5日，吕西安·波拿巴在戏剧演出方面也建立了这一制度。左派报刊当然也同时被清除了。

既然合法反抗已不可能，极端分子就开始想使用暴力。芽月里又出现了关于雅各宾派阴谋的传说。但是，唯一的严重危险来自军队，因为那里还有很多共和派，而心怀不满的人就更多，因为将军们没有一个不觉得自己也是适合做第一执政的。波拿巴使用了慎重的手段。他任命卡尔诺为陆军部部长，并且大大地增加了来因方面军司令莫罗的权力。他的最可怕的敌人仍旧是保王党分子，至少是那些决心拒绝一切妥协的人。可是，他们彼此既不能在原则上取得一致，因为有些人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也不能在做法上取得一致意见。同达瓦雷和圣普里厄斯特一起流亡在俄国米塔瓦的路易十八把谈判和阴谋结合起来。巴黎的鲁瓦耶-科拉尔为首的王党组织被授命去试探波拿巴。于是他便托人交给波拿巴两封信，都没有得到答复。在施瓦本，一个由普雷西和当德雷掌管、并由威克姆资助的机构正在为保王党亡命者入侵普罗旺斯做准备。此外，这个机构还与里昂和图卢兹的保王党，特别是与波尔多

（共和五年成立的“慈善学社”已深深扎根于此地）的保王党互通消息。住在英国的阿图瓦伯爵维持着在泽西岛和巴黎的联络机关，但在5月间，伊德·德·纳维尔在巴黎的阴谋暴露了。然而，保王党的主要根据地是在西部。共和七年，那里舒安份子曾死灰复燃，但他们不久就堕落为土匪，当政府军10月到来时——埃杜维尔的部队在卢瓦尔河以北，特拉沃的部队在旺代——他们就立即被降服了。埃杜维尔和舒安份子的贵族首领们进行了谈判，1800年1月4日达成停战协议。波拿巴非常希望把全部兵力转来对付奥国，因而迫切希望平定西部。然而，和热月党人不同，他不愿平等对待乱党，而决心解除农民的武装。因此，他提出赦免那些放下武器的人。但是没有得到响应，他把布律纳将军和勒费弗尔将军派到西部去。在那些郡里暂时中止了宪法的实施，并且下令枪毙那些携带武器的人或是鼓动叛乱的人。实际上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战斗，贵族出身的首领如道蒂钱普和布尔蒙在1月里投降了。布列塔尼的非贵族出身的首领坚持得更久一些；卡杜达尔是在2月14日最后一个投降的。弗罗泰在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到阿朗松去谈判，但在2月15日至16日的夜间在诺曼底被捕了。2月18日押送他到巴黎去的分遣队在韦纳伊遇见了一名传令官，他带来立即就地交付军事法庭的命令，于是弗罗泰当天就和他的六名同伙一起被枪毙了。由此可见，波拿巴在同叛党进行斗争中，也继续了共和二年的传统：他完全是个恐怖主义者。希农的一位编年史作者写道：“从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以来，法律从未曾如此严厉过。”

然而，波拿巴小心翼翼地不把这种手段普遍化。他比雅各宾派灵活，不过惩一儆百，而欢迎一切投降的表示。他没有等到全部解除反革命武装的和平时期的到来，就采取了措施以加速在全国招降。这样做肯定会使很多人高兴，因为结束混乱就会恢复繁荣，使那些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人安下心来。确实让人担心的是，那些人的归顺并不是那么真心诚意的，而在这一点上波拿巴也从不抱任何幻想。不过，只要他还在继续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主要的困难在于使资产阶级共和派，特别是使军队，接受那些有利于顽抗派教士和亡命者的宽大措施。因此在马伦哥战役之前，波拿巴只采取十分谨慎的措施。1799年12月28日，他批准天主教徒使用那些没有卖出的教堂。他允许他们享有每天（甚至在星期日）做礼拜的自由，只有第十来复日是例外，这一保留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为他实际上废除了第十来复日礼拜和几乎所有的革命节日。他只是要求神甫们答应忠于共和八年宪法而已；有一个时期，他似乎相信他们会趁此机会屈服顺从。可是，没有产生什么结果。那些原来拒绝宣誓的教士现在大多数都不顾埃梅里方丈的劝告而继续顽抗。秘密的宗教礼拜继续存在，教堂的钟声和敬神巡行仍旧是无数冲突的起因。波拿巴很快就意识到，为了平息教士的反抗，就必须和罗马教皇和解。此外，参议院还宣称，宪法默认取消了禁止原来贵族和亡命者亲属充任国家公职的规定。然而，参议院也决定保留有关对付亡命者本人的法律。但在1800年3

月3日又作出决定，只有那些在1799年12月25日以前逃走的人才包括在亡命者的名单中。于是一个为了审核亡命者申请回国而设立的委员会接到了很多这样的请求。原先的恐怖主义者巴雷尔和瓦迪埃，那些因果月事件被放逐的人，以及包括拉法叶特在内的国民制宪会议中多数的老“爱国党”成员，都被毫无异议地召回了。可是，名单上的亡命者仍有十四万五千人，而委员会的审核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富歇亲自建议除少数人以外大赦全部亡命者。但是，时机还未成熟；要冒这样的风险就象准备教务专约所冒的风险那样，波拿巴就必须首先取得胜利与和平来提高自己的威望。

三、仓猝上阵的1800年战役

波拿巴个人权力的保持和扩大有赖于1800年的战役，所以他就满腔热情地准备这次战役。人力不成问题，因为当年的新兵在3月8日已全部入伍交给他来支配了。但他反对雅各宾派和督政府所采用的方法。现在断然不是模仿共和七年大征兵的时候，何况也缺乏款项。此外，如果我们相信一位非常偏袒他的史学家的话，波拿巴很知道，“全国战争热情的高度和愿去打仗士兵的人数成反比”。所以他就满足于统帅三万名士兵了。那些富有的阶级是容易对付的，因为法律允许他们可以出钱雇人顶替。来因军已经准备就绪，一支新的后备军还有待建立。这就需要使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倾出训练站的新兵，召回西方军的老兵，成立意大利军团，在行军途中训练那些新兵掌握战斗技术。但是骑兵极少，而炮兵更少。在这样的条件下，波拿巴要全力以赴地出征意大利，就需要有非常的胆量和自信。

最难的问题是为战役提供军费，据说大约需要六千五百万法郎。替代了强制公债的额外军费捐献以及加速征集税收的措施都不能开辟急需的财源；由于捐献和租税可以用督政府发出的票据和支票来支付，而此时这些票据却毫无价值了，于是情况就更加严重。此外，军需供应又委托给了承包私商，这些人都以动产的收益作为担保。戈丹希望依靠征收间接税，但是，对自己的力量仍没有多大把握的波拿巴只准许统一城市通行税，但这项税收专用于济贫院和城市本身。开支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可是执政府最后不得不采用督政府所用过的权宜措施。政府停止了实行承包制度，并且恢复了征购的办法。但是征购时发出的票据又不能用来缴纳租税。政府最后决定部分延期付款；国库中的少量余款每隔十天给各部发放一次。此外，政府还发行了不兑现的支票。最后，它就依靠银行家和承包商了，他们同意每月按百分之五来贴现票据。政府也求援于在热那亚、汉堡等地的国外金融家，他们被强制垫款六百五十万法郎。

这个专制政府在财政政策上的唯一新奇特点就是它的高压手段。政府要求那些没有得到政府付款的承包私商：如果他们希望用新指券来补偿他们的话，他们就要交出五千二百万法郎。但是这种债务证券立刻就丧失券面价值

的百分之五十。已经被捕入狱的著名金融家乌弗拉尔被迫向政府交出一千四百万法郎。因此政府只能过一天算一天。虽然政府做了极大的努力，可是，不应以其结果来欺骗自己。由于政治原因而最受优待的来因方面军总共得到了六百二十万法郎，在雨月还拖欠了一千五百万法郎薪饷。徐徐前进的后备军，除了沿途从农民那里得到给养之外，既无军饷又无军粮。象在革命时期一样，战役准备中财政上的巨大不足造成了军队的苦难。在财政方面，象在政治方面一样，一切都取决于胜利。如果不要求全国作出牺牲（这种牺牲曾使得国民公会和督政府不得人心）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就不可能长期打下去。

至少人民是这样推论的，而且每一个人都相应地作了准备。当波拿巴于5月6日离开巴黎的时候，雾月党人就纷纷开始考虑万一他不能回来的话，有哪些可能解决的办法。西哀耶斯又在巴黎露面了，于是有人开始议论起什么新的督政府，什么新的第一执政来——卡尔诺、拉法叶特、莫罗。也有人提到奥尔良公爵。波拿巴的弟兄约瑟夫和吕西安也跃跃欲试。在这种形势下必然会有某些猜测；但是，肯定有很多显要人物会幸灾乐祸地指望着他的失败。除了他的失败以外，自由主义者和某些雅各宾派没有别的指望。斯塔埃尔夫夫人后来写道，“我在指望波拿巴失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暴政统治。”就保王党人而言，他们仍旧无所不用其极地帮助敌人。卡杜达尔6月30日从英国回来，打算再策动舒安份子的叛乱。如果波拿巴失败了，这就肯定会意味着法国亡国和革命失败。在波拿巴和他的敌人之间，法国人民再无犹豫的余地。

第二章 欧洲和平的实现

尽管进行战争并迫使敌人讲和对波拿巴是有利的，但让法国人相信他并非战争祸首对他也是同样重要的。为了完成他的备战工作，特别是为了挽救在埃及的军队（它的损失将成为法国在地中海和东方的不可挽回的挫折），他本会乐意签订一个停战协定。但是要在自然疆界的基础上媾和在他是难以想象的。他后来说，放弃意大利“会挫伤想象力”，也就是说，有损于他的威望。他也不愿意听取普鲁士国王的建议，国王对博浓维尔说，体现和平的诚意的条件是从荷兰、瑞士和皮埃蒙特撤军。塔列朗的得力助手德·奥特里夫不久后出版的《共和八年法国的状况》一书可以认为反映了波拿巴的思想。此书建议欧洲成立一个以法国为盟主的大陆国家联盟来代替传统的均势政策。

但是敌人拒绝了波拿巴的和平建议，这反而成全了他。实际上，奥国宰相图古特颇有试探和平条件的手腕，但是当塔列朗提到坎坡福米奥和约中所规定的领土界限时，图古特强烈地表示反对；当提出以现有边界为谈判基础时，他却又加以回避。因为只要图古特还没有被打败，他就梦想着收复尼斯和萨伏依，以便迫使撒丁国王割让皮埃蒙特的一部分给奥国作为报酬；建议与法国谈判的奥国大公查理失去了对德意志军队的统帅权。图古特对英国人微微暗示，对法国一些地方的征服可以用来作为恢复君主政体的条件。他至少相当慎重，没有公开说这件事情。然而皮特和格伦维尔却失策地泄露了贵族同盟的内心愿望。他们向众议院宣布，与波拿巴签订条约不能保证未来，并且对法兰西共和国无礼地宣称，最可靠的保证是“让原来的王室复位。这个王室在统治法国数百年中，使法国国内繁荣昌盛，备受外国的尊敬”。被他们收买的根茨突然极端狂热地鼓吹发动反革命的十字军。这样法国就别无其它选择，只有战斗。

一、1800年战役与吕内维尔和约

俄国已经退出这场斗争。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就只希望使法国和解，这样做可以使自己免于一切风险。然而选他做仲裁人并不合波拿巴的心意；波拿巴一方面恢复迪穆里埃和丹东的政策（他们本人就是法国外交上反奥传统的继承者），一方面却向弗里德里希建议结盟，而这种联盟会使普鲁士沦于从属地位。国王拒绝了，这样一来，战争仍然是法国与奥国之间的一场决斗。

一心想着意大利的图古特让克赖在来因河后面驻防，同时命令在意大利的梅拉斯（他的兵力经过很大的困难才扩充到十万多人）进攻法军，后者自11月就已经撤到亚平宁山后面。图古特还命令梅拉斯攻入普罗旺斯，那里的维约和皮韦尔侯爵计划挑起一场叛乱。奥国人指望着在梅诺卡岛的英国人的

帮助，但正象往常一样，邓达斯不能聚集必需的兵力。只得到五千名士兵的斯图尔特提出了辞呈，而他的继任者艾伯克龙比直到马伦哥战役之后才到任。梅拉斯当时把他的一半兵力分布在平原上和阿尔卑斯山各山口；另一半兵力则采取攻势。4月6日他把法军截为两段，包围在热那亚的马塞纳，并把絮歇赶回瓦尔河畔。结果，纯粹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的图古特的军事战略，只是使奥国军队把法国人赶到了西南方，并没有获得决定性的战果；而法国人则仍然控制着瑞士，因此得以从侧面攻击两支奥国军队。

起初，波拿巴把他的后备军分布在夏龙和里昂之间。3月，他企图说服莫罗率领他的全部兵力在沙夫豪森附近渡过来因河，以便切断克赖的交通联系，然后各个击破。那时后备军将开进瑞士，而且得到获胜的部分来因军的增援，尽可能向东前进，至少在圣戈塔德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就可以用同样战术对付梅拉斯。但莫罗完全没有理解这种速战速决战术的意义，而这时梅拉斯就发动了进攻。波拿巴置莫罗于不顾，在4月底把自己的后备军集中在下伐累地区。同月27日，根据工兵搜集的情报，他决定带领军队向大圣伯纳德山口进发。法国军队于1798年和1799年曾两度通过这个山口，所以他们很熟悉这条道路。尽管如此，5月5日他还是命令莫罗派蒙塞率领二万五千人经圣戈塔德山口到他那里。然而莫罗只愿派去一万五千人。可是这却仍然削弱了莫罗刚刚开始进攻，而给敌人决定性打击的功劳却归于波拿巴。这是他们二人感情破裂的起点。

通过大圣伯纳德山口的进军是从5月14日至15日夜开始的，到5月23日结束。由于部队必须排成纵列行进，艰难地通过巴尔德堡垒的猛烈炮火扫射，因此只有十门大炮能够通过，在部队到达米兰之前，这就构成了整个炮队。先头部队拉纳夺取了位于波河平原前沿的伊夫雷阿要塞，从这里波拿巴可以同沿瑟尼山口和热内弗尔山口而下的蒂罗部队汇合起来，向热那亚进军。在这种情况下，梅拉斯如果被击败，仍可主动地集中他的兵力退往伦巴第。可供波拿巴选择的另一条路线是向米兰进军，这样来切断梅拉斯的退路。于是，打一场胜仗将是有决定意义的，并会把意大利交给法国人。然而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只要在米兰的法军没有重新开辟一条通过圣戈塔德山口的战线，梅拉斯就能在波河北岸发动一次进攻而切断法军的交通线。波拿巴需要打一次胜仗，而且是一次立即取得的胜仗。他因此选择了后一条路线，虽然冒险，然而一旦成功必将产生惊人的战果。主力部队在拉纳掩护下向东迂回，于6月2日到达米兰，在这里与蒙塞会师。奥国的武卡索维奇已撤退到奥利奥河后面，奥军发现他们被分割成力量十分悬殊的两部分。法军各师然后向南进发，渡过波河，转而向西，夺取了斯特拉代拉的隘路。在这里，拉纳于6月9日攻占了芒泰贝洛村，然后向马伦哥平原进军。6月13日先头部队到达能看到亚历山大里亚的博尔米达河畔。波拿巴做到了即使他的师团挺进，又确保安全。他把部队编成独立的兵团，并且使各兵团尽可能地集中。与此同时，马塞纳不得不同意于6月4日撤离热那亚，并与絮歇重新

会师。而絮歇正在击退厄尔斯尼茨，并使奥军蒙受巨大的损失。波拿巴以为他们可以包抄梅拉斯。虽然他们没有能够这样做，但是却牵制了大量的敌人骑兵。

梅拉斯在亚历山大里亚从剩下的七万多人中仅仅集中起了三万人。象下赌注一样，他竟没有保留骑兵，但他还有大约二百门大炮。波拿巴对他的确切下落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奥军可能试图渡过波河，或者沿亚平宁山逃掉。因而在6月13日他调遣了一个师到波河以北，另外两个师在德塞统帅下南进，他仅留下了二万二千人 and 二十二门（或二十四门）大炮。此外，由于他没有破坏博尔米达河上的桥梁而铸成大错。6月14日上午9时，他的先头部队遭到二万名奥军的攻击。两个师匆忙赶去营救，但被敌人的左翼包围，于是法军丢下了他们的大炮惶惶溃退。对他们来说侥幸的是，奥军左右两翼的师团，只注意他们的前面，而并没有企图包围法军。波拿巴匆忙召回派去执行拦截任务的部队，但是只有布代的部队（五千人和五门炮）被德塞及时撤回。德塞集合起法军残部，从正面攻击前进中的奥军。直到这时，战局仍胜负未定，但当克勒曼率领四百名骑兵从侧面冲击奥军时，敌人惊慌失措，纷纷溃散；而他们的左右两翼尚未遭到削弱，掩护了撤退。德塞死于混战中，但未被人发现。这正是波拿巴曾经想要获得的胜仗，它的确是一场令人赞叹的战役的顶峰；但是如果战斗象开始时那样打法，他本来会打败仗的；后来他煞费苦心搞了关于这次战役的虚假报告，这在很长时间内蒙蔽了史学家。如果他失败了，部队也可以撤退出来，因为部队保留着一条退却的路线，但是这样一来，波拿巴的政治生涯无疑地将会从此告终。在战争中和在人生中一样（即使这人是天才），不能预见的因素所起的作用从未象这样明显地表现出来。奥军的失败也尚未陷入绝境，因为法军也疲惫不堪而且弹药缺乏。但是梅拉斯却沮丧万分。奈珀克伯爵说：“看上去他的面容象他身体一样在颤动。”这位注定会赢得一些名声的伯爵，当时是被派去与“暴民”谈判的奥国军官之一。按照6月15日在亚历山大里亚签订的停战协定的规定，奥国人撤退到明乔河以东，这样就保住了托斯卡纳和罗马教皇国属地。

与此同时，莫罗在德意志缓慢前进。在对克尔发动了一次佯攻之后，他的部队于4月28日至5月1日在从布赖扎赫到沙夫豪森之间渡过了莱茵河。然后继续越过黑林山，向统帅法军右翼的勒古布将军的方向前进。这就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分散的兵力不能集中作战。只有莫罗带领着中路部队，能够支援勒古布。克赖措手不及，他也没有能够集合起自己的队伍，以便利用这种混乱局面。由于莫罗的士兵坚强刚毅，使他于5月3日在恩根和施托卡克，5月5日在默斯基尔克占了上风。他得以继续朝着伊勒河和福腊耳贝克前进，在克赖和他占领提罗耳的部队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后来克赖就退到乌尔姆。莫罗由于被抽调一万五千人到意大利去而力量遭到削弱。他只剩下了九万人来对付奥军的十四万人。因此他便机动迂回而不敢攻击克赖。

最后于6月19日他在赫克施塔特强渡多瑙河，迫使奥军放弃乌尔姆向北撤退，然后又折回到多瑙河，并且渡过河要占领伊扎尔防线，但是法军由于占领了慕尼黑而击退了他们，使他们后退到因河。7月15日在帕尔斯多夫签订了停战协定。

自从6月16日以来，波拿巴已经再次写信给弗兰茨二世，邀请他举行和谈。但是这个建议的提出不是时候。6月20日，图古特与明托勋爵缔结了一项条约，条约规定，由英国人资助奥国，但以后者不单独签订和约为条件。为了赢得时间，奥国宫廷还是派了圣朱利安伯爵出使巴黎，非正式地探询和平条件。塔列朗的欺骗和波拿巴的威胁使得圣朱利安被迫签订了和约的一些初步条款，规定把整个来因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奥国为此可以在意大利得到未加详细规定的补偿。圣朱利安一回到维也纳，签订的条款没有得到承认，他本人并被捕入狱。同时，英国采取了有利于奥国的行动，声称准备参加和谈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图古特同意正式谈判。由于停战协定行将到期，波拿巴就利用这一机会要求全面停止战斗，并要求给他供应马耳他粮食和增援他在埃及部队的权利。格仑维尔终于拒绝了他的要求；而马耳他则于9月5日投降了。奥国为这种僵持的局面付出了代价，因为只有在奥国放弃菲利普斯堡、乌尔姆和英戈耳施塔特的条件下，波拿巴才同意了延长停战。与此同时，在维也纳，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即以得到那不勒斯的卡罗莉娜和皇后支持的图古特一方与查理大公一方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图古特拒绝承认由圣朱利安签订的协定、并且辞去了大臣的职务，而由路易·德·科本兹继任，他曾在圣彼得堡参加过对波兰最后两次瓜分谈判。尽管如此，由于科本兹亲自去吕内维尔参加谈判，图古特通过科洛雷多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影响。首先被波拿巴召到巴黎去的科本兹直到1800年11月5日才开始在吕内维尔同法国的代表约瑟夫·波拿巴谈判。然而吕内维尔的谈判毫无结果，因为第一执政对法国将在意大利作出的让步拒绝明确表态。波拿巴在西沙尔平共和国、热那亚和皮埃蒙特一直在建树自己的势力。缪拉率领的第三后备军就在这些地方驻扎着。更有甚者是杜邦借口英国人在里窝那，而不惜破坏停战协定，占领了托斯卡纳。因此到停战协定满期时，冬季战役便开始了。

当时法国在意大利的兵力有十万人，但其中只有五万七千人是由布律纳将军统率。布律纳固守明乔河一线，与奥国的贝勒加德将军对峙，后者统帅的八万人分布在福腊耳贝格与波河之间。统率着第二后备军一万八千名士兵的麦克唐纳占领着瑞士的格劳宾登州，他越过施普鲁根山口攻入提罗耳时，就可以增强布律纳的左翼。在巴伐利亚，莫罗率领着一支九万五千人的队伍，奥军以十万人的兵力与之对抗。这支奥国军队名义上由年轻的约翰大公率领，而实际上由劳尔将军指挥。奥热罗率领着一万六千名法军和巴达维亚军队守在美因河上。把奥热罗、麦克唐纳、甚至缪拉的兵力与莫罗的部队联合起来全力进攻维也纳，这是很自然的部署，但是波拿巴打算由他自己在意大利来给予敌人以致命打击。

这场战役的解决比波拿巴所预料的要快得多。莫罗为了部署渡过因河，已把他的一些师团分布在沿河一带，手边只有六万人的军队；这时候劳尔带领六万五千人从右侧发起了攻击，巧妙地威胁安普芬法军的左翼。当两军相对时，莫罗赶忙集合起沿霍恩林登森林分布的一切可利用的兵力。战斗于12月3日在这里爆发了。奥军在通过森林时以独立的、互不联系的纵队前进，他们发觉自己不能从森林小路进入开阔地了。与此同时，德凯恩和里什庞斯迂回到奥军的左翼展开进攻。然后，里什庞斯从背后袭击奥军的中锋，使其溃散。奥军损失了一万二千人到一万五千人，大炮一百门。这次莫罗十分迅速地追击，追赶溃散之敌，俘获了二万五千人。奥国为了保住维也纳，于12月25日在希太尔签署了停战协定，并同意单独缔结和约。与此同时，麦克唐纳经过一场出色的山地战斗之后到达阿迪杰河上游，而布律纳也最终能够发动攻势。然而，在布律纳的率领下，军队横渡明乔河配合得很差；正是由于敌军的指挥同样拙劣，才使得杜邦于12月5日在波佐罗免除了一场灾难。由于法军渡过了阿迪杰河和布兰塔河，1801年1月15日在特雷维佐签订的停战协定使奥国人撤回塔利亚曼托河后面。因此，结束了这场战争的是莫罗，也正因为如此，波拿巴永远不宽恕他。至于缪拉，他侵入了托斯卡纳和卢卡并把奥军逐出卢卡，还迫使那不勒斯人在福利尼奥签订了停战协定（2月18日）。

在吕内维尔，科本兹竭力抗拒波拿巴的要求，随着消息越来越坏，他才一步一步地屈服了。在同意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谈判并放弃曼图亚之后，他企图保住托斯卡纳。但是英国在这件事上无能为力，而且保罗一世已经明确地与英国断绝了关系，并向法国靠拢。1801年2月9日，和约终于完全象第一执政命令的那样签订了。神圣罗马帝国完全无条件地割让整个来因河左岸，只是把教会的土地分配给被剥夺了领地的各诸侯作为补偿。摩德纳公爵得到布赖斯高，而托斯卡纳公爵也将在德意志得到补偿。法国人控制着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西沙尔平共和国扩展到阿迪杰河，合并了维罗纳和波利齐内；从皮埃蒙特夺来的诺瓦腊已经给了西沙尔平共和国，以便它打开辛普朗通道的路；最后从罗马教皇国夺来的属地也都并入了西沙尔平共和国。和约没有提到撒丁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也没提到罗马教皇，这样就可以听任波拿巴随意处理他们。诚然，和约的确保证西沙尔平共和国、热那亚、荷兰和瑞士的独立，但是这一诺言又有什么价值呢？

对于关心意大利命运的人来说，不久就明白了。波拿巴已经重新改组西沙尔平共和国，首先给它成立了一个“谘询会议”，然后又实行了他自己创造的三头政治。在热那亚，他还建立了一个执政委员会。由于撒丁国王查理-埃曼努埃尔四世拒绝回都灵，波拿巴就在都灵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俄国人与法国大使圣马桑就皮埃蒙特的前途问题的谈判——它完全是看在沙皇的面子上进行的——在保罗一世死后立即中断了。皮埃蒙特变成了法国的一个军管区，下面设郡，并与法国本土一样实行同一行政和财政制度。

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四世于3月28日在佛罗伦萨签订了和约，按照和约的规定他撤离了罗马，割让了厄尔巴岛和皮昂比诺公国，同意对英国船只关闭他的港口，并且还答应法国派遣部队占领奥特朗托和布林的西，为期一年；这些部队可以从这两个港口乘船到埃及去。卢卡变成了一个共和国。而托斯卡纳则成为波拿巴对西班牙政策，甚至殖民地政策的一张王牌。1801年3月21日，阿兰胡埃斯条约把托斯卡纳大公国，作为伊特鲁利亚王国授与巴马公爵的儿子，他是西班牙王后的侄子，一位西班牙公主的丈夫。给与西班牙的这块地方是对它于1800年10月1日把路易斯安那交还给法国的补偿；而法国则应取得巴马，年迈的巴马公爵的确对这一交易置若罔闻，波拿巴搁下此事直到公爵死后才办。波拿巴的代表在意大利各地都享有很高的权威：布律纳在米兰，儒尔当在都灵，德让在热那亚，萨利切蒂在卢卡，克拉尔克在佛罗伦萨，莫罗·德·圣麦利在巴马，阿尔基埃在那不勒斯，缪拉在罗马——在这里，1800年2月在威尼斯举行的教皇选举会选出的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已接着在夏天即位。象半岛上其它王侯一样，教皇完全在拿破仑的控制之下。马伦哥战役和二百八十五年前的马利尼亚诺战役一样，将会在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缔结教务专约的谈判。

从一开始，波拿巴就象快刀斩乱麻一般，一举而解决了意大利这个疑难问题。他不是为了确定征服自然疆界的战果，并为巩固这个战果准备与奥地利言归于好，而是超越了法国的自然疆界。波拿巴既是西沙尔平共和国的创建者，如果不把它据为己有，对他个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他远不是就此止步，他明确表示要把奥国赶出意大利；同时吕内维尔和约还为法国在德意志与奥国相争提供了法律根据。如果波拿巴坚持这些意向，则欧洲大陆的媾和只能是暂时的休战而已。

二、武装中立联盟与英国的危机

在夺去英国的盟国的同时，波拿巴也力图直接威胁英国。在保罗一世的协助下，他开始策划大陆国家反英联盟，这是以后在提尔西特成立的体系的雏形。

1800年期间，波拿巴开始改组海军的后方勤务和发展海军军备，特别在布勒斯特是如此。在吕内维尔条约签订之后，他建立布伦大营准备登陆英格兰。此事在英国即使没有引起英国政府不安，也立即引起公众舆论的惊慌情绪。1801年8月纳尔逊曾先后两次进攻由拉图什-特雷维尔率领的法国小舰队，但是遭到惨败。由于荷兰在海上已不能有所作为，波拿巴就对西班牙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在意大利扩张自己的势力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西班牙，因为波拿巴后来宣称，谁控制意大利，谁也就控制西班牙：这令人回忆起十八世纪和家族条约的政策。然而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室没有参加恢复这一政策并不取决于波拿巴。但是，1802年出现的费迪南四世的儿子和

一位西班牙公主、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和那不勒斯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两桩婚事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希望。

不幸的是，波拿巴同督政府对西班牙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也同样鄙视这个有着异端裁判所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宠臣戈多伊；在乌尔基霍于 1800 年 12 月 13 日失宠后，戈多伊通过塞瓦略斯，恢复了对国事的控制。因此，波拿巴蔑视地对待他们。他相信这个王国是极为富有的，所以对它提出很多要求；它提供得迟缓就认为它是不情愿。同时，他的左右亲信也把西班牙视为掠夺的对象。塔列朗勒索了大量贿赂，与贝尔蒂埃分赃。他从不错过任何机会来表示他对查理四世的仇恨，而查理四世也从不掩饰对他的蔑视。乌弗拉尔也在期待着从西班牙获得巨富，他一直与埃尔巴斯保持着联系；此人是居住在巴黎的西班牙银行家，他的女儿嫁给了迪罗克。光靠西班牙舰队本身对抗英国是不行的，由海军上将格拉维纳率领的主要舰队仍然停泊在布勒斯特。然而，在西班牙的那边，英国的“采邑”葡萄牙是脆弱的。吕西安·波拿巴被派往马德里去说服西班牙人进行联合远征。这件事结果成为一场真正的喜剧。心抱怀疑的戈多伊没有等待法国军队。他在 1801 年 5 月 16 日占领了奥利范萨要塞，5 月 18 日围攻埃尔瓦什。在结束了这场“橘林之战”以后，他立即着手签订和约。和约的条件是由葡萄牙割让奥利范萨省，并答应给西班牙一千五百万法郎赔款。吕西安曾参与其事，他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巴黎。塔列朗也伸手捞一把，因为他已被葡萄牙收买，并且曾是改嫁给葡萄牙大使的弗拉奥夫人的情人。甚至英国也准备必要时占领巴西而从这一局势中牟利。英国拒绝给若奥亲王——他以他的疯癫的母亲的名义做了葡萄牙的摄政王——和他的大臣科蒂尼奥提供军事援助，只是劝他们为避免国土沦陷而求和。多方的愚弄激怒了波拿巴，但是恼怒毫无用处，他除了把赔款数字提高到二千万法郎外别无他计可施。

波拿巴得到的援助主要来自日益敌视英国的保罗一世；同时也来自追随俄国的榜样的中立国。同督政府的政策相比，波拿巴对中立国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节制，这种节制令人难以预测到大陆封锁。从 12 月开始，他就废除了他的前任的过激措施，恢复了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国所采取的态度；此外，他在有关海上捕获品的裁判权方面也做了某些变动。美国使节很快到达了法国。他们是亚当斯总统为急欲避免战争而同意派出的。既然法国承认除战时禁制品外，中立国旗可保护敌货的原则，所以双方很容易达成协议，并于 1800 年 9 月 30 日在莫尔丰塔尼缔结了一项条约。美国人尤其切望波拿巴不再坚持 1778 年的联盟，这样他们就可以遵循华盛顿一贯叮嘱他们的孤立（不卷入）政策。波拿巴的态度使得英国的态度在斯堪的那维亚人、普鲁士人和俄国人看起来更令人生气。此外，保罗一世越来越担心马耳他的命运。他于 8 月 29 日宣布对英国所有船舶的封港令，当他听到马耳他岛已经失陷时又重申了这一禁令；此外，格伦维尔于 10 月 17 日决定保有马耳他。最后瑞典和丹麦追随俄国并于 12 月 16 日同俄国一起组成了保护中立国贸易联

盟。普鲁士于 12 月 18 日参加了这个联盟。这样英国就从波罗的海被排斥出去；在防止法国占领的借口下，丹麦人占领了汉堡，普鲁士占领了汉诺威。这样就有效地阻止了英国在德意志各河流和汉撒各城市的贸易。而德意志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却是英国的两个主要市场。

波拿巴殷切地希望保罗一世的反英步骤不会到此为止，并且希望一个法俄联盟将正式联合欧洲大陆来对抗英国。从 1800 年 7 月起，他就提出把法国扣留的俄国战俘交还给沙皇，不是作为交换，因为俄国人没有扣留法国战俘。为此目的，斯普连格波尔琴被派往法国。12 月在波拿巴和保罗之间同时交换了一些友好信件；前者命令中止对俄国船只的敌对行动，后者驱逐了路易十八。然后在 1801 年 3 月科利切夫被派往巴黎签订和约并商讨成立联盟的条件。保罗激烈反对英国，他决定要远征印度，并派出哥萨克骑兵先锋队向中亚草原进军。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意放弃他已经到手或可能攫取的利益。罗斯托普钦向他呈递了一个重新安排欧洲的计划：俄国和奥国瓜分土耳其帝国，并且创建一个置于俄国保护之下的领土辽阔的希腊国。保罗一世仍然垂涎马耳他；他期望法军撤出那不勒斯王国，并且恢复撒丁国王的王位；他还保持着对德意志的保护权。可是波拿巴既然已经拒绝把意大利交给奥国（这样做将会保证和平），也不会把它让给俄国的。他也更不准备把“土耳其大皇帝”交给俄国控制。那么波拿巴不给俄国任何好处，又怎样能争取到俄国呢？何况事实上科利切夫同稍后在 7 月接替他的马尔科夫一样，不仅是保罗一世的、而且也是仍然非常敌视法国的俄国贵族的顽固代表，他把保护意大利各王侯的利益视为一个荣誉问题。波拿巴必须作出抉择。但是就英国而论，前途依然非常危险。

英国的工业遭受了 1799 年危机的打击，这一年的收获又造成饥馑：1800 年至 1802 年间英国进口了将近三百五十万夸特的小麦；在这种情况下，武装中立联盟所给予它的打击就更加沉重。波罗的海航运的中止引起了谷物市场的恐慌，1801 年 4 月 25 日，每夸特小麦涨价到一百五十一先令。一磅面包的价格高达五辨士以上，相当于七个法国苏。虽然议会针对这类情况发布法令采取了通常所采取的措施，可是到处发生了骚动；因为人们认为谷物涨价应归罪于投机买卖，而实际上是农民联合起来维持高价。那些诸如号召“面包或血”的威胁性的标语，被认为是雅各宾主义和法国宣传的产物，激怒了公共舆论。与此同时，财政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形势：1801 年黄金升值百分之九，白银升值百分之十七；英格兰银行的现金储备再次减少到四百五十万英镑；对盟国的补助金（五百六十万英镑）连同维持驻防军的费用（二百八十万英镑），以及购买粮食的款项共达二千三百三十万英镑。这笔钱于 1800 年和 1801 年流入大陆。1801 年，英镑在西班牙的外汇损失了几乎百分之十六，在汉堡损失了百分之十三。但是不论是贵族还是商人都赞成提高所得税。在这些情况下，如同 1797 年一样，和平很快又变成了人民普遍的要求，福克斯则利用了这一点。1800 年 10 月 9 日格伦维尔的兄弟写道：“面包的

缺乏和由此引起的穷人的困苦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我相信，它会迫使你——不管愿意与否——要与法国讲和。”《每月杂志》指出，“既然那种要饿死法国国民的人道的和值得称赞的政策不能实现，也许试图用媾和来防止我国人民饿死可能是善策。”

皮特和格伦维尔对是否应与法国议和举棋不定，然而一个内政事件却使他们幸免蒙受被追求和之辱。合并爱尔兰既已实现，英国政府就应兑现默许天主教徒的废除“宣誓条例”的诺言。然而9月30日，大法官拉夫巴勒宣称反对取消“宣誓条例”；他的意见在全体新教徒中立即赢得共鸣，而且国王也公开宣称他持有同样的意见。内阁为此争端而陷于分裂，皮特于1801年2月5日提出辞呈。国王那时召见了阿丁顿，让这样一个平庸的人组织政府，以保证自己在处理政务中有更多的影响。这些麻烦引起乔治三世的疯癫症复发。但是很快就复原了，他把发病归咎于皮特。急欲恢复自己职位的皮特厚颜无耻地答应，国王在世期间永不再提及天主教问题。可是，格伦维尔拒绝收回原来的承诺；而且，由于阿丁顿不愿意让位，皮特于3月14日被迫辞职。可以想像，皮特下台虽然不无耿耿，但当时的形势，使他未尝不稍感宽慰。新任外交大臣霍克斯伯里2月21日就向法国提出了开始和平谈判的建议。阿丁顿政府是由于皮特的容忍才得以继续存在，它的政策，包括亚眠和约的签订，都得到了皮特的赞成。据认为，皮特看到和平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乐得逃避签订和约的责任。

霍克斯伯里和塔列朗的谈判立即在埃及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他不反对让法国人呆在那里；他甚至发出了召回开往埃及的远征军的命令，然而这一命令到达得太迟了。但他想要保留英国的大部分征服地做为补偿，而塔列朗却不动声色地只同意交出印度！实际上，英国的建议只是助长了波拿巴指望联合俄国以摧毁英国的希望。而另一方面，阿丁顿虽然决心谈判，但却期望着产生一种较好的结果，说不定缔约的过程会对英国产生有利的结果。果然这种拖延策略有利于英国。

三、亚眠和约（1802年3月25日）

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打破了大陆联合的迷梦。1801年3月23日夜间，保罗一世被暗杀。这个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外。因为与英国的绝交会使俄国贵族失去他们出售粮食和木材的市场，所以，保罗一世的残暴和变幻无常的性格威胁着所有的官员，已被他这种性格所激怒的俄国贵族才被迫采取了这一行动。这一阴谋是由潘宁、帕伦与亚历山大共同策划的。皇太子似乎曾提出要求：不要伤害他父亲的生命。后来他表现很悲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幻想是十分天真的。亚历山大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谋求与英国和解。

但是，同月28日，以帕克为司令、纳尔逊为副司令的舰队开进松德海峡。哥本哈根遭到炮击，丹麦舰队遭受严重破坏。于是，丹麦缔结了停战

协定，并且在获悉沙皇死后，于5月28日签订了和约；瑞典也已于5月18日签订了和约。6月17日亚历山大也采取了同样的步骤。这样，第二次武装中立联盟就结束了；它于冬季成立，虽未使英国受到很大物质损失，但它确实给人们留下了不能立即忘却的印象。波拿巴唯一可做的事情只能是与俄国和好。10月8日，亚历山大正式同意恢复和平。他获得了对他父亲在地中海和土耳其开创的局面的承认：在地中海，他保留了对爱奥尼亚群岛的保护权和在科孚岛的驻军；在土耳其，波拿巴承认他为土耳其苏丹的调停人。法国也同意在埃及问题解决之后撤出那不勒斯，并且同意以符合形势要求的尊重态度对待撒丁国王。最后，德意志问题还要通过共同协商来解决。总之，波拿巴几乎把从保罗手里诈取来的一切都让给了亚历山大，并且，除了换取到一项和约之外，他毫无所得。对波拿巴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失败。

在埃及的冒险得到的又是一个失败。离开埃及时波拿巴任命克莱贝尔将军继任。后者决定一俟撤退协定签字，他将继波拿巴之后尽快返回法国。克莱贝尔同率领土耳其军队从叙利亚前来的优素福宰相以及英国的西德尼·史密斯于1800年1月24日在阿里什会晤，并达成了一项协定。但是英国舰队司令基思拒绝承认这一协定。克莱贝尔于3月20日在希里奥波里斯彻底击溃了土耳其军队。不幸的是，克莱贝尔于6月14日被暗害。他的继任者梅努将军没有威信，他改信伊斯兰教也未能提高他的威望。他经常和部下争吵，并让士兵评理。为了尽力挽救这支军队，波拿巴派冈托姆率领的舰队增援梅努。这支舰队于1801年1月23日从布勒斯特启航，它是几乎不会遭遇敌人的攻击的，但却胆怯地驶进了土伦港。当舰队于3月底重新启航时，英国远征军已经在埃及登陆，冈托姆就退却了。4月底他又出航，试图使他的援军在黎波里登陆，那里的帕夏已经同意签订一项条约，但是因为阿拉伯人持反对态度，以致谈判失败。当时埃及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在马耳他被攻占后不久，邓达斯就已命令准备派艾伯克龙比指挥的远征军开赴埃及。这支远征军于3月6日登陆，3月21日在卡诺普击退了梅努的进攻。由于波帕姆的舰队控制着红海，韦尔斯利派来的六千名印度士兵到达了库赛尔；与此同时，二万五千名土耳其军队取道苏伊士地峡进去。6月28日开罗投降，8月30日亚历山大港被英军攻陷。

七月末，当第二次武装中立联盟解体、波拿巴图谋进攻葡萄牙失败后，他提出了新的和平建议。根据这个建议，交战各国要相互归还各自的征服地。但唯一例外的是荷兰将会失去锡兰，并开放好望角作为国际贸易通道。总之，法国愿交出埃及，对于埃及的归属，波拿巴虽然故作镇定，但是埃及的丢失已成定局；而另一方面，法国将保留它在大陆上的全部征服地。英国要放弃马耳他、梅诺卡、厄尔巴、特立尼达、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实际上还要放弃埃及，而只保留锡兰。虽然英国已经又处于有利地位，这个不平等的建议足以使它感到不满，但除锡兰外它只是提出保留特立尼达的额外要求。它仍然很注意要搞好同亚历山大的关系，所以，并未提出反对归还马耳他，

虽然英国只要提出给那不勒斯和撒丁以保证就能讨好亚历山大。然而，它并未为此目的而作出努力。霍克斯伯里只是在关于荷兰问题上试图得到保证，并且要求一个强国为马耳他提供驻防部队，这样，这一强国就会成为马耳他中立的保证国。这个极好机会使法国可以提名俄国为保证国，并使俄国与英国恢复竞争。但波拿巴对此机会并未予以重视。当他威胁说如果不在这些预备条款上签字就要中断谈判时，霍克斯伯里于1801年10月1日让步了，甚至没有为奥伦治公爵要求补偿，或要求签订通商条约。

人们曾把这种投降解释成是由于阿丁顿内阁的无能所致，但这一理由很不充分。实际上，英国政府仍旧处在危机的压力之下，这次危机在这一年的头几个月就出现了，现在全国各地仍然感到它的影响。这个政府无论如何需要实行节约，并且指望和平可以恢复繁荣。公众听到和平消息所反映出来的欢欣鼓舞表明要求和平是压倒一切的意见。然而在议会和新闻界却提出了抗议和保留意见。温德姆大声疾呼反对这一“致命的条约”，他认为这是个“亡国判决书”，这一条约将会使波拿巴得以进行新的征服。阿丁顿反驳说，既然暂时不可能组织新的反法同盟，最好还是试行一种和平政策；而心满意足的法国或许会关心这一政策。反之，如果法国不信守和约，英国总会再找到盟国的。卡斯尔雷在一封信中表示了同样的意见。皮特赞成政府这一政策，他于11月3日提出令人吃惊的解释说：特立尼达要比马耳他具有更大的经济利益，而保留马耳他就不可能恢复和平；在他看来，锡兰似乎比好望角更可取。他十分重视特立尼达，因为那里生产糖并且是与西属美洲进行走私贸易的重要基地。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重商主义观点对于战争目的的影响，这种观点一直支配着英国寡头统治的政策。对英国而言，和平不只是一次休战，而且是商人的一次试验。

不久，明眼人就看出，获得持久和平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波拿巴在向圣多明各派遣军队（1801年12月）；1月他就成了改名为“意大利共和国”的西沙尔平共和国总统。在讨论条约最后文本时，波拿巴拒绝在条约内列入一项贸易协定，而要求某些殖民地的特权，要求开放印度自由贸易以及在福克兰群岛的停泊站。这些要求虽然被拒绝了，但却引起了很大的注意。然而阿丁顿仍然坚持他的方针。可以肯定，后来在亚眠的谈判中，英国利益因为英国政府及其代表康华里的无能而再次受到损害。康华里是一个诚实的人，一名勇敢的军人，但却是一位不高明的外交官。为换取和平而付出代价的法国各盟国，特别是巴达维亚共和国的席梅尔佩宁克，是会乐于支持康华里的，但是直到这些盟国同意初步条款之后，波拿巴才准许他们参加会谈。

会谈中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法国的征服地和马耳他问题上。波拿巴要英国承认那些新成立的共和国，英国也愿意承认，条件是他对撒丁国王做“一些让步”。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一无所获，英国就拒绝了。波拿巴随后宣称：如果“英国的贸易因此而受到损失”，如果这些国家之一想要“与某个主要大陆强国”合并的话，英国就没有理由表示不满。这是一个不祥之兆！至于马

耳他，英国接受了塔列朗建议的列强集体保证，然而拒绝同意拆除其防御工事，主张这个岛应由那不勒斯派出驻军，直到重组的圣约翰骑士团能获得足够的力量保持这个岛的独立为止。既然从英国人手中夺得马耳他，波拿巴看到成功已成定局。但是，交出马耳他所附加的条件很多，英国人其实也没有理由感到十分不满，并且他们还等待着事态的发展。英国政府训令康华里坚持其余两点：第一，割让多巴哥作为维持法国战俘费用的补偿；第二，赔偿奥伦治亲王。可是，波拿巴坚决拒绝放弃任何法国领土；至于“奥伦治-纳骚”家族，他说，有关赔偿的谈判正在柏林进行。这个家族的继承者，第一执政的伟大赞美者，表示愿意直接与波拿巴交涉，于是便离开了英国。这样康华里就于1802年3月25日签署了和约。

英国公众舆论虽然比以前有些淡漠，但还是满意的；这个岛国许多居民成群结队奔往法国，想对一个为许多重大事件所改变了的，并被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统治着的国家进行一番好奇的考察。虽然政界的批评日益增多，但议会此次仍然跟着政府走。

作为民族领袖，波拿巴在签订亚眠和约时已经达到他的命运的顶峰。欧洲已同意放下武器，不再反对他对自然疆界的要求。但是他那种一遇机会就一发不可收拾的权力欲，未能使他对这样的成就感到满足；而法国在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时，如果只关注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利益，它本来会对这些成就感到满意的。波拿巴如果停止干扰英国在海上和殖民地的事业，同意对英国贸易重新开放法国市场，并且满足于对其邻国施加他力所能及的、而又为法国疆界安全所需要的合法的影响的话，那末法国将一无所失。然而，甚至在亚眠和约缔结以前，波拿巴就已表明，他并不是这样理解问题的。

四、附庸各国的改革

实际上，法国在没有确实肯定这些屏障其疆界并被它占领的国家能自卫和自治的情况下，是不能够听其自然，不加过问的。现在，在法国使得这些国家实行了政治的和社会的变革之后，它们就难于靠自己的力量建成国家了。在许多附庸共和国中，拥护强大中央政府的联合派在政府组织的原则问题上就不能同联邦派意见一致。荷兰的情况是如此。西沙尔平共和国也是如此：奥罗纳郡的居民，也就是梅尔齐伯爵统治下的米兰人与波河南部各邦的居民，即由阿尔迪尼领导的艾米利亚人经常争吵。瑞士的情况就更加如此，各州都一直念念不忘丧失了自治地位。

显得更严重的是社会冲突。雅各宾民主派变得十分活跃，他们在自己的俱乐部里慷慨陈词，任意嘲弄贵族和教士。他们虽然只不过是少数，但却是法国人最好的朋友，他们求助于法国人，并且非常乐于按照法国人的意愿行事。象荷兰的席梅尔佩宁克、瑞士的厄斯特里和伦格尔、热那亚的科尔韦托等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及那些象西沙尔平共和国梅尔齐·戴里尔那

样归附新政府的贵族，都在不同程度上热情赞成统一和新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反对民主，并且希望象在执政府时期的法国那样，确保新贵名流占有优越的地位。然而他们在是否赞成共和八年宪法取消选举制度的正规运用这一点上，看法并不总是一致的，特别是在瑞士是这样。虽然他们感到需要依赖法国，他们也不是那么顺从的。在荷兰和瑞士，他们要求法国维护他们国家的完整；在各地人们都希望法国撤兵，希望独立，至于贵族阶级，他们盼望着法国战败，以便旧制度复辟；为达此目的，他们会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国家交给其它外国人。可是由于法国人在那里，所以他们便只好充当爱国者的角色。只要波拿巴不干涉他们，他们就愿意顺从。

除这种党派斗争外，预算上的困难也使得政府无法正常地维持下去。战费和占领费的负担从一开始就使财政遭到破坏，经济陷于瘫痪。拥有四百万居民的西沙尔平共和国向法军交付了三千三百万法郎，并为法军提供了估计总值为一亿六千万法郎的军需品。此外，军队也随意为自己征收附加捐税，将领们，特别是缪拉，对本地政府专横跋扈。象驻在荷兰的塞蒙维尔那样的文官们，同样也不是廉洁的。法国文武官员都干预地方政治，并且根据自己偏爱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因此来自各方的请愿者都要求波拿巴按照他们的意愿来改组国家，或者要求减轻他们的负担并惩办他自己的部下。波拿巴象在法国一样可以任意对待这些派别：他憎恨民主派，不信任那些对法国保持强烈独立性的温和派，也不想重建贵族统治。只要尚未同仍然希望收回他的属地的罗马教皇缔结教务专约，只要与英国的战争仍在继续，波拿巴就要持保留态度，而在这一点上他万无一失。因为这些国家形势越坏，他的事情也就越好办；而且，只要占领继续下去，他的军队就不需要他拿出费用。只是在恢复海上和平的初步条款签订之后，情况才开始变化。

在荷兰出现了一些反抗现象，那里的法国代表塞蒙维尔经荷兰的督政府同意起草了一部宪法，以便使政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他依仗自己的权势把这部宪法提交公民批准，但立法议会取消了这些不合法的决定。奥热罗解散了议会两院，宪法就提交给公民投票表决。由于宣布弃权就被视作为赞成的表示，结果获得了多数票。宪法于1801年10月6日颁布。由宪法产生了一个拥有立法创议权和行政权，包括对官员的任命权的“政务会议”（即摄政会议），还产生了一个立法院，它的成员经过两级选举产生，每年更换三分之一。事实上，督政府亲自指定了十二名政务官中的七名，其余的则由这七人互选产生；它还遴选了立法院的成员。正象波拿巴所希望的那样，新政府由各派别混合组成，但是清除了民主派、并把所有的官职授予新贵名流。

在波拿巴想亲自统治的意大利，改革工作花的时间较长一些。1801年7月间，西沙尔平共和国派遣代表团到巴黎，诉说了国内难以容忍的形势。10月，大家同意在里昂召开一个“协商会议”，以期建立一个新政府。这个“协商会议”由当然委员、政府选拔的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代表，以及由法院、商会、大学、郡政府和市政机关选出的代表组成；这些人都是在缪拉的密切

监视下选出来的。1801年12月29日，四百四十二名代表在里昂会合。塔列朗在会议前夕到达，他把代表们按地区分成几个组，来研究宪法草案并拟出“可以信赖的候选人名单”，从名单中再选出新人员。他煽起了地方主义的冲突，以便由波拿巴出面裁断。波拿巴于1802年1月11日到会，同往常一样亲自调查情况，并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他考虑要把西沙尔平共和国总统职位交给约瑟夫，但是这个重要人物拒绝了，因为波拿巴没有把皮埃蒙特一并交给他。1月21日负责选举总统的委员会选出了梅尔齐伯爵和阿尔迪尼伯爵，但是他们两人也都拒绝了。1月24日，总统职位交与波拿巴，他就接受了，并任命梅尔齐为副总统。两天以后，他把“西沙尔平共和国”改名为“意大利共和国”，这样就激起了人们的巨大的希望。新政府定于1802年2月9日成立。行政当局象在巴黎那样行使特权；它包括一名国务秘书和各部部长。此外，总统还亲自从三个选举人团提名的候选人中指派立法议会的成员。但是这一次，当然是波拿巴亲自建立了立法议会和选举人团。最后，还给意大利共和国建立了一个叫作“国务协商会议”的独创机构。这是个永久性的机构，负责处理外交及国家安全等事宜。在热那亚，1802年6月颁布了由萨利切蒂于1801年10月起草的宪法。在那里波拿巴任命了元老院的成员和一个“总领政”，二者构成行政权力机构。本应由三个选举人团选举的咨议院从未组成过。卢卡于12月28日成立了类似的机构。

黑尔维谢共和国的历史更是动乱不安。1799年11月间，拉阿尔普向他的同僚建议发动政变，没有得到他们的赞同。得到消息的立法议会予以回击，在1800年1月7日宣告解散督政府，把权力委托给一个执行委员会，多尔德在其中起着支配作用。这个委员会很快地和议会发生了争执，并要求波拿巴解决。1800年8月7日，被法军包围的议会投降了，并由议会成员组成临时政府负责准备一部新宪法。这一政变是由温和的联合派搞的，他们赞成单一制国家，更重要的是，他们都鼓吹由新贵名流来统治。他们反对雅各宾派，寻求旧贵族的支持，宣布暂时中止实行关于废除什一税、地租和封建赋税的法律，然后又宣布废除这个法律，只保留农民可以出钱赎买这些封建义务的权利。1801年1月，这些温和派制订了一个更具有单一制特点的宪法草案；根据这个草案，政权各机构的成员要通过互选产生。由于他们坚持要求把伐累和巴塞爾主教邦归并瑞士，法国政府代表雷因哈尔建议，在贵族的支持下煽起一次新的革命。波拿巴没有批准这个建议。他完全拒绝了这个宪法草案，并在1801年4月29日提出了一个被称为“马尔梅松条例”的草案来代替原来的宪法草案。这个条例是后来的“调停条例”的雏形。波拿巴感到联邦主义在瑞士非常根深蒂固，因此不得不给予各州一大部分的主权。不过，大概是由于波拿巴有意从瑞士撤军以便从中立中获得好处，因此他不赞成有一个实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的瑞士，因为这样会使这个国家变得过于强大。依照“马尔梅松条例”的规定，给予十七个州相当大的自治权，并允许它们制定自己的宪法，条件是要规定有财产资格的选举权。联邦议会

选出一个二十五名成员的元老院，他们再在自己中间选出两名“首席长官”，一名主持元老院，另一名与其它四名元老院议员一起组成一个小委员会，行使行政权。中央联邦当局保持着广泛的权力，特别是有任命各州行政长官的权力。

这样的解决没有使任何人满意。联合派在议会中确保多数，把要脱离中央的联邦派从元老院中排除出去，并拒绝执行马尔梅松条例，而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他们甚至公然对抗波拿巴，把伐累德的议员拉进他们的圈圈。1801年10月28日，法国的代表韦尔尼纳克和舒万·德·蒙舒瓦齐将军宣布解散议会，并建立了一个由贵族中最有才干的人物雷丁领导的临时政府。雷丁清洗了行政机构、压制了出版自由、大赦亡命者、取消了土地税，并重新开放了隐修道院。波拿巴拒绝承认他，要他给温和派以地位，这就在会议中掀起了不和。雷丁的巴黎之行一无所得，于1802年2月26日凭借自己作为首脑的职权颁布一部新宪法。可是在复活节休假期间，韦尔尼纳克趁雷丁不在的机会，策动雷丁的政敌废除了这部宪法。接着召集名流会议，议员最后于1802年5月29日承认了马尔梅松条例，并且任命了多尔德为“首席长官”。伐累州被建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普斯河谷则割让给法国。

这些变化与法国发生的变化有着明显的联系。共和八年宪法到处都在激励着新贵名流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夺取了权力。行政权在各地都得到了加强，从而有助于建立秩序和稳定局势。在各地，波拿巴都要求撇开民主派，并要求努力使温和派与善意的贵族和解。但是，在意大利，波拿巴把自己看作主人而不是仲裁者，他透露了他的秘密的偏爱，这是他在法国所从不敢公开表示的，更不用说在荷兰或瑞士；在那些国家里他还要保持真正的选举，以待将来再改。在意大利的宪法中，选举人团决不是在投票的基础上，甚至不是在只限于财产资格投票的基础上产生，而完全是由职业团体产生的：第一个团体包括一定数量的土地所有者，第二个团体包括商人和工厂主，第三个团体由各自由职业成员组成。前两个选举人团由他们的成员互选补充；显然是具有“空论”倾向嫌疑的第三个选举人团只限于向政府提出候选人名单。现在只差一步就告成了：这就是直截了当地由国家元首任命选举人团成员。

就事论事，毗邻法国的这些国家的改革本来丝毫没有引起欧洲不安的理由。相反地，人们希望，在使得这些国家能够自己治理自己以后，法国会召回它的军队，并给这些国家以独立，这是法国在吕内维尔和约中——其实没有确定具体细节——已经答应过它们的。事实上，波拿巴于1802年7月的确下令从瑞士撤军；他也同意减少在荷兰的驻军，奥伦治亲王在5月24日已放弃了他的权利要求，他提出把德意志的富耳达和科韦割让给他的儿子作为交换条件。不管怎样，这足以被认为是一个未来撤军的希望。在意大利共和国，梅尔齐希望迟早能得到同样的好处，因为波拿巴亲任总统只不过是暂时的。今天在我们看来，这些纯粹是幻想。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幻想，阿丁顿

和皮特同意冒险一试的道路就会缺乏存在的理由。

第三章 波拿巴就任终身执政

胜利与和平已使波拿巴成了一位民族英雄；他利用了这一时机更加增强自己的权力，并继续推行个人的政策。正因为对他的功绩感到满意，全国才愿意跟他走；但是，正当和平的局面有利于恢复自由的时刻，他却加强了独裁统治，因此全国不免出现遗憾和焦虑不安的情绪。无论如何，反抗增加了，只有依靠重新使用武力，波拿巴才能够镇压这些反抗。

一、共和九年的危机

波拿巴出发去意大利之后，法国全国上下忧心忡忡。他的战败可能会引起外国军队的入侵，而且肯定会引起新的骚乱，因为从共和七年收获季节以来面包价格再度上涨；在图卢兹一次骚动期间，群众强迫限制粮价。在巴黎交易所，价格正在跌落。马伦哥战役胜利的消息象魔术般地使舆论又平息下来，同时使波拿巴的威望扶摇直上。波拿巴重视报纸的威力并善于利用新闻工作，他从来没有放松过为自己制造舆论。在他的心目中，自豪和抱负会自然地把真相变成传说。他出版了一份《后备军通报》，这份通报和《政府通报》及其它半官方的报纸都把整个战役的荣誉归之于他个人。莫罗在霍恩林登战役获胜的消息来得太迟了，不能减弱波拿巴的威望；除此之外，他还想方设法压制这次战役胜利的影响。由于运气比天才更能迷惑人，并使人产生某种迷信的敬畏，所以，倘若人们知道了马伦哥战役的真相的话，波拿巴的名声必定会更加响亮。马伦哥的赌博并没有减低那个曾两次奇迹般地逃过了英国巡洋舰的人的声望。

与此同时，波拿巴在听到他不在法国期间的议论和正在策划的阴谋之后就赶紧返回巴黎。1800年7月2日，他进了巴黎城。内心忿懑不平，非常怨恨他的左右亲信，对那些曾想伺机取代他的将军们充满敌意的猜疑；而现在紧张的努力松弛下来，危险已成过去，这次冒险的悲剧性一面使他深深感到自己的地位是如何脆弱，因此他又充满着浪漫主义情调的感伤。但是，类似的感想从来只能使他心情郁郁而意志更坚。他毫不迟疑地利用了他的政敌陷入一片混乱的时机。

保王党立刻土崩瓦解。他们发动叛乱的种种准备，只剩下了几伙盗匪。威克姆溜回到英国，设在奥格斯堡的王党机关作鸟兽散；该机关某些成员妄图在拜罗伊特重新纠集起来，但是富歇命令普鲁士警察把他们逮捕入狱。英国中断了对它所雇佣的孔德亲王军队的资助，并且解散了这个队伍。1800年9月7日，波拿巴终于答复了路易十八：“您不应该再期望回到法国来，如果您要回来，就非踏过十万死尸不可。”这位国王从米塔瓦被驱逐之后，躲在华沙，后来又从华沙到了英国。波拿巴和保王党之间彻底决裂了。

共和派也很清楚，波拿巴的胜利会给他们钉上枷锁。在波拿巴的左右亲

信中，有许多曾盼望他阵亡或垮台的人，现在他们变得更加热切地向他建议，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必须重建世袭君主政体，以使他的权位具有原先缺乏的稳定性。他们之中最积极的是罗德雷和斐扬派，这些人虽然已经归附了共和国，但是他们骨子里还是君主主义者。塔列朗自然是支持他们的。一贯狂妄的吕西安·波拿巴抛出了一本题为《恺撒、克伦威尔与波拿巴之间的对比》的小册子，首先说出了其它人不敢说的话。这本小册子可能是他叫丰塔内写的。第一执政一回到法国就指派丰塔内在华盛顿逝世时发表一篇悼辞，他从此官运亨通，更不必提他已是埃利莎·波拿巴的情夫了。但是，所有这类活动都遭到了反对。富歇虽然同各界各派都有联系，甚至在圣热尔曼郊区也因他的秘密效劳而博得好感，但他仍被看成是一个左派的领袖。这不是没有充分理由的。的确，他是一个对人不抱任何幻想的怀疑论者，爱钱贪权，总是首先为自己打算。但是他留恋自己革命历史的程度比人们想像的要大得多。首先，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精力旺盛而又沉着果断；他对恐怖镇压的爱好，虽然是审慎而有节制的，但却也是非常自然地适应他那警务部长职务的需要的。其次，他真诚地愿意尽其力所能及拯救法国革命的成果、并且阻止旧贵族重掌国家大政。最后，特别是他具有一种炽热性格，隐藏在恬静外貌下面，这种外貌掩护住他好讥评时政的习惯，尖酸刻薄的谈吐，和对充当国民公会特派员时期的眷恋，当时他也曾以至高无上的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波拿巴重视他的才能，但却对他心怀疑惧，他始终感到，富歇随时可能会闹独立性。在 1804 年以前，富歇对那些君主政体的计划都一直持敌视态度。他在波拿巴的家族中找到了支持。没有生下子嗣的约瑟芬担心世袭的王位继承制会导致离婚。波拿巴对自己家族的贪得无厌很不满；如果情况迫使他从自己的兄弟中间挑选继承人的话，他准备迎接一场大风暴。此外，他也不打算勉强从事，并且认为，这时有关君主政体的种种谈论都为时过早：和约还未缔结，国家的改革尚待完成，最后，议会各院还没有驯服。因此吕西安遭到贬黜，他的内政部长职务移交给夏普塔尔，而他受命出任大使。

尽管如此，波拿巴仍然在伺机增强自己的权力。几起谋反案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这仍然是马伦哥战役胜利的一个后果：那次战役之后，雅各宾派和保王党失去了一切希望，其中有些亡命之徒试图采取暗杀手段。从共和八年底及其后不久，相继破获了三起雅各宾派的阴谋：9 月 14 日，逮捕了三个人；接着又在 10 月 10 日逮捕了阿雷纳、托皮诺-勒布伦和其他二人；最后，在 11 月 8 日，又逮捕了谢瓦利埃和一名共谋嫌疑犯。这些阴谋真实与否却一直是个问题的。第二起阴谋似乎是背着富歇破获的，富歇觉察到自己处境危险，于是就大事宣扬第三起阴谋。正当政府在制定一项放逐雅各宾派的计划时，保王党粉墨登场了，这就大大地方便了这项工作的进行。6 月卡杜达尔从布列塔尼派了几个舒安分子到巴黎去组织一次运动。跟踪他们的警察只逮捕到其中某个马尔加德尔的小贵族，并把他枪毙了。圣雷让、利莫埃朗和卡邦三名阴谋分子竟制造了一颗定时炸弹。12 月 24 日晚，在波拿巴

到歌剧院途中，这颗炸弹在圣尼凯斯大街爆炸了，当时有二十二人死亡，五十六人受伤，但是波拿巴却安然无恙。在当时的舆论中，人们自然只能一致认为“此事是雅各宾派干的”。日益接近帝位的波拿巴尤其痛恨这些“弑君者”，他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12月25日，当议会各院祝贺他幸免于难时，他高声怒咒“那些败坏共和国声誉、并用各种过激手段，特别是他们在九月事件中__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用类似的手段来毁坏自由事业的人。”12月26日，波拿巴在参议院宣称：“血是必须流的”。事实上，稍后在1801年1月13日、20日和31日，早先已被逮捕起诉的雅各宾派不是被枪杀就是被送上了断头台。

然而，主要的结果还是，对雅各宾派的大规模逮捕，接着又未加审讯就流放了他们。从谋杀波拿巴那天夜里起，富歇确实一直把责任归咎于“英国金币”——他确实知道谁是真正的罪犯。利莫埃朗被耶稣会会士克洛里维埃尔和尚皮翁·德·西塞的姐妹窝藏起来，因而得以逃脱，后来他成了一名神甫，而卡邦则于1月8日被捕，圣雷让于1月28日被捕。但是已太迟了，何况，波拿巴也不愿改变他的既定目标。参议院拒绝对放逐表态，它声明这是一个“政府措施”。1月5日又作为“有助于维护宪法的一项措施”提请元老院批准这一行动，在一百三十名被放逐的人中有舒迪厄__和两名前议员塔洛和德特雷姆，波拿巴一直没有饶恕他们在雾月19日所进行的激烈抗议。其中还有一些著名的革命家，如被称为“美国人”的富尼埃、罗西尼奥尔和勒佩尔蒂埃。富歇用拖延时间的方法从中救出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二十六人直到1804年才被送往圭亚那、六十八人在1801年以后被运往塞舌尔群岛；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流放中死去。此外，其他的共和党人大批受到监视。同时，富歇也逮捕了大约一百名保王党人，有的被判刑坐牢，有的未经审判就拘留起来。至于卡邦和圣雷让终于受到审讯，并于4月21日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样，波拿巴主义的恐怖再次打击了左派和右派。“这是他从未背离过的唯一的一种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斯塔埃尔夫人的夫人写道，“这样他就以拉此打彼的手段在那些人中结交了朋友。”这一回左派成了打击的主要目标，可以说左派因此被彻底粉碎了。但是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雅各宾派。议会各院没有被召集起来就放逐法令进行投票，因为不能绝对肯定它们是否会接受这一法令。所以，波拿巴于12月26日宣称，“玄学家是造成我们一切麻烦的一类人。”十分明显地构成了对议会的威胁。此后，他又转求之元老院。作为“宪法保护者”的元老院却暗中赋予自己违犯宪法和更有理由的修改宪法的权利。结果，第一个“元老院决议案”在共和九年雪月十三日（1801年1月5日）通过。这些元老院决议案使波拿巴有可能不需要议会其他各院在法律上的赞助就可以亲自立法，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修改共和八年宪法，而这部宪法没有规定任何修宪的程序。

1800年11月间及其以后，在放逐雅各宾派的同时，波拿巴已在考虑采取某些镇压措施，这些措施虽然不那么令人注目，但对全国总的形势产生了

更大的影响。在他看来，问题就是要一举平息舒安分子的暴乱和制止抢劫。煽动起舒安分子暴乱的卡杜达尔那时正出没于布列塔尼一带的农村，虽然不断地遭到追捕，但是他却一直未被捕获。由于保王党人布尔蒙的帮忙，富歇终于成功地收买了卷入舒安分子暴乱的某些人，这些人奉命杀掉卡杜达尔或者把他交给警察。但是，布列塔尼的保王党有一个钻进政府各部的十分活跃的反警务的组织，因此，当两个名叫贝克德里厄弗尔和迪夏泰利埃的舒安分子叛徒被指派去杀害他们的头头时，卡杜达尔就得以先把他们逮捕处死，可能是伊尔-维兰郡的郡守博里亲自出卖了迪夏泰利埃。舒安分子的猖狂激怒了波拿巴。1800年9月23日，安德尔卢瓦尔的前郡守、元老院议员、国有产业的重要购买人克莱芒·德·里斯在他的歇尔河上的阿泽别墅里被绑架了，同时在11月19日，菲尼斯太尔郡的主教奥德利安被暗杀了。运送国库基金的车队不断遭到匪帮的袭击和抢劫。象在共和八年一样，波拿巴又采用了严峻措施。共和九年花月18日（1801年5月8日），派出了由贝尔纳多特率领的、并带有军事法庭的三个纵队。扫荡进展得很迅速。到年底，卡杜达尔返回了英国。即使如此，仍然有分散各地的舒安分子残存下来。除了少数死心塌地的人之外，大多数是把叛乱视为谋生手段的社会渣滓。

不管盗匪是假借宗教的或是国王的名义，这些人几乎到处都有。当然，他们不只限于在山区，如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有“巴尔贝”在搞走私买卖，就是象诺尔和博司这样富饶的地方也出现了盗匪。他们用火刑折磨遭难者勒索金钱，所以人们通常称他们为“火夫”。这并不是新现象；农村人口中有很多是一年里有一部分时间失业的零散工和依靠自己的微薄收成不能维生的农民，尤其在歉收年份更是如此。农村中总是有成群结队的乞丐和游民，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不法之徒。战争和国内动乱造成经济失调与乡间警政瓦解，使这种灾难更大大恶化了。农民比城市居民更加看重治安问题，因为他们一般更容易遭遇危险。既然治安是正常的和有成果的劳动的首要条件，因而，对于全国来说再没有比恢复治安更为有益的事业了。所以波拿巴的威望将因此大大提高，就象当年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一样。

困难不只是在要抓到强盗，都是让军队增援宪兵队就能办到的事，而是在于能做到依法判处他们。证人和陪审员都知道他们是易于遭到报复的，因此有些人保持沉默，另一些人从宽发落罪犯。共和八年，许多轻罪案件已改送法庭判处，并且已授权郡守监督遴选陪审员，而这个权力原属治安法官行使。但是效果却仍旧微不足道；何况镇压的迟缓至少部分地削弱了镇压的效果。在类似情况下，旧制度下王国政府曾借助于一种特殊的审判制度即“宪警法庭”简化手续就地判决正法：“拿获即刻绞死”。波拿巴也求助于一种非常手段，在西部、普罗旺斯和来因地区已设立军事法庭，他丝毫没有要废除这些法庭的意图。然而，他也愿意以永久而正规的形式恢复旧制度的简易的镇压办法。

这就是共和九年雨月十八日（1801年2月7日）法律的目的。这项法律授权政府在波拿巴认为适当的郡（他选定了三十二个郡）里，各设一个特别刑事法庭，由一名庭长、两名普通刑事法庭法官和另外五人（三个军官和两个文官）组成；这些人都由第一执政任命。他们对无业游民、积犯、与诸如此类人犯，以及大批惯盗犯罪如夜盗、路劫、凶杀、纵火、伪造货币、煽动性集会、非法携带武器等进行终审判决，不得上诉，也不得要求重审。次年，共和十年花月23日（1802年5月13日），在每个郡都设立了另一个特别法庭审理欺诈罪，但是在没有特别刑事法庭的郡里，这个法庭也可以审理多种盗匪案。此外，共和十一年葡月26日（1803年10月18日），根据一项元老院决议案，许多郡停止实行陪审制度；这样就使刑事法庭的法官实际上构成一种特别法庭，虽然还没有军官干预。总之，由于这些特别法庭一直保持到他垮台为止，波拿巴在法国的大部分地方都废除了陪审制度。由于特别法庭现在委任他们当中的一名成员进行预审，所以根据同一理由也就废除了起诉陪审团。最后，在还存在着正规的司法制度的地方，由于检察官职务的变化及诉讼程序的改革，司法制度也都加强起来。共和九年雨月7日（1801年1月27日）“保安法官”代替了初审法庭中的政府专员，其任务是起草公诉状；预审部分地变成了秘密的预审，证人在被告不在场时作证。原告和证人不出庭，目的是为了避开遭到匪帮的报复，因此起诉陪审团就只得根据书面证据来作出决定。

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波拿巴已成功地在农村迅速地恢复了井然的秩序。不管他怎样考虑，制止行乞和流浪并不是他力所能及的。即使是名符其实的盗匪也经过长时间之后才镇压下去。在来因地区，法国政府好不容易才逮捕到申德尔汉内斯——一个真正的“卡图什”，当地居民相当喜欢他，因为他特别喜欢袭击犹太人。尽管如此，但到了帝国的初年，情况已经无疑地大有好转。既然特别法庭不是用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它们触动的只是社会上的坏人和犯罪者，因此这种法庭没有遭到公众舆论的谴责。至于说到政治嫌疑犯，波拿巴通常用军事法庭来对付他们。新的司法改革不仅严惩了职业罪犯，还可以用来阻止那些走投无路的穷人被迫走上暴乱的道路，象在1789年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良善之辈”守法的公民不加区别地看待饥饿的暴民和罪犯，而共和九年的法律也是如此。这肯定是波拿巴所期望的，因为，据夏普塔尔说，他最害怕的是饥饿暴动。

在放逐雅各宾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建立特别法庭，这引起了议会各院中共和派的极大不安。保民院的辩论很激烈；立法院投票的结果是一百九十二票赞成，八十八票反对。对波拿巴不再抱任何幻想的共和派没有放过这一表示抗议的机会。尽管如此，还必须给他们以公正的评价：这些新贵名流赞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不是一个武断专横的政府，在他们看来，这些非常措施在执政时代并不比在山岳派统治下的国民公会时代更符合原则。然而波拿巴不愿受任何原则的约束，甚至不受宪法的约束。共和十年他在参议院发

表演讲时直截了当地说，“一部宪法决不应妨碍政府进行工作，也决不应逼得政府去违犯它……每一天都不得不违犯成文法，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不这样就不能前进。”“政府诚然不应是暴虐的……；但是它不可能不采取某些专断的行动。”简而言之，宪法只是为开明专制点缀门面而已。保民院的辩论也激起了波拿巴的愤怒。“在保民院中有一打或十五个只适宜扔到水里去的玄学家。他们是我衣服上的虱子。我是军人，是大革命的儿子，我决不容忍把我当成一个国王那样来侮辱。”于是，共和九年的危机导致波拿巴与捧他上台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之间的决裂。但是现在，波拿巴想要他们批准教务专约，而在他所有的重大措施中，他们最不赞成的恰恰就是这个教务专约。

这个议会反对派是自己委任的，因此在全国得不到支持。各个利益集团得到了满足，而且，和平和社会秩序的改善有利于商业的复兴。一家新的发行钞票的银行在巴黎创办起来，这就是通称为“雅巴银行”的商业银行。法兰西银行和它的竞争者所发行的钞票使得投机商能够把硬币拨到外地，从而能在地刺激经济发展。连年歉收引起了农产品价格空前上涨，这就提高了有土地的农民或佃农的购买力。在经历过督政府时期那样令人不满的通货收缩之后，这些人当然喜欢这一意外之财；他们感激第一执政，因为他表现出非常关注国家产品的产量，并且极力鼓励生产。国家财政状况也有显著的改善。军事征服有助于减轻预算的重担，因为法国军队现在能够在外国取得给养。租税在定期征收，共和十年的预算实际上表明，收支相抵还略有节余。在大城市中，城市通行税正在逐渐取代私人动产税，这就使得富人非常满意。至于地产税，政府正在研究在各公社之间确保较为公平地分配负担的方法。后来在共和十一年，每个郡里都有一些公社着手进行了可耕地面积的测量登记和净产量的估价工作。

国库的情况仍然引起人们的关切。共和十年热月30日（1802年8月18日），政府企图通过创办一个一般税收专员的办事处或联合会，而在国库部的工作中取消某些中间包税人，目的就是要迫使一般税收专员贴现他们自己的证券；但这一尝试失败了。票据继续在跌价中销售。然而，对于国民来说，主要问题是清算了债务。如同在督政府时期那样，清算债务是靠宣布破产来完成的。1797年发行的大大贬值的“三分之二”公债券，如果人们不愿意象以前一样拿来偿付购买国有产业，则可以随意以票面价值的二十分之一兑换成带有百分之五利息的政府统一公债。共和六年发行的公债和拖欠的债务非常缓慢地分别按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五的利息整理合并进政府公债中去。但持券人仍然很高兴，因为共和九年风月30日（1801年3月21日）的法令起码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好处；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结果在共和八年底的恢复最少对工资收入者和公务人员用现金支付薪水和年金。对于国家军需供应商，波拿巴高兴的时候就付给他们现钱。

这并不是说，对法国财政方面的信心很足。尽管还债金库采取了措施，但证券交易所中的政府公债的市价仍然很疲软。亚眠和约签订之后，利息百

分之五的法国政府统一公债的市价为四十八至五十三法郎，而利息为百分之三的统一公债在英国市价却在六十六至七十九法郎之间波动。但是，如果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可能被一次新危机所摆布的话，它是不愿意给波拿巴制造困难，从而促使这场危机早日爆发的。遭受痛苦的只是平民各阶级。共和八年收获之后，在巴黎，一个四磅重的面包价格上涨到十三苏。到了 1801 年，所有的食品都涨了价，因而也减弱了吕内维尔和约所带来的快乐情绪。共和十一年收成相当可怜，甚至在大面积耕作的地区情况也是如此。那年冬季，在巴黎，面包上涨到十八苏，在小城镇和乡间，每磅面包涨到七苏——和英国的面包价格相同。不再能出口粮食的布列塔尼的面包没有涨价，这是唯一的例外。

为了应付危机，波拿巴转而采取了旧制度曾用过的办法。警察厅长又重新把面包商组织成行会共同负责，而且强迫他们建立储备谷仓。这一措施的结果使许多小面包铺破产消失了。1801 年 11 月 17 日，政府授命夏普塔尔从国外购买粮食，但由于政府短缺钱财，因此就又一次要求助于银行家：五名银行家负责每月要弄到五万公担粮食，结果还是不够。共和十年花月，波拿巴起用了曾遭贬黜的乌弗拉尔。结果保证了巴黎的供应，面包价格保持在十八苏。这样做就得需要供应一百多万公担粮食，要化费二千二百多万法郎；由于粮食按低价卖出，使国家亏损一千五百五十万法郎。首都以外的地方又出现司空见惯的现象：乞丐成群结队，农民受到煽动，纵火案四起，市场经常发生骚乱。虽然面包比 1789 年还要贵些，但是这次动乱没有造成威胁性的形势，这是由于没有同时发生政治的和社会的骚动，同时也由于刚刚实行了加强镇压措施：共和九年雨月 18 日法律已产生效果。不管怎样，民众的骚动只能会促使有产者更加依附于波拿巴：他变成了社会的捍卫者。危机在共和十年的夏季达到了顶点，这正是波拿巴准备改任终身执政的时刻，这场危机大大有助于他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教务专约

然而，为了使社会秩序完全恢复，关键问题始终是要在国内解除反革命的武装，波拿巴很久以来就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罗马天主教会和解。那些顽抗派教士仍然是难对付的。执政们的一个特派专员从伊尔-维兰郡的雷东写道：“不能指望与拒绝宣誓的教士和解。”假如宗教和国家一直保持分离的话，他们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罗马天主教徒们是不会承认国家与宗教分离或信仰自由的；他们充其量只会接受宗教容忍，交换条件是要给他们一种特权地位；只有付出这样的代价，他们才会同意解除武装，起码暂时会如此。于是，波拿巴决定做到这一点。共和八年热月 30 日（1800 年 8 月 17 日）波拿巴在罗德雷面前斥责有些人“认为，只要神甫保持沉默，就应把他们扔在一边，不去搭理他们，如果他们捣乱，就把他们逮捕起来。这就好象

是说：“有些人在你的房屋周围举着火把，你别管他们，假如他们放火，就逮捕他们’。”那么该怎么办呢？“用照顾他们的利益的办法，把他们的首领争取过来”，而首要的是选择好这些为首的人。波拿巴稍后对蒂博多说，“由英国收买的五十个亡命的主教现在管理着法国的僧侣。必须消除他们的影响；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罗马教皇的权威。”这就是要签订教务专约的基本理由。

象路易十四曾经想要做的那样，要请求罗马教皇免去法国一些主教的职务，就等于是给法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即教会的“高卢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传统与波拿巴毫不相干，他唯一关心的是君权的“高卢主义”。唯一可能触动波拿巴的是蒂博多提出反对的话，“你永远无法使他们真心诚意地拥护革命。”波拿巴是藐视这一判断的。象曾寻求罗马教会协助的其他人一样，他相信自己强大到足以把罗马教会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使保王党人失去僧侣的支持，从而削弱保王党人，这还不是教务专约带来的唯一好处。在新并入法国的地区，尤其是在比利时和来因地区，虽然并不关心波旁王朝的事业，但是当地僧侣是否效忠法国仍然关系重大，因为这些地区从来没有组成独立的国家，居民主要是服从神甫；因此，如果要使这些地区的居民归顺法国，最好先争取僧侣。其次，波拿巴还注意到，即使在拥护法国革命的人士中，也有不少人在思想感情上仍然依恋传统宗教，并且对教会的分裂深感遗憾。如果有人能办到使天主教会同 1789 年的原则实现和解，那怕是表面上的和解，他们对这个人该是何等感激？哪个购买教会产业的人，当他听到僧侣永远不再要求他归还这些产业时，能不感到高兴呢？

波拿巴也指望将来会获得另一种好处。他希望把贵族和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因此他也不能忽视宗教复兴对他们的影响。1801 年初，德尔皮什神甫创立了圣母修道会，后来名声很大，象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和他的兄弟，以及拉埃内克——这样的著名人士很快加入了该会。慈善性质的圣会又重新出现了；夏普塔尔在巴黎和某些郡守，象贝藏松的德·布里都自愿赞助这些组织。宗教又在社会上受到尊重，文学作品抓住了这一主题。有些作家乐于恢复写宗教主题，并很重视用它来左右文化界的风尚。自诩为“教会之母”的让利斯夫人正在创作大量的宣传德行小说；觉察到这种趋势的夏托勃里昂正在写他的《基督教的真髓》一书，这本书后来在庆祝教务专约签订的 1802 年复活节感恩颂典前夕出版了，它以其美学价值来证明天主教的真理。象丰塔内那样有政治头脑的一些作家则看得更远些，他们认为，恢复宗教有其社会意义：宗教必然能维护新的等级制度。既然波拿巴正是要巩固这一等级制度，因而他完全赞同他们的看法。他对罗德雷说过，——以后又对莫莱重复过：

“没有财产的不平等，社会就不能存在，而没有宗教，就不能保持财产的不平等。当一个人饿得要死，身旁却有另一个人饱得要吐的时候，他是不能忍受这种差别的，除非有一个权威对他说：上帝的意志就是这样，这个世

界上必须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是，在来生和在永生中，贫富之分将完全不同。”

除此以外，丰塔内机敏地看出，政府也将从一项协议中得到好处。1801年4月18日，他写给吕西安的信中说：“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征服者是从来不同神甫争吵的。可以既迫使他们就范，又利用他们……你可以嘲笑占卜师，但是最好还是同他们一道吃献祭的小鸡。”

虽然争取罗马教皇似乎还不是最困难的工作，但要完成这一任务却也不容易。1800年6月25日波拿巴路过维切利时向马蒂尼安尼主教提出一些建议，由他转达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和他的前任不同，他不是好斗的，而是个温文尔雅，并且有些意志薄弱的人。在与法国革命讲和的问题上，特别是在要抛弃那些自称为教皇做出了牺牲的主教的问题上，他仍然犹豫不决；而且他也还要冒疏远路易十八和天主教各国的危险。1800年8月，那些不赞成同法国革命和解的红衣主教宣称，对宪法的忠诚宣誓是非法的。这是庇护六世从来也不敢做的一项决定，而庇护七世却谨慎地不动声色。另一方面，要拒绝对天主教会，同时也对教皇国如此有利的一项提议，看来也是不可能的。这后一种考虑的确是权衡得很重的。首先，法国军队仍然能到马来，庇护七世既不信任占领着他的首都的那不勒斯人，也不信任仍然占据教皇属地的奥国人。其次，通过免除法国主教的职务，罗马教皇就有权任免“高卢主义”僧侣，这项权利是法国从来不肯承认的。

波拿巴事先答应了这一点之后，教皇首先以充分的理由提出要求恢复罗马天主教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红衣主教斯皮纳带着指示被派往巴黎。11月6日到达后，他就立即会见了波拿巴的谈判代表贝尼埃。贝尼埃原是旺代乱党的宗教首领，他刚刚投诚到波拿巴的阵营里来，一心指望成为巴黎的大主教和被提拔为红衣主教。法国的方案中自然没有提到国教，但由于斯皮纳的坚持，贝尼埃让步了，而波拿巴也没有从中看出什么害处。这是出于误会，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波拿巴也缺乏法律上明确的概念；他把罗马天主教称为国教或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只是想要给教会一笔拨款，并给它超于其它教派之上的特权地位。塔列朗和奥特里夫使波拿巴认清了问题，他们指出这样会毁掉信仰自由和国家世俗化这些基本的革命成果。从此以后，波拿巴就只承认罗马天主教为大多数法国人信仰的宗教，这是他毫不动摇的立场。争论的另一点是主教们的辞职问题；尽管教皇小心谨慎，但是这问题牵涉到他的利益太大，以致斯皮纳最后也没作出让步。谈判之所以拖延下去，是因为罗马教廷在等待着战争的结果；当法军占领了教皇各属地和罗马本身的时候，教皇只好让步。1801年2月末，谈判的速度加快了，波拿巴派卡考尔到罗马去催促此事。由于罗马教廷拖延答复，5月19日，波拿巴指示卡考尔，要求对方无保留地接受法国的条件，如果对方拒绝，就中止谈判。庇护七世刚刚写好一封信，建议做某些修正；但是卡考尔自作主张，在返回巴黎时把罗马教皇的国务卿红衣主教孔萨尔维带往巴黎。6月2日到达后，孔萨尔维

就开始逐条力争，但终于在 1801 年 7 月 16 日早晨两点钟最后签订了教务专约。

根据教务专约，罗马天主教被宣布为大多数法国人同时也是执政官们信奉的宗教，假如一个非天主教徒继任政府首脑，就必须另行谈判。宗教仪式可公开举行，但应遵守世俗政府为保证公共安宁而制订的必要的规章。国家支付主教和教区神甫的薪给，后者的人数应相当治安法官的人数。国家允许恢复大教堂圣职会和主教管区的修道院，但是不给他们捐助资金；国家还许可天主教徒捐款成立基金会。教皇答应劝告顽抗派主教放弃教职，如不能做到，就免除其教职。波拿巴也应对宪政派主教提出同样的要求，这样来结束教会的分裂。和约没有提及修道会，因而，它们仍然无保留地处在教皇的直接管辖下。根据 1695 年敕令的精神，主教的权力也大大地增加了：他们有权指定教区神甫和下属人员，这是主教在旧制度下未曾拥有过的权力。作为交换条件，波拿巴获得了一个由他挑选的新主教团、教士的忠诚宣誓、在礼拜仪式结束时为共和国做祈祷，教会答应不再要求收回已出售的教产，以及重新划定主教管区。主教由第一执政提名，而由教皇授予圣职。就波拿巴来说，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通过控制主教，他就会控制他们的教士，由于害怕顽抗派教士难以驾驭，他宁可把教区的教士置于主教团的监管之下，而不愿意亲自监视他们。至于那些隐修院的修士，他打算容忍他们，但是要限制在对他有利的范围之内。

罗马教皇批准了教务专约，并派卡普拉拉红衣主教作为他的使节到巴黎去监督专约细节的实施；10 月 7 日，波拿巴委派参议院参政官波塔利斯担任宗教部督导官。此人既是个高度虔诚的信徒又具有“高卢主义”思想，但他不久就作了很多的让步。在 1801 年曾经举行过一次宗教会议的宪政派主教没有反抗地顺从了，尽管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代表格雷古瓦对教务专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顽抗派主教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八十二名主教中有三十六名拒绝顺从，在新并入法国的领土上的十三名主教中有一名也不服从教务专约。这些顽抗的主教抗议剥夺他们教职，他们的一些信徒仍跟着他们走。结果，在很多主教管区里，反对教务专约的教派继续存在着，并延续至今，这就是所谓的“小教会”，虽然他们的信徒从来不是很多。尽管存在着反对派，但还是很快就准备出了一份新主教名单。由于教务专约没有为宪政派主教保留任何职位，所以罗马声言拒绝为他们授职，由于波拿巴毫不动摇的决心，才迫使教皇同意对十二名前宪政派主教的任命。在这十二名中间，竟然没有格雷古瓦。十六名已经递上辞呈的前顽抗派主教也被任命了，其中包括埃克斯的尚皮翁·德·西塞，图尔的布瓦热兰和波尔多的达维奥。除此之外，又增加了大部分从接受教务专约的神甫中提升的三十二名新主教。由于卡普拉拉坚持要新任命的宪政派主教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他们拒绝认错，于是整个安排在最后一刻又陷入了危机之中。代表法国政府谈判的贝尼埃用模棱两可的办法解决了问题，这是 1668 年为调解教皇和詹森教派的高级教士之

间的争端所用过的办法：他只是让卡普拉拉相信，分裂派已经发表令人满意的口头声明。应该补充提一下，这个十分圆滑的人物所得到的报赏只是奥尔良主教的职位。

现在留下的问题是要议会各院批准这一和约。参议院公然表示反对，10月12日的会议是非常激烈的。波拿巴刚刚禁止了敬神博爱教的集会，这是很难平息人心的。11月22日，立法院选举了反宗教的《宗教的起源》一书的作者迪皮伊为主席；11月30日，元老院选择宪政派主教格雷古瓦填补空缺。在保民院中，几乎一致地反对教务专约；沃尔内遭到波拿巴一场有名的责骂。政府中的反对派找到了两个机会来表示他们的激怒：一个是与俄国订立的和约，他们严厉地批评了这一和约，因为和约提的是“法国的臣民”而不是“法国的公民”；另一个是《民法典》，除了关于户籍的标题外（因为它明显地排斥任何国教），他们于12月28日否决了《民法典》开头的一些标题。至于军队的情绪，那是一清二楚的；7月20日，即教务专约签订的第二天，富歇指示要搜捕那些不接受教务专约的教士；波拿巴不得不让他撤回这个命令。看来，教务专约肯定要遭到挫折。

塔列朗建议对反对派作一些让步，办法是，在实施教务专约时必需制订一些补充规章。因此，政府公布了“天主教组织条款”作为教务专约的补充，事先没有通知罗马教皇，教皇也不敢提出抗议。这些条例使“高卢主义”成为国家的法律：它规定修道院要讲授1682年的宣言；教皇圣谕的公布、主教会议的召开、教士圣职的授任、修道院的创办以及教义问答的编撰等等都须经政府批准。世俗政权还取得了规定鸣钟、仪仗和教士服装的权利。条例还规定了新的教区划分和教士薪俸，从薪俸中要扣除革命时期法律所已发的年金。公社可为附属的小教堂人员和低级教士提供住所并发给薪俸，但这项规定对公社不是强制性的。

这还不是全部办法。为了显示天主教并不是又变成国教，于是又制订了“新教组织条款”。对改革派和路德教派牧师也一视同仁发给薪俸；卡尔文教徒则由捐款最多的信徒组成的一些教务监事会管理，由最老的牧师担任该会主席；路德派教徒设有各堂教务监事会负责管理。“新教组织条款”成为新教徒的宪章，与教务专约组成一体，教务专约又有“天主教组织条款”加以补充，因而构成了一部自成体系的完整法律。尽管采取了这样的调节措施，但也还不能肯定与教皇的协议就会得到议会的支持。但是，波拿巴已经开始警惕起来，特别是他正在酝酿其它重要措施，而这些措施也必定会遭到反对。举行一次新的政变才足以使议会各院投降。

三、清洗保民院和就任终身执政

1802年1月4日波拿巴撤回了提交给议会各院的所有议案，有如波塔利斯曾经预言的那样，使议会各院处于“法律禁食”的状态。三天以后，参政

院宣布，议会各院会期因此应被认为已告结束，而且宣布，现在应着手更换到共和十年任期已满的五分之一的议员。鉴于宪法中没有规定卸任成员的选定方法，此问题便提交给了元老院。很明显，这些成员应由抽签来选定，人们本来以为，元老院会采用抽签办法，因为它和其它各院一样怀有某种不安。但是元老院可能受到了恐吓，如果它表现得不驯顺，就要对它施加武力；而最重要的是，如果它让步屈服的话，就答应给予新的好处，不管怎样，元老院以四十六票对十三票决定由它自己提出卸任的成员。这样做的结果就免除了保民院中的最杰出的“空论家”的成员如邦雅曼·贡斯当、谢尼埃、多弩、然格内、拉罗米居厄尔和萨伊等人的职务。他们被第二流的人物，一些文武官员所替换。只有卡尔诺一人例外地留了下来。吕西安·波拿巴变成了保民院议员，这样他就重新进入政界，以便能起他在雾月时同样的作用。他向保民院提出了共和十年芽月11日（1802年4月1日）的规章，这个方案把保民院分为三个组，各组秘密审议法案。不久以后又有一项执政的命令规定，法律草案事先要在第一执政主持下的特别委员会里由各组的“报告人”和参议院负专职的参政官共同审查。这样就不致于在公开的会议上出现任何争论。“不应有任何反对意见，”波拿巴说道，“什么是政府？如果它得不到舆论的支持，就什么也不是。它怎么能够抵消一个随时公开攻击它的议会讲坛的影响呢？”同样也变得可疑的参议院也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因为它不再能控制法律的起草工作。最后，波拿巴在由他任命的心腹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里，着手准备他那些雄心勃勃的纲领，其结果提交给参议院通过只是走走形式罢了。

议会各院被压服之后，剩下的危险只有军队的叛乱。波拿巴利用和平的机会遣散和清洗部队；意大利方面军被调到葡萄牙；来因方面军被派往圣多明各。尽管如此，在军队中仍然存在着显著的不满，因为不能按时发军饷，而且，尤其在这饥荒的年代，士兵们都怀念他们在战斗中有利可图的冒险生活。巴黎简直是充满了百无聊赖的将军们，他们嫉妒他们的上司，都不相信他的军事天才、而只承认他运气好。波拿巴总是说，“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自认为具有同我一样的权利。”他们都自命是共和派，但他们的公民精神却大可怀疑。他们谈到要把法国分成几个大军区治理；倘若他们得逞，他们之间很快就会打起仗来，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即使现在就要实施军事独裁，那也只应有一个独裁者，因此在这一点上，全国又是支持波拿巴的。

在与波拿巴敌对的将军中，最显著的是莫罗和贝尔纳多特。莫罗已经断然与他的对手闹翻。他的妻子和岳母甚至怂恿他和波拿巴断绝社交往来；而《政府通报》却暗示，莫罗在德意志曾违法乱纪。但是他在脱下军装后甚至比在担任军职时更加优柔寡断。而贝尔纳多特看来比较有能力，作为驻扎在雷恩的西路军统帅，他随时可以发动兵变。实际上，尽管他有傲慢自大的气派，但由于他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以至不敢轻举妄动。他在督政府任陆军部长时，错过了共和七年夏季夺取权力的机会，而现在的形势却大大不利

了。他在参与夺权的活动中，坚持要元老院首先采取行动。在巴黎，从3月到6月举行了许多密谋反叛的集会，并且试探了包括富歇在内的某些文职官员的意见。与此同时，三名军官于5月7日被捕，其中一名是多纳迪厄将军；5月20日，贝尔纳多特的参谋长西蒙将军向军队秘密地散发了两份攻击波拿巴的煽动性宣言。这两份宣言落入了巴黎警察厅长杜布瓦手里，他为抓住了上司的把柄而高兴。而后富歇以“诽谤阴谋”罪逮捕了西蒙将军及其同伙。波拿巴对此事秘而不宣，因为他不想让人谈论军队中有人反对他。有嫌疑的军官不加审讯地被关在监狱里；正规军第八十二团被运往圣多明各，到那里就有去无回；而里什庞斯和德凯恩将军被派往殖民地去，拉纳出使里斯本，而布律纳出使君士坦丁堡。拉奥里辞职了，勒古布转入后备役。贝尔纳多特却未被触动，这是由于波拿巴考虑到贝尔纳多特的妻子朱丽叶·克拉莉，她是波拿巴原来的未婚妻，后来因为约瑟芬的缘故而被抛弃了。尽管如此，贝尔纳多特还是被罢了官。从来没什么事情使波拿巴这么强调他的所谓的“反军阀主义”，其实这只是对他旧日袍泽心存戒意而已。这种戒心表现在1802年5月4日他向参议院发表的名言中：“毫无疑问，文官是要高明得多。”在这种场合他是以文官自命的。富歇给那些受牵连的政界人士通风报信，劝他们躲避起来。斯塔埃尔夫人到她在瑞士科佩的别墅去了；当她在1803年试图返回时，波拿巴下令将她驱逐出法国。

波拿巴的种种忧虑从没有成为严重事件，因为它们决没有使事态的进展放慢速度。1802年3月25日签订了亚眠和约，它象是一个信号。在从4月8日到5月19日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整个政体全然改观：共和政体改变为君主政体，反革命正式归附，新贵名流的权势加强了。共和十年芽月18日（1802年4月8日）立法院通过了包括教务专约等有关宗教的法律。十天以后，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感恩颂典来庆祝法国革命和罗马教会的和解。接着在花月6日（4月26日）通过了一项元老院决议案（实际上是十五天前在一个特别委员会上准备好的），答应赦免亡命者，条件是在共和十一年葡月1日（1802年9月23日）之前回国、并且宣誓忠于宪法，只有罪恶深重者不在赦免之列，他们的人数不过一千左右。花月11日（5月1日）法令决定建立国立中学，这些学校颁发奖学金将会造就大批公务人员和各种自由职业者，使他们成为政府的拥护者。花月29日（5月19日）一项法律创立了荣誉军团。它包括十五个“大队”，每个大队由二百五十名军团成员组成，他们是由波拿巴从新贵名流中遴选出来的。既有武官也有文人。从国有产业中拨给每个“大队”二十万法郎的年金，作为军团成员薪俸、住所和疗养院的费用，而他们则要宣誓“为共和国服务而献身”；“击败一切复辟封建制度……的图谋……”并且“竭尽全力维护自由与平等”。荣誉军团的确是一支有功勋的公民的组织而不是国家的装饰品，因为当时甚至没有给它的成员颁发一枚特别荣誉勋章。最后于5月8日至14日，波拿巴的权位转变成为终身执政。

虽然元老院的屈服和对保民院的清洗使雾月党人资产阶级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但仍然可以察觉出一些反抗。创立荣誉军团法令在参议院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立法院中仅以一百六十六票对一百一十票通过。至于宪法，波拿巴成功地废除了它，但只是以不断滥用权力，并与他身边具有君主制思想的成员如康巴塞雷斯、罗德雷、塔列朗和吕西安的合作下才获得成功的。亚眠和约于5月6日送交元老院，并要求这个机构决定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酬答第一执政，以表示“全国的谢意”；但是5月8日当一名元老院议员提出设立终身执政时，该院只赞成重选“拿破仑·波拿巴”连任十年第一执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官方文件上第一次出现了波拿巴的鼎鼎大名的教名 。这一计不成之后，波拿巴据说是依照康巴塞雷斯的出谋划策，于5月9日顺水推舟回答了元老院的提议：如果人民的愿望“命令”他这样做的话，他将接受这一提议。然后，一个特别会议接受了由罗德雷起草的草案，其中提出，除了终身执政之外，还授予波拿巴指定自己继承人的权力。这个决议竟被提交给参议院通过，虽然这并不在参议院的权限之内。富歇没有参加会议，五、六名参政官缺席。然后，波拿巴慎重地删去了决议中罗德雷加上的关于指定继承人的条款。本来无权参与宪法修改的保民院和立法院也通过了由三执政之一任终身执政的公民投票。象共和八年一样，这次公民投票也是公开投票，而在决定公民投票过程中靠边站的元老院则被指派负责清点票数，这简直是讽刺。热月14日（8月2日）元老院宣布波拿巴为终身执政。

波拿巴不失时机地命令制定一部新宪法，参议院和元老院于8月4日未经讨论就批准了这部宪法，其中一条授权第一执政在他认为合意的时候，或在遗嘱上把他挑选的一名继任候选人提交元老院通过，如果元老院不同意，波拿巴可以依次再提出两名候选人，第三次提的就不能再被驳回了。这样波拿巴就擅取了他曾拒绝向人民要求的权利。对于继任人的安排如此曲折，有人解释是由于在选择合适的继承人之初所产生的困难。波拿巴没有孩子，约瑟夫和吕西安就为继承权而争吵。这种继承权，如吕西安所说的，就象是继承“先父的遗产”一样。如果偏爱一名雾月党人，势必招致其它雾月党人的强烈忿懣。这一困难问题本来可以在路易·波拿巴和奥坦斯·德·博阿尔内的儿子查理身上得到解决。事实上，波拿巴曾想从这对夫妇过继一个侄子；但是查理直至10月10日才出生。因此，看起来尽管波拿巴控制了报刊和议会各院，但是他仍然看到了把一项太露骨的君主制的建议提交给公民投票的危险性。所以他用武力取得了他未敢请求的东西。另一方面，则有人认为，那些把法国革命的命运和波拿巴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把他视为唯一能够保卫自然疆界的革命人士发现，他们自己在逻辑上不得不使他成为一位君主，以便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稳定局面。事实上，正如蒂博多十分正确地看出的：在这一点上，终身执政和世袭继承本身都只不过是虚幻的保证。波拿巴的统治实质上是建立在胜利基础之上的军事独裁统治，只要他在战场上仍然保持胜利，并不是非要这些措施不可。正如波拿巴自己所说，如果反法同盟一旦

进入巴黎，“这些元老院决议案还会有什么意义呢？”他一旦死去，谁还会关心他的遗嘱呢？“有谁曾经把路易十四的遗嘱放在眼里？”崇敬他的法国和成为他的俘虏的雾月党人都顺从了他的要求。获得作为民族化身和成为全国第一公民的荣誉都不足以使波拿巴满足，他甚至明知自己因缘际会做出的伟大功业不过是过眼云烟，但他仍一意孤行要称王称帝。

仍然必须指出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对他的要求表示赞助的同时，仍然谨慎地提醒他在雾月结成的盟约。这些人中就有罗德雷，他自己谈到了代表着主要社会利益的重要机构，这些机构会得到宪法的保障而与政府联系在一起；无疑，这意味着要给议会各院、特别是元老院某种真正的控制权。这些共和派还指出，现在行政权已很强大，足以给公民恢复一定程度的自由权。夏博在保民院提议国民应感谢第一执政，当他把关于公民投票的法律呈递给波拿巴时，他胆怯地暗示了这种需要：“波拿巴的思想非常伟大和豁达，他决不会脱离那些创造了法国革命与建立了共和国的自由原则。他非常珍惜真正的荣誉，决不致以滥用权力来玷污他已经取得的莫大荣誉。”“空论家”若尔当在一本很快被查禁了的小册子《为终身执政而举行的公民投票的真正含义》中更加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主子是不会宽恕的。果月二十六日（9月13日）富歇失宠了，他所管辖的警务部与司法部合并。罗德雷最后也被剥夺了参议院组长的职位和掌管国民教育的权力。波拿巴当时的答复是，独裁统治仍然是必要的：在英国，反对党在宪法范围内有它的地位；而在法国，反对党就成为反革命和雅各宾派的活动范围。既然他已经恢复了反革命分子的公民权，他就完全可以提醒“革命人士”，如果举行选举未必会对他们有利。“政府必须掌握在革命人士手里；这是他们唯一拥有的东西。”波拿巴的合作者没有和他争论这一点，但是他们提醒他，他们将和他一起分享政权，这曾经是他们之间的谅解。

相反地，共和十年宪法反而缩小了他们参与政权的范围。第一执政独揽缔约权、特赦权，独自指定元老院、最高法院和第二、第三执政的候选人，以及从选民提出的候选人中遴选治安法官等权力。他特别保留了以系统的元老院构成法来解释或补充宪法的权利，这就使后来在建立帝国时没有遇到象在设立终身执政职位时所引起的那样多的困难。他还僭取了通过颁发一般的元老院决议案来暂停实施宪法、解散保民院和立法院以及撤消法院判决的权力。他建立了枢密委员会，在每次会前由他指定其成员，这个机构起草他所提出的元老院决议案，而只有他才有立法的创议权。被授与这种过高权力的元老院进行了适当的改组，虽然它仍然由互选增补成员，但是只能从波拿巴提出的候选人中选出，波拿巴并有权直接任命四十名附加元老院议员。不久，波拿巴于共和十一年雪月14日（1803年1月4日）侵夺了任命元老院秘书处的权力，同时他在每个上诉法院管辖区都设立了一个元老院议员庄园，每个庄园拨有国有土地和宅邸，这是波拿巴在薪俸之外赠与那些最听话的元老院议员的。最后，新宪法还授权元老院议员得兼任部长和政府的各种

高级职位。另一方面，其它议会各院的权限则大为削减。立法院失去了召集例会和选举主席的权力。保民院被缩减为五十名成员，并且在宪法中列入一项取消保民院发言权的条例。参政院把它的优先地位让给了元老院，并且有枢密委员会在和它抗衡。虽然波拿巴继续在向参政院提交新法案，但是他现在不通过它也可用元老院决议案来制定法律。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废除了元老院终于在三月刚刚发表的“名流名单”。波拿巴的借口是起草过程中曾遇到困难，而实际上是他感觉到这使议会各院拥有太多的选择自由。毫无疑问，他也希望每个郡恢复他认为合适的代表机构，以便使新贵名流高兴。因此他建立了选举人团制度来代替“名流名单”。在基层，由各区公民大会提名治安法官和地方议会的候选人，并提名县选举人团的候选人和郡选举人团的成员，后者是从六百名纳税最多的公民中选出的，这样一来，选举人的财产资格就终于出现了。县选举人团为保民院和立法院中每个空缺席位提出两名候选人；郡选举人团为立法院和元老院中每个空缺席位提出两名候选人。这样议会各院就具有地方代议制的性质。由于选举人团必须在它们自己成员以外选出两名候选人之一，因而它们就不完全是寡头性质的。第一执政对这些选举人团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不仅指定它们的主席，而且还可以给县选举人团追加十名成员，给郡选举人团追加二十名成员，并且授权政府官员加入选举人团。

既然选举人一经提名终身任职、并且只有在选举人团成员有三分之一的缺额时才增补空缺，这样就使选举减少到最低限度。此外，直到共和十二年，新近被选定的公社新贵名流才独自组成了区议会，而他们组成的选举人团继续起作用，到帝国灭亡之前一直没有变动。新贵名流的垄断权就这样得到巩固并且加强了。请倾听吕西安于 1803 年 3 月 24 日对塞纳郡的选举人团演讲时所说的话吧：“我们的新选举法原则……不再是建立于虚幻概念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唤起我们保持公共秩序愿望的社会与财产的基础上。今天，选举权以逐渐的、稳健的方式变成为最开明、最关心良好秩序的阶级独享的特权。”但是实际上，这个阶级从此只有依靠波拿巴才能保持它的地位。

四、波拿巴的社会政策

共和十年的重要法律不限于扩大波拿巴个人权力；它们还显示了在他头脑里正在形成的社会概念。在参政院会上，波拿巴批判了从法国革命中产生的个人主义社会。他把这个社会描述为“一盘散沙”，并且强调了必须在“法国的土地上投上一些大块花岗石”，以便“给法国人民指明方向。”明白他说，波拿巴想要用利禄与荣誉组成一些依附于这个政权的利益集团，并期望这些集团对工资劳动者施加影响，以便赢得平民各阶级的忠顺。这就等于是复活旧制度下官民之间的中间组织或行业集团，但必须警惕，不能使这些组织再能够对抗国家或蜕变为寡头统治。波拿巴机敏地指出，资产阶级将从中

得到好处。他认为：贵族是靠血统、阶级偏见和教会的等级结构而结成一个集团的，而“咱们，咱们却是各自分散的”；因此，荣誉军团应“把革命人士集聚在一起”。然而，这些社会集团将有待于他、并且只有他一人去创立；刑法甚至规定，凡成员在二十人以上的一切团体都要经他批准才能成立。这样，人们就清楚地看到，他个人的权力因此也大为增长。议会各院就是集聚革命人士的一个社会集体，荣誉军团是另一个集体，选举人团又是另一个集体。除这些集体之外还有由波拿巴不断增加的官吏也是一个集体。他们被组织在各部门等级森严的制度中工作；公费生将被培养成为官吏。波拿巴在共和十一年芽月十九日（1803年4月9日）任命了十六名协理专员。但这只是个开端。他们隶属政府各部和参议院，并且要形成一个与法国革命或旧制度都没有联系的高级行政核心。在这个体系中法官占据了显要的地位，他们的薪俸微薄，因此只能从富裕的资产阶级中选拔。共和十年宪法规定了法官的等级和专业训练制度。司法官也都组织成了团体：辩护士会从共和八年就已存在；公证人和公共拍卖人从共和九年就已联合起来。实业家们也没有被忽略，有商会、制造业公会、经纪人公所，而代理商的再现不只是适应了工业技术上的需要，也是既定的社会计划的一部分。如果只凭波拿巴为所欲为的话，人们一定会看到行会复活。

象波拿巴当时所设想的那样，社会的阶梯等级制度建立在财富的基础之上。因为他是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夺取政权的，所以不可能出现别的局面。的确，空论家们打算以对所有的人实行免费教育的办法，使有才能的人同有财富的人能取得领导国家的职位。但是，已据有财富的人很自然地倾向于把持领导权。此外，只要那些“才能之士”仍旧处于贫困状态，波拿巴就同有钱人一样对他们存有戒心，视他们为革命的火种。所以波拿巴和富人一致同意，只能用他们充任技术性的官员，象过去的贵族政治和君主专制时代那样做法。当波拿巴宣称自己是法国革命的代表时，他总是把这场革命归结为废除特权，其后果则是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的抬头。他的个人专制一倾覆，人们就可以看出，共和十年的社会制度已经为“七月王朝”打下了基础。

《民法典》成了新社会的圣经。1800年8月12日，波拿巴指定一个由特隆歇、波塔利斯、比戈·德·普雷亚梅纽和马尔维尔四位法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民法，草案于1801年1月完成，但是波拿巴与议会各院的冲突中断了《民法典》的讨论，直到1803年才恢复讨论。法典最后于1804年3月21日以《法国人的民法典》的名称颁布了，后来改称为《拿破仑法典》。波拿巴只是在涉及家庭法时才直接参加了民法的起草工作。他的注意力集中于加强父权和夫权，剥夺未经认领的私生子的财产继承权，并削减已获认领者所继承的份额，以及保留离婚的规定，这一项是出于为他个人着想。

象波拿巴所有的成就一样，这部法典也有它的二重性。一方面它肯定了封建贵族的消灭，并且采纳了1789年的社会原则：个人自由、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国家世俗化、信仰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这部法典在欧洲成为法国革命的象征，不论传入什么地方，它都提供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虽然这一特点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丧失其光彩，但是，如果不认清法典当时具有的创新之处，则将是对拿破仑时代历史的歪曲，并且将妨碍我们理解法国统治扩张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法典也体现了反对共和国民成就的反动倾向。它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设想，首先关心的是确保财产所有权，把这种权利视为自然权利，是先于社会的、绝对的、属于个人的权利，并且保障实际占有的所有权。有关契约的各项规定涉及到的几乎都是财产问题，而有关雇用问题的规定只有两条。家庭问题有很大部分也是从保障财产所有权的角度考虑的。结果，关于婚姻契约的详尽规定使婚姻成为金钱交易，而法典对血统关系如此重视，所考虑的也就是继承权的问题。

波拿巴和他的法学家心目中的国家利益，是民法起草工作中的另一个主导思想。正是波拿巴在涉及诸如地下资源，或为公益而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尤其是以遗嘱处理财产的能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财产所有者的权利。家庭对国家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是约制个人行为的那些社会实体之一。被法国革命削弱了的父权因此又得到加强：父亲无需司法机关的认可就可把他的子女监禁六个月；他完全有权控制他们的财产；同样，他也可以支配他妻子的财产；虽然夫妻财产共有制是习惯法的一部分，但他往往可以随意处理它。但是，象所有的团体那样，家庭也可能变得十分强大以至于能够对抗国家，因为它自发产生的自然结合力非常强大，所以情况就更加如此；从家庭就可能又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贵族阶层。由于这个原故，国家把家庭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父亲遗嘱的权力被重新建立的“特留份”所限制，继承权被宣布是一件有关社会秩序的事，因此就由法律加以规定。从这个观点来看，民法典遭到旧贵族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尖锐批评，因为它确定遗产分散，从而限制了他们的经济实力。

对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民法典除去禁止终身合同和永久雇用，以保护他们的人身自由之外，别无其他规定。民法典宣布了劳动自由和在法律面前公民平等，实际上象国民制宪议会所希望的一样，抛弃工资劳动者，使他们置于经济竞争的一切危险之中，并且把劳动力视为只不过是一种商品。民法典拒绝接受 1793 年出现的关于承认公民有生存权的主张。由于在工资争议中只承认雇主的供词为可信的，因此民法典甚至歧视工资劳动者，从而背离了法律上平等的原则。此外，国家还以治安法的名义出面干涉，因为既然穷人一无所有，他们就会违抗民法典，使雇主提出的惩办不守纪律的诉讼归于无效。共和十一年芽月 22 日（1803 年 4 月 12 日）法律重申了对工人结社的禁令；在 12 月 1 日一项法令强迫工人携带地方当局颁发的工人手册，不能出示工人手册的人被禁止雇用。

法国社会的演进产生了资产阶级并使之获得政权，民法典也是法国社会演进的结果。从法典的细节上看，它的历史标志就更明显。拿破仑时代的法

学家主要是从多马和波蒂埃的著作中吸取了法典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两人都已经开始从事条理化编纂法典的工作，后者专心致力于编纂法国南方保存的成文罗马法，前者献身于编纂习惯法。法学家们把这项学术遗产与法国革命的成就结合汇编在一起，并删除某些不妥条例，从而使民法典成为一部折衷的法典。民法典对地产特别注意，因为地产仍然是当时财富的主要形式，但它却很少涉及到工业财富、公司组织和信贷，这也是它的历史特点之一。总之，民法典决不是理论家的创作，不是理论家硬加给社会的、与生活实际无关的一部抽象法律书，而萨维尼和其它德意志法学家所提出的批评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些批评家内心里充满贵族阶级思想感情，而民法典正是否定这种感情的。

波拿巴关于国民教育的主张是，它应当与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和政权的专断性质协调一致。他说，教育必须“普及全国”，并且是“政府首先要关心的事”。夏普塔尔的教育方案被认为野心太大，于是改由富尔克鲁瓦主持，起草了共和十年花月11日（1802年5月1日）的法律，把初级学校交给公社市政当局管理，就象在旧制度统治下那样。波拿巴和当时大批资产阶级人物都同以前的伏尔泰抱有同感，他们认为，教育穷人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都是件麻烦事。至于为培养教育未来领导人物的传授专门知识的中级学校，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学校是仿照普利坦内——原来通称为路易大王中学——建立起来的，这所学校是法国革命唯一保留下来的旧学校；在督政府时代，该校曾恢复为寄宿学校，新办的“中央学校”就没有。共和八年（1800年3月22日）当时的内政部长吕西安·波拿巴对它进行了改革。每个上诉法院管辖地区都要有一所国家提供经费的国立中学。同时也规定有由私人开办、但由政府批准和监督的中级学校；共和七年，政府开始指派这些学校的教师。政府在国立中学设立了六千四百份奖学金，其中两千四百份授与军官和政府官员的子弟，其余四千份留给中级学校的优等生。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奖学金迎合了“空论家”的愿望；但在实际上穷人是申请不到奖学金的，它成为只是对文武官员有利的补助金，成为使小资产阶级依附于大资产阶级、并把其中最优秀分子吸引过来的诱饵。他们成为公务员或经济部门的领导者，就不再会有变成动乱的因素的危险了。私立教育机构原则上继续存在，虽然塞纳郡郡守弗罗肖最少在巴黎有权批准和监督这些学校。天主教的教士立即从这种宽客中得到了好处，在有关初级教学的问题方面，波拿巴从没有给教士设置任何障碍；基督教学校的修士再次变得活跃起来，并于共和十二年在里昂建立了一所学院。因为他不重视妇女教育，所以便允许恢复了一些培养修女的修道会。可是国立中学和教会男子中学彼此间很快就发生了冲突；这导致拿破仑对各级国民教育都实行了控制。

然而，正在波拿巴确立资产阶级的社会权势时，他却已在表现对这个阶级的不信任。他在参议院谈到财富时毫不留情地说：“不能把财富当作某种资格、权利的证明。富人往往是一无所长的懒汉，富商则通常只是依靠高价

出售或偷盗而致富的。”他对金融界人士更没有好感。很清楚，他并不是反对各种形式的财富，而只是抨击反对那正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动产。首先，它是一种不易控制的财富，不论是对它实行征税还是没收。其次，它每时每刻产生出一些新人物，这些人无所凭借因只靠自己发财致富而感到自豪，并且更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的独立性，因此他们趋向于打破波拿巴竭力建成的社会结构。为了登上帝位，波拿巴自然转向拥护君主政体的各派，而在君主政体下，君主依靠土地贵族的支持，反过来他则保证贵族对农民的奴役。这一理想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时波拿巴甚至还没有考虑要重建贵族阶级；但是他想已与反革命和解，这是出于个人偏爱，而不是从民族利益考虑。在共和十年宪法颁布之后的几个月里，使那个时代的人最感诧异的就是这种和解的进展。

教务专约按部就班地在实施。埃梅里深恐拿破仑侵越专约规定的权益，便在圣使卡普拉拉的左右对勒絮尔方丈施加影响，使卡普拉拉倾向和解，而波塔利斯有时虽不免流露对“高卢主义”传统的依恋，却也尽力使卡普拉拉感到满意。

在新任命的各级僧侣中，顽抗派占了优势，这是势所必然的。原来的宪政派的主教也因政府加以限制，不得不让顽抗派教士占优势，如果不是这样安排，他们也找不到足够数量的宣誓派教士。例如在下来因郡，宪政派主教索里内在三百五十一名教区和小教堂神甫中，只能派十六名“宪政派”教士，还占不到百分之五；至于原先虽属顽抗派主教，如加来海峡郡的拉图尔·德奥弗涅和北滨海郡的卡法雷利，却派了约百分之十二的宪政派教士，前者在六百三十四圣职中派了七十八个，后者在三百四十个圣职中授与“宪政派”教士四十三个职位。另一方面，有一些前顽抗派主教迫使 1791 年的宣誓派教士宣誓顺从，这就等于要他们悔过；即使郡守们反对这一做法，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能使宣誓书的措词搞得含糊些罢了。宪政派主教遭到了他们下属教士的无礼对待，而普通神甫的遭遇则就更坏。富歇在他发出的通报中坚持应维护信仰自由，他不加掩饰地认为有权把主教看成政府雇员或警察的辅助人员，即视为精神的宪兵队。然而他失宠了，波塔利斯几乎总是站在反对郡守一边。为了安抚主教，加来海峡郡和罗讷河口郡的郡守终于被撤职了。从共和十年“组织条款”一颁布就遇到重重障碍。高级教士被曾称为“阁下”；教士服装又重新出现了；宗教仪仗和教堂钟声又自由地恢复了；主教被允许把“承天主慈悲与圣座恩典”加上他们的称号。波塔利斯虽然不掩盖他个人的感情倾向，但他拒绝强制规定礼拜日休假，他认为习惯很快就会形成自然。他准许恢复教堂婚礼公告；尤其赞助主教竭力想获得监视政府官员的权利。他写信给尚皮翁·德·西塞说：“在向政府报告涉及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方面，您处于比任何人都更为有利的地位。”布伦的县长马斯克莱虽然对教士不信任，但仍然告诫他属下的市长，不论他们个人的信仰如何，由于职务的约束，他们仍然应遵奉宗教。

低级的不享有薪俸的教士立即抱怨起他们的可悲境况。农民对他们没有敌意；但多数人对他们很冷淡，没有人愿意养活他们。虽然“组织条款”规定宗教礼拜是免费的，但是信徒的捐款要分配给教区神甫和分教区神甫，而捐款的旧习惯就迅速地恢复了。主教开始公布预期的捐赠数额，并且获准成立旨在保证教区物质福利的委员会。不领薪俸的低级教士既不能从信徒那里得到住所，也得不到薪俸，因此波拿巴从共和十一年开始迫使行政机关“考虑”这些事情；他还把没有卖出的教会产业还给了教区神甫。这些措施收效不大；但是不久到了帝国时期，国家对于教会变得日益慷慨起来。这样教务专约就成为天主教教士扩大影响的起点，从而为他们后来在复辟时期的得势做了准备。

亡命者的归国没有象教务专约那样激起輿情大哗，但是此事仍然给人们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值得一提的是，波拿巴在就任终身执政时曾收到许多祝贺信，但在颁布大赦令时则连一份都没有收到。在此后十年里大赦令把亡命者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象对其他人一样，只要发出“密札”就能够把他们监禁起来。因此，他们通常都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但是这既不能限制他们横行乡里，也不能阻止他们企图强迫那些买下他们产业的买主归还，或让赎买回他们的产业。国有产业的买主大为惊慌，特别是自从1803年7月23日波拿巴下令清算买主未付清的差额，就更引起了人们的忧虑，人们甚至竞相拍卖，因为这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产业出售本身可能成问题。如果一任波拿巴为所欲为，1793年7月17日那项曾无偿地废除封建地租的法律就可能被修改，从而既给业主补偿又可增加国库收入，这些地租有许多同国有产业有关。可是波拿巴不敢无视参政院的决定，1803年2月19日该院宣布决不能修改这一法律。一些回国的亡命者已经参加了政府工作：塞居尔被派到参议院；塞吉埃在巴黎上诉法院任职，吕伊纳公爵进了元老院；1804年约瑟夫-玛丽·德·热朗多成为内政部的一个司长。另一方面，波拿巴还使他的一些高级军官如朱诺、内伊、拉纳、奥热罗、萨瓦里同贵族的女儿结了婚；但也有几个人，如迪罗克和马尔蒙，则宁愿同金融家通婚。

融合在一起的气氛在第一执政的宫廷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很快地使杜伊勒里宫比马尔梅松表现出更多的旧制度的气象。迪罗克已经是杜伊勒里宫的总管；1802年11月，约瑟芬得到一种正式的显贵地位，从那时起她就由从旧贵族中选出的四名贵妇伴随。就是在这四名贵妇的陪伴下她同波拿巴到比利时去的。宫廷的礼仪规定越来越细；波拿巴本人穿起丝袜，在佩剑上系有“摄政式”的绒球。老百姓再次被那些装束、车辆、身着制服的随从、祝宴和歌剧院的化妆舞会弄得眼花缭乱。当波利娜·波拿巴的丈夫勒克莱尔将军于1803年1月在圣多明各去世时，宫廷丧礼也恢复了。1802年8月15日，一个新的圣徒节，圣拿破仑的节日被规定下来；而7月14日和葡月1日的共和国节日的庆祝只是为了摆摆样子而已，到1804年就停止举行。1803年，硬币铸上波拿巴的肖像。

沙龙也紧紧追随着宫廷的情调。这个新兴的贵族阶层与暴发户和金融界人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波拿巴为这个贵族阶层规定了一些礼仪，这是革命前的贵族所不具备的。他使约瑟芬离开了她以前的好友塔利昂夫人和阿姆兰夫人，并且唤起了妇女们的品德观念。但是这种严格的伦理永远只不过是表面的粉饰而已，波拿巴本人就是恣意寻欢作乐的人；他关心的只是保持外表的丰采，并且给别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事实上，这个社会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社会，它因为十八世纪的贵族太不“检点”而谴责了他们的闲散和放纵。此外这个阶级的演变还远未完成，“荣誉军团”的命运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波拿巴由于独自任命了军团的“大政务会”成员而破坏了他自己制定的法律，于是推迟对“军团”成员的任命。他已经感到，由他建成的这一组织似乎与法国革命的记忆的联系太紧密了。

到 1802 年末，许多征兆已昭然若揭地显示了波拿巴的真正意图。这样，从民族的角度来看，亚眠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波拿巴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法国人民的最大要求莫过于和平，波拿巴已给了他们和平；他们热爱法国革命的社会成就，而波拿巴维护了这些成就。对自己的领袖感到满意和自豪的法国人民还没有开始意识到他正在滥用权力，也没有意识到他要做的事都是违反他们自己的利益的。但是他们不希望他们的领袖成为皇帝，更不希望他创造一个新的贵族，但此时波拿巴的内心里已经同共和国以及平等的观念决裂了。他们对自然疆界的获得很高兴，并且丝毫也不希望超越这些边界，但此时他们的主人却已经这样做了，这就使得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法国人民仍然把他视为民族英雄，但正是在这一时刻他已经不再是这样一个人了。

第三编 提尔西特条约前 帝国的对外征服 (1802—1807年)

波拿巴的同时代人以及早期论述他的史学家，都用所谓拿破仑的“野心”来解释帝国的对外征服和帝国本身。当然不是说有野心就可以为所欲为，还要有机会，他的野心抓住了这些机会，而如果明智占了上风并考虑民族利益，他本应放过这些机会。后来的一些史学家认为，这样用“野心”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化。这些史学家中的一派只愿意把波拿巴看做是法国自然疆界的捍卫者：共和派使他出来任第一执政，继而又让他当皇帝，目的就是为要他替他们保住自然疆界，这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是法国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不幸的遗产，这迫使他去征服欧洲，并且终于毁灭了他。这一派史学家认为他是大革命的战士，他所做的一切无非为了自卫而反抗欧洲旧制度下的帝王；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史学家不过是照搬“老兵”们的偶像崇拜所形成的、后来拿破仑本人又在圣赫勒拿岛上散布的神话传说。另一派史学家不愿贬低个人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反对把拿破仑仅仅看成是命运的工具，他们坚持要从他本身找出他的政策的原动力，他们认为可以从贯穿他的政策的宏图壮志中找到这种原动力。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宏图壮志就是要夺取英国的海上霸权，这样看来，波拿巴的历史，至少从亚眠和约破毁以来的历史，只不过是路易十四发端的对英斗争的最高潮，因此是与旧法国的传统一脉相承的。在另一些人看来，招致他坠入深渊的是逞雄东方的幻景。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与其说是个法国的人物，不如说是个欧洲的人物，因为他想首先恢复加洛林帝国，然后重建罗马帝国——西方的和基督教的文明的一统天下。来说，米雷的话是正确的：只有年事渐高，或可使拿破仑性情变得沉着起来，对外征服或能中止。然而上述其他各家的论点仍各有其价值：拿破仑战争确是英法争夺海上和世界霸权的最后阶段；各大强国无疑都希望一旦时机许可就夺回法国所征服的地方。从1806年起拿破仑即想把欧洲大陆组成一体，这种趋势是很明显的；我们甚至可以同意，如果听任拿破仑为所欲为，他也会非常乐于保持和平。最后，欧洲与拿破仑为敌也可用贵族对革命的法国和对这个暴发户的深仇大恨来解释，而令人诧异的是：上述史学家中竟无一人主张这一论点。逞雄东方的幻景的作用似乎是最无足轻重的论点。

晚近又讨论这一问题的有多伊奇著：《拿破仑帝国主义的起源》（美国，坎布里奇，1938年），但未提出任何创见；还有在勒努万主编的《国际关系史》第四卷，《法国革命与拿破仑帝国》（巴黎，1954年）一书中，著者菲吉埃主张“民族仇恨”之说，并强调旧欧洲反对拿破仑的斗争具有“深刻的”社会性质。

在上述各种解释中，每一种都包含一部分真理，但都是以偏概全。那些捧波拿巴上台的人确实想要保住自然疆界，而为了捍卫自然疆界就可能试图越过这些疆界；但是，如果认为这就是唯一的，或最可靠的保卫自然疆界的

办法，并且认为他在扩大征服时一心想的只是民族利益，那也是不确切的。英国确实是与他周旋到底的顽敌，并且一打垮了他，就断然地战胜了法国；但是，如果他果真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专只针对英国的计划，那他对大陆的政策就会迥然不同；曾造成很多问题的大陆封锁本身就是大帝国建立的产物，并不是建立大帝国的原因。没有比长驱直入君士坦丁堡或印度更能使这位新的亚历山大大帝__乐意的事了；但是，除一时心血来潮而外，他的大部分事业同这种梦想没有联系。他常自比查理大帝与恺撒，有意把西方世界从政治上联合起来；但是，驱使他行动的决不是存心复古。关于拿破仑的传说揭露了反法同盟帝王们对法国大革命战士的深仇大恨，可见传说之中也有真知灼见。而令人惊异的是，有很多史学家竟忘却了这一点；但是，拿破仑并不是限于防御而已。

没有任何合乎理性的解释可以把拿破仑的全部对外政策统一起来，因为他同时在追求几个不同的目的，有些至少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彼此矛盾的。归根结蒂，还是要回到他的“野心”上来。然而，他的同时代人由于目睹喧嚣一时的穷奢极侈的新的豪华排场、放荡的胡闹、贪婪的皇族的争吵、官吏的贪污盗窃，因此虽不否认其天才，但鄙视其“野心”，视之为与常人无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形象清晰了，显示出他的奥秘在于：勇于冒险、迷于幻梦、任性冲动而不能自制。

第一章 法国和英国：战端重启 (1802—1805年)

从亚眠和约到1805年战争之间，在这段关键性的岁月里，拿破仑的个性特征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为明显。同英国签订的和约只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只要大陆战争没有重开，使波拿巴能在1799年上台的解决办法——一个扩大了领土而爱好和平的法国同称霸海洋的英国对峙——并没有被废弃。普莱斯堡和约之后，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波拿巴的经济政策与亚眠和约的撕毁

阿丁顿内阁决心认真试行保持和平，并且相信和平会保持一段时间；这是很难加以反对的。他废除了所得税，把海军开支削减了二百万英镑。海军大臣圣文森特暂时停止造舰，并且解雇了海军造船厂的工人。木材供应商由于他着手调查他们侵吞公款的案件，和他闹翻了，于是造船厂的材料供应很快就断了。然而政府在自己党内遭到了反对。托利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相信，和平会使法国重新武装起来，从而对不列颠帝国发动新的袭击，所以他们就象一百年前辉格党人一样呼吁作战到底。这些托利党的反对派控制了一部分报纸，法国的亡命者佩尔蒂埃帮助他们咒骂法国革命和波拿巴的军事独裁。英国商业界人士在托利党这两派意见之间举棋不定。和平危害着很多行业的利益：许多军事工业苦于停工；英国商人就要失去他们对波罗的海和德意志商业的垄断，尤其是失去了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归还法国的殖民地意味着英国贸易的减少，仅仅荷属圭亚那的贸易就减少了一千万英镑。最后，在亚眠和约签定之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大下降，以至中立国，特别是美国，也认为和平是一场灾难。然而一般都认为这些不幸只是暂时的。这些托利党人敲起的警钟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但在海上和殖民地，危害似乎还不是迫在眉睫。至于大陆，英国舆论对它并不过于关切。真正问题却是要弄清楚：波拿巴是否会把法国及受它控制的一些国家的广大市场向英国的商业重新开放，因为假如不建立对英国人有利可图的商业关系，英国人就不会长期容忍这项条约的存在。1802年5月，外交大臣霍克斯伯里重申，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人赞成和平，就需要加速重建商业关系。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执政的经济政策。

拿破仑同一切开明专制君主一样，总是非常注意经济的进展；这的确不是因为它能改善人民的处境，并使平民各阶级分享文明的成果，而只是出于政治的动机。因为发展经济就有希望建立健全财政，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从而使军队获得新的兵源，最后由于减少失业和增产粮食，从而确保“秩序”。因此，他对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的关注是不平衡的。一心考虑着战争的拿破仑对商业界和金融界是不信任的，因为这两界的活动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并

到处同英国有密切联系。他对工业很感兴趣，尤其关注那些消耗本国原料的工业。他认为，一个军事大国的力量，象斯巴达或罗马这样军事强国的力量，是寓于农业之中的；农业提供好士兵，在必要的时候，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是重农主义的，随着他疏远资产阶级而考虑重新创立土地贵族，他就从另一个方面来接近这个学派。然而，正象往常一样，每当他遇到具体困难，他从来都不屑拘泥于一家的学说。虽然他偏爱农业，他却总是不愿给予出口粮食的权利，因为正象共和十年的经验所证明，面包价格一上涨就会引起群众的骚动。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和一般平民想法一样，痛恨囤积粮食投机的商人和粮农的“利己主义”。工业危机使得工人失业，引起了同样的问题；所以他需要非常照顾棉纺工业，尽管它所使用的是进口原料。

在波拿巴所面临的一切实际问题之中，最需要他注意的是货币问题。英国是允许适当的有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它使物价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因而对生产起到了刺激作用；而法国除了银行发行的有限的纸币外，仍然不得使用硬通货，这种通货总是被人贮藏起来，因此总感到金币不足。这种情况使法国的经济遇到了麻烦，因为资金继续不足，而且昂贵。波拿巴总是不断责备法兰西银行在贴现商业证券方面所持的过分谨慎态度，他很想看到这家银行在外地多设分行，使信贷得到广泛使用。硬币的不足使国库负担沉重，因而对国家的财政也产生了不利的影晌。在发行指券失败之后，波拿巴无论如何不愿采用纸币，因为用纸币就要用政权力量去强制流通，这样势必有害他的威望。象科尔贝尔在类似的情况下必须为路易十四解决财政问题一样，波拿巴也转变为重商主义者，他认为，法国必须少从国外购买货物并增加出口，或征服外国，以取得金属而保护其硬币的供应。

因此执政府尽力鼓励生产，特别是生产奢侈品。1800年建立的统计局重新进行由救国委员会和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所开始的调查工作。它通过郡守从事法国经济和人口的调查，而且在随后的几年里发表了调查结果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为了统一国内市场而采用了十进位的公制，不过这种公制只是很缓慢地才获得通用。共和十一年芽月17日（1803年4月7日），把货币制度固定在金与银的为一比十五又二分之一的比率上，但是，由于贵金属缺乏，不能保证铸造足够的硬币来代替旧通货。然而新政权坚决稳定货币，因为法郎的法定价值以白银为依据（一法郎为四又二分之一克纯银，或五克九成纯银）。而旧制度下的里弗从来没有过法定价值，所以计算上的货币和实际使用的货币在价值上第一次完全相符。商业的管理委托给了一个总委员会；随着帝国的诞生，商业管理又由参议院中的一个组负责。1801年3月19日，商业交易所改组了；1802年12月24日，商会重新出现了；1803年4月28日，十六个海港被指定为国际贸易港，并准予建立保税仓库。1801年底，在夏普塔尔的主持之下组织了一个“全国工业促进会”；作为内务部长，他恢复了督政府时期举办工业展览会的做法。1803年4月12日，制造

业公会出现了。巴黎农业协会则于 1798 年就已重新成立起来。波拿巴和科尔贝尔一样，本性就倾向于通过行会进行管理。工匠会因为恢复了他们的垄断权而高兴，某些商人会欢迎那些针对家庭手工业者或雇工的管制规定。警察厅长以“公共秩序”为借口设法把面包商和屠宰业各组成公会。可是，第一执政当时还不敢走得更远，因为受到参议院支持的银行家和大实业家都强烈反对任何限制劳动自由的规定。共和十一年芽月 22 日(1803 年 4 月 12 日)法律只限于规定商标注册制度。另一方面，财政状况也不容许波拿巴按他本来的意愿那样大举兴办公共工程，同时也没有能力直接资助鼓励私人企业。甚至稍后到资金较为宽裕时，拿破仑也拒绝直接资助私人企业；他只给加工订货，并在经济发生危机时，为了避免失业现象，拨出贷款给私人企业建立库存。因此在科尔贝尔的制度中，还没有使用的只有保护关税而已。

许多强有力的理由表明应当采取最后这一步骤。让—巴蒂斯特·萨伊所极力主张的自由主义经济还远未被人们普遍接受。费里埃在 1805 年出版的《论政府与商业的关系》一书中仍然坚持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甚至在亚眠和约签订之前，有人就不断攻击英国的走私活动，战争一结束，走私活动更为猖獗。棉纺工业家大喊大叫地说，如果又恢复 1786 年条约，则随着该条约产生的严重危机势必重现。织布业依然是极其繁荣的，纺纱业虽然有些进步（棉花进口量前十年的年平均数五百万公斤，到共和十二年上升为将近一千一百万公斤），却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尤其是在高支纱方面，无人能与英国工业竞争。波拿巴没有撤销督政府对英国商品的禁令；他并且在 1802 年 5 月 19 日还批准暂时提高关税税率，对英国殖民地商品的征税至少比法国殖民地的同类商品高百分之五十。

在亚眠和约以后，波拿巴并非不愿和英国订立一项商务条约。

科克贝尔·德·蒙布雷和一些商界代表被派往伦敦；英国提议恢复 1786 年的条约，但可适当修改，并允许法国采取一些临时措施照顾本国工业。1802 年夏天，商会宣称断然反对禁止英国商品进口，夏普塔尔建议政府接受伦敦的提议，同时要求英国按从葡萄牙进口雪利酒和波尔图酒的同样条件准许法国酒类进口，并且也允许法国丝绸输入英国。他也忠告法国不要把关税定得太高。他说：“我在等待我们的工业家开始大声疾呼。”如果给工业家适当照顾的话，这个方案是站得住的。科克贝尔却提出相反的建议：法国输入英国多少商品就准许英国输入法国相等价值的船货。夏普塔尔反驳道，这样的建议意味着颁发特许证，并会造成只对少数人有利的对外贸易垄断。夏普塔尔称之为“荒谬”的特许证制度事实上就是后来在 1811 年实行的办法。在自由竞争和禁止通商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制定适当的保护政策的余地，如果取得英国同意的话，这是夏普塔尔所倡议的，也是法国工业非常需要的。波拿巴要在大工业家的要求和民族利益（它需要和平）之间作出抉择。最后他事实上支持了禁止通商。

波拿巴对维护和平是不感兴趣的。他告诉蒂博多：“一个第一执政不同

于那些蒙上帝恩典的帝王，他们把他们的国家视为世袭的财产……而第一执政需要取得辉煌的成就，因此他需要战争。”

他很谨慎而不公开说出这种想法，因为国民不会赞成这种想法。

“让外国人先开仗，这对我更为有利。”但是，他补充说，“他们将是首先再动武器的人。”他既抱这种态度，当然就会鼓励他们先动手。无论如何，禁止通商保证了硬币的积累，有助于备战工作，直到变成一项战争的武器，法国大革命期间就是如此。人们认为建立在举债和通货膨胀基础之上的英国经济和财政结构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脆弱了。奥特里夫于共和八年、盖尔于1801年、拉萨尔于1803年，还有《政府通报》本身都用各种笔调反复表达这一意见。虽然威胁法国的危险毫无疑问地存在着，然而法国却又错误地认为自己单枪匹马就能使英国在经济上遭到毁灭。波拿巴也大有这种错觉，因为作为一个军人、一个独裁者，他蔑视这个既无陆军和又无政府可言的商人寡头统治。他把英国比作迦太基，而他自己则要扮演伽图和西庇阿的角色。商业条约已无人再提：有一些商船被拿捕了，因为发现它们运载了英国的货物。然而法国的对外贸易从1799年的五亿五千三百万法郎上升到共和十年的七亿九千万法郎。英国资本家知道经济斗争将会继续下去，他们厌弃这种对自己毫无好处的和平。

因为殖民地产品是法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项目之一，所以尽早收复仍旧属于法国的安的列斯群岛就成为当务之急。甚至在亚眠和约签订之前，波拿巴就向圣多明各派遣了一支远征军。杜桑-卢维杜尔这时控制了全岛，而且于1801年5月9日颁布了一部宪法，名义上仍属于法国，实际上归他自己统治。然而他终于向法国远征军首领勒克莱尔将军投降，但却在1802年6月7日被捕，解送法国，1803年4月7日死于法国日乌堡里。与此同时，里什庞斯再度占领了西印度群岛中较小的岛屿。虽然英国不能再阻碍法国去征服安的列斯各岛，但却不安地注视波拿巴对路易斯安那的计划：北海沿岸正在准备一次远征，打算把维克托将军派往那里去。舰队预定在1803年3月启航，但是出发的时间推迟了。在准备远征期间，西班牙已禁止美国船航行密西西比河。由于法国和西班牙是盟国，荷兰受法国控制，所以墨西哥湾似乎任凭波拿巴的摆布，从而也控制了西属西印度群岛上的走私，法国在这里处于一种有利的特权地位。然而，这种前景不必英国出来干预就消失了。若干时候以来就垂涎西属佛罗里达的美国不希望看到法国在新奥尔良立定脚跟。新当选的总统杰佛逊同他的国务卿麦迪逊和加勒廷试图实行共和党的和平、裁军和压缩开支的纲领。纵然杰佛逊对法国有好感并对莫尔丰丹尼条约的签订感到高兴，他却不能不顾美国的舆论。因此他透露：如果法国留在路易斯安那，美国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将参加英国一方。1803年4月12日，杰佛逊的大使门罗到达巴黎，带来一项波拿巴已经同意的建议：购买路易斯安那的领土。随后于5月3日签订的条约规定给波拿巴八千万法郎，在扣除应付美国的赔偿，并给办理交款的银行家霍普和巴林的佣金之后，只剩下了五千五百

万法郎。

这时，起义已经遍布圣多明各全境，这是由于恢复奴隶制引起的。在波拿巴身边的亲信随从里，白人种植场主的代言人很多（更不用说约瑟芬本人了），他们认为奴隶制是在殖民地迅速恢复生产的最得力的方法。但是，恢复奴隶制并不是迫切需要的，因为，甚至在已经实行共和二年雨月 16 日法令的殖民地，督政府的特派员和杜桑-卢维杜尔本人都已经实行了强制劳动。波拿巴最初倾向于确认这个制度，而把奴隶制仅限于存在奴隶制的岛屿上——例如在马斯克林群岛，那里把国民公会法令视为一纸空文；又如英国占领下的马提尼克岛，那里从来没有能接到这项法令。最后，波拿巴让步了。的确，1802 年 5 月 20 日法律明确规定在殖民地将“保持”奴隶制；人们从这条法律可以推论出，在已经废除奴隶制的地方，就不再恢复奴隶制。但是，波拿巴却作出另一个决定，他命令里什庞斯在瓜德罗普岛重新实行奴隶制，因而激起了一次起义。在圣多明各，勒克莱尔宣称实行这一措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但是，黑人都知道将要遇到什么不幸的事了，9 月，杜桑的部将克里斯托夫和德萨利纳轻而易举地在全岛发动了起义。法国军队由于黄热病而大批死亡，迅速遭到削弱。勒克莱尔病死，他的继任者罗尚博是种植场主的支持者，他在进攻黑白混血人的战争中使法军伤亡殆尽，由于波拿巴禁止这些混血人进入法国和与白人通婚，已经激怒了他们。太子港法军于 1803 年 11 月 9 日投降，少数被围困的驻防部队设法苟延残喘到 1811 年。

英国人虽不喜欢看到法国重建它的殖民帝国，但他们也不会为阻止它这样做而提早重新开始战争的。但是，威胁英国的属地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而这恰恰是波拿巴所干的。一个新的宏伟的设想激励着他向地中海方面扩张，这就是说，目标就是埃及。亚眠和约终于使土耳其人决定同法国人签订和约（1802 年 6 月 26 日），并为法国人开放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一个名叫吕芬的法国代办立即着手在地中海东岸各国重建领事馆。法国在 1801 年和 1802 年还分别与黎波里的帕夏和突尼斯的别伊缔结了条约。1802 年 8 月，一支舰队强迫阿尔及尔总督也同法国订立了条约。君士坦丁堡已经很担心法国在伯罗奔尼撒、艾奥尼纳和塞尔维亚人中间搞阴谋，并且感到有被瓜分之虞。8 月底，塞巴斯蒂亚尼上校经过的黎波里前往埃及，然后又访问了叙利亚，他到处都设法和本地的首领建立联系。卡韦尼亚克被派往马斯喀特；德凯恩于 1803 年 3 月 6 日启航前往印度，随行的重要参谋人员之多足能把印度士兵组成若干团队。所有这一切使得英国得出结论，波拿巴正在计划对埃及和印度发动一场新的进攻；为了谨慎起见，一定不让他完成准备工作，特别是不能放弃马耳他岛。但是，英国人继续占据该岛就是破坏亚眠和约。

波拿巴在欧洲大陆的政策给英国人提供了不交出马耳他的借口。波拿巴不顾席梅尔佩宁克的再三要求，拒绝从荷兰撤军，他辩解说，和约的条款还没有履行。虽然波拿巴放弃了那不勒斯的各港口和教皇各属邦，他却在 1802

年8月吞并了厄尔巴岛，9月吞并了皮埃蒙特，10月在巴马公爵去世之后占领了巴马。在瑞士，法国军队刚刚撤完，雷丁就在1802年8月27日夜周领导山区的一些州起义。起义者在施维次召集了议会。苏黎世、伯尔尼和弗里堡都在其掌握中。合法政府到洛桑去避难，答应沃州起义农民废除封建赋税，同时允许以国有产业来赔偿地主的损失，可是并无任何效果。因此，这个政府只好向波拿巴请求援助。第一执政于9月30日进行调停，强迫起义者解除武装。内伊进军瑞士，议会从英奥两国那里只听到一些好听的话，却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只得自行解散，雷丁被捕。12月10日，在巴黎召开了一个协商会议，指派了一个委员会同几名法国元老院议员一起讨论波拿巴关于制定宪法的计划。波拿巴命令委员会为各州草拟宪法，草拟的条文后来附入1803年2月19日的“调停条例”中。十九个州各都有自己的宪法，大都规定了有财产资格的选举权，尤其在以前由贵族统治的各州里是如此；在那里，宪法规定保证革命前的城市贵族的统治。这些州恢复了大部分自治权，特别是处理国有产业和解决封建赋税和宗教事务的权利。这就使得反动势力几乎在各地都取得了胜利，宗教自由只在原已存在的地方才得到了保证。表现国家统一的就只剩下各州的平等权利，它们被禁止各别结盟，瑞士人在全联邦居住和拥有财产的自由，国内关税壁垒的废除，以及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包括一个议会，每个州根据其重要性在议会有一个或两个表决权，还包括一个行政长官，即联邦主席的官职，由六个主要的或者说“执政的”州的首领轮流担任。波拿巴指定路易·达弗雷为第一任总督，他是一名法国的瑞士卫队前任军官，代表弗里堡州。1803年9月27日，瑞士联邦和法国签订了一项为期五十年的防御同盟条约，并且重订了为法国招募四个团、每团四千名新兵的条款。但是联邦却没有常备军，而且波拿巴甚至不允许瑞士成立总参谋部。

与此同时，法国利用根据吕内维尔和约规定补偿来因河左岸被剥夺了的王侯的机会，在德意志扩充势力，进展很快。德意志帝国议会曾拒绝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解决这个问题，并授权一个委员会就此事与法国相商。奥国外交大臣科本兹企图以提议结盟来对法国施加影响，但却徒劳无益。波拿巴和俄国的亚历山大已经同意共同解决此事。事实上，以普鲁士国王为首的所有德意志王侯都去巴黎谈判，他们以合计总额达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法郎的巨款贿赂塔列朗，以保证尽可能争得最好的土地。乔治三世自己接受了奥斯纳布吕克主教邦。美因兹的选侯达尔贝格热心为法国效劳。唯有萨克森很不高兴，因为它没有要求补偿的权利。1802年6月3日，法国和俄国邀请帝国议会批准在巴黎制定的计划。奥国表示不赞成，并且占据了帕骚，此地是决定要给巴伐利亚的；但是在各王侯的一致抗议下，奥国不得不撤离帕骚。最后是波拿巴在12月26日缔结的条约中为它保留了一块地方，从而挽回了奥国的面子。1803年2月25日德意志帝国议会批准了“帝国大法”。

这个新的帝国组织法废除了各教会邦国，从而完成了1555年和1648年

的世俗化过程， 同时把五十一个自由市减为六个。

普鲁士获得了几个主教邦：帕德博恩、希尔德斯海姆、埃尔富特和明斯特的相当大一部分；巴伐利亚得到了弗顿津主教邦和帕骚的一部分；巴登得到了曼海姆和海得尔堡两城市，以及斯皮尔、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等各主教邦的在来因河右岸的领土；其它各邦则按其比例大小各分得一份。分得最少的奥国获得了布里克森和特伦特两个主教邦以及帕骚主教邦的一部分；它把布赖斯高和奥尔特瑙割让给了摩德纳公爵；由于奥国的影响，托斯卡纳大公接受了萨尔斯堡和艾克斯塔特主教邦。奥国没收了它自己领土内被剥夺了的王侯们的土地和财产。

对于罗马天主教会来说，1803年的“帝国大法”是一场大灾难，它可以与十六世纪的大灾难相比：教会丧失了将近二百五十万臣民，损失了岁入两千一百万弗罗林；十八所大学以及所有的隐修院脱离了宗教控制；在大主教选侯中，经过这次大改组之后幸存下来的只有美因兹的达尔贝格，而他又被调往累根斯堡。奥国除丧失其威望之外，还眼看着神圣罗马帝国难保，因为符腾堡、巴登与黑森—卡塞尔等新教各邦都成了选侯，就使得新教徒在德意志各邦中和在选帝侯中都一跃而为多数。尽管奥国竭力想保住帝国骑士 和各骑士团地位，在“帝国大法”中为他们争取到保留规定。

但他们不久就消失了。德意志领土的打乱调整，只有法国能从中取利，因为整个南德意志都倒向法国一边来反对哈布斯堡王室。

普鲁士取得很多，但仍未能满足它的欲望；为避免与英国发生纠葛，普鲁士不敢接受汉诺威并同法国结盟的建议。随着和平的降临，普鲁士不再能控制北德意志。1802年6月10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梅默尔会见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在那里和路易莎王后发生暧昧关系，这种关系使他后来一直和霍亨索伦王室联在一起，但是普鲁士国王感到他自己不像是俄国的同盟者，倒象是俄国的被保护人，所以颇感受到轻视。

英国目击了这一切巨变，但却无能为力。这些变化纵然没有破坏亚眠和约的明文规定，但在英国看来却是与条约精神不符的。英国在感到愤慨的同时，也感到快慰，因为它知道俄国与奥国都关心瑞士的命运，而且奥国在丧意大利之后，又失势于德意志，心有不甘，正如阿丁顿所预见的那样，英国又将会找到同盟国。直至1802年10月，英法关系一直是相当好的。对于《政府通报》颇多不满的阿丁顿甚至接受波拿巴的抗议，对佩尔蒂埃提出了控诉。直至9月10日，内定派赴巴黎的英国大使惠特沃思得到的训令还完全是心平气和的。但是法国在意大利吞并领土，特别是对瑞士的干涉（这次干涉同1798年那次干涉一样引起很大震动 ）使得英国从根本上改变了态度。霍克斯伯里表示“深感遗憾”。“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我们需要法国政府的合作。”“英国希望恢复签订亚眠和约时欧洲大陆的状况，别无其他。”在他的心目中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即法国每扩张一次，英国就要求补偿一次。最符合法国利益的做法至少是要赢得时间；它只有四十三艘战列

舰，虽然还计划建造二十三艘，但却要到 1804 年才能完成。波拿巴在给德凯恩的训令中预料到了战争，但是认为不致于在 1804 年秋季之前爆发。然而他反驳说，英国“应履行全部亚眠条约，别无其他。”塔列朗的恐吓则更是火上浇油：“随着第一声炮响，就会诞生一个高卢人帝国，”并且劝告波拿巴“使西方帝国重见于今日。”即使如此，霍克斯伯里也没有加剧这一紧张局势，还是让法国大使安德列奥西和英国大使惠特沃思各赴任上。这种显而易见的软弱表示只是更加激励了第一执政。1803 年 1 月 30 日，正当英国行将完成从埃及撤军的时候，他在《政府通报》上发表了塞巴斯蒂亚尼将军的报告，其中提到了“一万士兵足以再征服埃及”的名言。这一类挑衅的话使人思想混乱不解。尽管他曾对吕西安说，他这样做是指望刺激“约翰牛来战斗”，但是他清楚地知道法国还没有准备好。但到 10 月间塔列朗也宣称，如果英国要让世界相信“第一执政由于不敢而不去做某一件事情的话，那他就会立即去做的。”这种声明既缺乏理性，又有损民族利益。

事实上，霍克斯伯里的忍让姿态完全是暂时的。他在 1802 年 11 月 25 日写信给惠特沃思说，“由于法国最近某一次侵略行为而使英国卷入战争，这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是一种明智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必须设法利用这些侵略来为将来同俄、奥两国建立联合防御体系。”早在 10 月 27 日，他就明确地向俄国建议结盟以维持欧洲现状。亚历山大那时正专心致力于同法国一起处理德意志的事务，所以最初对这一建议置若罔闻。但是波拿巴的东方政策终于触动了他：就象在 1798 年法国对埃及的远征那样，它使俄国转而接近英国。亚历山大认为，假如他得不到马耳他，那么宁可让英国人得到这个岛屿，也比让法国人得到它要好些。因此在 1803 年 2 月 8 日霍克斯伯里获悉，沙皇希望英国推迟撤离马耳他。这一消息是在塞巴斯蒂亚尼的报告在《政府通报》上发表之后到达的，真是来得及时。9 日，霍克斯伯里指示惠特沃思，在从马耳他撤离之前，英国要求法国政府对其行动作出“令人满意安心的解释”。

接着在波拿巴与英国大使之间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争论。2 月 20 日，波拿巴在给立法院的一份谕文中谴责了伦敦主战派的行径。3 月 8 日，乔治三世在议会开幕致词时回答了这种谴责，他提醒人们注意法国的军备情况；议会即通过征召民兵。当时，英国留在马耳他是有根据的，因为亚眠和约中所规定的条款还没有履行：亚历山大提出要先修改条约，他才肯充当保证人；普鲁士亦步亦趋。而此时已决定继续占领马耳他的阿丁顿则利用这一机会，以便迅速扭转形势。3 月 15 日，他提出要在马耳他占领十年，作为由于法国进行新的扩张而给予英国的补偿；塔列朗答复愿在亚眠和约的范围内举行谈判。与此同时，霍克斯伯里于 4 月 14 日得知，尽管俄国又表示拒绝缔结同盟，但却答应在土耳其受到攻击时给予援助，并重新提出它在马耳他问题上的忠告。26 日，惠特沃思交给波拿巴一份最后通牒。

英国人突然采取的坚决态度使第一执政周围的人感到不知所措。富歇在

元老院告诉波拿巴，“你自己与我们大家一样，是革命的产物，而战争又使一切都成为未定之数。”3月，有人从中奔走告诉惠特沃思说，只要进行适当贿赂，第一执政的亲属可能会答应使波拿巴平息下来，而且只要塔列朗也能得到一份好处的话，他也会帮忙的。俄国表示不安也使波拿巴感到十分烦恼：3月11日，他再次写信给沙皇，要他放心，并请他劝说英国人平静下来。他现在要求沙皇从中调停，并建议让英国人占领马耳他一两年，然后把它移交给俄国。阿丁顿答复说，不能接受这一建议，惠特沃思于5月12日离开了巴黎。至于是否把断绝邦交视为宣战，英国政府还保留有抉择权，但这与欧洲大陆的惯例正相反，英国的战舰在海上不预先警告就开始拿捕法国商船，于是这被法国斥为“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的不折不扣的海盗行径。事实上亚历山大接受了调停的邀请；波拿巴这一邀请又巴结了他，此外，占领马耳他正中他的下怀，这样就可以把英、法两国排除在东方之外。俄国大使沃龙佐夫要求说明英国拒绝调停的理由，阿丁顿答复说是由于他还没有时间请示国王。阿丁顿态度如此强硬，一反常态，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受了主战派——可能是皮特——的干预。这种态度在国内没有造成好印象，辉格党人不遗余力地予以谴责；英国要过了一些时间才能适应这种形势。但是波拿巴是如此气势汹汹，使英国很快纠正错误，比在法国革命时期要快得多。

英法决裂的责任问题成了激烈争辩的话题。虽然波拿巴的挑衅是无可争辩的，但英国在有希望取得俄国合作的时候起，却先破坏了条约、并主动发动了预防性的战争，这也是事实。英国的辩护理由是要保持欧洲的均势，但这种均势却不推及到海洋，因为在英国人的眼中，海洋是上帝为英国人创造的。波拿巴与英国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只是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

二、法兰西帝国的建立（1804年）

战争给中立国的海运带来了利益，但同时却阻碍了英国的贸易，并且引起了英镑贬值；但战争使法国贸易受到的打击更大。波拿巴以没收敌人的货物，尤其以逮捕和监禁英籍臣民来报复英国对法国商船的沉重打击。尽管他认为英国拿捕法国商船是他采取行动的正当理由，但他这样的反击措施却被认为是太过分了，而且对法国商人无补于事。亚眠和约签订以后，法国商人大量投资造船业，很多人为此破了产，其中就有法兰西银行的一位董事巴里荣。所有的银行均直接或间接地投资于海运业，因而都面临着破产的威胁。证券交易所也受到了影响：利息为百分之五的证券3月份还值票面价值的百分之六十五，到5月下跌到百分之四十七。意识到危机临头的波拿巴根据共和十一年芽月24日（1803年4月14日）法律改组了法兰西银行。莫利昂曾不断谴责法兰西银行的股东，这些股东享有为他们自己的票据贴现的特权，并且分得优厚的红利，而后又在银行股票价格上升中搞投机。根据新法

律，红利限定在百分之六，贴现工作委托给一个商人委员会办理，但从 1805 年的情况看来并无任何真正的改进。对于波拿巴来说，加强法兰西银行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这家银行的资本提高到了四千五百万法郎，并有了储备金。它取得在巴黎发行钞票的垄断权，并且吞并了其对手商业贴现银行。作为报答，法兰西银行同意贴现在一两个月后可以收集的收税专员的期票。商业和国库仰仗法兰西银行的帮助都能渡过风险，而不致遭受重大的损失。

波拿巴的声誉并未受到损害。既然英国撕毁了亚眠和约，并且未经宣战就开始敌对行为（这是它的一贯做法），他完全可以把责任完全推到英国身上，而不会受到反驳。遭到攻击的法国除了团结在其元首周围之外别无其它选择，在面临英国政府又开始怂恿和资助的新的保王党阴谋的情况下，全国的决心更加强了。所以战事重开后的第一个结果是国民让波拿巴获得了皇帝称号和世袭继承权。

卡杜达尔一直不断地使他的同谋者进行阴谋活动；从 1803 年初以来，他的两名间谍被捕入狱。8 月 21 日，他亲自在下塞纳郡的比维尔登岸，从那里来到巴黎，许多同党把他隐藏起来。据他自己说，他是想要绑架波拿巴，而不是要暗杀他；但已决定，倘若波拿巴抗拒就杀掉他，显然，这个企图就是要杀害他的。阿图瓦伯爵的到达将作为这次行动的信号，但他一直没有来。与此同时，到处又出现了保王党的骚乱，西部又出现成帮的盗匪。另一方面，拉若莱将军正力图把皮什格鲁与莫罗撮合在一起。他们两人之间已经通过一位叫作达维德的神甫建立了联系，这个神甫已于 1802 年底被捕。拉若莱于 1803 年 8 月底赴伦敦，12 月又返回来，皮什格鲁也很快随之而来。莫罗同意与皮什格鲁会面，但鉴于舒安分子卡杜达尔参与了这项阴谋活动，他就不同意参加。最后参与这项阴谋活动的第三条线的线索被梅埃·德拉图什破获了，他以前是雅各宾派，后来成为一名间谍；他在伦敦和某些亡命者集团接触联系之后，建议他们与共和派阴谋分子合作。随后他设法到了德意志，在慕尼黑英国使节德雷克把自己的种种策划告诉了他：要在来因地区煽起叛乱，并维持与阿尔萨斯通消息，以便准备使当甘公爵率领的一支由保王党亡命者组成的队伍能进入法国。

其实贩卖活动到处都有，而第一执政只发觉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在德累斯顿，亚历山大的间谍昂特雷格伯爵通过“巴黎女友”，约瑟芬的一位密友详细地了解波拿巴私生活的情况，并通过“巴黎友人”了解他的政治动向，此人是塔列朗的一个助手，似乎是未来的帝国大军的兵站总监达律，或是他的父亲，他把一些外交文件提供给昂特雷格。在大法官雷尼埃平庸无能的指导下，警察的搜索毫无结果。尽管富歇动用了他自己的情报系统为第一执政效劳，但波拿巴在 1804 年初对这一切还是所知有限。2 月，他决定采取行动。有两名囚犯在拷问下供出了“有位亲王”即将到来一事，并供出了关于和莫罗谈判的情况。于是莫罗立即被捕，当时“恐怖政策”似乎再度提上了日程：关闭栅栏、搜查住宅次数增多、中止陪审制度、任命缪拉为巴黎总督。警察

不久就抓获了皮什格鲁和卡杜达尔。同时梅埃·德拉图什报告说，当甘公爵就住在巴登的埃登海姆，离斯特拉斯堡不远，他还说亡命者正在奥芬堡集结。波拿巴认为，这位公爵即是阴谋分子等待着的那位“亲王”。3月10日，在一次有富歇和塔列朗参加的会议之后，他决定绑架当甘公爵。

绑架交由旧贵族出身的科兰古侯爵执行，并由奥德内尔将军作为他的助手。科兰古未能在奥芬堡发现任何亡命者的军队，但奥德内尔却在3月14日至15日夜于埃登海姆逮捕了当甘公爵。20日，另一次会议决定了执行步骤。这位公爵于下午五时被带到万森，夜间十一时被带到一个军事法庭受审，次日清晨二时被枪决。尽管他的文件没有表明他与卡杜达尔共谋，但却有证据说明他被英国收买了，并且他盼望指挥入侵阿尔萨斯。他不是被宣判为阴谋分子，而是被宣判为接受外国津贴要入侵法国的亡命者。假如他是在法国本土或在敌国被捕，就可以合法地宣判他死刑。但是在一个中立国绑架他，波拿巴却十分明显地损害了法国的利益，因为这给欧洲列强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借口。随即审判了一批阴谋分子。有二十人于6月9日被判处死刑，波拿巴赦免了其中十二名大部分出身旧贵族的人，其余的（包括卡杜达尔）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皮什格鲁被发现勒死在他的牢房里。莫罗被判释放，但是法官奉命重审；这次法官宣判他服刑两年，后来减刑为流放。在审判过程中，资产阶级及出入于沙龙的上流社会人士情绪激昂。罗德雷于6月14日写道，“对政府的仇恨和谩骂就象我在法国革命前所曾看到的那样剧烈，那样肆无忌惮。”这种情绪在剧院里和在法院里都有所表现。波拿巴政权同旧势力的和解一时遭挫，已经接受了一项外交职务的夏托勃里昂辞职了。但是这些激烈的批评者并不考虑要诉诸人民，新闻界保持缄默，从全国的动向来看，不是表示漠不关心，就是表示拥护波拿巴。

波拿巴周围的人，以及希望重新得宠的富歇这一次都催促他要趁热打铁利用这一机会。他们向他建议，世袭制度的建立将会解除刺客们的武装：这纯是稚气十足的议论，因为假如波拿巴遇害，这个政权就肯定会被推翻。真正能肃清暗杀活动的是实行恐怖措施和改进警察监视制度。但是议会各院却装出一副认真考虑这个借口的样子，以便表明在建立世袭制中它们不是没起过作用的。此外，共和派对当甘公爵被处死一事是满意的：“我很高兴”，保民院议员居雷说，“波拿巴与国民公会是由同样材料制成的。”3月23日，元老院宣布，“修改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在征询参政院的意见时，它表示反对世袭统治的原则，但在4月23日，居雷使保民院通过同意建立世袭制。于是波拿巴答复元老院说，“贵院已认为有必要建立世袭制。”并未作出这样的决定的元老院只好默认。5月16日至18日，起草了一部新宪法，然后以元老院决议案的形式于共和十二年花月28日（1804年5月18日）颁布，最后由公民投票批准。“共和国政府”付托给一位世袭皇帝，这位世袭皇帝领取二千五百万法郎的皇室费，并获得除他私人庄园之外的皇室领地的收益。在建立宫廷和管理皇族事务方面，他有权自由处理。

主要困难在于规定继承法规。“世袭”一直总是“长子继承权”的同义语，然而波拿巴无子，他自己甚至也不是家庭的长子。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不外乎象在罗马帝国时代那样，让皇帝保留指定自己的继承人的权利。事实上，波拿巴保有认领嗣子的权利，但他却拒绝给那些可能继承他皇位的人这一权利。即使如此，他还是极为忠于他的一族的，而不愿意全然摈弃他们。然而，他的兄弟们却拒绝把他们的继承权让给路易·波拿巴的儿子。他们享尽了荣华富贵，但却不知道感恩，在他们的母亲的支持下，这些人给拿破仑制造了无数的烦恼。吕西安刚娶了儒贝尔通夫人（一个破产了的投机商的寡妇）；随战舰到安的列斯群岛服役的热罗姆跑到美国与一个商人的女儿结了婚；改名叫波利娜的波莱特不征求她兄长的意见就嫁给了博尔盖泽亲王。还有缪拉的妻子阿农齐阿塔（现在重取教名卡罗利娜），以及嫁给了那位荒唐的科西嘉人巴乔基的玛丽亚娜（后来叫作埃利兹），这两姊妹都因波拿巴没有封她们为公主而大发雷霆。最后决定，如若没有亲生的或认领的后嗣，那么继承人就是约瑟夫，约瑟夫之后即是路易。吕西安因为拒绝与其妻离婚而被剥夺了继承的权利，他于是离开法国住到意大利去。

象在共和十年那样，元老院要利用这样时机表达想取得一些宪法保证的愿望，不过这一次是正式提出。元老院想要变成一个拥有否决权的世袭团体，这一权力使它能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至于立法院，丰塔内要求还给立法者发言讨论的权力，并让该院主席职位具有“稳定性”，实际上就是指他自己。但实际取得的结果是，元老院取得了指定两个常设委员会的权力，这两个委员会分别负责维护人身自由及出版自由。它们仅有权听取申诉，并且在调查之后宣布：有这两种自由受践踏的“推定”。与此相反，警察又经改组，并在更大程度上加强中央集权；富歇在7月10日又重新成为警务大臣，法国被分为四个警务区，分别由对他负责的四名参政官掌管。除此之外，政府机构很少有什么改变。拿破仑更趁此机会掌握了不受限制地选定元老院议员的权力，并宣布，亲王们即他的兄弟们同六名帝国大勋爵是元老院当然成员。

由于规定了亲王和大勋爵，以及高级官员（包括十八位元帅及若干宫廷大臣），共和十二年宪法就标志着创建新贵族的重大步骤。帝国宫廷规模日大，金碧辉煌，奢侈豪华。关于优先位次的共和十二年收月24日（1804年7月13日）法令将礼仪推行到整个政府机构。与旧势力和解的事很快又恢复进行了。从这时起拿破仑热中于要创立一个新的贵族阶层，他很快地把荣誉军团变成了单纯授勋的装饰品。当决定邀请选举人团的代表参加他的加冕典礼时，他特别指出，这些代表要从有名望的世家中挑选。在典礼举行的那天，他发泄出对平民各阶级的蔑视，“法国真正的人民是各区的长官、各选举团主席和军队”，而不是“两三万鱼贩子以及类似的人……；我看他们只是一个大城市的堕落的愚昧无知的社会渣滓。”

因此，拿破仑不能把民众的委托视为新皇统的真正基础。象矮子不平

一样，他要求教皇为他授圣职，这样王权神授说就能恢复，并可写入教义问答中。塔列朗与贝尼埃在巴黎同圣使卡普拉拉谈判；在罗马，皇帝的舅父红衣主教费什也在同孔萨尔维进行谈判。作为前宪政派教士的费什，曾被任命为里昂大主教、红衣主教以及派到圣座前的大使。鉴于拿破仑不久前对当甘公爵的处决，庇护七世害怕得罪各列强，当然有理由犹豫不决；但是因为他希望修改组织条例，而且也许还希望收回其属邦，最后他还是同意了。保王党顿时喧哗叫嚷起来；约瑟夫·德·梅斯特写道，教皇已经“使自己堕落成 一个无足轻重的傀儡小丑。”教皇所得到的只是那些过去拒绝向正统派屈服的宪政派主教对他的顺从；即使如此，斯特拉斯堡的索里内主教仍然拒绝否认“教士法”。庇护七世甚至未能幸免于受屈辱。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拿破仑从教皇手中夺过皇冠自己戴上；在教皇退席后，他又宣誓忠于自由和平等。约瑟芬也是由她丈夫加冕的。但在加冕典礼前夕，她还耍了令人不快的一招，她告诉教皇，他们只举行过世俗婚礼没有经过宗教仪式；因此拿破仑只得答应补行宗教仪式，这就使得离婚变得更为困难。

虽然加冕典礼的戏剧性仪式（这个场面经达维德的名画流传后世）满足了拿破仑的心愿，但却没有增添他的威望。人民用怀疑的眼光瞧着这种稀奇的仪仗，以及在十二月全月不断举行的庆贺宴会。没有人相信拿破仑的权力会因此而巩固起来。由于重建了君主政体，并加强了政权的贵族政治的性质，他只不过使他个人事业与民族事业更分离开了。夏普塔尔说，“在那些日子里，法国革命的历史对我们说来就象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一样遥远。”对夏普塔尔及和他一类的人来说，情况可能如此，但是在人民之中，法国革命的精神却并未消逝！拿破仑曾许诺人民要实现和平来赢得民心，但他却在重启战端时，终于自己登上帝位。现在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他为所欲为了：帝国的征战扩张、专制统治和贵族政治一发而不可收拾，而惊惶失措、忧心忡忡的国民只能跟着常胜的恺撒的战车奔跑，以免遭到亡国之灾。

三、入侵英国的计划。 特拉发加海战（1805年）

英法之间的战争拖了两年多还胜负难分。双方都在经受了始料未及的重重困难。1803年，英国有五十五艘战列舰，法国有四十二艘，其中仅有十三艘处于战备状态。这种压倒的优势使英国一开始就掌握了制海权。法国各港口再次被封锁，商业受到打击，而英国的商船则除私掠船外几乎无所畏惧，他们恢复使用护航舰队保护商船以对付私掠船。英国迅速重新占领了圣卢西亚、多巴哥以及荷属圭亚那。即使如此，阿丁顿还是被斥为作战不力。战舰多已陈旧，新造船舰极少，因为圣文森特不能够组织木材的供应。虽已开征间接税，但财政仍令人感到不安。从对马耳他问题的调停以来，阿丁顿政府与俄国的关系一直很冷漠，而且在共和十二年保王党阴谋的问题上这个政府

所扮演的角色损害了它的名声。

拿破仑加紧扩军备战，但他缺乏经费。共和十二年，财政又出现赤字。对自己权力很自信的拿破仑终于采纳财政大臣戈丹的意见，他恢复了间接税。“难道我没有宪兵、郡守和教士吗？”他吼叫道，“如果有人胆敢造反，我就绞死他五、六个，其它人就都会缴税了。”共和十二年风月5日（1804年2月25日），他成立了综合消费税局，并任命弗朗塞·德·南特为局长，但只限于对酒类征收适当的税。至于国库，巴尔贝-马尔布瓦开源无术，不得不求助于银行家及供应商。1804年，法兰西银行的一名董事德普雷伙同两名金融家米歇尔和塞甘组织了一个“联合商行”，于1805年收购了所有未兑现的收税专员期票。在一定程度上，这家商行附属于范勒尔贝格的粮秣供应公司，但是它的幕后的大老板却是乌弗拉尔。这一年的4月，乌弗拉尔提出以百分之九的利率借给政府五千万法郎，其条件是政府要把原来欠他的并拒绝归还的二千万法郎算作这笔新借款的一部分，这样事实上就把利率提高到了百分之十五。6月，乌弗拉尔借出了一亿五千万法郎，其中的四千二百万要算作倒帐。巴尔贝-马尔布瓦则以指定的税收和国库债务作抵押。德普雷保证所有证券在法兰西银行贴现，这样该行事实上搞了变相的通货膨胀。法国各盟国被迫捐献。从1803年4月起，法国派军驻扎在符利辛根城和荷兰的布拉班特；虽然荷兰希望保持中立，它不得不于6月25日同意提供一万六千名士兵以及法国要求的所有战舰。给戈多伊下了最后通牒迫使他也照此办理；10月19日，他答应每月捐献六百万法郎；12月19日里斯本政府也同意支付一千六百万法郎。不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均未对英宣战。另一方面，法国人重新占领了那不勒斯各港口，1803年5月莫蒂埃从荷兰侵入了汉诺威，解除了军队的武装，然后占领了易北河口的库克斯港以及埃姆斯河上的梅彭。但所有这些还不能迫使英国投降；即使法国海战得手，也只能给人以遥远的期望。因此，拿破仑决定以入侵来威胁敌人。

拿破仑没有忽视爱尔兰：1803年，那里曾爆发一次起义，但被镇压了下去；拉塞尔和埃米特被处以绞刑，法国未能及时赴援。然而，他最关注的是1801年的计划。军队集结在布伦大营；1803年12月2日，这支军队被称为“英格兰方面军”。这样集结部队的好处是把军队同全国隔离开来，并以从事一桩伟大事业的希望来赢得军队对他个人的效忠，这样集中的部队也可在必要时掉头在欧洲大陆上大举出击。1805年1月，他宣称，这支集中的军队别无其他目的。而实际上他是竭力想掩饰当时已十分明显的挫折。毫无疑问，拿破仑曾经多次下决心要横渡英吉利海峡，鉴于联合王国的军事形势，这是很可理解的。1804年初，英国正规军不到十万人。民兵按理应有七万二千人，为了逃避征兵中签而加入志愿部队的为数极多，据说超过三十多万。1803年7月27日，议会也通过“全国总动员”，强迫年龄在十七岁至五十五岁之间的所有男人接受军训；最后于7月6日，决定成立“增援部队”，用抽签办法征募。但所有这些军队都没有作战力：万一在法军登陆的情况

下，政府似乎计划退到威尔士的乡间去打游击。可以断言，法国人有可能不发一枪就占领伦敦。只是这一点对拿破仑就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英国人对于这样的危险作了充分的准备。国民动员运动显出甚至比 1797 年更加激励人心；关于这一切，有华兹华斯为后人留下了著名诗篇为证。1804 年 2 月，皮特开始抨击内阁；多数党分崩离析，到 4 月底，阿丁顿辞职。皮特希望组织一个全国联合政府，但是国王拒绝接纳福克斯入阁。因而与福克斯言归于好的格伦维尔也拒绝参加新内阁。这样，皮特不得已只好与阿丁顿的同僚一起组阁，他甚至不得不在 1805 年把阿丁顿本人也拉入内阁中。因此皮特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在议会中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他的地位由于追究海军部另一件贪污事件而进一步削弱。在一些盗用公款的人中，有他的密友邓达斯（当时已封为梅尔维尔勋爵）在内，后者为此被迫辞职。但是无论如何，皮特还是给英国的政策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性。而且他还结了新的同盟，由于拿破仑的政策而投向英国的俄国，结果主动提出与英国结盟的建议。他还组织起志愿部队，最后把他们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他把民兵与“增援部队”合并起来组成后备部队，并从中抽调一万人加强正规部队；为了取得海军承办商的协作，在供应舰队器材方面，他给那些承办商以自由处置权。战列舰逐渐增加到一百一十五艘。他大抓了海防工作，并以恢复所得税来稳定财政。他最成功的措施是在 1805 年 4 月任命巴勒姆勋爵查理·米德尔顿接替邓达斯的海军大臣职务。正是由于米德尔顿对舰队在海战中出色的指挥，才有特拉拉加海战的大捷。在这一战役胜利之前，英国的舆论是没有信心的，但皮特与巴勒姆从未失去他们那泰然自若的神态。拿破仑拥有一支军队这一点现在倒是无足轻重的，主要的障碍仍是横渡海峡。

显然拿破仑一方面总是心存侥幸：他不是不顾英国的舰队而远征过埃及并且又回来了吗？另一方面，他是个地中海人，所以他起初没有足够估计到多佛尔海峡的种种困难：它那汹涌澎湃的浪潮，湍急狂暴的海流以及变幻莫测的风云。最初，他曾计划用炮舰和平底船开道，这种船与弗拉芒各运河上的驳船相似，能装载大炮，并用桨划行。部队要由商船运送；但是必须承认商船数量不足，1803 年 9 月决定军队也要乘坐平底船。拿破仑下令从荷兰到大西洋沿岸各处都建造平底船，但是英国舰队却决不会让它们集中在一个地方。尽管如此，1804 年还是有一千七百多艘平底船集结在布伦港及其邻近的港口，设置了一些码头以训练这些水兵。海军大臣德克雷和舰队司令布律克斯海军上将看出，每次涨潮能开出布伦港的船只不超过一百艘，敌人舰队就有足够时间出击这些船。虽然海上风暴可能使敌人不致出来截击它们，然而这些平底船却不能冒险出航，除非是在风平浪静的天气里。这样就使得拿破仑需要派遣战舰在海峡一带进行扫荡；总之，他被迫要再次进行一场海战。

在海战方面拿破仑显然处于劣势。英国人不但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还拥有相当多的三层甲板的战舰。这种战舰胜过古典式的装有七十四门炮的炮舰，并在上甲板上装有大口径短炮，这样就大大加强了火力。霍姆·波帕姆

爵士采用了一种新的有效的信号系统。英国战舰装备较好，水兵久经战争锻炼，他们的海军将领，尤其象纳尔逊这样的人，都是从参加过战争的舰长中选拔上来的。一向困守在海港里的法国水兵和战舰却不具备这种素质。法国的海军将领也不具备这种素质，他们只能指挥他们自己所统帅的分舰队。但是英国舰队尽管有这些优点，却由于分散停泊而有被各个摧毁的危险。在法国几个海军基地之中，受到英国舰队严密监视的只有布勒斯特；罗什福尔座落在难以封锁控制的比斯开湾上，眷恋于汉密尔顿夫人__的纳尔逊逗留在那不勒斯水域，因而土伦也只是处于纳尔逊的远距离警戒之下。这样，法国舰队是能够出航的。倘若法舰一旦启航，英国海军部已经计划在乌桑岛__集结舰队；只要英国舰队封锁着英吉利海峡的入口，英国本土就无所畏惧了。即便如此，还不能完全忽视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不管人们怎么说，对突然袭击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1804年5月，拿破仑决定，他的舰队只要都冲破封锁，即可在布勒斯特救援冈托姆，随后扫清英吉利海峡。他于8月到达布伦港，16日他在那里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但是事实证明准备不足。布律克斯与拉图什-特雷维尔先后死去。从1804年9月到1805年3月，由于拿破仑在意大利肆意兼并，奥国准备立即发动进攻，看来拿破仑势必要放弃入侵英国的计划。拿破仑命令他的舰队启程到安的列斯群岛，去攻击那里的英国殖民地。但只有海军上将米西埃西的舰队能够驶离罗什福尔；他在美洲未能会合其它法国舰队，便返回法国。

但随后大陆上战争的危险从表面看来减少了：直到1805年7月15日，拿破仑才理解到反法同盟的真实意图。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已在威胁西班牙的英国，在1804年10月5日截夺了数艘装载着财宝的西班牙大帆船。12月，戈多伊终于向英国宣战，他把他的舰队交给法国皇帝指挥。由于戈多伊在国内的地位正在受到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夫人的威胁，他就派了自己的代表伊斯基耶多向拿破仑建议瓜分葡萄牙，以便为他在自己在那里开拓一块封地。这使得拿破仑大受鼓舞，他又回到他那宏伟的计划。对安的列斯群岛殖民地的远征现在变成了战略行动：法国各舰队要在安的列斯群岛会合，在给敌人制造了混乱之后，舰队将折回英吉利海峡，必要时就展开战斗。这个计划看来可能很高明，但这首先需要物质条件和指挥能力，而这两者都是法国缺乏的。此外，拿破仑自己就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指挥计划：既然最后决定作战，他又不允许冈托姆从布勒斯特突破封锁，这样就使得后者不能有所作为，整个重担就落在缺乏胆识的土伦舰队司令海军上将维尔纳夫身上，以致毁了整个计划。

1805年3月30日，维尔纳夫指挥着十一艘军舰启航（在加的斯西班牙人又加入了六艘），一开始他就忽视了歼灭守卫直布罗陀海峡的奥德的部队。随后他驶向马提尼克岛，于5月14日才到达那里。与此同时，英国舰队除了违背训令的纳尔逊未到外，都在乌桑岛集结。直到4月19日，纳尔

逊一直在驶往埃及的航线上搜寻维尔纳夫；他最后接到了情报，就匆匆赶到直布罗陀，在那里他才获悉维尔纳夫已经西去。5月11日他全速赶往安的列斯群岛。这要冒很大的危险，因为敌人可能已经开往英吉利海峡，或者可能已与其它舰队在美洲海面汇合，这样他们就具备了足够的力量来打败纳尔逊。海军部由于受到公众对牙买加安全问题担忧的影响，便批准了这个大胆的行动计划。纳尔逊的大胆主动精神固然十分可嘉，然而结局仍然可能是灾难性的；但他赌赢了。在安的列斯群岛，维尔纳夫等待其它法国舰队到来，但没等到。他只接到了拿破仑的紧急公文，皇帝在其中终于亮出了他那宏伟的计划，命令他等待一个月，然后折回与费罗尔和罗什福尔的舰队会师，来解除英国对布勒斯特冈托姆的封锁。

6月4日纳尔逊到达巴巴多斯之后，开始搜索法国人。当维尔纳夫获悉这种情况之后，他决定立即折回费罗尔，希望能摆脱纳尔逊的追踪，但徒劳无益。纳尔逊派遣了一艘快速双桅船去通知海军部，接着于6月13日即驶向欧洲。但是他仍然担心维尔纳夫可能到埃及去，所以他就驶向直布罗陀；由于巴勒姆曾命令海军上将考尔德在菲尼斯特雷角截断维尔纳夫的归路，英国的舰队再次分散开了。7月22日，维尔纳夫遇上了考尔德的舰队。在遭遇战中考尔德拿捕了两艘军舰后撤退了，让法国人进入了费罗尔港。另一地方，接替了米西埃西的阿勒芒从罗什福尔出海，游弋了几个月，既没有遇上友舰也没有碰上敌舰。从8月12日至15日，英国人再次在乌桑岛附近集结他们的力量，但是立即被康华里海军上将调遣分散了，他为东印度护航舰队的安全和克雷格将军所率赴援那不勒斯的部队滞留里斯本的安全担心，于是考尔德被派回费罗尔，而纳尔逊则返航英国。维尔纳夫对这一有利时机一无所知，所以根本没有利用这一机会。8月14日，维尔纳夫启航出海，看到自己舰队的情况不佳，又听到关于敌舰正在全速赶来的虚假情报，他感到十分沮丧。他接到的7月16日命令是，要他在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时，可驶往加的斯。他遵照命令于8月18日在加的斯下锚。即使他在布勒斯特突破封锁并击败康华里，他也来得太晚了。8月24日，拿破仑指挥大军向德意志进军，并命令舰队解除战备。

维尔纳夫的错误在于没有立即驶往土伦，而使自己困于不断得到其它舰队增援的康华里和考尔德的封锁之中。9月28日，纳尔逊终于负起指挥舰队作战的任务。不过法、西联合舰队躲在港口里是能得到掩护的，而且还牵制着三十二艘英国战舰。但是拿破仑命令舰队不惜一切代价去进攻那不勒斯，此举正中纳尔逊的下怀。当维尔纳夫于10月19日得知有六艘敌舰为补充给养而前往得土安时，他便率领三十三艘战舰启航。21日，正当他们在特拉发加角一带排成六公里长的队形行进时，纳尔逊赶来，向他们展开进攻。在10月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他曾指出，他将从垂直角度向敌人发动进攻，而不是一般惯用的并排作战方式。这就得把舰队排成两列，从中间切断敌舰队形，一列舰队吃掉其首部，另一列则歼灭其尾部。事实上，英国舰队并没有

保持预想的队形。攻击进行得相当混乱，因为纳尔逊认为法、西联合舰队会转头驶向加的斯。尽管如此，他的计划还是成功了：法、西联合舰队的中部及后部全部被歼。率领先头的十艘战舰的海军上将迪马努瓦投入战斗较晚；他的四艘战舰当时逃脱了，但几天后还是被俘获了。夜晚，一场暴风雨结束了这场灾难。法、西联合舰队仅有九艘战舰回港，四千三百九十八人死亡，而英国人仅有四百四十九人死亡。纳尔逊也受了致命伤。维尔纳夫被俘，他受尽了皇帝的辱骂，在返回法国时自尽身死。

英国终于可以喘口气了。确实，反法同盟使得登陆英国成为一桩不可能的事；但是得胜的拿破仑随时可能重新执行他那攻英计划。然而纳尔逊的胜利使这一计划无限期地拖延下来。同时也宣告了海战的结束。到后来英国人就可以利用西班牙人的起义而把战争推到欧洲大陆上。然而在当时，英国人比以往更不愿在大陆上作战，这样，特拉发加海战的唯一积极后果是拯救了那不勒斯。看来这次海战只是确认了英国的海上霸主的地位。在拿破仑看来，特拉发加海战只不过是一个不幸的插曲，人们是很容易理解这一点的，因为只要他在大陆上立于不败之地，英国就永远不会打败他。

四、封锁

拿破仑的事业至少可以确保他掌握主动权。只有招架之功的英国再也无力从事征服新的殖民地。唯一例外的是韦尔斯利，他继续在印度扩张。他吞并了阿瓦德的一部分，控制了卡纳蒂克，并建立了对苏拉特和坦焦尔的保护关系。他利用马拉塔人内讧的时机在那里也采取了行动。马拉塔王公之一霍尔卡把丕什瓦巴杰劳从浦那赶了出去；韦尔斯利却把巴杰劳于 1803 年 5 月护送回到浦那，这样把他变成了受保护者。韦尔斯利随后又对道拉特开战，后者的父亲辛地亚在十五年前，在 1788 年征服德里时几乎要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韦尔斯利又袭击了贝拉尔王公拉古吉·邦斯勒。1803 年 9 月 23 日，他在阿塞战役中打败了道拉特，在阿尔加翁击溃了拉古吉·邦斯勒，这两位统治者都割让了他们的部分辖地。1804 年，霍尔卡也拿起了武器，成功地击溃了蒙森上校的部队，但他自己后来也以失败告终。第二年，大莫卧儿皇帝阿林沙的国家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尽管获得了这些利益，但韦尔斯利的自行其是与目中无人的态度还是激怒了东印度公司，并使得已经焦头烂额的英国政府感到担忧。韦尔斯利辞职，并于 1805 年 8 月 15 日启程回国。

英国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始终是如何利用他的海上优势取得贸易的垄断地位。它全力恢复了有关封锁的规定。从 1803 年到 1805 年，它的虚拟封锁的范围甚至扩及法国占领下的汉诺威。与此同时，英国在 1803 年 5 月 18 日开始重新颁发特许证，甚至允许用中立国船舶载运敌货进口。对敌人的殖民地贸易重新实行了“1756 年规则”^{__}，但对也能为它服务的中立国则实施得并不严格，予以适当照顾。在欧洲，中立国只得顺应形势，屈从英国；而对

美国的关系则很快就发生困难。美国航运事业的进展日益遭到英国妒忌；斯蒂芬在他的《伪装下的战争》（1805年）一书中认为，“迂回路线”有助于欺骗，所谓“中立化”的敌货甚至没有卸船，也没有按照美国的规定征收关税。由于英国海军部从未明确地规定在何种情况下“中立化”才算有效，所以一些捕获法庭就开始数以倍增地没收货物。1806年4月18日，美国国会采取了报复行动，它宣布，在11月15日以后禁止英国货进口。但是这时拿破仑实施了大陆封锁，于是形势就起了变化。

由于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仍然没有被封锁，所以英国能够象在前次战争期间所做过的那样重新组织它的贸易，因而损失甚少。1803年它的出口从二千五百五十万英镑下降到二千零四十万英镑，但在1805年回升到二千三百三十万英镑。再出口受到的影响较大，从1802年的一千二百七十万英镑下降到1805年的七百六十万英镑。英属安的列斯各岛（世界上糖的主要供应者）的糖的产量继续上升，价格不断下降，因为尽管英国的消费不断增长，但进口过剩。糖价从1805年的每公担五十五先令下降到1807年的每公担三十二先令。连年丰收和开垦土地（由于1801年圈地条例促成）的结果使面包价格下降到每磅两便士，这就使得地主要求加强谷物法，他们的要求在1804年得到了满足。这说明为什么从法国入侵的梦魇下解脱出来的英国舆论，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前，一直处于一种漠不关心的状态，它漫不经心地瞧着大陆的事态。

这一时期拿破仑的经济政策没有引起英国人太大的关注。1803年6月20日，他重新下令禁止英国货进口；他原先指望入侵英国，后来又把全副精力倾注在他的大陆战役上，但是不管史学家怎样看法，他认为在这期间这项禁令只不过是次要的措施，他甚至没有很严格地执行这一规定。事实上，他依然忠实地执行着有节制的政策，这一政策从他上台以来就替代了督政府的政策。他对中立国的贸易未加任何限制，结果中立国成了交战国之间的中间人，使伪装中立国货物的交战国货物依然来来往往。大陆封锁完全符合构成拿破仑重商主义思想一部分的保护贸易主义思想。而且，封锁政策是为满足工业家的愿望而制定的；它排除了外商的竞争，但却不排除必要原料的进口，也不妨碍本国货物的出口。海关税表表明，这一政策不仅是针对英国的。共和十一年，精制糖与糖蜜，不论来自哪个国家，一律不准进口。1804年3月13日和1805年2月6日，棉织品及殖民地产品的关税都提高了。1806年3月4日，对殖民地产品又加征收附加税。由于这些货物主要来自英国，因此可以默认，封锁并无实效，而这时拿破仑的封锁政策其实并不是一种作战的手段。

最狂热的保护主义者总是那些棉纺企业主，特别是纺纱厂厂主，因为英国棉纱进口量从1804年的三十一万公斤增至1806年的一百三十六万八千公斤。里昂的工厂主也同样强烈要求排除意大利的竞争，他们要求把皮埃蒙特的生丝专门供应给他们。从不断上升的海关税率可以看出，工厂主的影响起

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逐步地使拿破仑采取了他原来并不想采取的措施。夏普塔尔不同意这样做，巴黎的商人也不同意，他们在 1803 年通过商会谴责了所有的贸易禁令和针对中立国的所有措施。1806 年 2 月 22 日，拿破仑终于下令禁止进口漂白布、印花布、软棉布、灯心布及金属器具；但他允许继续进口其它棉纱，杂货以及各种丝缎带，但要征收附加税。到 1805 年，已拥有超过一百万纱锭的棉纺业又取得了更大进展，纱锭的生产从 1806 年的二百万公斤上升到 1808 年的四百五十多万公斤。里昂的工厂主也得到了满足：尽管 1803 年和 1806 年的法律准许不单从里昂，也可从热那亚和尼斯出口皮埃蒙特的生丝，但是海洋被封锁确保了里昂人的垄断地位。他们还在意大利王国谋取好处，1808 年，他们把通商条约强加给意大利，这一条约减低了法国进口货的关税，并且由于税率的特惠而保证了里昂对意大利的生丝贸易。

然而有些迹象表明，拿破仑也顺着督政府的老路滑下去，他因封锁没有起作用而烦恼。1804 年 3 月 13 日，他下令禁止进口“直接来自英国”的货物，并命令中立国要出示货物来源地的证件。另一方面，他的民族经济主义的倾向很自然地与战争热狂融合在一起，这表现在 1806 年 2 月 22 日对成包棉花突然征税的措施上；毫无疑问，这一措施使工业家极为不满，并导致增加了对亚麻及苧麻的使用。最后，法国的反英政策逐渐也施加于自己的盟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在 1806 年甚至强加于瑞士，对瑞士只有棉纱是破例开禁的。至于英国同德意志的贸易，则由于法国对汉诺威与库克斯港的占领而受到阻碍，这是督政府没有做到的事。很多人仍然相信，只要扼杀了英国的出口贸易，就能击败它，蒙加亚尔的著作再次表达了这种信念。

总的说来，拿破仑对英国的封锁没有采取对策，这种封锁超越了传统的重商主义的措施，也比交战国之间通常采用手段更为严厉。拿破仑耐心地容忍英国施加于中立国的强横要求。这一点甚至体现于他在 1806 年 3 月 4 日在参政院所发表的演说中，使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时他非但无意加强封锁，反而在等待和约缔结，以便着手完善他的禁止进口制度。“在与英国媾和四十八小时之后，我将下令禁止进口所有外国货，我将颁布一项航海条例，它规定，我国的港口只许法国船舶进入。”但是当拿破仑在大陆上赢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节节胜利，并建立起大帝国时，他的大陆政策激起他的权力欲，从而使一切翻然改观。

五、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起源

由此可见，不能说拿破仑的大陆政策是他对英作战的后果，说成仿佛是由于不能在海上或以入侵其本土战胜英国，他就封闭欧洲大陆市场来摧毁英国。他当然不会没有过这种想法；但是这种想法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以往的征服扩张使这项政策奏效。这种想法也不能解释那些激怒大陆列强的轻举妄

动和侵占行径。假如我们这样说就会更加接近于事实：尽管欧洲大陆的君主们象英国一样不安地注视着拿破仑在扩张势力，尽管他们内心仍旧充满对这位革命民族的领袖的仇视——他们通常称他为“科西嘉人”“篡位者”，或者象玛丽亚-卡罗莉娜所称的“罗伯斯庇尔的继承人”，更不用提其它浑名了——假如没有英国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够拿起武器的，因为他们是分崩离析，贫困不堪的。亚眠和约的撕毁使他们有希望获得英国援助，因为英国有钱资助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而且组成同盟对它最有利。然而在 1803 年，他们显然缺乏主动作战的精神，至少在德意志各邦是如此，奥国甚至在 1802 年 12 月 26 日承认了自吕内维尔条约签订以来在意大利境内的变化。即使反法同盟的组成是可能的，甚至象是就要发生的，但是决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设法推迟同盟的建立，耐心等待，直至英国象在 1801 年那样必然陷入的困难之中（这些困难不单是由法国造成的），这是最符合法国民族利益的政策。但是这种平淡无奇的政策拿破仑从来没有想过。不尊重任何人，相反地自高自大，这只能加速同盟的组成，并且要冒可怕的风险，注定了要挑起连绵不断的战争，除非征服整个欧洲方得罢休。再没有比这样的前景更能适合拿破仑的性格。

1803 年之前，与俄国和好一直是拿破仑外交政策的基石；而两国失和是沙皇造成的，这样沙皇就能主动发起组成反法同盟。当时二十六岁的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放荡堕落妇人的孙子，而其父是一个疯子，因此他生来就存一种病态的变幻无常的性格，而他所生长的环境及早婚更加重了这种特点。叶卡捷琳娜把他托付给瑞士沃州人拉阿尔普教育，此人侈谈自由主义，却没有把它的精神灌输给他的学生，保罗又使他接受普鲁士式的严格的体格训练。他随时都可能堕入这个凶恶残忍的宫庭的陷阱，因此变成一个矛盾交织的人：既单纯而又敏锐狡猾；既胆怯而又固执；既性急而又懒散；既侈谈道德而又放荡淫逸；这是一个“北方的塔尔马__”，一个好色之徒，一个轻易变节的拜占廷帝国的希腊人__。他即位后轻易地就获得了自由主义者的声誉。在很快地贬黜了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帕伦和潘宁之后，他便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对西方文明有一定兴趣的人，如曾在日内瓦和伦敦逗留过的柯楚别依和诺沃西尔佐夫，和在巴黎留过学、曾受教于罗默__的斯特罗格诺夫。除这些人之外，还有跟他一起寻欢作乐的伙伴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他是个波兰民族的叛徒，为人机智，但却缺乏品格。这些人组成了“密友委员会”或叫做“非正式委员会”，在这一组织中酝酿着有关宪法改革的各种设想，而元老院的贵族们则要求将该“委员会”纳入政府之内。与此同时，亚历山大把拥护旧制度的人也留在身边，如他的侍从武官多尔戈鲁基亲王、炮兵司令阿拉克切夫，以及东正教圣教总会代表哥利津，后者使沙皇逐渐地沉溺于神秘主义。由于那批自由主义的“朋友们”认为，俄国实行自由的条件尚未成熟，并且有充足的理由不主张解放农奴，所以亚历山大在他的统治时期可以大胆随便地时而重用这一派，时而重用另一派，这要根据他自己倾向于 法国还

是反法同盟而定；当然，不管起用哪一派，他一直是个专制帝王。1802年9月20日，俄罗斯元老院成为监督司法的机构，并在立法事宜中取得了规谏权，但这种权力刚一试行很快就被废弃了。新建了八个部，但是各部大臣仅仅是业已存在的各行政会议机构的首席官吏而已。除了西耶弗斯在里沃尼亚省根据1804年2月21日的命令答应对农奴实行某些改革之外，政府没有为农奴采取什么重要措施。唯一进步的措施是由新设立的国民教育部在多尔巴特、哈尔科夫及喀山建立了大学。

自我陶醉、虚荣心胜过勃勃野心的亚历山大，在外交政策中也侈谈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特别是想哗众取宠；所以他一开始就把波拿巴视为自己的敌手。他很早就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德意志人，他们吹捧他为自己祖国的保护者和欧洲未来的解放者。这些人一般都曾是法国革命的赞美者，由于波拿巴恢复了君主政体而使他们的幻想破灭。他们之中著名的有克林格尔，他曾参加过狂飙运动，并曾被保罗一世聘为私人医生。他写道，“从受尽蹂躏的欧洲将出现一位王子，他将反抗威胁我们的肆无忌惮的蒙昧主义和政治迫害者，而变成人道、正义与文化的保护人。……这个人将是他！”随着他日益沉溺于神秘主义，亚历山大越来越相信自己就是这位新的救世主。他很自然地把这个天启使命同他保持与扩大俄罗斯帝国的愿望合而为一。根据特欣条约的规定，并作为1803年帝国大法的保证人，他自诩为德意志各邦的保护者，在这些邦的王侯中他有很多亲戚，恰尔托雷斯基遵照亲俄主义的家庭传统，劝说沙皇重建波兰，并封他为王。然而亚历山大梦寐以求的和俄国由来已久的野心都是觊觎君士坦丁堡。因此当恰尔托雷斯基在1804年出任外交大臣之后就起草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他利用彻底重画欧洲大陆地图的机会，把恢复波兰的设想纳入这个计划。此时亚历山大先迫使土耳其苏丹承认俄国对多瑙河各公国的保护关系：1802年，沙皇发布一道敕令，除守备队之外，将所有土耳其人逐出这些公国；敕令规定所有官职均由希腊人或罗马尼亚人充任，没有俄国同意不准撤换公国国君。从1783年起，格鲁吉亚君主就接受俄国沙皇的保护，1803年国君赫拉克里斯死后，格鲁吉亚很快就被并入俄国，俄罗斯的统治从此便越过了高加索山。这样，亚历山大的侵略野心就使得他与埃及的征服者波拿巴发生了冲突。他推断，如果让波拿巴在德意志建立统治的话，君士坦丁堡就可能落入他的手中。亚历山大从来不是想与拿破仑瓜分欧洲，他只是在等待从他手里夺到欧洲。

波拿巴的东方政策引起沙皇的不安，沙皇便靠拢英国一步，并间接地鼓动它撕毁和约。但是当法国要求俄国出面调解时，他就后退一步，对英国疏远起来。法国的提议满足了他的愿望；他不但可以扮演所罗门的角色，而且还能取得马耳他。尽管他的驻巴黎和伦敦的大使马尔科夫和沃龙佐夫执行着亲英政策，但他于1803年6月5日正式接受了法国的邀请。7月19日，他提出自己的建议：马耳他将接受一支俄国军队驻防；英国将占领毗邻的小岛拉姆佩杜札；法国则继续占领皮埃蒙特，条件是给其国王补偿；意大利各

邦、荷兰、瑞士、德意志以及土耳其的中立由欧洲列强共同给以保证。总之，他想以调停英法间争端为口实而充当整个欧洲大陆的仲裁人。法国如接受这一调停将一无所失，因为它的自然疆界不成为问题，甚至也不危及它对意大利的控制。就波拿巴本人来说，他本不想被这样的条件束缚手脚，但他即使赞同沙皇的条件，实际上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6月27日英国已宣称它将不交出马耳他。然而波拿巴已经占领了汉诺威和那不勒斯的各港口，在沙皇看来，这对他是一种侮辱。于是在8月29日，波拿巴最终拒绝了俄国的建议，理由是这个建议极其偏袒英国。他极为粗暴地对待马尔科夫，并要求召回这位大使。亚历山大于10月28日同意了这一要求，只把奥布利尔留在巴黎担任临时代办。现在他意识到，波拿巴决不会承认他是欧洲的最高裁决人，这使他深为恼怒。劫持当甘公爵一事终于使这两个人彻底决裂了。亚历山大以德意志的保护人自居，在帝国议会上抗议这种破坏德意志中立的行动。波拿巴从圣彼得堡召回了他的大使，并带着侮辱性的讥讽口气问道，假如为英国所雇佣的刺杀他父亲的凶手在邻近俄国边境地方定居下来，亚历山大是否“不会迫不及待地把他们抓起来”。奥布利尔接着申请护照，于1804年9月底离开巴黎。

亚历山大既与波拿巴发生冲突，必然就倒向英国。但是由于他仍然对阿丁顿抱有不满，所以直至皮特重新掌政之后他才以明确的姿态开始接近英国。然而仍不容易取得谅解。沙皇为了仍然充当他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希望组成一个总的联盟来使欧洲实现和平，并完全重新绘制欧洲地图；他甚至谈到恢复海洋自由！1804年6月29日，皮特只建议英俄结盟，其目的是为了从法国夺回比利时和来因地区。9月11日诺沃西尔佐夫带着谈判结盟的训令出使伦敦，训令是照抄他的副手修道院长皮阿托利草拟的备忘录的。备忘录的精神依然是野心勃勃，但为了迎合皮特，提出了要法国退回到它原有的疆界。莱维森-高尔于11月出使圣彼得堡，建立联盟的条件开始渐趋形成。瑞典的古斯塔夫四世于12月3日与英国结盟，1805年1月同俄国结盟。亚历山大要求英国与俄国在科孚岛的军队合作，以救援那不勒斯，1805年4月，克雷格将军启航到地中海。但是直至4月11日两国才签订条约，英国答应为俄国参加反法战争的十万名士兵提供补助金一百二十五万英镑。征服地的分配问题将留待以后再定，但已取得谅解的是：荷兰将取得比利时，普鲁士将得到来因河左岸北部一带。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强迫法国复辟波旁王朝，但双方同意竭力使法国接受复辟。条约签订后，亚历山大企图立即加以修改。他通过诺沃西尔佐夫最后一次试图以牺牲英国人为代价与拿破仑达成协议，然而英国人却丝毫没有想到俄国人会有必要这样做。

这样，在准备战争的同时，谈判也在进行着。俄国与英国同意增援在波美拉尼亚的瑞典军队，这支军队将入侵汉诺威与荷兰。在那不勒斯，俄、英与玛丽亚-卡罗莉娜达成了协议，她在拿破仑于1804年5月要求撤换国务大臣阿克顿之后就执政。11月签订了一项条约，由一名法国亡命者达马斯男爵

指挥那不勒斯的军队；同时，纳尔逊控制着西西里。此外英、俄还对君士坦丁堡施加了压力，那里的土耳其苏丹拒绝承认拿破仑为皇帝。可是，单从南北两方威胁法国还是不够的；要打败法国，俄国人还必需保证能假道德意志或奥地利。

在德意志，俄国人并未取得任何进展。实施 1803 年的“帝国大法”继续激起德意志各王侯反对奥地利，奥地利正试图在帝国议会中恢复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平衡，奥国尤其要维护“帝国骑士”的利益。在“帝国骑士”的名下，包括三百五十名封建领主，其中有很多伯爵和男爵，他们领有一千五百处封地，总面积达十一万公顷。他们组成三个部分——施瓦本、弗兰科尼亚和来因，他们直接臣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各自有权进行统治。他们的子孙一般由于家道贫困而去作教士，或进入政府供职，尤乐意在奥国为官。事实上象梅特涅、施塔迪翁、达尔贝格和施泰因一类的人家庭出身就是如此。他们已经由于把教会产业拨归俗用受到伤害，而现在又看到他们自己为那帮贪婪的王侯所垂涎，这帮王侯要把他们降格为“间接附庸”，也就是说，要把他们变为隶属王侯的臣民。普鲁士在弗兰科尼亚开了先例，其它王侯也就跟着仿效；1804 年 1 月 13 日，施泰因抗议纳索公爵吞并了他的两个村庄。奥国根据 1803 年“帝国大法”撤销了这些“间接化”的降格措施，并威胁因此向法国求援的巴伐利亚。奥国态度如此强硬，可能是由于维也纳已风闻共和十二年巴黎发生谋刺波拿巴的阴谋案。1804 年 3 月 3 日，即下令逮捕当甘公爵的前一周，波拿巴向奥国发出一份最后通牒，奥国立即解除了武装。这次危机产生的后果是：当瑞典和俄国抗议法国侵犯德意志领土时，南德各邦闭口不言。1804 年秋，拿破仑出巡来因地区，有些王侯来美国兹覬见以巴结他。他们就组成一个来因联盟问题交换了意见；拿破仑想让欧仁·德·博阿尔内娶巴伐利亚的奥古斯塔公主，但是这位公主已与一个巴登的亲王订了婚；达尔贝格建议全帝国与罗马教皇签订一个教务专约，但是德意志各邦拒绝了这一建议，它们宁愿同教皇个别交涉，从而加强各自的独立地位。不管怎样，南德意志各邦现在都在转向法国这一边。

如果普鲁士明确支持南德意志各邦反对奥地利，情况就会不同，但普鲁士只顾自己，而在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周围始终有一个“亲法派”，内阁大臣洛巴德就是这一派的头面人物；这一派人会很乐意接受波拿巴关于普、法结盟的建议。外交大臣豪格维茨的态度则较有保留，有时也建议对法国采取坚定态度，然而他过于看重自己的官位，以至不敢坚持己见。1804 年 4 月初接替他的哈登堡自夸采取一种更为有力的政策；然而事实上，他并不比他的前任更坚定。英法之间的战争使弗里德里希-威廉进退维谷：乔治三世以汉诺威选侯的身分宣布了中立，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宁愿让普鲁士占领他的领土，而不愿被法国征服。对普鲁士来说这真是恢复 1795 年的中立联盟的极好机会，这个联盟曾使它得以称霸北德意志，并象 1801 年一样，这也是一个重新占领汉诺威的极好机会。在这个问题上，普鲁士谨慎地决定

先取得俄国沙皇的同意，然后再采取行动；亚历山大怀疑普鲁士与法国有秘密协议就加以反对。豪格维茨建议动员军队，并要求法国在汉诺威只限于索取金钱捐献；但是国王拒绝这样做。这位大臣于 1803 年 6 月 28 日又重申前议，他指出，由于法国占领汉诺威和库克斯港，使普鲁士的贸易受到危害。弗里德里希-威廉却愿派洛巴德去会晤那时正在比利时的波拿巴，建议法国同普、俄建立三角联盟，其条件是：在汉诺威的法国军队保持当时的水平，并要恢复贸易。但是这一尝试失败了。豪格维茨随后建议，如果法国人撤离汉诺威，普鲁士保证全德意志的中立。波拿巴仅仅同意重新开放港口，条件是普鲁士同法国结成盟国。普鲁士国王勉强同意了这一点，波拿巴就认为普鲁士因此承担了义务，也应保证维持意大利及土耳其的现状，这在事实上将会使普鲁士与奥、俄两国为敌，而给普鲁士的只是获得汉诺威的希望而已。1804 年 4 月，普、法谈判陷于破裂：普鲁士对汉诺威垂涎欲滴，但却只肯以它本身的中立为条件。

正在此时，逮捕当甘公爵一事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再次感到驻在汉诺威的法军近在咫尺的威胁，他最后放弃了在法、俄两国之间搞平衡的企图。亚历山大早在 1803 年 7 月就建议签订的防御同盟条约，终于在 1804 年 5 月 24 日签订，俄国应允当拿破仑加强在汉诺威的兵力，或扩张越过威悉河以东时，提供五万名士兵。战争的借口在十月里的确出现了，当时英国驻库克斯港的使节乔治·朗博尔德被富歇下令逮捕了，富歇希望从他的公文中发现与共和十二年阴谋案有关的证据。哈登堡希望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军事动员来要求法国从汉诺威撤军，但弗里德里希-威廉仅只要求释放被捕的人，当拿破仑把他释放之后，整个事件也就解决了。

在一段长时期内，奥地利和普鲁士一样，也没有什么指望。吕内维尔条约签订之后，奥地利恢复元气颇为不易。查理大公力图劝他的哥哥改革统治方法，允许大臣有职有权，并允许他们参加会商议事。1801 年 9 月 12 日，成立了一个由三个部组成的内阁。然而这也没有用，因为弗兰茨依然要独揽大权专断一切。不过他起码还是允许于 1801 年 1 月 9 日提升为军务院主席的查理大公在他的参谋长迪卡和他的顾问法斯本德的协助下负责改组军队。但是经费缺乏：1801 年至 1804 年间，国债从六亿一千三百万盾增加到六亿四千五百万盾，流通的国库券从二亿零一百万盾增加到三亿三千七百万盾。结果通货膨胀为害极大；1801 年，按票面价值百分之十六贴现的纸币现在却按百分之三十五贴现。物价上涨，以致必需增加工资和薪俸。投机使少数人致富，但却毁了那些有固定收入的阶层。1804 年影响到全德意志的饥馑更加深了苦难，同时人们仍拒绝打击特权等级享受的纳税豁免权，如果取消这种特权，那将不难重整财政。在这些情况下，正如查理大公所言，奥国亟需休养生息。外交大臣科本兹和有影响的科洛雷多伯爵也持有这样的见解；只恢复同法国结盟而自诩的科本兹与法国大使尚帕尼密切合作，每当波拿巴一提高嗓门，他就让步。

尽管如此，在维也纳还是有一个主战派。一些奥地利人，象施塔伦贝格伯爵和施塔迪翁，就属于这一派，但是起主要作用的则是已组成反法同盟的那些国家的大使——俄国的拉祖莫夫斯基、英国的佩吉特、瑞典的阿姆费尔特，他们正是在几个俄国贵妇人的沙龙里展开阴谋活动。他们通过当时宫廷图书馆长约翰·冯·米勒，与沙皇驻德累斯顿的代表昂特雷格伯爵取得联系，后者也被奥国所收买。通过施塔迪翁和当时驻萨克森的大使梅特涅，他们把弗里德里希·冯·根茨拉进他们一伙。在柏林负债而破产的根茨于1802年9月接受了奥国宰相府顾问一职，但却没有停止接受英国的津贴。尽管这伙人都是得人钱财替人效劳，但他们个人也都是仇视法国革命的，特别是阿姆费尔特，他是一个死硬的贵族，根茨称之为“最后一位罗马人”。根茨本人游说弗里德里希·威廉参加这次圣战未成后又希望争取弗兰茨。奥国的大臣们不信任他，仅仅把他作为一个政论家而加以利用；这样他就只得到僚属的待遇，因此他猛烈抨击科本兹与科洛雷多，并且夸大他们的软弱无能的缺点。

事实上，科本兹决不是无所作为的。他对英法之间的战争感到不安，因为他忧虑的是，在海上不能取胜的波拿巴可能会以奥国为牺牲品而在大陆进行报复。同时他意识到，这次战争使他处于一种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从1803年起他开始向伦敦要津贴，后来他终于拿到了手。法俄之间的破裂又给他提供了新机会。1803年9月1日，多尔戈鲁基到达维也纳，受到热情的接待，并请他提建议。1804年1月，俄国提出愿出兵十万，以迫使法国重新接受吕内维尔条约的规定。科本兹宣称，俄国这点援助是不够的；除此之外，他也无意冒犯法国，弗兰茨更是如此，他说，“法国没有做什么伤害我的事。”

法兰西帝国的宣告成立改变了一切。反革命派惊呼狂嚎，根茨写道：“法国革命已经被我们时代血腥悲剧的不可思议的结局认可了，甚至几乎是郑重批准了。”如果说维也纳宫廷也被此事搅动起来，那特别是因为它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王室利益造成了严重后果。拿破仑采用皇帝的称号而不用国王的称号，这不只是尊重大革命的传统；而且还意味着是针对整个欧洲的，因为到当时为止仅仅有一位皇帝，即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基督教理论上的首领。在法理学家看来，帝国不一定非得是德意志帝国不可，教皇加冕礼（哈布斯堡王室久已废而不用）在巴黎举行同在罗马举行一样有效。拿破仑巧妙地把这种尊严归于他的国家，自称法国人的皇帝，并否认有统治全球的野心；然而人人都看出，既然一个新皇帝出现了，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因此，尽管弗兰茨二世决定承认拿破仑也称皇帝，但他要求，当他在1804年8月11日改称奥地利皇帝时，也将得到同样的承认。他暂时还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他显然料到有朝一日会被赶出德意志的。此外，由于传统把意大利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也担心法国可能在意大利进行新的扩张，在这一点上他没有看错。因此，法兰西帝国的创建就加速了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形成。

科本兹第一步是想要试探普鲁士的意图，但是由于他没有提出任何实惠的东西给普鲁士，这种试探就毫无结果。当他在十月获悉诺沃西尔佐夫前往伦敦时，他推测，同英国结盟的俄国可能会置奥国于不顾，于是就与亚历山大签订了1804年11月6日条约，虽然条约是防御性的，但它却规定“在需要以其它形式动用共同的兵力的情况下”，双方将洽商采取联合行动。到1805年1月有消息说，意大利共和国将要变为一个世袭王国；为了不妨碍自己的手脚，科本兹决定排挤掉不赞成与俄国结盟的查理大公。查理大公处事有独立见解，因而长期以来就使弗兰茨皇帝感到不快，皇帝对他不断无端指摘，以致使这位大公不得不辞职。迪卡和法斯本德也受到冷落，颇受英国称赞的麦克将军应召主持总参谋部。即使如此，弗兰茨还是反对发动进攻，科本兹本人也犹豫不决，结果就使得焦急等待的俄国以废弃协约相威胁。拿破仑一系列新的侵略终于巩固了俄奥两国的协约。

拿破仑的附属国和同盟国都没有按照他的意图行事。荷兰依然听任走私活动继续进行，荷兰议员拒绝通过为增加军备而征税或举债。1804年9月，拿破仑指出需要修改宪法。1805年3月22日，席梅尔佩宁克受任为拥有全部行政权的首席行政长官；立法权授与了“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议员由公民从政府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选出；候选人由席梅尔佩宁克挑选，这还是第一次。这一切都安排就绪之后，财政部长高格尔便能着手实施财政改革。

具有更大影响的事件是意大利共和国的消亡。共和国副总统梅尔齐仿照法国组织了行政和司法体系，签订了教务专约，创建了一所学院，重新开设了一些大学。为了镇压盗匪，他取消了陪审制度，设立了警察厅长的职务，建立了宪兵队，并建立了特别法庭。公共工程增加了，辛普朗通道建成了。精力充沛、精明能干的财政部长普利纳采用了征收间接税，清偿了债务，整顿清洗了财政部人员，改进了帐目管理。最后还建立了地方军队，征兵制度终于在1803年成功地实施了。然而这些改革没有使人高兴，而是更把人激怒了，公共舆论依然非常敌视法国人。虽然梅尔齐很照顾贵族，但却几乎得不到他们的支持；立法院显然难以驾驭，它拒绝采取建立登记注册机构和征收遗产税等措施。梅尔齐本人希望法国军队撤离，得到独立。1803年5月，他向奥国政府提出一项古怪的建议，内容是建议把包括威尼西亚在内的北部意大利统一起来，而置于前托斯卡纳大公的统治之下。当波拿巴得知此事后便产生了疑心，促使他决定亲自控制意大利共和国的事务。

法兰西帝国的建立给拿破仑的意大利计划带来了最危险的因素。自从查理大帝以来，所有的罗马皇帝不是伦巴第的国王就是意大利的国王，所以拿破仑也必须如此。早在1804年5月，他就把他的意图通知了梅尔齐。意大利的一个委员会制订了一部宪法，但是当皇帝发现宪法对他的权力作了若干限制的时候，他极为愤怒；因此他把委员会成员召到巴黎，颁布了他的全部条文。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把王冠加于自身的危险，因为他曾首先提出让他的哥哥约瑟夫作国王，1805年1月1日，他写信给奥国皇帝，向他保证，新成

立的王国将永远与法兰西帝国区分开来。但是指望将成为法国统治者的约瑟夫拒绝做意大利国王，路易也代表他儿子同样表示拒绝。结果，拿破仑安排于3月18日通过一项元老院决议案，宣布他兼任意大利国王。5月18日他在米兰为自己加冕，并指定他的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作副王。对奥地利，他只答应随着和平的到来，当从马耳他和科孚撤军时，他将让位给他的一个亲属。这样，吕内维尔条约遭到了破坏。在他的驻热那亚代表萨利切蒂策划下，利古里亚共和国决定与法兰西帝国合并，拿破仑便于6月6日把这个共和国划分为法国的三个郡，这就再次违反了条约。除此之外，拿破仑于3月18日把皮昂比诺公国赠给了他的妹妹埃利兹，并于6月23日封他的妹夫巴乔基为卢卡公爵。这两块领地是皇家采邑，拿破仑通过这样赐赠，目的显然在于表示他以罗马皇帝继承人自居。奥国不再犹豫了。6月17日，帝国议会决定加入英俄同盟。恰在这时诺沃西尔佐夫途经柏林去巴黎，受权表示同意法国据有来因地区及比利时（安特卫普除外）；6月25日，亚历山大取消了诺沃西尔佐夫的使命。7月16日，奥地利的温青格罗德将军与麦克磋商，决定了作战计划。7月28日，皮特和亚历山大终于批准了4月11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英俄条约，但在马耳他命运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奥地利于8月9日也在条约上签了字。然而它还在向巴黎进行试探，希望获得法国一些让步就可以不必参战。由于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奥地利于9月11日侵入了巴伐利亚。

在此同时，双方都尽了很大努力说服争取德意志各邦。弗里德里希-威廉对于沙皇的责难仍然固执地充耳不闻，7月15日，他拒绝集结在波美拉尼亚的军队假道普鲁士，这就给拿破仑帮了大忙。亚历山大要求会见国王，但没有成功，于是便威胁说要强行通过西里西亚。恰尔托雷斯基感到大有希望：9月23日，沙皇到达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城堡普瓦维；他在那里谈到要夺回在瓜分波兰时普鲁士所得到的的一份领土，并扬言要复兴波兰。其实亚历山大却是在欺骗他的朋友，因为他只是企图威胁普鲁士国王，希望把他争取过来。

至于拿破仑，那年冬天他对在威尼西亚集结军队感到焦虑之后，直至七月底他也没有什么怀疑，只是到8月23日他才意识到危险。尽管如此，他于8月8日以答应把汉诺威给普鲁士作为诱饵，试图把普鲁士争取过来；8月22日他派迪罗克到柏林去谈判，普鲁士国王回答说，他只同意在吕内维尔条约的基础上保持和平，才肯与法国结盟。在普鲁士宫廷和军队内部，主战派开始形成；路易莎王后一直对亚历山大表示同情支持，也从未减少对拿破仑的憎恨。但是包括军队在内的大部分普鲁士人仍然赞成执行中立政策。由于其它地方需要贝尔纳多特的部队，皇帝决定从汉诺威撤军，并许诺由弗里德里希-威廉的部队占领，如果这位国王想利用这个机会，那机不可失，他不应错过。拿破仑预料到这位国王对此会感到极为满意，起码暂时会放弃参战的念头。这种估计完全正确。拿破仑在受奥国威胁的南德意志各邦中进

行得更为顺利。8月25日，巴伐利亚与法国结盟，9月5日，符腾堡原则上也追随巴伐利亚的做法。早在1803年已端倪可察的德意志的四分五裂过程就这样完成了。

拿破仑在意大利也施展了相同的手腕。9月10日，那不勒斯王后玛丽亚-卡罗莉娜与俄国结盟；9月21日，拿破仑与那不勒斯大使加洛侯爵签署了一项撤军条约，因为他要派这支军队到阿迪杰河一带。他还占领了伊特鲁利亚，甚至不顾教皇的抗议占领了安科纳港。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四世由于害怕维尔纳夫的进攻而批准了这一条约。特拉发加海战之后，玛丽亚-卡罗莉娜扔掉了假面具，11月19日，一支英俄联合舰队把一万九千名士兵运到那不勒斯登陆。但已为时太晚；拿破仑已经赢得了胜利。

第三次反法同盟一直被认为是存心要剥夺法国的自然疆界。反法同盟如若获胜，势必夺回全部或部分法国的征服地，这是不在话下的。不过有待说明的是，英国于1803年、俄国和奥国于1805年挑起战争并不纯粹是为了这一目的；这一点没有任何证明，甚至英国方面也没有。首先，这种十分明显的侵略精神是由一直未被人们重视的强烈欲望和利害关系助长的；英国满脑子的经济利益盘算及海上帝国主义的政策；亚历山大的妄自尊大及个人嫉妒心；在维也纳影响很大的欧洲贵族的敌对心理，这种仇恨法国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冲突。其次，更为清楚的是，拿破仑就好象在赌博一样，拼命煽起这种郁积着的仇恨心理，使各强国无不惊恐万状，甚至使最怯弱的奥地利也被迫走极端。且不说法国民族的利益，只从他个人政策的观点来看，绑架当甘公爵、建立帝国、过早地触怒英国、使俄国的东方野心惴惴不安、特别是改意大利共和国为世袭王国，以及吞并热那亚等等对于保持他的政权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尽管他没有吉伦特派的革命热情，但他也向各国帝王与贵族恣意挑衅，而吉伦特派已曾为此而受到责难；他执行了强横的侵略政策，而督政府已曾为此而遭到轻蔑的批评。

不管怎样，亚眠和约被撕毁之后形成的第三次反法同盟终于决定了他命运的道路。这并不象有些人所主张的那样，他的最后倒台从此就是注定了的；要使拿破仑垮台还有待他犯下更多的错误和发生某些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但是从此时起，他除了征服全世界之外，已别无其它选择。

第二章 拿破仑的军队

吕内维尔条约签订之后，波拿巴便着手清洗军队内部的厌战分子和不可靠分子。他裁减了许多军官，遣散了至少参加过四次战役、总数达八分之一的精锐部队的士兵。从 1801 年到 1805 年，他花费了四年多的时间来改组军队，并重新审查和改进他的作战体系，这个体系在 1805 年和 1806 年付诸实施时将震惊世界。波拿巴的独创天才充分表现在精心制订的战略原则和建成对战略原则不可或缺的战术部队上面。除此以外，他大体上仍然忠实于法国革命所采用的办法：混合编制和从士兵中晋升始终是他的军队最重要的特征。虽然波拿巴在战争准备中表现了极高的组织能力和对细节的慎重考虑，但是他对每次战争总是临机处置。

一、征募与晋级

征募新兵仍根据共和六年的法律，这项法律已补充了许多行政规定，最后于 1811 年把所有这些规定都编纂成一部法律。这部法律规定，所有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的法国男子都得服兵役；但是为了免得使政府帮助供养应征者的妻子儿女，它又允许有许多例外。首先免服兵役的是那些已婚男子，以及在 1798 年 1 月 12 日前已有孩子的鳏夫或离了婚的男人。公共舆论忽视了限定的日期，而一般都把免服兵役视为永久性的。然而由于法律有明文规定，所以 1808 年以前的征召，甚至追溯既往的征召入伍，都没有放过已婚男子和成为鳏夫的父亲。不过，征募新兵的军官倾向于不征募这几类人，或把他们列入“备取”，也就是说，编入已中签的一部分新兵之中，这些人只在应召新兵不足额时，才应召入伍。最后，按照 1808 年 9 月 10 日元老院决议案免除了这几类人的兵役。因此到帝国末期匆忙结婚者数以倍增。另一方面，赡养家庭者受到相对的优容，在教务专约签订之后，对神学校学生则更是如此。最后，在共和八年只是一种优待的“顶替”制度，根据共和十年花月 28 日（1802 年 5 月 18 日）的法律变成了一种权利。

出于财政的也有经济的考虑，为了保存劳动力，共和六年法律规定，除了祖国在危急中的情况之外，不征募所有适龄者入伍，而是由议会每年规定一定的新兵名额，首先从年龄最小的适龄者中征募。在执政府时期，新兵的征募大体同在大革命时期一样：本已为数无多的每年新兵名额由立法院通过决定，然后摊派到各郡。在原则上，郡议会和县议会再给各公社分配名额；各市府自己选择医生检查新兵体格，指定免役人员，批准顶替兵入伍，如有异议最后上报郡守决定。

兵役制度如同帝国其它制度一样，朝着同一个方向演进。从一开始“顶替制度”就已优待新贵名流。1805 年 9 月 24 日拿破仑以元老院决议案规定了名额，此后就剥夺了立法院在这方面的权力。另外，许多市政府玩忽职守、

庸碌无能和舞弊作恶，以致怨声载道。于是象剥夺市政当局财政权那样剥夺了它们在征兵中的职能，地方征兵改由专职官员主办，这就大大有利于平民。政府禁止各市政当局用投票方式抽征新兵，而鼓励用抽签办法征募新兵。郡守和县长日益频繁地干预兵役制度的实施。共和十年热月 18 日（1802 年 8 月 6 日），每个郡都成立了一个由郡守和数名军官组成的巡回征募委员会，目的在于重新审查所有因健康不合格而免服兵役的人。1805 年的战役又引起决定性的变化：按照 8 月 26 日法令剥夺了地方议会的分配名额的职能。从那时起，名额分配改由郡守和县长负责；后者开列适龄新兵名单，以抽签方式选择应召新兵，并负责主持体格检查，不过检查要经征募委员会复审。中签应征入伍新兵仍然保留由志愿兵代替入伍的权利：这叫作“替换”；此外中签新兵还可以雇人代替：这叫作“顶替”。甚至在新兵编入团队之后，还可以雇人顶替。入伍新兵的分配是由皇帝或他的大臣决定的。每一个团派出一名军官以顾问的名义参加征募工作；这名军官由一个护送队陪同，把分配给该团的新兵带到新兵训练站。除了 1800 年由阿让维利埃负责、1807 年由督导官拉居厄·德·塞萨克管理的征兵局之外，新兵征募工作没有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但是征兵制度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至于新贵名流的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拿破仑无疑地有所制止，但是他也不能做到彻底杜绝。

虽然这一制度做到了合理利用人力，但是由于取消了平等，由于把大部分负担转嫁给穷人，因而改变了兵役制度的全民性，所以也带来了不利的一面。1805 年到 1811 年顶替兵的价格上涨得不很多，但是在科多尔郡价格从一千九百法郎波动到三千六百法郎，以致新兵名额中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能有钱雇人顶替。但是，征兵之所以终于为人民憎恶，那是因为在 1805 年之后一直在打仗的缘故。被征来的新兵从来没有进过兵营，而是尽快地开赴前线，投入战斗。无休止的战争不允许他们退役：士兵只有在残废的情况下才能回家。1803 年军队仍然还有十七万四千人是在 1792 年到 1799 年间征募的；而且他们的退役还遥遥无期。此外，随着皇帝的冒险事业的不断扩增，征募数字也不断地增加，而且 1806 年之后都是提前征募新兵，虽然法律并没有此项规定。直到 1813 年，确实并没有任何一年的适龄入伍者是一次全部被征入伍的，但是那些没有中签的人，甚至那些已雇人顶替的人也都是毫无保障的，因为谁也不能阻止发布补充征募新兵的征召令，从尚未入伍完毕的各年适龄应征者中补征。早在 1805 年，拿破仑就从 1800 年至 1804 年每年适龄男子中补征了三万人。

对当时的人来讲，这些要求似乎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在旧制度统治下还闻所未闻。不过必须指出，从 1800 年到 1812 年拿破仑一共仅仅征募了一百三十万人，其中从法国原有领土内征募的占四分之三稍多些。甚至把 1812 年和 1813 年的巨大征兵数字（超过一百万人）考虑在内，那些实际上被征募的男子的比例没超过适龄的男性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科多尔郡从三十五万居民中提供的新兵总数仅为一万一千名，占百分之三点一五；北滨海郡从

五十万居民中征募了一万九千名士兵，占百分之三点八。正如在法国革命时期那样，拿破仑不得不追捕规避兵役者和逃兵；早在共和八年，他们的父母就要被罚款，1807年之后，他们的家又都受到驻兵监管。宪兵和国民自卫军的别动队在全国各地搜捕逃犯。这些措施的确很有效，因为触犯军纪的人在1812年之前一直为数不多：例如在科多尔郡，从1806年到1810年这样的人不足百分之三。共和八年、共和十年以及1810年拿破仑三次大赦他们。因此，国民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更为顺应强制兵役制；只有最后由于军事失利而出现大量征兵的时候，国民才变得难以驾驭了。

由于不断地进行战争，拿破仑的军队通过不断的混合编制加以补充，这个原则产生于法国革命。每个战役一开始，新兵部队不管服装和武器好坏，都分成小股部队奔赴前线。皇帝在1806年11月16日写道，“新兵不需要在训练营里呆八天以上”。他们在开赴战场的路上学习基本军事技术，如此而已！一旦编入团队，他们就和久经战阵的老兵混合编制在一起，在战斗中获得他们所能得到的知识。即使在战争中有短时休整期间，也不注意操练，因为操练被看成是没有用处的。拿破仑的士兵和兵营中训练出来的士兵毫无共同之点：他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士兵一样，是仓促上阵作战的斗士，并且还保留着同样的独立性。既然由普通士兵提升的军官们是他昨天的战友，并且他自己也可能在明天被提升，因此他很不注意“军队的”精神；对他来说形式的、机械的纪律是难以容忍的；他往往随便离队，到时候回队，只有在炮火下才服从命令。很少有军队容忍违犯纪律到这种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示威，个别抗命以及哗变经常发生。拿破仑为此大发雷霆，但他总是对军队表现出比政府特派员更加纵容的态度；他认为士兵基本上是一名战士，而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战士是否渴望战斗、并且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

这种在敌人面前表现出鼓舞着个人的主动性、大胆、自信并使军队具有集体精神的热情，也是大革命的遗产之一。无套裤汉的激情、对平等的热爱、对贵族的仇恨、对教权主义的激烈反抗无疑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了，但是这些情感并没有熄灭；1805年它仍然十分热烈。在老卫兵看来，被人亲昵地称作“小伍长”的拿破仑从来不是一位帝王，而是在反对各国帝王的战争中的一位领袖。从大革命中也迸发出了一种意气风发的民族主义感情，这是一种属于“伟大民族”的自豪感。皇帝用颁发“告士兵书”的方式，精心地哺育着这些情感，在这一点上，他承继救国委员会的办法，使战争成为一种得到群众拥护的事业。

如同国民公会和督政府的军队一样，拿破仑的军队的威力，主要也是从为个人才干开辟了发迹道路的社会革命中得来的。在军队里，平等表现在从士兵中擢用军官。共和八年宪法授权总司令选用军官。即使拿破仑表示有意恢复军事贵族，但是他基本上还是凭军功大小决定任命。资历是无足轻重的；知识水平本身很少引起重视；打胜仗不取决于受教育多少，而是几乎完全依靠大胆和勇敢。每次战斗之后，负责晋升的上校军官从团内选拔战功突

出的人填补阵亡军官的空缺，士兵是对他在提升问题上表现得公平与否的最好的法官。拿破仑也根据同一标准任命高级将领。在一个正在巩固等级制度的社会里，正是军队给有才干的人提供了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因此，军队强烈地吸引了有抱负的青年人。军队中的优秀分子理所当然地渴望投入战斗，冲在前面，他们带动了其他人，或者至少在战场上弥补其他人的短处。拿破仑从未停止过鼓励这种对荣誉的渴望，起初颁发滑膛枪和军刀，即表示荣誉的武器，后来颁发荣誉军团勋章。同时他还大大增加了精锐连队和军团的数目，其中最得意的是身着闪闪发亮、五彩缤纷的检阅军服而显得异常突出的近卫军。

这个制度实行的结果是，相对地讲军官比士兵所受过的训练高不了多少。由此而带来的不利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拿破仑从未和任何人在一起商量制定战略思想和指挥作战；除此之外，只要有在战略运用方面很熟练、有经验的勇敢的将军们就足够了。总参谋部不是一个能对战斗进程施加影响的自主机关；那些在机关里工作的军官只是处理实际任务：皇帝下圣旨，他们转达。总参谋长贝尔蒂埃是一位优柔寡断、才能平庸但规规矩矩、唯命是听的将军，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名“传送陛下敕令”的少校而已。拿破仑在1806年写信对他说：“严格遵守我给你的命令”，“只有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贝尔蒂埃亲自告诫一位元帅说：“没有人了解他的思想，你的职责就是服从命令。”拿破仑的副官，如马尔博、费桑扎、卡斯特朗、古尔戈和他的侍从武官，如迪罗克、穆东、拉普、德鲁奥、萨瓦里和贝特朗，都是由于他们具有敏捷的判断力和尽职的热忱才从行伍中选拔上来的。他们根本不具备左右军团司令官的权威；他们只不过是主人的耳目而已。这些人总是奉命出差各地，他们发回视察该地形势的报告。然而，如果拿破仑不能同时到各处巡视，认为有必要指定人代他外出的话，他就派出一个心腹，如缪拉、拉纳、达武或马塞纳，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副总司令或军队的临时司令官，也只有他们才有权制定战略方针。因此，真正富有才干的将领并不需要很多。

由此可见，拿破仑的军队并没有整套的制度；它不断地经历着临时出现的变化。军队的力量在于发挥个人的勇敢和指挥官的天才。各兵种在组织方面的革新无关紧要。步兵仍然分成战列步兵和轻步兵或称流动步兵，他们的战术没什么重大的变化。共和十二年葡月1日（1803年9月24日）规定的骑兵建制，此后成为标准的分类法，即分为轻骑兵（狙击骑兵），主力骑兵（龙骑兵）和重骑兵（胸甲骑兵）。由于国民公会和督政府的努力，骑兵比步兵训练得要更好一些。在缪拉和许多勇猛的骑手率领下，奥国的骑兵是没有什么可怕的。炮兵是按照骑、步兵团组成的，步兵的炮被取消了。工兵组织为一些独立的营，架桥兵也属于工兵营的编制。近卫军的编制在共和十二年热月10日（1804年7月29日）确定下来，那时这支部队有三分之二是富有经验的老兵；它包括五千名步兵和二千八百名骑兵，这两个兵种被分为掷弹兵、轻骑兵和轻武装搜索兵。再加上一百多名马穆鲁克^①、一个轻炮队、海

军陆战队、宪兵队、甚至拥有一个为时法国军队中唯一的辎重队。至于军械则没有什么变化。1777 滑膛枪准确射程为二百米，每三分钟至多打四发子弹。格里博瓦尔炮__每分钟发射两发实弹，重量达四磅、八磅或十二磅，在六百米以内效果极好。在四百里之内效果良好的榴弹和霰弹偶尔也使用。也使用一种六吋榴弹炮。拿破仑非常重视炮火，因此就非常重视炮队。然而他自己的炮队炮的数量为数不多：1806 年以前，每师只有十二门炮，就在这一年才出现了一个有大约五十九门炮的总停炮场。1808 年平均每千人中还只有两门炮。马尔蒙对这种落后状态应负部分责任；1803 年。他曾经着手进行改铸全部大炮的工作，但是当 1805 年战争又起时，他被迫放弃了这个工作。但是还有些更为深刻的原因：装备工具缺乏，而最重要的是运输能力不足；既不能搞到更多的炮车也不能得到充足的弹药。

拿破仑的军力由于不断战争和扩大征服，也由于他日益增长的贵族倾向而逐渐削弱。随着共和国时期的老兵数量日减，而入伍新兵骤增，因此混合编制的效用变得越来越小，1809 年，军队开始建成完全是新兵的师。要使从士兵中晋级这一制度发挥其优越性，有赖于每次战役有相当数量的阵亡军官，以便为新人的提升腾出位子。起码在 1812 年之前，阵亡军官为数不多。特别是高级将领比比皆是，而一旦荣任元帅，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保持钱财和荣誉，因此便希望和平与安逸。如果只由皇帝一人独断专行，这种弊端可能会发展得更为迅速，因为这符合他的政治意图，符合他要建立一个包括出身贵族、富人和军官子弟的军界优秀核心的社会理想。他建立了一所陆军中学，在圣热尔曼设立了一所骑兵学校，在枫丹白露创办了一所军官学校，这所学校于 1808 年迁到了圣西尔。拿破仑也考虑到要重建 1791 年解散的“亲卫队”__：按照这种方针，他于 1800 年创建了“后备志愿队”，1806 年创建了“宪兵队”。他鼓励组织从出身名门的国民自卫军的成员中征召的地方“仪仗队”，1805 年 9 月 30 日，他把这些原供检阅用的部队列入军队编制。虽然军官们愿意让自己的子弟到军校学习，但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不愿意送他们的子弟去。此外，拿破仑意识到有招致军队，特别是近卫军不满的危险。宪兵队和仪仗队于 1806 年被取消了，只是在 1813 年后才又恢复起来。只有在意大利王国，1805 年 6 月 26 日建立的王室仪仗队成了军官养成所，这就揭示了拿破仑的真实意图。

军队的民族性质也减弱了。1800 年以后，法国部队中来自新合并地区的士兵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这一比例随着新的扩张而不断增加。此外，拿破仑还恢复了旧制度的习惯做法，即尽量征募外国人入伍。他有瑞士团和波兰团，1803 年组织了汉诺威团和爱尔兰团，1805 年又创建了两个“外籍”团。这些外籍部队与日俱增。最后帝国军队包括有属国和盟国的部队：1805 年以后有意大利人、荷兰人和南德意志人。他们的数量增加得如此之多，以至在 1812 年法国本土上的法国人在帝国军队中只占少数。

正是这个制度的成功暴露了某些随之而来的弱点。随着战场的增加，拿

破仑如不能亲临现场就往往暴露出：他的将领中很少有人能独当一面，统帅全军。内依、乌迪诺和苏尔特在独立指挥作战时表现庸碌无能。人们认为，拿破仑要对这种庸碌无能负责，因为他剥夺了这些司令官所有的主动权。这是没有根据的指责。虽然如同所有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一样，他独自指挥战争全局不和别人共同商量，然而在选择具体作战方法上，他还是留给他的将军们相当大的活动余地的。只是他在选拔高级将领时，没有使他们具备应付大规模战争的必要训练。另一方面，扩大征服地使交通线随之延长，并需不断分兵占领新征服的领土，这就又构成了另一个弱点。由于拿破仑总是想用决定性的打击一举结束战争，所以军队缺乏后备力量。除了提前征募下年度适龄新兵之外，没有其它办法补足军队兵员；只有依靠盟国甚至最靠不住的属国的军队，才有足够兵力驻防所占有的土地；在前线，精锐部队的战士不断地减少。以共和三年牧月 28 日（1795 年 6 月 16 日）法律为基础、根据共和八年宪法规定所重建的国民自卫军本来是能够为国防军提供兵员的。但到 1805 年，它只是存在于纸上；9 月 24 日，皇帝命令重新组织国民自卫军，他自己保留选派军官的权力；但在事实上，他只不过是组织了精锐的连队和仪仗队而已。后来，他部分地动员了国民自卫军，例如用在保卫沿海区域；不过直到 1812 年，他没有把国民自卫军同他的军事制度紧密地联系起来。

1805 年还没有出现令人不安的征兆。拿破仑在布伦大营命名的帝国“大军”，于 8 月 26 日开始向德意志进军。它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将近四分之一的士兵在法国革命期间参加过所有的战争，另外的四分之一左右参加过 1800 年战役，而其余的人是在执政府时期入伍的，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和老兵们完全融合起来。各级军官几乎都亲身经历过战斗，然而他们年岁太大：九十名校官超过了五十岁，有些超过了六十岁。另一方面，高级军官很年轻，作风泼辣。这支军队只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就把“大帝国”的疆域扩张到了涅曼河畔。

二、战争准备

在旧制度之下，战争总是在毫无准备之下进行的。一旦战争爆发，就必须征募官兵。变为大承包商的军需供应商不问贵贱地购买货物，充塞他们的仓库，囤积装备。他们敲诈国王，而他们的代理人吸尽士兵的骨髓。政府力图建立监督制度，但是军需官却没有职业良心，足以抵制腐蚀。这种弊端的显而易见的原因似乎是由于财政匮乏的结果；而深刻的原因则是国家的经济情况，经济还十分薄弱，以至不能支撑现代战争，也不足以维持一个廉洁的、胜任的官僚机构。这样，王政下的政策总是超出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同样不得不仓猝作战的山岳派做过非凡的努力，以便废除私人承包商，使供应业务国有化，并且要求公务人员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热月 9 日政变之后，共和国处境与王政时期不相上下。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一仍其旧，而由于军队

数量剧增和战争旷日持久，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象雅各宾派一样，拿破仑非常厌恶军需供应商；并且同他们一样，在缺乏足够金钱和人员的情况下被迫仓促行事，但由于他依靠的是新贵名流，他就不能诉诸雅各宾派的做法。正象他为了充实国库被迫求助于金融家一样，他现在要维持军队也不得不求助于这些人。1805年，范勒尔贝格等人保证为国内军队提供粮秣；战争爆发后，某些公司负责专营面包、肉类、饲料、医院和所有运输设施，包括大炮的运输设备，所有这些经营都可获得一定的保证利润。共和九年，创立了一个炮队运输营，只有近卫军才拥有自己的行李辎重队。拿破仑做了很大的努力来厉行账目核实。共和十年，把军队的行政管理部门组成军政部，由德让领导。军队的财政机构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早在共和八年，核实军队数字的任务就不再由军需官负责，而改交给叫作审核员的官员专门负责。前者与后者都对帝国大军的兵站总监维尔曼齐负责，1806年达律接替了他。皇帝非常喜欢亲自清查名目繁多的账目和发现账目错误。虽然他查对收支账目只能偶尔发现没有落账的交易和不正当的支付。但战争时期匆促任用的军需官依然营私舞弊，民愤很大。拿破仑于1808年5月18日写道：“他们叫我给已死的士兵发饷”，况且，他从未能防止他的将军们征收强制捐献以饱私囊。

1805年，拿破仑已拥有将近四十万步兵，但是在和平时期他不能适当地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普通士兵每天得到五苏，但是国家仅仅配给他们一份口粮，在战争时期配给一份肉。即使是这一点微薄的军饷也不能按时发给。就在1805年出征的前夕，拿破仑注意到士兵的“军饷不足”；1806年底军饷拖欠了五个月。由于经费缺乏就不可能储备食品、鞋、军服以及进行战役所需要的运输工具。拿破仑只得先注意武器和弹药。1800年，他曾说明需要贮备三百万支滑膛枪，但他从未获得这么多的枪枝，而且这个数字本已超过了国家的生产能力。到1805年，只制造了十四万六千支滑膛枪，据估计，仅一次战役中的损失就相当于这个数字。炮兵部队就更加供应不上，大炮的损失只有靠夺取敌人的军械库来弥补。如果说弹药的供应没有引起严重问题的话，那是因为节省使用弹药的缘故；在耶拿，第四军团仅仅发射了一千四百发炮弹。至于军马一直是供不应求，尽管拿破仑特别关心此事。由于法国不能保证足够的马匹，不足的部分都从被征服的国家补充。

至于其它东西——食品、鞋、服装，原则上应是以战养战。贝尔蒂埃在1805年10月11日给马尔蒙的信中写道：“在皇帝发动的大举进攻的战争中，仓库是不存在的，军队要在入侵的国家中获得给养就全靠军团的总司令了。”人们会争辩说，在作战前夕，拿破仑非常努力布置给他的士兵烘制面包和饼干，分发鞋子。但是，首先是为时太晚，再则他的命令也没有全部贯彻。1805年，许多士兵只穿着一双鞋就渡过了来因河，而1806年许多人身无大衣就开赴耶拿；至于面包，他们能够得到多少就带多少。拿破仑的战争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迅速行军为基础的，这种战争体系适应财政拮据的情

况：以他所拥有的运输工具而论，即使有更多给养也赶不上军队的需要。士兵出征时装备很差，因为拿破仑每次作战时都指望速战速决。这种速战速决的胜利成为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因为后方没有准备人力物力支援战争；如果军队被迫退却，或者敌人顽强抵抗，甚至敌军在投降之前来得及实行破坏的话，法国军队就会只因弹尽粮绝而遭覆灭。

当战争在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时，它总是以牺牲士兵为代价的。象达武这样煞费苦心按时为连续行军的部队筹办军需品的将军是寥寥无几的。士兵通常从居民那里掠夺他们所找到的一切；但是由于队伍接连不断通过，因而后来的就一无所获。士兵们忍饥挨饿，有时浑身湿透，往往睡眠不足，要么饿得要死，要么酩酊大醉，因而他们便落得疾病缠身。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健康。医务工作依旧处于极其受忽视的状况。虽然国民公会征召内外科医生入伍充当军医官，但是督政府出于经济原因决定在和平时期立即把他们遣散，而拿破仑也一仍其旧。除了象拉雷、佩尔西、科斯特这样杰出的军医首长之外，医务人员比庸碌无能更低一筹。他们只使用简陋不堪的医疗设备，从当地居民中征用必需品并招募他们做护士，就这样建立起野战医院和临时医院。这简直是人间地狱，佩尔西在他的日记中描绘了这个地狱中的恐怖景象：医院里极端痛苦的炮弹重伤病员、不用麻醉药的截肢、坏疽与溃烂，难以形容的污秽、疥癣、虱子以及斑疹伤寒。拿破仑绝对禁止把伤员运回遥远的后方，特别是不允许运回法国；由于缺乏卫生设施他们会在途中死掉的。当时的死亡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用令人毛骨悚然的措辞描绘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泰恩还是一再说，在执政府和帝国时期有一百七十万人死亡，而这个数字还只限于从 1789 年的疆界范围内征募的人。可是，既然从在这疆土范围内征募的士兵总数从未超过这个数字，那就是说全体官兵有去无回，更不必说被俘的了。事实上从 1800 年到 1815 年间实际损失可能不到一百万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其中有三分之一失踪，这些人肯定不是都死了。这个数字还要加上从 1789 年以后法国新合并的疆域内征募的大约二十万法国人，以及从盟国和属国征募的大约二十万人。尤其不应忘记的是，阵亡人数仅占死亡总数的一小部分：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阵亡百分之二，在滑铁卢战役中阵亡数目最大，占百分之八点五。其余的人或者因为受伤、患病而死在医院里，或者因疲惫不堪、饥寒交迫而亡。

拿破仑对待供应问题的态度引起许多可怕的后果。法国的占领变得日益不得人心。抢劫与掠夺成风，这就使纪律大为松弛，士气极为低落。强行军使得部队把残废者与掉队者抛在后面，他们聚众结伙，无所不为。悲惨的境遇常常引起兵变。最糟的是，拿破仑的军事体系是以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地方为依据而制定的，主要是伦巴第，在那里他曾经进行过头两次欧洲战役。当他侵入北德意志、波兰、西班牙和俄罗斯时，地理条件就使得他的战争体系行不通了，于是军队便陷入了危境。

三、战争指挥

在旧制度的最后年代里，法国的军事学家曾论证了由弗里德里希二世加以完善的传统作战方法的不利方面：一支不连贯的部队，沿着单一的道路以线式队形缓慢行进，不能控制整个作战区域，因此不能迫使敌人迎战或在敌人坚守阵地时进行机动迂回。然而，要等到法国革命才使战争突破墨守成规的作战方式。随着兵员数量的增加和发动群众战争，法国革命的将军们不得不把军队组成为师，以便于指挥。不过很快发现这种新编制仍有不妥之处，因为随着师的数目逐渐增加，总司令要协调各师间的行动就很感困难。骑兵和炮兵分别编入各师，所以便不可能集中使用它们的力量。督政府时期曾断断续续地试行过一种较高一级的部队编制即军团，1800年莫罗曾指挥过三个军团，每个军团包括四个师，但是没有后备队。拿破仑从法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中以及从吉贝尔和布尔塞的教导中引伸出自己的战略思想；但是在马伦哥战役中他才最后确定了部队的编制：每个军团有两个或三个师，尽可能配有少量的骑兵；大部分骑兵组成独立的兵种，炮兵后备队则直属最高统帅指挥。执政府时期，这种组织运用到了全军。这些师和军团的力量仍然是不断变化的。1805年，一个军团包括二至四个师，总人数在一万四千人到四万人之间；一个师由六个到十一个营组成，人数从五千六百人到九千人不等；一个团包括一至三个营。次年，军队实行了较为正规的规定，每师有六千到八千人，每团由两个营组成。

拿破仑的军事天才表现在使几个军团协同行动的能力。这种艺术在于部署和指挥几个军团如何进军，以便能够控制整个作战区域，使敌军无从脱身；同时，各个军团还得要保持相当近的距离，以便能够集中部队进行战斗。军团的部署一般采取容易变化的梅花阵形。在向敌人开进时，随着某些军团发现自己容易遭到突然袭击，战线就逐渐收缩。有时，如在艾劳，军团在确定朝一个较远的前进方向之后，就在战场上进行集结，以便就在前进中迂回和包抄敌人。战役的总布局需要两个不同的战斗计划，它取决于拿破仑是打算同一支单独的敌军部队作战，还是希望在几支敌军之间占领中心阵地，如1796年至1797年在曼图亚周围的战斗，或者如在1813年的情形那样。无论如何，部署根据环境而变化，从未拘泥于一种方式，拿破仑的战略是一种艺术，虽然也有一些原则，但在判断形势和作战实际中从不受这些原则的拘束，从不损害他丰富的想象力。

胜利取决于拿破仑的当机立断与胆略，其次取决于部队风驰电掣般的行动。突袭是取胜的重要因素，因此，它要求绝对保密。总是主要以骑兵为掩护的军队只要有可能就利用河流、山脉作为行军的天然屏障，虽然隐蔽自己、迷惑敌人是很重要的，但发现敌人的行动也同样是很必要的：掩护部队和情报机构就起了作用，情报机构利用外交官，各式各样的特务（或许应该包括神秘的基尔曼斯埃格伯爵夫人在内），尤其是利用间谍，象臭名昭著的

舒尔迈斯特这样的人，很乐意一仆事二主，两边讨好。一旦部队沿行军路线前进，拿破仑就不再很重视与法国相连接的交通线了，因为他总是期望战役在短时间内结束。另一方面，作战路线却是他严重关注的事，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这些路线是连接部队与后方指挥部所在要塞之间的道路，指挥部所在地随着部队的前进而推进。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小分队守卫各驿站驿路，保持部队和法国的联系。因而，在拿破仑看来，要塞的作用很大，它们既是作战基地，又可据守河流和山口，可用来作桥头堡并掩护部队。然而，要塞没有起到在革命前的战略中那样重大的作用。在纯以迫使敌人决战和歼灭敌人目标的战役中，要塞本身从来不是战役的目标。

在战场上，拿破仑力求迫使敌人全线作战以耗尽其后备力量。这一任务要用最少的兵力来完成，以便完整地保有一支密集的突击部队；然后，他就用步兵和大炮的火力对准威胁敌人的侧翼和退却路线，从而挫伤敌军的士气。最后，当拿破仑认为敌人已被大大地削弱时，他就投入生力军，击溃敌人，并无情地追击溃败的敌人。这种追击是拿破仑战争的最新颖的特点，只有少量军队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从来也不敢下令这样追击的。拿破仑指挥战斗确是无与伦比的，但他并没有改变基层单位的战术，这是他从未论及的一个题目。在原则上，部队的基层单位仍遵循 1791 年的操典：师以旅为单位组成两道防线，一个团在前面展开，另一个团则成密集的纵队队形。但是，事实上，大革命时期的军队部署方法仍然保持未变：步兵往前面派出一群精心挑选的散兵，他们在地形的掩护下前进；第一线的步兵逐次跟进，通常以同样的方式投入战斗。就是这种随意的机动灵活的射击打乱了敌人的阵脚，敌人习惯于对付线式队形，在这种队形里，士兵依次成三列（后两列成立式），这就提供了准确的目标。一听到冲锋号，法军第二线步兵就以密集的纵队前进，几乎从来都无需动用刺刀，因为到这时敌军往往掉头逃跑了。战术毕竟经历了某些变化。斗志昂扬的法国人倾向于用刺刀大规模冲锋来缩短射击战斗的时间；随着没有经历过炮火的新兵数量的增加，指挥官们变得更喜欢使用纵队。然而，一旦英国人，甚至德意志人改革战术以适应这种新方法时，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拿破仑战争艺术的弱点之一也许是缺乏对基层作战单位战术的重视，而当反法同盟各国军队有所改进并发挥其有利条件时，法国的弱点是没有随之改进自己的战术。

由于财政困难的限制，拿破仑的战争势必要速战速决，这就确保了皇帝的威望。无坚不摧的威力和迅速结束战斗的无懈可击的机动灵活的致命一击，直到今天仍然唤起人们富于浪漫色彩的敬佩。战役进行的迅速与勇猛成为拿破仑火焰般性格的标志。就象供应军粮的方法一样，他的指导战争的思想是在他所进行的最初几次战役中形成的。群山环抱的波河盆地使敌人无路可逃。盆地面积相当小，巧妙铺开的部队很容易控制它，因此部队能够来回运动而不致精疲力竭；这个盆地相当肥沃，足以为部队提供补给，使其得到恢复。军队到了南德意志，距离拉长了，因而已经倍感艰辛；但南德意志还

是分为几块地区，所以仍然能运用原有的作战方法。但是一旦军队打进北德意志、波兰和俄罗斯漫无边际的原野，情况就不同了。敌人现在能够逃跑了，由于距离遥远，行军把军队搞得精疲力竭，军粮供应成为难只解决的问题。沿路都要分兵驻守占领地，以致在开始战斗之前军队就分散了。经济情况不能提供必需的运输工具，军事组织依然如故，后备力量缺乏。拿破仑的战略完全是以地中海区域为依据，这种战略没有预见到新的地理条件，因此便不能成功地完全适应这些新的条件。

第三章 大帝国的创立 (1805—1807年)

拿破仑即位的头一年，在严重的财政危机下进行的1805年战役使他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胜利拯救了他，他控制了德意志，并开始组织大帝国。这样就招致了新的反法同盟的形成，而反法同盟的失败又把整个中欧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并且由于提尔西特条约的签订而巩固了“大陆体系”。

一、1805年的财政危机

拿破仑命令帝国大军开赴德意志之后就返回巴黎为战役做紧急准备。他发现工商界焦虑不安，惊慌失措的民众挤到法兰西银行的大门口，国库空空如也；而王党分子则满怀希望。长期以来，国库大臣巴尔贝-马尔布瓦的处境极为艰难，法兰西银行正在被通货膨胀所压垮。这家银行除了拥有已经直接为国库贴现的二千七百万法郎期票外，银行的一名董事德普雷又强加给它二千万法郎期票，这是国库部推销给“联合商行”的，更不必谈法兰西银行应负担的税收证券了。但由于乌弗拉尔在西班牙的财政投机活动——当时最大的投机冒险——这种灾难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查理四世的财政状况处境可悲。西班牙自从1804年以来饥荒严重，它在墨西哥国库贮存的银币皮亚斯特已经不再运到。答应每年给拿破仑的补助金早在1804年6月就已拖欠了三千二百万法郎。乌弗拉尔把这笔款项预付给法国国库，国库把收税官的新证券交给他作为抵押。由于以前曾给西班牙舰队供应粮食，所以乌弗拉尔掌握着的墨西哥国库的支票总数达四百万皮亚斯特；他的兄弟在美国费城开设了一家商行，他亲自证实了在墨西哥国库中存有七千一百万皮亚斯特，只要一有机会便可运往西班牙。乌弗拉尔出面担保，他有办法把这笔钱财运到欧洲，用来偿还法国和他自己。拿破仑对这种前景当然很高兴，乌弗拉尔得到皇帝的许可于1804年9月启程赴西班牙。

到马德里后，他便以豪华的排场、善辩的辞令与丰盛的礼品眩耀于宫廷。戈多伊热切地答应把西班牙拖欠的补助金偿还乌弗拉尔，并同意他以每公担二十六法郎的价格向西班牙提供二百万公担小麦。由于在法国，特别是在法国西部，粮食有剩余，乌弗拉尔每公担只花费十八法郎。拿破仑总是热望讨好农民并急于使硬币流入法国，便欣然批准出口特许证，条件是法国政府要收取一半利润。乌弗拉尔接着又热心和那个负责维持银币价格的保证银行打交道。他答应立即借款给保证银行，此外还给一笔为期五个月的信贷。他获得的保证是取得在罗马教皇同意下即将出售教会财产的权利。保证银行拥有烟草专卖权与汞矿开采权，乌弗拉尔要求取得这两项权利。西班牙对英国宣战后，乌弗拉尔给停泊在半岛各港口的法国和西班牙舰队提供粮食；为

了支付这笔花销，他从在阿姆斯特丹经营霍普银行的一个朋友拉布谢尔那里借了一千万盾。

由于乌弗拉尔做出了这么多贡献，他就处于转运墨西哥白银问题的有力地位，他竭尽全力为这些财富的转运求得皮特的帮助，而皮特正因在印度搞商业活动而需要白银。1804年12月18日，乌弗拉尔收到了西班牙政府给他的墨西哥国库的五千二百五十万皮亚斯特的支票；他把其中一部分送给了巴尔贝-马尔布瓦，而后者没办法只好交付他更多的收税官的证券。已完全被拉过去的查理四世与乌弗拉尔合伙，承包了将来从美洲装运硬币的所有运转业务。但是乌弗拉尔由于经营得手以至不想就此止步：他邀国王与他合伙经营西属美洲的全部贸易。他取得了西属美洲贸易的专利权，并承担保证国王可能需要的一切运输业务，条件是，他将获得一笔佣金，并取得每只船为他装运三分之一货物的权利，而查理四世则支付一切开支和承担所有风险。乌弗拉尔为这笔交易取得了空白特许证，上面没有填写船只所驶向的目的地；他准备把这些特许证卖给美国人。然后他就出发去阿姆斯特丹，拉布谢尔起初有些不知所措，但终于在1805年5月6日同意替他承担墨西哥皮亚斯特的转运业务，并接受使用特许证的贸易。然而乌弗拉尔被迫事先同意霍普银行在最后决算时无论结果如何付给它所应得的盈利。

由于乌弗拉尔依靠拉布谢尔——他是最有影响的伦敦银行家、皮特的密友巴林的女婿——来取得英国的默许合作，因而就使这次业务成为具有国际性质的事件。实际上皮特同意了这种做法，甚至派出四艘英国帆船巡洋舰去装载首批白银，购买白银的款项由英格兰银行付给了拉布谢尔。但是为了运送其余的资财和利用贸易特许证，拉布谢尔派出了达维德·帕里什（一位有名的汉堡银行家的儿子）到费城，另外还派出了两名代理人，一名到新奥尔良，另一名到韦腊克鲁斯。他们计划把墨西哥的皮亚斯特用美国船只运往美国，在那里，把皮亚斯特预付给商人，以换取运货到欧洲的代理商的支票。贸易特许证也以分享一部分利润为条件出卖给美国商号。交易直到1806年才得以进行，到1807年因杰佛逊宣告禁运而中止。整个交易将会使霍普银行和拉布谢尔获得九十万英镑，折合法郎是二亿二千五百万；而乌弗拉尔将只会分得二千四百万法郎。在这时候，拉布谢尔不得不与拿破仑达成协议。那些维护乌弗拉尔的计划的人有理由认为，这些计划能够获得成果；但是他们忘记了，皇帝不会赞同一个使外国银行、实际上是一家敌国银行发财的计划。他们尤其是没有认识到实际上是由法国付出这笔钱的。

运输银币皮亚斯特和利用特许证的贸易要取得成果需要较长的时间。在这期间，必须付款购买运给戈多伊的小麦，并须提供承诺给保证银行的资金和信贷。这些钱现在由法兰西银行拿出，它贴现了由保证银行发出的一部分票据和收税官的证券，这些证券是由巴尔贝-马尔布瓦只作为保证金而抵押的。因此当拿破仑踌躇满志，自以为做了一笔好生意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他在为整个活动提供资金！这时，就巴尔贝-马尔布瓦而言，他使法兰西银行

贴现了西班牙票据，这些票据，相当于他从乌弗拉尔那里接受的皮亚斯特银币储备量。再者，德普雷和范勒尔贝格还没有收到国库应付给他们供应粮食的款项，而且由于资金缺乏，他们采取了接受通融汇划票据的办法，这种票据使他们得以筹款和取得附加信贷。联合商行的所有股东开始互相开支票，甚至虚立户头为自己开支票，所有这些“包袱”集中压在法兰西银行身上，而银行却也毫不犹豫地全部承兑了这些支票。到1805年9月，这家银行的纸币发行额为九千二百万法郎之巨。要不是因为德普雷是法兰西银行的董事，要不是巴尔贝-马尔布瓦的秘书罗杰受贿一百多万法郎的话，造成这样的局面将是不可想象的。

乌弗拉尔仍旧泰然自若，他相信西班牙会偿清所有的债务，而且法国的信贷情况会保持正常。而实际上，西班牙交付小麦贷款很缓慢，保证银行由于难于在短期内卖掉教会财产也就不能承兑它的任何证券。1805年夏季，巴尔贝-马尔布瓦向乌弗拉尔索讨他承诺的皮亚斯特。为了抚慰巴尔贝-马尔布瓦，乌弗拉尔开始用他所能得到的那么一点点皇家公债来购买皮亚斯特；以后不久，皇家公债的票面价值下跌了百分之五十八，乌弗拉尔停止了付款，他认为运来皮亚斯特已不可能，因为他发给西班牙的信贷已遭冻结。在这个时刻，法国又将进入战争；巴黎股票交易所的投机商利用战争迫在眉睫的形势，从中赚钱；而民众便挤到法兰西银行提取存款。到9月底，这家银行的现金储备下降到仅有一百五十万法郎。起初，银行寻找种种托辞拖延支付，但最后被迫宣布停止部分支付。乌尔姆战役之后，恐慌情绪稍有平息，但在特拉发加海战之后，人们看到战争又拖延下去，恐慌情绪再次继起。11月，几家私人银行倒闭，其中主要有雷卡米埃银行和埃尔巴斯银行。

自8月底开始，法国国库的状况引起拿破仑严重的不安。加来海峡郡的军需官已发不出军饷，在斯特拉斯堡需要借款一千二百万法郎，但须有特别担保才能借到。因而相当多的士兵只穿一双鞋就渡过来因河是不足为怪的。最终还是士兵以自己的痛苦，甚至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他们主上仓促作战和金融家的投机生意付出了代价。不久，范勒尔贝格无力继续供应已出征的部队和国内驻防部队；9月23日，他只好吁请国库贷款，而国库也只得求助于法兰西银行。更为糟糕的是，政府后来授权范勒尔贝格，只要开一张简单的收条，他就可以从收税官的钱柜里领取现钱。这样一来，等收税官的期票到期时，法兰西银行收到的只是收条而已。1806年1月1日，范勒尔贝格亏损一亿四千七百万法郎，所以只好解除契约。拿破仑曾这么谈到巴尔贝-马尔布瓦：“如果我被打败，他就会是反法同盟的最好帮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位大臣的唯一过失在于他的无能。皇帝暗示过有一个在皮特的赞同下策划的阴谋，它的目的是要让前亡命者塔隆主管法兰西银行。不幸的是，我们对此所知无多。无论如何，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奥斯特里茨大捷消弭了这场可怕的危险。

虽然1805年的危机主要的是财政和金融危机，但不要忘记，在奥斯特

里茨战役的一年里，整个经济，无论在农业或是工业部门，都遭受了打击。在默尔特郡，或多或少是同过去一样的原因导致了危机；但更严重的是又造成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性下跌，象在革命前的经济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农产品价格下跌减少了大多数居民的购买力。这就造成了信贷紧缩，而高利贷重要性日益增长。这一切造成的最重大的社会后果，一如既往总是加深了民众的苦难。

二、1805 年战役

拿破仑幸好碰上奥国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查理大公的改革几乎还没有开始：1802 年，他曾以长期服役制代替终身服役制，但是这一改革直到 1805 年才生效。虽然他订出免除兵役的规定，但也不能阻止人们规避兵役，在二千五百万人口中，每年登记适龄应征的只有八万三千名。匈牙利议会于 1802 年拒绝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征兵；它同意每年只提供六千名士兵，战时外加一万二千名（只给一次）。从技术上看，奥国人最多只能建立一个提罗耳人猎兵团。当麦克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以后，他制订了新的条例以增加步兵和轻骑兵，并从 1805 年 8 月 1 日起修改了操典，然而他这样做只能制造混乱。另外，奥国的财政状况也使得这一切努力落了空。平时编制还缺少八万三千人，有九万七千人在休假，三万七千名骑兵没有马，没有一座大炮备有运载马车。临时凑合的程度比法国更甚，奥国军队发兵时比它的对手装备更差。

此外，麦克为俄国将军温青格罗德所误。率领俄国第一支部队的库图佐夫仅带来三万八千人，而不是原来答应五万人；计划应紧跟他来的布克斯赫弗登直到 11 月才到来。而归根到底，同在 1799 年一样，奥国主要关心的仍是意大利，它把查理大公率领的六万五千人的主力部队派到了那里，另派约翰大公率领的二万五千人到提罗耳还不算在内。在德意志，不久就成为麦克将军部下的费迪南大公只率领一支六方人的部队，再加上在福腊耳贝克有一万一千人，兵力所以如此之少的借口是俄国人即将前来会师。费迪南原想在累赫河东岸等待俄军，但麦克向弗兰茨皇帝担保，拿破仑此来不可能超过七万人。麦克决定推进直到黑林山，于 9 月 11 日渡过了因河并占领了巴伐利亚，巴伐利亚的军队退至美因河北岸。

然而，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是在德意志战场。拿破仑当然应把他的军队从布伦港开赴德意志，各个击败反法同盟各国的军队。马塞纳仅率领四万二千名士兵坚守在阿迪杰河上，因为意大利动荡不安，在皮亚琴察周围和皮埃蒙特不断发生暴动。拿破仑起初决定把帝国大军集中于阿尔萨斯：十七万六千人分为六个军团、外加一个骑兵后备队和近卫军；从布勒斯特开来的第七军团直到十月底才到达。接着，他于 8 月 24 至 28 日，发觉集中阿尔萨斯会使前进中的纵队延误战机，而且会使他们与从荷兰赶来的马尔蒙和从汉诺威

赶来的贝尔纳多特会师不易。因此他命令他们改变路线向帕拉蒂纳前进，在那里从9月25日起渡过了来因河。然后军团在缪拉的骑兵掩护下转向东南，朝着乌尔姆以下的多瑙河上的各个目标前进。拿破仑获悉敌人已在乌尔姆集结的消息后，于10月7日命令他的士兵开始在多瑙沃尔特附近横渡多瑙河。他后来失去了与敌人的接触，因为担心麦克南逃，他便命令他的军团成扇形散开，派贝尔纳多特到慕尼黑去截击俄军，使达武居中，而主力部队则向乌尔姆和伊勒河挺进。实际上，遭到突然袭击的麦克要集中他的部队有很大困难，而且他的两个军团于10月8日和9日在韦尔廷根和京次堡附近遭到沉重打击。后来麦克决定向北出击以期切断法国的交通线。被派去控制北岸的内伊，仅仅派杜邦指挥的一个师渡河去。杜邦的师于11日在哈斯洛克遭受严重挫折，奥国的韦内克军团和费迪南大公得以设法沿北路逃跑。但是麦克于14日得知法国人向西奔伊勒河前进，他以为他们正在向来因河退却，于是就回到乌尔姆去截击法军的退路。拿破仑急忙包围敌军，并命令内伊在埃尔欣根强渡多瑙河。奥军四面受围困，于15日投降。韦内克军团在缪拉的追击下于18日缴械，费迪南大公只率领几个残兵败将逃到波希米亚。总共四万九千名奥军被俘；唯独金迈尔一师得以逃脱。然而这场战役并不像某些人所断言的进行得那么整齐有秩序，军队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战术上的挫折。阴雨和大雪使得部队的行军困难异常。费桑扎写道：“除俄罗斯战役之外，我从未遭受过这么大的折磨，也从未见过军队如此混乱。”

这时内伊追击约翰大公进入提罗耳，并到达德拉瓦河流域；与此同时，奥热罗占领了福腊耳贝克。在意大利，马塞纳进攻查理大公，在卡尔迪埃罗一战中未见分晓，后来查理率领军队向莱巴赫撤退。拿破仑不失时机地挥师前进，直扑俄军，使已经到达因河的库图佐夫仓惶溃退。然而，由于在恩斯以东的多瑙河河谷突然变得狭窄起来，以至追击放慢了些。马尔蒙和达武不得不越过山地，而莫蒂埃被调到北岸，以阻俄军渡河；但库图佐夫在克雷姆斯设法避开了缪拉，11月11日，他在迪恩施泰因几乎消灭了莫蒂埃的一个师。缪拉在向维也纳推进时，施计巧夺了多瑙河上的几座桥梁，使得法军能够前进并越过了摩拉维亚的布尔诺。然而，库图佐夫已在这些地方与布克斯赫弗登的部队和一支奥国军团会合；另一支俄军也即将到来。

拿破仑这边的形势转入危境。他已知道自己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在南部奥国的几个大公可能把他们的军队集结起来；在北部，存在着普鲁士干涉的威胁。匈牙利按兵不动，弗兰茨于十月间再次拒绝匈牙利语为官方使用的语言和割让阜姆而使匈牙利深为不满；议会没有钱装备一次“起义”或总动员。匈牙利人对拿破仑没有敌意；当达武占领普莱斯堡时，帕尔菲宣布中立；摄政王约瑟夫大公虽然表示不赞成中立，但他的态度表现十分犹豫，以至被怀疑是想自己称王。普鲁士的威胁则更为险恶。为赢得时间，拿破仑命令贝尔纳多特率军假道属于普鲁士国王的安斯巴赫公国；这是前几次战役中已有先例允许通过的。这一次，弗里德里希-威廉甚至预先没有得到通知，他勃然

大怒；作为报复手段，他允许俄军假道西里西亚，然后不与拿破仑磋商就占领了汉诺威。亚历山大认为这是个适当的时机，便于10月25日到达柏林；他受到热情洋溢的接待，普鲁士的主战派大为振奋：当时已到普鲁士供职的米勒以及哈登堡都加入了主战派的行列；汉堡的书商佩尔泰斯呼吁普鲁士不要对奥国的命运置之不理；就连达尔贝格也于11月9日在议会宣称必须维护帝国的完整。11月3日，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在波茨坦签署了一项协定，普鲁士国王同意向拿破仑提出调停，要法国遵循吕内维尔条约的规定；如果法国拒绝调停，他就要率领十八万人参战，其中还不包括萨克森人，他们也已答应与普鲁士合作，也不包括黑森人，他们仍在犹豫，但黑森军队已由布吕歇尔统帅了。从10月15日起，施泰因为开辟必要的财源，开始发行纸币，并用国库的支票来支付那些军需品供应商。然而国王仍然坚持让拿破仑在12月15日以前明白表示态度。带着最后通牒的豪格维茨经过很长时间，直到11月28日才到达布尔诺；然后他又被送到维也纳，拿破仑指示塔列朗敷衍豪格维茨。实际上，弗里德里希-威廉已经又动摇了，即使不象他后来声称的，他命令过豪格维茨不惜任何代价地维护和平，他也命令过要竭尽全力保持和平。由于担心拿破仑与奥国达成协议而调转头来反对普鲁士，他便决定等待事态的发展。

即使拿破仑不知道波茨坦协定，他仍然感到了危险；由于不能追击敌人到奥尔莫乌兹，他便切望敌人来进攻他：他假装害怕的样子，后撤军队，筑起堡垒防守，并试探要与沙皇谈判。库图佐夫识破了这一计谋，但是多尔戈鲁基和沙皇身边的亲信都劝说亚历山大发动进攻。12月2日拂晓，集结在奥斯特里茨以西的戈尔德巴赫河西岸的法军透过晨雾看到奥俄联军正在前进，准备发起攻击。联军总数为八万七千人，用以对付七万三千名法军，但他们是沿着十六公里宽的战线铺开的，目的是要包抄法军的右翼，并切断其去维也纳的退路。联军按照他们的计划开始从中央阵地普拉岑高地下来，拉纳指挥的法军左翼，尤其是达武指挥的右翼，在敌人猛攻下岿然不动。处在中路的拿破仑突然下令，命苏尔特猛攻高地。法军把敌军切成了两段，迂回包抄了他们的左翼，打得敌军溃退。奥俄联军损失总数达二万六千人；法军损失八千至九千人。亚历山大感到很受屈辱和恼火，宣布他要回俄国，奥地利于12月6日签署了停战协定。

既然没有等到普鲁士下决心反法同盟即已瓦解，拿破仑就轻而易举地把奥地利孤立起来。从12月10日至12日，他加强了与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的联盟。7日，他接见了豪格维茨，对他很粗暴；14日，他再次召见普鲁士特使，告诉他奥国正在要求把汉诺威交给前托斯卡纳大公，并给他接受与法国结盟的最后一次机会。在这样的恐吓之下，豪格维茨屈服了，在12月15日签订了肖恩布鲁恩条约：普鲁士总算吞并了汉诺威，但却被迫割让了纳沙泰尔公国以及安斯巴赫侯国，第二天拿破仑就把后者赠给了巴伐利亚，以换取贝格公国。12月24日，弗兰茨撤了科本兹和克洛雷多的职务；

26日，他批准了普莱斯堡条约。奥地利让出了从坎波福米奥条约中得到的威尼斯的全部领土包括伊斯的利亚一部分和达尔马提亚，和它在南德意志的全部领地，以及提罗耳和福腊耳贝克；而获得了萨尔斯堡，这是托斯卡纳的费迪南用来换取巴伐利亚的维尔茨堡的。帝国骑士就这样落到了他们的敌人手里。升格为拥有主权的王国地位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还有巴登，解脱了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切封建附庸关系。这样一来，奥国完全被驱逐出意大利，并且，除了仍拥有皇帝虚名之外，它在德意志的全部领地也荡然无存。

三、大帝国

拿破仑于1806年1月26日返回巴黎之后首先在莫利昂辅助下整顿财政，莫利昂已取代巴尔贝-马尔布瓦任财政大臣。4月22日，拿破仑对法兰西银行及时采取措施，把它交给由皇帝任命的一名总裁管理，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莫利昂改革了会计制度，迫使税收专员签署为期四个月的期票，并且于7月14日建立了公款存付银行，以便调节货币流通；此后，税收专员们除非真的把税款存入该银行，否则他们所收税款就不能再得到利息。解决1805年财政危机则更为艰巨。1月27日，皇帝召见军需供应商，在这一次令人难忘的场面里，皇帝以处死相威胁，迫使他们把所有的资产交给莫利昂；由于贝尔蒂埃走露风声给乌弗拉尔，所以他能把一些资财隐藏起来。供应商的有价证券、信贷和仓库被清查结算，他们被迫继续其供粮业务，而只能得到应得粮款高达一千八百万法郎的半数。但是仍然还有欠款六千万法郎，这笔债要由西班牙来承担，尽管它只收入三千四百万法郎。查理四世被迫从拉布谢尔的霍普银行那里请求再借一笔贷款交付法国，并求得罗马教皇同意再征用一批教会财产。拉布谢尔自己不得不放弃了还没有获得汇票的一千万皮亚斯特。整个事情拖延了多年，最后，由于范勒尔贝格和乌弗拉尔不能偿付西班牙的债务而宣告破产；乌弗拉尔于1809年因债务问题而被捕入狱。但是这一恢复国家财政的巨大任务并没有妨碍皇帝从事内政改革：他还要筹备编纂多种法典，1806年决定创办帝国大学。

然而，所有这一切不过只是细枝末节，因为奥斯特里茨大捷激起了他的想象力的新飞跃。在南德意志，重大变化接踵而来。奥地利在德意志的领地被瓜分了：巴伐利亚国王得到了艾克施塔特主教邦、提罗耳和福腊耳贝克；符腾堡获得了乌尔姆和另外一些领土；巴登侯国割去了布赖斯高、奥尔特瑙和康斯坦次。从1805年11月起，符腾堡首先进攻帝国骑士的领地，德意志其他王侯也急于并吞骑士领地。既然他们享有充分的主权，这些王侯就竭力效仿拿破仑的治国手段，符腾堡国王终于摆脱了他的议会。但是拿破仑无意让德意志土崩瓦解。1806年1月，拿破仑建议成立一个新的邦联，以他为保护人。一部宪法将规定邦联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并由一个拥有必要权力的议会来实施。拿破仑已经迫使他的德意志盟国在各国内给予新并入的附庸以

特权地位——这是干涉它们内政的绝妙借口，他还强烈表示希望这些盟国采用《民法典》。这些新国王感到愤慨，因为他这样做是想破坏他们刚刚获得的主权。符腾堡的弗里德里希一世大叫道，“这是对对我的政治生命的一个致命打击”；巴伐利亚的大臣蒙特热拉只愿意缔结临时的联盟。这些国王既不敢同法国决裂，便都屈服了。1806年7月12日，十六位王侯宣布脱离神圣罗马帝国，他们组成了莱茵邦联，并答应给他们的保护人提供六万三千名士兵。

但是拿破仑也非有他们不可，因为普鲁士很不可靠。联合决议规定了宪法和成立议会，然而它们却被无限期地延搁起来，从未见天日。此外，王侯们因顺从拿破仑而获得新的领土作为补偿：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两个自由市划归巴伐利亚；法兰克福划给了达尔贝格。几个小邦的君主只是为了不致被吞并沦为“降格附庸”而依靠自己的亲缘关系加入了邦联，如雷严伯爵，他所以升格为侯爵是因为他是达尔贝格的侄子，在他的四千臣民中要提供二十九名士兵；还有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公主，她的丈夫是博阿尔内的朋友，她的儿子与缪拉的侄女结婚，后来成为罗马尼亚国王的祖先。其余没有参加邦联的所有较小的邦都被并入了较大的各邦，沦为附庸：诸如施瓦岑贝格、考尼茨、利内、图尔恩与塔克西斯等家族。也有升格的邦，如：巴登、贝格、黑森-达姆施塔特等公国升格为大公国；纳索成为公国；达尔贝格获得莱茵邦联大首领的头衔。

留下来的唯一问题是要消除神圣罗马帝国的残迹。至于奥国，它要抵抗是不可能的，因为拿破仑以俄国占领了科托尔港为托辞而把他的军队留驻在布劳瑙。帝国大军仍然驻扎在德意志各盟国，开销当然要各国支付，这虽然给拿破仑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来缓和法国的财政状况，但却招致了各盟国对法国的不满。蒙特热拉夫人在写给塔列朗的信中说：“我喜欢法国人，因为他们赶走了我们的敌人，恢复了我们的正统君王，但是我憎恶那些象吸血鬼一样地榨取我穷困可怜的祖国的人。”民族意识开始在德意志蔓延开来；巴伐利亚书商帕尔姆开始到处贩卖反法小册子，拿破仑枪毙了他。1806年8月1日，帝国议会宣布自行解散。弗兰茨二世根据通知的要求，于8月6日放弃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样，由巴塞尔和约肇端的这出悲剧便结束了它的最后一幕。

与处理德意志问题相比较，使荷兰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不过是一场儿戏。2月6日，塔列朗通知席梅尔佩宁克必须使荷兰适应新的形势，3月14日，拿破仑向海军上将弗尔许尔表明了他的意图：他的弟弟路易将任荷兰国王，否则他就要吞并这个国家。执行议会召集了特别会议，进行了“伟大的工作”，并于5月3日俯首听命她接受了拿破仑的主张，唯有席梅尔佩宁克拒绝屈服。在一项条约中保证了王国的完整，并与法国分立；路易于1806年6月5日即位为荷兰国王。

在意大利，威尼西亚被并入意大利王国；马萨和卡腊腊给了埃利兹；瓜

斯塔拉授予了波利娜，而她随后又把此地卖给了意大利王国。最大的变化是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室的垮台，1805年12月27日，拿破仑在一项有名的敕令中宣布“那不勒斯王朝已不复君临”。马塞纳轻而易举地执行了这一宣判；俄军撤离那不勒斯退守科学岛；英国人满足于继续占领西西里岛，他们利用该岛进行军事演习；波旁王族流亡到巴勒莫。加埃塔一直抵抗到6月18日。在卡拉布里亚，成群的暴动者立即纷纷揭竿而起。然而拿破仑直到7月份还认为，一切都已解决，3月30日，他将那不勒斯的王位交给了他的哥哥约瑟夫。然而，那不勒斯却在酝酿着象后来西班牙战争那样一场游击战。玛丽亚-卡罗莉娜没有放下武器。她只率领六千人，但煽起了武装暴乱。暴乱的骨干分子无所不包，从贵族罗地奥直到拦路强盗佩扎（别称弗拉·迪亚沃洛），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领导过1799年的叛乱。很多教士援助了他们。卡拉布里亚居民缺乏民族意识，对波旁王朝的命运几乎是漠不关心的，但是法国的占领使他们的负担过于沉重，并且解除他们的武装更使他们愤怒；因为，居民从事抢劫习以为常，这是由于该地经济状况、走私以及强大的“黑手党”酿成的。牧民和农民认为资产阶级和贵族是最拥护法国人和新思想的人，所以他们把王后的呼吁视为允许抢劫上层阶级财产并普遍地抢劫各城市的表示。

英国人不赞成这一煽动民众暴动的呼吁，他们认为暴动的军事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他们在夺取了卡普里岛和蓬扎群岛之后决定冒险登陆，这样做就促成了这场暴动。7月1日，一支五千二百人的英军在斯图尔特爵士率领下于圣欧菲米亚湾登陆。他们于7月4日在迈达遇上雷尼埃将军统帅的六千多法军，雷尼埃毫无准备，命令士兵手持白刃冲锋。英军步兵岿然不动，等到他们逼近，英军以排炮射击击溃了他们。这是威灵顿后来在塔拉韦腊战役到滑铁卢战役使用的杰出战术的第一个范例，不幸的是拿破仑完全没有重视这种战术。法国这次大败变成了普遍暴动的信号，暴动充满骇人听闻的恐怖景象。马塞纳和雷尼埃用残酷无情的屠杀一步步地重新征服了卡拉布里亚。劳里阿城夷为平地，弗拉·迪亚沃洛被处绞刑，监狱和囚船充塞犯人。尽管如此，暴动的影响仍很大：它使法国人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英军得以占领勒佐直到1808年，四万法军被牵制得寸步难行。

与此同时，拿破仑占领了里窝那，使英国人不能利用这个港口，他并且把一个西班牙师调驻伊特鲁利亚。这时在意大利仅有的独立国就是罗马教皇国。

早在加冕礼以前很久，庇护七世就一直担心法国在意大利的进展。他被迫同意于1802年9月并入法国的皮埃蒙特实施教务专约，随后他又不得不同意大利共和国签署另一教务专约。然而后一条约还能使教皇差堪告慰：它承认天主教为国教，优待教士，对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按教会成规解决。但是1804年1月，梅尔齐补充了一项法令，它宣布原有法律凡教务专约没有明文禁止的，仍然维持有效。庇护七世抗议把这些新的组织条例强加于人；皇帝

只做了含糊其词的答复。然而，1805年5月26日卡普拉拉在米兰为拿破仑兼领意大利国王加冕之后才一个月，拿破仑就发布了两道敕令，事先未经罗马教廷同意而擅自改组宗教生活。他确实增加了僧侣的收入，但同时却减少了教区的数目，取缔一些隐修院，并且限制了僧侣的数目。更有甚者是他于1806年1月1日把《民法典》推行到意大利王国。除了伊特鲁利亚王国新君主忠于罗马教会之外，在意大利各地——卢卡、巴马、皮亚琴察和那不勒斯——教会都成为众矢之的。庇护七世曾以为法国出售教会财产等世俗化措施是较小祸害而加以容忍，但看到把《民法典》推行于意大利势必也把世俗化推行到意大利，他就感到忧心忡忡，因为他把意大利视为自己的禁苑，至少从宗教意义上说是如此。

德意志的情况给教皇带来的忧虑也不少。1803年“帝国大法”的后果变得日益严重，因为各邦君正在使教会产业世俗化，并且未和罗马教廷商量便控制管理起教士来。恺撒——教皇主义——甚至也在巴伐利亚赢得胜利。既然各邦君此时已统治信仰不同宗教的居民，他们便抛弃了“民随君教”的原则，并且公然宣告容忍政策，因而就朝着国家世俗化的方向大步前进。起初罗马教廷想与维也纳谈判缔结一项德意志教务专约，但是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除非法国施加压力，没有办法迫使德意志各邦君接受这一专约。特别是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创立大帝国既是企图称霸世界的象征，恐怕迟早有一天会向圣门神职挑战，因此，大帝国的创建使庇护七世迟迟不愿默认拿破仑为天主教世界的世俗元首。

然而尽管有着这些灾难折磨，教会还是从拿破仑的保护下获得了巨大利益，如若教皇不同时也是一位世俗君主的话，庇护七世决不愿与皇帝决裂。但教皇确是这样的人，所以拿破仑不会允许教皇损害他的统治。教皇宣称要守中立，但没有用，因为中立并不包括反法同盟的成员国那不勒斯王国在内。当英军和俄军于1805年在那不勒斯登陆时，他们是可以从那里侵入意大利王国的；庇护七世无力阻止他们假道，这样的事件正是他的亲信左右所欢迎的事件。

因此，法军占领了安科纳，继之又占领了契维塔韦基亚。庇护七世提出了抗议，拿破仑于1806年2月13日的答复是：要庇护七世加入自己的“体系”、驱逐英国人并禁止英国人进入其领土。当罗马教皇拒绝时，皇帝召回了法国驻罗马大使费什。孔萨尔维的政策破产了，于是他便提出辞职。这是最后的决裂，此后拿破仑再也不给庇护七世写信。

四月间马尔蒙进入达尔马提亚，丹多洛被指派为那里的“行政长官”。然而一支俄军从科孚岛出发，与奥国串通夺取了科托尔港口，在腊古扎，法国的莫利托尔将军遭到了门的内哥罗人的攻击。拿破仑利用这一时机迫使维也纳答应给他假道奥属伊斯的利亚的权利。就这样，他一登上奥斯曼帝国的门坎，便立即想要插手其内部事务，1806年这一年标志着他的东方野心的复活。在艾奥尼纳，普克维尔已经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事；雷因哈尔被派往

摩尔达维亚；达维德负有使命到波斯尼亚的帕夏那里去，帕夏正陷于与塞尔维亚人的冲突之中。奥斯特里茨大捷加强了法国对土耳其苏丹的影响，他终于承认了法国皇帝，并派遣了驻法大使；作为回报，拿破仑派塞巴斯蒂亚尼往君士坦丁堡，他是8月9日到达的。与此同时，土耳其与受英国支持的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但马尔蒙的第二军团事实上仍然是象驻扎在意大利的军队那样被牵制在达尔马提亚。

1805年的战争异乎寻常地扩展了拿破仑经略的范围，以至使得法兰西帝国变成只不过是“大帝国”的核心，而“大帝国”本身便开始由一些法律文件组织起来。皇帝把他新创建的各国视为“联合的国家或真正的法兰西帝国”。虽然他任意引据许多历史先例，但他所采用的组织却是独具匠心的。最高一层是些国王和王侯，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是世袭的，拥有主权的，如约瑟夫、路易、缪拉，缪拉是3月15日被封为贝格大公的。其次是附庸的王侯，他们也拥有主权、甚至也是世袭的，不过他们的领地只限于在“采邑”之内，每当所有权改变时，这些领地就要另行赐封，象这样的情况有：皮昂比诺的埃利兹、成为纳沙泰尔亲王的贝尔蒂埃。在他们之下是既不拥有军队又无钱财的王侯：本尼凡托亲王塔列朗、蓬特-科沃（这两块领地一直是罗马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争夺的对象）亲王贝尔纳多特。再低一层是单纯的采邑，这些采邑只有实利没有主权：拿破仑在那不勒斯王国保留有六个公国，在威尼西亚创立十二个公国，以分封给一些功勋卓著的法国人。

这还不是全部。这些王侯和国王从理论上讲是独立的，但象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个人都是拿破仑的附庸，虽然他们的国家并非采邑。实际上，他们是法国皇族的一部分，共和十二年宪法规定，皇族要受1806年3月31日颁布的特别法规的约束。这项法规为皇族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法律身份；它授权帝国元首监护未成年者和对成年者实行家长的权力，包括批准他们结婚以及监禁他们的权力。此外，各亲王，甚至是享有主权的亲王，仍然是帝国的大勋爵。这样，庞杂的组织结构很大部分是按照家族公约的概念建立起来的，它既令人回忆起波旁王室的姻亲组织网，又反映出拿破仑对其氏族的眷恋。在他看来，家族关系是最为牢固有力的关系。因此他也把这种政策扩展到各盟国。1月15日，欧仁·德·博阿尔内终于与巴伐利亚公主奥古斯塔结了婚，同时皇帝认领了他，虽然他并不因此享有法兰西皇位的继承权。约瑟芬的侄女斯特凡妮·德·博阿尔内也被认领了，并让她嫁给了巴登大公的继承人。贝尔蒂埃不得不抛弃维斯孔蒂夫人而娶了巴伐利亚的一位公主。第二年热罗姆跟符腾堡王室攀了亲。出于同样的动机，现在再加上切望得到一位直系继承人，这就预示了皇帝势必将离婚再娶。

应时而生的大帝国仍然是罗马帝国概念的首次体现，这种概念已暗含于拿破仑在1804年所采用的皇帝称号之中。他现在毫不犹豫地公然以西罗马帝国的复兴者自居，并且要求拥有他的“杰出的先人”查理大帝所拥有的种种特权。这些历史权利的要求特别有损于教皇国的地位，这是理所当然的。

拿破仑 1806 年 2 月 13 日的信提醒庇护，虽然查理大帝曾是由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他仍然视教皇为受他庇护的人；他把授予罗马教会的世俗领地只是作为他自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拿破仑也是这样。他对庇护七世写道“陛下是罗马的教皇，而我是罗马的皇帝，”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充分体现皇帝威严的简洁公式已经表明，大帝国甚至是在它建成之前，已显出它只不过是一统天下的开始。

四、与普鲁士决裂（1806 年）

这样一种政策本不能指望带来全面的和平。可是客观形势却使这两个仍然干戈相见的强国有和谈余地。在英国，皮特在他的政策又遭到灾难性的失败和反对党猛烈的攻击之后，于 1806 年 1 月 23 日忧愤而死。辉格党再一次要求让欧洲大陆听天由命，他们认为和平是中止法国入侵的唯一手段。福克斯说，“如果我们不能削弱法国的庞大力量，那末，制止它的发展对我们终归有点好处。”换言之，他建议再次实行阿丁顿的试验，尽管当时并没有出现 1801 年危机的征兆。虽然他的朋友们未必都同意他的想法，但是他们都愿意谈判，只要能使他们掌权就行。国王召见了格伦维尔，后者坚持要福克斯入阁：这一次他成功地把福克斯拉入内阁，让他负责外交部。辉格党的领导人——格伦维尔、谢尔本的儿子佩蒂勋爵、格雷勋爵的儿子霍威克勋爵和厄斯金，再加上现在成为西德默斯勋爵的阿丁顿，组成了“人才内阁”。

激怒了英国公众的是辉格党的国内政策：他们停止施行爱尔兰的戒严令，并且正再次考虑解放天主教徒问题。然而没有人反对试探和平。主战派由于普鲁士的态度而遭受挫折，因为普鲁士为了获得汉诺威而甘愿同法国结盟。当英国于 5 月 11 日对普宣战、并封锁德意志北海沿岸时，普鲁士关闭了它的波罗的海各港口，禁止对英贸易，从而引起了商业利益集团的恐慌。早在 2 月底，福克斯因为通知法国一项谋害皇帝性命的阴谋而重新打开了通向巴黎的渠道；塔列朗报以和谈的建议。亚尔默斯勋爵——他一直被拘留在法国，是一些上层人物的密友，——作为居间调停者出发到伦敦，并于 6 月 17 日作为具有全权的中间人返回法国。福克斯拒绝谈判任何协议，除非俄国也参加谈判，他也拒绝以亚眠和约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他坚持以“实际占有”作为谈判基础，但把汉诺威归还英国作为例外。拿破仑原则上并不反对，因为他考虑到可以给普鲁士找到某种补偿；然而他却不让普鲁士知道事态的发展，因为他知道普鲁士一定会反对的。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也决定参加谈判。普鲁士的背叛使得哈尔托雷斯基的影响增加了。他于 1 月间劝告沙皇放弃为欧洲仲裁的宏伟计划，而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俄国的利益上，即集中于东方。他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形势对俄国是大有可为的。1805 年 3 月，塞利姆三世正式建立起他的新的常备军，土耳其近卫军步兵从此感到不安稳。同时，鲁梅利亚的各帕夏由于担心自己的

权位难保，便勾结多瑙河两公国的小邦君拿起了武器，这些小邦君，尤其是伊普西兰蒂，都是被俄国利用的。塞尔维亚人公开造反了。1804年3月，一直与奥国谈判的奈纳多维奇被杀死了，他的同胞在卡拉-格奥尔吉领导下举行起义，在沙皇的支持下，他们要求自治。1805年夏季，他们选出了民众议会，议会创设了元老院，并向土耳其苏丹请愿。土耳其人无力征服他们。恰尔托雷斯基意识到，胜利的拿破仑必将阻挠俄国对外扩张的政策，这一看法不久便得到证实。塞利姆拒绝续订他与俄国在1798年签订的条约，他也拒绝缔结一项贸易协定。6月间，他撤销了“特准令状”，根据这项令状，曾准许列强把归化证书授予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从1806年5月以来，一支俄军在向德涅斯特河集结，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阿巴思诺特催促英政府派遣一支舰队。恰尔托雷斯基建议在西方采取守势，并且与拿破仑进行谈判：如果后者不干涉俄国在东方的行动，便可达成一项交易，而着手瓜分土耳其。他同法国领事莱塞普斯举行会谈，并于5月12日通知他，俄国大使奥布利尔已启程经维也纳赴巴黎。此外，拿破仑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政策预示着对奥国要发动一场新战争，这一场战争可能会使奥国完全覆灭；奥布利尔后来一直坚持说，他曾接到训令，为了拯救奥国要不惜任何代价缔结和约。

当拿破仑获悉这一使命之后，他改变了态度。他一直在与福克斯谈判，以期孤立俄国；但是换另一种政策引起了更大的兴趣，因为最难击败的对手是英国。他立刻要求英国把西西里交给约瑟夫，并且补充说，费迪南四世可在其它地方取得补偿。亚尔默斯提出抗议，结果谈判中断了。当奥布利尔于7月6日到达时，他立刻受到诱骗和恫吓，并对他不断施加压力：他被告知，俄国可以保留爱奥尼亚群岛并且享有两海峡的自由通航权；甚至可能把阿尔巴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交给费迪南，以便在法、土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对俄国友好的缓冲国。亚尔默斯得知这一建议后并没有反对，虽然他到此时为止仍然拒绝讨论西西里问题。来因邦联的创建终于使奥布利尔做出决断；他确信，如果他不让步，奥国就要完蛋，所以他于7月20日签订了和约。拿破仑在最后一刻以巴利阿里群岛替换了准备给费迪南的巴尔干一些地区。俄国至少是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虽然失去了科托尔，但仍然保住了爱奥尼亚群岛，使法国放弃了腊古扎，并把土耳其置于俄、法的共同保证之下；此外，拿破仑答应从德意志撤军。亚历山大在提尔西特和约中也不会得到如此巨大的收获！英国人当时大为震惊。福克斯承认那是“一个使人感到屈辱的协定”，他发现英国再次被抛弃了。亚尔默斯步奥布利尔的后尘提出了一项和约草案，拿破仑于8月6日没有做任何根本变动就答复了他：英国将占有马耳他和好望角，重获汉诺威，同意把巴利阿里群岛交给费迪南，并承认约瑟夫，因而就默认把西西里给约瑟夫。看来拿破仑分别谈判的两面手法似乎即将获得成功了。他在给约瑟夫的信中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地中海的主人，“这是我的政策的主要的和不变的目标”——至少暂时是这样，因为他心目中还有许多其它计划。

突然间，风向变了。有很多理由使人产生怀疑，亚历山大是否会批准这一和约，因为他刚刚解除了恰尔托雷斯基的职务，此人的政策触怒了强烈仇视拿破仑的亲英派的俄国贵族。7月9日，沙皇任命布德贝格男爵为新外交大臣，他是一个出生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他只关心欧洲大陆事务，并颇为同情普鲁士。英国是可以期待从这一任命中获得好处的。此外，福克斯已经改变了态度，他的同僚比他更为严厉地谴责亚尔默斯的草案。一个新的但却仍与法国十分友好的全权代表洛德代尔被派往巴黎，再次要求以“实际占有”为谈判的基础，然而却可以答应交出西西里，其条件是要能为费迪南找到一个稍为象样的补偿。拿破仑拒绝重开谈判，他指望俄国批准条约，以迫使英国退让。但是现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态度使沙皇拒绝了批准这一条约，也许他与法国谈判不过是为了诱骗普鲁士。

毫无疑问，皇帝绝不希望与普鲁士决裂；当决裂时，他深感失望和烦恼。历届革命政府和皇帝本人长期寻求与普鲁士联盟，以便使奥国和俄国变得软弱无力，并将英国人拒于德意志以外。因此，拿破仑对普鲁士的态度完全是仁慈的，如果普鲁士肯象西班牙一样纳入他的“体系”，也就是变成一个附庸国的话，拿破仑把这一点对普鲁士讲得清清楚楚。国王不顾豪格维茨多次警告，固执地坚持一种不幸的想法，拒不接受肖恩布鲁恩条约的原来条款，只肯接受经他修订的条款；在未缔结全面的和约之前他不想吞并汉诺威，而只是占领它，以免与英国的关系破裂。他的胃口也增大，他声称有权保有安斯巴赫、并获得汉撒各城市。当拿破仑于1806年2月1日收到这些可观的建议时，他刚刚得知皮特之死。他宣称，普鲁士的反建议废除了肖恩布鲁恩条约，2月15日，他迫使豪格维茨签署了另一个条约，这一条约强迫普鲁士立即吞并汉诺威，并对英国人封闭它的一些港口，不仅要交出安斯巴赫和纳沙泰尔，还要交出普鲁士还保有的克累弗公国在来因河以东的那一部分，拿破仑把这一部分并入贝格公国，并迫使普鲁士同意法国在威塞尔驻军。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投降了；这是一个他永远不能原谅的可怕的惩罚，而普鲁士的主战派则更加不肯原谅。

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暂时心灰意懒的主战派很快又增长了力量。然而一直到最后，在普鲁士仍有一些拿破仑的崇拜者：比洛，未来的独立战争中的英雄的兄弟，他写了一本关于1805年战役的书，他在书中对待普鲁士颇为严厉；布赫霍尔茨，他在自己的《新利维坦》一书中用霍布斯^[1]的哲学来赞颂拿破仑帝国的专制主义；在军队里有马森巴赫，他原籍是符腾堡。另一方面，宫廷是拥护战争的。路易莎王后把拿破仑拿来同温文尔雅的亚历山大作对比，到处散布反对“魔鬼”和“地狱的渣滓”言论。这些情绪赢得了国王的堂兄路易-费迪南、他的妹妹（她嫁给了拉齐维尔亲王）、福斯伯爵夫人以及她的妹妹贝格夫人的共鸣。施莱尔马歇、亚历山大·冯·洪堡、约翰·米勒和默克尔都转变为敌视法国。很多军人，如法尔、沙恩霍斯特和布吕歇尔则急于采取行动。哈登堡支持他们，4月，施泰因要求国王解除他所

宠爱的顾问洛巴德和拜姆的职务；在战争前夕王室的亲王们再次提出这一要求。弗里德里希-威廉生气了；可是他也感到焦虑不安，所以就暗中力图重新赢得沙皇的友谊。他派遣不伦瑞克公爵去向亚历山大保证，尽管普鲁士与拿破仑结盟，它永远不会对俄国作战；6月23日，当他得知奥布利尔所负的使命时，又用书面重申了这些保证。至于哈登堡，他与俄国大使阿洛佩尤斯进行了秘密谈判，按照上述方针缔结了一项协定，7月24日，沙皇签署了这项协定。

来因邦联的创建更加深了普鲁士的不满情绪。的确，皇帝认为绝不反对普鲁士组成北德邦联，普鲁士在1795至1801年间一直抱有这一伟大梦想。但是他不准汉撒各城市成为其成员，并且告诉萨克森，它完全有拒绝参加北德邦联的自由。黑森选侯也不敢加入。更糟的是，8月初亚尔默思在巴黎就向普鲁士大使卢凯西尼泄露了将要从普鲁士手中夺走汉诺威的消息。布吕歇尔报告说，法军正在来因河一带集结，从弗兰科尼亚也传来类似的警报。这种谣言最后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下了决心。他确信汉诺威处于危险之中，在没有澄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就通知了沙皇，并于8月9日进行了动员。整个8月他都很苦恼，不知道奥布利尔签订的条约结果将会如何。实际上弗里德里希-威廉自己的决定已经使得奥布利尔条约失去了作用，而且沙皇也拒绝批准这一条约。得知这种情况后，国王于9月6日写信给亚历山大，表示“我除了战争外别无出路”。

正象1805年那样，拿破仑直到最后一刻还不肯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8月17日，他甚至下令准备把帝国大军撤回法国，因为德意志问题随着弗兰茨的退位已经解决了。直到8月26日他还称普鲁士动员的消息是“可笑的”，但是到9月3日，当亚历山大拒绝批准奥布利尔条约时，他才明白了。他从中看出，一个新的反法同盟正在形成。9月5日，他发布了第一批命令；全面的训令直到19日才发出。9月13日福克斯死后，他的同僚确信俄国和普鲁士是可靠的，并由于攻陷布宜诺斯艾利斯而受到极大鼓舞；他们又增加了要求。9月26日，他们坚持要求把达尔马提亚给费迪南四世；10月5日，由于拿破仑的拒绝使谈判停下来。他那时已在班贝克，正在去击溃普鲁士的途中。他象上次战役一样临时仓促草率地准备了这次战役。当他到达弗兰科尼亚时，他的命令甚至还没有执行，他解除了维尔曼齐将军的兵站总监职务，而派达律继任。士兵们在没有大衣的情况下就出发了，其中大部分都没有替换的鞋，只带了几天的面包和饼干。然而这次战役象风卷残云一般，所以他们遭受的痛苦较少。10月1日普鲁士已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军撤到来因河西岸；拿破仑于7日在班贝克收到了这份最后通牒；到14日，普军已全部覆灭。

五、耶拿战役与奥尔施泰特战役。冬季战役 (1806—1807年)

普鲁士却对自己的军队充满信心，而全欧洲也这样相信它。甚至在法国也有不少人认为，只有在摧毁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军队之后，拿破仑的声誉才真正确立起来。自从普鲁士军队赢得荣誉时起，它似乎毫无变化。虽然自从尼德兰和德意志不再能提供兵员以来，征募外籍兵已变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普军里至少仍然有八万名外籍士兵。军队的其余部分是由从农民中征召来的“区乡兵员”组成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免服兵役，而大部分军官则由容克地主充任。这支全然没有民族特征的军队，在旷野进行线形队列的战斗训练，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此时普军是由若干营步兵组成，但是他们没有作为散兵进行战斗的训练。骑兵仍然是很好的，但是炮兵的装备很差，工兵和医务几乎都不存在。指挥战争的理论几乎也不再有任何进展。团以下没有再划分较小的单位。行军依据军事仓库的所在地而定行程，部队经常为庞大的行李辎重队所拖累。谁也没有看出来，这支军队在与法国革命的战士相遇时，就显示出它是一支非常落后的军队，也没有人看出，这支军队的最大缺陷是它已不惯于作战。连长在本连队为所欲为，由于和平时期请长假的人多，吃空额捞了金钱，他们把一场战役视为一场灾难。指挥官年已衰老，缺乏果断；所以这些部队虽然既勇敢又训练有素，但由于缺乏得力的领导而失败了。

如果普军不是过于自负，越过易北河、而是留在易北河东岸等待俄军的话，他们是能够避免一场灾难的。就亚历山大来说，他比 1805 年更加行动迟缓，因为他还注视着土耳其。8 月 24 日，塞利姆单方面地免除了多瑙河各公国小邦君的职务；但是由于俄国最后通牒的威胁，他又于 10 月 15 日让他们官复原职。与此同时，米切尔森的军队受命去占领各公国。结果，不仅拖延了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准备工作，而且还使俄军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普军以三路主力大军向图林根集中。这三路主力大军是：不伦瑞克公爵和国王率领的六万人；霍恩洛厄率领一支五万人的部队穿过了德累斯顿以便带动萨克森人；吕歇尔带领的三万汉诺威人取道黑森。瓦尔米的败将不伦瑞克在他的部属中几乎没有什么威望，他既不善于集结部队，也不会掩蔽部队，甚至也不能贯彻作战计划。他打算向美因河进军，以便威胁法军的作战通信线路，而霍恩洛厄则打算穿过弗兰科尼亚森林正面迎击法军。最后，霍恩洛厄向耶拿移动去靠拢不伦瑞克的部队，但他没有能与不伦瑞克会师，而留下了两个军在萨勒河。普军还没有来得及集结他们的部队就遭到了袭击。

拿破仑留下路易和莫蒂埃保卫来因河；他的德意志盟国固守后方。9 月 25 日前后，他的主力部队集结在纽伦堡附近，以美因河和弗兰科尼亚森林为掩护。总共六个兵团，再加上骑兵后备队和近卫军共约十三万人。对于拿破仑来说，必须在俄军到达之前击败普军，他担心他们正固守在易北河东岸。当他听说他们正在行军途中时，他推断，他们不是朝着美因兹就是朝着维尔茨堡进发；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与他们在美因河一带交战，迂回包抄他们

的左翼将会使他们朝着来因河方向撤退。当看到他们仍按兵不动时，他就于10月7日至9日兵分三路纵队穿过弗兰科尼亚森林，以便切断他们向易北河的退路。内伊和苏尔特未经战斗就进入霍夫村；缪拉、贝尔纳多特，达武和近卫军把陶恩齐恩的一师人赶出了施莱茨；左边的拉纳和奥热罗袭击了萨尔费尔德，在这里费迪南亲王被击败身亡。接着，部队向北进发，然后转头向西挺进；与此同时，缪拉扑向来比锡，他获悉这里的普军正在退却。萨勒河有两个可以涉水渡河的地点：克森和卡赫拉。达武占领了前者；拉纳和奥热罗夺取了后者，然后沿左岸前进，到达了耶拿，并占领了兰德格拉芬山——一个能控制霍恩洛厄扎营处的高地。拿破仑以为普军的主力驻扎在这个平原上，便命令内伊、苏尔特、近卫军以及部分骑兵在兰德格拉芬山集结；其余部队由贝尔纳多特率领从瑙姆堡被调回到德恩堡，受命在必要时向炮声轰鸣的方向进军。

事实上，不伦瑞克和国王率领着七万人正在向克森渡口进军，霍恩洛厄只不过有五万人，而且这五万人甚至还未集结起来。拿破仑于10月14日投入了五万六千兵力去对付霍恩洛厄。拉纳和苏尔特从兰德格拉芬山长驱直下，击溃了敌人的第一道战线，继而进攻第二道战线，并且迂回包抄了敌人的左翼，而奥热罗因道路崎岖，进击稍慢，最终还是威胁了普军右翼。经过一番激烈抵抗之后，普军大败，溃不成军。率领部队赶来增援的吕歇尔，赶到战场后也只落得同样的下场。在这段时间内，达武带领的二万六千人却担负着迎击在奥尔施泰特附近的普军主力部队的重担；不伦瑞克受了致命伤，他的部队惊慌逃奔，撞上了从耶拿败退下来的逃兵，这些逃兵和不伦瑞克的败军混在一起，更是溃不成军。至于贝尔纳多特，虽然他确实在德恩堡渡过了萨勒河，但是他一向心怀不轨，便与两个战场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普军死伤二万七千人，被俘一万八千人，几乎丢掉了他们全部野战炮。

缪拉、内伊和苏尔特穿过哈次山区追赶敌人残部，俘获二万人，可是却让几个军团逃掉了。法军主力经来比锡直下柏林，达武于27日首先进入柏林；他与奥热罗从柏林渡过奥得河，迫使库斯特林要塞投降。对敌人的追击现在变得更加有条不紊了，霍恩洛厄被截断通往什切青的路，于28日在普伦茨劳缴了械。布吕歇尔设法到达了卢卑克，但却于11月6日在那里被俘。当时残留下的普军只有在东普鲁士的莱斯托克的一个分队。远至维斯杜拉河的所有要塞都开门投降，只有西里西亚各城镇和由格奈森诺防卫的科尔贝格除外。民众毫无反抗，文职官员宣誓效忠拿破仑。被征服的地区迅速地被组织起来，并且要交纳一亿六千万法郎的军税（这还没有把强行征用的计算在内），以便获得法国军队完全缺乏的各种军需物资。

拿破仑马上就开始采摘自己的胜利果实了。早在9月27日，维尔茨堡大公就加入了来因邦联；12月11日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希也加入了邦联，并接受了国王的头衔；萨克森的公爵们于15日加入了邦联，中德意志的其它王侯最后也都随着加入了。黑森-卡塞尔和不伦瑞克公国，以及富耳达一

起被并掉了，富耳达的邦君奥伦治公爵曾站在普鲁士一边参战，因此被剥夺。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本人似乎是甘愿附庸称臣，以便保住自己的王位。卢凯西尼与察斯特罗同迪罗克谈判一项和约，和约规定割让整个易北河以西的普鲁士领土，阿尔特马克除外，并对英国人封闭波罗的海各港口。10月30日签署的这一和约于11月6日由国王批准了。

可是，局势已经发生变化。当拿破仑于10月27日进入柏林时，他在档案中发现了普俄之间的一项协定的证据，于是他开始散播关于普鲁士王后同沙皇亚历山大之间关系的流言蜚语。他很快就明白，俄国将会前来帮助普鲁士，彼得堡的贵族中间爆发了好战的愤怒情绪，东正教将拿破仑逐出教会。11月9日，皇帝决定延缓签署和约，而代之以一项要求以维斯杜拉河与布格河为界的停战协定；国王的军队要驻扎在东普鲁士，在必要时，他们将从那里赶走俄国人。此外，他还宣称，在未能签订一项包括归还法国殖民地以及保证土耳其领土完整的全面和约之前，他将不从普鲁士王国撤兵。11月21日，他的这些意图在提交给元老院的一篇咨文中公开发表了。实际上，普鲁士已被作为抵押品；看来，它所处的被囚禁地位很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随着军队的前进，它有计划地没收了英国货；随着汉撒各城市被占领，德意志现在停止了对英国的贸易。拿破仑在11月21日著名的柏林敕令中宣称，不列颠诸岛“处于封锁状态”，那就是说，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进行虚拟封锁。结果，无论是直接来自英国的船，还是来自它的殖民地的船，都不得驶入帝国的港口。

有人认为“大陆封锁”是“大帝国存在的理由”，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封锁的扩展是帝国对外征服的自然结果。由于拿破仑没有控制海洋，因而著名的柏林敕令本身对业已存在的对英国货物的禁令并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富有意义的新情况是，由于中立国无形中受到打击，封锁就会失去自拿破仑执政以来就给予它的那种保护主义的根本特点，从此以后，它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武器。胜利又使拿破仑完全转回到1798年督政府采用的政策上去。联合欧洲大陆反对英国的意志已经形成了，因此就使“帝国的”和罗马的观念在当代政治中具有了现实意义。“我要用陆地的力量征服海洋，”拿破仑这样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柏林敕令标志着一个转折点。

普鲁士的谈判全权代表由于眼光短浅而于11月16日接受了停战协定，但是国王却拒绝了这一协定，同时他身不由己地和反法同盟连结在一起。拿破仑不等国王作出决定就一直进军到维斯杜拉河。11月27日，部队到达华沙。可是皇帝不得不在柏林停留一个月以便调集援军和充实士兵装备。莫蒂埃被派遣去占领瑞典的波美拉尼亚，并封锁斯特拉尔松。已表示悔改之意并答应取消与美国人联姻的热罗姆率领德意志各邦部队去包围西里西亚各要塞。1806年度征募的新兵已启程开赴前线。与此同时，向维斯杜拉河的进军已经把波兰问题公开提出来。波兰人在法军进军中就举行了起义，并驱逐了普鲁士的行政官员。参加起义的主要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但他们的看法不一

致：有一个由拉齐维尔公爵领导的亲普鲁士派，其中不止一个贵族从那仿照普鲁士的先例建立的抵押银行中得利；尤其是还存在一个亲俄派。恰尔托雷斯基再次劝说亚历山大抢在拿破仑之前宣布自己为波兰国王，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涅姆策维奇和大主教谢斯琴策维奇的支持，后者痛骂了“波拿巴的虚伪良心”。波尼亚托夫斯基本人直到 12 月末还在犹豫不决。波兰的大贵族担心万一失败会遭到报复；他们也同样惧怕法国获胜，因为法国的胜利将会解放他们的农奴。

无论如何，不得不与俄军作战的拿破仑不能拒绝别人给予的援助。早在 9 月 20 日，他就授权札荣切克将军成立一个由普鲁士军队中逃出的波兰人组成的军团。耶拿战役之后，顿布罗夫斯基将军和韦比茨基将军就受命在起义地区组织三个军团。同样被召去的科斯丘什科则要求给以保证条件。拿破仑无意答应重建波兰国家，因为这将触怒沙皇并会引起奥国干涉。科斯丘什科谴责拿破仑对重建波兰保持缄默是出于自私：“他只想到他自己。他憎恶所有的伟大民族性，更加憎恶独立精神。他是一个暴君。”这是一个透彻的论断，但却也是对这位皇帝的保留态度的一种误解：如果条件可能的话，他并不反对恢复波兰人的国家，以便使波兰成为帝国的一个附庸国。但波兰人能否自治呢？他对此表示怀疑，他的某些元帅也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何况此时去做也未免言之过早。因此他没有做出任何许诺，尽管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她与拿破仑一起渡过了整个冬天，而且他也在热烈地爱恋着她——一再恳求他。他只在波森为顿布罗夫斯基设立了一个临时行政机构。后来于 1807 年 1 月 14 日在华沙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推选马拉霍夫斯基为主席。在塔列朗和马雷的监督下，委员会把行政权委任给五名督政官，它着手组织波兰民族的军队，并为拿破仑的军队供应军需品，还开始效仿法国改革司法制度。

面临帝国大军，本尼格森和他的三万五千名士兵已经退却到那累夫河与弗克腊河之间的一个阵地，以等待布克斯赫弗登的四万名增援部队的到来。12 月底，拿破仑开始进攻本尼格森。23 日，他和达武在恰尔诺沃强渡弗克腊河，并命令拉纳向普乌土斯克进军。其余来自托伦和普洛次克的部队计划迂回攻击敌人的中部及右翼，并包围他们。但当时的天气恶劣，那些坎坷不平的道路影响了行军的速度。贝尔纳多特留在后面，内伊因为追击普军而迷了路。拿破仑力图重整部队秩序，但也无济于事。12 月 26 日，法军在拿破仑不在场的情况下，对普乌土斯克和戈莱明发动了一场秩序紊乱的进攻；俄军坚守阵地后又能够撤离。皇帝认为自己那些缺乏大衣、鞋子和食物的士兵是不可能在森林和沼泽地里去追击俄军的。因此他就在帕萨尔格河到华沙之间安置了冬营。

延伸如此之远的战线是令人惊讶的。位于森林背后的本尼格森现在向北移动了。1 月末，他渡过了帕萨尔格河，企图进攻贝尔纳多特，后者在向托伦撤退。与此同时，莱斯托克进军远至格鲁琼次。可是拿破仑已经集结他的

其它的部队，并且向北进发以切断敌人的退路。本尼格森由于捕获一名信使而得悉拿破仑的计划，因此他能够在帕萨尔格河一带坚持相当长的时间，以便逃跑。在穷追之下，为了保住科尼希斯贝克，他于艾劳应战。虽然拿破仑只有六万人，而敌人有八万人，他还是于 1807 年 2 月 8 日对本尼格森展开了进攻。他首先迂回包抄俄军的左翼，然后正面进攻，可是奥热罗的军队在一场暴风雪中迷了路，因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敌军主动出去，法军用骑兵不断冲锋，费了很大的力量才击退本尼格森。莱斯托克军队的到来使得法军处境更加糟糕；但是正在追击他的内伊终于在傍晚 7 时赶到战场，他迂回包抄本尼格森的右翼；本尼格森后来下令撤退。二万五千名俄军和一万八千名法军阵亡了。拿破仑停止追击敌军，并率领部队回到帕萨尔格河彼岸。他在沃斯特鲁达设立了自己的司令部，继之于 4 月 1 日又将司令部移至芬肯施泰因城堡。

拿破仑赢得了这场死伤惨重的战斗，但是他的计划再次失败了，还必须进行一次夏季战役。他再次陷于危境；他远离法国，在那里战争正在引起一场工业危机，危机迫使他大量增加政府定货和信贷，以避免失业的蔓延。同时，奥国可能会参战，而英国也有可能试图在大陆展开活动。艾劳战役轰动了整个欧洲，它加深了波兰战役遗留下来的印象。艾劳战役表明，拿破仑的战略和大军的力量很不适应这些平原地区和气候条件。布赖特公司不得不承认在保证运输方面无能为力；乡间只能提供有限的军需品；部队力量减弱了，只有四分之一的士兵能够参加战斗，其余的则要守卫后方。要战胜俄国，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都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

六、夏季战役与提尔西特条约（1807 年）

最简单的任务是补充新兵。从 1806 年 9 月至 11 月，后备役和这一年所征募的新兵的一半被派往莱茵河，克勒曼又从这里把他们一队队地派往前方去。另一半的新兵也以同样的方法于 10 月至 12 月派遣出去。正当拿破仑启程到前方去时，他提前征召了 1807 年度的新兵；这批士兵也在冬季走上征途了。最后于 1807 年 4 月，1808 年度的新兵也被征募，这些新兵刚到兵站就被立即派出，装备不齐，并且完全缺乏军事训练。带领新兵也变得困难起来，首次用新兵组成“临时团队”，同一些幸存的干部混合编在一起。帝国总共征募了十一万名士兵；同时，盟国军队由四万人增到十一万二千人，其中有德意志军队、荷兰军队、波兰军队、由拉·罗曼纳侯爵率领的西班牙军队以及意大利军队。1807 年 7 月 15 日，在德意志境内的帝国大军达四十一万人，为 1806 年 9 月兵员总数的二倍。大约有十万人参加了弗里德兰战役。此外，皇帝还在意大利驻扎着十二万人，监视着奥国和西西里岛，另外还有十一万人（其中有一些国民自卫军步兵）保卫着海防。

组织运输和供应要困难得多。私人公司在供应军需品方面的失败使皇帝

把后勤工作都军事化了，至少原则上是如此。炮队扩充了，并组织了辎重队；设立了军粮总局，并委派马雷的兄弟负责。这样 1807 年战争的结果使得国家的职权扩大了。但是不应由此推断说，这一切改变了拿破仑战争的特征。新的组织机构从未满足过需要，大部分车辆仍然是在行军途中偶然获得的。军粮总局局长几乎是不管正在战斗的部队，否则就不成其为“以战养战”了。1807 年战役期间，拿破仑从法国仅调去三万匹军马用以补充在波茨坦和库尔姆的新马站；他认为就地征用一切军需品却更为经济和便利。在德意志设立了作坊，并和当地的船夫和马车夫订立了运输合同。困难多半仍然还是难以克服的。在货物不能运输的情况下，保持连续不断的生产也无济于事。充塞在维斯杜拉河东部——欧洲人烟最稀少的地区——的战士们所能获得的东西仅仅是能使他们免于饿死而已。到 7 月为止，法军才收到了二万六千件大衣，五万二千件短上衣，和同等数量的裤子；在后方仍有大批的鞋子储备着没有穿用。俄军方面由于同样的原因，象往常一样深受苦难。而他们的盟军的条件也并不好些，尽管他们是在本土作战。东普鲁士全境遭到彻底蹂躏和掠夺。

拿破仑一边备战，一边进行谈判，试图在反法同盟各国中播下不和的种子，并使奥国保持中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那种坚决的姿态为时不长。12 月 16 日，他把外交大臣的职务交给施泰因，但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不肯撤换他的亲信顾问，也不肯组成一个政见一致的政府，施泰因拒绝了，这使得国王对他很生气。仍然负责外交的察斯特罗急于同法国谈判，因为他担心自己的产业会被没收。拿破仑在 11 月 16 日的停战协定的谈判失败之后曾宣布，除非签订全面和约，否则就不进行谈判。于是国王就听从了劝告，要求俄国和英国赞成谈判，他们同意了，其条件是，法国必须首先提出和平谈判的基础。在这期间，拿破仑由于处境困难，便又想与普鲁士单独媾和，而他自己曾使普鲁士想媾和的建议遭挫。他在 1 月底向普鲁士建议谈判，并在艾劳战役后派贝特朗到科尼希斯贝格去肯定谈判的诚意。国王派克莱斯特上校去芬肯施泰因作为回访。拿破仑坚持了自己的条件，同时也同意召开一次会议，4 月，当普鲁士为会议提交了一份正式建议时，他便接受下来。6 月 9 日，国王通知了英国；到这时，战役已经接近尾声了。拿破仑从这些谈判中得到的好处是，这些谈判招致了亚历山大对普鲁士的不满。4 月 2 日，沙皇到达梅默尔规劝国王以哈登堡接替察斯特罗；4 月 23 日，他诱导国王签署了巴滕施泰因协定，从而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同盟。直到那时，普军还没有失去希望，因为俄军仍在竭力拯救但泽。可是，这座要塞城市的陷落，以及容克地主对盟军过分放肆的行为的抱怨，使得两国关系忽然冷淡下来。因此，亚历山大心中开始模糊地形成了逐渐把他引向提尔西特和谈的思想。

奥地利的态度只能促进沙皇这种想法。新宰相施塔迪翁伯爵急欲进攻拿破仑；但是他断定，法军仍然是个劲敌，对普鲁士和俄国的野心他也感到不安。所以，奥国进行备战，待机而动。自 10 月以来，拿破仑就一直在交替

使用着引诱和威胁手段，他建议结盟，但没有提出别的，只提出以加里西亚交换西里西亚，并且还坚持要奥国停止武装。施塔迪翁却在故意回避；可是，1 月间他却派遣了文森特男爵到华沙与塔列朗谈判，而塔列朗毫不费力地使文森特陷入他的圈套中。施塔迪翁要摆脱其它的谈判代表而且还要不得罪他们则更为困难，他们是：俄国大使拉祖莫夫斯基，跟他一起的还有波佐·迪·博尔戈，一个效忠沙皇的法国亡命者，以及英国代表阿戴尔。召开和谈会议的计划及时地使奥国从窘境中解脱出来。3 月 18 日，施塔迪翁提出一项调停建议，4 月 7 日经过塔列朗同意，这一建议成为正式建议。当谈判各方都接受了这一调停建议时，拿破仑却突然变得沉默起来，他将塔列朗召到身边，整个 5 月都没有给文森特答复。就这样，拿破仑在奥国出面调停之前就可以重开战端，而这是亚历山大决不能原谅奥国的。

但更令亚历山大激怒的是英国的态度。福克斯死后，他的同僚仍然在当权，霍威克勋爵继福克斯出掌外交部。他们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显示出岛国的偏狭性。攻占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公众唯一关心的是西属美洲；一些军队被派到了那里去，对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的远征占用了可动用的部队，因此，沙皇要求英国在大陆发动牵制攻击，英国就没有办到。西西里岛本可以作为一个进攻意大利的极好基地，可是福克斯将军是玛丽亚-卡罗莉娜的冤家对头，并且也没有得到增援部队，他宣布他自己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英国政府仍然舍不得花钱，它拒绝担保俄国发行的一笔公债。英国政府的外交也不够灵活。它到 1807 年 1 月 28 日才同普鲁士签订和约，条件是要普鲁士从汉诺威撤军；甚至在此之后，英国仍故意冷落普鲁士。英国驻科尼希斯贝格和圣彼得堡的大使哈钦森和道格拉斯既不灵活变通又不干练，并且暴露了他们自己是拿破仑的热情崇拜者。最后，内阁于 2 月因天主教徒问题而岌岌可危；国王终于答应撤消宣誓条例，但仍拒绝授与天主教徒较高的军阶，在海军中尤其如此。3 月 7 日，内阁辞职；托利党又执政了，并以“不要天主教”为口号进行竞选。政府只是在名义上由波特兰公爵领导；政府的重要部门又由皮特的门徒掌握，他们要恢复皮特的对欧洲大陆的政策，并且在政策的实施中显示出同样不屈不挠的决心。埃格蒙特勋爵之子珀西瓦尔，担任财政大臣；巴瑟斯特出任商务大臣；特别是坎宁出任外交大臣，以及卡斯尔雷出任陆军大臣。然而由于人们不很了解这些人，所以他们的上台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坎宁直到 5 月 16 日才任命莱维森-高尔为新任驻俄大使。坎宁对普鲁士仍然心存疑虑，怀疑它想收回汉诺威以称霸北德意志；他认为，在汉诺威只不过是用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取代拿破仑的军国主义，英国则一无所获。他所关心的主要是策动瑞典的古斯塔夫四世破坏他与法国在 4 月 18 日签定的停战协定。当夏季战役开始时，反法同盟各国对英国的愤懑达到了高峰。

正值亚历山大枉费心机地等待着英国发动牵制攻击的时候，他自己不得不分调一部分兵力去攻打波斯，和继续进行他所不合时宜地发动的对土耳其的战争。于是拿破仑抓住时机同沙皇的敌人搞好关系，因此欧洲的冲突便扩

大到了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就象在督政府时期一样。俄国将军米切尔森已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并未发一枪一弹就拿下了布加勒斯特；但是他的部分军队却被召回，因而他只好就此止步。虽然拿破仑怂恿了塞利姆三世对俄宣战，但是鲁斯丘克的帕夏、统帅着多瑙河军队的“旗手”穆斯塔法到5月底仍按兵不动。塞尔维亚人的暴动因而便有着重大的意义，特别是他们在12月12日夺取了贝尔格莱德之后情况就更是如此。土耳其人答应了塞尔维亚人的一切要求，可是现在俄国代理人的影响却占了上风。3月，帕夏苏莱曼及其军队撤退时遭到屠杀，塞尔维亚的民众议会投票决定与沙皇结盟。拿破仑竭尽全力帮助土耳其苏丹；他与艾奥尼纳的帕夏阿里-泰布兰言归于好，并诱使他进攻科孚岛和圣摩尔岛；马尔蒙将大炮和炮兵教官派往波斯尼亚的帕夏那里；一名军官去到了在鲁斯丘克的帕夏那里，另一名去到了在维丁刚刚去世的帕斯万·奥格卢的继任者那里。皇帝甚至还提出把达尔马提亚的军队派遣到多瑙河去。这一消息冒犯了穆斯林的感情，塞利姆本人也拒绝过于依赖法国；3月间派到拿破仑那里的使节没有与他达成结盟的协议。5月末，俄军侵入了小瓦拉吉亚，以便援助塞尔维亚人，后者正取道克拉伊纳向多瑙河进军；但他们不得不急忙撤退，因为“旗手”穆斯塔法终于渡过了多瑙河。可是他并没有走很远。5月25日，土耳其近卫军步兵在君士坦丁堡叛变，他们杀死了大臣，废除了“新军”，废黜了塞利姆，由塞利姆的堂兄弟穆斯塔法四世继位。“旗手”穆斯塔法撤退了，于是俄军得以同塞尔维亚人于7月17日在纳果廷城下会师。

英国人在东方支援俄军，然而他们这样做有自己的打算。英国海军上将达克沃思要求土耳其苏丹恢复1798年的联盟并对法国宣战，苏丹拒绝了英国的要求，达克沃思的舰队便于2月19日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并于次日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塞利姆的使者们敷衍拖延时间，以便让塞巴斯蒂亚尼组织城防；到26日，苏丹便抛下了假面具，达克沃思不得不于3月3日惶惶退出达达尼尔海峡，受到了一定损失。英国没有坚持下去。其实英国无意为俄国利益出力；英国政府宁愿重新占领埃及。自从法军离开埃及之后，土耳其苏丹一直没有能在埃及恢复统治。马穆鲁克人打败了科斯勒夫帕夏，而在其首领穆罕默德·阿里率领下的阿尔巴尼亚军队则取得了独立。马穆鲁克人的分裂有利于穆罕默德·阿里：奥斯曼的别伊巴尔迪西结好于他；穆罕默德·埃尔-埃尔菲则和英国人勾上，而这两个马穆鲁克首领又都与法国领事德罗韦蒂勾结。最后于1804年穆罕默德·阿里将巴尔迪西驱逐出开罗，并与土耳其人断绝了关系，还迫使土耳其苏丹承认他为这个国家的代理总督，1805年又迫使土耳其苏丹承认他为帕夏。英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干涉使得埃尔-埃尔菲替代了他，可是穆罕默德·阿里不肯妥协；后来这两个马穆鲁克首领相继去世，这就使得他能够为所欲为了。为这次失败进行报复的达克沃思从西西里调来一支分遣队，在亚历山大港登陆；他们占领了罗塞塔，但很快就被穆罕默德·阿里所发动的一次袭击所打败。1807年4月22日，穆罕默

德·阿里包围了亚历山大港，英军于9月15日签署了撤军协定。

当时，英国人在波斯也遭到挫折。波斯王自1804年来就一直同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交战，1806年的一次失败使他失去了巴库和达格斯坦。波斯王同时向拿破仑和印度总督求援。法国派出代表去商谈结盟问题，接着，波斯使团到芬肯施泰因拜会了皇帝，5月7日在那里签定了一项条约。法国同意将波斯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同意向波斯提供武器和教官；而波斯则答应支援法国实行计划中的对印度的远征。5月10日，拿破仑给加尔达内将军发出了训令，派他出使德黑兰。

总之，一切都变得对拿破仑有利起来，然而，只有对俄国取得决定性胜利才能粉碎反法同盟。而本尼格森给拿破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但泽和西里西亚（科塞尔除外）都已陷落，法军只要一发起进攻，科尼希斯贝克就会失守，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本尼格森试图以突袭来拯救这座城市，6月初，他贸然向帕萨尔格河挺进，以期击溃在帕萨尔格河右岸扎营的内伊。内伊从本尼格森的包围中逃脱出来，与达武在沿河一带会师，与此同时，其余的法国大军于6月9日向俄军的右翼进攻，以便切断俄军与莱斯托克的二万四千名普军的联系。本尼格森然后退守海尔斯贝格，这是阿勒河上的一个设防阵地。缪拉本应当把本尼格森围困在该地，以保证法军通过唯一可行的大路，可是他却于6月10日轻率地展开全面进攻，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损失约一万人，并使本尼格森得以沿着阿勒河右岸撤退下来。拿破仑此时投入攻击正在向科尼希斯贝克撤退的普军。本尼格森想支援普军，发动袭击牵制法军，6月13日，他在弗里德兰渡过阿勒河。他可能就只想做这件事，因为当他在次日清晨遇到拉纳的军团时，他并无意利用自己的优势兵力。这样他就给了皇帝充分的时间以便带领三个军团赶到战场。俄军的左翼在击退了内伊的两次猛攻之后终于被法军炮火突破。桥梁被焚毁，本尼格森部队被追赶到河里，损失了二万五千人。其残部在法军的追击下撤到提尔西特。俄国将领受到这一打击而惊惶失措，认为必须签订停战协定，亚历山大的使节于6月19日被派去要求签订停战协定。他们受到了友善的接待，并于6月21日签署了协定。除此之外，迪罗克19日就向他们提出了签订和约的建议。

拿破仑需要和平：如果俄国继续抵抗，他就得渡过涅曼河；这就需要再次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而战争旷日持久会使奥国有机可乘。就亚历山大而言，他对各同盟国都有不满，也无意孤注一掷了。他的兄弟康斯坦丁是完全倾向媾和的，康斯坦丁的汇报无疑地说服了亚历山大：在遭到入侵的情况下一切都可能发生：军队哗变、贵族谋叛、波兰各省暴动，或许农奴也要造反。亚历山大接着又会见了弗里德里希-威廉，6月22日哈登堡趁机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建议：已不复存在的普鲁士劝说沙皇改变他的全部政策，向拿破仑建议建立三国联盟，对英国作战，并重绘欧洲地图；俄国和奥国将瓜分土耳其，并与普鲁士一起放弃它们所占有的波兰领土；萨克森国王将入主华沙，而将自己的国土让给普鲁士。由此可见，正是普鲁士在引导沙皇与法国

结盟并与英国决裂。对英国十分恼怒的亚历山大欣然接受了这样的建议。此外，哈登堡的计划将会再次把他与拿破仑一起树为欧洲的调停人，就如同在1801年那样；因为处在当时的情况下普鲁士几乎是无足轻重的。这恰恰符合于拿破仑的想法；他暂时放弃了征服俄国的念头，并且打算让俄国代替普鲁士作为自己的盟国。这一建议于6月23日送到亚历山大手里，它触动了沙皇的虚荣心。他也许认为他能象捉弄许多别人一样诱惑拿破仑，因此提出举行一次私人会晤。这次会晤是于6月25日在涅曼河中间的一个木筏上举行的。在这里两位皇帝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彼此说了些什么：这就是“提尔西特的秘密”。

实现和平与结成联盟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还必须决定普鲁士的命运。拿破仑一分钟也没有考虑过要承认普鲁士为第三方。他以蔑视的态度对待弗里德里希-威廉，并且把他撂在一边。路易莎王后于7月6日前来拜会拿破仑；他很有礼貌地听她的谈话，但她却空手而归。已经原则上同意了哈登堡计划的亚历山大竭尽全力维护他的盟友，但结果在结成联盟时却没有让普鲁士参加。为此他会被斥责为背信弃义。他无疑地看出了拿破仑是很固执不容商量的，所以就附和了拿破仑的主张。皇帝认为他是根据征服的权利占有普鲁士的，而且可以继续占有它；尽管如此，出于对沙皇的敬意，他愿意同普鲁士签订停战协定，并归还其部分领土。拿破仑想必是还用东方问题的前景来炫惑亚历山大，他们一旦使英国恢复理性，甚至在这以前，就将着手解决东方问题。总之，他使沙皇着迷。

1807年7月7日于提尔西特签署的文件包括一项和约、某些秘密条款和一个盟约。7月9日又增加了一项与普鲁士签订的单独条约。俄国经过这场战争毫无损失；相反地，普鲁士丧失了易北河以西的全部领土，如英国同意割让汉诺威给拿破仑，则普鲁士还能重新获得三十万至四十万臣民。东弗里西亚群岛已经并入荷兰，普鲁士在威斯特法利亚的领土已划入贝格大公国。其余的领土——明登、希尔德斯海姆、哈耳伯斯塔特、马格德堡——都与不伦瑞克、黑森-卡塞尔、汉诺威的一部分、奥斯纳布吕克和格廷根合并组成了将由热罗姆统治的威斯特法利亚王国。拿破仑把汉诺威的其余部分与埃尔富特、哈瑙以及富耳达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普鲁士也放弃了它所瓜分的波兰各省，除了西普鲁士的一小块地方以外，这块地方是一边把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另一边把东普鲁士连接在一起的三十公里宽的地峡。被肢解切割剩下四个省份的普鲁士还给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但是7月12日所签署的条约又规定在付清赔款以后，法国才从普鲁士撤军。既然没有让沙皇作为一方参加签署这个条约，因此他就无权过问这个协定的实施，这样拿破仑就暂时控制了整个普鲁士。

法俄联盟前途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波兰各省，只有但泽问题已经解决，它现在是普鲁士领土上一个孤立的都市，变成一个自由市，但仍由法国将军拉普继续占领。不幸的是，恰恰是在波兰问题上，提尔西特会谈的秘密至今

仍被隐藏得深不可测。毫无疑问，拿破仑很愿意与沙皇共同瓜分普鲁士；事实上，他已经建议俄国应该扩张到涅曼河。拿破仑似乎要把他已征服的波兰各省送给沙皇，条件是让法国另占有西里西亚。这一建议遭到沙皇的拒绝，在原来普占波兰各省中，俄国只并吞了比亚威斯托克省。假如拿破仑不要求西里西亚并答应归还普鲁士在中德意志的领土，亚历山大也许会接受这一建议的。结果普鲁士的波兰各省被组成了一个华沙大公国。这种解决办法可能是沙皇本人作为一种暂时的妥协方案提出来的；或许又是拿破仑的主意；无论如何，这个有二百万人口的华沙大公国是被置于萨克森国王的统治之下了。皇帝于7月22日经过德累斯顿时，给波兰人颁布了一部宪法。象威斯特法利亚一样，这个新的大公国也加入了莱茵邦联，三万名法国士兵驻扎在那里。这样就重建了一个波兰国家，只不过没有用“波兰”的国名罢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法国反俄的前沿阵地而已，所以它一开始就在法俄联盟中埋下了解体的种子。

在拿破仑这样把大帝国扩展直到涅曼河时，亚历山大却在放弃保罗一世在地中海所取得的权益。他将科托尔和爱奥尼亚群岛割让给了法国，甚至还从不久前才占领的多瑙河两公国撤了出去，对撤出的条件只是在和约签订之前土耳其人不应重新占领这些公国，拿破仑应在俄土之间充当调解者；如果土耳其苏丹在三个月之内拒绝签订和约的话，法国就将与俄国联合起来剥夺土耳其政府除鲁梅利亚之外的在欧洲的全部领地。至于英国，则由亚历山大出面调停，要求英国归还法国的殖民地，并承认海洋自由。如果调停失败，法国就要采取措施，迫使瑞典、丹麦和葡萄牙加入大陆体系。这样一来，就无异于续订和扩大了1801年的协定；沙皇就能够指望征服芬兰和土耳其；而拿破仑则可征服葡萄牙，同时还可组成一个禁止对英贸易的大陆联盟，普鲁士已经参加大陆封锁；被孤立的奥地利也难以拒绝这样做。陷于法俄联盟夹击之中的这两个德意志国家沦落到无能为力的地步，因此，也就不可能缔结任何反法同盟。

因此，对拿破仑来说，提尔西特和约是一个辉煌的成就，纵然只是一个暂时的成就。虽然亚历山大似乎是落入了拿破仑的圈套（而他却认为拿破仑是处在他的支配之下），他的虚荣心和反复无常的性格肯定是不会让这种局面长期存在下去的。同一个在性格上不能平等待人的人合作，他是不会忠实地同他平分秋色一起统治欧洲的。毫无疑问，亚历山大既狡猾又诡诈，内心深处确实另有打算。即从一种险恶局面中毫无损伤地解脱出来，他推想，法国会比英国更乐意允许他掠夺瑞典和土耳其。同时，他仍完全有自由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重新拿起武器。因此有人认为，是他欺骗了拿破仑。

完全不是这样。在提尔西特进行谈判时，拿破仑对梅内瓦尔说过，他决心不把君士坦丁堡交给俄国人：“它就是世界的帝国”。在拿破仑心目中，法俄联盟并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而是俄国纳入了他的体系，因而变为他的附庸国。他不可能不会想到，迟早有一天战争将会再起，可是拿破仑

是个只顾眼前的人；他知道，他要重建军队、解除奥国的武装并使西欧完全归于他的统治，就需要和平。法俄联盟就使得和平有了保证，至少在目前是如此；或许这个联盟甚至还会使他能征服英国。下一步如何，走着再瞧。如果俄国在英国失败之前发动战争，那么他就将先征服俄国。但是，拿破仑只要有俄国的支持，那怕是暂时的支持，他就会赢得时间聚集他所需要的力量，以便打败亚历山大。

